

安邦大略

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编著

中国历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论析

军事科学出版社

Anbang
Dal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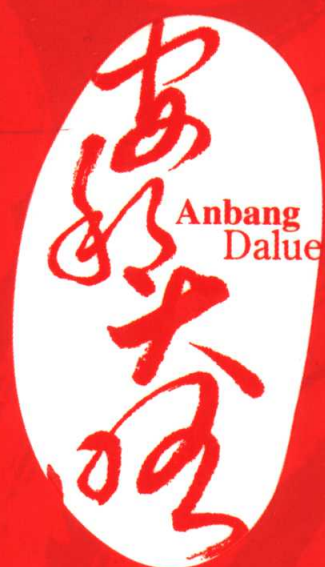
安邦大略

■宗庙社稷之安危，为中国历朝历代的头等大事。故国家安全的战略思考与国家相伴生。

■本书辑析了中国从先秦到晚清历代政治家、军事家对国家安全战略思考的思想成果。

■关于国家安全的战略思考凝聚了中华民族维护国家安全的智慧和奋斗历史。历久弥新，史鉴深远。

■“内事文而和，外事武而义”；“治安中国而四夷服”；“居安思危”、“安不忘战”。传统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综合性、内敛性、预防性的特点，昭示了中国未来国家安全战略的脉动。



Anbang
Dalue

ISBN 978-7-80237-127-9



9 787802 371279 >

定价：52.80元

安邦大略

——中国历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论析

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 编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邦大略/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编著.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80237-127-9

I. 安… II. 军… III. 国家安全-研究-中国 IV.D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0600 号

安邦大略

主 编: 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

责任编辑: 潘 宏

封面设计: 倪春昊

出版发行: 军事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100091)

标准书号: ISBN 987-7-80237-127-9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鑫海达印刷厂

开 本: 1000 毫米×1400 毫米 B5

印 张: 17.5

字 数: 586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52.80 元

销售热线: (010) 66767216 62882626

传 真: (010) 66768547

网 址: [http:// www.jskxcbs.com](http://www.jskxcbs.com)

电子邮箱: jskxcbs@163.com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储运部联系(010-66767383)

学术指导委员会

主 任	李德义			
副主任	任 力			
委 员	吴如嵩	张一文	张文才	
	范中义	于泽民	刘 庆	

课 题 组

主 编	钟少异				
副主编	霍印章	葛业文	魏 鸿		
成 员	李如龙	萧大维	高润浩	李元鹏	喻 江



序

李锐书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但世界仍然很不安宁。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为适应世界战略形势的发展变化,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国家安全战略理论研究。我部第四研究室课题组的同志编撰出版了《安邦大略——中国历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论析》一书,颇具现实意义。

国家安全战略作为从宏观和全局高度筹划与指导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总体方略,是国家根本利益的集中表现,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中国历代明君良相、有识之士,为了治国安邦,高度关注国家安全,在处理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留下了极为丰富的遗产。见之于历代帝王及大臣、学者遗留下来的许多诏书、敕谕、奏疏、对策和文章,对涉及当时国家安全的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不乏独到的战略性思考和精辟论述,形成了日久弥新的国家安全观念,成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念和国家安全战略思想,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在认识和处理国家安全问题上的高超智慧,具有鲜明的特点。择其大要:一是强调整体性。把国家安全看成是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多种因素互相联系、综合作用的结果,主张内外兼顾,文武并用,以实现国家的总体安全。二是注重防御性。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农耕自然经济和农业社会结构,使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安土惧迁、追求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和内敛持重、崇尚和平的民族



气质,反映在军事文化上则是主张慎战,反对好战,尚武而不黷武。中国历史上国家安全战略的主流思想是,注重防御,防御先于进攻;强调守土,守土重于拓疆。三是倡行忧患意识。中国历代有识之士通过对社会、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关注和深入思考,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等国家安全理念,主张居安思危、治不忘乱,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保持和加强安全防范与忧患意识。

中国历史上的这些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的思想和论述,有的被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用,为安定国家、消除内外祸乱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虽然没有被付诸实施,但仍不掩智慧的光芒,对我们不乏现实的启示和借鉴。它们都是中国历代宝贵的思想遗产。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尚未对其进行系统的整理,更没有在此基础上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期待着这本书的面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憾,并为人们进一步开掘国家安全战略理论的历史宝藏,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研究国家安全战略理论,不仅要立足现实,前瞻未来,也需要从历史的长河中探寻源头和脉络,对其经验和教训进行科学的思辨。历史是现实的基石,研究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把握现实,筹划未来。读了这本《安邦大略——中国历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论析》,深感其虽是一部基础性的研究著作,但通过对中国历代国家安全问题紧密相关史料的梳理分析,从历史的纵深探讨国家安全问题,总结历史上治乱兴衰的成败得失,为现实提供一面可资借鉴的镜子,使我们可以更深入、更准确地认识今天所面临的安全形势,思考和把握当今世界的安全问题,从中寻求应对的良策,深化当代国家安全战略研究,进而不断丰富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

2007年12月17日

说 明

当前,在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错综交织的时代大背景下,国家安全理论和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我国历史上在处理国家安全事务方面有着独到而丰富的理论和思想,这对于我们今天思考国家安全问题仍具有宝贵的启迪和借鉴意义。本书围绕中国先秦到晚清历代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对有关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思想和论述进行系统收集和梳理,精选出具有重大历史影响和现实借鉴意义的名论名篇,对其进行必要的注释和白话翻译,着力评析其思想内涵、历史作用和价值意义;同时,通过对历朝历代有关国家安全战略重要论述的整理和研究,总体揭示出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发展脉络和基本特点,旨在为思考当前和未来的国家安全战略问题,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体系提供借鉴和参考。

本书由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第四研究室编撰完成,任务分工如下:

导 言	钟少异
第一章 先秦(上)	萧大维
第二章 先秦(下)	李如龙 魏 鸿
第三章 秦汉	霍印章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	钟少异 喻 江(三国)



第五章	隋唐五代	高润浩
第六章	宋元	魏 鸿
第七章	明	葛业文
第八章	清前期	葛业文
第九章	清后期	李元鹏

魏鸿对先秦上、下和魏晋南北朝三章,葛业文对隋唐五代、宋元、清后期三章,霍印章对明和清前期二章,进行了统改;钟少异对全书进行了统稿。

本书的编撰得到了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黄星部长、科研指导部组织计划部周宏伟部长的大力支持;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寿晓松部长、李德义副部长和第四研究室任力主任自始至终给予了关心和具体指导,寿部长并为本书作序;吴如嵩、张一文、张文才、范中义、于泽民、任力、刘庆等专家审读了书稿,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求是》杂志社刘润为副总编、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周为民总编、国防大学研究生院刘春志院长、军事科学院专家组傅立群同志,以及《学习时报》陶春编辑评阅了书稿,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感谢。

恳切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利我们今后进一步修订完善。

编 者

二〇〇七年十月

导 言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中国历史上,“宗庙社稷”——国家的安危存亡始终是头等大事,关于国家安全问题很早就产生了战略性的思考,并逐渐形成一系列相当稳定的思想,成为历朝历代安内攘外、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的指针和依据。这些思想,也是中国历史上维护国家安全的经验的结晶,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国家安全问题、制定国家安全战略仍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一、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基本倾向

在历史上,东亚大陆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区。中国作为东亚大陆的核心国家,所面临的是一个独特的安全环境:以两河(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中原王朝,建立于发达的农业文明基础之上,其外部威胁,都来自于这个区域周边的部、族、邦、国,特别是活动于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武装集团,对王朝构成了最大威胁;其内部威胁,则根源于中原王朝自身不同阶级、阶层、政治势力和集团错综复杂的矛盾。孕育于这一环境的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具有三个基本的倾向或特点。

一是综合性。强调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社会安全和军事安全、富国和强兵相统一。

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仅仅着眼于边疆和外部,也不能单纯依靠军事和武力,更不能简单地依恃山河险固,而必须从内、外两个方向,“文”(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非军事因素)“武”(军事因素)两大方面综合进行努力,这样才能够达成内部团结安定、国家巩固安全的局面。故说:“内事文而和,外事武而义”^①;

^① 《逸周书·武纪》。



“文武并用,长久之术”^①。体现出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社会安全和军事安全、国家安全和国家治理紧密结合的特点。

战国法家、兵家系统地提出了“富国强兵”和“农战”思想。认为国家安全的根本在于富国强兵,“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②;而富国强兵的关键是“重农战”,即重视农业和战争,“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③。这个观点的实质是把经济和军事视为国家安全的根本支柱,紧紧抓住了“文”、“武”两大方面的核心因素,深刻触及了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国家安全的本质,即以农业为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以军事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二者并重,相辅相成,从而实现富国和强兵、社会安全和军事安全、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的统一。孔子主张治国之要在于“足食,足兵,民信之”^④;墨子认为“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⑤,都包含有相似的意义。这一思想实际上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遵行。

同样,在力量运用和策略手段上,历朝历代也都十分强调文武结合,相辅而行,相资为用,而反对单纯或简单地使用武力。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⑥尉繚子说:“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⑦这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以汉、唐、清三大盛世为代表,凡是社会安定繁荣的时期,其统治者大都能够着眼全局,深谋远虑,军事手段与非军事手段相结合,文武相济,一张一弛,较好地处理了国家安全上的重大问题。

① 《史记·酈生陆贾列传》。

② 《管子·治国》。

③ 《商君书·农战》。

④ 《论语·颜渊》。

⑤ 《墨子·七患》。

⑥ 《史记·孔子世家》。

⑦ 《尉繚子·兵令上》。



二是内敛性。重内部治理而非向外扩张,重防御而非进攻。

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认识到,国家犹如人,外患还可救,“疾自中起”(从内部发病),就难以应付了^①。因此,内部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是外部安全的前提。及至秦汉以降,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的宜农区域基本上得到了开发,历朝历代更都把广大农耕区域也即王朝内部的治理和稳定作为关注的重点,而不是把向外拓张领土作为国家的目标。主流思想始终认为,“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②,只要把内部治理好了,国家安定强大,周边的部族邦国自然就会顺服;对外扩张用兵则是靡费国家、烦扰社会之举,即使占领了远方的土地,也没有多大用处,徒增国家的动荡和损耗。

在这种思想主导下,防御便成为军事上的基本倾向。自秦汉以来,抵御周边部族邦国特别是强悍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保护中原农业社会的安全,是每一个中原王朝的基本职责。历朝历代对北方游牧民族的防御,总是随国力的升降而在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之间变化。消极防御,突出地表现为收缩防线,依凭筑城,单纯防守,各个朝代的末期通常如此。积极防御,往往表现为主动出击,如强盛的汉朝和唐朝,以及明朝永乐时期,都曾向北出击,并分别击溃了匈奴、突厥和蒙古诸部的军事力量。但历史上的每一次出击,总在取得一定的胜利后即收兵凯旋,将军队的主力撤回到长城以内。进攻行动的适可而止,说明中原王朝的战略重点始终是确保长城以内广大农耕区域的安全,而不是向外拓张领土。因此,进攻是短促的、暂时的,防御是长期的、持久的。历代边防的经常性情况,恰如明太祖朱元璋所强调的方略:固守疆围,防其侵扰;来则御之,去则勿追^③。

① 《国语·晋语六》。

②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唐纪九》,太宗贞观三年十二月。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二,洪武元年六月庚子。



与此相应,中国传统安全战略又表现出强烈的大陆性特征,即专注于大陆农业区的安全和防御,海洋往往只被看作保护内陆安全的一道疆界或防线,即所谓“海疆”、“海防”。特别是随着时代的推移,到封建社会后期,海洋越来越被视为威胁大陆安全的祸患来源,而不是需要大力拓展的“利藪”。自郑和下西洋活动中止后,明、清两朝的海洋战略基本上就等同于海防战略,其核心是防范敌寇从海上侵犯大陆;而且,与陆上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相比较,海防始终处于次要的、从属的位置。因此,海防的基本方针一直是沿岸近海防御,海上力量建设始终局限于沿海或近海海军。

三是预防性。提倡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注重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

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中国先哲很早就意识到保持忧患意识(也即危机意识)的重要性。《周易》中便有“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箴言^①。先秦兵书《司马法》也明确指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②基于这个认识,历代贤明的政治家、军事家,都十分强调居安思危,见微知著,对各种潜在的威胁保持戒备,预为防范。“乃其有备,有备无患”^③;“无备,虽众不可恃”^④。所以《吴子》说:“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⑤也就是说,保障国家安全的方法,预先戒备是最重要的。

先秦伟大的哲学家老子还从事物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出发,深刻指出:“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⑥意为:局面

① 《周易·系辞下》。

② 《司马法·仁本》。

③ 《尚书·说命中》。

④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⑤ 《吴子·料敌》。

⑥ 《道德经·六十四章》。



安定的时候容易掌握,事变还没有明显迹象的时候容易谋控;事物在脆弱的时候容易被消解,在细微的时候容易被驱散。因而精辟地提出“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即在事端没有形成之前就进行处理,在祸乱没有发生的时候就进行治理。与老子的深远哲思互为表里,古代思想家还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作比喻^①,形象地揭示了在国家战略筹谋上绝对不能忽视看似微小不起眼的潜在危害的道理。

在这些思想影响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提倡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注重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的安全理念。正是秉承这样的传统,各个时代的有识之士,居安思危,针对国家安全上的重大问题,发表了大量论见,试图启迪当朝,防患未然,也为后人留下了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丰富遗产。

二、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近代化

近代世界格局、内外关系和中国社会的剧变,对中国自古以来的安全观念构成了严重冲击。在新的安全环境和新的安全形势下,传统安全战略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 朝贡体系崩溃,视野的放大和观念的更新

自古以来,中国历代王朝都自视为天下的中心,秉持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致力于通过文、武两手的综合运用,来构建周边部族邦国“万方来朝”的理想局面。即使在能力有所不及的时候,也一贯保持其“天朝上国”的优势意识。至19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大举入侵,晚清政府失地丧权,传统朝贡体系土崩瓦解,“天朝上国”的心理优势被彻底摧毁。国人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走出,逐步认识到新的世界格局和潮流,逐步对国家的状况有了现实的体认,于是从追求理想化的朝贡体系逐步转向

^① 《韩非子·喻老》、《淮南子·人间训》。



对国家地位的现实估量,开始谋求正常国家关系下的国家安全。与此同时,鸦片战争以来与列强打交道的屈辱史,又使人们深刻认识到,没有强大的实力就没有正常的国家关系,就没有国家安全。因此,“变革图强”随之成为近代以来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主轴。

(二)“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注重工业和科技对国家安全的作用

鸦片战争失败首先使国人看到,西方“船坚炮利”,是其取胜的直接原因,因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①,其核心内容就是学习、引进西方的近代军事工业和军事技术,改善武器装备,从而加强军力和国防。这个主张经过19世纪晚期的洋务运动而趋于普及,并逐渐由单纯发展军事工业扩展为发展近代工业和科技,增强国家的整体实力,包括国防实力。这标志着近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走出了传统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单纯重农的局囿,开始把工业和科技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柱。

(三)以“商战”富国强兵,开始注重经贸对国家安全的作用

晚清鸦片泛滥,白银外流,民气萎靡,使人们看到贸易也有动摇国本的作用。近代兴办军事工业对资金的巨额需求,增强了国人对“振兴商业”的重视。有识者进而认识到,近代中国国防的衰弱,深层原因还在于国家经济不发达;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根本目的是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这不断加剧了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因而主张与西方进行“商战”,发展和维护本国的经济。“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②。这个主张渐成思潮,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传统观念通常把商业和农业相对立,认为商业的发展必然会损害对农业的重视,动摇国家的根本,因而主张“重农

① 魏源《海国图志》序。

② 《郑观应集》上册,第614、586、591页。



抑商”；甚至把手工业及其技术与商业一并视为“末业”和“末技”，与作为“本”的农业相对立，主张“重本抑末”。近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商战”等主张的推动下，逐渐走出了这个误区，看到了工业、科技和商业经贸对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

（四）从重塞防轻海防趋向塞防、海防并重

历史上中原王朝所受到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武装集团，因此历代王朝都把军事防御的重心放在北方，致力于构建塞防。从秦汉至明清，在北部边疆实行多层次、大纵深防御的思想日趋完善。相对于北部塞防，东南海防一直不太受重视。但近代西方列强却从东南海上攻破了中国的门户。自鸦片战争开始，东南海防告急，威胁与日俱增。而与此同时，沙俄和日本又从西北和东北两个方向大肆入侵，对传统的塞防构成严重威胁。面对这个局势，晚清关于塞防和海防孰轻孰重发生了激烈争论，最终形成了塞防、海防并重的较为一致的认识。在此过程中，近代中国的军事安全视角和国防战略取向逐步发生了转变。

近代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总体上在变革中不断发展，逐步近代化。但由于国家政权的日益腐朽、没落，许多有益的思想，最终都难以实现或收效甚微，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危机反而一步步加剧。处身于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而苦苦求索的民族先行者们逐渐认识到，必须以革命的手段建立自主自强的新中国，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安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三、借鉴中国历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需把握的几个问题

中国历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是中华民族战略思维的一份宝贵财富，它根源于历史上各个朝代维护国家安全的丰富实践，同时又对历朝历代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它又是中华民族维护国家安全的奋斗历史的一个缩影。



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不曾中断的文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始终注重从自己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寻求启迪和借鉴。当前,在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错综交织的新的时代大背景下,国家安全理论和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我们今天整理和研究中国历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目的就是为思考当今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问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理论提供参考和借鉴。为此,需特别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一)着重把握其精神实质和战略思维方法,汲取精华

今天,世界正进入信息化、全球化的“地球村”时代,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大环境已经远远超越了雄视东亚的古代中国和深受西方冲击的近代中国所处之环境,国家安全的内容和意涵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广泛而复杂,国家安全诸因素的关联和互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紧密而迅疾,这决定了中国历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不可能简单地套用于现代。从今天来看,中国历代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的战略思想,其价值和意义首先在于其中所包含的那些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特别是一些基本理论和原则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实质和战略思维的方法。我们从中国历代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中,应当着重汲取这些方面的精华,以达到启迪思维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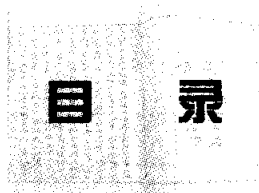
(二)既看到智慧,也看到局限;既看到成功,也看到失败

中国历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既蕴含了深邃的理性智慧,也有其不可避免的时代和环境局限;同时,中国历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来自于实践又运用于实践,有其十分丰富的实践内容,其中既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无论智慧还是局限,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先人和历史留下的一份宝贵遗产,我们都应当认真地加以分析和总结。既不夜郎自大,也不讳疾忌医,既从成功中看到经验,也从失败中看到教训,从而进一步深化对有关思想的认识和理解,为思考当前和未来的国家安全问题提供正、反两个方面的借鉴和启示。



(三) 紧密联系当前实际,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这段话透辟地阐明了对待前人思想遗产的正确方法。研究和借鉴中国历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在根本上也必须采取这样的方法。换言之,必须立足现实,紧密联系当前实际,对前人的思想有所“吸收”,有所“拒绝”,更有所“增加”,即根据新的时代特点进行创造性的发展,从而达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目的,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富于时代特点、切合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国家安全理论和国家安全战略。



导 言	(1)

第一章 先 秦(上)

• 概述	(2)
• 《禹贡》述大禹区分九州	(4)
• 《五子之歌》论民为邦本	(9)
• 周公论立政	(11)
• 《周易》论居安思危	(14)
• 《逸周书》论武穆	(16)
• 《逸周书》论武纪	(19)
• 五父谏亲仁善邻	(21)
• 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	(23)
• 管仲论招携以礼、怀远以德	(27)
• 宫之奇谏假道	(29)
• 楚庄王论止戈为武	(33)
• 范文子论外患内忧	(36)
• 司马侯论三殆	(39)
• 范蠡论持盈、定倾、节事	(43)
• 赵武灵王论胡服骑射	(46)
• 赵武灵王论以原阳为骑邑	(51)
• 策士说齐闵王后起、远怨	(55)



第二章 先秦(下)

- 概述 (60)
- 老子论不以兵强天下 (62)
- 老子论治之于未乱 (65)
- 孔子论足食足兵民信之 (67)
- 孔子论有国有家者 (69)
- 孔子论文事武备 (72)
- 孙子论安国全军 (74)
- 孙子论兵贵胜不贵久 (77)
- 墨子论备者国之重 (82)
- 商鞅论农战 (84)
- 《司马法》论好战必亡忘战必危 (87)
- 《管子》论霸王之主 (90)
- 孟子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92)
- 孟子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95)
- 荀子论节用裕民 (98)
- 《吕氏春秋》论简选精良 (103)

第三章 秦汉

- 概述 (108)
- 秦始皇、李斯论分封制 (111)
- 贾谊《治安策》 (114)
- 晁错论削藩 (117)
- 主父偃请行推恩法 (120)
- 晁错《言兵事疏》 (123)
- 晁错论募民守边备塞 (130)
- 晁错论贵粟强边富国 (134)
- 王恢、韩安国对匈奴战和之争 (138)
- 侯应论罢边备 (142)



• 扬雄谏不许单于朝	(147)
• 赵充国《屯田制羌疏》	(151)
• 陆贾论长治久安	(157)
• 刘秀论出击匈奴	(161)
• 屯屠何上书求破北成南	(167)
• 班超《请兵平定西域疏》	(171)
• 皇甫规上书请纓平羌	(176)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

• 概述	(182)
• 曹操《置屯田令》	(184)
• 诸葛亮《隆中对》	(187)
• 诸葛亮《绝盟好议》	(191)
• 陆抗《戒动师旅疏》	(195)
• 刘颂《陈封国之制》	(199)
• 陶璜、山涛谏平吴罢兵	(202)
• 郭钦《徙戎疏》	(205)
• 阮种论抚绥以德	(209)
• 蔡谟论抗威待时	(212)
• 王羲之谏殷浩北伐	(215)
• 袁乔劝桓温伐蜀	(219)
• 苻坚等论山河之固	(221)
• 苻融谏伐东晋	(224)
• 李安世《均田疏》	(228)
• 崔浩等议伐柔然	(232)
• 韩秀谏罢敦煌戍	(237)
• 袁翻论安置柔然	(240)
• 孙绍论国之防守	(245)
• 古弼论罪之小大	(248)



第五章 隋唐五代

- 概述 (252)
- 长孙晟《攻突厥之策》 (255)
- 隋文帝《改革府兵制诏》 (259)
- 唐太宗论便桥之盟 (262)
- 唐太宗论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 (266)
- 唐太宗论不筑长城 (269)
- 唐太宗论中华夷狄爱之如一 (272)
- 魏征论理政得失 (275)
- 马周《陈时政疏》 (279)
- 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282)
- 郭元振《守安西四镇疏》 (286)
- 韦嗣立论立国资于储蓄 (290)
- 李泌《对肃宗破贼疏》 (295)
- 陆贽论居重驭轻 (299)
- 刘晏论漕运利病 (303)
- 王朴论攻取之道 (308)

第六章 宋 元

- 概述 (312)
- 宋太祖与赵普论息兵 (315)
- 宋太祖与赵普雪夜问对 (318)
- 王禹偁论边防 (321)
- 贾昌朝论削方镇兵权过甚 (326)
- 蔡襄论强兵富国 (329)
- 苏辙论三冗 (332)
- 李纲论战和 (341)
- 虞允文论四州之不可弃 (344)
- 郝经《东师议》 (348)



• 郝经《立政议》	(353)

第七章 明

• 概述	(362)
• 明太祖论御边之道	(364)
• 明太祖论安近来远	(367)
• 明太祖申海禁策	(370)
• 叶伯巨谏分封太侈	(372)
• 明成祖《北征诏》	(376)
• 诸臣议请明成祖迁都	(379)
• 史家论明宣宗内迁开平卫	(382)
• 刘球《谏伐麓川疏》	(385)
• 唐顺之论海防策略	(389)
• 张濂论御倭策	(392)
• 戚继光《练兵条议疏》	(396)
• 王崇古论俺答封贡	(399)
• 宋应昌论援朝抗倭	(403)
• 许孚远论开放海禁	(406)
• 徐光启论御后金策	(409)
• 马文升论爱民以固邦本	(412)
• 薛应旂论省官	(415)
• 高拱论漕粮海运	(418)

第八章 清前期

• 概述	(422)
• 康熙论不修长城	(424)
• 康熙论抗击沙俄侵略	(428)
• 康熙论地方镇将不时朝覲	(432)
• 施琅《边患宜靖疏》	(434)
• 施琅《陈台湾弃留利害疏》	(437)



• 李之芳论禁海迁界	(441)
• 李光坡论海防	(445)
• 蓝鼎元论开放南洋之禁	(448)
• 雍正论对回民策	(451)
• 鄂尔泰《改土归流疏》	(454)
• 晏斯盛论绥理苗疆	(458)
• 张广泗等奏请众建土司	(461)
• 乾隆论柔远安边	(463)
• 乾隆论征讨廓尔喀	(467)
• 福康安上治理西藏策	(470)
• 乾隆论守中国	(473)
• 舒赫德《八旗开垦边地疏》	(476)
• 乾隆谕移民新疆	(479)
• 乾隆《赐英吉利国王敕书》	(481)
• 嘉庆谕防堵外国兵船入内海	(484)

第九章 清后期

• 概述	(488)
• 黄爵滋奏请严禁鸦片	(490)
• 魏源《海国图志》序	(494)
• 左宗棠论自行设局造船	(499)
•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	(503)
• 左宗棠论海防塞防并重	(507)
• 左宗棠《遵旨统筹全局折》	(511)
• 刘铭传《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	(515)
• 张之洞《选募新军创练洋操折》	(519)
• 郑观应论以商立国	(523)
• 严复《拟上皇帝书》	(527)
• 梁启超《论尚武》	(530)

第一章 先秦(上)

安而不忘危，
存而不忘亡，
治而不忘乱。

——《周易·系辞下》



概 述

先秦时期,自公元前 21 世纪至公元前 221 年,历时 1900 余年。包括夏(约前 21 世纪~前 16 世纪)、商(约前 16 世纪~前 11 世纪)、西周(约前 11 世纪~前 771 年)三个朝代和春秋(前 770 年~前 476 年)、战国(前 475~前 221 年)时期,是中国古代国家安全实践的初始阶段,也是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奠基时期。此时期各个阶段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促进了战略思维的发育,为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萌芽、成形、发展和成熟,奠定了基础;同时,战略思维和安全思想的成熟,又极大地推动了实践的发展^①。

夏、商、西周三代是中国王朝历史的开端,国家机器初步建立,渐具规模。其时,王朝周边部族方国林立,王朝的生存、国家的安全始终面临巨大的压力;奴隶制逐步成熟,阶级矛盾尖锐。王朝内外的安全压力、无数次动乱和夏商两朝亡国绝祀的事例,不断地激发了政治家、军事家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思考,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由萌芽而趋于成形。特别是在西周时期,统治者“制礼作乐”,治国理念和国家制度及其所体现出来的国家安全思想都更为成熟。

春秋时期,奴隶制逐渐向封建制转变。周王室衰微,丧失了对诸侯国的控制力,原先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最终被诸侯争霸所取代。各诸侯国互相蚕食兼并,同时还要应对周边部族的侵扰,国家安全实践日趋丰富而多彩。大国在争霸过程中不断寻求增强实力的办法和途径,以多种手段打击、削弱对手,以联盟维持霸业。中、小国家则在大国争霸的夹缝中左右周旋,力求自保。五霸迭兴的过程中,政治、军事、外交等国家手段的运用越来越灵活多样。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互相兼并使中国历史迈向了统一的进程。战国前期,秦、楚、齐、魏、韩、赵、燕七雄并列成型;战国中期,七雄争强,各国内求变

^① 由于先秦时期时间跨度长,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内容丰富,所以本书把先秦部分分为上、下两章,第一章先秦(上)编选和论析先秦经史文献中的有关思想,第二章先秦(下)集中选析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著作中的有关思想。



革发展,外施纵横捭阖;战国后期,秦国远交近攻,各个击破,最终完成了对六国的统一。

如果说春秋时期国家安全实践的主要内容是大国争霸,那么战国时期国家安全实践最重大的主题就是富国强兵、实现统一。时代的风云际会,使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出现了空前的大发展,迅速地趋于成熟。

从先秦时期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实践来看,不同阶段统治者对国家安全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明晰的过程。国家出现后的最初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国家安全问题的认识和其他社会问题一样,笼罩在早期天地鬼神崇拜的迷雾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实践的发展,这些迷雾不断被破除,人们的思考越来越理性,思维越来越活跃,思想也越来越深刻。总的来看,先秦国家安全思想萌芽早,成熟快,内容丰富,内涵深邃,深深植根于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社会土壤,与时代的演进相同步。这个时期在长期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以中国古代独到的战略思维方式,揭示了维护国家安全最基本的原则要求,确立了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基本框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包括以下思想观念:

“居安思危”^①,辩证认识安危、存亡、治乱之间的转换关系,强调忧患意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②,基于朴素的民本意识,认识到人民是保持国家安宁的基础和保护国家安全的主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③,高度重视战争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强调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主导地位,谋求安国全军之道;“内事文而和,外事武而义”^④,强调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手段维护国家安全,等等。特别是与中国古代中央集权政治的早熟相关联,先秦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很早就确立了追求国家“大一统”目标的鲜明立场,并持续地推动着诸侯兼并战争最终迈向了国家的统一。

先秦时期维护国家安全的这些基本思想和指导原则,奠定了中国后世历朝历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发展的基础,为维系中国作为世界上惟一不曾中断几千年文明进程的国家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① 《左传·襄公十一年》。

② 《尚书·五子之歌》。

③ 《左传·成公十三年》。

④ 《逸周书·武纪》。



《禹贡》述大禹区分九州

题引:《禹贡》是《尚书·虞夏书》中的一篇。《尚书》为夏、商、周三代的文献汇编,相传为孔子所编定,因而被后世儒家奉为经典。《禹贡》一篇著成于东周(春秋战国)时期,该文所述大禹区分九州,划分五服,“任土作贡”,是中国传统“大一统”观念的重要源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原文】

禹别^①九州^②,随山^③浚^④川,任土^⑤作贡。

……中邦^⑥锡^⑦土、姓,祗^⑧台^⑨德先,不距朕行^⑩。

五百里甸服^⑪。百里赋纳^⑫总^⑬,二百里纳铎^⑭,三百里纳秸^⑮服,四百里

① 别:区分。

② 九州:指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等中国古代九个大的行政区域。

③ 随山:即“随山刊木”之意,指顺着山势砍削树木作为标志。

④ 浚川:疏通河道。浚,疏通。

⑤ 任土作贡:根据土地肥瘠的情况制定贡赋等级。

⑥ 中邦:指中央之国,天子之邦。《十三经注疏》以此“中邦”两字属上句,此据钱宗武等《尚书新笺与上古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

⑦ 锡:通“赐”,赐给。

⑧ 祗(zhi,音支):恭敬。

⑨ 台(yi,音移):以。

⑩ 不距朕行:不违背我天子的政教所行。距,同“拒”;朕,天子自称。

⑪ 甸服:天子王畿之外,以王畿为中心,每五百里为一行政区划,由近而远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等五个地带,称为“五服”。甸服的主要任务是替天子耕田,贡献谷物。甸,都城郊外的地区。

⑫ 纳:交纳。

⑬ 总:指禾的总体。

⑭ 铎(zhi,音质):古代的一种短镰刀。这里用来指代禾穗。

⑮ 秸:去掉芒的禾穗。



粟,五百里米。

五百里侯服^①。百里采^②,二百里男邦^③,三百里诸侯^④。

五百里绥服^⑤。三百里揆^⑥文教,二百里奋武卫^⑦。

五百里要服^⑧。三百里夷^⑨,二百里蔡^⑩。

五百里荒服^⑪。三百里蛮^⑫,二百里流^⑬。

东渐^⑭于海,西被^⑮于流沙,朔^⑯南暨声教讫^⑰于四海。禹锡玄圭^⑱,告厥^⑲成功。

【译文】

禹区分九州,顺着山势砍削树木作为标志,疏通河道,根据土地的肥瘠情况制定贡赋的等级。

……将天子之邦的土地赏赐给诸侯,并赐以姓氏,以他们的品德作为赏赐的先后依据,这些人都是不违抗我政教措施的人们。

国都以外五百里叫作甸服。离国都最近的一百里缴纳连秆的禾,二百里

① 侯服:服侍天子,司候王命。侯,同“候”。

② 采:替天子服各种差役。

③ 男邦:替邦国服差役。男,任。

④ 诸侯:此处意为替天子守望放哨。

⑤ 绥服:替天子做安抚之事。

⑥ 揆(kui,音奎):度量,考察。

⑦ 奋武卫:奋扬武威,保卫君主。

⑧ 要服:受王者约束而服事之。要,约束。

⑨ 夷:平,和平相处。

⑩ 蔡:法,遵守王法。

⑪ 荒服:替天子守卫边远的地方。

⑫ 蛮:尊重当地人风俗,维持与他们的隶属关系。

⑬ 流:任由他们流动迁徙,可以进贡也可以不进贡。

⑭ 渐:流入。

⑮ 被:及,到。

⑯ 朔:北方。

⑰ 讫(qi音气):通“迄”,到达。

⑱ 玄圭:天青色美玉。玄,天青色;圭,吉祥的美玉。

⑲ 厥:其。



缴纳禾穗,三百里缴纳去掉芒的禾穗,四百里缴纳带谷壳的粗米,五百里缴纳去掉谷壳的精米。

甸服以外五百里是侯服。离甸服最近一百里的替天子服各种差役,二百里的替国家服各种差役,三百里的替天子警戒放哨。

侯服以外五百里是绥服。离侯服最近三百里的,考察天子的政教,在自己的封地里推行;较远二百里的奋扬武威,为天子作藩卫。

绥服以外五百里是要服。离绥服最近三百里的要彼此和平相处,较远二百里的要遵守王法。

要服以外五百里是荒服。离要服最近三百里的要尊重他们的风俗,维持和他们的隶属关系;再远二百里的可以随便流动迁徙,可以进贡也可以不进贡。

东方进入大海,西方到达沙漠,北方、南方连同声教都到达外族居住的地方。于是,禹被赐予玄色的美玉,表示大功告成了。

【评析】

先秦国家安全思想最显著的特点,是很早就形成了追求国家“大一统”的思想倾向,强调“尊王”。这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政治早熟的一个标志。公元前2000多年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国君集最高军权、神权、行政权于一身,是国家最高统治者,附属侯、伯都要服从夏王的调遣指挥。商、周时期,形成了“内服”、“外服”的官僚体制,外服有“侯、甸、男、卫、邦伯”等,内服有“百僚、庶尹”等^①,国君通过这套体系维护中央王朝的统治。到西周时期,已经建立起以周天子为首的各级贵族组成的金字塔式统治结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成为严格的政治制度。

夏、商、周三代的集权程度虽然远远不能和秦汉以后相比,但是从思想观念来说,中央政权的惟一性和天下一统的观念已经牢固树立,“也许从夏朝国家开始,华夏族王朝的统治者就认为至少在理论上他们是人们所能了解的整个世界的君主。在整个先秦时期,中原王朝从未承认过在其统治范围之外还可能有与之对等的政治实体”^②。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种种制约,早期国家的中央权力对地方的控制还是比较弱的,天子可以直接控制王畿,离王畿越

^① 《尚书·酒诰》。

^②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9页。



远,天子的控制力越弱。这正是按照距离政治中心远近区分“五服”思想得以产生的客观基础。

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无论商、周,其疆域都没有“五服”叙述的那样广阔,也不可能出现那样整齐划一的格局。与其说“五服”是商周时期实施的行政区划,毋宁说它是一种带有浓厚理想色彩的国家观念。这一观念产生于殷周时期的政治实践,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深化、完善。早在西周穆王时期,政治家祭公谋父已经对“五服”模式做了详尽的阐述,他说:“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①这一“五服”论以王畿为中心,按照远近亲疏关系,由内向外扩展,形成同心圆式的等级管理结构。“五服”之中,甸、侯、宾三服大体相当于王畿与诸侯的领地,对应的是“华夏”的地域,要服、荒服对应的则是“蛮夷”、“戎狄”等周边部族的范围。

祭公谋父的“五服”思想在先秦文献中可以得到多处印证^②,本篇所引《尚书·禹贡》所论便与祭公谋父之说大体相同,只是以“宾服”为“绥服”而已。虽然《禹贡》是著成于东周时期的一部地理学著作,并非大禹“别九州”、“任土作贡”的原始史料,但是,由于它作为儒家经典的重要地位,经它阐发之后,“五服”思想便成为更加系统、整齐的天下模式,其影响也更为深远。后来,由“五服”思想又推广而成“九服之制”,即《周礼·职方氏》所载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虽然区分的层次增加了,但基本的内涵是一致的。

以《禹贡》为代表的“五服”思想所构建起来的天下模式包括这样几层含义:天子是政权的核心,包括周边部族的整个天下都应当承认天子权威的惟一性,接受天子统治;天下是一个统一的、连续的整体,是天子德政教化的对象,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③;从天子直接控制的王畿到偏远的要荒之地,地域上有远近之别,文明发展程度上有高低之分,在所承担的职能、义务上由重而轻,中央政权对待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统治措施。这种天下模式体现了以国家统一、中央集权为要素的天下情怀,成为

① 《国语·周语上》。

② 参见李学勤:《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86~192页。

③ 《诗经·小雅·北山》。



后世中华民族“大一统”国家观念的思想基础。此外,它所阐释的对待要服、荒服等周边部族较为松散的羁縻统治方式,也成为后世中央王朝处理边疆民族关系的重要准则。



《五子之歌》论民为邦本

题引:太康是夏朝第二位君主,因荒淫无度而被驱逐,其弟五人作《五子之歌》,指责他不遵古训而失国。本篇节选自《尚书·虞夏书·五子之歌》,强调了“民惟邦本”的思想。

【原文】

皇祖^①有训:民可近,不可下^②。民惟邦本^③,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④能胜予^⑤。一人三^⑥失,怨岂在明^⑦,不见是图^⑧。予临^⑨兆^⑩民,懔乎^⑪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译文】

我们伟大的先祖大禹有训示:对待百姓,可以亲近他们,不应该认为他们卑贱。百姓是立国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才会安宁。我认为,天下的愚人都能胜过我。一个人会犯很多错误,难道只有明显的错误才会招致怨恨吗?应该在过失还很微小的时候就反复考虑,加以改正。我统治亿万人民,畏惧

① 皇祖:指夏朝的先祖大禹。皇,大。

② 下:低下。这里是意动用法,意为“以……为下”,即以之为卑贱。

③ 民惟邦本:百姓是立国之本。惟,乃,是;邦,国家。

④ 一:都,一概。

⑤ 予:我。

⑥ 三:泛指数量很多。

⑦ 明:明显的时候。

⑧ 不见是图:倒装句式,即“图不见”,指在错误还不明显、很细微的时候就反复考虑,加以改正。

⑨ 临:面临,引申为统治。

⑩ 兆民:人民,百姓。兆,数词,常用来表示极多。

⑪ 懔(lin,音凛)乎:内心恐惧。



的心情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着六匹马拉的车一样。地位在众人之上的人,为什么不谨慎从事呢?

【评析】

大禹的儿子启建立起中国古代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启死后,传位其子太康。太康身居高位却贪图安逸享乐,不顾人民疾苦,激起人民的怨愤。在这种情况下,太康依然纵情游乐,带领家属到洛水南面打猎,一走就是上百天,不愿回朝理政。东方部落的领袖、有穷国君后羿乘机在黄河北岸阻止太康回朝,袭占夏都,史称“太康失国”。太康的五个弟弟这时侍奉他们的母亲跟随打猎,当太康被阻后,他们在洛水入黄河处苦苦等候,始终不见太康回来,他们便陈述祖先大禹的告诫而作五首诗歌,指责太康轻视人民、纵情声色、失道乱纲、覆宗绝祀,表达了不慎厥德、追悔莫及的感叹。

本篇所选是《五子之歌》的第一首。太康之弟认为,从夏禹时候起,祖先就告诫他们,老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做人君的要十分重视老百姓的作用,只有根基稳固,国家才会安宁,如果轻视老百姓,最终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一句,由此成为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理论源头之一。

夏、商、周三代,人们对社会运动规律的认识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天神崇拜的阶段,然而,现实政治的深刻教训也使统治者开始意识到民众的巨大力量。尤其是到了殷周之际,奴隶制走向成熟,由于“殷鉴不远”,更让周人懂得“敬天保民”的重要性,以民为本的国家安全理念便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在《尚书·周书·蔡仲之命》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太康失国”10个世纪后的西周初年,周公东征平定蔡叔之乱后,封贤明敬德的蔡叔之子蔡仲为燕的国君,册封之词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告诫蔡仲施行德政,争取民心,只有这样才能立国巩固。

到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激荡下,民本思想得到更大程度的提升和发挥,许多政论名篇都以民心向背对国家安全、战争胜负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而立论,主张统治者执政修德、取信于民,得民心以得天下(见本书第二章所选孔子、孟子的有关论述)。民本主义的国家安全观也因此成为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的主流。



周公论立政

题引:周武王在伐纣两年后去世,其子成王继位。成王年幼,由武王之弟周公旦摄政,七年之后,周公还政成王,作《立政》告诫成王要健全官僚制度、加强军事力量建设,以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本篇节选自《尚书·立政》。

【原文】

今文子文孙^①,孺子^②王^③矣!其勿误于庶狱,惟有司之牧夫^④。其克^⑤诰^⑥尔戎兵以陟禹之迹^⑦,方行^⑧天下,至于海表^⑨,罔有^⑩不服,以覲^⑪文王之耿光^⑫,以扬武王之大烈^⑬。呜呼!继自今后王立政^⑭,其惟克用常人^⑮。

① 文子文孙:文王的子孙。

② 孺子:小孩子,指周成王。

③ 王:动词,称王,统治天下。

④ 惟有司之牧夫:“惟有司之牧夫是义之”的省略,意为只要让有关部门和主管官员去治理就行了。惟,只是;有司,有关部门;之,和;牧夫,官员。

⑤ 克:能。

⑥ 诰:治理。

⑦ 陟禹之迹:循行大禹的足迹,意指统一天下。陟(zhi,音质),提升,此处意为遵循。

⑧ 方行:广行,遍行。

⑨ 海表:海外。

⑩ 罔(wang,音网)有:没有。

⑪ 覲(jin,音进):见,此处意为显扬。

⑫ 耿光:光明,光辉。耿,明亮。

⑬ 大烈:伟大的功业。

⑭ 立政:建立长官。政,同“正”,长官。

⑮ 常人:善人,贤能善良的人。常,通“祥”,善。



【译文】

现在,先王贤明的子孙啊,您已经做上君王了!您可不要在各种狱讼案件上犯错误,就让有关部门和主管官员治理好了。您要治理好军队,循着大禹的足迹,遍行天下,直至海外,使普天之下没有不臣服的人,以此来显扬文王圣德的光辉,继续武王伟大的功业。啊!从今以后,继位的君王设立官员,一定要任用贤能善良的人。

【评析】

周公摄政以后,经过三年东征,铲除了管叔、蔡叔等反叛势力,天下日趋安定。这时,周王朝的迫切任务就是建立和完善统治制度。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悦)。”可见,在天下初安的情况下,周公以健全官僚制度为核心的“立政”措施适应了形势需要,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周朝很快进入了“成康之治”的盛世时期。

在本篇所选的这段话中,主要涉及了两方面的思想。

一是建立用人行政的官僚制度,作为国家机器良好运转的基础。周公总结夏、商两代的设官分职经验,制定了一套新的官职体制,相传《周礼》就是周公所作。官僚机构虽然是国君用以统治人民的工具,但国君并不应该随意干涉具体事务,而是应该让各个职能部门各司其职。这其中已经蕴含着将君主专制与制度管理相区别的思想。对于任用官员的标准,周公也明确提出,要任用贤能的“常人”,这是因为,任人唯贤是保证官僚体制正常、高效运转的基础,尤其在各种制度不能十分完备的古代社会,任人唯贤和任人唯亲就成为政治运行的分野。君主专政加上贤人辅政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理想模式。

二是高度重视军事,要求成王集中精力加强军事力量建设,维护天下安定统一。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明智的统治者总是把建设一支忠勇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实现军事安全、维系统治秩序的重要支柱。周公亲身参与武王伐纣战争、东征平叛战争,对此认识深刻。因此,他特别告诫成王,在其执政之后,只有掌握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方行天下”,“罔有不服”。否则,政治秩序的稳定、国家的安全尚且不能保障,又哪里谈得上不



显文王之耿光、发扬武王之伟业？

《尚书·立政》所阐述的建立健全官僚制度、任人唯贤以及发展军事力量等思想不但对西周王朝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对后世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历代统治者奉为圭臬的政治准则。



《周易》论居安思危

题引：《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本是古代卜筮之书，成书于西周至东周时期，后来被儒家视为群经之首。该书以象征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的八卦模式推演自然和人事的变化，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本篇选自《易传·系辞下》，论述了安危、存亡的辩证关系以及“安不忘危”的安全思想。

【原文】

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①。”

【译文】

国家发生危险的，是由于统治者自安于统治地位；国家走向灭亡的，是由于统治者只知道保持现状；国家发生祸乱的，是由于统治者沉迷于长期的太平局面。因此，君子在国家安定的时候不忘记可能有的危险，在国家存在的时候不忘记可能来临的灭亡，在国家太平的时候不忘记可能出现的祸乱。因此，他们就能得到自身的平安而国家也可以得到保全。《易经》说：“快要灭亡了！快要灭亡了！国家的命运如同系在嫩弱的苞草桑枝上一样危险。”（意指时时保持这样的忧患意识，国家就安全了）

【评析】

夏、商、周三代由于统治者思想麻痹导致政权颠覆、动乱亡国的事例数不胜数。无数惨痛的教训使古人很早就明白了“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道理，把居安思危作为寻求国家长治久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

^① 苞桑：苞草，桑枝。



春秋战国时期,类似的论述还有很多:“《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①;“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③;“于安思危,危则虑安”^④,等等。后世更是将“居安思危”作为安邦治国的基本准则,如《新唐书·魏徵传》有“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宋许洞《虎铃经》有“防乱于未乱,备急于未急”;《明太宗实录》卷九十三有“天下既平,不可不思患而豫防之。盖乱生于治,何也?非治之能生乱也,以其久安而不知戒,故乱生于所忽也。是故,天下虽有盘石之安,当常怀隍机^⑤之惧。守满持盈,居高思危,谨其始,虑其终,则可以保其位而安其身也”,等等。

中国古代“居安思危”的国家安全观就其思想内涵来说,一是强调克服麻痹思想,看到事物运动正反两方面的辩证关系,对可能的危险保持高度警惕;二是强调做好充分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祸乱,“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⑥。总之,只有防微杜渐、常备不懈才能争取国家安全的主动权。

① 《左传·襄公十一年》。

② 《吴子·料敌》。

③ 《司马法·仁本》。

④ 《战国策·楚策四·虞卿谓春申君》。

⑤ 隍机(niewu,音聂务):倾危不安。原作“机隍”,出自《尚书·秦誓》。

⑥ 《盐铁论·险固》。



《逸周书》论武穆

题引：《逸周书》是先秦古籍，本名《周书》，隋唐以后又称《汲冢周书》。系战国时人纂辑而成，反映了西周的一些史事。本篇选自《逸周书·武穆》，述及武王伐纣推翻殷商残暴统治后，周公旦针对安抚殷民和长治久安问题，提出了文武并用的对策。

【原文】

曰若稽古^①，曰昭天之道^②，熙帝之载^③，揆民之任^④，夷德之用^⑤。总之^⑥以咸殷^⑦。等之以□禁^⑧，成之以□和^⑨，咸康^⑩于民，卿格维时^⑪。监于列辟^⑫，敬惟^⑬三事，永有休^⑭哉！

① 曰若稽古：考察古代治道。《尚书》等先秦著作多以其作为文章的开端，后来逐渐演变为帝王诏谕的套语。曰若，语气词，无义；稽，考察。

② 昭天之道：彰明天道。昭，光大，彰明；天之道，即天道，温肃生杀之道。

③ 熙帝之载：发扬帝王的功业。载，事。帝载指用来教养万民的六府三事，详见《尚书·大禹谟》，六府指水、火、金、木、土、谷等百姓生活所需物资的积聚；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等治理百姓的三件政事。

④ 揆民之任：考察人们的才能，授以官职。揆(kuí，音奎)，考察，估量。

⑤ 夷德之用：按照不同的人的品德公平录用，授以职位。夷，平。

⑥ 之：比。

⑦ 咸殷：团结殷民。咸，和；殷，殷民。

⑧ 等之以□禁：用各种禁令规范、限制他们。等，齐，限制。□禁：对照全文，疑为“九禁”，指各种禁令。

⑨ □和：对照全文，疑为“五和”，指用各种和好措施团结他们。

⑩ 康：安乐。

⑪ 卿格维时：按时祭祀鬼神。卿，当为“飨”字之讹，意为供奉鬼神；格：到；维：以。

⑫ 监于列辟：借鉴各位先王的经验教训。监，通“鉴”，借鉴；辟(bì，音必)，天子、诸侯的通称，这里指周的历代君主。

⑬ 惟：用。

⑭ 休：吉庆，喜庆。



三事:一倡德,二和乱,三终齐^①。……

钦^②哉钦哉!余夙夜^③求之无射^④。

【译文】

考察古代圣王的行事,彰明上天的主张,发扬帝王的功业,根据人们的才能授与官职,依照人们的品德公平录用,全面地采用这些措施以安抚殷民。用禁令限制他们,用和好政策团结他们,使他们都像一般人一样过着安乐的生活,并按时祭祀鬼神。借鉴各位先君的经验,谨慎地推行三件事,就能永享吉庆啊!

这三件事:一是提倡仁德,二是消除逆乱,三是坚持统一百姓的思想行动。……

谨慎啊谨慎啊!我从早到晚都努力做到这些,从不厌倦。

【评析】

牧野之战周军占领殷都朝歌(今河南淇县)的第二天,周武王举行即位大典,宣告革殷成功,周朝建立,姬姓周王成为天下共主。在对待商畿地区殷朝遗民问题上,周武王采取安抚之策,分其地为邶、鄘、卫三部分,并派商纣之子武庚在邶地奉守商祀,显示出宽厚仁德的政治风范。同时,周武王还下令释放商纣王统治时期被囚禁的犯人,开仓放赈,救助灾民,并赏赐功臣,分封诸侯,追剿纣王死党,扫清残敌,使天下初步安定下来。

《逸周书·武穆》虽然不能断定是西周初年的原始史料,但是,它所记载的内容和思想与周初所采取的政治、军事措施基本一致,应该说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文中所讲的“武穆”,其要旨是用兵要讲道德,讲和睦,讲和美,对能够争取和团结的各个方面,都要尽可能地去争取和团结,这是军事领域武力与文德的结合,是孔子所说“有武事者必有文备”的典型例证(参见本书第二章孔子论文事武备)。文中所说“敬惟三事”——倡德、和乱、终齐(即提倡仁德,消除逆乱,统一百姓的思想行动),更进一步表明了文与武两种手段同时

① 终齐:坚持以礼规范人民。终,自始至终;齐,使之规范整齐。

② 钦:敬慎。

③ 夙夜:早晨晚上。

④ 射(yì,音译):通“戮”,厌倦。



并用的思想：既要推行德化，安民济民；也要严肃纲纪，消除逆乱；更要持之以恒地统一人民的思想和行动。文武并用的两手政策使周初形势很快安定下来，整个国家走上了有序发展的轨道。

周武王等周初统治者对待殷朝遗民的思想 and 实践给后人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它表明，战胜攻取固然重要，战后稳固形势的举措也同样重要。这一思想在先秦兵书经典《孙子兵法》中也有所阐发，孙子总结春秋以前的军事经验，强调了战胜攻取之后“修其功”的重要性（参见本书第二章孙子论安国全军）。“修功”不仅是论功行赏、战争总结，更重要的是要从战略、政略的高度进行战后安排，修明政治，巩固战果，实现人心安定，政局平稳。做不到这一点，即便实现了战胜攻取，也难以长久维持，甚至有可能逆转翻盘。



《逸周书》论武纪

题引:《武纪》是《逸周书》中全面论述维护国家安全和进行战争谋划的长篇论文,总结了自汤武以来处理国家内政、外交和战争的基本经验,主张坚持礼法,分清时宜,认真准备。本篇节录的几句话是对全文内容的概括。

【原文】

凡建国君民^①,内事文而和,外事武而义,其形^②慎而杀^③,其政直而公。本之以礼,动之以时,正之以度,师之以法,成之以仁,此之谓也。

【译文】

凡是建立国家统治人民,对内要用文德而和衷共济,对外要用武力而合于正义,用刑谨慎并且减轻刑罚,政事正直并且保持公平。把礼当作行动的根据,按照时机采取行动,用一定的尺度匡正自己,把法度作为学习的对象,用仁爱求取成功,“武纪”指的就是这些。

【评析】

春秋战国时期,重民尚德政治思想有了较大发展,出现了以改铸旧礼、弘扬仁义为基本特征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兴起。由于各诸侯国之间的争霸兼并愈演愈烈,彼此攻伐不断,使人们更加关注那些与战争成败、国家安危紧密联系的政治条件,关注仁义礼法、德政教化对国家政治、外交、军事活动所产生的影响。《逸周书·武纪》就反映了这样一种时代思潮。它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概括了商周以来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思想 and 经验,其中无论是讨论内政、外交还是作战攻伐,都紧密围绕国家政权不被倾覆的根本问题来谈,立意高

① 君民:统治人民。君,用作动词,统治。

② 形:通“刑”。

③ 杀:降等,减少,指减轻刑罚。



远,思想深刻。

《武纪》讲得最多的是如何谋划战争。自古兵凶战危,谋划战争要非常审慎。文中认为,攻打愿意服从的国家是不吉利的,攻打做好了战争准备的国家会产生危险,攻打凭险固守的国家很难获胜,这就是所谓不攻“三守”之国。此外,攻打别国还要分清“六时”、“五动”、“四顺”等几种情况,需要看准于敌不利、于我有利的时机才可以出兵。文中又指出,战争谋划要文武兼备,如果废弃仁爱,“文”的谋划就不足;废弃勇敢,“武”的谋划就不足;废弃武器装备,具体准备的谋划就不足。这些观点归结在一起,就是要实行“外事武而义”、“本之以礼”、“动之以时”、“成之以仁”的基本原则。

《武纪》还讨论了国家的内政、外交等各个方面,主张处理内政要坚持德政教化,处理与别国的关系要坚持仁义礼法。在内政方面,如果国内土地没有被分割,人民没有流散,政治教化尚未改变,即使国君昏乱,国家也还不至于灭亡。如果国家大事不合乎法度就不可以兴作,不合乎时宜就不可以进行。在外交方面,《武纪》主张与邻国的交往不能靠暗中算计,不能无理勒索又领兵袭击。一旦失约于邻国,两国关系就难以修复。由于自己德义丧失导致邻国不服,就难保不会发生祸患。

这些阐述鲜明地反映了作者以仁义礼法治国安邦的立场和观点,综合起来,就是要“内事文而和,外事武而义”。



五父谏亲仁善邻

题引:五父,春秋初期陈国公子,名佗。针对陈国疆域狭小、地处中原四战之地(国都在今河南淮阳一带)的特点,五父主张“亲仁善邻”,与周边邻国处好关系。本篇选自《左传·隐公六年》。

【原文】

五月庚申,郑伯^①侵陈,大获^②。往岁^③,郑伯请成^④于陈,陈侯^⑤不许。五父谏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陈侯曰:“宋、卫实难,郑何能为?”遂不许。

【译文】

鲁隐公六年(前716年)五月庚申日,郑庄公率军进攻陈国,获得重大胜利。过去,郑庄公曾经向陈国请求和解,而陈桓公不答应。陈公子佗向陈侯进谏说:“亲近仁者,善待四邻,这是国家最可宝贵的东西。您就答应郑国吧。”陈侯说:“宋国、卫国都做不到,郑国又能怎么样呢?”于是没有答应郑国的请求。

【评析】

本文所讲的故事发生在春秋初期。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周天子实力威望日衰,历史进入政由方伯、大国争霸的春秋时期。

① 郑伯:春秋初期郑国国君郑庄公。在位43年,有韬略,首先揭开春秋争霸战争的历史序幕,史称“郑庄公小霸”。

② 获:俘获,缴获。

③ 往岁:以前的时候。

④ 成:和解。

⑤ 陈侯:陈桓公。



春秋初期,晋、齐、鲁等各主要诸侯国大都专注于自身事务,只有郑国凭借几代君主的精心经营,政治上积极勤王,军事上乘乱开拓,经济上促进工商,成为当时实力强大的诸侯国。郑庄公以此为基础,开始了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的对外争霸事业。

郑庄公的争霸有着清晰的战略思考,就是正确选取打击对象,远交近攻,由弱到强,各个击破。齐、鲁两国力量较强,离郑国也比较远,对郑国构不成直接威胁,而宋、卫、陈、蔡诸国军事实力略逊一筹,与郑国同处中原腹心,成了郑庄公各个击破的打击对象。另一方面,郑庄公在争霸战争中又善于打着周天子的旗帜,凭借王室卿士的身份,对自己的进攻对象“以王命讨之”^①。此外,郑庄公还坚持奉行“礼乐”原则,对追随自己的诸侯国给予实际好处,对反对自己争霸的诸侯国也经常修好讲和,不贪其土,这种谨慎节制的态度使其争霸事业博得不少诸侯的信任和支持。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郑庄公对同为中原之国的陈国先请求和解,和解不成再行打击,争取了道义上的主动。而陈侯则昧于形势,不能与郑、宋、卫等周边邻国处好关系,造成了自己巨大的军事政治损失。

春秋时,宋、卫、陈、蔡等国都是地处黄河中下游中原腹心之地的中小诸侯,它们大多为虞、夏、商、周的后代。在文化心理上,这些国家素有文化发达地区的优越感,受周礼旧传统的影响束缚较大,政略战略相对保守。同时,由于它们大都国土狭小,军力单薄,又身陷列国争霸战争的中心漩涡,战略回旋余地不大,经常成为中原大国强国争夺控制的焦点,只能在大国斗争的夹缝中生存。由于地缘战略上的不利境地,它们很有必要相互团结,相互策应,共同应对来自大国强国的压力。五父讲的“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虽然原是本于周礼的道德原则,而且它并不能使一个国家从根本上自立自强,但是,它能够改善周边关系,为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争取更大的空间,对当时中原诸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五父提出的“亲仁善邻”观点此后超越了它所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成为中华民族普遍推崇的“交往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大国小国,在外交和自处上都应该“亲仁善邻”,惟有如此,才能利人利己,在国家安全和发展上获得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

^① 《左传·隐公九年》。



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

题引:管仲(? ~前645年),春秋初期齐国政治家,名夷吾。齐桓公即位后,任用管仲为相,整顿国政,实行经济、政治、军事全面改革,终于完成了富国强兵、称霸诸侯的大业。本篇节选自《国语·齐语》,主要讲了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的军事改革措施,此举大大提高了齐国的军事实力,为齐国称霸奠定了基础。

【原文】

桓公曰:“吾欲从事于诸侯^①,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国未安。”桓公曰:“安国若何?”管子对曰:“修旧法^②,择其善者而业^③用之;遂滋民^④,与无财^⑤,而敬百姓,则国安矣。”桓公曰:“诺。”……国既安矣,桓公曰:“国安矣,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君若正卒伍^⑥,修甲兵^⑦,则大国亦将正卒伍,修甲兵,则难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国诸侯有守御之备,则难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于天下诸侯,则事可以隐令,可以寄政。”桓公曰:“为之若何?”管子对曰:“作内政^⑧而寄军令焉。”桓公曰:“善。”

管子于是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⑨;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⑩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

① 从事于诸侯:在天下诸侯之中争取霸权,征讨不义。

② 法:霸王之法,实行争霸的方法。

③ 业:此处意为开创性地运用。

④ 遂滋民:滋育百姓。遂,培育;滋,长。

⑤ 与无财:救济贫困无财的人。

⑥ 卒伍:部队。

⑦ 甲兵:军事装备。

⑧ 内政:国政。

⑨ 里有司:在里中设立主管官吏。

⑩ 良人:乡士,乡大夫,主管乡的官员。



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①，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②。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③振旅^④，秋以猕^⑤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内教既成，令勿使迁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⑥，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⑦；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其欢欣足以相死。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⑧于天下，以诛^⑨无道，以屏^⑩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

【译文】

齐桓公说：“我想要在天下诸侯中成就霸业，现在能这样做吗？”管仲回答说：“还不行，国内尚未安定。”齐桓公说：“该怎么办才能安定国家呢？”管仲回答说：“研究过去实行霸业的方法，选择其中好的加以开创性运用；滋育万民，使百姓财富增长，而敬重百姓，那样国家就会安定。”齐桓公说：“好的。”……国内安定后，齐桓公说：“国内已经安定了，可以实行霸业了吗？”管仲回答说：“还不可以。您如果整束部队，治理装备，那么其他大国也将整束部队，治理装备，这样难以使霸业迅速成功。您有进攻出击的装备，小国诸侯同样有防守抵御的装备，这样也难以使霸业迅速成功。您要想很快在天下诸侯中称霸，这些军事建设就应当隐藏起来，寄托于国政之中。”齐桓公说：“具体应

① 小戎：古代戎车一乘，步卒 72 人，管仲改革后齐国戎车一乘为 50 人，由里长指挥。

② 五乡之帅帅之：由五乡的主官负责统领。五乡，每一军为五乡。齐国改革后以万人为军，而在西周是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第一个“帅”字是长官之意；第二个“帅”字是统管、统率之意。

③ 蒐(sou, 音搜)：春天的田猎。

④ 振旅：整治军队。振，整治。

⑤ 猕(xian, 音显)：秋天的田猎。《周礼》有“仲秋教治兵，遂以猕田”之语。

⑥ 相畴：相互熟悉的同一类人。畴，同类，相匹配的人。

⑦ 乖：不协调。

⑧ 方行：遍行、横行。

⑨ 诛：讨伐。

⑩ 屏：屏障，屏蔽，保卫。



该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说:“应当把军事建设融入国内政事的治理中。”齐桓公说:“好。”

管仲于是制定国家管理体制:五户人家编为一轨,轨中一人设为轨长;十轨为里,里中设有专人管理;四里为连,连里一人设为连长;十连为乡,乡中设乡大夫。管仲以此为基础设立军事编制:五户人家为一轨,所以五人为一伍,由轨长统领;十轨为一里,所以五十人为小戎,负责人率领兵车一乘;四里为一连,所以二百人编为一卒,由连长统领;十连为一乡,所以二千人为旅,由乡大夫统领;五乡为一师,所以一万人编成一军,由管理五乡的主官负责统率。齐国的武装力量编成三军,所以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天时,利用田猎整顿军旅;秋天的时候,利用田猎训练军队。因此,卒伍这样的小部队在里训练,军旅这样的大部队在郊外进行大规模操练。内部教习成军以后,下令有关人员不得迁徙。同一卒伍里的人共同祭祀祈福,有人死丧则一体抚恤,大家共同承担各种灾祸。这样,同一编制单位之内,人与人相互熟悉,家与家相互熟悉,他们世代生活在一起,从小一起长大,因此,当夜间战斗的时候,听声音就知道怎样进行协调;当白天战斗的时候,相互一看就知道怎样进行识别。同一编制里的人,感情之深能够拼死相救。他们生活共欢乐,行动相协调,死难同悲伤。这样的军队防守则协力固守,冲锋则全力出击。齐桓公有了这样的三万雄师劲旅,用它横行天下,诛伐无道,屏卫周室,天下各大诸侯国没有谁能够抵挡得了的。

【评析】

实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一个国家能否在各种安全威胁中生存发展,归根到底要靠实力说话。而要提高国家的实力,必须加强政治上的治理,打牢经济上的雄厚基础,提升军事上的实战能力。这三个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正如管仲在齐国进行的全面改革,覆盖了经济、内政、军事各个层面,使齐国经济更加发展,内政更加严密,军力大幅提升,具备了号令诸侯、称霸中原的实力基础。

管仲经济改革的主要措施有:鼓励和发展农业,根据土地肥瘠征收税赋,均土分力,调动农业生产者积极性;重视工商,督促渔、盐、铁、丝织品生产,保障产品行销中原各国;加强财政管理,制造金铜币,实行盐铁专卖,统制统销,充实国库,等等。通过这些经济改革,齐国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在内政上,管仲举贤任能,选派专才治理国家;整顿行政区划,使士农工商不相杂处,各



司其职；建立“野”、“鄙”行政组织，以扩大和加强对国都外郊野之地的管理。通过这些内政改革，齐国的中央集权得到加强，建立起了自上而下的严密统治秩序。

管仲的军事改革尤为引人注目。其中心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士乡组织同时又是军事组织，其实质是“寓兵于农”，兵农合一，军政合一。管仲这一改革，继承了夏、商、西周以来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传统，并进一步完善、严密其组织体制，使居民组织军事化，居则为轨之成员，出则为伍之战士；战时为兵，平时为民；农忙在家务农，农闲集中训练，战时出征，实行生产、训练和作战的多重管理和协调统一。通过这一措施，有效地扩大了齐国的军事力量规模。在作战中，由于战士都是世代生活在一起的族人、伙伴，协调能力和互助精神都较好，有利于提高部队战斗力。管仲还注重兵器装备的建设，加强军队的军事训练，使齐国一跃而成当时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



管仲论招携以礼、怀远以德

题引:管仲向齐桓公进言“招携以礼,怀远以德”,主张通过修礼诸侯的方式,赢得各诸侯国的拥护。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的图霸事业十分注重“道义”形象,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遵从周礼,具有鲜明的文武相资而行的特点。本篇选自《左传·僖公七年》。

【原文】

管仲言于齐侯^①曰:“臣闻之,招携^②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③,无人不怀。”

【译文】

管仲对齐桓公说:“我听说,要用礼义与各国相互提携,要用仁德使远方归附。坚持仁德、礼义的做法不改变,就没有人不接受您的安抚。”

【评析】

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评价管仲辅佐齐桓公的霸业时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赞美之辞,溢于言表。

在春秋争霸的历史舞台上,齐桓公扮演了称霸第一人的角色。当时,中原诸侯各国由于内乱或者国力相对较弱,无法抵御北方部族南下侵扰中原、楚国北上武力扩张的冲击,周王室和中原各国安全受到相当程度的威胁,需要有人出头担任诸侯之伯(长),率领大家“尊王攘夷”,保存和光大华夏文化。齐国地广民殷,有一定实力基础,齐桓公继位后,继承齐国自开国以来的“大国”传统,坚持把军事实力作为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坚强后盾,任用管仲

① 齐侯:齐桓公。

② 招携:招引,带领。

③ 易:更改,改变。



实行经济、内政、军事各层面的深入改革,具备了称霸的实力基础。

齐桓公霸业的形成,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他在协调处理中原各国关系的实践中,并不单纯依靠战争手段,而是注重运用外交和政治手段配合军事行动,高举“尊王攘夷”的政治旗号,坚持以周礼为行动准则,从而较好地争取了舆论和道义上的支持。齐桓公争霸初期,固然有对弱小国家无情兼并、增强实力之举。但是后来,齐桓公吸取教训,更多地是对诸侯国以道义攻心,采取军事行动也注重实施联盟威慑手段,善于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政治、军事的双重胜利。史称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①,实际上他主持会盟的次数远不止9次,史料记载的多国会盟达22次。齐桓公主持的这些会盟,有的为了安定周室,维护周天子权威;有的为了压服诸侯,树立齐国威望;有的为了稳定各诸侯国内部事务;有的为了团结诸侯,共同对付北方部族和楚国侵犯。在周天子的肯定、支持下,齐桓公经常出面协调诸侯各国关系,巩固诸侯联盟协作。而中原各诸侯国拥戴齐桓公的霸主地位,惟其马首是瞻,除了战略利益的原因,也是由于齐桓公采取了“招携以礼,怀远以德”的政治方略,较广泛地赢得了人心。

齐桓公文武相资而行、政治军事并举的图霸战略起到了团结诸侯、扩大影响的重要作用,收到了良好效果。这也说明,管仲尽心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其政治眼光和战略眼光让人钦佩。

^① 《史记·管晏列传》。



宫之奇谏假道

题引:宫之奇,春秋时期虞国名臣。公元前658年和公元前655年,晋献公两次借道虞国攻打虢国,灭掉虢国后,又在回师途中对虞国发动突袭,消灭了虞国。宫之奇两次劝谏虞公拒绝晋国借道的请求,但虞公并未听从,最终落得国破身虏的下场。本篇选自《左传·僖公五年》。

【原文】

晋侯^①复假道^②于虞^③以伐虢^④。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⑤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⑥,寇不可玩^⑦,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⑧,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公曰:“晋,吾宗也。岂害我哉?”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⑨。大伯不从,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

① 晋侯:晋献公,春秋时晋国国君,公元前676~前651年在位。

② 复假道:又一次借道。第一次借道在公元前658年,这一次在公元前655年。

③ 虞:国名,姬姓,周初所封,在今山西平陆县北。

④ 虢(guo,音国):国名,姬姓,周初所建,在今河南三门峡一带。

⑤ 表:外,外围。

⑥ 启:开启。

⑦ 玩:轻视,因为习惯而漫不经心。

⑧ 辅车相依:辅是车轮外的两条直木,用以增强车辐的承载力。又有一说,辅是车两旁之板,大车载物要用辅来支持,故辅与车有相依的关系。

⑨ 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意思是说,太伯和虞仲,都是太王的后代。太伯(大伯)是太王的长子,虞仲是太王的次子,下文王季是太王的第三子。太王(大王)即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按古代宗庙制度,始祖庙居中,以下左为昭、右为穆,依次排列。周代始祖后稷庙居中,以下第一代居左为昭,第二代居右为穆……古公亶父(太王)是第十二代,为穆;太伯、虞仲、王季是第十三代,为昭,因此说“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为王季之子,是第十四代,为穆,因此说“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



为文王卿士^①，勋在王室，藏于盟府^②。将虢是灭，何爱于虞^③？且虞能亲于桓、庄^④乎？其爱之也，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偪^⑤乎？亲以宠偪，犹尚害之，况以国乎？”公曰：“吾享祀丰絜^⑥，神必据^⑦我。”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⑧，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絜^⑨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⑩依，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⑪馨香，神其^⑫吐之乎？”弗听，许晋使。

官之奇以其族行^⑬。曰：“虞不腊^⑭矣。在此行也，晋不更举矣。”……

冬十二月丙子朔^⑮，晋灭虢。虢公丑^⑯奔京师^⑰。师还，馆^⑱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

【译文】

晋献公再次向虞国借道以进攻虢国。官之奇劝阻虞公说：“虢国是虞国

① 卿士：周王朝的执政官。

② 盟府：掌管功勋赏赐的官府。

③ 将虢是灭，何爱于虞：意思是说，晋国连虢国都想灭掉，还会对虞国有什么偏爱吗？晋也是姬姓国，始封之君为周成王之弟。依宗法关系，晋与虢亲一代，与虞疏一代。

④ 桓、庄：指晋献公之曾祖父桓叔和祖父庄伯的后代，即下文所说“桓、庄之族”。晋献公为了巩固自己的君权，几乎把同曾祖父、祖父的兄弟全部杀尽。

⑤ 偪：同“逼”，逼近，使之感到受威胁。

⑥ 絜：通“洁”。

⑦ 据：依，此处意为保佑。

⑧ 非人实亲：等于说“非亲人”。亲，亲近。

⑨ 絜(yì，音依)：是。

⑩ 冯：同“凭”。

⑪ 荐：献，奉上。

⑫ 其：岂。

⑬ 以其族行：率领他的家族出走了。

⑭ 腊：腊祭，在周历的十二月份。

⑮ 朔：初一。依干支记日，这个初一是丙子。

⑯ 丑：虢公的名字。

⑰ 京师：这里指周天子的都城洛邑（今河南洛阳）。

⑱ 馆：止宿，居留。



的屏障。虢国亡了,虞国必定跟着灭亡。晋国的贪欲不可纵容,外来的军队不可忽视,所谓的‘借道’,借一次就太过分了,难道还可以借第二次吗?俗话说‘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指的就是虞国和虢国的关系啊。”虞公说:“晋国,是我的同宗,难道会害我吗?”官之奇回答说:“太伯和虞仲,是太王的儿子。太伯不遵父命而逃往吴地,所以未能嗣位。虢仲、虢叔,是王季的儿子,做过文王的执政大臣,为王室立下了功勋,接受赏赐的誓词还藏在盟府。晋国连虢国都要灭掉,对我们虞国还会有什么偏爱吗?再说,晋侯对我们虞国的爱心,还能亲过桓叔和庄伯的后代吗?桓叔和庄伯的后代有什么罪过,晋侯几乎把他们斩尽杀绝,不就是因为关系太近了吗?亲族由于有宠而使晋侯有威胁感,尚且要把他们灭掉,又何况是一个国家呢?”虞公说:“我祭祀时供品又多又干净,神明一定保佑我。”官之奇回答说:“我听说,鬼神并非亲近某个特定的人,只要谁有德行他们就保佑谁。所以《周书》这么说:‘上天并不偏袒人,谁有德行辅佐谁。’又说:‘祭品芳香不算香,德行美好才算香。’又说:‘人们祭祀不换祭品,谁有德行就算谁有祭品。’照这样说,如果国君道德欠缺,人民就难以团结,神明也不愿受祭。神明所凭依的,就在于有德之人。假如晋国占取了虞国,而修明道德来贡献祭品,神明难道会把您献的祭品给吐出来吗?”虞公不听劝阻,答应了晋国使者借道的要求。

官之奇带上他的整个家族出走了。他说:“虞国等不到腊祭的日子了。晋国灭亡虞国就在这次出兵吧,晋国不用再次发兵了。”……

冬十二月初一日,晋军灭了虢国,虢公丑流亡到周天子的王都。晋军回师,在虞国住下,乘机袭击虞国,把它灭了,并活捉了虞公……

【评析】

晋献公是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的父亲,他的文治武功为晋国迅速崛起、跻身大国行列奠定了重要基础。他继位之后,对外作出“尊王”姿态,以博取政治资本;对内则挑动公族内斗,尽杀群公子,解除了宗族势力对君权的威胁,加强了国君的集权统治。当内乱一除,晋献公就着手扩军备战,积极从事对外扩张,先后攻灭周边实力弱小的耿、霍、魏等小国,以及赤狄、驪戎诸部族,然后运用假途伐虢之计灭掉实力稍强的虢、虞两国。晋国由此国势一振,蔚然成为大国。

相形之下,虞公则是一位思想愚昧、计短谋拙的庸主,无法正确认识和判断本国的安全环境和安全利益。他的愚笨首先表现在迷信政治上的血缘同



宗关系,看不到春秋争霸兼并战争的残酷性,认识不到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血缘纽带打破、宗法制度解体的历史大势。春秋社会政治的演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靠争霸兼并斗争得以实现的。大国吞并小国后,经常是土地不再分封,民众、土地隶属国君,新的郡县制度建立,西周以来的贵族分封制度就这样逐渐终结,而朝着后来的中央集权制迈进。迷信传统的宗法关系能够庇护自己国家的安全,无异于自欺欺人。宫之奇以实例告诉虞公,晋献公连同同宗的虢国都要消灭,怎么还能指望同宗关系保护虞国自己?晋献公为了巩固君权连亲族兄弟都要杀掉,又怎么会保护作为兼并对象的虞国?可是,此时的虞公仍然执迷不悟,幻想着神明会来保佑自己。面对这样的国君,宫之奇只能出走避祸。

宫之奇是有一定战略头脑的谋臣。他对虞公的劝谏,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他指明了虢、虞两国唇齿相依、互为屏障的地缘战略关系。表面上看,虞公牺牲小国伙伴可以换来大国保护,而实际上,虢和虞是安全利益攸关的命运共同体,晋国灭掉虢,下一步必然是吞并虞,正所谓“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这一预见切中了要害。

宫之奇从地缘关系入手分析国家安全利益,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一个较早的经典事例。今天的国家安全理论仍经常引用“假途伐虢”这一典故,可见其影响深远。



楚庄王论止戈为武

题引:楚庄王,春秋五霸之一。公元前597年,楚军在晋楚邲之战中取得胜利,势力达到鼎盛。邲之战后,楚庄王坚决反对炫耀武功,提出了“止戈为武”的著名观点。本篇选自《左传·宣公十二年》。

【原文】

丙辰,楚重^①至于邲,遂次^②于衡雍^③。潘党^④曰:“君盍^⑤筑武军^⑥,而收晋尸以为京观^⑦。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

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⑧……夫武,禁暴、戢^⑨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⑩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 犹有晋在,焉得定功? 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 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 利人之几^⑪,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 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 其为先君宫^⑫,

① 重:辎重,军队的装备、器械、粮食等的统称。

② 次:停留,驻扎。

③ 衡雍:地名,在今河南原阳西北。

④ 潘党:也叫叔党,潘圉之子,楚臣。

⑤ 盍(he,音和):何不。

⑥ 武军:显示武功的营垒。

⑦ 京观:也简称“京”,埋葬敌人尸体后堆成的大土堆,用来炫耀胜利和武功。

⑧ 夫文,止戈为武:甲骨文的“武”字,从“止”从“戈”,楚庄王因此认为止息干戈才是真正的武功。虽然这种解释未必合乎造字的本意,但这种说法反映了楚庄王对战争本质的一种认识。

⑨ 戢(jì,音及):止息,禁止。

⑩ 观兵:检阅军队以显示军威。

⑪ 几:危机。

⑫ 宫:宗庙,神庙。



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①而封^②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③。今罪无所^④,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可以为京观乎?”

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

【译文】

丙辰日,楚军的辎重到达郟地,于是军队移驻衡雍。潘党说:“您何不修筑显示武功的军垒,收集晋国战死者的尸体筑成京观呢?我听说,战胜了敌人,一定要昭示子孙,使他们不要忘记前人的武功。”

楚庄王说:“这不是你所懂得的。从字形上说,‘止’和‘戈’合起来是个‘武’字。……战争是用来禁止暴虐、消弭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功业、安抚人民、调和众国、增殖财富的,所以,要使子孙莫忘了前人的赫赫武功。如今我使得两国将士尸骸暴露,这就是暴虐了。夸耀军威来胁迫诸侯,战争就难以止息了。暴虐而不能止战,怎么能保持强大?晋国仍然存在,怎么能算有了安定的功业?违背人民愿望的事还很多,人民怎么能够安稳?道德不足而与诸侯逞强争胜,靠什么来调和众国?利用别国的危机,心安于别国的动乱,以此作为自己的荣耀,靠什么来增殖财富?武功有上述七种美德,我却一种都不具备,用什么来昭示子孙后代?还是修建先君的神庙,报告一下战事已经完成也就算了。用武并不是我的功业啊。古代的贤明之君去讨伐不知戒惧敬肃的国家,只是抓住它的元凶杀掉,封土为丘,作为一种重大的惩罚,于是就有了所谓的京观,以此来惩戒放肆作恶、不敬礼法的人。现在晋国并没有明显的罪过,人民却肯尽忠,为执行国君的命令而战死,我们又怎么可以用他们的尸骸来修筑京观呢?”

于是,楚庄王祭祀了黄河之神,盖了先君神庙,报告战事完功,就班师回去了。

【评析】

楚庄王在郟之战胜利后,反对修筑“京观”,不愿大炫武功,这缘于他“止

① 鲸鲵(ni,音泥):大鱼之名,此处比喻大恶之人。

② 封:堆土。

③ 淫慝(te,音特):放肆奸恶而不敬礼法。慝,奸邪。

④ 罪无所:即“罪无所归”,不知归罪于谁,意思是晋国没有明显的罪过。

戈为武”的理念和“武有七德,我无一焉”的自省精神。对战争的这种认识和态度,还可以从先秦典籍中找出很多,这些论述都达到了相当高的哲理层次,具有一种共同的精神取向。

首先,强调要谨慎对待战争。楚庄王认为,“武非吾功也”,“今罪无所,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可以为京观乎?”他感到在国君的命令下,民众投入战争造成巨大的人员死伤、物资损耗,这是绝对不能喜形于色的事情。春秋时期老子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①,战国时期孙臆认为“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②,诸子百家,没有一家支持黩武的。即便是给人“主战”印象的法家,也认为“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审用也。”^③楚庄王提出,惩罚战争罪犯,要抓住元凶杀掉,而不能拿死难百姓的尸骨大做文章,这是慎重对待战争、胜利之时有所节制的具体表现。

其次,强调要区分战争目的,采取不同态度。楚庄王认为,“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达到这七种目的战争是有德的战争,值得肯定,而自己从事的邲之战,一种美德都不具备,他不愿意过多肯定。虽然楚庄王没有明确地说“武有七德”的战争就是一种正义战争,“止戈为武”就是正义战争的目的,但是已经触及到了战争的正义性问题。《吕氏春秋》中有一句“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④,它所提到的“义兵”(正义战争),内涵正与“武有七德”有相似之处。

慎战、止战的思想文化作为两千多年中国战略思想的底蕴,从最深层次上决定了国家安全战略运筹的方向和选择。可以说,对狂热好战、穷兵黩武的否定和批判从观念上奠定了中国历代国家安全战略注重防御、崇尚社会安宁稳定的基调。

① 《老子·十三章》。

② 《孙臆兵法·见威王》。

③ 《韩非子·存韩》。

④ 《吕氏春秋·荡兵》。



范文子论外患内忧

题引：范文子，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名士燮。晋楚邲之战后，晋国国势转衰。公元前575年，郑国伐宋，晋国乘机出兵伐郑，与支持郑国的楚国又进行了鄢陵之战。当时晋国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正愈演愈烈，范文子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晋国不宜与楚国交锋，而应先把国内治理好。本篇选自《国语·晋语六》（参见《左传·成公十六年》）。

【原文】

鄢之役^①，晋伐郑，荆^②救之。大夫欲战，范文子不欲，曰：“吾闻之，君人者刑其民^③，成，而后振武于外，是以内和而外威。今吾司寇^④之刀锯^⑤日弊^⑥，而斧钺^⑦不行^⑧。内犹有不刑，而况外乎？夫战，刑也，刑之过也。过由大，而怨由细，故以惠诛^⑨怨，以忍^⑩去过。细无怨而大不过，而后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而忍于小民，将谁行武？武不行而胜，幸也。幸以为政，必有内忧。且唯圣人能无外患，又无内忧；诘^⑪非圣人，必偏^⑫而后

① 鄢之役：晋楚鄢陵之战，公元前575年，晋国大败楚师于鄢陵，重振霸业。鄢在今河南鄢陵西北。

② 荆：楚国别称。

③ 刑其民：用刑罚来端正人民的行动。

④ 司寇：官名，掌管刑狱。春秋时各诸侯国多有此职。

⑤ 刀锯：指用于小民的刑罚。

⑥ 日弊：刀锯用得太多，乃至日益钝败。

⑦ 斧钺：指用于大臣的刑罚。

⑧ 不行：不能执行。

⑨ 诛：去除。

⑩ 忍：狠心、残忍。

⑪ 诘(jù，音巨)：如果。

⑫ 偏：偏于一端。



可。偏而在外,犹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难。盍^①姑^②释荆与郑以为外患乎。”

【译文】

在鄢陵之战时,晋国攻打郑国,楚国出兵救郑。晋国大夫都想应战,范文子却不同意。他说:“我听说,治理人民的,要使用刑罚来端正臣民,这件事做到了,然后才在国外显耀军威,因此国内团结而国外畏惧。现在我国司寇官用来惩罚小民的刀锯用得太多而日益钝弊了,但是用来惩罚大臣的斧钺却并不怎么使用。在国内还有不能够进行惩罚的,更何况到了国外呢?战争,就是一种刑罚,是用来惩罚重大过失的。重大过失是大臣们犯下的,导致怨恨在一般小民中产生,因此应当用恩惠来消除小民的怨恨,下决心禁止大臣的过失。小民没有怨恨,大臣不犯过失,然后才可以振作军威,惩罚国外那些不顺服的人。现在我国的情况是,刑罚排除了大臣,却下狠心来对付小民,这样还能靠谁来振作军威呢?军威不振而打胜仗,只是一种侥幸。依靠着侥幸的成功来治理国家,必然会有内忧。况且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既无外患,又无内忧;如果不是圣人,那就必然要偏失一头。如果偏失的一头是外患,还可以想办法进行补救;如果弊病发生在国内,那就很难应付了。何不姑且撇开楚国和郑国,不去进攻,留下它们作我们的外患呢?”

【评析】

从范文子的论述可以看出三层意思:首先,“战,刑也”,用兵如用刑,晋国对内用刑不正,还能靠什么来振作军威?所以不能对外用兵;其次,“幸以为政,必有内忧”,军威不振而打胜仗的,纯属侥幸,靠着侥幸治理国家,又会引起新的内忧;第三,如果内忧、外患都不可避免,不得已偏取其一,那么宁肯暂时保留外患,也要先把内忧解决好,因为“偏而在外,犹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难”。

范文子的论述实际上揭示了内忧外患二者的关系,提出了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的层次模型,即治内先于对外,立足自身建设,由内及外改善安全环境。历史上明智的统治者,在治理内部与抵御外敌之间,总能很好地区分轻重缓急,在通常的情况下,首先把内部治理好,把增强内部凝聚力放在安全战略的

① 盍(he,音和):何不。

② 姑:姑且。



首要位置；或者在争取到一个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后，抓紧时机整合内部，然后全力对外。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夫治国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①。唐太宗李世民将其高度概括为“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②。从根本上说，没有内部的整合和治理，要想有效安定四方、维护周边安全是不可能的，外部的安全只能基于内部的强大。

在范文子看来，如果晋国国内的祸患不根除，内部不实现稳定，就难以在争霸的历史舞台上继续驰骋。当晋国在鄢陵之战取胜后，看到晋军从战场上胜利归来，范文子非但没有高兴，反而忧心忡忡，甚至希望自己早死，以免遭受晋国的内乱。后来的事情果然如范文子所料，由于外患突然消失，晋国内部原先潜伏的政治矛盾凸显出来，公卿对立迅速激化，随之而起的是一场难以避免的血腥动乱，强卿大族和国君公室之间互相诛杀，最终导致了春秋末年晋国的分裂。

① 《盐铁论·地广》。

②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唐纪九》太宗贞观三年。



司马侯论三殆

题引:司马侯,名女(ru,音汝)齐,春秋时期晋国人。公元前546年,晋、楚召开弭兵大会,互相承认战略均势,相关小诸侯国分别向晋、楚两国朝贡。公元前538年,楚灵王试图分得更多的霸权,派使者赴晋协商。对此,司马侯主张同意楚国要求,并建议晋平公修明德行、搞好内政以待之。本篇选自《左传·昭公四年》。

【原文】

四年^①春,……楚子^②……使椒举^③如^④晋求诸侯。……晋侯^⑤欲勿许。

司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⑥,天或者欲逞^⑦其心,以厚其毒^⑧而降之罚,未可知也;其使能终^⑨,亦未可知也。晋、楚唯天所相,不可与争。君其许之,而修德以待其归^⑩。若归于德,吾犹将事之,况诸侯乎?若适淫虐,楚将弃之,吾又谁与争?”

公曰:“晋有三不殆^⑪,其何敌之有!国险而多马,齐、楚多难。有是三者,何乡^⑫而不济^⑬?”

- ① 四年:鲁昭公四年,公元前538年。
- ② 楚子:指楚灵王,名熊虔,公元前540~前529年在位。
- ③ 椒举:即伍举,楚国大夫。
- ④ 如:到……去。
- ⑤ 晋侯:指晋平公,名姬彪,公元前557~前532年在位。
- ⑥ 侈(chi,音尺):放纵,放肆。
- ⑦ 逞:快意,称心。
- ⑧ 毒:祸患,危害。
- ⑨ 终:结果。这里指善终,好结果。
- ⑩ 归:归宿,归向。
- ⑪ 殆:危险。
- ⑫ 乡:通“向”。
- ⑬ 济:成。



对曰：“恃险与马，而虞^①邻国之难，是三殆也。四岳^②、三涂^③、阳城^④、大室^⑤、荆山^⑥、中南^⑦，九州之险也，是不一姓^⑧。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恃险与马，不可以为固也，从古以^⑨然。是以先王务修德音以亨^⑩神人，不闻其务险与马也。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若何虞难！齐有仲孙之难而获桓公^⑪，至今赖之；晋有里、丕之难而获文公^⑫，是以为盟主。卫^⑬、邢^⑭无难，敌亦丧之。故人之难，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暇，又何能济？君其许之！纣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陨^⑮，周是以兴，夫岂争诸侯？”乃许楚使。

【译文】

鲁昭公四年的春天，……楚灵王……派大夫椒举到晋国，希望晋国同意让更多的诸侯服从楚国。……晋平公打算拒绝这个要求。

司马侯说：“这不好。楚王的欲望正在膨胀，上天或许要使他称心，以加重他的过错，从而降给他惩罚，这是说不定的；或者上天要使他结局圆满，这也是说不定的。晋、楚两国只有依靠上天的庇佑，而不可与老天安排的命运

① 虞：娱，乐，这里是幸灾乐祸的意思。

② 四岳：东岳泰山（在今山东），西岳华山（在今陕西），南岳衡山（在今湖南），北岳恒山（在今河北曲阳西北与山西接壤处）。

③ 三涂：古三涂山在今河南嵩县南。

④ 阳城：古阳城在今河南登封东南，俗名“城山岭”。

⑤ 大室：太室山，即嵩山。

⑥ 荆山：在今湖北南漳县西。

⑦ 中南：即终南山（在今陕西）。

⑧ 不一姓：不为某一姓（指某个诸侯国）所专有，意思是各国都有险阻。

⑨ 以：同“已”。

⑩ 亨：通，这里作“沟通”解。

⑪ 齐有仲孙之难而获桓公：公元前686年，齐国公孙无知（即仲孙）杀齐襄公，自立为君，引起齐国内乱，最后公子小白夺得君位，是为齐桓公。

⑫ 晋有里、丕之难而获文公：公元前651年，晋献公死，里克为了公子重耳能回国继位，先后杀了奚齐和卓子（都是献公之子），丕郑与里克是同党。后来重耳终于回国夺取君位，是为晋文公。

⑬ 卫：国名。曾被狄人所灭，后又迁都复国。

⑭ 邢：国名，在今河北邢台，公元前635年为卫所灭。

⑮ 陨（yun，音允）：死亡，这里作“灭亡”解。



相抗争。您还是先答应楚王,修明自己的德行,而等待他的发展吧。如果他趋向德义,我们晋国自己还要服事于他,又何况其他诸侯国?如果他走向荒乱暴虐,楚国自己就会抛弃他,我们又跟谁去争锋呢?”

晋平公说:“晋国有‘三不危’,谁能与我们抗衡!我国地势险要,马匹又多,齐、楚两国又有很多祸难。有了这三条,向哪儿发展会不成功?”

司马侯回答说:“仰仗险阻和马匹,庆幸邻国的祸难,这不是‘三不危’,而是‘三危’。四岳、三涂、阳城、太室、荆山、终南,这是天下的险阻,并不专属于某一个国家,晋国能单独依靠这样的险阻吗?冀州的北部,是产马的地方,在那里却没有产生昌盛的国家。因此仗恃地形险要和马匹,是不能巩固国家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因此,前代圣王努力修明德行来沟通神人,没有听说他们致力于依仗险阻和马匹的。邻国的祸难,是不能庆幸的。别国或者由于多难而得到巩固,开辟了疆土,或者由于无难而丧失了政权,失去了地盘,怎么能庆幸别国的祸难呢!齐国由于有仲孙之难而获得桓公这样的明君,到今天齐国还仰赖他的功业;晋国有里克、丕郑之难而得到文公这样的英主,因此晋国成为了霸主。卫国和邢国倒是没有祸难,敌国依然把它们灭了。所以,别国的祸难,是不能庆幸的。只知道仗恃这三条,却不修明政治和德义,救亡都来不及,还谈什么往哪儿发展不会成功呢?您还是答应了楚王的要求吧!商纣荒淫暴虐,文王仁惠平和,商朝因此而灭亡,周朝因此而兴起,兴亡的道理难道只在于多争到几个诸侯的支持吗?”于是,晋平公同意了楚国使臣的要求。

【评析】

春秋中期弭兵之会后,楚灵王又想得到更多的霸权,让更多的诸侯国服从楚国,故而派出使者与晋平公协商。围绕这个外事问题,晋平公与司马侯展开讨论,而讨论的重心又回到内政上去了。从他们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汲取到维护国家安全的三点战略智慧。

其一,制衡霸权倾轧,维护国家安全,必须立足自身发展,办好自己的事情。司马侯认为,只要修明自己的德行,搞好自己的内政,楚灵王那边要趋向德义还是趋向暴虐那是他自己的事情,晋国可以在观察之后再作反应。换句话说,只要晋国自己拥有不断强大的实力,答应楚灵王的要求与否,对晋国并无实质性损害。晋平公认为,晋国拥有使自己强大的三个有利条件(所谓的“三不殆”),司马侯针对这“三不殆”提出了对内政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求强



的基点应当放在搞好内政上,而不能寄托在别国出现祸难上;只有先把内政搞好了,才能真正谈论向哪儿发展才比较有利的问题。

其二,晋平公认为晋国有“三不殆”,即国家有关山之险、马匹多、对手齐国和楚国不断有内乱。司马侯认为,如果依恃这些外部的、自然的条件,而不注意从国家内部进行努力,修明政治,保持国家的安定,增强国家的实力,这三个有利条件,恰恰会变成三个危险的因素,即“三殆”。这个观点对于如何正确地把握国家安全的根本所在,是极其辩证而深刻的。

其三,对邻国的祸难不可庆幸,而应加强自己的战略预置,应对邻国出现的各种变局。司马侯提到齐国仲孙之难和晋国里克、丕郑之难后,产生了齐桓公、晋文公两位雄才霸主的事例。许多诸侯国在应对这两个重大政治事变时未能把握好机遇,甚至举措失当,支持错了对象,最终造成政治上的被动,对自己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邻国激烈动荡的政治事变尚且如此,对其平静无声、不露端倪的变化就更需提高警惕,做好应对变局的准备。司马侯论述别国的祸难不可庆幸,虽然是为其修明德政、立足国内的基本观点服务的,但其中无疑也包含了这样的启示。

战国时期,大军事家吴起提出河山之险不足恃,国家安全在德不在险^①;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认为天时地利不如人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参见本书第二章孟子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其重视德政、不可单独依恃自然条件的思想都与司马侯一脉相承。

^① 《战国策·魏策一》。



范蠡论持盈、定倾、节事

题引：范蠡，春秋末期政治家、军事家，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辅佐越王勾践成就了霸业。春秋后期，吴越争霸，越王勾践在携李之战大胜后滋长骄傲情绪，范蠡向其提出了“持盈、定倾、节事”的劝谏。本篇选自《国语·越语下》。

【原文】

越王勾践即位三年^①而欲伐吴。范蠡进谏曰：“夫国家之事，有持盈^②，有定倾^③，有节事^④。”王曰：“为三者，奈何？”对曰：“持盈者与天^⑤，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王不问，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⑥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⑦不作^⑧，弗为人客^⑨；人事^⑩不起，弗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于人。王若行之，将妨于国家，靡^⑪王躬身^⑫。”王弗^⑬听。

① 三年：越王勾践即位于公元前497年，其三年，为公元前495年。

② 持盈：保持、守护已成之业。盈，满，盛。

③ 定倾：安定倾危之势。倾，侧，斜，不安定。

④ 节事：节制各种事务，使之适度。事，指人事，如政令措施等等。

⑤ 与天：效法天。与，效法，下文“与人”、“与地”的“与”义同。

⑥ 矜：夸耀。

⑦ 天时：指时令季节、阴晴寒暑和自然灾害一类现象。

⑧ 作：兴，起。

⑨ 客：进攻者。攻者为客，守者为主。

⑩ 人事：这里特指敌我双方内部的政治情况。

⑪ 靡（mi，音迷）：损害。

⑫ 躬身：自身。

⑬ 弗：不。



【译文】

越王勾践即位的第三年,意欲兴兵攻吴。范蠡进谏说:“国家的大事,有的是要保持已成的大业,不使亏损;有的是要安定不稳的局面,不使倾覆;有的是要节制各种措施,不使失去分寸。”越王说:“做这三样事,该怎么样?”范蠡回答说:“要保持已成的事业,就效法天;要安定不稳的局面,就效法人;要节制好各种政令,就效法地。您不下问,我不敢说起。天之道,充实而不横溢,鼎盛而不骄纵,不停地运转却不自夸其功。圣人顺应时机以行事,这叫作守时。在天时方面,如果节令寒暑等条件不具备,就不做进攻者;在人事方面,如果内政外交等条件不具备,就不带头挑起争端。如今您德行未圆满就横溢,事业未鼎盛就骄纵,没有劳苦就自夸功绩;天时方面条件不具备却想成为主动进攻者,人事方面条件不具备却想带头挑起争端。这既不顺乎天道又不合乎人心。您如果这样做了,将会有害于国家,也会有损于自身的。”越王没有听从他的劝谏。

【评析】

中国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在理性思维和论说辩难时,经常以“天人合一”的宇宙构成模式为逻辑起点,以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和把握问题,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和融合性特征。春秋末期范蠡论述其治理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的持盈、定倾、节事原则,就是采取了以“天道”推论“人事”的方式,认为“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

范蠡认为,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维护国家安全也应当遵循自然的规律和模式,做到“随时以行,是谓守时”,“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也就是说,维护国家安全、进行军事斗争,要顺应天时、把握时机,既不超前,也不滞后,以时机是否有利、战机是否成熟来决定斗争展开与否,不能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盲目进取。

范蠡从“圣人随时以行”接着论述到其主要观点“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就是说,当天时、人事条件不具备时,应当持久防御、“固守勿与”,积蓄力量,争取主动,而不能仓促行事,陷入过早决战的被动不利局面。范蠡还认为转换实力对比的重要途径是“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当自己的力量积蓄好了,当敌人的实力损耗掉了,就可以雷厉风行地夺取最后的胜利。



范蠡的这些思想直接针对着越国在吴越相争中长期处于相对劣势的局面。在他看来,越是这种情况就越要讲究力量变化和运用中的辩证法,按照“天道”行事。春秋晚期,越国在越王允常和勾践统治时期,实力有相当大的发展。但是吴越争斗的早期,越国经常遭受吴国的重创,尤其是越国主动策应楚国以牵制吴国,而楚国最终在柏举之战被吴国打败,越国就更显得被动了。携李之战吴王阖闾过于骄傲自大,结果被勾践所败。待其子夫差继位后,“日夜勒兵,且以报越”^①,经过三年精心准备,军事实力、经济实力都有较大的增长,而且在复仇旗帜号召下吴国“师众同心”、士气旺盛,双方实力对比越国显然处在下风。范蠡此时劝谏越王勾践,“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是很有针对性的。勾践在携李之战后同样滋长了浓厚的骄傲情绪,成天游乐畋猎,懈怠武备,典型的“未盛而骄”。范蠡指出,如果越王勾践孤注一掷地对吴国发动进攻,妄图侥幸取胜,只能是“逆于天而不和于人”、“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但是,勾践根本听不进去这些劝告,于是遭遇了几近亡国的惨败。

此后,勾践屈辱求和,在夫差身边当了三年奴仆,历尽艰辛,骗得夫差信任,被释放回国。在范蠡、文种等人的辅佐下,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生聚教训,韬光养晦、励精图治,对内对外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壮大自己,削弱敌国,争取与国,赢得时间,完成了实力对比的转换。经过长期准备,越国终于在20多年后一举袭吴,取得笠泽之战的决定性胜利,并最终吞灭了曾经强盛一时的吴国。范蠡“随时以行”的思想很好地体现在越国的复兴上。

^①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赵武灵王论胡服骑射

题引：赵武灵王，战国时期赵国第六代国君，名雍，公元前325～前299年在位。为了富国强兵，他调整战略方向，坚决实施以“胡服骑射”为核心的军事改革，使赵国崛起为战国中后期的强国。本篇选自《战国策·赵策二》（参见《史记·赵世家》）。

【原文】

王^①曰：“吾固闻叔^②之病也。”即之^③公叔成家，自请^④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⑤，因其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被发文身^⑥，错臂^⑦左衽^⑧，瓠越^⑨之民也。黑齿^⑩雕题^⑪，鯁冠^⑫

① 王：赵武灵王。

② 叔：公子成，赵国公族，赵武灵王的叔父。

③ 之：到……去。

④ 请：谒见，拜见。

⑤ 观其乡而顺宜：考察当地的风俗，以适宜的措施顺应它。

⑥ 被发文身：南方瓠越之民的风俗打扮，与中原风格不同。中原人束发成髻，女加笄，男加冠。南方多水，人常在水中，以为文身可避蛟龙之害，故而当地人喜欢文身。被，通“披”；文，通“纹”。

⑦ 错臂：站立时两臂交叉，指没有礼貌。一说，也是指文身，用颜料涂画胳膊。

⑧ 左衽：衣襟向左边开。中原的习俗是衣襟向右边开，有些少数民族的习惯是衣襟向左边开。衽(ren, 音认)，衣襟。

⑨ 瓠(ou, 音欧)越：“百越”的一支，分布在今浙江省南部温州一带，又称东瓠。

⑩ 黑齿：用草汁把牙齿染成黑色。

⑪ 雕题：在额头刺上花纹，再染上颜色。题，额头。

⑫ 鯁冠：用鯁鱼的皮做帽子。鯁(ti, 音提)，大鲇鱼。



秫缝^①,大吴^②之国也。礼、服不同,其便^③—^④也。是以乡异而用^⑤变,事异而礼易。是故圣人苟^⑥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儒者一师^⑦而礼异,中国同俗而教离^⑧,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⑨之变,知^⑩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穷乡^⑪多异^⑫,曲学^⑬多辨^⑭。不知而不疑,异于己而不非者,公于求善也^⑮。今卿^⑯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⑰俗也。今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⑱,与齐、中山同之,而无舟楫^⑲之用;自常山^⑳以至代^㉑、上党^㉒,东有燕、东胡^㉓之境,西有楼烦^㉔、秦、韩之边,而无骑

① 秫缝:指缝纫粗拙。秫,通“鉢”(shu,音述),长针。

② 大吴:吴国,在今江苏省南部,国都在今苏州。一说,“大”字当作“干”,干为古国,国都在今江苏扬州。

③ 便:方便,便宜。

④ 一:一致,相同。

⑤ 用:器物,指衣服等。

⑥ 苟:如果,假使。

⑦ 一师:指都以孔子为师。

⑧ 教离:指中原各国教令不同。离,分歧。

⑨ 去就:舍弃或采用,取舍。

⑩ 知:通“智”。

⑪ 穷:闭塞,偏僻。

⑫ 多异:少见多怪。

⑬ 曲学:固守一隅的学说。曲,局部,不全。

⑭ 辨:通“辩”。

⑮ 公于求善:在求善方面是公正的。

⑯ 卿:国君称臣为卿,表示亲切。

⑰ 制:控制,驾御。

⑱ 薄洛:《水经注·浊漳水》说,“漳水又历经(巨鹿)县故城西,水有故津,谓之薄洛津。”依此,则薄洛水是指漳水。

⑲ 舟楫:船只。楫,船桨。

⑳ 常山:即恒山,在今河北曲阳西北至山西接壤处。因避汉文帝刘恒讳改名常山。

㉑ 代:初为小国,灭于赵襄子,武灵王时置代郡,在今河北蔚县至山西阳高一带。

㉒ 上党:郡名,辖境相当今山西东南地区。

㉓ 东胡:当时居住在我国东北部的少数部族,因为它在匈奴(胡)之东,称之为东胡。

㉔ 楼烦:少数部族,住地相当于今山西宁武、朔县一带。



射之备。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其参^①胡、楼烦、秦、韩之边。且昔者简主^②不塞^③晋阳^④以及上党,而襄王^⑤兼戎^⑥、取代,以攘^⑦诸胡,此愚知^⑧之所明也。先时中山负^⑨齐之强兵,侵掠吾地,系累^⑩吾民,引水围鄯^⑪,非社稷之神灵,即^⑫鄯几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报也。今骑射之服,近可以备上党之形,远可以报中山之怨^⑬。而叔也顺中国之俗,以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而忘国事之耻,非寡人所望于子^⑭!”……

【译文】

赵武灵王说:“我本来就听说叔父病了。”于是马上来到公叔成家,亲自会见他说:“衣服,应当便于穿用;礼法,应当便于行事。因此,圣人总是考察当地的风俗而采取适宜的措施来顺应它,根据事情的需要来规定相应的礼法,目的是有利于百姓、有益于国家。披散头发,身上刺有花纹,两臂交叉,衣襟向左开,这是瓠越百姓的风俗。染黑牙齿,雕刻额头,用鲛鱼皮做帽子,缝纫粗拙,这是吴国人的风俗。礼法、衣服不同,但便于行事、便于穿用却是一致的。因此,乡里不同,衣服器用就跟着改变;事情不同,礼法就跟着变换。因此,圣人如果能够方便百姓,就不强求统一衣服器用;确实可以便于行事,那

① 其参:当为“燕东”二字之讹。“其”字,据《史记·赵世家》,当为“燕”字之误;“参”字,据上文当作“东”字。

② 简主:赵简子,春秋末期晋国六卿之一。

③ 塞:阻塞(如筑长城),使之不通。

④ 晋阳:在今山西太原西南。

⑤ 襄王:“王”字当为“主”字之讹。指赵襄子,赵简子之子,战国时期赵国的开国国君。

⑥ 戎:西戎,西部少数部族的通称。

⑦ 攘(rang,音壤):排斥。

⑧ 知:通“智”。

⑨ 负:依靠。

⑩ 系累:捆绑,俘获。累,又写作“纆”。

⑪ 鄯(hao,音浩):赵地,在今河北高邑东。

⑫ 即:则。

⑬ 怨:恨。

⑭ 望于子:望,期望;子,您,对对方的尊称。

就不强求使用同样的礼法。儒家学者同出一师,所用的礼法并不完全一致;中原地区风俗相同,可是各诸侯国的政教却有所差别;又何况偏远山区更要便宜行事呢!所以,这种或舍或取的变化,就是聪明的人也不能强求统一;远近各地不同的衣服,就是圣贤也不能强求相同。穷乡僻壤的地方总是少见多怪,固守一隅的学说喜欢无谓争辩。不随便怀疑自己不懂得的,不轻易非议和自己不相同的,这样才是公正地追求好的东西。现在您所说的,是风俗;我所说的,是如何来驾驭风俗。现在我国东有大河、薄洛水,与齐国、中山共有,却不能充分利用船只水战;从恒山到代、上党这样广大的地区,东面与燕、东胡交界,西面与楼烦、秦国、韩国接壤,却没有骑射的防御措施。所以寡人将要聚集船只,征召水边的居民,来守卫大河、薄洛水;改穿胡服训练骑射,来防守邻接燕、东胡、楼烦、秦国、韩国的边界。而且,从前赵简主不阻塞晋阳到上党的土地,赵襄主兼并西戎,夺取了代,得以斥逐诸胡,这些是愚笨的人、聪明的人全都能看清楚的。先前,中山依仗齐国强大的兵力,侵掠我们的土地,俘虏我们的人民,引水包围鄗城,如果不是社稷神灵保佑,鄗城就几乎失守了。先王忿恨中山,可是这个仇恨到现在还没有报。如今改穿便于骑射的胡服,近可以适应上党那样的地形,远可以报中山的仇怨。可是叔父却顺随中原固有的风俗,而违逆简、襄的心意,厌恶改变服饰的名声,而忘掉国家的耻辱,这不是寡人所期望于您的!”……

【评析】

战国时期,赵国处于晋北一带,土地贫瘠,位置偏远,西面有秦国,南面有魏国和韩国,东面是齐国,北邻燕国,向中原发展十分困难。同时,赵国的北面和西北,与楼烦、匈奴、林胡等游牧部族相邻,中部还有白狄建立的中山国嵌入其腹地,南北联系受阻。由于赵国国力较弱,又同时受到来自中原和游牧部族等几个方向上的安全威胁,在兼并战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如果不扭转这种局面,很可能迅速陷入危亡。

赵武灵王继位后,在同中原诸强的斗争中多次受挫,认识到赵国所处战略环境的不利,遂于公元前307年召集大臣讨论,决定利用秦、齐、楚三强争斗无暇他顾的机会,实施战略方向转换,由向中原发展转而向北发展,避实击虚,开疆拓土,积蓄力量,待攻灭中山、北略胡地之后,再迂回云中、九原,南下袭秦,取得进图中原的有利态势,这是一个非常大胆而可行的战略构想。

赵武灵王认识到,即使对于向北发展,赵国的军事力量也是十分薄弱的,



只能自守,难以进攻。因为北边的游牧部族擅长骑射,拥有强大的骑兵,以步兵为主体辅以少量车兵的赵国军队难以在草原上快速机动,与游牧骑兵相对抗。为了增强军事实力,适应远程机动作战的需要,赵国只有实行军事变革,建立强大的骑兵部队,才有可能完成攻略中山和胡地的任务。围绕这个目标,赵武灵王提出了著名的“变服骑射”的口号,排除各种阻力,坚决推行军事变革。“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主要包括:国人脱掉中原地区原来宽袍大袖、不便骑射的服装,改穿胡人的短衣、长裤,束皮带、穿皮靴,习练骑射;并发布法令,招募人才,组建基地,组训骑兵,从而建立和发展起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

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的举措,遭到了众多贵族大臣的激烈反对。于是赵武灵王采取不同的方式,解决了这些思想纷争。他首先争取到朝中有远见大臣的支持,并率先垂范,从自己开始穿着胡服。然后亲自到反对派中职位最高、辈分最大的代表人物——叔父公子成家里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与公子成的谈话,以“先王之忿”为要点,促使公子成明白“胡服骑射”是非办不可的大事。当说服公子成之后,赵武灵王便对其他顽固坚持“先圣之所教”的保守派进行了严厉驳斥,以强硬手段坚决推行改革。

实行“胡服骑射”后,赵国实力大增,以至辟地千里,成为战国中后期能与秦国抗衡的强国之一。赵武灵王力排众议、坚决推行改革的实践不但取得了强兵强国的巨大功效,他反对僵化保守,主张根据形势需要积极进行变革的思想和言论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赵武灵王论以原阳为骑邑

题引: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将原阳改为专门组训骑兵的基地。有大臣提出疑义,赵武灵王认为,兵器装备要适合战争,风俗教化要适合时宜,因而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本篇选自《战国策·赵策二》(参见《史记·赵世家》)。

【原文】

王^①破原阳^②以为骑邑^③。牛赞^④进谏曰:“国有固籍^⑤,兵有常经^⑥。变籍则乱,失经则弱。今王破原阳以为骑邑,是变籍而弃经也。且习其兵者轻其敌^⑦,便其用者轻其难。今民便其用而王变之,是损君而弱国也。故利不百^⑧者不变俗,功不什^⑨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⑩以奉^⑪骑射,臣恐其攻获之利,不如所失之费也。”

① 王:赵武灵王。

② 破原阳:打破原阳原有的军事编制(适合车战的旧编制或步兵编制)。原阳,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

③ 骑邑:训练骑兵的基地。

④ 牛赞:赵臣。《史记·赵世家》有牛剪,于公元前305年随赵武灵王攻中山,剪、赞音近,当是一人。

⑤ 固籍:固有的典册,指本来的法令。籍,记载法令制度的书册。

⑥ 常经:常规,不变的准则。

⑦ 习其兵者轻其敌:熟习他们兵器装备的将士才可能轻敌敢战。

⑧ 百:百倍。

⑨ 什:十倍。

⑩ 破卒散兵:指拆散原来的部队编制。

⑪ 奉:从事,进行。



王曰：“古今异利^①，远近异用。阴阳^②不同道^③，四时^④不一宜。故贤人观时^⑤而不观于时^⑥，制兵而不制于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阴阳之宜^⑦。故兵不当^⑧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变？昔日先君襄主^⑨与代^⑩交地^⑪，城境^⑫封之^⑬，名曰无穷之门^⑭，所以昭后^⑮而期远也。今重甲修兵^⑯，不可以逾险；仁义道德，不可以来朝^⑰。吾闻信^⑱不弃功，知不遗时^⑲。今子以官府之籍，乱寡人之事。非子所知。”

牛赞再拜稽首曰：“臣敢不听令乎！”

至^⑳遂胡服，率骑入胡，出于遗遗之门^㉑，逾九限^㉒之固，绝^㉓五陁^㉔之险，

- ① 古今异利：古和今，利害不相同（古代为利，今天可能是害；古代为害，今天可能是利）。
② 阴阳不同道：阴和阳各有自己的变化规律。阴阳，指昼夜、寒暑、阴晴，等等。
③ 道：规律。
④ 四时：四季。
⑤ 观时：观察时势，采取适宜的措施。
⑥ 观于时：为时势所迫，被动地应付。
⑦ 阴阳之宜：适应天时人事的变化而采取适宜的措施。
⑧ 当：适合。
⑨ 襄主：赵襄子。
⑩ 代：国名，在今河北蔚县至山西阳高一带，后为赵襄子所灭。
⑪ 交地：接壤。
⑫ 城境：在边境上筑城。
⑬ 封之：把城当作边界。一说，封或是筑坛祭天的仪式。
⑭ 无穷之门：在今河北张北南。
⑮ 昭后：昭示后代。昭，明示。
⑯ 修兵：长兵器，如戈、矛等。修，长。
⑰ 来朝：来朝见，表示臣服。
⑱ 信：讲信用。
⑲ 遗时：错过时机。遗，失。
⑳ 至：当为“王”之讹。
㉑ 遗遗之门：关塞名，又称挺关，在今陕西榆林西北。
㉒ 九限：指众多的险阻与隘口。九，表示多数。限，阻隔。一说，“九限”当是“九原（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之误。
㉓ 绝：穿过。
㉔ 五陁：疑“陁”当作“陁”，山口。五，亦泛指多。一说，“五陁（陁）”系指井陘（在今河北获鹿西）。

至榆中^①,辟^②地千里。

【译文】

赵武灵王撤销原阳旧有的军队编制,将它改建为训练骑兵的基地。牛赞进谏说:“国家有固定的法令,军队有不变的准则。变动法令,国家就会混乱;丢弃准则,军队就会削弱。如今大王您撤销原阳旧有的军队编制,把它作为训练骑兵的地方,这就是变动法令和丢弃准则的行为啊。况且熟习手中兵器的将士才能轻敌敢战,对自己器械感到方便的人才能把难事看得容易。如今兵士们对他们的兵器装备感到方便适用,大王却要改变,这是危害君主、削弱国家的做法啊。所以,没有百倍的好处就不改变风俗,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更换器具。如今大王您拆散军队的编制改行骑马射箭的训练,臣恐怕攻战获取的好处,赶不上变革造成的损耗大。”

赵武灵王说:“古和今,利害不一致;远和近,器用不相同。阴阳有不同的变化规律,四季转换,各有其相适宜的事情。所以,贤人总是观察时势,及时采取适当的措施而不被时势所牵制,总是主动驾驭兵器装备而不被兵器装备所局限。你知道官府的法令,却不懂得器械的便利;知道兵甲器械的使用,却不懂得适应天时人事的变化而采取适宜的措施。因此,如果兵器装备不合用,有什么兵器装备不能更换?如果风俗教化不利于行事,有什么风俗教化不可改变?过去,先君襄子时我国和代国的土地邻接,他就在边境上筑城,把它作为边界,取名为‘无穷之门’,用来昭示后代,期望他们开拓远方的土地。如今厚重的盔甲、长长的兵器,不能翻越险阻之地;实行仁义道德,不能使别人前来臣服。所以要弃旧图新,实行胡服骑射。我听说,讲信用,却不可抛弃功利;真正明智,就不要错过时机。如今你却用官府的法令,来干扰寡人的大事。这些道理,不是你能理解的。”

牛赞再拜,叩头至地,说:“臣怎么敢不听从命令呢!”

赵武灵王于是坚决推行胡服骑射政策,率领骑兵深入胡地,从遗遗之门向前进发,翻越多道险固的防线,穿过多座险要的山口,抵达榆中一带,开拓了上千里的疆土。

① 榆中:在今陕西神木以北至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杭锦旗一带。

② 辟:开辟,开拓。



【评析】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有一套完整的内容,既有服装服饰、穿着习惯的改革,更有部队训练体制、保障体制的改革,这一切都服从于总的战略调整。服装服饰改革已经在观念、文化层面上深深触及贵族、大臣的心理底线,而打破步兵、车兵的训练、保障体制,组建一支新式兵种,同样在思想相对保守的军事将领中遇到阻力。赵武灵王在其改革过程中,一直与保守思想进行着斗争,本篇反映的就是赵武灵王在军事改革中的破旧立新。

赵武灵王首先从理论上说明了变革的必要性,为“以原阳为骑邑”提供思想依据。他从“阴阳不同道,四时不一宜”、“贤人观时而不观于时,制兵而不制于兵”的道理入手,指出形势在变,办法也要跟着改变,当武器装备、训练体制已经不适合战争的要求时,装备、兵种等都要进行调整。接着他又从军事上指明了变革的紧迫性,认为“今重甲循兵,不可以逾险;仁义道德,不可以来朝”,军队要适应新的作战形势,完成先王开拓远方的遗愿,就必须抓住时机,适时改革。

从赵武灵王君臣的这番对话可以看出,在推行军事以及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总会有一大批人迷恋原有的一套制度,他们对新事物的认识和接纳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如果因为对原体制、老方法得心应手而排斥新体制、新方法,则是消极保守、有害无利的。实行战略调整和变革必须从战略高度认清大利大害,坚决果敢地推行下去。

赵武灵王突破传统习俗观念的束缚,建立起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由于骑兵的集群冲击能力和快速机动性能在战场上显示出巨大的优势,所以中原各国纷纷仿效,也都大力发展骑兵,从而带动了整个战国乃至秦汉时期军事力量结构和作战方式的变化。



策士说齐闵王后起、远怨

题引:齐闵王,战国中期齐国国君,在位期间(前301~前284年)采取复杂多变的外交伎俩,致使各国与齐矛盾尖锐,燕、赵、韩、魏、秦五国联合攻齐。本篇选自《战国策·齐策五》,记载了策士劝谏齐闵王的游说之词,其中提出了“后起远怨”的策略思想。

【原文】

苏秦^①说齐闵王曰:“臣闻,用兵而喜先天下^②者忧,约结^③而喜主怨^④者孤。夫后起者,藉^⑤也;而远怨者,时^⑥也。是以圣人从事,必藉于权^⑦而务兴于时。夫权藉者,万物之率^⑧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藉,倍^⑨时势,而能事成者寡矣。……

“今世之为^⑩国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敌强,国罢^⑪而好众怨^⑫,事败而好

① 苏秦:苏秦为燕昭王间谍,不可能向齐闵王提出“用兵而喜先天下者忧,约结而喜主怨者孤”之类的建议。据杨宽著《战国史》,认为本文系“纵横家所造苏秦对齐闵王的游说词”。

② 先天下:先于诸侯而动,为天下先。

③ 约结:订约结交盟国。

④ 主怨:为怨之主,做怨恨的承担者。

⑤ 藉:利用。此指借助别人力量。

⑥ 时:时势,时机,此指乘时而动。

⑦ 权:权宜,随事势而采取的适宜措施。

⑧ 率:通“帅”,主将,首领。

⑨ 倍:通“背”,违背。

⑩ 为:治理。

⑪ 罢:通“疲”。

⑫ 众怨:与众结怨。



鞠之^①，兵弱而憎下人^②也，地狭而好敌大，事败而好长^③诈。行此六术者而求伯^④，则远矣。”

【译文】

苏秦劝说齐闵王道：“我听说，用兵而喜欢先天下而动的，会有忧患；与盟国交往而喜欢做被人怨恨的对象的，会陷于孤立。后起用兵，可以借助别人的力量；躲开怨恨，可以利用时机。因此圣人做事，一定要借力于人并掌握好时机。借用力量，好比是万物的统帅；利用时机，好比是百事的官长。所以，没有力量的借用，违背时势，却能办成事业的，这种情况不多见。……

“现在治国的人却不是这样了。兵力弱小却喜欢对抗强国，国力疲惫却喜欢与各国结怨，事情已经失败却喜欢硬撑到底，兵力弱小却厌恶位居人下，地幅狭小却喜欢抵抗大国，事情已经失败却喜欢崇尚诈术。用这六种做法来谋求称霸，可就相差太远了。”

【评析】

战国时期，诸侯列国纷纷围绕富国强兵的主题实行改革，整军经武，列国之间的军事、政治、外交斗争呈现出激烈复杂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纵横家群体应运而生。如《淮南子·要略》所说，“晚世之时，六国诸侯……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考，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纵横修短生焉。”这些纵横家不但能言善辩，而且了解形势，通晓权术，善于分析矛盾，利用矛盾，乃至制造矛盾。他们活跃于战国时期的政治舞台，在各诸侯国之间穿梭游说，纵横捭阖，提出了很多奇谋异策。像人们所熟知的苏秦、张仪就是这类人物的代表。

本文据考证并非出自苏秦，但它提出了“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于

① 鞠之：尽志，尽量使自己的心意满足。鞠，穷，尽；之，通“志”。

② 下人：在他人之下。

③ 长(zhang, 音掌)：崇尚。

④ 伯：通“霸”。



时”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这篇说词认为,在列国争雄、斗争激烈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巧妙地借用他国的力量,如何抓住时机乘势而起,都需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落实到具体做法,就是要“后起”、“远怨”。“后起”——避免过早介入到列强的争斗当中,能为自己的发展壮大赢得时间,而且容易获得道义上的支持,得到别国的帮助。在国力弱小的情况下,动辄主动出击对外用兵,只能招致大国的猛烈打击,成为各方斗争的牺牲品。“远怨”——不到处结仇树敌,营造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避免孤立,同样十分重要。

这位策士为齐闵王论“后起”、“远怨”,是有针对性的。在齐闵王时期,齐国已经衰落,但是,齐闵王不懂得“权”与“时”的重要性,他当政以后,采取了一系列诡诈、混乱的外交行动,“先鬻赵以取秦,后卖秦以取赵而攻宋”^①,结果成为诸国的“主怨者”。公元前284年,燕、赵、韩、魏、秦五国联合攻齐,燕将乐毅率兵攻下了包括齐国都城临淄在内的70多座城池,齐闵王出走,不久被杀。如果齐闵王能够恪守“后起”、“远怨”的原则,齐国不至于遭受如此致命的重创,齐闵王自己也不至于兵败身死。

“后起”、“远怨”这一策略思想,抓住了诸侯争霸环境下各国利益矛盾彼此关联、层层相因的动态特征,看到了用兵(军事)、约结(外交)与国家安全的紧密联系。基于这一思想,这篇说词又严厉斥责了“兵弱而好敌强、国罢(疲)而好众怨、事败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狭而好敌大、事败而好长诈”等六种不明智的做法,认为“行此六术者而求伯(霸),则远矣”。其实,不但“求霸”如此,“求安”也是如此,如果采取这六种错误的做法,国家的基本安全都很难得以保证,齐闵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① 《战国纵横家书》,第七章。

第二章 先秦(下)

有文事者必有武备，
有武事者必有文备。
——春秋·孔子
(《史记·孔子世家》)



概 述

中国历史在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 770 ~ 前 221 年)出现了一次思想大解放,诞生了老子、孔子、孙子等思想巨人,他们对自然、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收获了丰硕的思想果实,其中也包含了丰富的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的战略性理论思考。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原有的“学在官府”格局逐渐被打破,私人授徒讲学成为新的文化传授方式,老子、孔子等人就是这种私学教育的代表。他们在激荡变革的时代风潮中自由讲学,创立了道家、儒家等思想流派。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变革的进一步深化发展,涌现出更多代表不同阶级和社会集团立场的学术流派,它们的代表人物著书立说,相互辩驳,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成就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一个高峰期。在理论交锋的同时,各学派也相互吸纳、相互影响,到战国末期,逐渐出现了思想融合的明显趋势,为此后大一统时期治国安邦基本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国家安全思想是诸子思想的重要内容,各家学派从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出发,对涉及国家安全的诸多重大命题展开讨论,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而深刻的思想观点:

道家。创始人是老子,他从事物相互对立、相互转化的辩证观念出发,提出了“以静为下”、“柔弱胜刚强”,“无为而治”、“不以兵强天下”,“谋之于未兆,治之于未乱”等富于哲理智慧的深邃思想,揭示了事物运动的内在规律,为后人辩证地思考强与弱、盛与衰、安与危、治与乱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工具。

儒家。由孔子创始,战国时期代表人物为孟子、荀子。主张以“仁”、“礼”治国,强调“仁政”对政治统治、军事胜利和国家安全的决定作用。孟子认为,“以德行仁者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行仁政者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荀子认为,战胜之本在“善附民”。儒家的这些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深厚基础,成为中国封建时期治国安邦的重要指导思想。从荀子开始,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相结合,并逐渐发展出“外儒内法”的统治术,



对维护封建国家的政治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墨家。由墨子创始,倡导“兼相爱,交相利”,主张“非攻”、“救守”,即反对大国兼并战争,主张扶助小国以抗大邦。在当时诸侯混战的历史条件下,墨子的政治理想固然难以实现,但他重视国家防备,强调加强防御以保卫国家安全的思想,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法家是最直接地与社会政治实践相关联,并深刻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一个学派。其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韩非子等。法家主张“战胜而强立”,倡导“富国强兵”,提出“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将发展农业和提高军力视为国家安全的根本。在商鞅等法家政治家的推动下,法家思想成为社会变革的指导思想,并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功效。

兵家。春秋战国是战争频仍的时代,也是兵学思想大发展的时代。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以独到的视角思考军事和国家安全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卓越的见解。孙子看到,“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提出了“安国全军”的慎战思想。《司马法》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指出“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将慎战与备战并重。在此基础上,兵家深入研究战争规律,提出了“兵以利动”、“兵贵胜,不贵久”以及战后“修功”等一系列战略指导思想,为保障国家安全提供了理论指导。

诸子百家不但从不同角度对国家安全的诸多层面进行了论述,而且从哲学的高度,提出了许多思考国家安全问题的思想方法和基本原则,启人益智,发人深省,其中包括:要具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防患未然;要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见微知著,预见到潜在的安全隐患;要审时度势,“杂于利害”,全面衡量利害关系;要以变化的眼光看问题,根据形势变化采取应对措施;要清醒意识到“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的道理,善于保持和发展大国优势;等等。

总之,先秦诸子对治国安邦之道的不懈探求,对政治军事经济问题的哲理思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的内涵,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老子论不以兵强天下

题引：老子，春秋晚期著名哲学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姓李，名耳，字伯阳，又称“老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一说今安徽涡阳）人，生活年代略早于孔子（前551～前479年）。针对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征伐不已，社会动荡不安的状况，老子提出了“不以兵强天下”的主张。本篇选自《道德经·三十一章》。

【原文】

以道^①佐人主者，不以兵强^②天下。其事好还^③：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善有果^④而已，不敢^⑤以取强。果而勿矜^⑥，果而勿伐^⑦，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译文】

以“道”辅佐君主的人，不靠武力争强于天下。发动战争是很危险的事，很容易对自己造成祸患：军队征伐的战场，土地荒芜，遍地长满荆棘。大战过后，一定会有荒年。

善于用兵的人，取得战果就停下来，不依仗战争逞强称霸。取得战果而

① 道：此处指事物存在发展的规律。

② 强：逞强，争胜。

③ 其事好还：意为战争是危险之事，很容易给发动战争的人自己造成祸患。

④ 果：战果。

⑤ 敢：罗振玉、俞樾等学者都以“敢”字为衍文，其说详见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⑥ 矜：自满，自大。

⑦ 伐：夸耀。



不自以为了不起,取得战果而不自我夸耀,取得战果而不骄傲自满,取得战果是出于迫不得已,取得战果也不称强。

事物强盛到了极点就会衰败,靠武力争强是不符合事物发展之“道”的,不合于“道”就会很快灭亡。

【评析】

战争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现象,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战争便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在某些时期,甚至成为推动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重要方式。对于战争问题,古今中外的无数贤哲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过理性的思考,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命题。老子作为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对待战争的基本倾向是不战、反战。他认为战争是“天下无道”(《四十六章》)的表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三十一章》),主张“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这些思想既有一定的合理性,又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是,老子从辩证法的角度提出的“不以兵强天下”的观点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战争与政治相互关系的内在规律,对我们思考国家安全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老子认为,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用兵。也就是说,任何以侵略为目的的战争都是不应该的,而以自卫为目的的战争则具有合理性。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战争的性质问题。他又指出,战争要有节制,“善有果而已”,即达到自卫的目的就应停止,如果以之为称霸的工具,则属于“不道”的行为,最后必然走向灭亡。这实际上是最早的“有限战争”理论。老子的这些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战争观、战略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重视战争的正义性,以及有限度地运用武力以达成积极防御的目的,成为中国传统战略思想的基本理念。

老子“不以兵强天下”的观点首先源于对战争与经济关系的认识。战争作为武力集团之间的暴力对抗,对社会经济具有强烈的破坏性。老子认识到,“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无论是发动战争的一方,还是被迫应战的一方,都会在战争中损耗巨大的人力、物力,造成社会生产的停滞乃至倒退。尤其是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战争会造成农田荒芜、粮食歉收,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的基础,其破坏性尤为严重。

“不以兵强天下”的思想还基于老子深刻的辩证法思想。任何事物都要遵循辩证法的规律,战争也不例外。老子说,“物壮则老”、“兵强则灭,木强则折”(《七十六章》)。当一个国家以武力扩张称霸的时候,这种状态发展到



极致,必然走向衰落。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考察,老子的这一思想所揭示的无疑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例如,历史上以武功著称的罗马帝国的衰亡,正是在其穷兵黩武、无限扩张之际埋下的祸根。当然,从“兵强”到“灭”,是一个多种因素和条件共同作用的复杂过程,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兵强未必一定会“灭”,同样,“不以兵强天下”也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对“强兵”的追求。在这一点上,老子提出了“强大处下,柔弱处上”(《七十六章》)的理论,这正是他为强国指出的自处之道。



老子论治之于未乱

题引:老子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提出了“谋于未兆”、“治于未乱”的精辟思想。本篇节选自《道德经·六十四章》。

【原文】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①,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②;九层之台,起于累土^③;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

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译文】

局面安定的时候容易掌握,事变还没有明显迹象的时候容易图谋。事物在脆弱的时候容易被消解,在细微的时候容易被驱散。应该在事端没有形成之前处理妥当,在祸乱没有发生的时候进行治理。

合抱粗的大树,是从细小的萌芽长起来的;九层的高台,是从第一筐土建造起来的;千里的远行,是从脚下的第一步开始的。.....

人们做事,往往在即将成功的时候失败了。如果在事情要完成时也能像刚开始时那样谨慎小心,就不会有失败的事了。

【评析】

居安思危、防患未然是中国传统战略思维的重要特点和精髓所在。在两千五百多年前,老子已经明确提出这一点,并从哲学的角度给予了分析和论

① 泮(pān,音盼):融解、分离。

② 毫末:比喻极为细微。

③ 累土:一筐土。累,通“蓐”,意为盛土的筐。



证,这种睿智的哲思不能不令人叹服。

老子的这段论述是对事物之理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性认识,主要包含了两层意思。

一是安与危的辩证关系。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矛盾主要方面的发展同时也是其对立面发展的过程。安与危也是一样。当局面安定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孕育着危险因素的萌芽以及由安向危的转化趋势。而在危险因素刚刚萌芽的时候,它往往是细微的、柔弱的、不完善的、易于控制的,也就是老子所说的“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因此,要努力在危险因素发展壮大之前采取措施,这样才会事半功倍,避免祸患的发生。

这一思想运用到治国安邦的领域,便成为统治者藉以思考和处理国家大事的重要思想方法,成为一种高超的政治智慧的象征。如果我们细加分析,就会发现,这种政治智慧实际上包括了由知到行的三个要素。其一,要有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要从哲学的高度把握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安不忘危,居安思危。其二,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要见微知著,在危险因素萌芽的阶段便能透彻认识其本质,预见其发展趋势及可能的后果。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无不具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其三,要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就是要及时、果断地采取行动,“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只有具备了这三个要素,才能真正在事关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上掌控局势、有所作为。

二是脚踏实地、有始有终的观点。老子从事物发展的空间性和时间性两个方面论述了“处事”之道。从空间性来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从小到大、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无论是多么宏伟的蓝图,都要通过一砖一瓦去构建,无论多么遥远的征途,都要一步步去实现。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也是如此,任何制度、措施、方略都要脚踏实地,从点点滴滴做起,那种好高骛远、凌空蹈虚的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从时间性上来看,由始至终体现了事物发展的阶段性。任何事情的成功都需要恒心和毅力。行百里者半九十,越在最后时刻越要坚持住,否则就会功败垂成。

老子的这些论述虽然并非专门就政治立论,但其揭示的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顺应规律的方法却对后世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思考和处理国家安全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孔子论足食足兵民信之

题引:孔子(前551~前479年),春秋晚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曾任鲁国司寇(主管司法),长期周游列国、聚徒讲学,传说有弟子三千人,著名者七十二。孔子思想以“仁”、“礼”为核心,强调以“仁”、“礼”、“德”、“信”治国。本篇选自《论语·颜渊》。

【原文】

子贡^①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②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译文】

子贡请教为政之道。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百姓信任。”子贡问道:“如果不得已,必须要去掉一项,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万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这两项中要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都免不了死亡,(没有粮食,不过一死,)但如果没有百姓的信任,国家就无法立足。”

【评析】

“食”、“兵”、“信”,简单的三个字,却道出了国家生存、国家安全的基本条件,相当于我们今天讲的经济、国防和政治。

“食”就是粮食。西方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认为,吃饭、穿衣等温饱问题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只有满足了生存需要,才谈得上其他

① 子贡:(前520~?),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赐。

② 斯:这。



更高层次的需要。我国古语说,“民以食为天”,讲的也正是这个道理。

“兵”指的是军备。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存在一方面是对外反侵略、反掠夺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维护国内统治秩序的需要,其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信”就是老百姓对政权的信任。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是一个政权得以建立和存在的基础。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都深刻地揭示了这层关系。

如上所述,对于一个政权而言,“食”、“兵”、“信”都是非常重要的,缺一不可。孔子讲“足食,足兵,民信之”,直白讲就是粮食充足、军备充实、内部团结,孔子实际上是把这三者视为国家生存和安全的基本条件。“食”、“兵”、“信”之间又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既不可能孤立存在,也不可能把哪一项去掉。如子贡所假设的,必须在几者之中做出抉择的情境几乎是不存在的,而孔子对“食”、“兵”、“信”三者的排序,也只是为了极言“信”的重要性。事实上,他并不轻视“食”与“兵”,如他曾说“食色,性也”,又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

不过,在现实政治中,“食”、“兵”、“信”之间也确实会经常出现矛盾,如何处理其间的轻重缓急关系便体现了不同的治国理念。孔子的“去食”、“去兵”之说就是儒家治国理念的一个缩影。用今天的话解释,“信”是一个政权内在凝聚力的来源,是其之所以成立的根基,理应放在首要地位。“兵”的地位固然重要,但它只是维护政权稳固的物质力量。如果政权丧失了“民信之”这一存在的基础,再强大的军队又有什么意义呢?粮食虽然关系生死问题,但个人的生死与政权的存亡相比,显然处于次要的地位。

孔子对“食”、“兵”、“信”的论述成为中国封建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以民为本”也由此成为历代儒家政治家高标的政治准则。虽然孔子所说的“民信之”与我们今天所讲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其进步性、合理性仍然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在这一思想被发展、运用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片面强调政治,忽视军事和经济问题的不良倾向,这一点又是需要引以为鉴的。



孔子论有国有家者

题引：本篇选自《论语·季氏》，主要讨论了贫富与安危、治内与服远等治国安邦的重大问题。

【原文】

孔子曰：“求^①！君子疾^②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③。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④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而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⑤之忧，不在颛臾^⑥，而在萧墙^⑦之内也。”

【译文】

孔子说：“冉求！君子最讨厌那种掩饰贪求还编出种种借口的人。我听说，对于主掌一国或一家的人来说，不怕财富少而怕贫富不均；不怕物质匮乏

① 求：孔子弟子，名“冉求”，又名“冉有”，字子有，为鲁国权臣季孙氏家臣，帮助季孙氏发展势力，遭到孔子不满，要求弟子“鸣鼓而攻之”。参见《论语·先进》、《孟子·离娄上》等。

② 疾：痛恨。

③ 辞：托词、借口。

④ 盖：句首语气词。

⑤ 季孙：季孙氏，鲁国执政的正卿。这里特指鲁哀公时的季康子（季孙肥）。

⑥ 颛（zhuān，音专）臾：鲁国的附庸国，临近季孙氏的私邑，季康子欲用武力攻取而据为己有，因而遭到孔子的批评。孔子深刻指出，季孙氏的真正忧患在其内部而不在外部。后来果然发生鲁哀公奔越之事，企图求助越国伐鲁而除掉季孙氏以及孟孙氏、叔孙氏等三家贵族。

⑦ 萧墙：古代宫室内用以分隔内外的临门小墙。后常以“萧墙之患”比喻内部潜在的祸患。



而怕不安定。财富平均就不会有贫困,百姓和睦就不会物质匮乏,国内安定国家就不会倾覆。如果做到了这些,远方的部族不臣服,就加强文教、德化,使他们前来归附。归附之后,就妥善安置他们。现在你们辅佐季孙氏,远方的人不顺服,不能使他们来归附,国家分崩离析,不能设法保全,却谋划着在国内挑起战事。我担心季孙氏的忧患不在于颛臾,而在于自己家门内的争斗。”

【评析】

孔子的这段话虽然不长,却涉及到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和战略问题。一是治理国家的内政问题;二是治内和服远的关系问题。

孔子认为,对于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如何增殖财富,而是如何分配财富。他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也就是说,由于财富分配不均而引起的社会不安定是最严重的安全威胁。为了社会的稳定,他提出了“均”、“和”的为政思路。“均”就是平均分配社会财富,遏制贫富悬殊。“和”就是通过文治、教化达成社会和谐。通过这两个手段,就可以实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达成国家安定巩固的局面。

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源于生产力欠发达的古代农业社会,在经济增长较为缓慢、社会财富并不丰足的条件下,通过统治者的为政调节社会分配,遏制贫富不均,是减少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的有效方式。这一思想虽然带有保守的成分,却揭示了有关社会稳定的普遍规律。在阶级社会,贫富差距是一种社会必然,但当这种差距增长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阶级矛盾随之尖锐化,势必导致下层民众的激烈反抗,中国封建社会历次农民大起义无不是这种危险因素恶性发展的结果,西方国家政权及社会形态的更替也同样体现了这一规律。当然,在人类步入阶级社会以后,绝对的平均是没有的,孔子的思想本身也并不是主张绝对的平均主义,而是在承认阶级差别、阶级压迫的前提下一定程度地实现平均。

对于治内与服远的关系,孔子的思想很明确:先有内部的“安无倾”,然后才有对外的“怀柔远人”。如果国内政治没有搞好,内部不安定,而追求对外扩张,难免会祸起萧墙,铸成大祸。

对于远方异族,孔子的主张是“修文德而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也就是说,不是通过武力征伐使异族臣服,而是通过德化的力量感召他们,使他们欣然向化,并妥善地加以安抚安置。这一思想既是孔子以“仁”、“德”治国的



政治思想的延伸,带有鲜明的儒家特色,同时也具有浓厚的时代特点。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周朝不但是一个政治大国,也是一个经济大国、文化大国,它所代表的先进文明自然而然地影响到周边部族邦国,成为他们倾慕和追随的对象,“修文德而来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在嗣后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大体上一直保持着文明中心的优越地位,加之儒学思想占统治地位,孔子“远人不服,则修文德而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的思想便成为封建政治家们讨论华夷关系的理论张本。

孔子“均”、“和”、“远人不服,则修文德而来之”等思想不但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独特内涵,而且顺应了一系列政治问题的内在规律,对现代社会仍然具有穿越时空的借鉴价值。



孔子论文事武备

题引：孔子主张文武之道，相辅而行。本篇选自《史记·孔子世家》。

【原文】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①。夏，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②，会于夹谷^③。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④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⑤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

【译文】

鲁定公十年（前500年）春季，鲁国与齐国讲和。夏季，齐国大夫黎鉏向齐景公进言说：“鲁国任用孔丘，势必危害齐国。”于是派使臣通知鲁国举行友好会盟，会盟地点定在夹谷。鲁定公准备乘坐公车抱友好态度前往。孔子当时代理国相事宜，他说：“我听说，对待文事一定要有武备，对待武事一定要有文备。古时候诸侯离开国土，必须配齐文武官员随行。请配备左右司马。”定公说：“好。”于是，以左右司马随行。

【评析】

在中国古代政治术语中，“文”、“武”是一对非常重要的范畴。“文”是一个十分笼统的概念，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多方面的内容。“武”的涵义则相对集中、明确，指的就是军事问题。对于文武之间关系的论述，孔

① 及齐平：与齐和好。及，与；平，和好，媾和。

② 会：会盟，古代诸侯之间聚会结盟的一种形式。

③ 夹谷：今山东淄博境内，一说在山东莱芜南。

④ 摄：代理。

⑤ 具：准备，配备。



子的“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之说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最为深远。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文、武就像一辆车的两个车轮,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如果只有文治教化,而缺乏足够强大的武备,这个国家会很快在内部的动乱与外来的人侵面前归于灭亡,宋代的积弱而亡就有这方面的因素。相反,如果不注重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是一味穷兵黩武、大肆扩张,这个国家就不会有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最终也难以逃脱覆灭的厄运,秦朝和隋朝两个短命王朝的历史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唯有如孔子所说,以“文”、“武”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是治理国家最朴素、最基本的道理。

即便对于具体事务而言,“文”、“武”也是可以相资为用的两种手段。例如,文中提到的齐鲁会盟本为一次外交活动,双方国君会晤,达成和解,应该属于“文”的范畴,但是,如果没有军事力量做支撑,这样的会盟难免会出现失衡,孔子主张以掌管军事的左右司马随行就是以武备为和谈的后盾,促使会盟取得更好的效果。同样,在军事斗争中,运用文治、教化的力量争取人心,或者展开外交攻势,合纵联横,也都是“有武事者必有文备”的体现。

孔子“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的观点成为封建后世构筑国家政权的理论指导。任何一个政权都会从理论上强调文武并重,在机构的设置、制度的设计以及军事力量的运用上兼顾到文武平衡问题。尤其在儒家政治思想发展到后期,出现了“重文轻武”的倾向以后,这一思想成为一些进步政治家纠偏正谬的理论依据。

不仅如此,历代政治家还对这一思想多有继承和发展。如汉初,陆贾劝诫汉高祖说:“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①唐太宗在平定天下后对称颂武功的大臣讲:“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②明太祖朱元璋总结治国之道时也说:“我以为建基立业,犹之盖大房子,剪伐斫削,要用武臣,藻绘粉饰,就非文臣不可。……治理天下要文武相资,才不会坏事。”^③这些论述不但重申了文武不可偏废的观点,而且指出,在创业与守成的不同时期对文武的侧重点当有所不同,创业重武功,而守成重文治,这又成为封建政治的一条重要经验。

① 《史记·酈生陆贾列传》。

② 《旧唐书·音乐志》。

③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二。



孙子论安国全军

题引：孙子，春秋末期著名军事家，约与孔子（前 551 ~ 前 479 年）同时。名武，字长卿，齐国人，以兵法见吴王阖庐，用为将，辅助吴王成就霸业。所著《孙子兵法》十三篇，被后世尊为“兵学圣典”。本篇节选自《孙子兵法·火攻篇》，主要论述了“慎战”、“修功”等“安国全军”的重要思想。

【原文】

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①者，凶^②，命曰“费留”^③。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④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⑤之道也。

【译文】

打了胜仗，攻取了土地城邑，却不能巩固其胜利成果，是很危险的，这种情况叫做“费留”。所以说，明智的国君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贤良的将帅要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没有利益不要行动；没有取胜的把握不要用兵；不到危急关头不要开战。国君不可因一时的愤怒而发动战争，将帅不可因一时的气忿而出阵求战。符合自己的利益才用兵，不符合自己的利益就停止。愤怒可以重新变为欢喜，气忿也可以重新变为高兴，但是，国家灭亡了却不能复存，人死了却不能再生。所以，对待战争，明智的国君应该慎重，贤良的将帅

① 修其功：巩固胜利成果。这里指战胜之后修明政治，论功行赏。修，治，引申为巩固；功，功效，一说战功。

② 凶：凶险。

③ 费留：财货耗尽、师老兵疲而不得归。

④ 愠：恼怒，怨愤。

⑤ 安国全军：安定国家、保全军队。



应该警惕,这是安定国家保全军队的根本原则。

【评析】

在这段论述中,包含了两个十分重要的思想,一是慎战,二是修功。

慎战是孙子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孙子在战略上追求国家安全的一个基本认识。《孙子》开篇第一句话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的慎战思想源于他对战争残酷性的深切认识:大而言之,战争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存亡,这是政治问题;小而言之,战争事关无数生命个体的生死,这是一个道义问题,这两个方面在这段文字中表述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实际上,孙子之所以慎战,还有经济上的诸多考虑,这是与政治密切联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参见孙子论兵贵胜不贵久)。正因为战争造成的后果很严重,因此,国君和将领一定要慎重对待战争问题,“明君慎之,良将警之”。

孙子慎战思想的支点是“利”。孙子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利”、“得”说的都是“利”;“危”虽然不是主动的“趋利”,但从另一方面看,危急情况下被迫应战也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在孙子看来,“利”是决定作战与否的唯一标准,同时也是判断战争胜负的唯一标准。“利”是与主观感情因素相对立的客观动因,是实际的、理性的。以利益为战略行为的终极目标,就要求战略决策者时刻保持理智,审时度势,作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决策。如果君主或将领被一时的愤怒冲昏了头脑,就会偏离“利”这一中心,作出错误的决策。因此,孙子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不能因为一己的愤怒而贸然开战,置民众生死、国家存亡于不顾。

需要强调的是,孙子所说的“利”既非简单的一城一地的得失,也不是唯利是图之“利”,而是与“安国全军”的总体目标相一致的战略利益。因此,孙子会说,“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①,也就是说,为了长远利益,可以放弃暂时利益,为了整体利益,可以放弃局部利益。

如果说慎战思想是出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考虑,“修功”思想则更加突出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一般而言,战场上的胜利只是政治行动的一部分,如果在战胜攻取之后,没有一系列合理、有效的政治举措来安定社会秩

^① 《孙子兵法·九变篇》。



序,只能导致师老兵疲,谈不上最终的胜利。对于任何形式的战争而言,这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警示。对于“修功”,也有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在战胜之后,要及时论功行赏。即便按照这种解释,也是并不以战胜攻取为最终的胜利,而是要进一步稳定内部,避免功败垂成。这些思想即使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孙子“慎战”和“修功”的思想以“利”为思考战略问题的出发点,以“安国全军”为目标,兼顾到了政治利益、经济利益、长远利益等各个层面,处处闪烁着理性的光辉。在以儒家“重义轻利”为主导思想传统文化中,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贵思想财富,值得我们认真继承和发扬。



孙子论兵贵胜不贵久

题引:孙子着眼于减小战争对国家的负面影响,从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出发,提出了“兵贵胜、不贵久”的著名观点。本篇节选自《孙子兵法·作战篇》。

【原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①千驷^②,革车^③千乘^④,带甲^⑤十万,千里馈^⑥粮,则内外^⑦之费,宾客^⑧之用,胶漆之材^⑨,车甲之奉^⑩,日费千金^⑪,然后十万之师举^⑫矣。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⑬,攻城则力屈^⑭,久暴^⑮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殫^⑯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

① 驰车:轻型战车。

② 驷:四匹马,此指四匹马拉的战车。

③ 革车:重型战车,用以运载粮草、辎重。

④ 乘(sheng,音胜):四匹马拉的一辆战车。

⑤ 带甲:披甲,此指全副武装的士兵。

⑥ 馈:运送,供应。

⑦ 内外:指前方和后方。

⑧ 宾客:各诸侯国的使节和游士。

⑨ 胶漆之材:指制作与维护弓矢等武器装备所需的胶、漆等物资。

⑩ 奉:费用。

⑪ 千金:千斤铜钱,泛指费用之多。金,古代以铜制钱,一斤铜为一金。

⑫ 举:出动。

⑬ 钝兵挫锐:军队疲惫,挫伤锐气。钝,通“顿”,困乏、疲惫。

⑭ 屈(jue,音决):竭、尽。

⑮ 暴(pu,音瀑):“曝”的本字,意为在阳光下晒东西,引申为暴露。

⑯ 殫(dan,音但):尽。



闻拙速^①，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②，粮不三载^③，取用于国，因粮于敌^④，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⑤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⑥。力屈、财殫，中原^⑦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⑧马，甲冑矢弩^⑨、戟楯蔽橦^⑩、丘牛大车^⑪，十去其六。

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⑫，当吾二十钟；薏秆^⑬一石^⑭，当吾二十石。

故杀敌者，怒^⑮也；取敌之利者，货^⑯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⑰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故兵贵胜，不贵久。

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⑱，国家安危之主也。

【译文】

孙子说：凡用兵作战的一般情况，要出动轻型战车千辆，重型战车千辆，

① 拙速：行动笨拙，但能速胜。

② 役不再籍：不两次征集兵员。役，兵役；籍，名录。

③ 三载：指多次运送军粮。载，运载、运送。

④ 因粮于敌：依靠敌国补充粮草。因，就，依。

⑤ 百姓：原指“百官”，为贵族阶级，与“黎民”对称。后世用为民众的泛称。

⑥ 丘役：以丘为单位征派的赋税、徭役。丘：古代地方行政单位。《汉书·刑法志》：“四井为邑，四邑为丘。”

⑦ 中原：泛指国内。

⑧ 罢：同“疲”。

⑨ 甲冑矢弩：甲，铠甲；冑，头盔；矢，箭；弩，一种以机械力量发箭的弓。

⑩ 戟楯蔽橦：戟，古兵器，为戈与矛合为一体的长兵器；楯，盾牌；蔽橦，大盾牌。

⑪ 丘牛大车：牛拉的辘重车辆。丘牛，从丘邑中征集来的牛。

⑫ 钟：古代容量单位。六石四斗为一钟。

⑬ 薏秆：植物的秸秆。薏(qi，音其)，同“萁”。

⑭ 石：古代重量单位。每石120斤，约合今34.5公斤。

⑮ 怒：激励士气。

⑯ 货：财货，意谓以钱财赏赐。

⑰ 已：同“以”。

⑱ 司命：掌握命运的人。



军队十万人,还要从千里之外运送粮食,那么前方后方的费用、招待使节、游士的用度,制作与维护作战器材的经费,维修车辆盔甲的开支,每天都要耗费巨资,然后十万大军才能出动。

用这样的军队去作战,就要求速胜,旷日持久就会使军队疲惫,锐气挫伤,攻城就会使兵力耗尽,长期在外作战就会使国家财政亏空。如果军队疲惫、锐气挫伤、力量耗尽、财政枯竭,各诸侯国就会乘机前来进攻。到那时,即使有足智多谋的人,也无法收拾残局了。因此,用兵作战只听说过笨拙的速胜,没见过弄巧的持久战。战争久拖不决而对国家有利,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因此,不能完全了解用兵的害处,就不能完全懂得用兵的利益所在。

善于用兵的人,兵员不两次征集,粮草不多次运用,武器装备从国内取用,粮草依靠敌国补充。这样,军队的粮草供应就充足了。

国家之所以会因为用兵而贫困,就是因为军队长途运输。长途运输就会使百姓世族贫困。靠近驻军的地方物价就会昂贵,物价飞涨会使百姓世族的财力枯竭,国家财政枯竭就会急于增加赋役。人力耗尽、财力枯竭,国内便会家家空虚。百姓的家产将耗去十分之七;公家的费用,也会由于车辆损坏,战马疲敝,盔甲、箭弩、戟盾、蔽橰的制作维护以及丘牛大车的开支,而耗费十分之六。

因此,明智的将领务求在敌国解决粮草问题。吃敌国一钟粮食,相当于从本国运输二十钟;用敌国一石草料,相当于从本国运输二十石。

因此,要使士兵勇敢杀敌,就要激励他们的士气;要使军队夺取敌人的财物,就要使用物资奖励。所以,在战争中,凡缴获战车十辆以上的,要奖赏首先夺得战车的人,将战车更换旗帜,混合编入自己的车队,对俘虏要给予善待并使用,这就是所谓越是战胜敌人就越是壮大自己的道理。

因此,用兵作战,贵在速胜,不宜旷日持久。

因此,懂得如何用兵的将帅,是民众命运的掌握者,是国家安危的主宰者。

【评析】

在国家安全的链条上,战争、政治、经济是三个密切关联的环节。战争是政治的产物,也是政治的延续;经济因素往往是战争的重要起因,战争中又必然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国家经济的破坏甚至倒退,而经济的凋敝又会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胜负、政治的治乱。因此,在战争运筹的过程中,如何从



政治、经济、军事的全局权衡利害,从而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尽可能地减小战争对国家的负面影响,确保国家的持久安全,是战略学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每一位战略家所必须正确认识并妥善解决的问题。

孙子深刻洞察到了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复杂关系,他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殫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一支军队出征作战,从兵员的征集,到物资的准备、粮草的运输,要耗费大量的社会财富,如果战争旷日持久,国家经济就会不堪重负,必然导致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这一认识,是十分朴素而深刻的。

为了避免“钝兵挫锐”局面的发生,孙子提出了“兵贵胜,不贵久”的作战指导原则。也就是说,要在确保胜利的前提下,尽可能速战速决,减少战争之“害”。这一原则体现了损失最小化与利益最大化的双重标准,对于任何类型的战争都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当然,和任何理论一样,“兵贵胜,不贵久”也有其特定的适用条件和范围,例如,进攻战利于速战速决,而防御战多为敌强我弱,很难速胜,只能在持久的基础上伺机反攻。因而,随着军事实践及兵学思想的发展,与“速胜”相对应的持久战思想逐渐发展起来。唐代大军事家李靖即指出,“战贵其速”固然是作战基本原则,若“敌将多谋,戎卒辑睦,令行禁止,兵利甲坚,气锐而严,力全而劲”,则不宜速战,而是要“卷迹藏声,蓄盈待竭,避其锋势,与之持久”^①。但是,这并不是说“速战”思想不正确,在己方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以持久为利,正说明对进攻方而言,贵在速战,而不利持久。

孙子还谈到了一些尽可能减少战争对经济影响的方法,一是因粮于敌,靠掠夺敌人来补足粮食供给,这样就可以免去长途运输的巨额负担。二是“胜敌而益强”,将俘获的敌军人力、物力为我所用,在消耗敌人的同时壮大自己。尽管有这些战术原则做辅助,“兵贵胜、不贵久”的速胜思想仍然是孙子战略思想的基本原则。

在先秦诸子中,各主要学派都对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有所论及,但他们大多从政治、哲学、伦理的立场出发,看到战争造成的惨烈场景以及严重的经济破坏,从而走向抵制战争、否定战争的一端。如老子主张“胜而不美”,墨子强

^① 《通典》卷154引《卫公李靖兵法》。



调“非攻”,孟子则说“善战者服上刑”^①,等等。孙子则不然,他也理性地认识到战争对经济、政治的负面影响,主张重视用兵之害,慎重对待战争,但他的着眼点不是反对战争,也不是取消战争,而是要在全面衡量“利”、“害”的前提下,如何在战争决策、指挥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减少对经济的振荡和破坏。在战争无法根本消除的情况下,这种思考问题的角度无疑是更为务实,也更具有积极意义的。因此,孙子“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②的思维方式,以及“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等论断,都成为中国传统国家安全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① 《孟子·离娄上》。

② 《孙子兵法·用间》。



墨子论备者国之重

题引：墨子(约前468~前376年)，春秋战国之交著名思想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名翟，鲁国人。墨子倡导“兼爱”、“非攻”，反对兼并战争，主张援助小国。本篇选自《墨子·七患》，主要论述了国家的守备问题。

【原文】

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①；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②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③，不可以应卒^④。是若庆忌^⑤无去^⑥之心，不能轻出。夫桀无待汤之备，故放；纣无待武之备，故杀。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灭亡于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贵而不为备也。故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

【译文】

所以说，粮仓里没有储备的粮食，就无法对付荒年和饥馑；府库里没有储备的兵器，即使是正义的一方，也无法征讨无义的国家；内外城郭不预先修治完整，就不能进行守卫；心中没有事先筹划好的对策，就无法应对突发事故。王子庆忌如果不是放弃了戒备之心，也就不会轻易外出，(而上当被杀。)夏桀没有抵抗商汤的准备，所以被放逐；商纣没有抵抗周武王的准备，因而被诛杀。夏桀和商纣都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却都被小小百里之国的国君所灭

① 凶饥：凶年和饥馑。

② 城郭：内城和外郭。郭，外城。

③ 备虑：事先想好的对策。

④ 卒：通“猝”，突然。

⑤ 庆忌：春秋时吴王僚之子，为刺客要离所杀，事见《吕氏春秋·忠廉篇》、《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等。

⑥ 去：此处疑有缺文，一说以为“去”下缺“备”字，一说以为“去”下缺“要离”二字，今按文义，取前者。



亡,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拥有了富贵,却没有做好防备工作。因此,防备是国家的重要事务:粮食,是国家的珍宝;武备,是国家的爪牙;城池,是国家赖以自守的凭仗。这三样,是一个国家自卫的重要条件。

【评析】

墨子这段论述重点讲了战备的重要性。他首先指出,要有强烈的战备意识。“备者,国之重也。”也就是说,战备是国家的重中之重。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是我国传统安全思想的重要内容,墨子说,“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讲的也正是这个道理。只有平时在思想上不忘战,在行动上做好战争准备,面临突发安全事件之时才能措置得当。

墨子还具体讲到了备战的三个方面,一是“食”,即粮食储备。没有足够的粮食贮备就不能应对饥荒,也无法满足战争的需要,因此,墨子将粮食比喻为“国之宝”,即国家安全最重要的物质保障。二是“兵”,墨子所论之兵就狭义而言,指的是兵器,广义而言,则可泛指军队和战备。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充分的战备,即使是正义一方,也无法战胜非正义的一方。因此,墨子将兵比喻为“国之爪”,就像野兽用以防御和进攻的爪牙一样,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三是“城”。墨子说,“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食”和“兵”对于战备的重要性,先秦其他诸子也有较充分的论述,而以“城”为战备的重点则是墨子思想的独到之处。墨子生活的春秋时期,中原农业文明已经相当发达,以城市(国)为中心,统领周围的农村地区(野)成为各诸侯国的基本格局,城市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此外,由于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多处平原,无险可守,城市作为防御阵地的军事功能也日益强化。因此,城市攻防战逐渐成为决定政权生死存亡的重要作战方式。墨子反对兼并战争,主张扶助小国,抗拒大国,其主要方式就是帮助小国加强城防,《墨子·公输》中记载墨子曾劝楚国放弃攻打宋国,与善于攻城公输班演练攻防之法,九攻九拒,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墨子后学对他的城防理论和实践加以继承发展,使之成为墨学独具特色的一部分内容,也为中国古代作战理论的丰富做出了重要贡献。

墨子所讲的食、兵、城涵盖了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国家进行战争物质准备的主要方面,是国防战备的基本内容。其强调战备和有备无患的基本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可以为我们思考国家安全和国防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



商鞅论农战

题引：商鞅(约前390~前338年)，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法家学派的重要人物。名公孙鞅，早年为魏相公叔痤家臣，后入秦，得到秦孝公重用，实行变法，富国强兵，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以功封于商，故称商君，又称商鞅。本篇选自《商君书·农战》，阐述了农业和军事的重要性。

【原文】

凡人主之所以劝^①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②，此谓劳民^③。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④。

……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夫民之不农战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⑤则国治，壹^⑥务则国富。国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⑦外，身作壹而已矣。

【译文】

大凡国君用以勉励人民的，是官职和爵位；国家赖以兴盛的，是农耕和作战。现在百姓求取官职和爵位，都不靠农耕和作战，而是靠花言巧语和空洞的议论，这就是引导百姓变得奸巧。使百姓奸巧，这个国家必定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国家必然被敌国侵削。

-
- ① 劝：勉励。
 - ② 虚道：空洞的议论。
 - ③ 劳民：使百姓奸巧。劳，通“佻”，奸巧。
 - ④ 削：削弱。
 - ⑤ 常官：以正常途径(指农战)任命官吏。
 - ⑥ 壹：专力从事某事。
 - ⑦ 作：当为“非”字形误。



……国家的安定要靠农耕和作战,君主的尊贵也要靠农耕和作战。如果百姓都不从事农耕和作战,那是因为君主喜欢空谈,选任官吏失去了常道。按常规任用官吏,国家就会政治清明;百姓专力从事农耕和作战,国家就会富强。国家富强而又政治清明,这是成就王业的途径。因此,成就王业的途径不是别的,只在于自己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罢了。

【评析】

战国时期,围绕着如何在诸侯混战中自立、称霸,各个国家都积极探索增强国力的方法。法家思想由于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发展生产力的需要,而成为一时潮流。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悝曾帮助魏文侯实行变法,“尽地力之教”,大力发展农业。吴起也曾任楚国实行改革,“明法审令”,“抚养战斗之士”。在这些改革活动中,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是成效最为显著,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

商鞅作为战国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系统地提出了富国强兵的理论。他在秦国推行的变法,就是为了实现其富国强兵的主张,其核心措施是奖励耕战,也就是本篇所讲的“农战”。农业是在中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生产部门,也是封建经济的基础。军事实力则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能否独立存在,并进而争强称霸。可以说,这两点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要素,也是富国强兵的最主要方面。商鞅的改革正是抓住了这两点,并围绕它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了发展农业,他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制,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为农业发展开辟了道路。为了发展军事,他废除了维护奴隶主利益的世卿世禄制,实行按照军功授予田宅之法。为了引导人民致力于农战,他还制定了严格的赏罚制度,按照农耕成效和军功大小授予官爵、给予奖励,对那些不事生产的游民、商人以及勇于私斗、怯于为国而战的人则严惩不怠。由于商鞅的变法坚决、彻底,秦很快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军事强国,奠定了统一天下的实力基础。商鞅的变法实践及其思想因而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战国杂家著作《管子》中有一段话,实际上就反映了以商鞅为代表的战国法家富国强兵思想的逻辑主线:“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①

商鞅变法顺应了当时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历史趋势,取得了显

^① 《管子·治国》。



著成效,其历史功绩是巨大的。但另一方面,商鞅厉行法制,反对儒学,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为后来秦朝“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埋下了伏笔。他重农抑商、严刑峻法的思想和实践也不利于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这些也正是秦朝为什么虽能一统六合,最终却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

抛开其他方面,就其核心的“富国强兵”和“农战”思想而言,无疑具有跨越时空的重大意义。

其一,“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以商鞅为代表的战国法家实质上认为,富国是强兵的基础,强兵是富国的保障,这一观点正确地把握住了富国和强兵的辩证关系,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其二,商鞅把富国强兵思想具体化为“重农战”的政策主张,因而具有了切实的可操作性。他说“国待农战而安”,这不仅切合战国时期的时代主题,而且具有长远的思想价值。如果我们把“农”的概念扩展为经济,其合理性就更为明显。无论任何时代,经济和军事都既是国家事务的重要方面,又是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

其三,商鞅强调“壹”的重要性。当战略重点确定以后,就应该专注对待,全力投入,这样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商鞅的农战主张得以施行,严格的奖惩制度是一个主要条件,这也提示人们,任何好的主张都需要完善的制度来保障和落实。



《司马法》论好战必亡忘战必危

题引:《司马法》，先秦重要兵书，为宋代钦定“武经七书”之一种。战国时齐威王（约前356～前320年在位）命人纂辑而成。本篇选自《司马法·仁本》，着重论述了战争与国家安全问题。

【原文】

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①。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②。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故仁见亲，义见说^③，智见恃，勇见方^④，信见信。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战也。

战道：不违时，不历^⑤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⑥，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恺^⑦，春蒐秋猕^⑧，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

【译文】

古代治国以仁爱为根本，以“义”为原则，这是正常的途径。用正常的方法达不到目的，就采取特殊的手段。特殊的手段表现为战争，而不是表现为中和与仁爱。因此，如果杀掉坏人而使好人得到安宁，那么杀人是可以的。

① 权：变通，机变。

② 中人：中和与仁爱。中，中和；人，通“仁”，仁爱。

③ 说：通“悦”，悦服。

④ 方：通“仿”，仿效。

⑤ 历：使遭受。

⑥ 加丧：趁别国有国丧时发动战争。

⑦ 恺：同“凯”，凯旋。

⑧ 春蒐秋猕：打猎，古代藉以训练部队的一种方式。春猎为蒐(sou，音搜)，秋猎为猕(xian，音显)。



如果进攻别国是为了爱护该国的百姓,那么攻打它是可以的。如果用战争的手段来制止战争,那么从事战争也是可以的。所以,要施仁爱以获取人们的亲近,行正义以使人们悦服,凭智慧赢得人们的仰慕,靠勇敢争取人们的效法,以诚实博取人们的信任。这样,对内就能得到民众的爱戴,从而守土卫国;对外就能保持强大的威慑,从而战胜敌人。

用兵的原则是:不要违背农时,不要让民众遭受苦难,这样是为了爱护自己的民众;不乘敌人有国丧时进攻,也不趁敌国发生灾害时起兵,这样做是为了爱护敌国的民众;在严寒的冬季和酷热的夏季不兴师出征,这样做是为了爱护敌我双方的民众。所以,国家虽然强大,好战就必定灭亡;天下虽然太平,忘战则必有危险。即使天下已经太平,天子大功凯旋,仍要在每年春秋两季进行田猎以操练军队,演习战阵。各国诸侯也要在春天整顿军队,在秋天训练军队,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人们不忘备战。

【评析】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百家争鸣的核心是提倡用何种政治纲领来解决当时纷繁复杂的政治问题,统驭民众,治理国家,富国强兵,兼并天下。在这个问题上,《司马法》提出了一些基本的原则。

《司马法》强调治国要“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认为这是治理国家的常规方法和正确途径。同时,它也注意到了“正不获意”的情况,这时候就需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和补充,是与治国之“正”相反相成的权宜之计。从这一角度定位战争,便对战争的起源及其必然性作出了合乎客观的解释:在政治目的正确的前提之下,战争就具有合理性。

既然战争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那么,统治者应该如何对待战争呢?首先,《司马法》讲到了以政治与军事两种手段治国所需要的几种基本素质——仁、义、智、勇、信,在其他的论述中,它还提到了“礼”,这六个方面合称“六德”。“六德”既是对内治理国家、取得民众信任的保证,也是对外树立威权、战胜敌人的根本。因此,《司马法》说:“六德以时合教,以为民纪之道也,自古之政也。”(《仁本》)

其次,《司马法》讲到了对待战争的基本原则,那就是要爱民。不但要爱自己国家的民众,而且要爱敌国民众。爱民原则是其“六德”思想的体现,也与其所强调的“杀人安人”的战争正义性相一致。

再次,《司马法》强调了对待战争的两种基本态度,一种是慎战,一种是备



战。这两种观点都源于它对战争本质属性的认识。由于战争只是在常规的政治手段无法达到目的时的权宜之计,它不能取代治国的正常途径,也不应该超越其适用范围。好战乐战、穷兵黩武是势必要走向灭亡的。又由于战争具有必然性,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争,一个国家必须要加强战争准备,任何忘记战争、轻视战争的思想都是很危险的。

《司马法》从政治与战争关系入手,阐释了战争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由此导出了“好战必亡”、“忘战必危”的结论。这一论述具有严密的逻辑性、高度的辩证性和卓越的思维水平,因而成为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的名论,也成为国家安全思想的至理名言。



《管子》论霸王之主

题引：《管子》，战国时齐国稷下之学的言论著述汇编，先秦杂家的重要著作。托名于春秋初期齐国名相管仲，包含了管仲的一些思想。本篇选自《管子·重令》，论述了大国的自处之道。

【原文】

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天道之数^①，人心之变。天道之数，至^②则反，盛则衰。人心之变，有余则骄，骄则缓息。夫骄者，骄诸侯；骄诸侯者，诸侯失于外；缓息者，民乱于内。诸侯失于外，民乱于内，天道也。此危亡之时也。若夫地虽大，而不并兼，不攘夺^③；人虽众，不缓息，不傲下，国虽富，不侈泰^④，不纵欲；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

【译文】

土地广大，国家富足，人口众多，兵力强盛，这是成就霸王之业的资本，不过到了这一步也就与危亡邻近了。这是由于天道规律以及人心变化的缘故。天道变化的规律是，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强盛到了顶点就会衰败。人心变化的道理是，富裕了就会骄傲，骄傲就会懈怠。“骄”是对诸侯骄傲，对诸侯骄傲就会失去诸侯的友好，懈怠则会导致国内民众叛乱。在外与诸侯不和，在内有民众作乱，这是天道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正是危亡来临的时刻。如果一个国家尽管土地广大，却不兼并、侵略他国；尽管人口众多，却不懈怠，不傲视民众；国家虽然富足，却不奢侈，不放纵；兵力虽然强盛，

① 数：规律，必然性。

② 至：达到极点。

③ 攘夺：侵夺。

④ 侈泰：奢侈放纵。又作“侈汰”、“侈怙”。



却不轻易欺侮诸侯,动用民力、兵力一定都是为了天下政治的稳定,这才是匡正天下的基础,是成就霸王之业的君主。

【评析】

管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在齐国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其功绩连孔子都给予高度评价,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管子·重令》借鉴管子的思想和事迹,提出了富于睿智和理性的大国自处理论。首先,它看到了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至则反,盛则衰”,“盛”和“衰”是国家实力的两面,在达到某个节点的时候,由盛转衰将成为必然趋势。盛衰之变也具体表现在人事的变化上,一般而言,统治者在国力强盛时会骄傲自满,对内对外霸气十足,恃强凌弱,这就势必滑向其反面,出现“诸侯失于外,民乱于内”的危亡局面。因此说,“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既是霸王的资本,也与危亡为邻。基于这一深刻而透辟的认识,《管子·重令》提出了对“霸王之主”的理解,那就是,不以国家的富裕而骄奢淫逸,也不以兵力的强盛而侵略扩张,而是要以全天下的安定有序为己任,只有这样的君主才能成为霸王之主,才能做天下的统领者。

《管子》一书的其他篇章中也有类似的论述,如《枢言》篇中讲,在国家关系中,有三种角色类型,一种是“制人者”,一种是“为人所制者”,还有一种是“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所谓“制人者”就是霸王之国,他说:“德盛义尊,而不好加名于人;人众兵强,而不以其国造难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国后。如此者,制人者也。”这也是讲大国不应以强权称霸,可以与本文相互参看。

关于大国的自处之道,老子也有所论述,他从事物发展的辩证法的角度,提出“物壮则老”,“兵强则灭”,主张“强大处下,柔弱处上”(《老子·七十六章》,参见老子论不以兵强天下)。但是,相比之下,《管子·重令》的论述更为全面、合理。一方面,它不但注意到了物极必反、盛极而衰的自然规律,而且从人心变化的角度作出了具体的解释。另一方面,它也并不主张一味谦退,而是提出“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要以正义的形象承担大国的责任。这些都体现了其思想的周密、卓越之处。

《管子·重令》的思想虽然是两千多年前东周政治的产物,但是,它对于大国如何在德与力、义与利、盛与衰之间寻求平衡,如何保持和巩固领导地位却具有超越时空的借鉴价值。



孟子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题引：孟子（前372～前289年），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名轲，字子舆，鲁国邹（今山东邹城）人，曾周游齐、宋、鲁、滕、魏诸国，作《孟子》七篇。孟子主张行仁政以王天下，强调民心向背的重要性。本篇选自《孟子·公孙丑下》，阐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

【原文】

孟子曰：“天时^①不如地利^②，地利不如人和^③。三里之城，七里之郭^④，环^⑤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⑥非不深也，兵革^⑦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⑧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⑨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⑩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⑪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⑫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① 天时：时令与阴晴寒暑等气象条件。

② 地利：有利的地理条件。

③ 人和：指人心归依，内部团结。

④ 郭：外城。

⑤ 环：围绕。

⑥ 池：护城河。

⑦ 兵革：武器装备。兵，兵器；革，盔甲。

⑧ 委：放弃。

⑨ 域：界限。引伸为限制。

⑩ 威：威慑。

⑪ 道：正确的治国方法。孟子指的就是“仁政”。

⑫ 畔：同“叛”。



【译文】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周长三里的内城，周长七里的外城，敌人四面围攻而不能取胜。能够四面围攻，一定会有赶上适宜天时的时候，然而不能取胜，这说明，天时不如地利。

“(又如，)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不是不深，兵器盔甲不是不锐利坚固，粮食不是不多；(然而敌人一攻，)守城者就弃城逃跑，这说明，地利不如人和。

“所以说：限制人民不必靠国土的疆界，巩固国防不必靠山河的险阻，威慑天下不必靠兵器盔甲的锐利坚固。以正道治国的，帮助他的人就多；不以正道治国的，帮助他的人就少。帮助的人少到极点时，连亲属都反叛他，帮助的人多到极点时，全天下的人都归顺他。用全天下都归顺的优势，去进攻连亲属都反叛他的劣势，君子要么不发动战争，如果发动战争，是必然会胜利的。”

【评析】

政治对军事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它不但决定着战争进行与否、战争的性质，而且对战争的进程、战争的最终胜负等具有重要影响。孟子的这段论述讲的就是政治对于战争胜负、国家安全的决定性影响。

孟子列举了影响战争胜负的三个有利因素：天时、地利、人和。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就是说，在三者之中，“人和”最为重要、最为关键。“人和”就是良好政治的体现。只有统治者在政治上“得道”，施行仁政，才能取得民众的拥护和爱戴，达到“人和”的状态。孟子所讲的“人和”包括了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疆场上战士们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二是本国人民众望所归，万众一心，为战争提供强大的精神和物质动力；三是敌国民众受到我方“仁政”的影响和感召，对敌方统治者反戈一击，对我军“欢之若父母”。所谓“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简言之，政胜、人和是战胜之本，也是国防巩固、国家安全之本。这一思想在《孟子》一书中还有不同角度的阐发，如他说，“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公孙丑上》)，这是直接以仁政作为成就王业的充分条件。他又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离娄上》)，这段话后来被概括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对于“仁政”的具体内容，他的解释是：



“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也就是减轻剥削，发展生产，让人民安居乐业。“行仁政”而辅之以“孝悌忠信”的礼义教化，就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可使制挺以挾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梁惠王上》）。

孟子的思想揭示了政治与战争关系的一般规律，是十分有道理的。战争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政治而存在，更不能脱离作为战争主体的人而存在。人的主观意志、民众的支持或反对等等都对战争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尤其是从宏观上、长时段上观察战争的时候，我们更会发现，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孟子“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等才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被历代政治家奉为圭臬。

但是，孟子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将政胜与战胜直接联系起来，似乎政胜就必然地导致战胜，甚至不必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离娄上》）的惨烈战争场面的出现，这实际上忽略了战争所必然包含的战略、战术、武装力量建设以及天时、地利等军事专门知识的讨论。它带来的一个消极后果就是，后世政治家往往片面地强调“行仁政”、“得民心”，而对具体的战争问题缺乏关注和研究，以至于流入迂腐的“坐而论道”一途。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引起注意的。



孟子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题引:孟子认为,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要有忧患意识。一个国家如果长期处于和平环境,会使人们放松警惕,一旦遇到内忧外患,就会土崩瓦解。本篇选自《孟子·告子下》。

【原文】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①之中,傅说^②举于版筑^③之间,胶鬲^④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⑤,孙叔敖^⑥举于海,百里奚^⑦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⑧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⑨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⑩,曾^⑪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⑫,而后作^⑬;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人^⑭则无法家拂士^⑮,出^⑯则无敌国外患者,国

① 畎(quan,音犬)亩:田间,田地。传说舜曾经耕种于历山。

② 傅说:商朝武丁之相。说,同“悦”。

③ 版筑:在两块木板之间夯土筑墙。傅说曾在傅险版筑,为武丁所举用。

④ 胶鬲(ge,音隔):商纣时的贤人,曾贩卖鱼、盐,周文王向纣王举荐他,后又辅佐周武王。

⑤ 管夷吾举于士:管夷吾即管子,春秋时期齐桓公之相。他曾被囚禁,在法官(士)的管理之下。后为鲍叔牙所举荐,受到齐桓公重用。

⑥ 孙叔敖:楚国令尹(宰相)。

⑦ 百里奚:秦穆公大臣。传说秦穆公以五张羊皮的价格将其赎得。

⑧ 是:这个。

⑨ 拂乱:打乱。

⑩ 忍性:坚忍其性。

⑪ 曾:同“增”。

⑫ 衡于虑:思虑阻塞不同。衡:通“横”,阻塞。

⑬ 作:振作。

⑭ 人:指国内。

⑮ 法家拂士:辅弼大臣。法家,法度大臣之家;拂,通“弼”,辅弼。

⑯ 出:指国外。



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译文】

孟子说：“舜从田野中发达起来，傅说从筑墙的工匠中被提拔，胶鬲从鱼盐贩子中被举用，管夷吾从牢狱中被举荐，孙叔敖从海边被任用，百里奚从市场上被赎回，最终登上相位。所以说，上天要把重大使命赋予一个人，一定要先使他内心愁苦，筋骨劳累，忍饥挨饿，穷困贫乏，使他的经历总是不如意。通过这些来触动他的内心，坚忍他的心性，增长他的才干。一个人常犯错误，然后才能改正；内心忧困，思绪阻塞，然后才能有所作为。流露在脸色上，表现在声音中，才能使人们了解。（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如果国内没有坚持法度的大臣和辅佐君主的贤士，国外没有敌国外患，这个国家肯定会灭亡。然后才会明白“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道理。”

【评析】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一语精练地概括了环境对于个人成长和国家安危的重要性。

孟子所列举的舜、傅说、胶鬲、管夷吾、孙叔敖、百里奚等都是著名的历史人物，他们在功成名就之前，或饱受磨难，或身分卑贱，不为世人所知。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艰苦环境的磨砺恰恰成了一个重要原因。当他们饥饿、劳累、困顿不如意之时，能够“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因此，当机会来临，他们便得以崭露非凡的才干，成就辉煌的功业。相反，如果他们一直处于顺境，衣食无忧、地位优越，他们便无法体验困难，也无法超越自我，能力的提升反而变得迟缓，一旦遇到危机，势必无所适从，险象环生。

逆境使人发奋而求生，顺境使人安乐而怠惰，人事如此，国家亦然。在这里，我们要重点讨论的不是“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所揭示的人生哲理，而是它对国家安全问题的重要启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敌国外患的威胁，国家安全防御系统的建设就缺乏目标，也缺少了客观的评价标准，必然导致敌情意识松懈，武装力量发展速度缓慢，同时也会导致各种军事职能的退化，军事制度的腐化，甚至会对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的全面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一旦危险来临，势必遭遇空前的困境，轻则覆军杀将，重则国破家亡。清代后期面临西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时的种种表现就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

事实上，在阶级社会，真正没有敌国外患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关键是



如何保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正确判断安全形势,确定安全战略目标和方针。这就需要贤明的领导者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同时也应该看到,“敌国外患”所带来的效应可能有两种,一种是直面困境,奋发图强,从而使自己的国力、军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正如人在面临逆境时的“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另一种则可能在逆境面前丧失信心、举措失宜,最终在敌国外患的打击下走向衰亡。要达到前一种状态,避免后一种结果,也需要有正确的领导和把握。正是由于这一点,孟子讲到了与“敌国外患”同样重要的一个条件,那就是,一个国家要有“法家拂士”。“法家拂士”是有远见、有能力的安邦定国之士,他们既能见微知著,预见潜在的忧患;也能在真正面对“敌国外患”的时候成为国之栋梁,应对已然的忧患。

内有“法家拂士”,外有敌国外患,一个国家才能在主观上保持警醒,在客观上发展实力,从而在危机中求生存、谋发展。



荀子论节用裕民

题引：荀子(约前313~前238年)，战国晚期著名思想家，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名况，字卿，又称孙卿，赵国人。曾在齐国文化中心稷下讲学，三为祭酒(学宫之长)，又曾游历秦国，晚年至楚。荀子思想包含了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哲学等各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本篇主要论述了“节用裕民”的经济思想，节选自《荀子·富国》。

【原文】

足国^①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②其余。节用以礼^③，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④；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⑤患乎无余？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此无它故焉，生于节用裕民也。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⑥；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而或以无礼节用之，则必有贪利纠讐^⑦之名，而且有空虚穷乏之实矣。此无它故焉，不知节用裕民也。……

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征^⑧：……上好功则国贫，上好利则国贫，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⑨则国贫。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

① 足国：使国家富足。

② 臧：通“藏”。

③ 礼：荀子认为应该将人群分为不同的等级，各个等级严格遵循自己的行为规范，也就是“礼”。

④ 易：土地平整。

⑤ 奚：为什么，何必。

⑥ 秽：土地荒芜。

⑦ 贪利纠讐：贪图私利大肆榨取。讐(qiao, 音乔)，搜刮、榨取。

⑧ 征：征兆、预兆。

⑨ 制数度量：数量上的规定和限制。度，限度。



故田野县鄙^①者,财之本也;垣窳^②仓廩^③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④、事业得叙^⑤者,货之源也;等赋^⑥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⑦斟酌焉。潢然^⑧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⑨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故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⑩者,十年之后,年谷复孰^⑪,而陈积有余,是无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故田野荒而仓廩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⑫。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⑬,然而主相不知恶也,则其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以国持^⑭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谓至贪,是愚主之极也。将以求富而丧其国,将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万国,今有十数焉。是无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君人者,亦可以觉矣。百里之国,足以独立矣。

【译文】

使国家富足的方法,在于节约用度,使百姓富裕,并把多余的东西的储藏起来。节约用度要靠礼法来约束,使百姓富裕则要通过正确施政来实现。实行裕民政策,就会有多余的财货,百姓就会富裕;百姓富裕了,田地就会得到治理,平整而肥沃;田地平整肥沃,粮食产量就会成倍地增长。然后,国君按照一定的法规收取赋税,百姓根据礼制的要求节约使用,多余的物资就会堆积得像小山一样,需要不时地焚烧一些,因为多得没有地方储藏。君子又何

① 县鄙:县、鄙都是古代行政区划的名称,这里泛指农村。

② 垣窳:仓库。垣(yuan,音元),围墙,这里指四周围墙以藏粮食;窳:同“窖”,地窖。

③ 仓廩(lin 凛):粮仓。杨倞注:“谷藏曰仓,米藏曰廩。”

④ 时和:按时耕种、风调雨顺。

⑤ 得叙:有条理地完成。叙,同“序”。

⑥ 等赋:按等级征收赋税。

⑦ 时:时时,经常。

⑧ 潢然:水深广的样子。

⑨ 交:互相。这里指官府和百姓家中。

⑩ 菜色:因饥饿而脸色青瘦。

⑪ 孰:通“熟”。

⑫ 国蹶:国家颓败。蹶:跌倒。

⑬ 并之其末:聚集到国库中。并,集中,聚集。末:枝节,这里指国库。

⑭ 持:供养。



必担心没有多余的财货呢！所以说，懂得节约用度、使百姓富裕，就一定会有仁义贤良的美名，而且会有堆积如山的丰厚财货。这其中没有别的什么缘故，一切都在于节约用度、使百姓富裕。如果不懂得节约用度、使百姓富裕，百姓就会贫穷，百姓贫穷，田地就会贫瘠荒芜，所出产的粮食还达不到正常产量的一半。这种情况下，即使国君喜欢侵占夺取百姓的财货，也只能得到很少的东西。如果再加上不按照礼制的原则节约使用，一定会落得个贪图利益、大肆搜刮的恶名，而且还会在实际上空虚穷困。这其中也没有别的缘故，一切都在于不懂得节约用度、使百姓富裕。……

考察一个国家的强弱或贫富，是有一些征兆的：……国君好大喜功，国家就会贫困；国君贪图财利，国家就会贫困；士大夫太多，国家就会贫困；工商业者多，国家就会贫困；消费财物没有数量的限制，国家就会贫困。百姓贫困，国君就会贫困；百姓富足，国君就会富足。

所以，田地、农村是财富的根本；粮仓、府库是聚财的末节；百姓不违农时、再加上风调雨顺，农业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这是产生财富的源泉；按照等级收取赋税，储藏到仓库里，这是财富的流脉。所以，英明的国君一定会谨慎调养，使农事和顺，节制财货的流脉，开拓财货的源泉，并且要时时慎重考虑这件事。以宽广的胸怀使天下百姓都有节余，国君就不用担心财货不足。如果这样，就会国君和百姓都富足，私人和国库的财货都多得无处储藏，这是最懂得治国大计的表现。所以，大禹遇上了十年的水涝，商汤遭遇了七年的干旱，可是天下百姓没有人饿得面有菜色，十年以后，粮食又获得了丰收，原来储藏的粮食还有剩余，这里面没有其他的原因，只是因为大禹、商汤懂得本末源流的道理。所以说，农田荒芜了，国库依然充实，百姓的粮窖空虚了，国库仍然是满的，这就叫做国家颓败。砍掉了它的根本，用尽了它的源泉，又把百姓的财货聚集到国库中，可是，国君和国相却不懂得这样做的坏处，那么这个国家颠覆灭亡的日子很快就会到了。如果以全国的财力来供养还不能满足他一个人，这就叫做极端贪婪，是愚蠢到了极点的国君。像这样的国君，本想靠加强剥削谋求富足，反而将自己的国家葬送，本想靠贪婪的搜刮谋求私利，反而危害了自身。古代国家成千上万，现在只剩下十几个了。这没有别的缘故，它们亡国的原因都是一样的。当今的国君们，也应该从中觉悟了。（如果能够觉悟），方圆只有百里的小国家，也完全可以独自立国。

【评析】

在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中,经济作为文武相辅相成两大方面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受到了政治家、思想家的高度关注。荀子的经济思想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重要源头,这些思想经过后世的阐发、提炼和深化,逐渐发展成为指导中国封建经济的基本理论。具体分析,荀子的思想包含了这样几个重要原则。

一、裕民以政。荀子认为,对于国家的富足来讲,发展生产是第一位的,只要生产得以发展,就会生产出足够的财物,用不着担心财用不足的问题。这一观点充分肯定了人类生产劳动的创造性,以及以人力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信心。而要“裕民”,必须依靠良好的政治。荀子曾对“裕民”之“政”作过这样的解释,他说:“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为以政裕民。”(《富国》)也就是说,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减少农民的赋税和劳役负担。

荀子的裕民思想不仅是其经济思想的基础,同时也是对墨家学派担心社会财富不足,从而粗衣恶食以倡“节用”思想的辩驳。在他看来,财富不足的问题能够而且只能通过发展生产来解决,墨子所倡导的“节用”只会使社会更加贫困。

二、节用以礼。这实际上是要解决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生产的发展固然可以在总体上增殖社会财富,但是,如何使这些财富在全社会范围内达到合理的分配,也是一个关系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孔子之所以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正是从这一角度立论的。荀子认为,这一问题可以通过“礼”来解决。“礼”就是按照不同的身分地位确立社会等级,即“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如果人们都能按照“礼”的要求占有和消费财富,而不私自僭越礼制,财富的分配就会井然有序。荀子“节用以礼”的思想是在承认阶级差别、阶级压迫前提下的社会分配理论,带有明显的局限性,但是,如果从广义上理解,按照一定的规则合理分配财富无疑是保障社会稳定的通则。

三、开源节流。所谓“源”就是产生财富的根本,指生产资料以及劳动者的生产活动。所谓“流”指的是对社会财富的储藏和运用。荀子“开源节流”的思想不仅从另外一个角度概括了“节用裕民”思想,而且重点突出了国家对社会财富的宏观调控问题。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农业生产的丰歉是关系国



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因此,统治者一定要“善臧其余”,合理运用国家储备以调节丰歉,从而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

四、藏富于民。荀子主张让百姓富起来,因为百姓富足是统治者能够剥削到更多财富的基础。所谓“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这样就不是把统治者与劳动人民的关系相对立,而是将二者的利益统一到了发展生产、开拓财源之中。这一思想后来被发展为“藏富于民”,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理论。

五、取民有度。与前几点相比,这一点更明确地论述了统治原则的问题。统治者能够从劳动人民身上索取的是“流”、“末”。如果统治者毫无节制地剥削百姓,只把眼光盯在自己国库是否丰盈上,而忽略了对财富“源”、“本”的培植,那么这样的统治者只能落得亡国丧身的下场。

以上几个原则角度各不相同,但它们之间又密切关联,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的根本就在于发展生产、节制剥削。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也正是围绕着这样两个主题展开的,对历代王朝治理国家、安定社会产生了重大作用。其核心思想今天看来,仍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吕氏春秋》论简选精良

题引:《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战国杂家著作，为秦国丞相吕不韦（？～前235年）召集门客所作。书中杂集儒、法、名、墨、农、阴阳诸家思想，体现了战国末期百家交融的趋势。本篇选自《吕氏春秋·简选》，重点论述了“简选精良”和“兵械铍利”等军事问题。

【原文】

世有言曰：“驱市人^①而战之，可以胜人之厚禄教卒^②；老弱罢^③民，可以胜人之精士练材^④；离散系累^⑤，可以胜人之行陈^⑥整齐；锄耰^⑦白挺^⑧，可以胜人之长铍^⑨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论。今有利剑于此，以刺则不中，以击则不及，与恶剑^⑩无择^⑪，为是，斗因用恶剑则不可。简选^⑫精良，兵械铍^⑬利，发之则不时^⑭，纵之则不当^⑮，与恶卒^⑯无择，为是，战因用恶卒则不可。王子

- ① 市人：城市居民，没有经过作战训练的普通民众。
- ② 厚禄教卒：经过专门训练的正规军。厚禄，指待遇优厚。
- ③ 罢：同“疲”。
- ④ 练材：与“教卒”同义，指经过训练的战士。
- ⑤ 系累：捆绑。这里指俘虏或罪人。累，原误作“系”，依诸家说改。
- ⑥ 行(hang, 音杭)陈：行伍，队列。陈，同“阵”。
- ⑦ 耰(you, 音优)：同“耒”，平土的农具。
- ⑧ 白挺(ting, 音挺)：未经加工的普通木棍。
- ⑨ 铍(tiao, 音条)，矛。
- ⑩ 恶剑，指质料粗劣、制作不精的剑。择：区别。
- ⑪ 无择：没有区别。
- ⑫ 简选：选拔。简，选择，分别。
- ⑬ 铍(xian, 音先)：锋利。
- ⑭ 不时：不适能按预定时间到达。
- ⑮ 不当：不当其任，不能完成战斗任务。
- ⑯ 恶卒：未经训练、无作战能力的士兵。



庆忌^①、陈年^②，犹欲剑之利也。简选精良、兵械锐利，令能将^③将^④之，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汤、武、齐桓、晋文、吴阖庐是矣。……

故凡兵势险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选练角材^⑤，欲其精也；统率士民，欲其教^⑥也。此四者，义兵之助也。时变^⑦之应也，不可为而不足专恃。此胜之一策也。

【译文】

世人有这样的言论：“驱赶普通百姓去作战，也可以战胜待遇优厚、训练有素的士兵；使用老弱疲惫之人，也可以战胜精锐的武士；像流民、罪犯一类的乌合之众，也可以战胜纪律严明、整齐有序的敌人；用锄头棍棒之类的工具，也可以战胜敌人的长剑利器。”这完全是不懂军事的人的议论。如果这里有一把利剑，用它来刺杀，没有刺中；用它出击，又够不到目标，它看起来跟一把钝剑没什么区别。但是，因此便认为战斗可以使用钝剑，那是不对的。（再如），经过选拔的精锐士兵，又装备了锐利的武器，但是，行军不能按时到达，冲锋又不能获胜，看起来跟那些素质低下的士兵没什么区别。但是，因此便认为战斗可以使用素质低下的士兵，那也是不对的。像王子庆忌和陈年那样有名的勇士，尚且希望自己的剑极其锐利，（何况一般人呢！）选拔精壮的士兵，配备锋利的武器，再任用贤能的将领来统率军队，古代有很多人就是凭借这些成就了王业、霸业的，商汤、周武王、齐桓公、晋文公以及吴王阖庐就是显著的例子。……

所以，用兵依托山水险阻，是希望攻守方便；使用武器装备，是希望它坚利；选择训练大小将佐，是希望它们精锐；统率士兵，是希望他们受到严格训练。这四个方面，是义兵取胜的重要条件。至于时机的变化，不是人能决定的，不能完全依靠它。（上述险阻之便、兵械之利、将佐之精、士卒之教四个条

① 庆忌：春秋时吴王僚之子，以勇捷著名。

② 陈年：齐国有名的勇士。

③ 能将：有才能的将领。

④ 将：率领。

⑤ 角材：这里指各级将校，与下文“士民”（战士）相对应。

⑥ 教：教习，操练。

⑦ 时变：时机的变化。在古人观念中，“时”往往包含着四时、晴雨、阴阳以及某些天文现象（如星斗的移动）所显示的吉凶征兆，等等。



件,)才是致胜的策略。

【评析】

军队是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没有强大的军队就不可能有稳固的国防,也不可能在内忧外患中立足、发展,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因此,如何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不但是军事问题的核心,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我国古代关于建军治军的思想十分丰富,《吕氏春秋·简选》就是其中富有代表性的论述。这篇文章讲到了提高军队质量、增强战斗力的几个重要方面。

一是要“简选精良”,即注重选拔素质优良的兵员。战争是军队与军队的暴力对抗,说到底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因此,士兵的良好素质是决定军队战斗力的要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尤其在冷兵器时代,战斗一般表现为士兵之间直接的身体冲突,士兵是否拥有健壮的体魄、勇敢的精神就显得尤为重要。良好的士兵素质还只是精锐之师的基础,要想打造一支精兵,还需要严格的训练以及严明的军纪。这些也是我国传统政治及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如孔子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吴子强调“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吴子·治兵》)。《吕氏春秋》也说,“统率士民,欲其教也”,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二是“兵械铄利”,即注重武器装备建设。武器装备是士兵四肢的延伸,也是其力量的倍增器。有武器跟没有武器,有精良的武器跟只有劣质的武器,在作战效能上是有很差别的。在这一问题上,《管子·参患》的论述与《吕氏春秋》一致,它说:“兵不完利,与无操者同实;甲不坚密,与僇^①者同实;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实;射而不能中,与无矢者同实;中而不能入,与无镞者同实;将徒人与僇者,短兵待远矢,与坐而待死者同实。”当然,在战争实践中,完全的惟武器论带有严重的片面性,但同样,那种认为主观可以战胜客观,意志可以取代实力的思想也是很危险的。《吕氏春秋》的这段文字,实际上是批评了先秦儒家思想中只注重民心向背而轻视武器装备的片面倾向。

三是“良将将之”。将领是军队的首脑和灵魂,将领的能力直接关系到战略战术的正确与否,也直接关系到无数士兵的生死存亡。因此,孙子说,“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孙子兵法·作战》),任何一支武装力量的建设都必须把选任将领作为重中之重。

① 僇(jian,音剑):无甲而只穿单衣。



概括而言,《吕氏春秋》这段话涉及到了军队建设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人,包括将领和士兵,二是武器装备。这两个因素的结合构成了军队作为物质力量的主体。只有在这两个方面取得了优势,才能在军事斗争中有胜利的把握。正如《吕氏春秋·简选》所指出,“义兵”也必须具备物质方面的条件,才能够取胜。这对儒家思想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和修正。

第三章 秦 汉

能柔能刚，其国弥光；
能弱能强，其国弥彰。
纯柔纯弱，其国必削；
纯刚纯强，其国必亡。
——汉·佚名《黄石公三略》



概 述

秦汉时期,自公元前 221 年至公元 220 年,历时 441 年。包括秦(公元前 221 ~ 前 207 年)、西汉(公元前 206 ~ 公元 8 年)、新莽(公元 9 ~ 23 年)、东汉(公元 25 ~ 220 年)等四个封建统一王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上升发展阶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空前大统一的时代。在这一时代里,自始至终存在着三大基本矛盾,即国内阶级矛盾、国内民族矛盾、国内统治阶级上层集团内部矛盾。三大矛盾各自时隐时现,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从而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和发展。最高统治者对三大矛盾的不同认识和决策,决定着天下的治乱分合、国家的安危强弱和王朝的兴替存亡。此时期各个统一王朝治国安邦的实践,使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从总体上有了极大的丰富、充实和发展,表现出内和外、文和武、国家安全和国家治理相综合的强烈特点。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开创了大统一的历史新纪元。为了维护大统一,秦始皇建立了一系列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国防制度,皆为后世所继承。其中最成功的经验,就是废除了先秦朝贡体系下的分封制,创立了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实现了国家政体史上一次革命性的飞跃。但是,其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也有极为深刻的教训,即以“暴”治国,大施酷刑。只讲法治,不讲德治,只讲武功,不讲文治,只重视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民族矛盾,不重视阶级矛盾,直至焚书坑儒,否定历史文化,完全忘记了载舟覆舟的古训。以致空前强大的秦王朝,仅仅存在 15 个年头,即被空前的农民大起义推翻。

西汉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继秦之后第一个长期稳定、统一、富强的封建王朝。它的治国安邦思想与秦代根本不同,在汉承秦制的基础上,既矫了枉,又不过正,长期坚持“文武并用,长久之术”的方针。初期,继秦末天下大乱之余,曾面临三大危机:一是经济残破,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容易激化,威胁到国家政权的稳定;二是先有异姓诸侯王的接连叛乱,后有同姓诸侯王的尾大不掉,并终于发展为大规模联合叛乱,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威胁到国家的统一;三是北有强大的匈奴为患,常常大举进犯,时而威逼汉都长安,



威胁到国家的生存。由于长期坚持“文武并用”的方针,不仅逐一地克服了三大危机,而且逐步地创造出一个繁荣富强的鼎盛时代。对于经济危机,西汉政府采取的根本政策就是大施惠民的德政,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不仅把农业税降到三十税一,而且曾连续13年免除农业税,并用“重农”、“贵粟”、“赐爵”等各种手段让富人之钱流入国库之中,以利取有余而补不足。对于诸侯割据的危机,则坚决采取强硬手段,武力平叛,武力削藩,决不手软,一一剥夺他们的政权、兵权和财权,让他们由大变小,失去谋逆造反的条件。对于匈奴的威胁,则坚持战、和两手,力不足时屈辱和亲,力量强大后坚决反击,胜利之后又诚心诚意地和亲结好,实现“胡汉一家”,天下太平。在克服三大危机的同时,大兴文治,全面恢复历史文化,以儒家学说为主导,融汇百家之长,重新确立了中华民族固有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在政治、经济、军事、国防、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进一步巩固了大一统的国家。但是,自西汉后期汉元帝开始,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走向偏差,不再“文武并用”、“霸王道杂之”,而是“柔仁好儒”、“纯任德教”。从此朝纲不振,政治腐败,法制不行,皇权累世落入外戚之家,直至王莽篡位而西汉灭亡。

新莽统治的15年实际上是历史过渡时期。西汉末年业已政治腐败,土地高度集中,民不聊生,社会危机严重。王莽篡位后不是从实际出发实行政治、经济改革,而是借用《周礼》,倒行逆施,托古改制,从而搞乱了天下,激化了阶级矛盾,被农民大起义推翻。为了给个人立威,王莽还无端地对周边各少数民族用兵,破坏了60多年来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所有这些祸国殃民的教训。

东汉王朝是继西汉之后又一个长期稳定统一的封建王朝。光武帝刘秀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开国皇帝,他针对新莽末年天下大乱、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已全面激化的现实,早在称帝之前就已下定决心,以德立国,柔道安邦。称帝之后,当统一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时,他就开始大举销兵减政,全面恢复西汉的惠民政策,尽量与民休息。统一战争一结束,立即退功臣而任文吏,让功臣们去养尊处优“奉朝请”,收回他们手中的全部军政大权,以免君臣之间发生新的矛盾。同时用严明的法制要求文吏,以利搞好文治。对周边各少数民族,则一律友好善待:西域主动归附,要求汉军给予保护,则“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不肯出兵;匈奴常常犯边,则“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继续友好往来;鲜卑、乌桓等时而犯境,则以政治、经济手段抚慰之。所有这些都适应了当时天下大乱之后、社会需要休养生息



的客观实际,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暂时缓和了各种矛盾,巩固了政权,逐步走向了天下大治,再也没有经历西汉初期那样内外交困的局面。但是,这一柔道安邦的思想,显然与西汉“文武并用”的思想不同,偏于崇文抑武,缺乏进取精神,严重制约了东汉的进一步发展和强大。销兵减政的直接后果是削弱了军队和国防,以致东汉一代边患不止,特别是中期以后的三次大规模羌变,给了东汉王朝以致命的打击。退功臣而任文吏的直接后果是丧失了强有力的精英集团,以致内无强臣外无良将,削弱了国家的政治威望,给东汉中期以后外戚、宦官交替专政、内斗不已留下了方便之门。东汉前期的明、章、和三帝,处于经济繁荣时期,未能抓住机遇、与时俱进、改革柔道安邦的思想,决定了中期以后江河日下的历史命运,直至黄巾大起义爆发后,在军阀混战中沦亡。

秦汉 400 余年的历史,治国安邦的思想经历一个由以“暴”治国到“文武并用”再到柔道安邦的过程。这一过程表明:“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①

^① 汉·佚名:《黄石公三略·上略》。



秦始皇、李斯论分封制

题引：秦始皇(前259~前210年)，即嬴政，秦庄襄王之子，13岁继承王位，即位后9年亲政，26年平灭关东韩、赵、燕、魏、楚、齐六国，实现统一，遂称始皇帝。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推行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政策，其中最重大的举措就是废除分封制，确立郡县制。李斯(?~前208年)，秦代著名政治家，楚上蔡(今属河南)人，初为郡小吏，后入秦，历任相府舍人、廷尉、丞相之职，是秦始皇推行统一大业的核心谋主，废分封、立郡县的决策即由李斯所提出。本篇选自《史记·秦始皇本纪》。

【原文】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①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②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讎^③，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译文】

丞相王绾等人进言说：“天下诸侯刚刚被消灭，原来的燕国、齐国、楚国之地都很偏远，不给这些地方设置诸侯王，就无法镇抚那里的人们。敬请册封各位皇子为王，希望皇上恩准。”秦始皇把这一建议交给群臣讨论，群臣都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廷尉李斯则提出不同意见说：“周文王、周武王

① 荆：古代楚国的别称。

② 填：此处通“镇”，意谓安定。

③ 仇讎：亦作“仇讐”，即仇人，冤家对头。讎，此处为同等，即如同仇敌一样。



分封自己的子弟和同姓宗亲非常多,但他们的后代血缘关系逐渐疏远,互相攻击,如同仇敌一样,同姓诸侯之间彼此征战,连周天子也无法制止。如今天下靠皇帝的神灵之威获得统一,都已划分为郡县,对于皇子和功臣,用国家财政予以重赏供养,就很容易控制他们。这样做不使天下之人产生邪异不轨之心,实则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好办法。重新设置诸侯王不利于国家安宁。”始皇说:“长期以来天下人都苦于战争的无止无休,原因就在于有诸侯王的存在。现在,靠祖宗神灵的保佑消灭了各地诸侯,天下刚刚安定,如果再重新设立诸侯王国,这等于又将挑起战争,而想求得天下太平,岂不更为困难!还是廷尉李斯的意见正确。”

【评析】

秦始皇关于废除分封制、确立郡县制的决策,实乃中国国家政体史上一次深刻的革命。分封制形成于西周初期的大封同姓子弟以及开国功臣和方国部落,其目的是层层设置诸侯以屏卫王室,其本质则是构建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联盟朝贡体系。周天子虽然是天下共主,但仅能治理王畿之内方圆千里之地,号令不达于千里之外;千里之外都是公、侯、伯、子、男等诸侯的领地,数量多至 1773 国,号称 1800 诸侯。诸侯虽然名义上臣服、朝贡(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于天子,但实际上拥有世袭不变的独立治国权(政权、财权、兵权);至于是否听命于天子,则依形势的变化、有关各方实力的消长为转移。这一体系断断续续维持到西周末年而告崩溃,结果导致春秋战国长达 500 多年的诸侯兼并与混战。正是鉴于这一教训,秦始皇才下定决心采纳李斯的建议,宁愿以自己的子弟为匹夫(无官无爵),断然废除了分封制,确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郡县制与分封制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全国的政权、财权和兵权皆归于中央(由皇帝总统),全国的政策法令皆由中央制定(由皇帝颁发),全国县丞、县尉以上官员皆为朝廷命官(由皇帝任免),朝廷以因名设官、循名责实之道调动地方政府和官员尽职尽责的积极性,从国家政体上消除了诸侯割据之患,从而开创了中国历史空前大统一的新纪元。虽然秦王朝因施行暴政二世而亡,但它所开创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却被秦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其深远影响垂及 2000 余年。正如清末改革家谭嗣同所言:“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①秦以后 2000 多年中的封建王朝虽然保留了王、公、

^① 谭嗣同:《仁学》卷上。



侯、伯、子、男的爵号,但基本上剥夺了其治国权,所行仍是郡县制而非分封制。2000 多年中也有过恢复分封制的尝试(分别在汉初、晋初和明初),但基本上都付出了历史的代价(分别为七国之乱、八王混战和靖难之役)。2000 年来的历史反复表明,唯有中央集权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才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安全、发展和富强。这一思想在今天也有其借鉴意义和价值,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上维护祖国的统一,永远是中华民族的神圣使命。



贾谊《治安策》(节选)

题引:贾谊(前201~前168年),西汉政论家,洛阳(今属河南)人,历任博士、太中大夫、长沙王太傅、梁王太傅之职,于汉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上《治安策》,详陈当时国家安危之势有“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等九大问题。这里节选其中第一个问题——同姓诸侯王对中央政权的威胁与对策的部分内容,全文见《汉书·贾谊传》。

【原文】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①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②,亲兄之子西乡而击^③,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④! ……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⑤并进而归命天子,虽在细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

天下之势方病大瘡^⑥。一胫之大几如要^⑦,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⑧,一二指搐^⑨,身虑无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

① 爽:此处意谓“受伤害”。

② 亲弟谋为东帝:指淮南王刘长于文帝六年初“称制”,联结闽越、匈奴欲谋反;事泄被流放于蜀,途中绝食而死。

③ 亲兄之子西乡而击:指济北王刘兴居,于文帝三年夏发兵反汉,兵败被俘,自杀而死。乡,此处通“向”。

④ 虐:通“乎”。

⑤ 辐凑:即辐辏,车辐凑集于毂上,比喻人或物集聚一处。

⑥ 瘡:脚肿病。此处喻诸侯尾大不掉。

⑦ 要:此处通“腰”。

⑧ 信:此处读作“伸”。

⑨ 搐:牵动,动而痛。



【译文】

凡是设立诸侯国太强大而坚固,就必然造成与朝廷之间相互猜疑的忧患之势,以致下面多次遭到祸殃,上面多次受到伤害,用这种办法来安定上面保全下面是非常错误的。近年来有陛下的亲弟弟淮南王刘长谋反而称东帝,有陛下的亲侄子济北王刘兴居率兵西攻而作乱,最近又有人告发陛下的从兄吴王刘濞也出现了不轨行迹。现在陛下年富力强,力行仁义而无过错,恩德普加于四海,尚且有如此叛乱的诸侯,更何况那些莫大的诸侯其势力几乎十倍于此的人呢!……

要想天下之势长治久安,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众多的诸侯而每一个诸侯都很弱小。诸侯的实力少则容易使其遵守礼义,国度小则不会产生邪恶的念头。从而让天下之势如同人的身体支配胳膊,胳膊支配手指,没有不听从指挥的,使诸侯的君长不敢心存异志,只能像车轮中的车辐凑集于毂上那样齐心并进而听命于天子,即使处于下层的小民,也知道诸侯王是安分的,所以天下人都会知道陛下的英明。……

现在国家面对诸侯王的尾大不掉之势,就好像人的身体患上了脚肿病。一根小腿的胫骨几乎和腰一样粗大,一只手指头几乎和大腿的股骨一样粗大,平时不能屈伸,牵动一两手指头,就会把全身疼得无依无托。如果失去今天的机会不治,日久必然成为难愈的痼疾,将来即使有扁鹊式的神医,也无能为力了。

【评析】

西汉王朝诞生于秦末农民战争的烽火之中,汉高祖刘邦误以为秦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废除分封制,没有强大的同姓诸侯捍卫中央政权。因此,他“惩戒亡秦孤立之败”的教训,在战胜项羽之后,于平灭各异姓诸侯的同时开始分封刘氏诸侯,陆续“尊王子弟,大启九国”^①。每一个诸侯王国的规模都很大,有的“夸州兼郡,连城数十”^②,与战国七雄中的齐、魏、燕、赵、韩相近。以致九个诸侯国的封地占去当时全部西汉版图的2/3。从此造成了本小末大、干弱枝强的局面,埋下了诸侯王尾大不掉的祸根,忧患长达百年之久。

① 《汉书·诸侯王表》。

② 《汉书·诸侯王表》。



汉文帝(前179~前157年在位)时期,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是社会经济趋于全面恢复时期,同时也正是各诸侯王国不断发展壮大、潜伏的割据叛乱危机日益加剧之时。贾谊是西汉政府中最先洞悉这一危机的政论家,在《治安策》中形象而深刻地指出,小腿和腰一样粗,手指头和大腿一样大,这样强大的诸侯必然是国家的威胁;天子如同躺在积薪之上,而又把火种放在积薪之下,一旦燃起来,后果不堪设想。于是进而提出化解危机的对策,即“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这个对策的核心思想是“安上而全下”,体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其可贵之处有三:一是不强行削藩,不激化矛盾,不挑起战端,有利于国家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二是把每一个诸侯大国划分成若干小国之后,全部分封给原诸侯王的子子孙孙,“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无)所利焉”,符合各诸侯王的利益,容易被其接受;三是众多的诸侯王国建立后,国小力微,自然会效忠于天子,“下无倍(背)畔(叛)之心,上无诛伐之志”,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长治久安。当然,这个建策不能与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同日而语,秦始皇是在没有分封子弟的情况下预防危机的发生,所需要的是决心和远见;贾谊是在汉初分封子弟后矛盾严重如何化解危机的问题,所需要的是智慧、谋略与手段。同样,也不能与西周的分封制同日而语,西周所行是古代联盟朝贡体系下的分封,谈不上国家的统一;西汉所行是中央帝制下的分封,贾谊建策的目的正是改造分封制,逐步走向中央集权、国家统一的郡县制。

《治安策》上书于汉高祖刘邦分封子弟之后20年,也正是汉景帝时爆发吴楚七国之乱的前20年。贾谊在此时提出改造分封制的建策恰当其时。可惜汉文帝只采纳了贾谊的部分建议,于文帝前元十六年(前164年)将齐国一分为七,将淮南国一分为三;但没有采纳他的全部建议,对吴、楚等国未加触动。后来又纳贾谊之议充实了梁国,以备预吴楚。正由于汉文帝未全面采纳贾谊之策,导致后来终于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正由于汉文帝采纳了贾谊的部分建议,才为后来汉景帝平灭吴楚七国之乱奠定了基础。历史完全验证了贾谊的先见之明及其建策的正确。



晁错论削藩

题引：晁错（前 200 ~ 前 154 年），西汉著名政治家，颍川（今河南禹州）人。早年治法家刑名之学，后奉命受《尚书》。文帝时任太子家令，号称“智囊”，屡次上书言军国大计，建议重农贵粟、富国强兵、实边固防，皆为文帝所纳。景帝时任御史大夫，力主削藩，加强中央集权。吴楚七国之乱爆发，以诛晁错为名。景帝误听谗言，将其冤杀。本篇选自《汉书·荆燕吴传》。

【原文】

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①王齐七十二城，庶弟元王^②王楚四十城，兄子^③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隙^④，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不忍，因赐几杖^⑤，德至厚也。不改过自新，乃益骄恣，公即山铸钱^⑥，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① 孽子悼惠王：即汉高祖刘邦的长子刘肥，因非正妻所生，而是刘邦早年外遇的私生子，故称孽子。刘肥于汉高帝六年（前 201 年）受封为齐王，有 6 郡 72 城，死后谥号悼惠。文帝时将其国一分为七，封给刘肥诸子。其中有四国（济南、胶东、胶西、菑川）参加了景帝时的吴楚七国之乱。

② 庶弟元王：即汉高祖刘邦之弟刘交，因是父妾所生，故称庶弟。刘交于汉高帝六年受封为楚王，有 3 郡 40 余城，死后谥号元。传位至其孙楚王刘戊时，参加了吴楚七国之乱。

③ 兄子：即汉高祖刘邦之侄刘濞，于汉高帝十二年（前 195 年）受封为吴王，有 3 郡 53 城，经数十年经营谋划，至景帝时成为吴楚七国之乱的元凶。

④ 太子之隙：指汉文帝时吴王刘濞的王太子入京来朝，与皇太子（即后来的汉景帝）下棋，发生争执时无礼不恭，被皇太子当场打死。刘濞由此与文、景二帝结下仇恨。

⑤ 赐几杖：古时表示敬老的礼节，此处表示免除吴王刘濞定期朝见皇帝的特殊优待。几，古人席地而坐时凭靠身体的小桌子。杖，即拐杖。

⑥ 公即山铸钱：公开采矿铸造钱币。即，就，靠近。



【译文】

从前高祖皇帝刚刚平定天下,自己的同胞弟兄很少,亲生之子都很年幼,所以在分封同姓诸王时,给孽子悼惠王刘肥封了齐地七十二城,给庶弟元王刘交封了楚地四十城,给侄子吴王刘濞封了吴地五十余城。封了这三个不是嫡亲骨肉者为王,就分掉了全天下的一半。现在吴王因为先前有儿子被杀的怨恨,就假称有病,长期不来朝见天子,按照古代的法律本应问罪处死。但文帝不忍心治罪,并因其称病而赐予几杖免其入朝,恩德极其深厚。然而吴王不思悔过自新,反而更加骄横放肆,公然近山采铜铸钱,煮海水为盐渔利,招诱天下亡命之徒,蓄谋反叛作乱。当前的形势是,削减吴王的封地,他会造反;不削减其封地,他也会造反。现在削,叛乱发生得快,危害小;现在不削,叛乱发生得晚,危害更大。

【评析】

这篇对策提出于汉景帝即位之初(前156年),正当西汉政府与同姓诸侯王矛盾到剑拔弩张之时,其核心思想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削藩。面对诸侯割据势力的日益膨胀,晁错曾多次上书文帝建议削藩,未被采纳,直到景帝即位之后才获准施行其议。两年之间,以不同罪名削了楚王刘戊的东海郡、赵王刘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刘卬的6县。至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初,汉廷方议削吴王刘濞的会稽、豫章二郡,刘濞于同年正月发起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的七国之乱。参加叛乱的七国分别为吴、楚、赵、胶西、胶东、菑川和济南,还有闽越与东越发兵相助,并联结南越和匈奴共同灭汉。从而使西汉王朝经历了一场自开国以来最严重的生存危机。汉景帝一时惊慌失措,竟然误信谗言,杀了晁错以谢吴楚,并答应退还各诸侯王的削地。但刘濞不仅不肯罢兵,而且自称“东帝”,决心要夺取中央政权。景帝无奈,只得诉诸武力,按文帝临终时的遗嘱,任命周亚夫为将,3个月就平定了七国之乱,南越与匈奴尚未及出兵,战事即告结束。

历史完全验证了晁错的预言:“削之亦反,不削亦反。”七国之乱之所以爆发,根本不是什么清君侧、诛晁错、讨削地,而是割据势力长期坐大、久蓄逆谋的必然。正如吴王刘濞起兵时告各诸侯王书中所言:“寡人节衣食用,积金



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皆为此,愿诸王勉之。”^①一语道破了他的政治野心。历史还验证了晁错的预言:“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七国之乱虽然来势猛烈,但实际上不堪一击。其原因除了周亚夫的军事天才之外,最根本之点就在于叛乱有违于历史潮流。当时正处于文景之治的盛世,人民期望和平与统一,反对分裂与战乱,叛乱者一旦在军事上失败,政治上便顷刻瓦解,毫无社会基础可言。

这篇对策与上篇贾谊的《治安策》可谓殊途同归,异曲同工。《治安策》提出于文景之治的前期,有可能通过政治手段化解潜伏的危机,所以力主“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本篇对策提出于文景之治的后期,政治手段已不能奏效,军事手段则势不可免,所以力主削藩。而历史的演变恰恰是通过本篇的对策平灭了吴楚七国之乱,给了诸侯王割据势力以决定性的打击。战后,参加叛乱的诸侯王一一伏诛,其封地收归为郡县。未参加叛乱的诸侯王也被削去了支郡(与匈奴、南越接境的边郡),贬损了官制:改诸侯王太傅为傅,丞相为相;省去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等官,减少了大夫、谒者的员额及其长、丞;并夺去了诸侯王的治国权,行政统于由中央任命的相,军事统于由中央任命的中尉。从而加强、巩固了中央集权,为西汉王朝走向中期鼎盛阶段铺平了道路。

^① 《汉书·荆燕吴传》。



主父偃请行推恩法

题引：主父偃(? ~前126年)，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少习纵横、百家之言，有辩才，游学诸侯间40余年。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上书诣阙，拜郎中，迁谒者、中郎、中大夫。他针对当时犹有诸侯王封地过大之弊，于元朔二年(前127年)提出“诸侯得推恩分子弟”的建议，为武帝所采纳。本篇选自《汉书·主父偃传》。

【原文】

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①其强而合从^②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朝错^③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④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必稍自销弱矣。

【译文】

古代诸侯的封地方圆不过百里，在干强枝弱的形势下很容易控制。现在诸侯王有的连城数十，跨地千里，天子宽容时他们就骄奢无度而轻易干淫乱不法之事，天子严厉时他们就倚仗强大的实力而联合起来对抗朝廷。现在如果依照古代的法制割削其封地，他们的叛逆之念就会萌发，前些年晁错力主削藩时的七国之乱就是如此。现在每个诸侯王的子弟都多至不止十人，而其中只有嫡长子一人能够继承封地，其余的人虽然都是骨肉之亲，但皆无尺地寸土之封，这就很难使上仁下孝之道得以发扬光大。希望陛下准令诸侯王施

① 阻：此处释为倚仗。

② 从：此处读作“纵”。

③ 朝错：即晁错。

④ 适：此处读作“嫡”。



行恩惠分封其子弟,用诸侯王自己的土地给其子弟封以侯爵。这样做诸侯王的子弟们人人都会高高兴兴地如愿以偿,皇上施行的是恩德,而实际上是瓜分了诸侯王国,就必然使其逐渐地自行削弱了。

【评析】

自从汉景帝平灭吴楚七国之乱后,虽然诸侯王割据势力受到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丧失了治国权,贬损了官制,削掉了支郡,但仍然存在封地过大的隐患。封地大则经济实力强,以经济实力为基础,加上诸侯王这一政治上仅次于皇帝的崇高地位,上可以勾结朝臣,下可以收买地方官,还可以广招宾客,培植私人势力,所以图谋不轨之事时隐时现。如梁王刘武,是皇太后的爱子,其国“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今河南杞县西南),四十余城,多大县”,平时作威作福,“儼(拟)于天子”,出行以“千乘万骑”相随;“广招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多作兵弩弓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①。曾长期谋求继景帝之后称帝,先后派遣刺客刺杀朝中异己大臣十余人,直至病死于景帝之前而后已。又如淮南王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嫡孙,备受汉武帝的“尊重”。他表面上假行仁义,沽名钓誉,广招文人学士,著书立说(《淮南子》一书即由其招宾客所著),实际上早就与太尉武安侯田蚡相勾结,自建元六年(前135年)起“愈益治攻战具,积金钱赂遗郡国”,多次策划起兵夺取帝位,直至谋泄自杀^②。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主父偃于元朔二年提出“诸侯得推恩分子弟”的对策,史称“推恩法”。所谓“推恩”,亦称“推私恩”,就是指诸侯王可以把自己的封地分给自己的子弟,每人一份,基本上是一县一城之地,然后报请皇帝赐予侯爵的封号,史称“王子侯”,以与异姓功臣侯相区别。这样做的实质就是让诸侯王的众多子弟共同瓜分诸侯王国,使其由大变小,由强变弱,“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③,也就是不削藩的削藩。这个对策与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一脉相承,同出一辙,但比贾谊又前进了一步。贾谊的建议是给诸侯王子弟封以王爵,而主父偃的建议是给诸侯王子弟封以侯爵,侯爵比王爵低得多,更容易为朝廷所掌控。

① 《汉书·梁王刘武传》。

② 《汉书·淮南王刘安传》。

③ 《汉书·诸侯王表》。



这一建议当即被汉武帝所采纳,于元朔二年正月下达了“推恩令”：“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①遂从各诸侯王国中分封出 178 个王子侯。紧接着,武帝便开始采取各种手段剥夺这些王子侯(以及异姓功臣侯)的土地,有的因无嫡嗣继承而国除,有的因杀人犯罪而国除,有的因腐败淫乱而国除,有的因各种过失而国除。其中仅“坐酎金”(给皇帝助祭祖先的献金成色不足或斤两短缺)一项,就夺去了 63 个王子侯(还有大量异姓功臣侯)的爵位,将大量土地收归郡县。几乎与此同时,武帝又专门颁发了“左官之律”和“附益之法”,前者把仕于诸侯王的官吏视为被贬的“左官”,即左迁之官,政治上低人一等;后者则严禁各级官吏与诸侯王勾结往来,有阿谀谄媚诸侯王者必予严惩,使诸侯王处于孤弱之境。至此,西汉王朝才全面建立起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虽然形式上郡国并存),自汉初大封同姓以来,长达百年的诸侯王尾大不掉之患被彻底根除。

^① 《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武帝元朔二年。



晁错《言兵事疏》

题引：本篇上书于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前169年），是西汉王朝开国30多年来首篇关于抗击匈奴的军事对策。文中全面论述了防御、抗击匈奴的战略、策略与方针，着重阐明了将良、兵精、器利的强军之道。本篇选自《汉书·晁错传》。

【原文】

臣闻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人则小利，大人则大利；高后时再入陇西^①，攻城屠邑，驱略畜产；其后复入陇西，杀吏卒，大寇盗。窃闻战胜之威，民气百倍；败兵之卒，没世不复。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气破伤，亡有胜意。今兹陇西之吏，赖社稷之神灵，奉陛下之明诏，和辑士卒，底厉^②其节，起破伤之民以当乘胜之匈奴，用少击众，杀一王，败其众而大有利。非陇西之民有勇怯，乃将吏之制巧拙异也。故兵法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由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

臣又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③，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沟，渐^④车之水，山林积石，经川^⑤丘阜^⑥，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车骑二不当一。土山丘陵，曼衍^⑦相属，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步兵十不当一。平陵相远，川谷居间，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当一。

① 高后：即吕后，汉高祖刘邦之妻。刘邦死后，惠帝柔弱，吕后实际掌权7年；惠帝死后，她又亲自执政8年。陇西，郡名，治今甘肃临洮，辖境相当于今甘肃洮河中游及渭河上游一带。

② 底厉：同“砥厉”，磨炼、激励。

③ 服习：训练有素。

④ 渐：浸渍，这里指陷污。

⑤ 经川：长流不息的河水。

⑥ 丘阜，即土山。

⑦ 曼衍：连绵不断。



两陈^①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此长戟之地也,剑楯^②三不当一。萑苇竹萧^③,草木蒙茏,支^④叶茂接,此矛铤^⑤之地也,长戟二不当一。曲道相伏,险阨相薄,此剑楯之地也,弓弩三不当一。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⑥,前击后解^⑦,与金鼓之指相失,此不习勒卒^⑧之过也,百不当十。兵不完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⑨同;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亡矢同;中不能入,与亡鏃同;此将不省^⑩兵之祸也,五不当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臣又闻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⑪,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⑫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⑬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⑭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驍发^⑮,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筰^⑯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

① 陈:此处读作“阵”。

② 楯:同“盾”。

③ 萑(huan,音环)苇:两种芦类植物。萧,即艾蒿。

④ 支,同“枝”。

⑤ 铤(chan,音蝉):铁柄短矛。

⑥ 毕:敏捷。

⑦ 解:通“懈”。

⑧ 勒卒:约束士兵。

⑨ 袒裼(tanxi,音坦希):袒胸露臂。

⑩ 省(xing,音醒):察看,检查。

⑪ 仄:狭窄。

⑫ 罢:通“疲”。

⑬ 射疏:在广阔的正面上发箭射击敌人。

⑭ 格:抵挡。

⑮ 材官:经过专门训练的步兵,这里指的是步兵中的弓弩手。驍(zhou,音宙),通“骤”。

⑯ 革筰(sì,音四):用皮革制做的战衣。木荐,木制的盾牌。



接,去就相薄^①,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②之术也。

虽然,兵,凶器;战,危事也。以大为小,以强为弱,在俯仰之间耳。夫以人之死争胜,跌而不振,则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于万全。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③,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④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

传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臣错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财^⑤择。

【译文】

我听说自从我们汉朝开国以来,匈奴曾经多次入犯边境地区,小规模入犯就获得小利,大规模入犯就获得大利。高后执政后,匈奴两次攻入陇西地区,陷城破镇,屠杀百姓,抢掠牲畜和财产。后来又一次攻入陇西地区,杀了许多官兵,大肆抢劫。我听说打了胜仗的威风,军民的斗志可以提高百倍;打了败仗的军队,士气就终身难以复振。自从高后执政以来,陇西地区已经三次困败于匈奴,军民的士气受到挫伤,失掉了胜利的信心。然而最近陇西的将吏,依靠社稷神灵的保佑,奉行陛下英明的诏令,团结士兵,激励其斗志,动员起早已受到挫伤的军民,去抵抗乘胜而来气势汹汹的匈奴,结果却以少击众,斩杀敌人一个首领,打败敌军而取得很大的胜利。这并不是因为陇西的军民有勇敢和胆怯的差别,而是将领的指挥有高明和低劣的不同。所以兵书上说:“有必然取胜的将帅,无必然取胜的军民。”由此看来,卫国安边,杀敌立功,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有优秀的将军,这是不能不认真选择的。

我又听说指挥军队作战,在临阵交锋之际最要紧的事情有三件:一是要选好有利的地形,二是士兵要训练有素,三是武器装备要精良。兵书上说:一

① 薄:逼迫。

② 以一击十:按上下文意,应为“以十击一”。

③ 义渠:先秦西戎族的一支。秦汉时定居在今甘肃一带。谊,通“义”。

④ 衡:权衡,衡量。

⑤ 财:通“裁”。



丈五尺宽的沟坎,陷污车轮的沼泽,乱石堆积的山林,长流不息的河水,高低不平的丘陵,草木丛生之处,这是步兵作战之地,两个车兵或骑兵也抵不上一个步兵;土山与丘陵,连绵起伏不断,以及平原广野之处,这是车兵和骑兵作战之地,十个步兵也抵不上一个车兵或骑兵;平原与丘陵之间相距较远,中间有河流与山谷存在,处于居高临下之处,这是弓弩兵作战之地,使用短兵器的士兵一百个也抵不上一个弓弩手;两军在地平草浅之处对阵,可进可退,这是长戟手作战之地,使用短剑和盾牌的士兵三个也抵不上一个长戟士兵;芦苇丛生,竹蒿林立,草木茂盛,枝叶密接,这是用矛铤作战之地,两个长戟手也抵不上一个矛铤手;道路曲折隐蔽,险隘紧密相连,这是用剑盾作战之地,三个弓箭手也抵不上一个使用剑盾的士兵。战士未经选拔和训练,士卒不是训练有素,作风拖拉,行动不齐,战机有利时不能及时赶到,战机不利时不能迅速转移,前军出战而后军懈怠,进退不听金鼓之音的指挥,这是将领平时不能严格训练部队、从严治军的过错,这样的军队百不当十。武器不精良,与空手一样;铠甲不坚密,与赤膊一样;弓弩射不远,与短兵器一样;射出的箭不能命中目标,与没有箭一样;命中目标而不能杀伤目标,与没有箭头一样。所以兵书上说:武器装备不精良,就等于把士兵断送给敌人;士兵不会作战,就等于把将领断送给敌人;将领不懂得用兵,就等于把国君断送给敌人;国君不善于选拔良将,就等于把国家断送给敌人。这四点,是掌握军事问题的要领所在。

我还听说国家的大小不同则处境不同,强弱不同则形势不同;地形不同则守备不同。低三下四地依附强国,这是小国处境艰难所决定的做法;联合小国对抗大国,这是与对手势均力敌所决定的做法;团结周边少数民族抗击入犯的少数民族,这是中原地区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做法。现在匈奴的作战地形和作战的技能、特点与中原地区不同。上下山坡,出入溪涧,中原的马不如匈奴的;在狭窄倾斜的险境上边驰马边射箭,中原的骑兵不如匈奴的;雨打风吹,不怕疲劳,能忍饥耐渴,中原的战士不如匈奴的;这些是匈奴的长处。至于在平原旷野之中,中原的军队用轻便的战车和精锐的骑兵发动突袭,则匈奴的军队就很容易被打乱;强弩射得远,长戟刺得深,则匈奴军队的弓箭是挡不住的;坚固的铠甲,锋利的武器,长短兵器相互配合,弩机手灵活机动地往来发射,部队整齐一致地发动攻击,则匈奴的军队是无法招架的;弓弩手万箭齐发,射向同一目标,则匈奴军队的皮铠甲和木盾牌就难以支持;下马作战,剑戟相击,短兵搏斗,则匈奴军队的脚力和步法就难以应付;这些是中原部队的长处。由此看来,匈奴军队的长处有三,我方军队的长处有五,又加上陛下



发动数十万大军,用以讨伐来犯的数万匈奴军,从数量的对比看,这是以十击一的必胜之策。

虽然如此,但兵器是不吉利的东西,打仗是最危险的事情。在战争中由大变小,由强变弱,往往是顷刻之间的问题。用人的牺牲去夺取战争的胜利,一旦打了败仗就会一蹶不振,那就后悔莫及了。所以古代帝王巩固江山社稷的根本之道,总是从万无一失的角度去考虑。现在内附中原的西戎义渠人有些已入塞归义于朝廷,其众达数千人,生活习俗与作战特点与匈奴相同,可以发给他们坚密的铠甲、温暖的棉衣和强弓利箭,再加上边郡所产的良马。派遣英名的将领能够了解其风俗习惯并能团结爱护他们的人前去,用陛下英明的诏令统帅他们。遇到险阻之地就用这支军队去抵挡匈奴的进犯;而在平坦大道上,则用我们的战车和步兵的强弓劲弩来控制匈奴的行动。两支军队相互配合,发挥各自的特长,再看实际情况而增援众多的兵力,这是对匈奴防御作战能够确保万无一失的上策。

古书上说:“有时狂妄者所说的话,贤明的君主也能从中有所选择地采纳。”微臣晁错愚昧而浅薄,冒着死罪呈上狂妄无知之言,唯望陛下酌裁。

【评析】

西汉王朝开国后,最大的边患莫过于匈奴。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发祥于今内蒙古大青山一带,于秦末汉初空前强大起来,先后统一了大漠南北,控制了今新疆和中亚地区,渐渐南下,攻占今黄河河套地区,对西汉王朝构成严重威胁。汉初伊始,匈奴即勾结汉朝的异姓诸侯王连年入犯。汉高帝七年(前200年),在平灭韩王信时,刘邦亲率32万大军,企图歼灭内犯的匈奴军,结果被匈奴40万骑兵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南)7日。侥幸脱险后失去军事对抗的信心,转而与匈奴“和亲”,把汉室的公主嫁给匈奴单于,并年年纳贡大量金钱财物。从此,数十年内汉廷没有制定对匈奴防御作战的计划、方针与策略。但是,屈辱的“和亲”并未带来真正的和平,匈奴仍然勾结异姓诸侯王内犯,“终高祖世”盗边不止。惠帝、高后时期匈奴进一步骄慢,曾致书于高后肆意污辱,高后不得不以好言相慰,再次和亲。而匈奴却接连3次进犯陇西,大肆劫掠。文帝即位后,接连两次与匈奴“和亲”,匈奴居然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烽火直达汉都长安。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晁错以惓惓报国之心,于汉文帝前元十一年接连3次上书,纵论抗击匈奴的对策;其中首篇即为《言兵事疏》。



《言兵事疏》的核心思想有二,首先是强军之道,即建设一支将良、兵精、器利的强大军队以对抗匈奴,确保国家安全。晁错从陇西地区同匈奴作战三败一胜中得出一个结论:“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他深刻分析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作战方式,认为战场上的胜负决定于三个条件:“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得地形”在于将领的正确指挥,必须在不同的地形条件下使用不同的武器和兵种,否则有时“二不当一”,有时“三不当一”,有时“十不当一”,直至“百不当一”。“卒服习”在于将领平时对部队要训练有素,否则“百不当十”。“器用利”在于将领平时要保证武器装备的精良,否则就等于赤手空拳,“五不当一”。根据战场上的胜负规律,他参照先秦《管子》一书的有关论述,得出一个强军之道的至理名言:“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其次,在将良、兵精、器利的基础上,《言兵事疏》提出了对匈奴作战的克敌之术,即扬长避短、“以十击一”和“以蛮夷攻蛮夷”。晁错具体分析了匈奴军的三个长处和汉军的五个长处,认为只要善于扬长避短并坚持在数量上“以十击一”,就能够战胜匈奴的进攻,从而否定了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的匈奴“乘胜,不可击也”^①的观点。同时他还指出,为了克制匈奴的三个长处,需要与周边其他少数民族联合作战。所谓“以蛮夷攻蛮夷”,并不是说要挑拨各少数民族互相残杀,其实质是指中原民族与周边民族团结、合作、凝聚起来,共同抵抗匈奴的掠夺。这一思想完全符合历史上的国情。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合作的大家庭,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政治、文化产生着巨大的凝聚力,而周边民族的环境、条件离不开与中原的合作。所以团结合作永远是民族关系的主流,而且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而民族关系中的冲突与矛盾,包括汉匈之间的冲突与矛盾,都只不过是历史的支流而已。匈奴受游牧民族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支配,强大起来之后首先征服的是周边其他民族(东胡、月氏、西域及中亚各族),而后才把主要矛头对准中原。因此,中原与周边联合抗击匈奴实乃历史的必然,这种联合能充分抵消匈奴的优势与特长,所以被晁错称之为“万全之术”。

这篇对策深深打动了汉文帝。他以明君贤主的良知及充满了虚怀若谷的自责精神,下玺书宠答晁错说:“皇帝问太子家令:上书言兵体三章,闻之。

^① 《汉书·匈奴传》。



书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今则不然，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夫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①也就是说，文帝完全嘉纳了这篇对策，并把已往对匈奴斗争不利的责任归咎于天子自身。从此，西汉王朝逐渐走上了强兵抗匈的道路，并对西汉中期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汉文帝时刻把选拔良将放在心上，著名抗匈英雄李广就是文帝从陇西部队中选拔起来的。李广历文、景、武三朝，历任北部边防八郡太守，使匈奴望而生畏，称之为“飞将军”。与李广同时齐名的程不识，以治军严整而著称，长期驻屯边防，匈奴不敢进犯。文帝晚年还从对匈斗争中选拔出细柳营中的“真将军”周亚夫，并在临终前特意将周亚夫嘱托给汉景帝，从而使景帝顺利平灭了吴楚七国之乱。到汉武帝时，选将、建军、联合周边部族抗匈的思想获得空前发展。通过大建骑兵，在汉匈战场上终于变被动而为主动；通过精选卫青、霍去病等一代优秀的骑兵大将，终于取得反击匈奴的决定性胜利；通过联西域、联乌孙，终于断了匈奴的右臂，为汉宣帝时实现汉匈合作、“胡汉一家”奠定了基础，从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中原农业区与北方游牧区及西部半农半牧区的空前大统一。

^① 《汉书·晁错传》。



晁错论募民守边备塞

题引：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前169年），晁错继上奏《言兵事疏》之后，紧接着又两次上书，专论募民守边备塞的对策，亦为文帝所采纳，从此开创了中国古代屯田戍边的历史。本篇选自《汉书·晁错传》。

【原文】

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①，其势易以扰乱边竟^②。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③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⑤，以候^⑥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

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给而止。郡县之民得买其爵，以自增至卿^⑦。其

① 不著于地：不依靠耕田种地。著，依附。

② 竟：通“境”。

③ 南亩：农田。

④ 燕代：燕，指今河北北部及辽宁西部。代，指今河北蔚县一带。

⑤ 上郡、北地、陇西：上郡，辖境相当于今陕西北部及内蒙古乌审旗南部一代。北地，郡名，辖境相当于今甘肃马莲河流域和宁夏青铜峡以东地区。陇西，郡名，辖境相当于今甘肃洮河中游及渭河上游一带。

⑥ 候：伺望，窥伺。

⑦ 郡县之民得买其爵，以自增至卿：此句意谓内地有钱之家都可以通过献奴婢而购得爵位，使自己的爵位提升至卿；而政府则将奴婢转为平民，选择其中精壮者徙处塞下，屯田备匈奴。卿，指二十级汉爵中第十级左庶长到第十八级大庶长的爵位。



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予之。人情非有匹敌^①，不能久安其处。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县官为赍其民。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

臣又闻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②；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候：皆择其邑之贤材^③有护，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故卒伍成于内，则军正^④定于外。服习以成，勿令迁徙，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目相见，则足以相识；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前死不还踵^⑤矣。所徙之民非壮有材力，但费衣粮，不可用也；虽有材力，不得良吏，犹亡功也。

【译文】

匈奴人的吃穿所用，不依靠耕田种地，其游牧生活的情况和形势，很容易骚乱别人的边境。如何知道如此呢？他们吃的是兽肉，喝的是奶酪，穿的是皮毛，没有城邑田舍做安居，像飞禽走兽一样来往于广阔的田野，遇到水草丰茂之处就停留，草尽水竭就迁移。由此看来，往返迁移，时来时去，这就是匈奴人的生活方式，从而造成生活在边境地区的中原人民被迫逃离自己的农田。现在让匈奴人在边塞之下多处打猎游牧，有时在燕代方向，有时在上郡、北地、陇西方向，时刻窥伺着中原守卫边塞的兵力，一发现兵力少就进入塞内掠扰。陛下如果不救，边民就会因绝望而产生降敌之心；如果救援他们，少发兵则不足以抗击匈奴，多发兵则远处的兵力刚到，匈奴已出塞而去。大军如果久聚不撤，耗费必然巨大；如果把大军撤走，则匈奴又来进犯。连年如此，国家势必贫穷，人民也不得安宁了。

幸得陛下忧虑边境的安危，派遣将领、官吏征调士兵戍守边塞，这是对边民的极大恩惠。但是命令那些从内郡远方调来的戍卒守卫边防，一年一轮

① 匹敌：这里指配偶。

② 假士：在军事与行政合一的组织编制中 50 户的首领，因定期轮换故称为“假”。

③ 材：同“才”。

④ 正：通“政”。

⑤ 还踵：向后转，即逃跑。还，通“旋”；踵，足根。



换,不了解匈奴的特长,不如选募老百姓长期住在边境,安家务农,同时用来防备匈奴。……(对于选募来的边民)都赐予较高的爵位,免除他们全家的徭役和赋税。发给他们冬夏衣装,供应他们所需的粮食,直到他们安家立业后生活能够完全自给为止。内郡的百姓都可以献奴婢买爵,直到获得卿这样高的爵位(以便政府选募奴婢徙处边境备御匈奴)。对于没有丈夫或妻子的人,由政府出钱帮助他们完婚。人之常情,如果没有配偶,就很难久安其处。边境的老百姓,如果得不到较多的物质利益,就不可能使他们长久居住在危险之地。匈奴入犯时,如能截回被匈奴抢掠的人畜财产,便奖赏他们一半,其中的百姓则由政府出钱赎回。这样,各村镇邻里之间就会相互救助,对匈奴作战英勇不怕死。这种勇敢精神并不是为报答陛下的恩德,而是为了保全亲戚,贪图财物。这与从关东调来戍边,因不熟悉地形而害怕匈奴的戍卒相比,功效要胜过万倍。……

我又听说,古代在边境地区设置郡县用以防备敌人的做法是,五家编为一伍,设伍长一人;十个伍长编为一里,设里假士一人;四里编为一连,设假五百一人;十连编为一邑,设假候一人;各级都要选择那些德才兼备、有能力守护边境、熟悉地形、了解民心的人担任领导。平时训练民众掌握军事技能,战时指挥民众抗击敌人。所以军事编制在边民中形成,军政体制在战斗中确立。训练成熟后,不许他们迁移,大家从小就在一起游玩,长大了共同从事耕战。夜里打仗,彼此声音熟悉能互相救援;白天战斗,彼此一看就能识别敌我;互相之间的友爱之心,在战斗中完全可以做到同生共死。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加上用厚赏来奖励,用严刑来惩戒,打起仗来就只能拼死向前而决不后退。所选募徙处到边境的百姓,如果不是强壮有力的,那就只能浪费衣粮,是不可用的;虽然有了身强力壮的募民,但没有良好的官吏去管理,也还是无法收到守边的功效。

【评析】

这篇对策的核心思想,就是用募民屯田戍边取代来自内地郡县“一岁而更”的边防戍卒。这一思想是在深刻总结秦代历史教训和客观认识汉匈之间矛盾实质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对策中首先指出,秦代为了北防匈奴,大修万里长城,以戍卒守边,以重兵屯边,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直接引发了陈胜、吴广大起义的爆发。对策中进而指出,汉匈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根源于我国古代中原地区与北方地区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在汉匈两大政权对立



未能统一的条件下,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的进犯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以“一岁而更”的内郡戍卒守边,不熟悉地形和敌情,作战不利。以重兵屯边,积年累月地疲耗,国力难支。所以晁错在对策中提出,选募身强体壮的常居者徙处边境地区,用以取代“一岁而更”的内郡戍卒。

募民的主要对象来源于内郡各地犯罪的刑徒、贫苦的百姓、人身获得解放的奴婢。对策中提出用“赎罪”和“拜爵”等两种手段,鼓励富人献出奴婢,以便政府将他们转化为平民,募选到边境,屯田备匈奴。为了充分发挥募民屯田戍边的效用,一是把他们徙处于匈奴经常出没的要害之地,建城立邑,完善各种防敌作战的设施。二是让他们安居下来,给他们提供住房、耕地、农具和粮食,直到生活能够完全自给为止;没有妻子或丈夫的人,由政府出钱帮助完婚。三是给他们以特殊的优厚待遇,政治上皆授以高爵,经济上免除全家的徭役,打了胜仗奖给他们战利品的一半。四是把他们严格组织起来,建立起军政合一的体制,选出坚强有力的领导,平时负责军事训练,战时负责指挥打仗。

孙子说:“国之贫于师者,远输。”^①上述对策的实施,最大限度地使内郡“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而“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②,解决了自秦代至汉初以来长期困扰而无法克服的一大难题;不仅如此,还进一步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使原来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刑徒、贫民和奴婢,极大地提高了政治地位,改善了经济条件,走上了保卫边疆、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屯田戍边之道,为历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随着这一举措的落实,西汉王朝的北部边防得到明显的加强,匈奴较大规模的进犯在汉景帝时期仅有一次,小规模进犯虽时有发生,但比从前大为减少。自汉武帝以后,随着反击匈奴作战的胜利,屯田戍边被广泛实施于河西走廊和西域,在此基础上设置河西四郡和西域都护府,有效地巩固了对匈奴作战的胜利成果,促进了国家的统一。从此,屯田戍边成为中国历代王朝最重大的边防措施之一,对开发边疆、巩固边防发挥了长远的作用。

① 《孙子兵法·作战篇》。

② 《汉书·晁错传》。



晁错论贵粟强边富国

题引：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年），晁错又连续两次上书，提出贵粟、强边、富国的对策，皆为文帝所采纳。西汉王朝随即迎来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的盛世，开创出连续13年免除全国农业税的奇迹，奠定了富国强兵的基础。本篇选自《汉书·食货志》。

【原文】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①，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②。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③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④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人粟郡县矣；足支一年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

① 乖迕：相互违反。乖，违背。迕(wu，音午)，通“忤”，背逆。

② 渫(xie，音谢)：疏散。

③ 车骑马：拉战车的马或骑兵用的战马，即军马。

④ 五大夫：汉爵第九级的爵位。



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①劝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②且美,则民大富乐矣。

【译文】

当今法律上虽然规定鄙视商人,而商人却已经富贵;法律上虽然规定尊重农民,而农民却已经贫贱。因此,世俗所尊重的人,正是皇上所轻视的人;而官吏们所鄙视的人,却正是法律上所尊重的人。上下之间如此相反,好恶颠倒,要想使国家走向富强,法律得到贯彻,那是不可能办到的。当前要解决的问题,再也没有比让人们努力从事于农业生产更为重要的事情了。要想使人们努力务农,关键在于要以粮为贵;而以粮为贵的做法,就在于要对人们实施以粮食为赏罚的手段。现在应号召天下人向官府送交粮食,给交粮人在政治上相应地拜爵或法律上相应地免罪。这样做,富人可以获得爵位,农民可以得到金钱,粮食能够从囤积居奇的富商手中疏散出来。凡是愿意用粮食换取爵位的人,肯定都是富裕之人,取富人的粮食供朝廷使用,则贫苦农民的赋税就可以减轻,这就是所谓损有余而补不足,命令一颁布,人民就能得到实惠。这样做能顺应民心,可以一举三得:一是朝廷的军国之需充足了,二是人民的赋税减轻了,三是务农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现行法令规定,凡是献出军马一匹的人家,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兵役。因为军马是国家的军事装备,所以要给献马者免除兵役。古代的神农氏曾教导人们说:“即使有用石头筑的城墙高达八丈,用沸水灌注的护城河宽至百步,守城部队众至百万,如果没有粮食,也还是守不住的。”由此看来,粮食是朝廷的重要物资,是治国安邦的基础。让人们纳粟受爵到五大夫以上的爵位,只不过免除一个人的兵役,这与献出军马而得到的报酬相比差得太远了。爵位,是皇上专有的拜授权,只要随时开口,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封出来;粮食,是人们耕种所获,只要去种,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地里长出来。能够获得很高的政治爵位和免罪的待遇,这是大家都非常希望的事情。如果让天下人把粮食送到边郡去,从而获得爵位或免罪,那么用不了三年,边防军事用粮就必然很充足了。……

陛下给输送粮食到边郡的人授以爵位,这是个很大的恩惠。我考虑到边防军队的用粮,用不着从全国各地大量调运。当边郡用粮能够储备到五年所

① 俞:通“愈”,更加。

② 孰:通“熟”,此处意谓丰收,好年景。



需时,就可以下令把粮食输送到内地各郡县政府;等到内地各处都有一年以上的粮食储备时,就可以随时下达赦令,不要再收取农民的租税。这样做恩德普施于万民,他们就会更加勤奋地务农。如果发生战争或遇到水旱灾害,老百姓的生活不会困苦,天下也能保持安宁;如果遇到丰收的美好年景,那么全国人民就会生活得更加富裕和快乐了。

【评析】

西汉王朝建国伊始,就确立了重农抑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国策。汉高祖刘邦所制定的农业税为十五税一,税率约为6.6%,比先秦数千年所实行的什一之税减轻了一半。汉文帝即位后,更是屡屡下颁诏书,劝农力本,并“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①。但是,30多年过去后,正像晁错在本篇对策中指出的那样,弃农经商、舍本逐末的风气没有多少改变,以致“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远未达至国富民康,国防安全仍受到匈奴的严重威胁。广大农民的生活仍然很苦,常常“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甚至卖儿卖女。官、商之间勾结情况严重,“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正是在这样背景下,晁错提出了本篇的对策。

本篇的核心思想是,通过“贵粟”而重农、强边、富国、富民。晁错认为,重农的国策是完全正确的,但必须找到一个有效的杠杆,这个杠杆就是“贵粟”。所谓“贵粟”,就是把粮食作为赏罚的手段,以纳粮于国来授爵免罪:谁想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拿钱来买不行,必须纳粮来;谁犯了罪想免罪,拿钱来赎不行,必须纳粮来。汉爵一共二十级,按晁错的建议,纳粮六百石送到边郡,就可授以第二级爵“上造”;纳粮四千石送到边郡,就可授以第九级爵“五大夫”;纳粮一万二千石送到边郡,就可授以第十八级爵“大庶长”。大庶长在政治地位上仅次于天子和王、侯,是一个非常高的爵位。但汉代的官和爵是分开的,十八级以下的爵位没有食邑,只要不当官就不掌握权力,也不需发薪俸,封的爵再多国家也毫发无损。因此,晁错对策的实质是“损有余补不足”:富人贪得爵位,很乐于将多余的钱拿来买农民的粮食送给国家;农民有了钱,种粮的积极性更高;国家获得粮食,军国之需得以满足。同时晁错还建议,首先满足边防用粮的5年之需,而后满足内地用粮的一年之需,然后就免收农

^① 《汉书·食货志》。



民的租税,从而实现备战备荒、国富民康、国富兵强的目的。

上述对策被汉文帝采纳后,很快就发生了神奇般的效果。由于富人纷纷购粮纳官受爵,文帝于当年就下令减免全国人民的“租税之半”;紧接着第二年(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即下令“除民田之租税”,时间持续长达13年^①。这一奇迹的出现,使历史真正步入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其奥妙全在于“损有余补不足”,富人的大量钱财以不同形式转化到贫民和国家手中,生产力空前解放,社会空前繁荣:老百姓家给人足,各地府库皆有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穿钱的绳)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于是“始造苑马以广用”^②,大建骑兵,真正走上了强兵固边之道。到汉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年),虽然恢复了农业税,但从此确定了两汉极轻的税率——“三十而税一”^③,一直被施行到西汉末年和东汉末年,长达近400年。正是在文景之治、国富兵强的基础上,汉武帝时期才取得了反击匈奴的胜利,统一了祖国各地的边疆。

历史是一条永无止境的长河。虽然晁错“贵粟”的思想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但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很深的启示:在古代农业社会中,惟有大力发展农业,国家才能富强;在近代工业社会中,惟有大力发展工业,国家才能富强;在现代高科技社会中,惟有大力发展高科技,国家才能富强。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① 《汉书·食货志》。

② 《汉书·食货志》。

③ 《汉书·食货志》。



王恢、韩安国对匈奴战和之争

题引：王恢(? ~前133年)，燕(今北京西南)人，早年数任边吏，熟悉匈奴事务，汉武帝时入朝任大行令，力主对匈奴开战，因策划马邑之谋未获成功，入狱后自杀。韩安国(? ~前127年)，字长孺，成安(今河南临汝东南)人，初为梁王刘武的中大夫、将军、内史，武帝时入朝任大司农、御史大夫等职，力主对匈奴“和亲”。王、韩二人之争，始于建元六年(前135年)，终于元光二年(前133年)。武帝初从韩谏，后纳王谋，遂展开长期大规模反击匈奴的全面战争。本篇选自《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武帝元光二年。

【原文】

雁门马邑^①豪聂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致之，伏兵袭击，必破之道也。”上召问公卿。王恢曰：“臣闻全代^②之时，北有强胡之敌，内连中国之兵，然尚得养老、长幼，种树以时，仓廩常实，匈奴不轻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为一；然匈奴侵盗不已者，无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窃以为击之便。”韩安国曰：“臣闻高皇帝尝围于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围反位而无忿怒之心。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公，故遣刘敬结和亲，至今为五世利。臣窃以为勿击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坚执锐，行几十年，所以不报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边境数惊，士卒死伤，中国樵车^③相望，此仁人之所隐也。故曰击之便。”安国曰：“不然。臣闻用兵者以饱待饥，正治以待其乱，定舍以待其劳；故接兵覆众，伐国堕城，常坐而役敌国，此圣人之兵也。今将卷甲轻举，深入长驱，难以为功；从

① 雁门马邑：雁门郡马邑县(今山西朔州)。

② 全代：指战国中期以前的代国，位于今河北、山西、内蒙古相交的一带；战国中期时被赵国兼并，于其地建立代郡(郡治今河北蔚县东北)，但有部分地段被分别划入上谷郡和雁门郡。

③ 樵(hui，音会)车：运载棺木的车子。樵，粗陋而薄小的棺材。



行则迫胁^①，衡行^②则中绝，疾则粮乏，徐则后利，不至千里，人马乏食。兵法曰：‘遗人，获也。’臣故曰勿击便。”恢曰：“不然，臣今言击之者，固非发而深入也；将顺因单于之欲，诱而致之边，吾选泉骑、壮士阴伏而处以为之备，审遮险阻以为其戒。吾势已定，或营其左，或营其右，或当其前，或绝其后，单于可禽^③，百全必取。”上从恢议。

【译文】

雁门郡马邑县的豪绅聂壹，通过大行令王恢上书说：“匈奴刚与我方和亲不久，对我方边境人员颇为亲善信任，可以用重利将其诱至塞内，再用伏兵实施攻击，这是必然击破匈奴的好办法。”汉武帝召集廷议问计于群臣。王恢说：“我听说从前代国存在之时，外有北方强大的匈奴为敌，内有中原诸侯兼并战争的兵连祸结，然而仍能做到养老育幼，及时耕种，仓库经常充实，匈奴不敢轻易进犯。现在以陛下的神威，天下一统；而匈奴却不停止地犯境虏掠，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没有使敌人遭受足以使其震惊的打击。我认为与匈奴开战有利于国家安全。”韩安国说：“我听说高祖皇帝曾经被匈奴困围平城，七天没有饭吃；而到解围返回皇帝宝座之后并无愤怒复仇之心。这是圣贤之君以天下为念的度量，不以一己之私怒而伤害天下人民的共同利益，所以才派遣刘敬出使匈奴而结和亲，至今已经使国家获得休养生息之利达五世（高帝、惠帝、文帝、景帝、武帝）之久。我认为不与匈奴开战有利于国家安全。”王恢说：“不对。高祖皇帝亲自披坚执锐，创业战斗数十年，他所以不雪平城之耻，并不是力量上做不到，而是为了满足天下人民期望休养生息的心愿。现在边境地区屡遭匈奴之犯而惊扰，边防战士不断伤亡，以致向内地运载棺材的车辆在道路上络绎不绝，这是每一个仁人志士都深为痛心疾首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与匈奴开战有利于国家安全。”韩安国说：“不对。我听说用兵打仗要以自己的饱食等待敌人的饥饿，以自己的严整等待敌人的混乱，以自己的安逸等待敌人的疲劳；所以双方一交战就能击败敌军，一攻击敌国就能摧毁敌城，经常安坐不动而能驱使敌人烦劳不已，这样的用兵之道才是所谓圣人之兵。现在与匈奴开战则不同，必须收起甲冑轻装而发，深入敌境长驱而进，很难获

① 从行：读作“纵行”。从，通“纵”。迫胁：指两侧受到攻击。胁，腋下肋骨。

② 衡行：读作“横行”。衡，通“横”。

③ 禽：通“擒”。



得成功；以纵队前进则两侧易受威胁，以横队前进则中间易被突破，行动快则军粮不继，行动慢则失去战机，出塞不到千里，就会人饿马饥。正如《兵法》所说的那样：‘把军队送给敌人，必然成为敌人的俘虏。’所以我认为不与匈奴开战有利于国家安全。”王恢说：“不对。我现在所说的与匈奴开战，当然不是指要发兵出塞而深入敌境；而是指要顺应匈奴单于贪婪的欲望，将其诱致边塞之内，我军选择骁勇的骑兵和步兵设置埋伏做好准备，严密封锁各处险阻之地以戒备敌人。把我军的部署事先确定下来，有的埋伏在敌人的左面，有的埋伏在敌人的右面，有的阻击在敌人的前方，有的切断敌人的后退之路，这样即可以擒获匈奴单于，百分之百地必然取胜。”于是汉武帝采纳了王恢的建议。

【评析】

王恢与韩安国之间关于对匈奴战和的争论，发生在西汉王朝立国 70 年之后，汉匈双方的基本国情都已远非汉初之时所能比。西汉立国后曾面临经济残破、诸侯割据、匈奴犯边等三大忧患，无力同匈奴全面对抗，所以汉高祖刘邦不得不对匈奴实行屈辱的“和亲”政策，以利于国内休养生息。后经文景之治和平灭吴楚七国之乱，到汉武帝即位后情况已完全不同，政治高度统一，经济空前繁荣，实力空前雄厚，三大忧患只剩下一个，于是解除匈奴的威胁，成为无可推卸的历史使命。然而此时的匈奴，也恰值国力鼎盛的巅峰时期，不仅在汉初就已统一大漠南北，而且在汉文帝时又征服今天的新疆和中亚；不断地强迫汉廷“和亲”，时而进犯汉境大肆掳掠，是其行之已久的既定方针，决不肯轻易放弃。两强对峙，一个是中原农业民族的强大政权，一个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大政权，前者不愿再屈服，后者不放弃既得利益，这在古代弱肉强食的历史环境中，迟早必然要爆发大规模的全面战争，直至鱼死网破而后已。正是在这种形势和背景下，在西汉王朝内部产生了战与和两种不同意见的论争。

两种不同意见的论争，虽然主题是战与和的问题，但分歧的实质则在于匈奴是否不可战胜以及如何战胜匈奴的问题。御史大夫韩安国，曾是一位亲身经历过平灭吴楚七国之乱的将军。他认为匈奴有强大骑兵的优势，汉军只能在塞内防御作战，一旦出塞发动进攻，就必然成为匈奴的俘虏，也就是说，匈奴是不可战胜的，所以才力主“和亲”，避免汉匈之间爆发全面的大规模战争。大行令王恢，因曾数任边吏，深悉边事，认为匈奴是可以战胜的，只要事



先做好埋伏的准备,设法把匈奴单于诱骗到塞内,便可一战而胜,用不着出塞进攻,所以才力主开战,断绝与匈奴的屈辱“和亲”。这两种意见虽然相反,但都没有提出战胜匈奴的正确方针与手段。尤其是韩安国,在西汉国力已经空前雄厚之时,仍然坚持屈辱的“和亲”,不可能被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所采纳。他只看到匈奴有优势的骑兵,汉军以步兵为主,不能出塞作战,而没看到,汉朝已经完全有条件组建比匈奴更为强大的骑兵,从而转守为攻,争得主动,以骑制骑,战胜匈奴。王恢虽然主战,符合汉武帝的意图,但他根本没有看到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企图把匈奴单于诱骗到塞内,一战而胜就解决问题,这完全是一种幻想。即使真的擒获了单于,匈奴也不会就此罢休,疯狂的反扑必然立即到来。他所策划的马邑之谋被采纳后,汉武帝调发 30 万大军埋伏在马邑周围,匈奴单于也果然被诱骗到塞内,但很快就产生了疑心,经捕获边吏侦得实情,立即出塞而去,使汉军的行动全部落空,以致汉武帝不得不问罪于王恢以谢天下。

马邑之谋虽然落空,但汉武帝由此而做出的开战决策,却对西汉历史产生了极为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和亲”的断绝、匈奴的连年入犯,汉廷被迫不得不倾尽国力建设起强大的骑兵,改行以骑制骑的作战方式,在卫青、霍去病等人的指挥下,连续苦战 15 年:经河南之战而收复了黄河河套地区;经四次漠南之战而击败了匈奴右贤王,重创了匈奴单于;经两次河西之战而迫降了河西匈奴,控制了河西走廊;经漠北之战而犁庭扫穴,大败匈奴单于和匈奴左贤王,取得反击匈奴的决定性胜利。然而匈奴仍未屈服,继续同西汉对抗七八十年,直到汉宣帝时匈奴极度衰弱,四分五裂,才开始陆续臣服于汉;到汉元帝时匈奴在中亚的势力被汉军消灭,才在新的平等条件下重新与汉廷“和亲”,实现“胡汉一家”,天下太平,实现了中原农业区、北方游牧区、西部半农半牧区的空前大统一。实践表明,中华民族大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虽然统一需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归根结底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的根本所在。



侯应论罢边备

题引：侯应，汉元帝时郎中。竟宁元年（前33年）正月，侯应向元帝面陈十策，力主汉匈重新“和亲”之后不可撤除边防守备。本篇选自《汉书·匈奴传》。

【原文】

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兴，尤被其害。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如罢备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圣德广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来臣。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以罢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二也。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又况单于，能必其众不犯约哉！三也。自中国尚建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觊欲也。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①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绝。今罢乘塞，则生嫚易分争之渐，五也。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六也。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七也。盗贼桀黠^②，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八也。起塞以来百有余年，

① 诸属国：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西汉夺取河西之地，将降附的匈奴浑邪王部众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5郡黄河以南的战国秦长城之外，保留其原有生产生活方式，作为汉的属国。

② 桀黠（xia，音狭）：凶悍而狡猾。



非皆以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①,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臣恐议者不深虑其终始,欲以壹切省繇^②戍,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它变,障塞破坏,亭隧灭绝,当更发电缮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复,九也。如罢戍卒,省候望,单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汉,请求无已。小失其意,则不可测。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

【译文】

自周秦以来,匈奴残暴而凶悍,常常寇掠边境,汉兴之后,尤其深受其害。我听说北部边塞到辽东这一段,外有阴山山脉,东西达千余里,草木茂盛,禽兽繁多,从前匈奴冒顿单于盘踞其中,制造弓矢武器,出来四处寇掠,是其畜养禽兽的天然之地。到汉武帝之时,出兵远征,夺取了此地,将匈奴击退到漠北。漠北地势平坦,草木很少,风沙很大,匈奴由漠北向南来寇掠中原,途中很少有隐蔽之处,从边塞以南,都是幽径很深的山谷,往来行动比较困难。边塞附近的老年人说,匈奴人自从失去阴山山脉之后,每次从这里经过,未尝不痛苦流涕。我们如果撤除守备边塞的戍卒,就会让匈奴人明显看到有大利可图,这是不可撤的第一个理由。现在皇帝的圣德广及四海,像天一样覆惠于匈奴,匈奴人深感蒙受汉朝的全活之恩,所以才来叩头称臣。匈奴人的实际情况是,有了困难就态度谦恭,强大起来就骄横无礼,这是其游牧生活的天性所养成的。前几年已经撤除了塞外列城的守备,省去了烽火亭,现在边塞上保留的守备人员,才仅仅能够满足侦察瞭望,举举烽火以通报边情的需要而已。古人讲安不忘危,这是不可再撤边防守备第二个理由。中原有文明的礼义之教,有严格刑罚之诛,然而仍有愚顽之人违法犯禁,更何况匈奴单于,怎能必然保证其部众不会违约犯禁呢!这是不可撤除边防守备的第三个理由。在中原内部尚且修建关隘津梁以控制诸侯王,用来杜绝臣下的非分之图。设塞巡边,分兵守备,不单是针对匈奴人而已,同时也是针对各属国的降民,他们本来属于匈奴人,怕他们思旧逃亡,这是不可撤除边防守备的第四个理由。近来西羌人负责保护边塞,与塞内中原人互相来往,塞内的官民贪利,经常侵

① 水门:指边塞上遇到狭深的山谷,用木石结合构筑大栅于谷底,用以阻止敌军通过,但不妨碍溪水从栅中流过,故称“水门”。

② 繇:通“徭”,即徭役。



夺和盗窃羌人的牲畜和妻子,因此羌人非常怨恨,群起背叛的事件累世不绝。如今要撤除北部边防的守备,那么塞内塞外之人互相欺凌分争之事就会逐渐发生,这是不可撤的第五个理由。从前有很多从军作战的人沦落在匈奴没有回来,其在中原的子孙生活贫困,一旦流亡出塞,就会去寻找他们在匈奴中的亲戚,这是不可撤除边防守备的第六个理由。又加上边民中的奴婢生活愁苦,欲逃亡出塞的人很多,常常这样讲:“听说匈奴那边生活很快乐,只是边防守备的侦察瞭望很严,无可奈何!”然而还是不时有逃亡出塞的人,这是不可撤除边防守备的第七个理由。中原有些凶悍而狡猾的盗贼,常常成群结伙地违法犯禁,如果处境窘迫,向北方逃亡出塞,那就无法控制他们,这是不可撤除边防守备的第八个理由。边塞自修筑以来已经一百多年,并非都是以土筑墙,有的地段是利用山中的岩石和山上垂折而下的枯木在溪谷中构筑水门,稍稍加以平整而成边塞,戍卒和刑徒为了修筑边塞所用的功费和久远的时间,简直无法计算。我担心提议撤除边防守备的人,没有深思熟虑这样做从始到终的全部后果,想用一刀切的办法减省戍边的徭役,十年之后百年之内如有突然事变发生,那时边防的障塞已经破坏,烽火台已经灭绝,需要再重新征发屯兵和戍卒来缮修边塞,从前的累世之功就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这是不可撤除边防守备的第九个理由。如果撤除边防守备的戍卒,省去了边防的侦察和瞭望,匈奴单于自以为保塞守备有功,必然深感自己有恩德于汉廷,对朝廷的各种请求就会无尽无休。稍有某种小事未能满足其意愿,就会发生难以预测的后果。引发民族矛盾,损害中原守备,这是不可撤除边防守备的第十个理由。撤除边防守备的做法,并不是永保边境安宁、有效控制边区的长治久安之策。

【评析】

汉宣帝神爵四年(前58年),因长期战争业已极度疲弱的匈奴开始陷入长期内乱。甘露元年(前5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被匈奴郅支单于击败,率残部从漠北逃往漠南。不久,叩塞而降,称臣于汉;在汉廷的军事援助和粮食供养下其部得以全活,休养生息于塞下。汉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呼韩邪实力转盛,足能自卫,返归漠北,继续与郅支单于对抗。建昭三年(前36年),郅支单于被汉军诛灭,呼韩邪成为匈奴的唯一单于。竟宁元年(前33年)正月,呼韩邪入朝元帝,娶了宫女王昭君,封为宁胡阼氏。从此“胡汉一家”,天下太平,汉匈关系步入历史上空前的蜜月时代。



正是在这一大好形势下,呼韩邪单于上书元帝,请求由匈奴负责世代保护东起上谷(今河北怀来一带)之北、西至敦煌(今甘肃敦煌一带)西北的西汉边塞,撤除守塞的官兵,以利中原人民的休养生息。这个建议的出发点完全是善意的,大大有利于中原的休养生息,因而得到汉廷群臣的赞同。唯有郎中(秩禄比三百石,皇帝侍从官中最低的一等)侯应奋起而疾呼,向元帝面陈十条对策,坚决反对撤除边防守备。终为元帝所采纳。

侯应这篇对策的核心思想是,在中国古代多民族的环境中,必须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各民族利益相互交错的战略地区,才能确保民族团结与合作、国家安宁与统一。对策中的所谓“北边塞”,就是指汉武帝时沿阴山山脉所修筑的汉长城,亦称汉边塞。其东,与秦代的长城相接,通往辽东;其西,经贺兰山通过河西走廊而到达汉代的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这是当时我国中原农业区、北方游牧区、西部半农半牧区的基本分界线,同时也是关系着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一条生命线。在秦代,由于蒙恬北击匈奴,大修万里长城,控制了阴山山脉,所以匈奴对中原的威胁才无能为力,以致“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①。在汉初,由于匈奴冒顿单于控制了阴山山脉,据此而东征西讨,南攻北伐,烽火直达汉都长安,几乎威胁到西汉王朝的生存。直至汉武帝取得反击匈奴的决定性胜利之后,控制了阴山山脉和河西走廊,修筑了东西万余里的边塞长城及塞外列城,从而使西汉的边患得以解除,使西域各部族邦国得以纷纷内附中原,使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东西方交流的丝绸之路得以开辟和畅通,并为汉宣帝时建置西域都护府、汉元帝时实现“胡汉一家”奠定了基础。正是鉴于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和经验,侯应才坚决反对撤除边防守备。

对策中还深刻指出,即使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胡汉一家”的大好形势下,也必须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因为国内各个不同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生活习性、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在交流合作中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是一个客观存在,只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才能逐渐消融,而克服和解决这类矛盾,既需要有良好的民族团结政策,更需要有强有力的手段和措施,既能制止塞外民族中的破坏势力,也能制止塞内民族中的破坏势力,从而把民族间的交流活动控制在有序规范之内,防止民族间的冲突与战乱的发生。因此,侯应坚决反对撤除边防守备,决不能“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而必须确保各民族交汇地带的安宁。

^① 贾谊《过秦论上》。



由于汉元帝采纳了侯应的对策,较好地处理了边疆民族团结和加强边防守备的关系问题,西汉王朝后期才真正步入了历史上空前的民族大团结的巅峰。在60多年间“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①。直到西汉灭亡之后,王莽为了篡位立威的需要,无端地对周边各民族发动大规模战争,才破坏了民族大团结的大好局面。

^① 《汉书·匈奴传》。



扬雄谏不许单于朝

题引:扬雄(前53~公元18年),一作杨雄,西汉文学家、哲学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累官至太中大夫,著有《方言》、《法言》并词赋等。力主汉与匈奴友好相处,于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上书,劝止哀帝及群臣不许匈奴乌珠留若鞮单于来京朝见汉天子的做法,为哀帝所采纳。本篇选自《汉书·匈奴传》。

【原文】

臣闻《六经》^①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单于上书求朝,国家不许而辞之,臣愚以为汉与匈奴从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远称,请引秦以来明之:

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带甲四十余万,然不敢窥西河^②,乃筑长城以界之。会汉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其后深惟社稷之计,规恢^③万载之策,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余年。……

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④哉?以为不壹劳者不久佚,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卢山^⑤之壑而不悔也。……

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

① 《六经》:六部儒家经典,即《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合称。

② 西河:这里指今宁夏、内蒙古之间自南而北的一段黄河。

③ 规恢:规划恢张。恢,发扬、宏大。

④ 狼望之北:指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地区,即漠北。狼望,匈奴中地名,今址失考。

⑤ 卢山:匈奴中山名,今址失考。卫青、霍去病因大破匈奴有功,死后汉武帝特令卫青墓的造形状似卢山以志纪念,霍去病墓状似祁连山以志纪念。



所相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来厌^①之辞,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

【译文】

我听说《六经》治国的理论,重视在天下未乱之时解决问题;兵家制胜的理论,重视在未战之时做好准备。这两个问题都很微妙,然而处理重大问题的根本,是不能不认真研究的。现在匈奴单于上书请求朝见天子,国家却故意推辞不准他来,我的愚见认为这样做汉与匈奴的关系就从此出现裂痕了。匈奴本是北方的游牧民族,是上古的五帝所不能臣服的,是夏商周三代开国之君所不能控制的,不能使其与我们产生裂痕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我不敢说得太远,请仅举秦代以来的史实来说明这个问题:

以秦始皇的强大,将军蒙恬的威风,率领四十余万大军,然而不敢进窥黄河以西,却大修万里长城以阻隔匈奴。适逢大汉初兴,以高祖皇帝的威灵,率三十万大军被匈奴围困于平城,有的战士一连七天没有饭吃。……后来(武帝)深思巩固江山社稷的根本大计,规划出宏扬千秋万载的决策,才大举兴兵数十万反击匈奴,派遣卫青、霍去病执戈麾师,前后鏖战十余年。……

前代的做法难道是乐意倾尽无数的费用,驱使无事的生命,以求大快人心于漠北吗?而是认为不经一时的辛劳就没有长久的安逸,没有暂时的耗费就没有永久的安宁,所以才将上百万的大军冲入饿虎的口中进行搏斗,运输国库的资财填往卢山的沟壑之中而不悔吝。……

现在的匈奴单于早已归顺于汉,满怀坦诚之心,欲离开其单于庭,朝见于陛下面前,这本是前代遗留下来的政策,祖宗神灵所希望看到的事情,虽然国家为此要花费一些迎来送往的金钱,那也是不得已的。为什么要用上游“来厌”之辞加以拒绝,用疏远的态度让对方等待着遥遥无期的入朝之日,这样就会消损我们从前对匈奴的恩德,大开将来汉匈关系的裂痕!……用百年辛劳换来的汉匈友谊,一日之间消失殆尽,过去不惜靡费十倍的金钱,而今天却去吝爱一成的费用,我为国家这样做而深感不安。唯望陛下能够用些心思想一想未乱先治、未战先胜的道理,以利遏止边患萌生之祸。

^① 距:通“拒”。厌(ya,音压):通“压”,倾覆。来厌:意谓匈奴单于从地势较高的西北方向来入朝,对汉哀帝的身体不利。



【评析】

扬雄谏不许单于朝,与上篇侯应论罢边备,可以称得上是姊妹篇。二者都是在胡汉一家、天下一统的大好局面下,关于多民族国家长治久安的对策。上篇讲的是要由中央政府控制好多民族交汇的敏感地区,防止各民族之间的下层发生矛盾;本篇讲的是中央政府要处理好与少数民族领袖人物的政治关系,防止各民族之间的上层发生矛盾。

自汉宣帝时匈奴臣服于汉开始,每隔若干时段匈奴单于就选择某年的正月初一来到长安,向汉天子朝贺正旦。其礼仪非常隆重,汉廷对单于“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①,并向单于赐予特制的冠带衣裳、黄金玺绶、玉剑佩刀、弓矢棨戟、安车御马,以及大量的黄金、铜钱、衣被、锦绣、绢帛、棉絮。朝见之后,还要专门安排一次渭桥迎驾,由单于及其群臣和各少数民族首领等数万人夹道渭桥之下,待汉天子登上渭桥即山呼万岁而后已。然后单于及其群臣数百人在长安城欢度新年月余后返回。来与去皆有大批汉军迎送至塞上,确保其安全。这些礼仪虽然烦扰,但意义重大而内涵深刻,是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天下和谐的根本标志。但是出人意料,当汉哀帝建平四年(前3年)冬匈奴乌珠留若鞮单于遣使到长安,请求明年正月初一来朝见时,却遭到汉廷君臣的拒绝。哀帝因健康欠佳,认为单于从西北上游方向来入朝,会压垮自己的身体。群臣则认为单于来朝是“虚费府帑,可且勿许”^②。因而对匈奴做出了轻慢无礼的决定。这件事立即引起扬雄(时任给事黄门郎,秩禄仅为四百石的内侍小吏)的关注,乘匈奴使者尚未离京,遂上书于哀帝,提出本篇对策。

对策中深刻指出,“《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处理汉匈关系必须防微杜渐,从源头上遏止边患的发生。匈奴自上古即不臣服于中原,连秦始皇也不得不大修长城加以防范,汉初曾备受其患,直到汉武帝以后,历经百年的斗争,付出无数生命和倾尽国力的代价,才实现了“胡汉一家”、天下太平的宿愿。这个成果实在来之不易,必须备加珍惜和保护,决不能用“来厌”、“虚费”的借口不许匈奴单于来朝。如果由此造成汉匈关系的裂痕,边患一旦发生,其后果不堪设想,代价将是单于来朝的十倍乃至千倍万

① 《汉书·匈奴传》。

② 《汉书·匈奴传》。



倍。

这篇对策使汉哀帝顿时醒悟,立即通知匈奴使者请单于如期来朝。从而进一步维护了西汉末年民族团结、天下安宁的大好局面。



赵充国《屯田制羌疏》

题引：赵充国（前137～前52年），西汉名将，字翁孙，陇西上邦（今甘肃天水）人，历侍汉武帝、昭帝、宣帝三朝，长期同匈奴作战，沉勇有大略，深悉边务，累官至后将军，封营平侯。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以76岁高龄主动请缨，率兵万余往平西羌之叛。在平叛过程中先后五次上书宣帝，两次坚持以政治安抚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平叛方针；三次恳请屯田制羌，终于获得朝廷同意，取得平叛的全胜。本篇为赵充国第四次上书即第二次恳请屯田制羌的奏疏，选自《汉书·赵充国传》。

【原文】

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今虏亡其美地荐草^①，愁于寄托远遁，骨肉离心，人有畔^②志，而明主般师罢兵^③，万人留田，顺天时，因地利，以待可胜之虏，虽未即伏辜，兵决可期月而望。羌虏瓦解，前后降者万七百余，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辈，此坐支解羌虏之具也。

臣谨条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地，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④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⑤，以视羌

① 荐草：肥厚之草。

② 畔：通“叛”。

③ 般师：即班师，罢兵。般，通“班”。

④ 省甲：轻装，指不戴盔穿甲。

⑤ 河湟：指黄河、湟水两流域地，即今甘肃兰州以东西至青海湖一带地区。临羌：汉县，在今青海湟源东南。



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①,五也。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②,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瘕堕之患^③,坐得必胜之道,七也。亡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亡惊动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变之忧^④,十也。治湟狭^⑤中道桥,令可至鲜水^⑥,以制西域,信^⑦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繇役^⑧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国材下,犬马齿衰,不识长册^⑨,唯明诏博详公卿议臣采择。

【译文】

我听说拥有天下政权的国家军队,讲求以万全之策克敌制胜,所以重视谋略的运用而不轻易冒险作战。即使百战百胜,也不是好中最好的事情,所以要首先创造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而等待敌人的可胜之机。游牧民族的习俗虽然与中原的礼义之邦有所不同,然而其趋利避害、热爱亲戚、畏惧死亡的欲望和中原人民是一样的。现在叛羌已经丢掉肥美的草原,遁逃至远方寄托于愁苦之地,其内部骨肉离心,人有叛志,而在此时英明的陛下若能班师撤兵,只留万人屯田,顺应天时,依靠地利,以便等待可胜的叛羌,虽然不能立即使敌人伏诛,但军事上决胜是可以逐月期待而成的。叛羌因战败而瓦解,前后降者已有一万零七百多人,还有七十人接受了我们的嘱托回去做劝降工作,这是我们坐而支解叛羌的工具。

我谨就不出兵追歼远遁的叛羌而留兵屯田的问题,逐条陈述十二项好

① 传世折冲之具:意谓向世人传递战守条件都充分具备的信息。传世,这里指向世人传递信息。折冲,本义是折还敌方战车,这里泛指战斗、攻守而言。具,这里指充分、完备。

② 金城:指汉金城郡郡治允吾,在今甘肃永清西北。

③ 离:通“罹”,遭受。瘕(zhu,音竹):冻疮。

④ 开(qian,音干):我国古代羌族的一支。

⑤ 湟狭:在今青海西宁东南湟水边。

⑥ 鲜水:即鲜水海,指今青海湖。

⑦ 信:读作“伸”。

⑧ 繇役:即徭役。繇,通“徭”。

⑨ 册:通“策”。



处。将步兵九校、官兵一万人,留下来屯田作为武备,因屯田而积粮谷,可以收到武备与德政并施的好处,这是第一。又因屯田兵可以抵抗和击退叛羌,使其无法回归肥美的草原,加速其部众的贫困和破落,从而造成叛羌内部渐生离叛之心,这是第二。老百姓得以耕田种地,不失农业之本,这是第三。一匹军马一个月的食用,料能支付一个屯田兵一年的费用,撤走骑兵可以给国家节省大量经费,这是第四。到明年春天派遣轻装士兵,沿黄河、湟水运输粮谷到临羌,用以向叛羌显示我军粮谷充足,炫耀我军的威武,向世人传递我军战守条件充分而完备,这是第五。用闲暇时间顺流放下以前所砍伐的木材,修治好驿站邮亭,补充入金城以备战时之需,这是第六。如果出兵去追歼远遁的叛羌,逾越险阻只能靠侥幸取胜,不出兵追歼,则使叛羌被迫流窜于环境恶劣的风寒之地,遭受霜露疾病和冻断手指的灾难,我军则深得坐而必胜之道,这是第七。我军得以避免因经历险阻、深远追击敌人所造成的伤亡之害,这是第八。在塞内不损我军威武之师的庄严,在塞外使叛羌得不到有隙可乘之势,这是第九。又不惊动黄河以南的大开和小开等羌族部落,从而避免发生其他事变之忧,这是第十。修治湟水狭谷中的道路和桥梁,使其可以直达鲜水海,以便控制西域,伸威于千里之外,从这里行军通过就像走在自己家中枕席旁边一样,这是第十一。巨大的经费已经节省下来,繁重的徭役也预先停止下来,就可以更好地应对其他意料之外的问题,这是第十二。留下步兵屯田就会得到这十二条好处,出兵追歼叛羌就会失去这十二条好处。微臣我赵充国才能庸下,年老身衰,不懂得长治久安之策,唯望陛下诏令群臣广泛而详细地讨论,从我的建议中采纳选择其可取之处。

【评析】

羌族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自上古时代就和中原人民密不可分。西汉时期的羌人主要游牧在今甘肃、青海一带,分成无数支系,各有酋豪,互不相属,没有统一的君长。西汉前期曾被匈奴征服,后汉武帝击败匈奴,开设河西四郡,割断羌胡联系并平定了羌乱,始内附中原,由汉廷护羌校尉统领。汉宣帝时,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奉旨巡边,诸羌中的先零羌提出,请允许他们渡过湟水,到汉朝金城郡内无人耕田的地方放牧,安国未予拒绝,答应向朝廷请示。后将军赵充国认为这是个严重错误,会引发祸端,因此朝廷没有批准。但先零羌以义渠安国没有拒绝为借口,强行越过湟水,郡县无法禁止,矛盾日益加深。



宣帝元康三年(前63年),先零羌与其他诸羌结盟发誓,并遣使向匈奴借兵,准备进攻河西走廊,切断汉与西域的联系。于是汉廷再次命义渠安国率兵巡边,阻止羌人叛乱的发生。赵充国当即指出,义渠安国不是合适的人选,建议改派他人,朝廷没有采纳。充国还建议,当时金城一带的粮谷每斛八钱,极其便宜,赶紧购屯二百万斛,以便大军随时之需,羌人就不敢轻举妄动;结果大司农仅购置四十万斛,不久被义渠安国率兵巡边用掉一半,所余无几。元康四年,义渠安国率骑兵3000到达金城。其任务本是“巡视诸羌,分别善恶”^①,预遏变乱的发生。但他下车伊始便大施淫威,召集先零羌的首豪30多人一并斩首,纵兵攻击其牧民,斩杀1000多人。于是诸羌震恐而怨怒,矛盾立即激化,在先零羌首领归义侯杨玉等人的策划下,“皆畔犯塞,攻城邑,杀长吏”^②,烽烟顿起。神爵元年(前61年)春,义渠安国惨败,所部几乎被全歼,不得不呼救于朝廷。

对于如何平息这场冲突,汉廷内部赵充国与群臣以及宣帝之间,在认识上存在很大的分歧。赵充国始终坚持平叛要以安抚为主的方针,只对叛乱的主体先零羌作战,不对其他诸羌罕、开等部用兵,力求缩小战争的规模,以利汉羌关系的改善、边防全局的稳定和国家大局的安宁。而群臣及宣帝则强调大举用兵,全面镇压,力求速战速决,尽快平定叛乱。因此,当宣帝首次征询选将平叛的意见时,赵充国自告奋勇地说:“亡(无)逾于老臣者矣。”^③获准委任后,他于神爵元年六月率兵万余到达金城,迅速抢占了战略要地四望峡(今青海乐都西),立即释放了被汉军无端扣作人质的罕、开二部的重要首领之一雕库,并向诸羌明确宣布:天子之兵只诛有罪者,不伤无辜;有罪者可捕斩叛者而立功除罪;凡捕叛立功者皆有重赏。从而瓦解了诸羌之间的联盟,孤立了真正的叛者先零羌。

就在这时,汉宣帝在酒泉太守辛武贤的建议下,做出一个大举进攻罕、开二部的决策。宣帝及群臣认为,先零羌之所以猖狂,全仗有罕、开二部的支持,因而从中央、内郡及河西走廊四郡调集6万大军,命辛武贤率河西之兵由北而南,越祁连山向今青海湖以北进攻;命赵充国率其所部由东而西沿湟水前进,亦向今青海湖以北进攻,与辛武贤共同打击罕、开二部。赵充国认为这

① 《汉书·赵充国传》。

② 《汉书·赵充国传》。

③ 《汉书·赵充国传》。



个决策深为不妥,立即连续两次向宣帝上书,深刻指出:真正的叛乱者是先零,先击罕、开是“释有罪,诛亡辜,起壹难,就两害”^①,必然引起诸羌共叛,兵连祸结,岁久不决,代价巨大;河西走廊的边兵一旦南下,匈奴就会乘虚而犯,威胁河西走廊的安全;北部边塞东西数千里内有众多内附中原的少数民族,见到羌变事态扩大也会动摇起来,影响边防全局的稳定。

经过两次上书,宣帝终于采纳了赵充国的建议,终止了大举用兵罕、开的行动。充国遂按既定方针,于同年七月向孤立的先零羌发起攻势,轻而易举地将其击退至塞外。继而进军罕、开,秋毫无犯,受到诸羌的欢迎;先零羌被迫遁往今青海湖西南遥远的山区,从而取得平叛的基本胜利。

于是,如何解决远遁的先零羌问题又成为赵充国与朝廷之间新的分歧。宣帝明确下诏命充国率兵追击,歼灭余叛;而充国继续坚持以安抚为主的方针,接连3次上书,请求撤退骑兵,只留步兵万人屯田,坐困叛羌,以待其降。3次上书不仅指出了叛羌的必降之势,而且深刻阐述了屯田十二利,对于经营陇右、河西和西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第一次上书时,群臣赞同者为百分之三十;第二次上书时,群臣赞同者为百分之五十;第三次上书时,群臣赞同者为百分之八十。最后,宣帝还是命辛武贤等人发动一次有限的攻势,然后批准了赵充国的《屯田疏》。充国屯田不到半年,叛羌纷纷归降。叛羌原本5万人,在前后作战及遁逃过程中损失1万多人,投诚归附于赵充国者3万多人,至神爵二年五月仅余4000人,不足为患,故充国上表罢兵,结束屯田,振旅而归。归后两个月,余叛群起而杀其叛首犹非、杨玉,全部归顺于朝廷。从而使赵充国的屯田制羌之举,得以收全胜之功而告终。

赵充国的屯田制羌,不同于历史上一般长期戍边的军屯或民屯,而仅仅是由作战部队在执行作战任务过程中所采取的一次特殊的临时措施,作战任务一完成,屯田即告结束。这一措施为什么能够神奇般地收到全胜之功呢?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羌族人民在历史上有长期内附中原的传统,汉、羌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利害冲突,不存在不可化解的矛盾。羌族人民自古就过着以牧羊为主的游牧生活,与中原人民的农耕生活十分接近,彼此的交往源远流长。《竹书纪年》中有“汤十九年,氐羌来宾”的记载;《诗经·殷武》中有“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的诗句;《尚书·牧誓》中周武王伐纣的联军内,明确列有羌人部队的参加;甚至在羌人被匈奴征服之后,有的首领仍然长期为西汉保护

^① 《汉书·赵充国传》。



边塞。所有这些都表明,羌族人民与中原人民有割不断的联系。他们对中原的态度与匈奴人有很大的不同:匈奴人以“天之骄子”和百蛮之长自居,世代代与中原争高下,不到尽头不罢休;羌人则不然,“王政修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①,也就是说,只要中原王朝强大而开明,羌族人民就乐于内附,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而汉宣帝时期正是西汉王朝的中兴时代,法制严明,吏治清明,国力富强。因此,赵充国坚持以安抚为主的方针,符合汉、羌两族人民的根本利益,遂能轻而易举地取得平叛的基本胜利,仅以步兵万人屯田即收得平叛的全胜之功。

^① 《后汉书·西羌传》。



陆贾论长治久安

题引：陆贾，汉初政论家，楚人，有辩才。初以幕僚佐汉高祖刘邦平天下，因见刘邦以武力取天下，需辅以文治安天下，故于汉初提出“文武并用，长久之术”的建议，为刘邦所嘉纳，成为西汉一朝长期奉行的基本国策。后官至太中大夫，历侍高帝、惠帝、高后、文帝四朝。高帝、文帝时两次出使南越，说服南越王赵陀去掉帝号臣服于汉。本篇选自《史记·郿生陆贾列传》。

【原文】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①，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②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③。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怩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译文】

陆贾常常在刘邦面前称道儒家经典《诗经》和《尚书》的治国安邦思想。刘邦听后对他骂道：“你老子我的天下是骑在马上南征北战打出来的，哪里用

① 逆取：以武力征服。这里指殷朝的开国之君商汤用武力夺取了夏朝的政权；周朝的开国之君周武王用武力夺取了殷朝的政权。顺守：行仁义之道以治理国家。这里指商汤和周武王在武力征服天下之后，都是顺应形势的需要以文治来守成天下。

② 智伯：即智瑶，战国初晋国最强大的执政大夫，因不断用武力夺取赵、魏、韩三家大夫的领地，于公元前453年被赵、魏、韩三家联合灭掉。

③ 赵氏：指秦王朝。秦始皇的祖先本为“嬴”姓，但其中有一支在西周被封在赵城，姓赵氏。故史称秦、赵同姓，秦始皇嬴政亦称赵政。



得着《诗经》和《尚书》的理论!”陆贾回答说:“您可以骑在马上打天下,难道也可以骑在马上治天下吗?商汤和周武王都是先以武力征服天下,然后顺应形势的需要以文治来守成天下,文治与武功并用,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好办法。从前吴王夫差和晋大夫智瑶,都因极力炫耀武功而导致灭亡;秦王朝一味峻法酷刑而不改变,最终亦导致灭亡。假使秦朝在统一天下之后,施行仁义之道以治国,效法古代圣君贤王的榜样,那么,陛下您又怎么能够取得天下呢?”刘邦听后心情不快,脸上露出惭愧之色,便对陆贾说:“那就请你尝试着给我总结一下秦朝之所以失天下、我朝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在哪里,以及古代王朝成功与失败的原因所在。”于是陆贾就大略地概述了历史上国家兴衰存亡的征兆和原因,总共写了十二篇。每上奏一篇,刘邦无不给予称赞,左右群臣皆呼万岁,把陆贾这部书称为《新语》。

【评析】

这篇对策虽然很短,但却道出了秦汉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文武并用”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所谓“文武并用”,就是把政治手段与军事手段结合起来,把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结合起来,把施惠于民与平暴诛乱结合起来。这一经验完全来源于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并为而后的西汉历史所完全证实。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统一而先进的封建王朝,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上升发展阶段。它所开创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基本上为而后的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影响长达2000余年。它吞灭六国、统一中原、南平百越、北击匈奴,显示了无比强大的实力。它统一文字、统一车轨、统一度量衡,显示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但为什么只存在短短15个年头,就被人民大起义所推翻而彻底灭亡了呢?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完成统一大业之后,在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偏差:只用武而不用文。

秦代的统一,是商鞅变法后历经100多年的奋斗,在强化法制、力行耕战、富国强兵的基础上以武力兼并而实现的;这就是陆贾对策中所说的“逆取”,即用武力夺得了全国政权,并非天下自动接受其统治。逆取之后的根本问题是要顺应民心,施惠于民,取信于民,获得人民的拥护才能巩固政权,也就是对策中所说的“以顺守之”。武用于逆取,文用于顺守,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不可偏废。而秦王朝则相反,统一后坚持用打天下的手段治天下。



在政治上单纯依赖暴力维护其统治,完全忽视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①的作用与意义。不讲仁义道德,否定历史文化,直至焚书坑儒,灭绝人性。把以法治国的传统思想绝对化、极端化、片面化,滥施淫威,大搞酷法严刑,力行高压政策,人民群众动辄获罪,以致“刑戮相望于道”^②,杀人如麻,民不堪命。在经济上不是施惠于民,扶贫救困,而是横征暴敛,“收泰(大)半之赋”^③。为了保障急功近利和骄奢淫逸之需,先侵“贫人贱民”,次侵“富人吏家”,后侵“宗室大臣”,以致“亲疏皆危,外内咸怨,离散逋逃,人有走心”^④。在全国总人口仅 1000 多万的情况下,南戍五岭用兵 50 万,北防匈奴用兵 30 余万,修筑长城和直道投入民力 50 万,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墓投入民力 70 余万,平均每年服兵役和劳役者达 200 万人以上,几乎所有的青壮年被征调一空,以致社会简单再生产都难以为继。广大人民群众走投无路,敢怒而不敢言,遂引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不到 3 年就推翻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

秦亡于暴,正是针对这一教训,陆贾才向刘邦提出“文武并用,长久之术”的对策。这一历史教训,继陆贾之后又有贾山、贾谊、晁错、严安、徐乐等众多政论家反复提出,因而成为西汉前期最高统治者长鸣不止的警钟。

陆贾的对策被刘邦采纳后,对西汉王朝的历史影响长达 170 多年。从此,在“汉承秦制”的基础上,确立了“文武并用”的安邦思想,不断取得惊人的成就。汉初,在经济残破、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厉行无为政治 70 年,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施惠于民,取悦于民。以农业税为例,高帝时规定十五税一(即 6.66%),不仅与秦代的“泰(大)半之赋”有天壤之别,而且比先秦传统的什一之税(即 10%)还减轻了一半。文帝时曾连续 13 年免除农业税,开创了一大历史奇迹。景帝把三十税一(即 3.33%)立为汉代定制,又比高帝时减轻了一半,一直被沿续到东汉末年,由此产生了“人心思汉”的长期效应。随着民心的稳定,经济的恢复,国力的增强,自高帝至景帝先后用武力平灭了异姓诸侯王与同姓诸侯王的大规模叛乱,多次击退匈奴的大举进犯,从而全面巩固了西汉王朝的统治,并创造出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的盛世。由此可知,汉初的所谓“无为政治”,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为与有为的辩证统一,

① 《尚书·五子之歌》。

② 贾谊《过秦论》。

③ 《汉书·食货志》。

④ 《汉书·晁错传》。



文治与武功的相辅相成。正如老子所言：“无为而无不为。”^①即先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直至无所不能为。到了汉武帝时，国力空前强大，遂改无为政治为有为政治。一方面大兴文治，全面恢复先秦时期的传统思想文化，创设太学，以儒家理论为正统，确立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力行“王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持之以法；广纳人才，既用廉明的“循吏”以安民，又用强悍的“酷吏”以除奸。另一方面则大建武功，改革军制，强化武备，连续对匈奴用兵30多年，解除了边患，控制了西域，开拓了四裔，新建27个边郡，极大地促进了中原与边疆的统一，从而把西汉王朝推进到鼎盛时代。昭帝、宣帝时继续遵行文武并用的思想，全力巩固武帝时期的成就，终于降服匈奴，实现“胡汉一家”，天下和平。

但是，文武并用的原则到元帝时出现了偏差。元帝自幼“柔仁好儒”、“优游不断”，身为太子时就反对宣帝“持刑太深”，建议“宜用儒生”。宣帝曾严厉地斥责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乱我家者，太子也！”^②所谓“霸王道杂之”，也就是文武并用的思想，既重视以德治国，柔道安邦，又重视严明法纪，强化武备，二者不可偏废。果然如宣帝所料，元帝一即位就单纯用文，外则委政于不达时务的儒生，内则听命于宦官的摆布，以致大权旁落，朝纲不振，法纪败坏，贪腐日甚。元帝死后，皇权累代落入外戚王氏家族的手中，直至王莽篡位而西汉灭亡。

① 《道德经·三十七章》。

② 《汉书·元帝纪》。



刘秀论出击匈奴

题引:刘秀(前6~公元57年),即汉光武帝,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字文叔,汉高祖刘邦第九代孙。早年游学长安,习《尚书》。中年参加农民起义军,推翻新莽政权。后经营河北,独立发展,平定群雄,创建东汉王朝。统一天下后坚持“柔道”安邦的思想,内则销兵减政,退功臣而任文吏,与民休息;外则筑垒严边,加强守备,致力于“和戎”。直至匈奴连年荒旱、疾疫、内乱,疲困不堪,亦不肯兴师出塞以清边患。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开国功臣臧宫、马武联名上书请灭匈奴,被刘秀以诏书作答,严词拒绝。本篇选自《后汉书·臧宫传》。

【原文】

宫以谨信质朴,故常见任用。后匈奴饥疫,自相分争,帝以问宫,宫曰:“愿得五千骑以立功。”帝笑曰:“常胜之家,难与虑敌,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宫乃与杨虚侯马武上书曰:“匈奴贪利,无有礼信,穷则稽首,安则侵盗,缘边被其毒痛,中国忧其抵突。虏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①,疫困之力,不当中国一郡。万里死命,县^②在陛下。福不再来,时或易失,岂宜固守文德而堕武事乎?今命将临塞,厚县购赏,喻告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北虏之灭,不过数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谋臣狐疑,令万世刻石之功不立于圣世。”诏报曰:“《黄石公记》^③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

① 赤地:指旱灾与虫灾严重,地面光赤,寸草不生。

② 县:通“悬”。

③ 《黄石公记》:汉代道家学派的重要著作,是刘秀取天下、安天下、治天下的主要思想理论基础。从刘秀所引该书的内容看,与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中的《黄石公三略》(亦称《三略》)文字基本一致,似为《三略》一书的滥觞。



德之君,以所乐乐人^①;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②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③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

【译文】

臧官由于严谨诚信而朴实,所以常常得到刘秀的信任和重用。后来匈奴发生饥疫,内部互相分争,刘秀问计于臧官。臧官回答说:“我愿得到陛下的恩准,率领五千骑兵就可以大立边功。”刘秀笑着说:“你是常胜将军,看来很难与你共同谋划应敌的长久之策,我将自己独立思考这个问题。”建武二十七年,臧官又与杨虚侯马武联名上书说:“匈奴人贪利,没有礼义诚信,走投无路时就附汉称臣,内部安稳下来就犯境掳掠,沿边各郡深受其害,中原内郡亦深恐其来攻。现在匈奴因疾疫严重而人畜大量死亡,因旱灾、虫灾严重而大地光赤,病困的实力,抵不过中原一郡。其在万里之外的生死命运,完全掌握在陛下手中。这样的好运气不会再来,机会有时候很容易失去,怎么能只宜固守文德而放弃武功呢?现在应该任命将帅,率兵屯边,高悬优厚的奖赏购求杀敌之功,告知高句骊、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的武装,进攻匈奴的左侧;调发河西走廊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四郡的兵力以及天水、陇西二郡的羌人武装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武装,进攻匈奴的右侧。如此部署,匈奴的灭亡,不过数年时间。臣等实在担心,陛下以仁德的胸怀不忍心乘危兴师灭敌,又担心

① 以所乐乐人:前一个“乐”字是名词,即音乐,指国家所推行的“乐教”。后一个“乐”字是动词,即使人快乐,指国家通过“乐教”让人民过和谐快乐的生活。

② 灾变:这里特指天象的异常变化,如日蚀、月蚀、彗星等等。

③ 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zhuan,音专)臾:语出《论语·季氏》,意谓忧患在内不在外。季孙,春秋后期累世专鲁国之政的贵族季孙氏,这里特指鲁哀公时的季康子(季孙肥)。颛臾,鲁国附庸,临近季孙氏的私邑,季康子欲用武力攻取而据为己有,因而遭到孔子的批评。孔子深刻指出,季孙氏的真正忧患在其内部而不在外部。后来果然发生鲁哀公奔越之事,企图求助越国伐鲁而除掉季孙氏以及孟孙氏、叔孙氏等三家贵族(三家皆鲁桓公少子季友之后,史称“三桓”)。



朝中的谋臣们狐疑不决,从而使万世刻石的历史功勋不能建立于当今的圣明之世。”刘秀以诏书作答如下:“《黄石公记》说,‘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而适当是美德,刚而不当是灾殃,柔弱者是仁人义士所救助的对象,逞能者是众怨所归的目标。所以说有道德的国君,总是用其所制作的音乐来陶冶人们使民众快乐,没有道德的国君,总是用其所制作的音乐来陶醉自己使自身快乐。能使民众快乐的国君,才能获得国家长治久安的快乐;只图自身快乐的国君,很快就会国灭身亡。不搞好内政而图谋向外扩张的人,必然徒劳而无功;不向外扩张而致力于搞好内政的人,必然安逸而善终。使人民安逸的政治会出现很多忠良之臣,使人民徒劳的政治会产生很多祸乱之人。所以说热衷于扩张领土的人,内政必然荒废;热心于广施德政的人,国家必然会盛强。能保有自己正当权益的人,会获得安宁;贪求别人正当权益的人,会招来祸殃。实行残暴的政治,即使暂时成功也终必失败。现在国家的政治状况还不够良好,天象的灾变不断发生,老百姓有时惊恐不安,人心还不够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还怎么能想出兵到边塞之外去建立武功呢?孔子曾说过:‘我担心季孙氏的真正忧患,并不在外部的颛臾。’况且匈奴还很强大,边防屯田警备部队所获的传闻消息,往往与事实不符。倘若动用天下国力的一半而能消除心腹大患,那当然最好不过;但如果时机不对,还不如息事宁人为好。”从此之后,诸位开国将领再也无人敢于进言用兵之事了。

【评析】

光武帝刘秀的这篇诏书,是对开国功臣臧宫、马武上书请灭北匈奴所作的回答,深刻反映了刘秀坚持以德立国、“柔”道安邦的思想和决策。

东汉王朝是在农民大起义中推翻新莽政权,进而平定天下群雄建立起来的。臧宫、马武的上书提出于建武二十七年,当时统一战争已经结束14年,社会经济生活已基本恢复正常,人心已基本稳定,政权也完全巩固,开国以来时而骚扰东北边防的乌桓、鲜卑、高句骊等少数民族的武装皆已内附中原,一度严重威胁北部边防的匈奴已经分裂,南匈奴投诚归汉,只有北匈奴不肯屈服,但经连年灾害,人畜疫死,虚疲孤弱,常常被南匈奴和鲜卑击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臧宫、马武才提出联合各少数民族武装共灭北匈奴。由于这个建议同刘秀的以德立国、柔道安邦的方针相抵触,结果被全盘否定。

刘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开国皇帝,不仅在军事上身经百战,深谙兵法,善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尤其在政治上笃信孔子与老子的



学说,坚持以德立国、柔道安邦的理念,是一位知兵而不好战的军政统帅。早在称帝之前经营河北之时,刘秀就和他的同学邓禹(位列云台二十八将之首的开国元勋)商定了以德立国的大计——“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①。称帝之后,正当统一战争激烈进行时,于建武六年(公元30年)开始大规模销兵减政,首先恢复西汉三十税一的惠民政策,然后在其已直接控制的区域内(今华北、淮南、淮北、江汉、关中地区及东北部分地区),“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即精减90%的政府官员,极大地减轻了人民的经济负担;建武七年又下达诏令:“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即撤销了内郡常备的地方部队,改为有事临时征兵,从而极大地减轻了人民的兵役负担,并同时罢除了内郡(国)主管军事的都尉官,并职于太守(国相)^②。平灭群雄时则力求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先后以和平方式统一了河西走廊以及江南和岭南的大片国土。当不得不使用武力时,“每一发兵,头须为白”^③。

建武十三年,统一战争一结束,刘秀就立即退功臣而任文吏,大封开国功臣,让他们高高兴兴地交出兵权,退出政界,以列侯就国,时“奉朝请”而入京议事,从而预防西汉初期那种功臣拥兵、诸侯割据之患的发生。上自三公九卿下至郡守(国相)县令,全部由文吏担任,并以严明的法制约束他们,以利大兴文治,强化中央集权。不久,刘秀即正式宣布:“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④不论内政或国防,皆一以贯之。自建武十四年至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各国先后3次遣使来朝,自愿归汉,请求汉廷派出西域都护,率领汉军,对抗匈奴,保护西域。刘秀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⑤,皆婉言谢绝,赐以厚赏,退归西域各国送来的侍子(以国王之子为人质),史称“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⑥。这时恰逢匈奴(以及鲜卑、乌桓、高句骊)连年犯境,“北边无复宁岁”^⑦,汉军屡战不利。刘秀一方面下令筑垒防御,用自己亲自设计的战车

① 《后汉书·邓禹传》。

②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③ 《后汉书·岑彭传》。

④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⑤ 《后汉书·西域传》。

⑥ 《后汉书·臧宫传》。

⑦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可驾数牛，上作楼橹，置于塞上，以拒匈奴”；同时又利用政治、经济手段加紧与北方各少数民族的交往，友好往来，积极地致力于“和戎”，史称“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①。成效异常显著，自建武二十二年至建武二十五年，乌桓、高句骊、南匈奴、鲜卑接连内附于汉，造成一个各民族联合对抗北匈奴的局面，北匈奴为形势所迫，亦时臣时叛，东汉的北部边患基本解除。于是刘秀下诏书“罢诸边郡亭候吏卒”^②，进一步与民休息。从此他更加厌武喜文，绝口不言兵事，经常与群臣讲论儒家的六经到半夜。太子刘庄（即汉明帝）劝他多注意休息，他说：“我自乐此，不为疲也。”太子刘庄向他请教军事问题，他说：“昔卫灵公问陈（阵），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③也就是说，他只向自己的接班人传授政治而不传授军事。总之，内则销兵减政，退功臣而任文吏，致力于与民休息，外则怀柔天下，不尚武功，致力于和戎。这就是光武帝刘秀以德立国、柔道安邦的基本内涵。

这一思想对东汉王朝的影响至为深远而重大，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其积极的意义就在于适应了东汉初期历史发展的需要。自新莽后期以来，天下大乱 20 年，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社会生产需要恢复，社会秩序需要重建，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需要调整与缓和，否则，国家就无法走向繁荣、昌盛和统一。刘秀以德立国、柔道安邦的思想恰恰是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一副良剂，很快就缓和了内外各种矛盾，不仅从根本上巩固了东汉政权，而且顺利地由天下大乱实现了天下大治，再也没有像西汉初期那样经历一个长期内外交困的阶段。建武中元元年（公元 56 年），刘秀终于登临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祭告天地，宣示自己生平之志如愿以偿。次年正月，即临终前一个月，接受了倭奴国使者飘洋渡海来朝，赐予“汉委（倭）奴国王”金印一枚，这是中日两国政府之间首次友好往来。

但是，以德立国、柔道安邦的思想亦有其致命的弱点，即崇文抑武的倾向严重制约着东汉王朝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因为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论单纯依靠“文”的手段或单纯依靠“武”的手段，都不能长治久安，惟有把两种手段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克服矛盾，不断前进。刘秀大搞销兵减政、退武用文，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内无重臣、

① 《后汉书·臧宫传》。

②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③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外无良将,极大地削弱了东汉中期以后的内政与国防,逐渐失去解决各种危机与矛盾的能力。内无重臣则必然导致朝纲不振,政治腐败。自汉和帝开始,接连 11 个皇帝即位时都是年仅几岁、十几岁的少年儿童,有的甚至是出生不久的婴儿,不得不由母后临朝,外戚专权。小皇帝长大后,又不得不依靠身边的宦官打倒外戚,改由宦官专权。这一斗争长达百年,成为无法根除的政治毒瘤,直至东汉的灭亡。外无良将则必然边患不止,天下不安。汉和帝时虽然依靠各民族的联合力量彻底战胜了北匈奴,重新控制了西域,但好景不长,转瞬即逝。紧接着鲜卑与乌桓强大起来,时臣时叛,汉军无力有效地控制边塞。南匈奴与高句骊亦偶尔叛汉。通往西域的道路很快即被大规模的羌变切断,几经反复,不得不从西域撤出。大规模的羌变发生在汉安帝即位之初,先后 3 次,历经安、顺、冲、质、桓、灵六帝,长达 63 年,祸及今青海、甘肃、陕西、宁夏的广大地区及河北、河南、四川的部分地区。羌变虽然最后被镇压下去,但东汉政府已耗尽国力,阶级矛盾激化,黄巾大起义爆发。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历史由大一统时代进入了大分裂时代。

因此,刘秀以德立国、柔道安邦的思想,虽然在东汉初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积极的意义永远值得借鉴;但其消极的影响更值得人们深思和戒免。东汉前期及其以后的统治者只知因循守旧,不知与时俱进,这才是教训的真正所在。正如后人所言:“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与武也;用武则先威,用文则先德,威德足以相济,而后王道备矣。”^①

^①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九州春秋》。



屯屠何上书求破北成南

题引：屯屠何(? ~ 公元 93 年)，即南匈奴休兰尸逐侯鞬单于，是西汉时首次降汉的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犍之曾孙，东汉时降汉的南匈奴醯落尸逐鞬单于比之子。于汉章帝章和二年(公元 88 年)继立为单于，随即上书朝廷，请求派兵助其讨伐北匈奴，“破北成南，并为一国”。这一建议被采纳后，在汉将窦宪的统一指挥下，取得彻底战胜北匈奴的辉煌胜利，为东汉王朝统一大漠南北和西域做出了重要贡献。本篇选自《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原文】

臣累世蒙恩，不可胜数。孝章皇帝圣思远虑，遂欲见成就，故令乌桓、鲜卑讨北虏，斩单于首级^①，破坏其国。今所新降虚渠等诣臣自言：“去岁三月中发虏庭，北单于创刈南兵^②，又畏丁令、鲜卑，遁逃远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③等复共立单于异母兄右贤王为单于，其人以兄弟争立，并各离散。”臣与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帅杂议方略，皆曰宜及北虏分争，出兵讨伐，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令汉家长无北念。又今月^④八日，新降右须日逐鲜堂轻从虏庭远来诣臣，言北虏诸部多欲内顾，但耻自发遣^⑤，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击，必有响应。今年不往，恐复并壹。臣伏念先父归汉以来，被蒙覆载，严塞明候，大兵拥护，积四十年。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虽垂拱安枕，惭无报效之地。愿发国中及诸部故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师子、

① 斩单于首级：指汉章帝章和元年(公元 87 年)鲜卑大破北匈奴，“斩优留单于，取其匈奴皮而还”，致使北匈奴大乱，南下降汉者达 58 部 28 万余人。

② 创刈：即创艾，惩戒、打击。南兵，指鲜卑、乌桓及南匈奴的部队。

③ 骨都侯：匈奴官名，分左右，由异姓贵族担任，地位在同姓的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之下，是单于的辅政近臣。

④ 今月：指汉章帝章和二年(公元 88 年)七月。

⑤ 发遣：使离去。这里指空手无功而奔投南匈奴，降服于汉朝。



左呼衍日逐王须訾将万骑出朔方,左贤王安国、右大且渠王交勒苏将万骑出居延,期十二月同会虏地。臣将余兵万人屯五原、朔方塞,以为拒守。臣素愚浅,又兵众单少,不足以防内外。愿遣执金吾耿秉、度辽将军邓鸿及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圣帝威神,一举平定。臣国成败,要在今年。已敕诸部严兵马,讫九月龙祠^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

【译文】

我们南单于家世代代蒙受大汉的恩德,简直不可胜数。孝章皇帝圣明,深谋远虑,于是想看到成就南匈奴并吞北匈奴的大业,所以他才命令乌桓、鲜卑攻讨北匈奴,斩了优留单于的人头,破坏了其立国之基。现在所有新近投降来的北匈奴虚渠等部的头领都来对我说:“从去年三月中旬开始,北单于离开单于庭(今蒙古乌兰巴托);因挫败于南方各军,又怕丁令、鲜卑来攻,便遁逃远去,依附于安侯河(今蒙古鄂尔浑河)西岸。今年正月,留守在单于庭的骨都侯等众臣,又拥立了北单于同父异母之兄右贤王为单于;而其各部民众,因两单于兄弟之间争立,都各自离散而去。”我与南匈奴诸王、骨都侯及新从北匈奴投降过来的各部头领共同商讨方针大计,都说应该乘北匈奴分争之机,出兵讨伐,灭掉北匈奴,成就南匈奴,把南北合并为一国,让大汉江山永无北顾之忧。另外,本月八日,新投降的右须日逐部的头领鲜堂轻从单于庭远来见臣,他说北匈奴各部大多数都想内附中原,但以空手无功而自动来投为耻,所以才没有来投者。如果我方出兵攻击北匈奴,那就会有很多人奋起响应。今年如不出兵进攻,分裂的北匈奴恐怕就会重新合并统一起来。我退而自思,自从先父馱落尸逐鞬单于归汉以来,蒙受大汉的覆育包容,整备要塞和烽燧,派大军加以保护,已经长达四十年。我和我的部属都生活在大汉的土地上,张口依赖朝廷供应粮食,一年四季朝廷给我们的赏赐,动辄亿万之多,我们虽然生活得很安闲,但以不得为朝廷报恩效死而惭愧。志愿调发我直属的国内精兵、我所属各部的精兵、我从前旧部的精兵和新从北匈奴来降的精兵,派遣左谷蠡王师子和左呼衍日逐王须訾共同率领一万骑兵出朔方(郡治今内蒙乌拉特前旗东南),左贤王安国和右大且渠王交勒苏共同率领一万骑兵出居延(国治今内蒙额济纳旗东南),向他们约期十二月共同会师于北

^① 龙祠:古代匈奴单于大会龙城,祭祀天地鬼神。



匈奴之地。我率领其余的一万骑兵屯驻于五原(郡治今内蒙包头西北)、朔方两郡的边塞,以防敌人来攻。我一向愚陋浅薄,加之兵力寡少,不能满足内防外攻的需要。希望朝廷派遣执金吾耿秉、度辽将军邓鸿以及西河(郡治今内蒙东胜东南)、云中(郡治今内蒙托克托东北)、五原、朔方、上郡(郡治今陕西榆林南)太守率兵并力北进,令北地(郡治今甘肃庆阳西北)、安定(郡治今甘肃镇原东南)太守各率兵屯要害之处,借助于孝章皇帝尊严的神灵,一举平定北匈奴。我们南匈奴国的成败,关键就在今年。我已命令各部整顿兵马,到九月龙祠时,全部集中到黄河岸上。唯求陛下决断审查。

【评析】

东汉前期的主要边患来自于北匈奴。北匈奴直接控制着漠北,间接控制着西域,在汉明帝时期多次进犯东汉的河西地区和北部边境,“朝廷以为忧”^①。明帝晚年曾决心要以武力解决,但刚刚取得初战的胜利,明帝即病死,汉军即撤归,未竟其功。章帝时没有出兵北击,但内附中原的鲜卑却在章帝末年给了北匈奴以严重打击,以致北匈奴大乱,分裂为两单于互相争立,上下离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匈奴屯屠何单于才于章和二年七月上书朝廷,提出发兵消灭北匈奴的对策。这时章帝已死5个月,新即位的和帝年仅10岁,窦太后临朝听政。窦太后一方面考虑到北匈奴有可灭之势;另一方面考虑到其兄窦宪犯有杀害刘氏皇室之人的大罪,为了让窦宪立功赎罪,就批准了屯屠何的请求,以窦宪为车骑将军,统一指挥北伐。

屯屠何对策的核心思想是“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令汉家长无北念”。也就是消灭北匈奴,由南匈奴取而代之,走西汉呼韩邪单于的道路,永为汉臣,胡汉一家,天下一统。这一思想深刻反映了中国古代各民族关系的大趋势,即团结、合作与统一。对策中指出,不仅南匈奴诚心归汉,北匈奴各部的大多数人,也乐于内附中原。因此,这一对策被朝廷采纳后,战争的进展非常顺利。南匈奴全力以赴,出动3万骑兵,东汉中央部队与边防部队亦全力以赴,出动16000骑兵。历时不过3年,主要战役不过3次,北匈奴即被彻底打垮,北单于负伤远遁,莫知所终,其人民则纷纷投诚归汉。汉军创造了出塞5000里的历史记录,堪称是东汉军事史上很辉煌的一页。

但是,这一胜利并未使东汉王朝进一步发展强大起来,反而逐渐步入多

^①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事之秋的时代。战后,在窦宪的阻挠下,南匈奴并未返归漠北,仍然留驻在塞内。塞外漠南之地分别为乌桓、鲜卑、高句骊控制,漠北之地全部被鲜卑占领。新的矛盾随之而来,东汉政府没有足够的军队安边,只得继续以柔道羁縻之。内政方面则每况愈下。窦宪以平灭北匈奴之功升任大将军,首开东汉外戚专政的历史,欲图谋不轨加害于和帝。和帝与宦官密谋,虽然除掉了窦宪,但又开了东汉宦官干政、封侯的先例。和帝活到 27 岁即早亡,留下一个刚出生百余日的殇帝即位,从此东汉再也不能一振军威和国威。

导致上述后果的根本教训,就在于东汉前期没有像西汉前期那样厉行富国强兵的改革。开国之初销兵减政、与民休息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永远无所作为。明、章、和三帝在位共 43 年,“齐民岁增,辟土世广”^①,经济上空前繁荣,恰是军政改革的良机。但是,“明帝察察”^②,只强化一点法制;“章帝长者”^③,只增施一点仁政;和帝“率由前则”^④,一点改革都没有,所行仍然是开国初期销兵减政之策,内无重臣外无良将的局面毫无改变,所以东汉王朝的历史命运,自中期开始便江河日下。

① 《后汉书·和帝纪》。

② 《后汉书·章帝纪》。

③ 《后汉书·章帝纪》。

④ 《后汉书·和帝纪》。



班超《请兵平定西域疏》

题引：班超(公元32~102年)，东汉名将，字仲升，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著名史学家班固之弟。初以缮写为生，后投笔从戎，于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率36人出使西域，同北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展开长期斗争。章帝建初五年(公元80年)上书请兵，得朝廷遣兵千人相助，遂陆续消灭各敌对势力，使西域50余国全部归汉。后任西域都护，封定远侯，遣使西行四万里，全面开通东西方丝绸之路。在西域前后奋斗历时31年。本篇选自《后汉书·班超传》。

【原文】

臣窃见先帝^①欲开西域，故北击匈奴，西使外国，鄯善、于阗即时向化。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实愿从谷吉^②救命绝域，庶几张骞^③弃身旷野。昔魏绛^④列国大夫，尚能和辑诸戎，况

① 先帝：指汉明帝。明帝于永平十六年发兵击败北匈奴，不久重置西域都护。十八年，明帝死，章帝立，北匈奴卷土重来，都护陈睦被害，汉军不久即撤离西域北道。

② 谷吉：西汉元帝时卫司马，于初元五年(前44年)奉命护送匈奴郅支单于之子回国，力驳群臣只送到边塞为止的建议，坚持要送到漠北单于庭以利汉匈修好。临行前曾言，如遇不测，“没一使以安百姓，国之计，臣之愿也”。到漠北后果被郅支单于杀害。郅支单于自知负汉，率部远徙中亚，不久被汉军诛灭。

③ 张骞(?~前114年)：西汉汉中成固(今属陕西)人。武帝时两次出使西域，远至中亚很多地方，史称“凿空”。往返途中被匈奴拘留11年，备历艰辛。对加强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发展汉朝与中亚各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东西方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官至大行令，爵封博望侯。

④ 魏绛：即魏庄子(《左传》)、魏昭子(《史记》)，春秋中期晋国大夫、六卿之一。当时中原地区存在不少戎人部落和某些戎人之国，常常与中原各诸侯国发生冲突。晋悼公五年(前569年)，晋国北邻的山戎之国无终遣使请和，悼公不欲和戎而欲伐戎。时任新军副帅的魏绛，力陈“和戎有五利”(大意是有利于互市、农功、威怀诸侯、休整军备、天下和平)，为悼公所采纳。遂由魏绛主盟，“以德绥戎”。从而使晋国“八年之中，九合诸侯”，重霸天下。



臣奉大汉之威，而无铅刀^①一割之用乎？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唯焉耆、龟兹独未服从。臣前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备遭艰厄。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载，胡夷情数，臣颇识之。问其城廓大小，皆言“倚汉与依天等”。以是效之，则葱岭可通，葱岭通则龟兹可伐。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以步骑数百送之，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间，龟兹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臣见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间地，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为龟兹所置，既非其种，更相厌苦，其势必降反。若二国来降，则龟兹自破。愿下臣章，参考行事。诚有万分，死复何恨。臣超区区，特蒙神灵，窃冀未便僵仆，目见西域平定，陛下举万年之觞，荐助祖庙，布大喜于天下。

【译文】

我个人的浅见，孝明皇帝想要开通西域之道，所以才发兵北击匈奴，派遣汉使西行外国，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等国即时内附中原。现在拘弥（今新疆于田一带）、莎车（今新疆莎车一带）、疏勒（今新疆喀什一带）、月氏（在今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乌孙（在今伊犁河流域）、康居（在今中亚锡尔河中游地带）等国也都愿意归附我朝，想与我们共同合力破灭龟兹（今新疆库车），平定通往入汉之道。若能取得龟兹，则西域各国不肯归服者就只有百分之一了。我退而自思，自己不过是个卒伍小吏，实在是愿意像谷吉那样为国家效命于绝远的荒域，希望像张骞那样为国家委身于旷野山林之中。从前的魏绛，只不过是中原列国中的一个大夫，尚能和辑诸戎而振兴晋国，更何况我奉大汉一统天下之威，而不能以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国家发挥一些作用吗？前代论议者们的普遍说法，都把争取西域三十六国归汉号称为断匈奴右臂。现在的西域诸国，远自太阳入山之处始，没有不向往归附汉朝的，大国小国都高高兴兴，前来朝贡者络绎不绝，唯独焉耆与龟兹不肯归附。我从前与部下三十六人奉命出使西域，自从孤守疏勒以来，迄今已经五年，各城邦国的情况与底细，我都比较清楚。问他们各自城邦国的大小，他们都说“倚托大汉的保护像依赖苍天的保佑一样重要”。以此验证，那么与葱岭（指今帕米尔高原）各国都可以通好，与葱岭各国通好就可以讨伐龟兹。现在应该将前龟兹王送来的侍子白霸册封为龟兹王（取代匈奴人所立

^① 铅刀：铅质的刀，言其不锋利。比喻人的才能微弱，多用于自谦。



的今龟兹王),用步兵、骑兵数百人护送他,同时与西域各国的军队联合,时间不用很久,就可擒俘现在的龟兹王。用团结边陲各族人民的方法去战胜边陲的敌对者,这是很好的策略。我还看到莎车至疏勒之间土地肥沃而广阔,草原牧场富饶而盛多,与敦煌至鄯善之间的荒漠情况完全不同,在这里屯兵不需中原供应而能使军粮自给自足。况且姑墨(今新疆温宿、阿克苏一带)、温宿(今新疆乌什一带)二国的国王,都是由龟兹专门派来的,与姑墨、温宿人不是同一个种族,人们非常讨厌他们,其势必然会有降汉反叛之事发生。如果姑墨、温宿二国前来降汉,那么龟兹就会不攻自破。我班超不过是非常渺小的一身,特蒙神灵的保佑,私自切望不会很快地老死,能够亲眼看到西域地区得以平定,陛下举起万寿无疆的杯酒,向祖庙进献殊勋,向天下宣告特大的喜讯。

【评析】

班超这篇请兵平定西域的对策报告,上书于章帝建初五年,当时正是西域形势早已逆转、班超处境最为艰难之时。他于汉明帝永平十六年投笔从戎,参加汉军反击北匈奴的战争。在汉军攻占西域北道、将要重新设置西域都护时,班超以假司马之职奉命率 36 人出使西域南道。到鄯善,他以“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的胆略,攻杀了匈奴使团 130 余人,慑服了鄯善王。继而用各种惊人的手段除掉了于阗、疏勒等国的匈奴势力,并广布汉德,招抚南道诸邦全部纳质归汉。不料风云突变,永平十八年北匈奴重新攻占西域北道,龟兹、焉耆叛汉,都护陈睦被害。章帝建初元年(公元 76 年)汉军奉命撤出北道,并命班超奉旨回京,西域形势全面恶化。然而班超却已无法东归。南道人民认为,汉使一走,匈奴必来,所以大家抱住班超的马脚不肯放行,号泣而言:“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①为挽留班超,疏勒的都尉甚至“以刀自刭”。班超遂下定决心,抗旨不归,与南道人民共拒匈奴,孤守疏勒 5 年,多次击败匈奴势力的进攻和叛乱。在 5 年的逆境中班超看到的不仅仅是黑暗,尤其看到了无限的光明与希望,即西域各城邦国的人民,无不诚心附汉,南道如此,北道如此,葱岭及其以西也是如此,只要获得汉军的相应支持,就能击败匈奴势力,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班超才上书请兵平定西域,获章帝的同情遣兵千人相助,经营西域的事业才得以继续下去。

^① 《后汉书·班超传》。



这篇对策报告,深刻反映了东汉前期经营西域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其一,光武帝主动放弃西域,给子孙留下了后患。西域自汉武帝时内附中原,至新莽末年天下大乱时被匈奴控制。因“匈奴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于东汉初年纷纷要求内附。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一次竟有18国遣子入侍,请求汉朝派出都护管理西域。然而光武帝刘秀“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①，“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②,主动放弃了西域。结果西域不久被北匈奴控制,到明帝时成为重要边患。北匈奴胁迫西域诸国共同内犯,以致“河西郡县,城门昼闭”^③。这一教训表明,经营西域的根本目的在于制胜匈奴,即班超在对策报告中所说的“断匈奴右臂”,主动放弃西域,客观上必然资敌为患。

其二,明帝用兵的力度不够,死后前功尽弃。为了解除边患,明帝于永平十六年作出决策,四路出击,发起反击北匈奴的战争。攻占了西域北道,先后设置了宜禾都尉、西域都护、戊己校尉。正是借助这一胜利,班超才敢于率领36人出使西域南道,深入虎穴,除掉匈奴势力,仅用一年时间就抚定了南道诸邦。但是,这次反击作战取得的胜利非常有限,仅仅歼敌千余人。四路大军中有三路一无所得,根本没有从战略上打败北匈奴。结果两年之后,明帝一死,匈奴复至,都护被杀,汉军撤出,前功尽弃,以失败而告终。

其三,章帝不战而退,导致形势逆转。明帝死后之所以前功尽弃,关键在于“章帝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④。又一次主动放弃西域:不再派出都护,迎还戊己校尉,罢撤屯田部队,并命班超自南道回朝。从而导致西域形势的全面恶化,班超陷入绝境,欲退不得,欲进不能,死死地困守在疏勒5年。见到班超的请兵报告后,章帝虽然有所同情,但“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的消极思想没有改变,仅仅遣兵千人相助,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因此,直到和帝时窦宪大破北匈奴之前,班超并没有走出西域南道一步。

其四,和帝大举兴师,班超始收全功。西域问题的全部症结在于北匈奴,尽管绝大多数城邦国都一心附汉,但单靠班超和西域自身的力量解决不了北匈奴的问题。和帝即位后,由于朝廷采纳了南匈奴单于屯屠何的建议,以窦

① 《后汉书·西域传》。

② 《后汉书·臧宫传》。

③ 《后汉书·西域传》。

④ 《后汉书·西域传》。



宪为统帅,大举兴师讨伐北匈奴,自永元元年(公元89年)至永元三年,连续大破北匈奴,彻底摧毁了北匈奴的实力,班超才真正迎来了曙光。永元三年,班超出任西域都护,长期叛汉的北道龟兹、姑墨、温宿三国皆降。六年,班超调动西域诸国兵7万,一举攻克焉耆,西域50余国全部归汉。遂遣使“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①。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②。在丝绸之路史上谱写下光辉的一页。

① 《后汉书·西域传》。

② 《后汉书·西域传》。



皇甫规上书请缨平羌

题引：皇甫规(104~174年)，东汉名将，字威明，安定朝那(今宁夏固原)人。少览群书，晓悉边事，勇于作战。后举贤良方正，拜郎中，历任泰山太守、度辽将军、护羌校尉等职。39岁时上书请缨平羌，未获批准。59岁时再次上书请缨平羌，拜中郎将持节监关西兵，一举抚定叛羌20余万。本篇选自《后汉书·皇甫规传》。

【原文】

自臣受任^①，志竭愚钝，实赖兖州刺史牵颢之清猛，中郎将宗资之信义，得承节度，幸无咎誉。今猾贼^②就灭，太山^③略平，复闻群羌并皆反逆^④。臣生长邠岐^⑤，年五十有九，昔为郡吏，再更叛羌，豫筹其事，有误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马齿穷，不报大恩，愿乞冗官，备单车一介之使，劳来三辅，宣国威泽，以所习地形兵势，佐助诸军。臣穷居孤危之中，坐观郡将^⑥，已数十年矣。自鸟鼠至于东岱^⑦，其病一也。力求猛敌，不如清平；勤明吴、孙，未若奉法。前变未远，臣诚戚之。是以越职，尽其区区。

① 受任：指皇甫规于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由公车特征拜为泰山郡太守，专门受命平定该郡叔孙无忌领导的农民武装。

② 猾贼：指叔孙无忌。

③ 太山：即泰山，这里指泰山郡。

④ 群羌并皆反逆：指东汉第三次大规模羌变于延熹四年秋爆发。

⑤ 邠岐：东汉行政区划无邠岐之名，这里以古代周族的两个发祥地借指羌变的发生地。邠(亦作“豳”)，在今陕西彬县。岐，即岐山，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这两个地方都距皇甫规的家乡——朝那不甚远，同属羌变严重地区。

⑥ 郡将：即东汉的郡太守，这里泛指参加平叛作战的将领。东汉初经销兵减政，郡无主管军事的都尉，并职于太守，故常以郡将称太守。

⑦ 鸟鼠：指羌变发生地鸟鼠山，在今甘肃陇西南。东岱，即泰山，叔孙无忌领导的农民武装暴动处。



【译文】

我自受任泰山郡太守以来,神志用尽而天生愚钝,实际上靠兖州刺史牵颖的清廉刚正,中郎将宗资的诚信仗义,接受他们的指挥,才幸而没有过错和声誉。现在叔孙无忌的武装已被消灭,泰山郡基本平定,但又听说各支羌人同时都发生叛乱。我自幼生长在邠岐一带,今年五十九岁,从前作为安定郡的小吏,两次经历过大规模羌叛,参与谋议平叛之事,有不自意而讲得恰当的言论。我一向有久治不愈的疾病,深恐年寿将尽,不能报答皇恩,志愿讨求一个没有固定职责的散官,准备做一个单车使者,到关中地区慰劳三军,宣扬国家的威德,用我所熟悉的地形和排兵布阵的方法,协助诸军平叛作战。我过去隐居在孤苦危难之中时,坐而静观平叛将军们的作战指挥,已经有数十年了。从鸟鼠山的羌叛到东岳泰山的农民暴动,其所发生的问题病根都是一样的。力求战胜凶猛的强敌,不如修明清廉公正的政治;刻苦钻研孙吴兵法,不如认真奉公守法。目前的羌变发生不久,我实在忧心事态的进一步恶化。所以才斗胆超越个人的职权,尽吐自己微不足道的心声。

【评析】

这篇请缨平羌的对策报告,上书于汉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秋,正是东汉王朝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羌变刚刚爆发之时。零吾、先零、沈氏、牢姐、鸟吾等各部羌人,大肆攻掠于陇西、上郡、三辅、关中,“共寇并、凉二州”^①,切断了朝廷通往河西走廊的道路。时任泰山郡太守的皇甫规,针对这一形势和自己数十年来对羌变问题的研究,在对策报告中深刻指出:“力求猛敌,不如清平;勤明吴、孙,未若奉法。”也就是说,羌变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腐败,平息羌变的根本策略在于招安抚民,消弭羌变的根本方针在于修明政治。这一思想完全切合东汉一代有关羌变问题的实际。

东汉一代最严重的边患莫过于羌变,其鲜明的特点有三:一是连续不断,自东汉开国到东汉灭亡,前后近200年,小规模羌变从未间断;二是愈演愈烈,自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至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在63年内先后爆发3次大规模羌变,每次有的长达十几年,有的长达七八年;三是叛服无常,叛而复降,降而复叛,无止境地循环往复。这三个特点都同政治问题紧

^① 《后汉书·段颎传》。



密相联。

早在顺帝永和六年(公元141年)皇甫规就曾指出:“夫羌戎溃叛,不由承平,皆由边将失于绥御。乘常守安,则加侵暴,苟竞小利,则致大害,微胜则虚张首级,军败则隐匿不言。军士劳怨,困于猾吏,进不得快战以徼功,退不得温饱以全命,饿死沟渠,暴骨中原。徒见王师之出,不闻振旅之声。酋豪泣血,惊惧生变。是以安不能久,败则经年。”^①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羌变之所以经常发生,就在于羌人经常受到“侵暴”。由于西羌(塞外之羌)统于护羌校尉,东羌(塞内之羌)统于地方郡县,所以“侵暴”来自方方面面,有的“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有的“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有的“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②。

羌变之所以愈演愈烈,就在于东汉的政治越来越腐败,对羌人的“侵暴”越来越严重,反抗也就越来越激烈。而羌变一旦发生,腐败的军队打不过愤怒的羌民,致使战火越烧越大,时间越拖越久。第一次大规模羌变就是如此。上面外戚专权,下面贪官横行。羌民不愿被强迫到西域去打仗,政府就烧毁他们的部落。羌民奋起反抗,“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楯,或执铜镜以象兵,郡县畏懦不能制”^③。朝廷发5万大军去镇压,屡战屡败。增兵到20万,仍然不能取胜。战火遍烧凉、并二州及三辅,朝廷就下令把大量郡县内迁。后来组建一支仅有万人的骑兵,才逐渐把羌变平息下去。前后历时11年,用费240余亿,国库为之一空,而平叛的统帅仁尚一个人就贪污1000万以上。所有这些惨剧,无一不是腐败所致!

羌变之所以叛服无常,更是以政治为转移,有了廉洁的统帅来安抚,招之即降,根本不与官军对抗;换了嗜杀的统帅去屠戮,羌人就死战到底,降而复叛。第三次大规模羌变即是如此。皇甫规这篇请缨平羌的对策报告上奏于事变之初,很快被朝廷采纳。遂于同年冬拜中郎将持节监关西兵,到关中后仅仅同零吾羌打了一仗,斩敌800,就有先零羌等仰慕皇甫规的威信,“相劝降者十余万”^④。第二年进军陇右,途逢疾疫,皇甫规亲巡士卒,甘苦与共,三军感悦,东羌闻而请降。接着到凉州,处处诛除贪官污吏,西羌闻之翕然向

① 《后汉书·皇甫规传》。

② 《后汉书·西羌传》。

③ 《后汉书·西羌传》。

④ 《后汉书·皇甫规传》。



善,请降者10余万众,至此这次羌变已基本平息。不料又有意外之变。因皇甫规不肯行贿,遭宦官诬陷,被贬归乡,由段颎再次出任护羌校尉,对羌人大施高压手段,战火遂不断扩大。段颎经7年苦战,前后斩杀东西羌6万余人,才把这次羌变镇压下去。但是,羌人的反抗并未终止,腐败不除,永无宁日。不久,段颎自身因卷入宦官案中被捕入狱,自杀而死。东汉王朝也终于被宦官势力、外戚势力、对羌作战形成的军阀势力所吞没。

第四章 魏 晋 南 北 朝

天下大器，
一安难倾，
一倾难正。

——晋·刘颂
《陈封国之制》



概 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公元 220 年至公元 589 年,历时 370 年。包括三国(220~265 年)^①、西晋(265~316 年)、东晋十六国(317~420 年)、南北朝(420~589 年)等四个阶段,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纷乱动荡的时代。随着东汉王朝的崩溃,先是出现了群雄逐鹿,魏、蜀、吴三国鼎立争雄的局面,其后有西晋的短暂统一,接着出现了更大的动乱,导致了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的长期割据混战、分裂对峙。在这四百来年中,天下纷纷纍纍,打江山和安社稷、求生存和谋天下、安内与攘外、合纵与连横、攻与守、战与和……错综交织,各个阶段的各个政权,在安全上都面临严峻的挑战。针对所面临的重大安全问题,各阶段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或结合当时实际,或借鉴前代经验,提出了因应的对策和处置的办法,既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无论成功和失败,都以新的思考和实践,深化和丰富了国家安全战略上的认识。

在三国时期,魏、蜀、吴鼎足而立,在军事对抗的背后,实际上是国力的整体抗衡。分裂局面下的动荡和战乱,对社会和生产造成严重破坏,安定社会和发展生产,不仅是国家生存的基础,而且是富国强兵、夺取优势的基本前提,各方对此都做了巨大努力,各有思路和办法,其成效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三国争雄的结局。在三分天下的局面中,处于弱势的蜀汉和东吴政权,始终面临更大的生存威胁和安全压力,联盟成为以弱抗强的必然选择。多极斗争的纵横捭阖,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战略思想,产生了大战略运筹的千古名篇——《隆中对》。

经过汉末以来的动乱,到西晋重归统一后,北方地区的民族分布出现新的格局,大量的北方游牧民族部众进入长城以内,不仅在西北各郡,而且在中央王朝的腹心之地——关中和中原(特别是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等省),或聚族,或分散,与汉人杂居在一起,人口日渐繁殖。由于民族隔阂,内附的

^① 东汉初平元年(190 年)汉献帝迁离关中,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东汉政权名存实亡。三国时期的开始时间,按朝代纪年,为公元 220 年曹丕代汉称帝,实际上则是在 30 年前的公元 190 年。



少数民族人,常受士庶轻侮;而这个阶段又正是中国历史上土地兼并、人身依附最为严重的时期,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人大量沦为奴隶、婢仆、佃客,受到比汉族农民更为非人的待遇,因而“怨恨之气,毒于骨髓”^①。北方地区的民族矛盾空前尖锐,这对晋朝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巨大威胁,其威胁形态也表现出全新的特点:与秦汉时期由于匈奴的统一而在北方草原出现强大的游牧武装集团因而从外部对中央王朝构成严重威胁不同,晋初的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北方游牧民族部众进入内地,他们与塞外的本部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互为呼应,而与中原汉族积怨深重,极为仇视中央王朝,从王朝内部对国家的安定和稳定构成了巨大威胁。有识者站在当时的认知水平上,对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思路,但西晋政权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无所作为,而在其他事关国家安危的重大战略上,又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如分封宗室,埋下了诸王纷争的隐患;平吴罢兵,严重削弱了地方的控制力。所有这些,使得各种重大矛盾日趋激化,形成了迅疾的大爆发,导致了王朝的速亡,为后世思考国家安全战略问题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西晋覆亡后,南北分裂,天下大乱,北方地区陷入了五胡十六国的割据混战之中,东晋政权在南方地区艰难支撑。如何在诸多部族、诸多政权割据混战的局面中站稳脚跟、壮大势力、拓张疆域、巩固国家,是摆在北方各族政权面前的突出问题;如何在王朝颠覆之余,以弱抗强、培植元气、巩固国防、积蓄力量,是摆在南方东晋政权面前的突出问题。南、北各政权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这些方面各有见地,不乏有远见的战略思想,但各政权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并不很成功,其结果:北方的十六国大多其兴也勃,其亡也速;南方的东晋始终艰难维持,江河日下,总体上教训多于收获。

南北朝时期,南方宋、齐、梁、陈各政权先后禅代,承东晋衰颓之势,一直难有起色。北方地区,鲜卑拓跋部在十六国晚期的混战中把握时机,举措得宜,迅速崛起,建立了北魏政权,逐渐统一了北方地区。在与南朝的对峙中,北魏在大力进行武功开拓的同时,不断汲取中原历代王朝治国安邦的成功经验,大刀阔斧地推进各方面建设,振衰起弊,为国家的巩固和富强打下了较扎实的根基,逐渐呈现出宏大的王朝气象,在国家战略运筹和安全战略思想上,也留下了较多有价值的遗产。作为北魏的继承者,后来北周的壮大和隋的重新统一中国,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① 《晋书·江统传》。



曹操《置屯田令》

题引：曹操(155~220年)，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瞞，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举孝廉，为郎，屡迁至典军校尉。后起兵讨董卓、迎献帝、平定中原，封魏王，与蜀、吴三足鼎立，势力最为强大。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庙号太祖。由于连年战乱，经济萧条，为了解决粮荒，壮大实力，曹操于建安元年(196年)发布屯田令。本篇选自《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参见《曹操集·置屯田令》)。

【原文】

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①。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②。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③兼天下，孝武^④以屯田定西域^⑤，此先代之良式^⑥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

【译文】

自从遭遇兵荒战乱以来，普遍缺乏粮食。各路军阀同时起兵，都没有全年的用粮筹划，缺粮时就四处抢掠，粮多时就丢弃多余的食物，军队瓦解流离，无敌自破的数不胜数。占据黄河以北的袁绍，士兵靠桑树的果实充饥。

① 桑椹：桑树的果穗，成熟时黑紫色或白色，味甜，可以吃。

② 蒲赢：蛤蚌之类的东西。赢(luo，音罗)，俗字作“螺”。

③ 急农：重视农业生产，以农业为急务。

④ 孝武：汉武帝刘彻。

⑤ 西域：今甘肃玉门关以西，包括新疆等地的广大地区。

⑥ 式：范式、榜样。



位于长江、淮河一带的袁术,军队以靠拾取蛤蚌之类的东西为食。老百姓甚至人吃人,州府和乡里一片萧条景象。曹操说:“安定国家的方法,在于强兵足食。秦国重视发展农业从而统一了天下,汉武帝实施屯田法从而平定了西域,这是前代治国的好榜样。”这一年,曹操募集百姓在许都附近屯田,收获粮谷百万斛。于是,各地州郡照许都之例设置屯田官,在其地屯田积谷。从此,军队征伐四方,无需运输军粮之劳,终于兼灭了诸多割据势力,平定了大半个天下。

【评析】

东汉末年,由于皇帝昏庸、吏治腐败,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继之而起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长期的军阀混战。连年的战乱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经济文化向称发达的黄河流域遭受的破坏尤其严重,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人相啖食,白骨委积”^①的惨状。

战乱不仅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也成为各军阀势力发展壮大的主要障碍,它们“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和袁术的军队是当时两支较为强大的武装,袁绍军要靠桑椹为食,袁术军则要采食蛤蚌之类为生。曹操的军队也不例外,直到建安元年(196年)往迎献帝的途中,仍然不得不令军士以干枯的桑椹充饥。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发展,各军阀必须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军粮供应问题。曹操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战略家,他很早就认识到发展农业生产对于富国强兵的重要性。早在初平三年(192年),曹操初得兖州时,治中从事毛玠建议“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织以蓄军资”,已经将发展生产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谋划提了出来,得到了曹操的赞同。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打败了汝南、颍州等地的黄巾军,获得了大量劳动力和耕牛、农具,并进据许县,为发展农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就在此时,羽林监枣祗、骑都尉韩浩提出了兴办屯田的建议,这一建议立刻为曹操所采纳。在迎汉献帝都许昌不久,局面刚刚稳定之时,曹操便下令屯田。屯田首先在许昌周围实行,由枣祗主掌。待局部成功后,又命任峻为典农中郎将,推广到各地,其范围西起河西,东南达淮南;东北自幽燕,西南至荆襄。屯田起初为民屯,其方法是:官府授给屯

^① 《后汉书·魏志·献帝纪》。



田农民一定数量的土地以及耕牛等生产资料,所获粮谷按规定比例分成。民屯不受地方管辖,由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等屯田官专门管理,带有军事组织性质。后来又发展出军屯,即由各地驻军耕种,补足军需。

曹魏的屯田制大致与其政权相始终,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首先,军粮紧张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仅在初行屯田的当年,许昌地区便收获了“谷百万斛”。而且,由于屯田使军粮能就近供应,也减轻了农民运送粮草的沉重负担。充足、稳定的军粮供应使军队的战斗力得到了有效的保障,以致“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更为重要的是,屯田使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大量流亡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上,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及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史称,曹魏屯田以后,“百姓亲附,甲兵强盛”^①,这就从根本上增强了曹魏政权的实力,为曹操统一北方,并在三国争雄中始终占据优势,以及后来司马氏最终兼并蜀、吴,重新统一中国,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①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诸葛亮《隆中对》

题引：诸葛亮(181~234年)，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东汉末，隐居隆中(今地有湖北襄阳和河南南阳二说)，人称“卧龙”。建安十二年(207年)，刘备三顾茅庐，恳请诸葛亮出山相助，诸葛亮为其诚意所感，纵论天下大势，为刘备指划了谋取霸业的方略，史称“隆中对”(也称“草庐对”)。此后，诸葛亮鼎力辅佐刘备父子，创建蜀汉政权，促成了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本篇选自《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原文】

自董卓^①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②。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③，已历三世^④，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⑤北据汉沔^⑥，利尽南海，东连吴会^⑦，西通巴蜀^⑧，此用武之国，而其主^⑨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

① 董卓(?~192年):字仲颖,东汉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本为凉州豪强。汉灵帝时任并州牧,昭宁元年(189年)率兵入京,废少帝,立献帝,专权恣肆。曹操、袁绍等起兵反对,董卓焚毁洛阳,挟献帝西迁长安,后为王允、吕布所杀。

② 挟天子以令诸侯:董卓死后数年,献帝还都洛阳。不久,曹操迫献帝迁都许昌,总揽军政大权,以皇帝名义号令诸侯。

③ 江东:长江在安徽芜湖、江苏南京之间折向东北,秦汉以后,习称自此以下的长江南岸地区为江东。

④ 三世:孙权及其父孙坚、兄孙策,合称“三世”。

⑤ 荆州:治今湖北襄樊,包括今湖北、湖南及河南部分地区。

⑥ 汉沔:汉,汉水,又称汉江,为长江最大支流;沔,沔水,即汉水之上游。

⑦ 吴会(kuai,音快):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和会稽郡(治今浙江绍兴)的统称。

⑧ 巴蜀:巴,今重庆一带;蜀,今成都一带。

⑨ 其主:指割据此地的刘表。



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①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②闇弱^③,张鲁^④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⑤,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⑥,南抚夷越^⑦,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⑧,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⑨,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⑩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译文】

自从董卓之乱以来,各路豪杰纷纷起兵,势力跨越数个州郡的割据者不可胜数。曹操与袁绍相比,名望低微而且兵马较少,但是曹操之所以最终能够战胜袁绍,变弱为强,并不只是因为天时有利,恐怕也在于人的主观谋划。现在曹操已经拥有百万大军,挟持天子对诸侯发号施令,我们确实不能与他争锋。孙权占据江东,已经历了三代,那里地势险要,百姓亲附,又有贤良能干的人替他效力,我们可以把他作为外援,而不能图谋他。荆州北边据有汉水、沔水,南通南海,东边连接吴郡、会稽郡,西边与巴郡、蜀郡相通,这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但它的主人却不能守住它,这大概是上天要以此帮助将军,将军有意取得这块地方吗?益州地势险要,沃野千里,世称天府之国,汉高祖依靠它成就了帝王之业。刘璋昏庸软弱,张鲁在北边,(时刻构成威胁),人口众多地方富饶却不知体恤爱惜,有智慧有能力的人都希望有贤明的君主来统

① 益州:治今四川成都,包括今四川、云南及甘肃等部分地区。

② 刘璋(? ~219年):字季玉,江夏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人。继其父刘焉为益州牧。

③ 闇弱:昏庸懦弱。闇,同“暗”。

④ 张鲁(? ~216年):字公祺,东汉末五斗米道首领,时据汉中。

⑤ 胄(zhōu,音皱):帝王或贵族的后裔,刘备为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故称“帝王之胄”。

⑥ 戎:中国古代对西北各部族的称呼。

⑦ 夷越:泛指西南和南方的少数民族。

⑧ 宛洛:宛,今河南南阳;洛,今河南洛阳。

⑨ 秦川:泛指今陕西、甘肃秦岭以北渭水流域。

⑩ 箪食壶浆:意为百姓以饮食犒劳所爱戴的军队。《孟子·梁惠王下》:“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箪(dān,音单),盛饭竹器;浆,米汤。



治它。将军既是大汉宗室的后代,又以诚信道义闻名四海,能聚集各路英雄,求贤若渴,如果占有荆州、益州,固守险要,西边与各少数部族和好,南边对各少数部族加以安抚,对外结好孙权,对内修明政治;如若时势有变,就命一员上将率领荆州的军队向宛城、洛阳一带进发,将军您亲自率领益州的大军出师秦川,老百姓谁能不箪食壶浆来迎接您呢?如果确实能这样,那么您称霸天下的大业便能成就,汉室也能复兴了。

【评析】

《隆中对》是建安十二年(207年)刘备屯兵新野(今河南新野)、三顾茅庐时诸葛亮答刘备问的一番话。刘备起兵八年,没有大的建树,这时徐庶向他推荐了诸葛亮,刘备于是三顾茅庐向诸葛亮请教。诸葛亮感怀于刘备礼贤下士、虚心求教,为之纵论天下大势,提出了一份在汉末乱世中图生存求发展的完整战略谋划。

首先,他向刘备提出了“跨有荆益”的现实目标。诸葛亮从政治、经济、军事、地缘等方面分析,指出:北方的曹操拥兵百万,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以武力与之争胜;南方的孙权据有江东,已有三世,地势险要而且政治巩固,只能结为盟国而不应树为敌手;荆州刘表居于要冲之地,但自己不能据守,益州刘璋虽有险要关塞,但昏庸无能,不懂安抚百姓,这两个地方都是有机可乘的战略要地,占领了两地,便可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形成与曹魏、孙吴三足鼎立之势。

其次,他为刘备制订了经营荆州和益州,建立稳固的根据地的方略。诸葛亮指出,在“跨有荆益”之后,应该致力于拓展自己的实力,一方面要“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结好孙权”,稳固后方,争取盟友,创造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一方面要“内修政理”,也就是整顿吏治,发展经济,使自己的综合实力得到提升,从而为进取中原奠定坚实的基础。一旦天下有变,机遇到来之时,便由荆州、益州两路出兵,一举成就霸业。

《隆中对》对战略形势的透彻分析及其卓越的战略筹划对蜀汉政权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刘备依此战略而行,先是据有荆州,进而开拓西川,攻取汉中,迅速扭转了局势,由一支进退无据的弱小武装发展成为可与魏、吴相抗衡的重要势力。其后虽然出现了孙权夺荆州杀关羽、蜀吴发生夷陵大战、刘备惨败后饮恨而亡的重大挫折,但后主刘禅继位后,诸葛亮辅政,依然坚决贯彻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的方针,整



顿吏治,发展生产,力排众议坚持与东吴结盟,采取攻心之法平定南中(大渡河以南的少数民族地区),从而使蜀汉政权在空前的危机中得到安定,实力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保持住了与曹魏和东吴鼎足而立的局面。可以说,《隆中对》不仅对刘备夺取荆州、益州开创基业,而且对后来蜀汉政权的安定和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在后一方面,更表现出了高度的前瞻性。因为:蜀汉偏处西南,紧邻少数民族地区,只有处理好与土著少数民族的关系,才可能有稳固的后方;蜀汉国小势弱,与东吴结盟,联合抗曹,是以弱敌强的必然选择;而修明政治,发展自身,增强实力,则是生存和进取的基本前提。因此,“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这几句话,实际上就是日后蜀汉政权求生存、保安全、谋安定的基本方针。

《隆中对》战略思想的重要价值,得到了后人的充分肯定。唐人王叡说:“孔明创蜀,决沉机二三策,遽成鼎峙,英雄之大略,将帅之弘规也。”^①这一评价实非过誉。

不过,《隆中对》“两路出兵”的战略构想却以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这首先是由于诸葛亮所预期的战略时机一直没有出现。蜀汉虽经多年经营,在政治经济上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但始终未能形成高于曹魏、东吴的突出优势,魏、吴也并未出现大的战略失误或是政治变故,尤其是在孙权袭取荆州,擒杀关羽,刘备“怒而兴师”,导致夷陵之战大败的情况下,诸葛亮以荆、益二州为支点的“两路出兵”之策已经失去了现实基础。另一方面,“两路出兵”思想本身也存在一定缺陷。荆州、益州为大巴山、巫山所阻隔,很难形成相互策应之势,加之蜀汉的兵力较为单弱,不宜分兵。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蜀汉的失败,“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②,是很有道理的。

尽管《隆中对》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其超凡的战略思维、卓越的实践功效仍然使它成为中国古代不可多得战略名篇。

^① 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七百四十三,《将略论》。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



诸葛亮《绝盟好议》

题引：自孙权袭取荆州，夷陵之战爆发，吴蜀反目成仇。蜀汉建兴七年（229年）四月，孙权称帝，并遣使赴蜀，表示愿意“与蜀约盟”。群臣大多主张与东吴断交，“绝其盟好”。诸葛亮高瞻远瞩，力排众议，并深入分析了其中的道理。本篇选自《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参见《三国志文类》卷三十八《诸葛亮绝盟好议》）。

【原文】

权有僭逆^①之心久矣，国家^②所以略其衅情^③者，求掎角^④之援也。今若加显绝，仇我必深。便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⑤，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⑥，未可一朝定也。顿兵相持，坐而须老^⑦，使北贼得计，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辞匈奴^⑧，先帝优与^⑨吴盟，皆应权通变，弘思远益，非匹夫之为忿者也。今议者咸以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⑩满，无上岸^⑪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⑫，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

① 僭(jiān, 音见)逆:越礼犯上,指孙权称帝。

② 国家:这里指蜀汉政权。

③ 衅情:罪情,罪恶用心。

④ 掎角:分兵牵制或夹击敌人。语出《左传·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角,抓角,掎(jī, 音挤),拉腿,引申为牵制。

⑤ 角力:以武力决胜负。角:较量。

⑥ 缉穆:和睦。也作“缉睦”。

⑦ 老:指军力衰落、疲顿。

⑧ 孝文卑辞匈奴:这里指汉文帝曾以谦恭友好的言辞修书匈奴予单于,缔结和亲。

⑨ 优与:宽容。

⑩ 以:已。

⑪ 上岸:指孙吴渡过长江,统一中国。

⑫ 不侔:不相等。指孙权与曹操的智力与实力对比。



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若大军致讨,彼高^①当分裂其地,以为后规^②;下^③当略民广境,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④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权僭之罪,未宜明也。

【译文】

孙权有称帝叛逆的野心已经很久了,我们之所以对他的罪行不予追究,是为了求得掎角相援的态势。如果我们现在公开与他断交,他对我们的仇恨势必加深,我们也只能派兵东伐,与他以武力争胜,要等到兼并了吴国的领土,才能讨论北伐中原的问题。而东吴有贤德、有才能的人很多,将相和睦,不可能在短期内平定。双方一定会陷入长期对峙的持久战,导致兵疲力竭,这就会使北面的曹魏奸计得逞,不是战略谋划的上策。过去,汉文帝曾以谦卑的言辞与匈奴和亲,先帝刘备不计小过,宽容地与东吴结盟,都是权宜变通的策略,他们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不像寻常人那样因怨恨而感情用事。现在议论此事的人都认为孙权(联合我们)是为了得到三国鼎立之利,不可能与我们齐心协力灭曹,而且他(称帝以后),已经志得意满,没有了渡过长江与曹魏作战的愿望,以此推断孙权,都是似是而非的。为什么呢?孙权的智谋和实力赶不上曹操,所以才以长江为界来保全自己;孙权不能越过长江,犹如曹操不能渡过汉水一样,并不是兵力有余而见利不取。如果我们大举北伐曹魏,那么孙权的上策应当是乘机割裂曹魏领土,作为进一步谋划的基础;下策应当是掳掠百姓,拓展疆境,在国内积极备战,他决不会是端坐不动的旁观者。如果即使孙权对曹魏不采取作战行动,而与我们和睦相处,我们进行北伐,就没有了东顾之忧,黄河以南的曹魏军队,就不能全部向西调集,这样带给我们的好处,已经是很大的了。因此,孙权僭越称帝的罪过,不宜公开声讨。

【评析】

蜀汉建兴七年(229年)四月,孙权建号称帝,这是三国历史上一个重要

① 高:上策。

② 后规:以后的谋划。

③ 下:下策。

④ 河南之众:黄河以南的曹魏军队。



事件,标志着三国分立的局面正式形成,同时也使三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而微妙。

在此之前,220年,曹操之子曹丕称帝,由“挟天子以令诸侯”变为取天子之位而代之,其志向自然在于平灭吴、蜀,一统天下。次年,刘备在成都自称汉皇帝,以光复汉室相标榜,与曹魏形成针锋相对之势。孙权虽然没有马上称帝,也在222年自称吴王,七年以后的称帝之举就是这一趋势的进一步发展。虽然从历史演进来看,孙权称帝是顺理成章的,但却引起了蜀汉朝臣的一片“绝交”之声。这是因为,一方面,称帝意味着对立的公开化,增加了联盟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从蜀汉一向以正统自居的政治立场出发,很难接受孙权这种公然的“僭逆”行为。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孙权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袭占荆州,擒杀蜀大将关羽。蜀汉章武二年(222年),刘备倾全国之力发动夷陵之战,结果以大败告终,饮恨而亡。蜀汉由此元气大伤,蜀吴关系也从此出现了一个深刻的裂痕。在此情形之下,面对孙权的结盟请求,蜀汉群臣主张“绝其盟好”就是合情合理的了。

在这一关键时刻,诸葛亮再次显示出高超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他从“利益”而非“道义”或“感情”的角度审时度势,深刻指出,奉行联吴战略的目的在于与孙吴形成“掎角之援”,这是蜀汉最大的利益所在。至于孙权,无论其称帝与否,都具有统一天下的政治野心,称帝不过是使名实更为相符罢了。为求得联盟之利,对其“僭逆之心”可以忽略不计。联盟初期如此,孙权称帝后也当如此。这是从“利”的角度讲。从“害”的方面看,如果蜀汉与孙吴绝交,势必造成两线作战的困难局面,征吴则曹魏坐收其利,伐魏则有东顾之忧,以蜀汉实力而言,这种局面无疑是十分危险的。因此,承认孙权称帝的既成事实,继续与东吴联盟,是趋利避害的明智选择。

后主刘禅采纳了诸葛亮的建议,于是年六月派卫尉陈震使吴,祝贺孙权称帝,巩固了与东吴的联盟关系。这一举措为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复出祁山创造了条件。

其实,三国时期,魏、蜀、吴从各自安全利益出发,都很注重处理与周边政权的关系,不断根据形势制定和调整其联盟战略。三国之间,或合纵联横,或联弱抗强,有利则盟,无利则破,其目的都是根据时势,利用各集团之间的矛盾,以最小的力量取得最大的功效。孙权曾说“盟随势迁”,深刻道出了当时各方联盟行动的实质。以吴蜀的这次联盟而论,利益无疑是最重要的基石。非但诸葛亮能够通观全局、明辨利害,孙权的结盟之议也是基于利益的权衡,



他担心自己称帝后受到孤立,陷入两面树敌的被动局面,所以不得不继续延续“联蜀以抗魏”的思路。再者,蜀、吴较魏相对弱小,又有长期结盟的历史,这也是此次能够顺利结盟的重要原因。三国时期联盟战略的思想和实践,为后人思考如何运用联盟手段维护国家安全,达成国家目标,提供了诸多鲜活的范例。



陆抗《戒动师旅疏》

题引：陆抗(226~274年)，三国吴将，字幼节，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名将陆逊之子，历官至大司马、荊州牧。公元272年，吴主孙皓听从一些将领的建议，频繁派军侵掠西晋，致使百姓疲困不堪，严重危及国家安全，陆抗上疏进谏。本篇选自《三国志·吴志·陆逊传附陆抗传》(参见《三国志文类》卷二十三《上百姓疲敝疏》)。

【原文】

臣闻《易》贵随时^①，《传》美观衅^②，故有夏多罪而殷汤用师，纣作淫虐而周武授钺^③。苟无其时，玉台^④有忧伤之虑，孟津^⑤有反旆之军^⑥。今不务富国强兵，力农畜谷，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⑦无旷厥职^⑧，明黜陟^⑨以厉庶尹^⑩，审刑罚以示劝沮^⑪，训诸司^⑫以德，而抚百姓以仁，然后顺天乘运，

① 随时：顺应时势。语出《周易·随卦》：“随时之义大矣哉。”

② 观衅：窥伺敌人的间隙。语出《左传·宣公十二年》：“会闻用师，观衅而动。”

③ 授钺：意为授予将领军权，使之统兵作战。钺，古青铜圆刃兵器，似斧而大，亦为礼器，军权的象征。

④ 玉台：传说中天帝居住的地方，此处当指夏台(又称“钧台”，位今河南禹州)，夏桀曾召商汤而囚于“夏台”。

⑤ 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周武王伐纣前曾在此会盟各路诸侯。

⑥ 反旆之军：周武王即位第二年，观兵孟津，据说有八百诸侯不期而至。但周武王认为伐纣时机尚未成熟，下令还师，两年后兴师灭纣。旆，旌旗。

⑦ 百揆之署：犹言各级官署。揆(kui，音奎)，筹划，管理。

⑧ 无旷厥职：无不尽职。旷，荒废、失职；厥，其。

⑨ 黜陟：官吏的升降。黜(chu，音触)，降官；陟(zhi，音治)，升官。

⑩ 厉庶尹：激励众官吏。厉，勉励、激励；庶，众、多。

⑪ 劝沮：鼓励与禁止。

⑫ 诸司：各级官署。



席卷宇内,而听诸将徇名^①,穷兵黷武,动费万计,士卒凋瘵^②,寇不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争帝王之资,而昧^③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奸便^④,非国家之良策也。昔齐鲁三战,鲁人再克而亡不旋踵^⑤。何则?大小之势异也。况今师所克获,不补所丧哉?且阻兵^⑥无众,古之明鉴,诚宜暂^⑦息进取小规^⑧,以畜士民之力。观衅伺隙,庶无悔吝^⑨。

【译文】

微臣听说,《周易》重视顺应时势,《左传》赞美伺机而动,因此,要等到夏桀罪大恶极时商汤才发兵进攻,商纣荒淫暴虐时周武王才授钺兴兵。如果时机不成熟,商汤曾被夏桀囚禁夏台,忧伤焦虑;周武王也曾从孟津掉转旗帜撤军。我们现在不致力于富国强兵,发展农业,积聚粮食,使文武人才发挥作用,使各级官府不失其职,严明官员晋升制度以激励官吏,合理运用刑罚以示劝勉或禁止,用道德训导臣僚,用仁爱安抚百姓,然后顺应天命,借助时运,席卷天下,而是听从诸将追求功名的愿望,穷兵黷武,动辄耗费数以万计的金钱,使士兵困苦疲敝,敌人并未因此而衰败,我们却已经元气大伤了。现在只想争夺当帝王的资本,却看不清十倍百倍的利益,这是臣下奸邪自利的私心,而不是安定国家的良策。从前,齐、鲁两国打了三仗,鲁国前两次都获胜了,最终却迅速灭亡。为什么呢?这(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是由于国家的大小不同啊。更何况我们现在获得的战果,根本弥补不了损失呢!再说,只依仗军队而没有民众的支持(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是古代的明鉴,我们实在应当暂时放弃进攻北方的小打算,积蓄士兵和民众的力量,观察敌人的破绽以等待时机,只有这样,今后才可能没有悔恨。

① 徇名:舍身求名。徇,同“殉”。

② 凋瘵:衰败,困苦。

③ 昧:糊涂,不明白。

④ 奸便:奸邪、自私的想法。

⑤ 旋踵:转足之间,形容迅速。踵,脚跟。

⑥ 阻兵:依仗兵力。

⑦ 暂:暂时。通“暂”。

⑧ 进取小规:进军攻伐敌国边境这一小的规划。

⑨ 庶无悔吝:似乎可以没有什么悔恨了。庶,差不多;悔吝,犹言悔恨。



【评析】

公元263年,曹魏灭掉蜀汉,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了。两年以后,权臣司马炎篡夺曹魏政权,建立晋朝,史称西晋。西晋继承了曹魏、蜀汉的广阔领土,拥有雄厚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而在这时,与西晋对峙的孙吴政权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它不但在疆域上仍然据守江东一隅,无法与西晋抗衡,国内政治也是乱象丛生。孙权去世后,宗室之间为争夺帝位,互相残杀,政局十分混乱。公元264年即位的吴主孙皓更是一位有名的暴君,他不但对百姓实行苛酷的统治,赋税繁重,滥用刑罚,而且荒淫无度、穷奢极欲,其后宫人数多达万余,甚至规定两千石大臣家的女儿,年当十五六岁的都要经过简阅,简阅不中者才能出嫁。在他的残暴统治下,吴国“上下离心,莫为皓尽力”^①,经济上也出现了“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畜”的衰败之象。

孙皓的暴虐统治使西晋与孙吴在国力上的差距日益拉大。西晋的一些有识之士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提出了乘机灭吴的主张。名将羊祜便认为:“吴人虐政已甚,可不战而克……如舍之,若孙皓不幸而没,吴人更立令主,虽百万之众,长江未可越也。”^②吴凤凰元年(272),吴西陵督步阐降晋,羊祜奉命进逼江陵。当时,陆抗都督西陵,扼守长江防线,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成功击退了晋军的进攻。此役之后,他在荆州地区与晋将羊祜采取了互不攻战、互信往来的守边策略,常常告诫将吏:“各保分界而已,无求细利。”^③晋吴边界出现了短暂的相对和平局面。

但是,吴主孙皓却采取了与陆抗完全不同的做法,他听从一些将领的意见,屡次派兵侵扰晋境。在当时情况下,这显然是一个十分错误的战略决策。首先,战略时机的选择不适宜。孙吴虽然在江陵之战中获胜,但主要是因为陆抗这样的优秀将领,而且充分利用了长江天险的地理优势,从总体上看,双方的“大小之势”并未改变,此战之后,孙吴更加兵民疲弊,不利再战。这正是陆抗对羊祜采取睦邻政策的主要原因。其次,这些小规模的军事行动徒然造成边境形势的紧张,得不偿失。频繁的战事给孙吴原本衰败的经济造成了

① 《三国志·吴志·孙皓传》。

② 《晋书·羊祜传》。

③ 《资治通鉴》卷七十九《晋纪一》武帝泰始八年。



更为沉重的负担,使得“士卒凋瘁”,民不聊生,却并未能真正削弱晋朝的實力,因此,陆抗说,这样的做法是“争帝王之资,而昧十百之利”,“寇不为衰,而我已大病矣”!实是把国家推向极危险境地的不明智之举、愚蠢之举。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陆抗提出,应以“富国强兵”为急务,加强内政治理,“训诸司以德,而抚百姓以仁”,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稳固的根基,为孙吴的自保和发展乃至最终统一全国创造条件。这无疑处于劣势的孙吴政权唯一正确的出路。

陆抗的建议基于对内外部形势的深刻认识,从战略时机和实际成效等方面分析,是十分痛切、中肯的。但是,他提出的“富国强兵”、以“德”、“仁”治国等主张意味着对孙皓的暴政进行彻底的改良,又是很难实现的。果然,孙皓并未采纳陆抗的建议,而是一如既往地继续着他的暴虐统治和不智之举。两年以后,陆抗去世,孙吴不再有像他这样富有用兵韬略和政治远见的将帅,国势更加衰弱。公元280年,最终为晋所灭。



刘颂《陈封国之制》(节选)

题引:刘颂(? ~约301年),西晋名臣,字子雅,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历任中书侍郎、河内太守、淮南王相、吏部尚书。西晋开国之初,晋武帝分封宗室,存在很大弊端。刘颂于晋武帝晚年上疏建议完善封国制度,意欲匡补缺失。奏疏全文见《晋书·刘颂传》。

【原文】

天下大器^①,一安难倾,一倾难正。故虑经后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遗业,使数世赖之。若乃兼建诸侯而树藩屏,深根固蒂,则祚延无穷,可以比迹三代^②。如或当身之政,遗风余烈不及后嗣,虽树亲戚,而成国^③之制不建,使夫后世独任智力以安大业。若未尽其理,虽经异时,忧责犹追在陛下,将如之何!愿陛下善当今之政,树不拔之势,则天下无遗忧矣。

【译文】

国家是天下大器,安定就难以倾斜,倾斜就难以扶正。所以为后世考虑的人,必定精心于当前的政事,留下安定的局面,使几代人都有依赖。如能这样做,又分封诸侯,树立屏藩,使国家根深蒂固,则国统绵延无穷,功绩可以与夏、商、周三代比拟。如果只是应付身前之事,遗风余烈影响不到后代,虽然分封了亲戚,却没有建立完善的封国制度,后世就只能凭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安定大业了。如果(封国制度)不能完全合理,即使经过了不同的时期,后人还会把责任算在陛下身上,该怎么办好呢!希望陛下很好地把握当今之政,为国家确立不可动摇之势,那么天下就没有遗留的担忧了。

① 天下大器:即国家。《荀子·王霸》:“国者,天下之大器也。”大器,本义指巨大的器物。

② 三代:夏、商、周三个朝代。

③ 国:这里指诸侯封国。



【评析】

继三国之后的西晋王朝,是由河内士族大家司马氏为首的政治集团建立的。曹魏后期,大权旁落,司马氏把持了国柄,司马昭派邓艾、钟会率军伐灭蜀汉,司马炎夺取帝位后又灭掉东吴,“三国总归司马氏”,分裂局面复趋于统一。但仅二十来年后,天下又出现大乱,并很快导致了西晋政权的覆亡,中国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更加分崩离析、动荡不安的时期。西晋王朝的短命,有政治、军事、民族、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而最高统治集团在国家安全战略上的举措失误,直接导致了这些方面复杂矛盾的大爆发。

西晋的开国君臣,大都出自汉魏以来的名门望族,惯于逸乐,多为门第之计,普遍缺乏雄才大略、深谋远虑。晋武帝司马炎本人就是个代表。太傅何曾有次私底下对儿孙说:“主上开创大业,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道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①因此,晋初的各项举措,猥琐多弊,在国家安全上埋下了重大的隐患,分封诸王就是其中之一端。

由于司马氏的天下是从曹氏手中夺取的,为戒防异姓特别是曹氏势力,晋武帝受禅登基后即大封宗室,“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②。而且授予宗室诸王重权,出则持节都督一方军事,入则掌握中央朝政。晋武帝死后,继位的惠帝才智低弱,朝政混乱,很快酿成了诸王争位的“八王之乱”。宗室诸王互相厮杀,兵连祸结,对政权和社会造成严重破坏,各地频频爆发流民起义,汉魏以来人居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乘乱起兵,一举颠覆了西晋王朝,中原地区随之陷入了“五胡十六国”的混战之中。

正如时人所言,西晋之亡,实由“藩王争权,自相诛灭,遂使戎狄乘隙”^③。其祸根不能不追溯到晋武帝的分封宗室。对于晋武帝搞分封,当时的臣僚大多表示赞成和支持,刘颂也是如此。但刘颂也看到了一些隐忧,所以在武帝晚年专门上疏,提醒晋武帝要有长远眼光,要为后世考虑,精心处理国政,建

① 《资治通鉴》卷八十七《晋纪九》怀帝永嘉三年。“贻厥孙谋”,语出《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意即为子孙后代考虑。

② 《晋书·地理志上》。

③ 《晋书·祖逖传》。



立起完善的封国制度,来保障国家的长久安定。

对关乎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只有形成合理、完善的制度,才能有持久、根本的保障。刘颂能够看到这个层面,难能可贵;但在具体措施上,刘颂认为晋初分封不合古制,建议完全仿照西周的典章,却不免迂阔。对战略性问题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可以说是西晋君臣的通病。迟暮之年的晋武帝,对刘颂的建言也仅表示知道了而已。没过几年,刘颂的担忧就变成了现实。

在这篇奏疏中,刘颂借鉴前人成语,把国家比作天下巨大的器物,进而指出“天下大器,一安难倾,一倾难正”,还是富有哲理性的。这句话的着重点和落脚点,在于“一倾难正”四个字,魏晋南北朝四百来年分裂动荡的历史,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陶璜、山涛谏平吴罢兵

题引：陶璜，字世英，秣陵（今南京）人，三国时为吴交州刺史，晋灭吴后，归顺于晋，仍任交州刺史，镇守南疆前后历30年。山涛（205～283年），字巨源，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人，魏晋名士“竹林七贤”之一，晋初任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晋武帝灭吴后，下诏罢州郡兵，陶璜、山涛均以为不妥，或上书陈情，或发表论见。本篇选自《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晋纪三》武帝太康元年（参见《晋书》陶璜传、山涛传）。

【原文】

诏曰：“昔自汉末，四海^①分崩，刺史^②内亲民事，外领兵马。今天下为一，当韬戢干戈，刺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交^③、广^④东西数千里，不宾属^⑤者六万余户，至于服从官役，才五千余家。二州唇齿，唯兵是镇。又，宁州^⑥诸夷，接据上流，水

① 四海：指天下。《汉书·高祖纪》：“天子以四海为家。”

② 刺史：西汉武帝时，分全国为十三部（州），部置刺史，本为监察官性质，官阶低于郡守。成帝以后，一度改刺史为州牧。东汉灵帝时，为镇压农民起义，再改刺史为州牧，居郡守之上，掌握一州的军政大权。自三国至南北朝各州亦多置刺史，一般以都督兼任，并加将军之号，权力甚大。

③ 交：交州。东汉建安八年（203年）改交趾刺史部为交州。治广信（今广西梧州），旋移番禺（今广州）。辖今广东、广西大部 and 越南平治天以北诸省。三国吴分交州为交、广二州，交州治龙编（位今越南河内东天德江北岸），辖境限于今越南中部、北部及广西钦州地区、广东雷州半岛。

④ 广：广州。三国吴分交州而置，治番禺（今广州），辖境相当于今广东、广西两省区大部。

⑤ 宾属：归顺、服从。

⑥ 宁州：晋泰始七年（271年）分益州置。治味县（今云南曲靖）；一说在濬池（今云南晋宁东）。辖今云南大部 and 贵州、广西小部，后东扩至贵州大部。



陆并通。州兵未宜约损,以示单虚。”仆射^①山涛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备”,帝不听。及永宁^②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禽^③制,天下遂大乱,如涛所言。

【译文】

(晋武帝平吴之后,颁布)诏书说:“从东汉末年开,天下分崩离析,刺史既掌管民政,又统领军队。现在天下一统,应当收藏起兵器,把刺史的(军政)职权分开,完全依照汉代原先的制度;把州郡的兵都去掉,大郡设置武官一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刺史陶璜上书说:“交州、广州从东到西有几千里,不归顺的有六万多户,至于服从官府劳役的,才五千多家。两个州唇齿相依,只有靠军队才能镇守住。另外,宁州各部族,地处江河上游,(与交、广两州)水路、陆路都通,也不应减少州兵,而显出官府的力量单薄虚弱。”仆射山涛也说“不应当去掉州郡的军事守备”,晋武帝不听。到了永宁年间(301~302年)以后,盗贼四起,州郡没有武备,没有办法控制,天下于是大乱,正应了山涛的话。

【评析】

晋代军队主要由中军、外军两部分组成。中军指驻扎于京师地区的中央直属军队。外军系与中军相对而言,泛指驻于京师之外的各地方军队,包括都督统率的驻屯军,刺史、太守统率的州郡兵,及宗室诸王的王国兵等。太康元年(280年)晋灭吴后不久,晋武帝就下诏罢州郡兵。交州刺史陶璜上书陈情,指出交州、广州地处边陲,范围广大,情况复杂,必须靠军队来确保安全和稳定,不宜减少兵员。据《晋书·陶璜传》记载,晋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另外可能还有一些多事的地区,州郡兵也没有废罢^④。但是,“罢州郡兵”的措

① 仆射:官名。起于秦代,凡侍中、尚书、博士、谒者、郎等官,都有仆射,根据所领职事作称号,意即其中的首长。东汉尚书仆射为尚书令副手,职权渐重;东汉末年分置左、右仆射;魏晋以后尚书令、尚书仆射同居宰相之任,有“朝端”、“朝右”等称呼。

② 永宁:晋惠帝年号(301~302年)。

③ 禽:通“擒”。捉住、逮住。

④ 参见唐长孺:《魏晋州郡兵的设置和废罢》,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



施仍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推行,山涛认为“不宜去州郡武备”,就是从总体上说的。晋武帝此举无疑削弱了州郡对地方的控制力,十几年后,西晋就在天下大乱中覆亡(参见刘颂《陈封国之制》评析),与此不无关系。所以,晋武帝平吴罢兵,一直为后世所诟病。明太祖朱元璋的一段话,是很有代表性的批评:“人孰(谁)不曰:天下平定之时,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后可言息兵,讲武而后可言偃武。若晋彻(撤)州郡之备,卒召五胡之扰;唐彻中国之备,终致安史之乱,此无备之验也。夫当天下无虞之时,正须常守不虞之戒,然则武备其可一日而忘哉!”^①

^① 《明太祖宝训》卷六,《武备》。



郭钦《徙戎疏》

题引：郭钦，西河（今山西中西部）人，晋初曾任侍御史。这篇奏疏写于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晋武帝灭吴之后，专门就解决当时北方民族问题提出建议。本篇选自《晋书·四夷传》（参见《西晋文纪》卷十九《上武帝徙戎疏》）。

【原文】

戎狄^①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②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③、上党^④不三日而至孟津^⑤，北地^⑥、西河^⑦、太原^⑧、冯翊^⑨、安定^⑩、上郡^⑪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

① 戎狄：对西部和北部游牧民族的统称。

② 百年之后：泛指多年以后。

③ 平阳：郡名。治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辖境相当今山西霍州以南的汾河流域及其以西地区。

④ 上党：郡名。治壶关（今山西长治北），辖境在今山西和顺、榆社以南，沁水以东一带。

⑤ 孟津：黄河古渡口。在今河南孟津东。《书·禹贡》：导河“东至于孟津”。相传周武王伐纣，在此盟会诸侯并渡河，故一名盟津。一说本作盟津，后讹作孟津。

⑥ 北地：郡名。辖境在今陕西耀县、富平一带。

⑦ 西河：郡名。治兹氏（晋改隰城，今山西汾阳），辖境在今山西离石、中阳、石楼、汾阳、介休、灵石一带。

⑧ 太原：郡、国名。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古城营），辖境在今阳曲、交城、平遥、和顺间的晋中地区。

⑨ 冯翊：郡名。治临晋（今陕西大荔），辖境相当今陕西韩城、黄龙以南，白水、蒲城以东和渭河以北地区。

⑩ 安定：郡名。治临泾（今甘肃镇原东南），辖境在今甘肃平凉、景泰、靖远、会宁、泾川、镇原及宁夏中宁、中卫、同心、西吉、固原一带。

⑪ 上郡：地区名。汉时曾设郡，辖境约当今陕西北部及内蒙古乌审旗一带，东汉建安二十年（215年）废。



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已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①、三魏^②见士^③四万家以充之。裔不乱华^④,渐徙平阳、弘农^⑤、魏郡^⑥、京兆^⑦、上党杂胡,峻四夷^⑧出人之防,明先王荒服^⑨之制,万世之长策也。

【译文】

西部和北部的游牧民族强悍勇猛,自古以来就是边疆之患。曹魏初期,由于人口不足,西北各郡都被这些民族入住。他们现在虽然服从管辖,但以后一旦发生战乱,游牧骑兵从平阳、上党出发,用不了三天就能够到达孟津,那么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等地就全成为他们的地盘了。(陛下)应当乘平定吴国的威势,用谋臣猛将的智略,从北地、西河、安定出兵,恢复上郡,加强冯翊,从平阳以北各县招募被判死罪的人,再从三河和三魏地区迁徙四万户居民充实到这些地方。边地少数民族不能扰乱中原汉族地区,应当将

① 三河:河东、河内、河南三郡,与“三辅”、弘农同为畿辅之地。河东郡治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辖境在今山西阳城、沁水、浮山以西,永和、隰县、霍县以南地区;河内郡治野王(今河南沁阳),辖境在今河南黄河以北、京汉铁路以西地区;河南郡治雒阳(今河南洛阳东北),辖境主要在今河南黄河以南洛水、伊水下游,双泊河、贾鲁河上游地区。

② 三魏:《水经注》卷十《浊漳水》:“汉高帝十二年(195年)置魏郡,治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王莽更名魏城。后分魏郡,置东西都部都尉,故曰三魏。”辖境在今河北大名、磁县、涉县、武安、临漳、肥乡、魏县、丘县、成安、广平、馆陶,河南滑县、浚县、内黄及山东冠县一带。

③ 见士:在当地居住的人。见,同“现”,现成的、在当地居住的。

④ 裔不乱华:典出《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裔、夷,皆指边地少数民族;华、夏,都是汉族的古称。

⑤ 弘农:郡名。治弘农(今河南灵宝北),辖境在今河南黄河以南、宜阳以西的洛水、伊水、浙水等流域和陕西洛水、杜川河上游、丹江流域。

⑥ 魏郡:郡名。治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辖境在今河北大名、磁县、涉县、武安、临漳、肥乡、魏县、丘县、武安、广平、馆陶,河南滑县、浚县、内黄及山东冠县一带。

⑦ 京兆:郡名。治长安(今陕西西安),辖境约当今陕西秦岭以北、西安以东、渭河以南地区,为京畿之地。

⑧ 四夷:古指华夏族以外的四方少数民族。

⑨ 荒服:中国古代将王畿外围,以五百里为一区划,由近及远分为侯服、甸服、绥服、要服、荒服,合称五服。要服、荒服属于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地区。《史记·周本纪》:“夷蛮要服,戎翟(狄)荒服。”



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地区的各种少数民族逐渐迁走,加强对四方少数民族出入内地的控制,显明先王治理边地少数民族的制度,这是长治久安的良策啊!

【评析】

中国的民族史经过长期的演进,到秦始皇筑长城,在北方地区出现了一个民族分布界域比较分明的局面:长城之外,为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长城之内,为农耕汉族的生活区域。长城成为一道严密的关防。但这种界域分明的状态只维持了短暂的时期,在汉武帝以后就逐渐被打破。首先,汉武帝击破匈奴后,把许多匈奴降部安置于长城沿边,以后直到西晋,朝廷屡屡这样安置降附或归顺的北方部族,他们在与沿边郡县人民的日常往来中便逐渐向内渗透。其次,在两汉之际和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人口丧亡,边防废弛,北方部族人民(匈奴、羯、氐、羌、乌桓、鲜卑等)更大量地进入长城以内,并不断向内地深入,这种情况在汉末和三国时期尤为严重。所以到西晋立国的时候,中国北方地区的民族分布就形成了新的局面:大量的北方游牧民族部众进入长城以内,不仅在西北各郡,而且在中央王朝的腹心之地——关中和中原(特别是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等省),或聚族,或分散,与汉人杂居在一起,人口日渐繁殖。由于民族隔阂,内附的少数族人,常受士庶轻侮;而这个阶段又正是中国历史上土地兼并、人身依附最为严重的时期,进入内地的少数族人大量沦为奴隶、婢仆、佃客,受到比汉族农民更为非人的待遇,因而“怨恨之气,毒于骨髓”^①。北方地区的民族矛盾空前尖锐,这对晋朝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种威胁与秦汉时期由于匈奴的统一而在北方草原出现强大的游牧武装集团因而从外部对中央王朝构成严重威胁不同,表现为大量的北方游牧民族部众进入内地,他们与塞外的本部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互为呼应,而与中原汉族积怨深重,极为仇视中央王朝,因而从王朝内部对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构成了巨大威胁。

魏末晋初,西北各州县就常有内附的少数民族造反。魏末司马师当政时,邓艾曾建议从这些地方逐渐迁出与汉人杂居的氐羌等族,并迁匈奴于雁门。因当时内有司马氏、曹氏两党争权,外有魏、蜀、吴三国角力,未能顾及。晋武帝灭吴完成统一后,郭钦又上疏建议着手解决北方的民族问题。他提出

^① 《晋书·江统传》。



的具体办法是：乘平吴之威，发兵塞外，加强边防，从内地迁移人民充实边地郡县；把进入关中和中原的游牧部族逐渐迁移出去，加强对少数民族进出内地的控制，防止塞外游牧部族向关中和中原渗透。晋武帝没有采纳郭钦的建策，也没有采取其他有效办法解决北方民族问题。其中原因，可能一是晋武帝的昏愤，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晋初朝中有一种看法，认为只要平定了东吴，北方各部族自然就会安定，所谓“吴平则胡自定”^①，这对晋武帝影响很大，平吴罢兵就是体现（参见陶璜、山涛谏平吴罢兵）。其二，郭钦建议的核心，实际上是动用武力，把进入关中和中原、并已在那里繁衍生息的众多少数民族强制性地迁回塞外故地，这谈何容易！势必造成内外骚动，弄不好反而会引发大乱。邓艾、郭钦等人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所提出的对策却过于简单、草率。对于民族问题的这种简单化思维，也是时代局限使然。

北方民族问题没有解决，隐患越积越重。没有几年，晋武帝死，惠帝继位，朝政混乱，酿成了诸王争位的“八王之乱”^②。宗室诸王互相厮杀，兵连祸结，对政权和社会造成严重破坏，散布于关中和中原的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乘乱起兵，塞外的游牧部族闻风而动，呼应驰援，一举颠覆了西晋王朝——郭钦的预言不幸变成事实，中原地区随之陷入了“五胡十六国”的混战之中。

① 见《晋书·羊祜传》。西晋开国后，把灭吴完成统一放在第一位是对的，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北方民族问题的严重性，更不应在平吴实现统一后，仍不去注意解决这个问题。

② 晋惠帝时，关中氐、羌反，名士江统再次倡言把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迁回故地，写出了洋洋洒洒数千言的《徙戎论》（见《晋书·江统传》）。但其时“八王之乱”已起，朝廷已没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江统之论也只能成为一纸空文。



阮种论抚绥以德

题引：阮种，字德猷，尉氏（今河南开封）人，晋武帝时被举为贤良，对策^①第一，后曾任中书郎、平原相。这段论述是他举贤良时对策的一部分，对晋初北方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解决的思路，选自《晋书·阮种传》。

【原文】

自魏氏^②以来，夷虏^③内附^④，鲜有桀悍侵渔之患。由是边守^⑤遂息，郾塞^⑥不设。而今醜虏^⑦内居，与百姓杂处，边吏扰习^⑧，人又忘战。受方任^⑨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⑩，侵侮边夷；或干赏啗利^⑪，妄加讨戮。夫以微羈^⑫而御悍马，又乃操以烦策^⑬，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群醜荡骇，缘间^⑭而

① 汉晋时期以问题书之于简策，要求解答以试士，称为“策”或“策问”；应试者的答论，称为“对”、“对策”，或“策对”、“策论”。

② 魏氏：指三国时期的曹魏政权。

③ 夷虏：对少数民族的蔑称。

④ 内附：向内迁移。内，指边关（在北方就是长城）以内。下文提到的“内居”，意义相似。

⑤ 边守：边防守备。

⑥ 郾塞：郾，障的本字，小城堡；塞，关塞。

⑦ 醜虏：对少数民族的蔑称。

⑧ 扰习：习以为常。

⑨ 方任：一方的重任。指地方长官所任的职位。

⑩ 狙诈：狡猾奸诈。《汉书·叙传下》：“吴孙狙诈，申商酷烈。”

⑪ 干赏啗（dan，音淡）利：追逐利益。干，求取；啗，“啖”的异体字，即吃，引申为追求。又作“干赏蹈利”（《荀子·议兵》）。蹈，踩上、投入，引申为追逐。或认为“啗”即“蹈”之误。

⑫ 羈：马络头。

⑬ 策：马鞭，引申为鞭打。

⑭ 缘间：趁机会。缘，沿着、趁着；间，空隙、机会。



动。虽三州^①覆败,牧守^②不反,此非胡虏之甚劲,盖用之者过也。臣闻王者之伐,有征无战,怀远以德^③,不闻以兵。……宣元^④之时,赵充国征西零^⑤,冯奉世征南羌^⑥,皆兵不血刃,摧抑强暴,擒其首恶,此则折冲^⑦厌难^⑧,胜败相辨,中世之明效也。

【译文】

自从曹魏以来,少数民族向内迁移,很少有凶悍侵盗的祸害。因此边防守备就懈怠了,城堡和关塞也不设筑。如今少数民族内迁居住,与汉族百姓杂处在一起,边地的官吏习以为常,人们又忘记了战争。担负一方治理责任的人,才干又不相称,或者用狡猾奸诈的罪名,侵扰、侮辱边地少数民族;或者为了邀功逐利,对他们肆意征讨、杀戮。这好比用纤细的络头驾驭烈马,又不停地加以鞭打,马的不受控制,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少数民族骚动恐慌,一有机会就起来造反。虽然凉、雍、秦三个州遭到颠覆,刺史、太守败死,但这不是因为北方民族非常强悍,实在是当事者的过失。我听说王者的讨伐,有出征而无战斗,安抚远方的人民要用德,没听说用兵。……汉宣帝和汉元帝的时候,赵充国征西零,冯奉世征南羌,都兵不血刃,打击强暴,擒拿首恶,这样御敌平乱,胜败一目了然,是西汉中期明显的成效。

【评析】

晋初对于解决北方民族问题,也有人提出了与郭钦等人武力徙戎(见郭钦《徙戎疏》)不同的主张,阮种是一个代表。首先,他比较客观地分析了晋

① 三州:凉州、秦州、雍州,今甘肃、陕西一带。晋初屡有少数民族起事,秦州刺史胡烈、凉州刺史牵弘、杨欣等先后败死。

② 牧守:牧,即刺史,州的长官;守,太守,一郡之长。

③ 怀远以德:语出《左传·僖公七年》。怀,安抚、感化;远,远方人民。

④ 宣元:汉宣帝(前73~前49年)、汉元帝(前48~前33年),属西汉中期。

⑤ 赵充国征西零:事见《汉书·赵充国传》。赵充国(前137~前52年),西汉名将,汉宣帝时率兵平定先零羌之乱。西零,即先零,羌族的一支,分布于湟水下游地区。

⑥ 冯奉世征南羌:事见《汉书·冯奉世传》。冯奉世(?~前39年),西汉名将,汉元帝时率兵平定羌族之乱。南羌,指陇西一带羌族。

⑦ 折冲:使敌方的战车折还,意谓抵御、击退敌人。

⑧ 厌(ya,音压)难:平定祸乱。厌,抑制、制服;难,灾难、祸乱。



初民族矛盾尖锐的原因,指出官吏守边失职、治理不善、举措失误,对少数民族过分欺压,是导致内附的少数民族屡屡造反生事的主要原因。基于此,阮种主张对内附的少数民族在总体上要抚之以德,对造反生事者,应像西汉赵充国、冯奉世平羌乱那样,摧其强暴、擒其首恶,而不应滥用武力(参见本书第三章赵充国《屯田制羌疏》)。其思想的基调是恩威并施,而以怀柔德化为主。晋武帝对阮种的策论十分欣赏,但阮种对内附少数民族抚之以德的主张却并没有被推行,这在根本上是由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决定的。西晋时期,土地兼并和人身依附恶性发展,大量的内附少数民族人沦为奴隶、婢仆、佃客,受到非人的待遇,而以司马氏为核心的西晋统治集团,大多为汉魏以来的世家大族,集中代表了大地主阶层的利益,不可能去改变这种社会状况,对内附少数民族也就不可能真正做到抚之以德。所以后来起事的匈奴刘宣说:“晋为无道,奴隶御我。”^①

晋武帝既不能武力徙戎,又做不到德化远人,在北方民族问题上毫无作为,而其分封诸王、平吴罢兵等举措又严重失当,致使多种严重的安全隐患交织在一起,终由“八王之乱”这根导火索引起了大爆发,铸成了西晋王朝的短命结局(参见刘颂《陈封国之制》,陶璜、山涛谏平吴罢兵)。

^① 《晋书·刘元海载记》。



蔡谟论抗威待时

题引:蔡谟,东晋大臣,字道明,陈留考城(今河南兰考)人,官至侍中、太常、司徒。东晋成帝咸康五年(339年),征西将军庾亮上疏请规划、部署北伐中原,成帝让公卿讨论,蔡谟发表了这一看法。本篇选自《晋书·蔡谟传》。

【原文】

时有否泰^①,道^②有屈伸^③。暴逆^④之寇虽终灭亡,然当其强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⑤受黜于巴汉^⑥,忍辱于平城^⑦也。若争强于鸿门^⑧,则亡不终日,故萧何^⑨曰“百战百败,不死何待”也^⑩。原始要终^⑪,归于大济^⑫而已。岂

① 否(pi,音匹)泰:《易经》中的两卦。否,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为不利,为坏;泰,天地交而万物通——为有利,为好。两卦相随,寓意“否终则泰”、“否极泰来”。

② 道:在这里指因应时势的方法、办法。

③ 屈伸:屈曲和伸直,引申为退和进。“时有否泰,道有屈伸”,意思就是要“与时屈伸”(《荀子·不苟》),即根据时势灵活地选择进退。

④ 逆:倒行逆施,即反动。

⑤ 高祖:汉高祖刘邦。

⑥ 巴汉:巴,巴蜀;汉,汉中。公元前206年,项羽、刘邦合力灭秦后,项羽封刘邦为汉王,领有巴蜀和汉中,实际上把刘邦贬抑、排斥到边远的地区。

⑦ 平城:位今山西大同东北。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迎击匈奴,被围于城东白登山,屈辱地议和退兵。

⑧ 鸿门:古地名,在今陕西西安东北鸿门堡村。公元前206年,项羽在此宴见刘邦,对于是否乘机除掉刘邦犹豫不定,席间杀机四伏,刘邦险中脱身,史称“鸿门宴”。

⑨ 萧何:汉朝开国名相。佐刘邦起义,推翻秦朝,打败项羽,建立汉朝,位居群臣之首。

⑩ “百战百败,不死何待”:这是萧何劝刘邦的话。灭秦后,项羽封刘邦于巴蜀、汉中,刘邦发怒,想攻打项羽。萧何劝他暂时忍耐,说这总比死好。刘邦反问,为什么就会死?萧何说:“今众弗如,百战百败,不死何为?……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至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于是刘邦听了萧何的话,忍了下来(见《汉书·萧何传》)。

⑪ 原始要终:意为通过考察从始至终的过程来看事物的发展。原,考察;要,探求。

⑫ 归于大济:归,归结、收场;大济,最大的成功,引申为最终的结果。



与当亡之寇争迟速之间哉！夫惟鸿门不争，故垓下^①莫能与之争。文王身圯^②于羑里^③，故道泰于牧野^④；勾践见屈于会稽^⑤，故威申于强吴。今日之事，亦由此矣。贼假息之命^⑥垂尽，而豺狼之力尚强，宜抗威以待时。

【译文】

时势有坏有好，办法有退有进。残暴、反动的敌寇虽然最终会灭亡，但当它强盛的时候，人们都退而避开它。因此汉高祖刘邦接受了封往巴蜀和汉中的贬黜，忍受了平城被困的屈辱。如果他在鸿门与项羽争强斗胜，则早就灭亡了，所以萧何说“百战百败，能不死吗”。事物的发展，无非归结于最后的成功。为什么要与应当灭亡的敌人争一日之短长呢！正因为刘邦在鸿门不与项羽争强，所以垓下之战就没有人能与他争胜。周文王忍受了羑里囚禁的摧残，所以他的道义能够最终在牧野得到伸张；越王勾践在会稽山屈辱求和，因而得以最终灭亡了强大的吴国。今天的事情，也正是这样。贼寇的生命将尽，但他们如豺狼一样的力量还强，我们应当抗住威压，等待时机。

【评析】

公元316年西晋覆亡后，残余力量退守江南，建立了东晋政权。广大的北方地区，包括历来被视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关中和中原，被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所占据，100来年中产生了大大小小众多的政权，互相混战，此亡彼兴，史称十六国。经丧乱之余，在江南艰难复国的东晋政权，接受了大量渡江南下避乱的中原百姓，逐步稳定下来后，深怀国破家亡、背井离乡之痛的南渡汉人大多强烈地希望光复旧国，一些手握重兵的大臣也急切地谋划北伐。蔡謨“抗威以待时”的主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公元339

① 垓下：古地名，在今安徽灵璧东南沱河北岸。公元前202年，刘邦在这里最终击败项羽。

② 圯(pi，音匹)：毁坏、伤害。

③ 羑(you，音有)里：古城名，在今河南汤阴北。商朝末年，商纣王曾将周文王囚禁于此。

④ 牧野：古地名，在今河南淇县西南。商末，周武王在此大败商军，推翻了商朝。

⑤ 会稽：山名，在今浙江中部绍兴、嵊州、诸暨、东阳等市县间。春秋晚期吴越争霸，越为吴所败，越王勾践退居于此，向吴屈辱求和。

⑥ 假息之命：靠借来的气息维持生命，比喻生命已快到尽头。假，借。



年提出的。在形势判断上,蔡谟认为当时仍是敌强我弱,北伐的时机尚不成熟,正确的战略应是抗住强敌的威压,耐心等待时机,而不应意气用事,与敌争一日之短长。

“与时屈伸”是中国的传统思想,也是中国人重要的处世哲学,其含义是根据客观情势的有利与否灵活地选择进退,尤其强调在情势不利时能够隐忍退让,等待情势好转。中国古人很早就确立了这样的哲学观念:万事万物都处在变化之中,物极必反,客观情势也是如此。《易经》中“否极泰来”的卦象,就是这一观念的生动体现,它实际上成为中国人看待时势的一种信念。“与时屈伸”的思想,又与这样的信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这样的思想和信念运用于国家战略运筹,就是要正确判断形势,根据客观形势确定战略的基本取向——进还是退;特别是在形势不利时要能够灵活地进行退守,并隐忍、等待。“抗威以待时”的思想,对于弱势国家的安全战略选择,具有重大的意义。蔡谟用历史上的许多著名事例,言简意赅地阐明了其中的道理,指出处于弱势而不能隐忍,时势不利而不能等待,只能招致速亡。东晋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蔡谟对形势的判断和抗威以待时的主张是正确的,但东晋政权始终未能真正采纳这样的战略思想,结果导致国家安全环境越来越恶化(参见王羲之谏殷浩北伐)。



王羲之谏殷浩北伐

题引：王羲之(321~379年,又说303~361年或307~365年),东晋名臣,字逸少,琅邪(今山东临沂)人,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书法为世所重。殷浩(?~356年),东晋重臣,晋穆帝永和八年(352年)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统军北伐中原,王羲之认为不妥,极力谏阻。本篇第一段选自《资治通鉴》卷九十九《晋纪二十一》穆帝永和八年,第二段选自《晋书·王羲之传》。

【原文】

殷浩之北伐也,中军将军王羲之以书止之,不听。既而无功,复谋再举。羲之遣浩书曰:“今以区区江左^①,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争武功,非所当作。自顷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哉!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所复及,莫若还保长江,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羈縻^②而已。引咎责躬,更为善治,省其赋役,与民更始^③,庶可以救倒悬^④之急也!……”

又与会稽王^⑤笺^⑥陈浩不宜北伐并论时事,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

① 江左:长江在芜湖、南京间作西南、东北流向,秦汉以后,习称自此以下的长江南岸地区为江东。古人在地理上以东为左,故江东又名江左。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各代的统治区域主要在长江以南,都以江左为腹心之地,所以当时人又称东晋、南朝及其统治下的全部地区为江左。

② 羈縻:中国古代王朝对边远地区的惯常做法,使臣属而不反叛,但不纳入与内地一体的管治。

③ 更始:除旧布新,重新开始。

④ 倒悬:比喻处境痛苦危急,像人被倒挂着一样。

⑤ 会稽王:司马昱,晋元帝少子。永和元年(345年)晋穆帝二岁继位,司马昱以皇叔祖身份入掌朝政;后于371年登基成为简文帝。

⑥ 笺:奏笺,古代文体名,多用以上皇后、太子、诸王。



可追。愿殿下更垂三思^①,解^②而更张,令殷浩、荀羨还据合肥、广陵,许昌、谯郡、梁、彭城诸军皆还保淮;为不可胜^③之基,须^④根立势举^⑤,谋之未晚。此实当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忧可计日而待。安危之机,易于反掌,考之虚实,著于目前,愿运独断之明,定之于一朝^⑥也。……”

【译文】

殷浩北伐,中军将军王羲之写信阻止,殷浩不听。不久,北伐没有成功,殷浩又谋划再次北伐。王羲之写信给他说:“如今国家处于江东的狭小地区,天下心寒,本已很久了,力争武功,不是适当的作为。从来担负朝廷内外重任的人,不曾有深谋远虑,而是耗尽国家的元气,各行其是,竟然没有一件可以称道的功绩,最终使国家将有崩溃的趋势;那些担当事务的人,岂能推卸掉天下的责备!现在军队在外战败,内部的资财趋于枯竭,守住淮河的意图,不再能够做到,不如退守长江,都督和将领各返回原先的镇所;对长江以外的地区,使之臣属而不反叛就可以了。引咎自责,转而(对国家)进行妥善的治理,减轻赋税和徭役,为百姓除旧布新,兴许还可以挽救国家于危急之中!……”

王羲之又给会稽王司马昱上奏笺陈述殷浩不宜北伐并论述时事,奏笺中说:“……已经过去的事情无法劝阻,将来的事情还可以追赶。希望殿下再仔细考虑,放弃北伐而改弦更张,命令殷浩、荀羨退守合肥(今属安徽)、广陵(今江苏扬州),许昌(今河南许昌东)、谯郡(治所位今安徽亳州)、梁郡(治所位今河南商丘南)、彭城(今徐州)等地的军队都退守淮河;打造(使国家)不可战胜的基础,等(国家的)根本稳固了、形势大好了,再谋划北伐不迟。这实在是当前的上策。如果不这样做,国家很快就会有忧患。安、危的枢机,比手掌的翻动还容易,通过考察(国家的)虚实,眼前已看得很明白,希望殿下用乾纲独断的英明,尽快定下决心。……”

① 更垂三思:更,进一步;垂,敬词,用于尊贵者的动作;三思,反复考虑。

② 解:废除、停止,如解约、解聘。

③ 为不可胜:源于《孙子·形篇》“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意为善战者要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等待敌人出现败象。

④ 须:等待。

⑤ 举:飞腾。《吕氏春秋·论威》:“兔起凫举。”

⑥ 一朝:一个早上,喻很短的时间。



【评析】

东晋 100 来年中,为了恢复中原,屡屡北伐,屡屡失败。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国力军力不够强大和各方面没有充分的准备。而之所以在基础和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还要经常北伐,又与东晋朝廷的权力之争密切相关。东晋一朝,自始至终都为皇威不立、权臣柄国所困扰,从王敦到桓温到刘裕^①,权臣们外据藩镇、手握重兵而内争朝权,互相倾轧,北伐成为他们经营势力、以武功树威权的手段,而不是基于国家根本利益的深谋远虑、周密慎重之举。其结果是:屡屡轻率北伐,成效甚微,甚而惨败,国力不断消耗,国势江河日下。这正是王羲之痛心疾首之处,也正是基于此,他坚决反对殷浩的北伐。

当时,作为宗室执掌朝政的会稽王司马昱与安西将军桓温互相角力,司马昱引扬州刺史殷浩入朝为援;桓温都督荆、司、雍、益、梁、宁、交、广八州,“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②。永和七年(351年),北方的后赵(十六国之一)灭亡,中原混乱,桓温、殷浩都想乘机北伐,司马昱不许桓温而支持殷浩北伐。王羲之认为,其时中原虽出现了一定的机会,但东晋自身由于举措失当,国家已经严重虚耗,内忧重重,百姓不堪重负,将有崩溃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不应再兴师北伐,而应改弦更张,先治理好内部,让百姓休养生息,使国家逐渐富强起来,具有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再把握时机,谋划北伐(这与上一篇蔡谟论抗威待时的主张是一致的)。然而,殷浩、司马昱没有听从王羲之的再三劝阻,还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连续起兵北伐,结果两次都遭到失败,一次更比一次败得惨。桓温乘机上疏攻击,殷浩被废为庶人,身败名裂。

可叹的是,桓温扳倒殷浩后,又迫不及待地进行北伐,结果还是受挫而还。权力之争使东晋的北伐严重偏离了国家利益的轨道,失去了对形势的理智判断,不可避免地一再失败,致使国力不断损耗,国家安全环境日益恶化。在此恶性循环中,东晋终未能恢复中原,反而最后被权臣刘裕取而代之,过渡到了南朝刘宋政权。

需要补充指出的是,王羲之给殷浩的建议也有不妥之处,这就是放弃淮河防线、退守长江的主张。后来的历史一再证明,“守江必守淮”,丢失了淮河

① 这三个人分别是东晋一朝初期、中期、末期野心和势力都堪称第一的权臣。

② 见《资治通鉴》卷九十九《晋纪二十一》穆帝永和七年。调,古代赋税的一种;殆,几乎。



流域,长江必定守不住^①。东晋要治理内部,必须经营好淮河防线,巩固国防。王羲之后来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给司马昱的奏笺中就改变了提法,实际上是主张军事上守住淮河,政治上大力经营好内部。东晋要“抗威以待时”、“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就必须这样做。可惜在权力斗争的恶性循环中,这些很好的战略构想,在现实中完全落了空。

^① 宋代章如愚论江淮形势有言:“江淮之险,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而长淮之地,又天地所以蔽长江也。昔立国于南,则守江以为家户,备淮以为藩篱,是故轻重之权,不在江而在淮。”(《群书考索》卷五十八“江淮形势”;参见明·章潢《图书编》卷三十四“论江淮”)直到上个世纪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袁乔劝桓温伐蜀

题引：袁乔，字彦叔，东晋权臣桓温(312~373年)部将，曾任江夏相。西晋灭亡后，巴氏族首领李氏在成都建立了成汉政权，据有巴蜀。永和二年(346年)，安西将军桓温拟率军攻打成汉，部下将领大多不赞成，袁乔力排众议，坚定了桓温的决心。本篇选自《资治通鉴》卷九十七《晋纪十九》穆帝永和二年。

【原文】

安西将军桓温将伐汉，将佐皆以为不可。江夏相袁乔劝之曰：“夫经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于胸中，不必待众言皆合也。今为天下之患者，胡^①、蜀二寇而已，蜀虽险固，比胡为弱，将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势^②无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险远，不修战备。宜以精卒万人轻齎^③疾趋，比^④其觉之，我已出其险要，可一战擒也。蜀地富饶，户口繁庶，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国家之大利也。论者恐大军既西，胡必窥觊，此似是而非。胡闻我万里远征，以为内有重备，必不敢动；纵有侵軼^⑤，缘江诸军足以拒守，必无忧也。”温从之。

【译文】

安西将军桓温将要征伐成汉，部下都认为不可以。江夏相袁乔劝他说：“策划经营大事，本就不是常情常理能够做到的，智慧的人胸中了然，不必等大家的意见都一致。如今对国家构成威胁的，是占据北方的游牧民族和占据

① 胡：统指当时控制着北方地区的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族政权。

② 李势：成汉当时的国君。

③ 轻齎(jì, 音机)：轻装。齎，“赍”的异体字，意为旅行人携带衣食等物。

④ 比：及、等到。

⑤ 侵軼：侵扰、侵犯。



蜀地的成汉两个敌寇而已,蜀地的成汉虽然险要坚固,但比起北方各族政权要弱,想要消灭它们,应当先从容易的下手。李势无道,民众不拥护,而且依仗其地险路远,不整饬战备。我们应当用精兵万人轻装急进,等他们发觉,我已越过其险要,可以一战就将其擒获。蜀地富饶,户口众多,诸葛亮依靠它与中原抗衡,我们如果得到并占有它,将是国家的大利。议论的人担心大军西征后,北方的敌人一定会窥伺可乘之隙,这种看法似是而非。北方的敌人听到我万里远征,以为我内部有周密的防备,必然不敢轻动;即使有些侵扰,沿江各军足以防御,肯定没有什么可忧虑的。”桓温听从了他的意见。

【评析】

东晋的北伐乏善可陈,但公元346~347年桓温伐蜀,却取得了成功。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东晋面临的重大威胁来自北方占据了关中和中原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在国家安全上,东晋的首要任务是防范北方;收复关中和中原,又是朝廷上下梦寐以求的最大目标。因此,北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战略的主要方向,必须慎之又慎,举措稍有不当,可能就会产生严重后果,甚至危及国家根本。权臣们的屡屡轻率北伐,就是背离了处理国家安全主要矛盾所应具备的慎重原则。但另一方面,东晋上下对北方这个主要战略方向,往往又显得过分紧张,以至在北方威胁的重压之下,束手束脚,不敢动弹。桓温伐蜀,应该说是在主要战略方向处于敌我相峙状态时,寻求在次要方向有所作为的一个良策,通过攻取巴蜀,可以扩大东晋的版图,增强东晋的实力,是必要的谋势之举,却遭到部下多数将领的反对,他们的理由就是担心北方的强敌乘机而动。正如袁乔所指出,这种过分小心的观点似是而非。桓温听从了袁乔的分析,果断出兵伐蜀,速战速决,一举灭亡了成汉,占领了巴蜀,取得了东晋历史上少有的大胜利。事实说明,在主要战略方向难有突破或取守势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在次要战略方向有所作为,并通过次要战略方向的积极进取,来改变国家安全全局的战略态势。

东晋的有识之士提出,在东晋和十六国的南、北对抗中,东晋要“抗威以待时”(见蔡谟论抗威待时)。轻率北伐不是抗威待时,束手束脚、不敢动弹也不是抗威待时。王羲之主张军事上守住淮河,政治上经营好内部,培元固本(见王羲之谏殷浩北伐);袁乔推动桓温伐蜀,先取易胜之敌,以逐步增强国家的实力,才是抗威待时的正确方法。



苻坚等论山河之固

题引：苻坚(338~385年)，略阳临渭(今甘肃天水)人，氐族，十六国时期前秦国君，公元357~385年在位。苻坚即位之初，与群臣共登龙门，观山河壮丽，引发了一段有关安邦定国的议论。本篇选自《晋书·苻坚载记上》。

【原文】

坚自临晋登龙门^①，顾谓其群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娄敬^②有言，‘关中四塞之国’^③，真不虚也。”权翼、薛讃^④对曰：“臣闻夏殷之都非不险也，周秦之众非不多也，终于身窜南巢^⑤，首悬白旗^⑥，躯残于犬戎^⑦，国分于项籍^⑧者，何也？德之不修故耳。吴起有言：‘在德不在险。’深愿陛下追踪唐虞^⑨，怀远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坚大悦，乃还长安^⑩，赐为父后者爵一级，鳏寡孤独高年谷帛有差，丐^⑪所过田租之半。是秋，大旱，坚减膳彻悬^⑫，金玉绮绣皆

① 龙门：即黄河禹门口。界于陕、晋(今陕西韩城东北和山西河津西北)之间，黄河至此，两岸峭壁对峙，形如门阙，因而得名。

② 娄敬：即刘敬。汉初名臣，建议刘邦入都关中有功，得刘邦赐姓刘。

③ 关中四塞之国：典出战国时人对秦国地理形势的形容。秦处关中，四面都有天险可作屏障，故称“四塞之国”(见《史记·苏秦列传》)。

④ 权翼、薛讃：二人都是苻坚的谋主，深受信任。

⑤ 身窜南巢：商灭夏后，商王成汤把夏主桀流放到南巢(今安徽巢湖西南)。

⑥ 首悬白旗：周灭商后，周武王把商纣王的头斩下来悬挂于太白之旗上。

⑦ 躯残于犬戎：公元前771年，西部游牧族犬戎攻破西周都城镐京(位今陕西长安西北)，杀周幽王。周朝被迫迁都洛阳。

⑧ 国分于项籍：项籍即项羽。秦朝灭亡后，项羽大封诸侯，瓜分了秦朝的天下。

⑨ 唐虞：即尧和舜。尧为陶唐氏，故称唐尧；舜为有虞氏，故称虞舜。

⑩ 长安：前秦国都，位今陕西西安西北。

⑪ 丐：施予。《后汉书·窦武传》：“丐施贫民。”

⑫ 彻悬：撤去悬挂的乐器，以示与民同甘苦。彻，通“撤”；悬，指钟磬等悬挂的乐器。



散之戎士,后宫悉去罗纨,衣不曳地。开山泽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与境内休息。

【译文】

苻坚从临晋(今陕西大荔东)登上龙门,回头对群臣说:“山河险固,多么壮美啊! 蒯敬曾说,‘关中四面都有天险’,真不假啊!”权翼和薛讃回答道:“臣听说夏朝和商朝的都城不是不险要,周朝和秦朝的士民不是不众多,但最终夏桀被流放到了南巢,商纣的头被挂到了太白旗上,周幽王被犬戎攻杀,秦朝的天下被项羽瓜分,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不修德。吴起曾说:‘国家安全在德不在险。’恳切希望陛下追随唐尧虞舜,用德来安抚、感化远方人民。山河的险固是靠不住的。”苻坚大喜,于是返回长安,赐给百姓继承父业的人爵一级,鳏寡、老人粮食和布帛不等,免除所经过地方田租的一半。这年秋天,大旱,苻坚减少了膳食,撤除了乐器,把金玉丝绣都散发给战士,后宫都不穿绫罗,服装不拖到地上。开放山林湖泽的利益,使官府、百姓共享,暂停用兵,让境内人民休养生息。

【评析】

西晋灭亡后,北方地区陷入了五胡十六国的混战之中,由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建立的大小政权,大多穷兵黩武、四面为战,兴也勃,亡也速。苻坚是十六国时期最为博学多才、有宏图大志的个别君主之一,他较多地继承了中国历代王朝的治国经验和兴亡教训,开创了当时最为盛大的局面。

天时地利不如人和、国家安全在德不在险,是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就已经对此做了明确的阐述(参见本书第一章司马侯论三殆、第二章孟子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权翼、薛讃都是饱学儒士,他们用这一思想结合前代亡国教训劝导苻坚要以德治国。苻坚从小聪敏,据说8岁时就要请师求学,祖父苻洪说:“汝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邪!”感到很惊奇,但还是高兴地答应了。所以他从小就受到中原文化的熏染,“性仁友”。在十六国你亡我兴的混战中,苻坚也看到了光凭打打杀杀难有大的作为,即位后,在用武力开疆拓土的同时,就着手推行中原王朝一贯的治国方法,所以权翼、薛讃以德治国的主张,与苻坚一拍即合。

在治国上,苻坚主要依靠王猛、薛讃、权翼等中原儒士,特别是王猛



(325 ~ 375年),世称有诸葛孔明之才,犹为苻坚所倚重,实际上处于总理内政的地位。在王猛主持下,前秦整顿吏治,在关中开水利、兴农桑、办学校,“政理称举”,出现了西晋亡后北方地区不曾一见的社会安定、经济恢复局面,史称“关陇清晏,百姓丰乐”^①。这为苻坚的军事经略,提供了莫大的支持,于是苻坚以关中为根据地,先后攻灭前燕、前凉、代,统一了北方大部地区,又夺取了东晋的益州,并派军远征西域。这一段的前秦历史,称得上是文武相济、治国有道,不仅确保了关中的安全和稳定,而且开拓出了大好的局面。

^① 《晋书·苻坚载记上》。



苻融谏伐东晋

题引：苻融(? ~383年)，十六国时期前秦国君苻坚之弟，封阳平公。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年)，苻坚谋划攻打东晋，苻融和群臣极力谏阻，未被采纳。本篇选自《资治通鉴》卷一百四《晋纪二十六》孝武帝太元七年(参见《晋书·苻坚载记下》)。

【原文】

冬，十月，秦王坚会群臣于太极殿，议曰：“自吾承业，垂三十载，四方略定，唯东南一隅，未沾王化。今略计吾士卒，可得九十七万，吾欲自将以讨之，何如？”……于是群臣各言利害，久之不决。坚曰：“此所谓筑舍道旁^①，无时可成。吾当内断于心耳！”群臣皆出，独留阳平公融，谓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过一二臣而已。今众言纷纷，徒乱人意，吾当与汝决之。”对曰：“今伐晋有三难：天道^②不顺，一也；晋国无衅^③，二也；我数战兵疲，民有畏敌之心，三也。群臣言晋不可伐者，皆忠臣也，愿陛下听之。”坚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复何望！吾强兵百万，资仗如山；吾虽未为令主，亦非闇^④劣；乘累捷之势，击垂亡之国，何患不克。岂可复留此残寇，使长为国家之忧哉！”融泣曰：“晋未可灭，昭然甚明。今劳师大举，恐无万全^⑤之功。且臣之所忧，不止于此。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满畿甸，此属皆我之深仇。太子独与弱卒数万留守京师，臣惧有不虞之变生于腹心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顽愚，诚^⑥不足采；王景略一时

① 筑舍道旁：成语。原作“筑室道谋”，典出《诗经·小雅·小旻》，意为在路边盖房子，请教过路人，一人一个意思，没法盖成房子。比喻人多口杂，意见纷纷，办不成事。

② 天道：这里指天象所预示的吉凶祸福。

③ 衅：瑕隙、事端。

④ 闇：同“暗”，昏庸愚昧。

⑤ 万全：万无一失，绝对把握，绝对安全。

⑥ 诚：此处意为如果。



英杰，陛下常比之诸葛武侯，独不记其临没之言乎^①。”坚不听。

【译文】

（前秦建元十八年）冬，十月，秦王苻坚在太极殿与群臣议事，说：“自从我继承大业，已将近三十年，四方大体平定，只有东南一隅，还没有统一。现在概略估计我们的军队，可以有九十七万人，我想亲自率军征伐东晋，怎么样？”……于是群臣各自就利或不利发表看法，长久定不下来。苻坚说：“这真是盖房子请教过路人，永远也盖不成。我当自己在心中决断！”群臣都退出后，苻坚单独留下阳平公苻融，对他说：“自古以来决定大事，都不过一两个大臣而已。如今大家议论纷纷，只能扰乱人心，我当与你决定这件事。”苻融回答道：“现在伐晋有三难：一是天道不顺；二是晋国没有内乱；三是我连续作战，军队疲惫，民众有畏惧的心理。群臣中说东晋不能打的人，都是忠臣，希望陛下听从他们的意见。”苻坚发怒说：“你也这样，我还能期望谁！我有强兵百万，物资和武器堆积如山；我虽然算不上明主，但也不是昏君；我们趁连战连胜之势，攻打将要灭亡的国家，为什么担心不成功？岂能再留下这个残余敌寇，使它继续成为国家的忧患！”苻融流泪说：“东晋灭不掉，是很清楚的事情。如今劳苦军队大举远征，恐怕没有绝对的成功把握。而且臣所担心的，还不单单是这个。陛下优待鲜卑和羌族、羯族，他们的人布满了京畿地区，这些部族都是与我有深仇大恨的。太子仅和数万弱兵留守京师，我担心有预料不到的变故发生于腹心肘腋，后悔就来不及了。我的顽固愚陋之见，如果不足以采纳；那么王景略是当世的英杰，陛下常把他比作诸葛亮，难道陛下忘记了他临终的遗言吗？”苻坚不听。

【评析】

苻坚从公元357年即位，到公元382年，已经在位26个年头。此时前秦

^① 王景略：王猛（325～375年），字景略，北海剧（今山东寿光东南）人，苻坚的股肱之臣。公元375年，王猛病重，自知不久人世，上疏提醒苻坚：“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是以古先哲王，知功业之不易，战战兢兢，如临深谷。伏惟陛下，追踪前圣，天下幸甚。”王猛临终，苻坚又问以后事，王猛答：“晋虽僻处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没之后，愿勿以晋为图。鲜卑、西羌，我之仇敌，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三《晋纪二十五》孝武帝宁康三年）



业已统一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有雄兵近百万,匈奴、羌、羯、鲜卑等族大多臣服于他,境内生产逐渐得到恢复,特别是关中地区,呈现出“百姓丰乐”的局面。这时,苻坚觉得是挥师南下,消灭东晋,一举统一中国的时候了。

然而,北方地区的其他民族势力,当时依然非常强大,特别是羌、羯、鲜卑等族,保有相当完整的军事力量,其领袖人物,像鲜卑的慕容垂、羌族的姚萇,都是当世的枭雄,与苻坚都有灭国杀亲、不共戴天之仇,苻坚为了收服各族部众,对慕容垂、姚萇等人优待有加,而他们迫于时势虽然臣服于苻坚,却无时无刻不思谋着复国自立。前秦表面上统一了北方大部地区,实际上还远不是一个巩固、牢靠的国家。因此,以王猛、苻融为代表,朝中多数大臣认为,此时还不是南伐东晋的成熟时机,前秦的当务之急是彻底解决好羌、羯、鲜卑等降附部族的问题,消除内部的不安定因素,进一步巩固根基。这就与苻坚在战略方向的选择、战略次序的确定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公元375年王猛去世之前,苻坚已逐渐有了骄矜之色,在统一大业上流露出急切的心情,对形势的判断开始不清醒,非但不注意解决各降附部族的问题,而且把他们引为用兵所倚重的力量。所以王猛在病榻上特意上书,提醒苻坚要战战兢兢,善始善终;临终又直言相劝,希望苻坚不要谋取东晋,而要解决鲜卑和羌族降部问题。到了公元382年,苻坚更加志得意满,决意伐晋。慕容垂、姚萇等人极力怂恿,实则想让前秦和东晋拼死相斗,两败俱伤,他们好乘机复国。一直辅佐苻坚开创基业的权翼等人则坚决反对伐晋,苻坚之弟阳平公苻融更是涕泣而谏。但苻坚一意孤行,反而称道慕容垂:“与吾共定天下者,独卿而已。”

于是,公元383年,苻坚大举伐晋,号称雄兵百万,其中裹挟了降附的各族部众,成分复杂,军心不稳,大量的汉族将士不愿伐晋^①,慕容垂、姚萇等部则心怀叵测,完全违背了“师克在和不在众”的用兵原则。结果淝水之战,前锋稍有异动,大军立刻崩溃。当时,前秦和东晋的军队隔着淝水(淮河支流,在今安徽北部)对峙,晋将谢玄机智地要求秦军稍为后退,让晋军渡过淝水进行决战。苻坚想乘晋军半渡而击,就下令部队后退。谁知前锋往后一退,整

^① 王猛以东晋“正朔相承”来劝告苻坚不要伐晋,既体现了中原汉人的民族情结,也体现了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因为苻坚的氏族人口有限,北方人民主体仍是汉族,前秦的军队中有大量的汉族将士,他们也普遍视东晋为正统所在,这对军心士气会有很大影响,王猛正是看到了这一层。



个大军就后退不止，汉将朱序^①乘机在阵后大喊“秦军败了”，各部纷纷奔逃，晋军急速渡河掩杀过来，秦军全线崩溃，人马互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苻融死于乱军之中，苻坚虽然逃归，再也无力控制局面，各族首领纷纷拥众自立，慕容垂反于关东，姚萇反于关中，前秦遂乱。两年后，苻坚为姚萇所杀。

由于在统一问题上操之过急，苻坚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辛苦基业毁于一旦。其中教训，可以归结于一个“骄”字。骄，因而不清醒，因而刚愎自用，决策失当，军败国亡。

① 朱序原是东晋大将，镇守襄阳，十年前兵败被苻坚所俘。



李安世《均田疏》

题引：李安世(443~493年)，北魏赵郡平棘(今河北赵县)人，以贵胄子弟出仕，历任主客令、主客给事中、相州刺史、赵郡公。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为安定社会，富民强国，上疏建议实行均田制，得到采纳。本篇选自《魏书·李孝伯传附李安世传》。

【原文】

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安世乃上疏曰：

臣闻量地画野，经国大式；邑地相参，致治之本。井税^①之兴，其来日久，田莱^②之数，制之以限，盖欲使土不旷功^③，民罔^④游力^⑤。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所以恤彼贫微，抑兹贪欲，同富约^⑥之不均，一齐民^⑦于编户。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⑧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侥幸之徒兴，繁多之狱作。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⑨，令分艺^⑩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

① 井税：即井田制，相传商周时期的一种土地制度(见《孟子·滕文公上》)。

② 莱：轮休的田地。

③ 旷功：旷于事功，意为土地得不到耕种。

④ 罔：无、没有。

⑤ 游力：没有使用的力量，意为无地可耕。

⑥ 富约：即富和贫。

⑦ 齐民：平民。

⑧ 三长：北魏地方基层官吏党长、里长、邻长的合称，北魏孝文帝时始设。《魏书·食货志》：“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

⑨ 径术：纵横于田间的道路，实起疆界的作用。

⑩ 艺：从事，这里意指耕种。

右靡余地之盈。则无私之泽，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①矣。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然后虚妄之民，绝望于覬覦；守分之士，永免于凌夺矣。

高祖深纳之，后均田之制，起于此矣。

【译文】

当时人民穷困饥饿，四处流亡，豪门大族大量侵夺霸占土地。李安世于是上疏说：

臣听说测量土地区划田野，是治理国家的大法式；城邑和土地相参错，是有效治理的根本。井田制的兴起，由来已久，耕种和轮休的田地数目，通过制度加以规定，目的是要使土地不荒废，农民有地可耕。雄强的家族，不独占肥田沃野；弱小的农夫，也有顷亩田地。因此，抚恤贫穷弱小，抑制贪婪欲望，使贫富不均趋于相同，把平民百姓统一编入户籍。（如今）臣私下见州郡百姓，有的因灾年歉收而流亡迁徙，抛弃或变卖田地房屋，漂泊异乡，历经好几个时期，直至地方上设立了党长、里长、邻长，才返回故居，这时宅院荒废，树木改种，事情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容易产生假冒，势力强大的家族，肆意侵夺霸占，……（以致）争执诉讼，延续数年都判不了。良田弃置得不到耕种，柔嫩的桑叶直至枯萎也不采摘，希冀获取侥幸之利的人大量出现，官司越来越多。想要家家丰足，年年有积储，人人都有资财用度，能办得到吗！愚见以为如今虽然原先的田畴难以恢复，但应当重新均衡丈量（土地），审定田野间的道路，使（农民）分别耕种有标准，力量和产业相称，弱小的百姓获得赖以生存的利益，豪门大族没有空余闲置的土地。那么，无私的惠泽就能平均地播撒到广大人民中间；普通百姓就能积累起像山丘一样的财富。另外，对有讼争的土地，应当限时判决，事隔多年，难以查清楚的，就都判归现在所属之人。然后，那些不老实的人，断绝了覬覦的念头；安分的人，永远不再受侵夺欺凌。

孝文帝对这个建议深为肯定，后来的均田制度，就由此而起。

【评析】

在西晋亡后北方地区五胡十六国的混战中，由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最终站稳了脚跟，逐渐统一了北方地区。随着南方的东晋被刘宋政权取代，北

^① 比户：指平民百姓。比，并列。



方大体归于北魏,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时期(420~589年)。北魏之所以能够在北方地区的混战中胜出,与其战略上的举措得宜密切相关,在南北朝对峙中,北魏进一步汲取中原历代王朝治国安邦的成功经验,大刀阔斧地推进各方面建设,为国家的巩固和富强打下了较扎实的根基。后来隋的统一中国就得益于此,因为隋归根结底是北魏的继承者^①。

在北魏的各方面建设中,孝文帝推行均田制,是对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的一项举措。

自秦汉以来,中国历代王朝都是建立在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农业社会之上。国家按郡县把自耕农统一编入户籍,按户籍征收赋税、摊派劳役、征召兵员。如果自耕农大量破产,成为流浪乞讨的流民,或者依附于豪强地主,成为受其荫庇的奴婢、佃客,国家的户籍就会变得名不符实,就难以按户籍征收赋税、摊派劳役、征集兵员,而大量出现的流民则成为社会动乱的因素,拥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丁(奴婢、佃客)的豪强地主,则与国家形成利益之争,对官府权威构成挑战。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耕农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基础,只有拥有庞大、安定的自耕农阶层,朝廷才能有稳定、充足的经济、兵员和劳役来源,国家才能够安定、巩固和富强。所以在秦汉以下的每一个朝代,保护自耕农都是头等要务,秦汉时期强制迁徙豪强大户的做法和与民休养生息的主张,就都与保护自耕农的意识密切相关。北魏孝文帝推行均田制,则有其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历史必然性。

经过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北方地区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凋弊,土地荒芜,百姓流离,社会上出现大量的流亡浮游人口。进入中原的北方各部族成员,许多在战乱中没落下来,无田无业,也加入了流民的行列。与此同时,魏晋以来的土地兼并风潮依然非常严重,豪门大族大量侵夺霸占土地,新入主中原的鲜卑贵族也大量侵占良田,北魏统治者初时还圈占广大土地为牧场,所有这些都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失地流亡,或沦落为贵族、豪门的奴婢、佃客,而拥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丁的豪门,往往隐匿不报,与朝廷争利。在这种情况下,非但生产得不到发展,人民缺衣少食,国家收不齐赋税,国库难以充盈,而且酝酿着社会动乱的巨大危险。不解决这个问题,北魏国家的安定、巩固和发展就谈不上。

^① 北魏于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不久东魏被北齐取代,西魏被北周取代,北周灭北齐,而后为隋取代,隋灭陈(南朝),统一中国。

李安世比较透彻地看到了这一点,他的这篇奏疏,核心就是建议重新均分田地,恢复农业生产的秩序,使流亡和被豪门隐占的人口有田可耕,能够重新附著于土地,成为为国家承担赋税、兵役和劳役义务的自耕农。奏疏全文没有太过激烈的言词,但实实在在地抓住了当时对国家安定和富强至关重要的问题,提出了明确的对策主张,体现了民富国富、民安国安的思想。北魏经过前期诸王的武功开拓,到孝文帝时,国家进入了需要大力加强内部各方面整治和建设的时期,李安世的这个建议与孝文帝的期望正相符合,所以深受肯定。太和九年十月,孝文帝便颁诏推行均田制,派遣使者“循行州郡,均给天下之田”^①。这是历史上由朝廷大规模均分田地做得比较成功的一次,尽管由于时代局限,在许多方面并不彻底,但对安定社会、恢复和发展经济还是起了重要的作用。

^① 《魏书·高祖纪》。



崔浩等议伐柔然

题引：崔浩(? ~450年)，北魏名臣，字伯渊，清河东武城(今山东武城)人，仕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朝，官至司徒，参与军国大计，多所谋划。太武帝神䴥二年(429年)，力主出击柔然，与诸臣当廷辩论。本篇选自《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一《宋纪三》文帝元嘉六年(参见《魏书·崔浩传》)。

【原文】

夏，四月，……魏主将击柔然^①，治兵于南郊。……尚书令刘瓘等共推太史令张渊、徐辩使言于魏主曰：“今兹己巳，三阴之岁^②，岁星^③袭月，太白^④在西方，不可举兵。北伐必败，虽克，不利于上。”……魏主意不快，诏浩与渊等论难于前。

浩诘渊、辩曰：“阳为德，阴为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⑤。夫王者用刑，小则肆诸市朝，大则陈诸原野。今出兵以讨有罪，乃所以修刑也。……愿陛下勿疑。”渊、辩复曰：“蠕蠕^⑥，荒外^⑦无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

① 柔然：北方游牧古族，4世纪末5世纪初壮大兴起。

② 今兹己巳，三阴之岁：古人用于支纪年，并把干支分为阴阳两类，如甲乙丙丁，甲为阳，乙为阴，丙为阳，丁为阴，依此类推，己、巳都是阴，己巳相合也为阴，故称己巳年为三阴之年。

③ 岁星：中国古代称木星为岁星。

④ 太白：中国古代称金星为太白星。

⑤ 阳为德，阴为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古人认为事物有阴阳之分，德是阳，刑是阴，日是阳，月是阴；天象昭示人事，日食说明德有缺，月食说明刑有缺，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

⑥ 蠕蠕：对柔然的蔑称。

⑦ 荒外：荒服之外的地方。中国古代将王畿外围，以五百里为一区划，由近及远分为侯服、甸服、绥服、要服、荒服，合称五服。要服、荒服属于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地区。《史记·周本纪》：“夷蛮要服，戎翟(狄)荒服。”荒服之外，极言其荒凉僻远。



可臣而使,轻疾无常,难得而制;有何汲汲^①,而劳士马以伐之?”浩曰:“渊、辩言天道^②,犹是其职,至于人事形势,尤非其所知。此乃汉世常谈,施之于今,殊不合事宜。何则?蠕蠕本国家北边之臣,中间叛去。今诛其元恶,收其良民,令复旧役,非无用也。世人皆谓渊、辩通解数术,明决成败,臣请试问之:属者^③统万^④未亡之前,有无败徵?若其^⑤不知,是无术也;知而不言,是不忠也。”时赫连昌^⑥在坐,渊等自以未尝有言,惭不能对。魏主大悦。

既罢,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寇^⑦方伺国隙,而舍之北伐,若蠕蠕远遁,前无所获,后有强寇,将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则无以待南寇。南人闻国家克统万以来,内怀恐惧,故扬声动众以卫淮北。比吾破蠕蠕,往还之间,南寇必不动也。且彼步我骑,彼能北来,我亦南往,在彼甚困,于我未劳。况南北殊俗,水陆异宜,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何以言之?以刘裕^⑧之雄杰,吞并关中,留其爱子,辅以良将,精兵数万,犹不能守,全军覆没,号哭之声,至今未已。况义隆^⑨今日君臣,非裕时之比;主上英武,士马精强,彼若果来,譬如以驹犊斗虎狼也,何惧之有!蠕蠕恃其绝远,谓国家力不能制,自宽日久,故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钞。今掩其不备,必望尘骇散。牡马护牝,牝马恋驹,驱驰难制,不得水草,不过数日,必聚而困弊,可一举而灭也。暂劳永逸,时不可失。患在上无此意,今上意已决,奈何止之!”

① 汲汲:心情急切的样子。

② 天道:指天象预示的吉凶祸福。

③ 属者:不久之前。

④ 统万:十六国时期匈奴族赫连氏建立的政权——夏的都城(故址在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公元427年被北魏太武帝攻取。

⑤ 其:即张渊、徐辩,二人都曾为夏臣,统万城陷落后,被俘降于北魏。

⑥ 赫连昌:夏的君主,统万城陷落后,被俘降于北魏。

⑦ 南寇:指南朝宋政权。

⑧ 刘裕:东晋末期权臣,公元420年取代东晋建立宋政权,是为宋武帝,东晋由此过渡到了南朝。刘裕曾于417年统军北伐,消灭后秦,夺取关中,留爱子刘义真督兵镇守,不料次年留守诸将发生内哄,大败于夏,全军覆没,重又丢失关中。

⑨ 义隆: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刘裕之子。



【译文】

(北魏神䴥二年)夏,四月,……魏太武帝将攻打柔然,在南郊校阅军队。……尚书令刘絜等人一起推举太史令张渊、徐辩向太武帝进言:“今年是己巳年,属于三阴之年,岁星袭月,太白星位于西方,不可以兴兵。北伐必败,即使成功,也对君主不利。”……太武帝神情不愉快,命崔浩与张渊等人在面前辩论。

崔浩责问张渊、徐辩:“阳是德,阴是刑,所以日食修德,月食修刑。王者用刑,小用就陈设于街市和朝廷,大用就陈列于原野。现在出兵讨伐有罪,就是修刑。……希望陛下不要犹疑。”张渊、徐辩又说:“柔然是荒凉僻远地方的无用之物,得到他们的土地无法耕作取食,得到他们的人民不能臣服役使,他们来去轻快,没有常规,难以控制,有什么急迫的需要,要劳师动众去攻打他们?”崔浩说:“张渊、徐辩谈论天道,倒还是他们的职责,至于人事形势,他们就不了解了。他们所说的都是汉朝的老生常谈,用在今天,实在不合时宜。为什么呢?柔然本来就是国家北部边疆的臣属,中间反叛离去。如今诛杀其首恶,收服其良民,使其重新为国家所驱使,这不是没有用。世人都说张渊、徐辩通晓数术,能准确预言成败,臣想试问他们:不久前统万城未破之前,有没有要败的征兆?如果他们不知道,是没有法术;知道却不说,就是不忠。”当时赫连昌在座,张渊、徐辩二人因当初不曾有过建言,惭愧得无言以对。太武帝非常高兴。

辩论结束后,公卿大臣中有人指责崔浩:“如今南方的敌寇正等待我们国家出现空隙,我们却把这放在一边去北伐柔然,如果柔然远远地逃遁,我们前面没有什么收获,后面有强大的敌人,将怎么去抵御呢?”崔浩回答道:“不然。现在不先打败柔然,就没有办法抵御南方的敌人。南方人听说我们攻克统万城以来,内心恐惧,所以制造声势调动军队以保卫淮北。等我们打败柔然,往返之间,南寇必定不会轻举妄动。而且他们是步兵我们是骑兵,他们能北来,我们也能南下,对他们来说很困难,对我们来说并不劳累。何况南北习俗不同,水陆方式有别,假使国家把黄河以南地区给他们,他们也守不住。为什么这样说呢?凭刘裕雄强杰出的才略,吞并关中后,留下爱子,以出色的将领进行辅佐,有精兵数万,还是守不住,全军覆没,哭嚎之声,至今都没有停。何况现在的刘义隆君臣,能力还比不上刘裕的时候;而我们主上英武,兵强马壮,他们如果真的来犯,就好像用马驹牛犊来与虎和狼相斗,有什么可怕的!柔



然依仗其地域遥远,以为国家没有能力制服他们,长期放松警惕,所以夏天就分散部众放牧,到了秋天马畜肥壮才聚集起来,背寒向暖,南下抢掠。如今攻其不备,必定望风逃散。雄马护着母马,母马恋着马驹,乱奔乱窜难以控制,得不到水草,过不了几天,必然聚成一堆困乏不堪,可以一举歼灭。暂时的辛劳能够换来永久的安逸,不可错失时机。只怕主上没有这个意图,如今主上已经下了决心,为什么阻止他呢?”

【评析】

在十六国晚期至南北朝的战略版图上,当鲜卑拓跋部南下逐鹿中原的时候,原先依附于拓跋鲜卑的柔然人逐渐在蒙古草原上壮大崛起,成为新的草原霸主,于是当北魏逐渐统一了中国北方地区,建立起新的王朝体系时,柔然便成为其北面最大的安全威胁。公元424年,柔然六万骑南犯,魏太武帝亲自率军抵御,被柔然骑兵重重包围。这时北魏与柔然的关系,犹如当年的汉朝与匈奴,不同的是,当年汉朝是以统一的国家与匈奴对抗,而北魏是在与南朝对峙的情况下面临柔然的威胁。

太武帝时(424~452年),北魏的武功开拓达到极盛。太武帝的方略基本上是稳住南线,肃靖北方,首先解除国家的北顾之忧,因此于公元429年夏决定大规模出击柔然。但这遭到了朝臣的激烈反对,于是太武帝就让赞同其决策的崔浩与大臣们当廷辩论。在辩论中,崔浩对“蠕蠕荒外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的保守观点进行了尖锐批评。这种“荒远无用”论发端于汉代^①,影响很大,是中国传统战略思想的重要主张。它根源于中国战略传统中一贯的内敛倾向——总是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王朝中心区域的防御和内部的治理、安定上,并把这种内向性推向极端,不顾具体情况,机械地一概排斥对外的开拓、经略。崔浩一针见血地批评这种陈旧观点不合时宜,体现了积极的战略取向;他明确指出柔然本是国家的臣属,征伐柔然就是收服叛臣,则体现了可贵的国家主权意识和宏大的战略视野。

然而,崔浩的积极态度,并非简单地出于某种观念和意识,而是以其对客

^① 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的盐铁会议上,主张进取西域的桑弘羊和主张弃守西域的儒生发生了激烈争论。儒生们认为西域(今新疆地区)是荒绝无用之地,长期屯守耗费太巨,是“散有用事无用”,结果“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国”。这是“荒远无用”论的典型代表。



观形势的洞察为依据的。当时朝中大臣普遍担心南朝宋政权可能会趁北魏对柔然用兵之机进取中原,如果远涉大漠出击柔然没有什么收获,师老军疲,宋乘机北伐,局面就被动了。对此,崔浩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首先,从北魏和南朝宋的实力对比上说明,北魏出击柔然,宋必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宋武帝刘裕在代晋称帝之前,曾于417年率大军北伐,消灭后秦,夺取关中,留爱子刘义真督重兵镇守,不料次年留守诸将发生内哄,大败于夏,全军覆没,重又丢失关中。直到这时,宋还没有完全从这次惨败中恢复过来,而一代雄主刘裕业已过世,当时的宋文帝刘义隆远没有乃父的才略。与此相反,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武功开拓正使国家进一步走向强盛,427年刚刚攻取了夏都统万城,消灭了夏军主力,基本上并吞了夏的版图,这对南方的宋造成了极大震慑。崔浩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出击柔然,宋必定不会有大的动作,即使有些动作,也不足惧。其次,通过对柔然情况和用兵时机的分析,说明此次出击柔然必能成功。柔然的活动习性是,夏季分散部众畜牧,秋季马畜肥壮,就背寒向暖,南下进入北魏境内,夺取粮食和物资。自424年包围、挫败太武帝的亲征后,柔然更加轻视北魏,夏季散众放牧,牲畜满野,毫不戒备。北魏以刚刚破夏、兵强马壮的威势,抓住夏季的大好时机,迅疾出击,可以打柔然一个猝不及防,从而大获全胜。崔浩知彼知己的分析,也正是太武帝稳住南线、肃靖北方方略的依据所在。

经崔浩力排众议,太武帝毅然实施了对柔然的大规模出击,取得了巨大成功,柔然大檀可汗大败西遁,三十余万落(户)投降,北魏俘获戎马百余万匹。但归根结底,太武帝和崔浩的战略思想并没有脱出中国一贯的内敛传统,因为北魏的出击柔然,犹如汉朝的出击匈奴,都是以主动出击来解除北方游牧部族对中原的威胁,如同汉朝一样,北魏在主动出击柔然的同时,也大力加强了长城防线,一击奏效后,便又退守于长城以内,关注的重心始终在长城沿线的防御和长城以内的安定。因此,太武帝、崔浩与张渊、徐辩等人的争论,只不过是内敛战略传统下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的分歧。这种分歧和争论在以后的朝代还一再地重现。



韩秀谏罢敦煌戍

题引：韩秀，北魏大臣，字伯虎，昌黎（今辽宁义县）人，历任尚书郎、给事中、青州刺史。孝文帝延兴四年（474年），韩秀在朝议中坚决反对放弃敦煌镇，将西北防线向内收缩，得到采纳。本篇选自《魏书·韩秀传》。

【原文】

延兴中，尚书奏以敦煌一镇^①，介远西北，寇贼路冲，虑或不固，欲移就凉州^②。群官会议，金^③以为然。秀独谓非便，曰：“此蹇国之事，非辟土之宜。愚谓敦煌之立，其来已久。虽土邻强寇，而兵人素习，纵有奸窃，不能为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进断北狄^④之觐^⑤途，退塞西夷^⑥之窥路。若徙就姑臧，虑人怀异意，或贪留重迁，情不愿徙，脱^⑦引寇内侵，深为国患。且敦煌去凉州及千余里，舍远就近，遥防有阙，一旦废罢，是启戎心，则夷狄交构^⑧，互相来往，恐醜徒^⑨协契，侵窃凉土及近诸戍，则关右^⑩荒扰，烽警不息，边役烦兴，艰难方^⑪甚。”乃从秀议。

① 镇：北魏在边防要地设立的军事戍防机构。

② 移就凉州：凉州，治姑臧（今甘肃武威），辖境相当今甘肃黄河以西大部地区。移就凉州，即迁往姑臧。

③ 金（qian，音千）：都。

④ 北狄：北方少数民族。

⑤ 觐：窥视、察看。

⑥ 西夷：西部少数民族。

⑦ 脱：或许。

⑧ 交构：交合、结合。也作“交媾”。

⑨ 醜徒：对西北少数民族的贬称。

⑩ 关右：即关西，指函谷关（位今河南灵宝东北）或潼关（位今陕西潼关县北）以西地区。古人以西为右。

⑪ 方：将、将会、将要。

【译文】

(北魏孝文帝)延兴年间,尚书上奏,由于敦煌镇孤立地远处于西北,正当敌寇往来的要道,担心有可能守不住,想把它迁往凉州。官员们集会议事,都表示赞同。唯独韩秀认为不妥,说:“这是使国家变得局促的事情,而不是有利于开拓疆土的措施。我认为敦煌镇的建立,由来已久。虽然这个地区邻近强敌,但军民训练有素,即使有(敌人)侵扰,也造不成(大)危害,按常规设防戍守,足以自我保全。进可以切断北狄的窥探途径,退可以阻住西夷的窥视之路。如果移往姑臧,(我)担心人们会心怀不同的想法,有的留恋故土,不愿迁移,有的可能招引敌寇内侵,对国家造成严重危害。而且敦煌在凉州以外将近千余里,舍远就近,远方的边防就会有缺口,一旦废除,等于启发了敌人入侵的野心,西夷和北狄便会勾结起来,互相来往,协同配合,侵夺凉州的土地和附近各戍所,那么关西地区荒芜纷扰,烽火警讯不断,戍边的徭役频繁征发,局面将会越来越艰难。”于是,(孝文帝)听从了韩秀的意见。

【评析】

中国战略传统中一贯的内敛倾向,即总是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王朝中心区域的防御和内部的治理、安定上,在历史上往往产生负面影响,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在对外开拓和边疆经略上经常过于消极保守,裹足不前,稍遇困难,便动摇退缩。如汉代的时候,朝廷对于经略西域(今新疆地区),经常在积极进取和消极弃守之间摇摆,稍有困难,弃守论就占据上风。东汉建初元年(公元76年),正当班超等人在西域艰苦努力的时候,朝廷中经过激烈争论,却下诏撤回西域的屯戍官兵,命班超回朝,放弃西域;永初元年(107年),因西域出现反乱,朝廷又诏令撤回西域都护和屯戍士卒,“后西域绝无汉吏十余年”。这种战略上的动摇退缩,导致国家版图缩小,军事防线收缩,匈奴等游牧武装集团势力卷土重来,边疆和国防安全形势趋于恶化。

北魏时期,受国力军力局限和南北朝对峙的牵制,对西北边疆的开拓和经营,局面远没有汉代盛大,孝文帝时西部防线只限于河西走廊西端,敦煌是最远的据点。即便如此,朝廷对于西北防务也经常产生退缩之意,孝文帝延兴四年(474年)尚书上奏拟放弃敦煌镇,把镇所和敦煌军民内迁到凉州治所姑臧(今甘肃武威),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当时,柔然进犯敦煌,被魏军击破,在此情况下,朝廷不考虑加强敦煌镇的防御,反而想撤守,将西部防线进



一步向内收缩^①。敦煌所处的河西走廊西端是北上蒙古草原的居延古道^②和西出新疆的丝绸之路的交汇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在这里敦煌、酒泉、张掖三城互为表里,形成犄角之势,北控居延古道,西扼丝绸之路,一旦放弃敦煌,那么新疆各游牧部族将由丝绸之路东进,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则顺居延古道南下,形成汇聚之势,直接冲击酒泉、张掖,对西北边防构成更大的压力。韩秀不仅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而且敏锐地意识到,放弃敦煌将会动摇西北军心民心,产生连锁反应,危及整个西北边疆安全,所以他严厉地指斥这是“蹙国之事”。韩秀以他对西北边防全局的洞察,既透辟揭示了放弃敦煌的严重后果,也尖锐批评了国家安全战略上的消极倾向,后者无疑更具有长远的意义。

① 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三《宋纪十五》苍梧王元徽二年。

② 沿弱水(额济纳河)而至居延海(位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境)。

袁翻论安置柔然

题引：袁翻，北魏大臣，字景章，项（今河南项城）人，官至凉州刺史、都官尚书。北魏正光初年（520年），柔然王阿那环因内乱投奔北魏；次年，柔然被高车打败，柔然王婆罗门又率余部投奔北魏。袁翻时任凉州刺史，镇守西北边疆，朝廷就安置阿那环和婆罗门事宜征询他的意见，袁翻于是上表陈述安置办法，得到朝廷采纳。本篇选自《魏书·袁翻传》。

【原文】

谬以非才，忝^①荷边任，猥垂访逮^②：安置蠕蠕主阿那环、婆罗门等处所远近利害之宜。窃惟匈奴为患，其来久矣，虽隆周、盛汉，莫能障服。衰弱则降，富强则判。是以方叔、召虎^③不遑^④自息，卫青、去病^⑤勤亦劳止。或修文德以来之，或兴干戈以伐之，而一得一失，利害相侔。故呼韩来朝，左贤人侍^⑥，史籍谓之盛事，千载以为美谈。至于皇代勃兴^⑦，威馭四海，爰在北京^⑧，仍梗

① 忝：谦词，意为有愧于。

② 猥垂访逮：意为有辱垂询。猥，谦词，犹言辱；访逮，询问到。

③ 方叔、召虎：周朝大臣，多次出征北方的部族方国。

④ 不遑：没有空。遑，闲暇。

⑤ 卫青、去病：即卫青、霍去病，汉朝征匈奴的名将。

⑥ 呼韩来朝，左贤人侍：西汉甘露二年（前52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派其子右贤王到长安做侍子，并亲来长安朝觐，汉元帝将宫人王昭君嫁给他。事见《汉书·匈奴传下》。此处“左”字当为“右”字之误。侍子，古代诸侯王或属国之王遣子入侍天子之称。

⑦ 皇代勃兴：指北魏兴起。4世纪初，鲜卑拓跋部在今山西北部 and 内蒙古一带建立代国，为十六国之一，后为前秦苻坚所灭。淝水之战后，拓跋珪于386年重建代国，随即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

⑧ 北京：北魏前期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493年孝文帝迁都洛阳，称平城为北京。



疆場^①。自卜惟洛食,定鼎伊瀍^②,高车^③、蠕蠕迭相吞噬。始则蠕蠕衰微,高车强盛,蠕蠕则自救靡暇,高车则僻远西北。及蠕蠕复振,反破高车,主丧民离,不绝如线。而高车今能终雪其耻,复摧蠕蠕者,正由种类繁多,不可顿灭故也。然斗此两敌,即卞庄^④之算,得使境上无尘数十年中者,抑此之由也。

今蠕蠕为高车所讨灭,外凭大国之威灵,两主投身,一期而至,百姓归诚,万里相属。……若弃而不受,则亏我大德。……又高车士马虽众,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盗为资,陵夺为业。河西捍御强敌,唯凉州、敦煌而已。凉州土广民希,粮仗素阙,敦煌、酒泉空虚尤甚。若蠕蠕无复竖立,令高车独擅北垂,则西顾之忧,匪旦伊夕^⑤。

愚谓蠕蠕二主,皆宜存之,居阿那环于东偏,处婆罗门于西裔^⑥,分其降民,各有攸属。那环住所,非所经见,其中事势,不敢辄陈。其婆罗门请修西海故城^⑦以安处之。西海郡本属凉州^⑧,今在酒泉直北、张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车所住金山^⑨一千余里,正是北虏往来之冲要,汉家行军之旧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处婆罗门,于事为便,即可永为重戍,镇防西北。宜遣一良将,加以配衣^⑩,仍令监护婆罗门。凡诸州镇应徙之兵,随宜割配,且田且戍。虽外为置蠕蠕之举,内实防高车之策。一二年后,足食足兵。斯固安边保塞之长计也。……今不早图,戎心一启,脱^⑪先据西海,夺我险要,则酒

① 疆場(yi,音义):疆界。

② 卜惟洛食,定鼎伊瀍:这两句话都是讲孝文帝迁都洛阳。卜,选择;惟,语助词;洛食,就食洛阳。伊,伊水;瀍(chan,音缠),瀍水,都是洛水的支流。

③ 高车:即西北游牧古族铁勒,汉代称丁零。因其所用车轮高大,亦称高车。

④ 卞庄:春秋时鲁国人,路遇二虎相斗,等其两败俱伤,便轻易杀死两虎。有成语“卞庄刺虎”。

⑤ 匪旦伊夕:非晨即夕,比喻事情将很快来临。也作“匪朝伊夕”。

⑥ 裔:边地。

⑦ 西海故城:西海郡,治居延(位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辖居延海地区。西海故城即居延故城。

⑧ 凉州:治姑臧(今甘肃武威),辖境相当今甘肃黄河以西大部地区。

⑨ 金山:即阿尔泰山。

⑩ 配衣:当时的专用名词,指禁军。

⑪ 脱:或许、倘或。



泉、张掖自然孤危，长河以西终非国有。不图厥始，而忧其终，噬脐^①之恨，悔将何及。……

【译文】

臣能力不足，有愧于担负边疆重任，有辱垂询：安置柔然王阿那环、婆罗门等的地方远近利弊事宜。我个人以为，匈奴为患边疆，由来很久了，即使兴旺的周朝、强盛的汉朝，也未能阻挡、降服他们。他们在衰弱的时候就投降，富强的时候就反叛。因此，方叔、召虎没有空闲休息，卫青、霍去病奔忙劳累。或者修文德以招抚他们，或者兴干戈以讨伐他们，然而有得有失，利害相抵。因此匈奴呼韩邪单于前来朝觐，派右贤王当侍子，被史书称为盛事，千年传为美谈。到了我朝兴起，威馭四海，只是定都平城，疆界还很局促。自从选择迁都洛阳，定鼎于伊水、瀍水之间，高车、柔然接连互相吞并。起初柔然衰弱，高车强盛，柔然于是忙于自救，无暇他顾，高车则处于偏僻遥远的西北。后来柔然重又振兴，反而打败高车，高车王死民散，不绝如线。如今高车终于能够报仇雪耻，又打败柔然，是因为它部族繁多，不可能骤然消灭的缘故。不过让这两个敌人互相争斗，就是卞庄刺虎的策略，几十年中边境得以没有征尘，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

现在柔然被高车攻灭，对外依靠我朝的大国威望，两位柔然王前来投靠，同期到达，百姓诚心归附，在道路上万里相连。……如果抛弃他们不予接纳，就会有损我们的基本道德。……而且高车人马虽然众多，但君主非常愚弱，上制不住下，下不服从上，只以侵盗为依靠，以掠夺为生计。河西地区防御强敌，只靠凉州和敦煌。凉州地广人稀，粮食、武器向来缺少，敦煌、酒泉更加空虚。如果柔然不再存在，让高车单独称雄于北部边境，那么我们的西顾之忧，很快就会来临。

愚见以为，两位柔然王都应当保留，把阿那环安置在偏东的地方，把婆罗门安置在西部边境，把降附的柔然民众分为两部，各属一王。对阿那环的安置处所，我没有经历和了解，其中的情势，不敢随便陈说。对于婆罗门，建议修缮西海故城（即居延故城，位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来安置他。西海郡本

① 噬脐：人咬不到自己的肚脐，比喻够不上，来不及。



属凉州,现位于酒泉正北、张掖西北一千二百里,距离高车所处的金山(阿尔泰山)一千余里,正是北方游牧部族迁徙往来的要冲,汉朝军队开进的旧道,土地肥沃,非常适宜耕种。这里不但今天适合安置婆罗门,即使将来也可以永远作为重要的戍所,镇防西北。(因此)应当派遣一名良将,配给他禁军,让他监护婆罗门。凡是各州镇应调赴边疆的士兵,就便分配(西海),一边耕种一边戍守。对外这是安置柔然的举措,实际上却是防范高车的策略。一两年后,粮食和兵力就都充足了。这实在是安定边疆保卫边境的长远之计。……(如果)现在不尽快谋划,一旦高车发觉,可能会先占据西海,夺我险要,那么酒泉、张掖自然就孤立危险了,黄河以西的国土最终将会丧失。不在事情开始的时候进行谋划,临到末了才忧虑,为时已晚,后悔莫及。……

【评析】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当其强盛之际,总是频频南下寇掠,对中原王朝构成严重威胁,而当其衰败之时,则往往归附于中原王朝,寻求庇护和救济;另一方面,中原王朝为保障自身安全,屡屡主动出击,以解除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而当北方游牧民族丧败归附的时候,又都面临着怎样安置其部众的问题。

对于安置归附的少数民族部众,历朝历代都受到两个因素的困扰,一是资财消耗给国家造成沉重负担,二是安置地域不当往往产生新的问题。由于其事复杂,所以当柔然被高车打败,柔然王及其余部投奔北魏的时候,朝廷要就安置事宜专门征询边疆大员的意见。袁翻从边疆安全的大局出发,主张把安置柔然余部与牵制防范高车、稳定西北地缘战略格局相结合,体现了地缘制衡的战略思想。他据此提出了安置婆罗门及其部众的具体办法,即把婆罗门一部安置于居延海地区(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带),同时派兵在这里进行屯戍(一边耕种一边戍守),既监护婆罗门部,又起到镇防西北的作用。居延海地区古时水草丰茂,是草原游牧民族往来迁徙的要冲,又有弱水河谷南接河西走廊,一直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进犯的重要通道,也是当年汉朝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击匈奴的经由之路,汉武帝打败匈奴后,曾特意沿弱水河谷至居延海修筑了长城塞防,加以控扼。高车作为西北的游牧古族,以阿尔泰山为活动中心,其南下进犯也必然以居延古道为重要通路,把柔然余部安置在这里,能对高车较好地起到牵制作用,而在这里驻军屯戍,则恰好控制住了西北边防的战略冲要,能够有效地屏障河西地区。



由于袁翻提出的安置办法,较好地考虑到了边疆安全需要,地点选择恰当,而且用屯戍的办法,避免了给国家造成沉重负担,方方面面比较周全,因而在朝议中受到大臣们的普遍赞同,遂被朝廷采纳。特别可贵的是,袁翻的上述对策,体现了良好的全局意识和前瞻性,这正是思考国家安全战略问题不可缺少的品质。



孙绍论国之防守

题引:孙绍,北魏大臣,字世庆,昌黎(今辽宁义县)人,官至中书侍郎、太府少卿、右光禄大夫。宣武帝延昌年间(512~515年),孙绍上表议论国是,对加强国防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本篇选自《魏书·孙绍传》。

【原文】

臣闻建国有计^①,虽危必安;施化能和,虽寡必盛;治乖人理,虽合必离;作用失机,虽成必败。此乃古今同然,百王^②之定法也。伏惟^③大魏应天命,兆启^④无穷,毕世后仁^⑤,祚隆七百^⑥。今二虢^⑦京门,下无严防;南北二中^⑧,复阕固守。长安^⑨、邺城^⑩,股肱^⑪之寄;穰城^⑫、上党^⑬,腹背所凭。四军

① 计:在这里意为计划、方略。

② 百王:犹如说历代帝王。百,喻言其多。

③ 伏惟:下对上陈述的谦敬之词。

④ 兆启:开启。

⑤ 毕世后仁:意为经过三十年治理而使仁政得到实现。源于《论语·子路》“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原意为,如有圣王兴起,一定需要治理三十年才能使仁政得到实现。古称三十年为一世。

⑥ 祚隆七百:意为国运绵长,超过周朝。《左传·宣公三年》记,周成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⑦ 二虢:东虢(在今河南荥阳东北)、北虢(在今河南陕县东南),本为西周古国名,后演变为地区名。

⑧ 南北二中:北魏初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迁都洛阳,称平城为北京,洛阳、平城遂形成一南一北两个中心。

⑨ 长安:位今陕西西安西北。

⑩ 邺城:位今河北临漳西南。

⑪ 股肱:大腿和胳膊。

⑫ 穰城:位今河南邓县。

⑬ 上党:郡名,治壶关(位今山西长治北)。

五校^①之轨^②,领护^③分事之式,征兵储粟之要,舟车水陆之资^④,山河要害之权,缓急去来^⑤之用,持平赴救之方,节用应时之法,特宜修置^⑥,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体^⑦,何得而忽?居安之辰,故应危惧矣。

【译文】

臣听说建国有方略,即使存在危险也必定能走向安定;施行教化而能使国家和谐,即使人少也必定能走向兴旺;治国违背人理,即使聚合也必定会走向分离;举措不合时机,即使成功也必定会走向失败。这是古今一致,历代帝王都应遵循的必然规律。我大魏顺应上天圣明的命令,开创了无穷的基业,经过三十年治理而使仁政得到实现,国运绵长。如今东魏和北魏两地,是京师的门户,没有严密的防守;洛阳和平城南北两个中心,也缺乏巩固的防御。(在国家战略地理上),长安和邺城,是如同股肱的依托;襄城和上党,是腹背的依靠。四军五校的体制,领军将军和护军将军区分职责的制度,征兵和储备粮食的要点,车船水陆交通的保障,山河要害的权衡把握,形势平稳和危急时各种行动的开支费用,保持安定和解救危难的方法,节约费用与顺应天时的办法,应当特别加以完善和设置,以巩固堂堂国家的根基。保持成业,哪能马虎?处于安定的时候,正应想到危险而感到害怕。

【评析】

居安思危是中国的传统思想。孙绍这段论述以这一思想为指导,就平时如何加强国防,确保国家的军事安全,提出了宏观的设想,提纲挈领,思路明晰,言简意赅。军事安全是传统安全问题的核心内容,更是古代国家安全的

① 四军五校:军、校,古代军队编制单位,人数历代不一,一军大多在万人上下,一校约为千人左右。

② 轨:规矩、法度、体制。

③ 领护:北魏设有领军将军,掌中兵(中央军,为北魏军队的主力);护军将军,主捍卫京师。

④ 资:凭借。

⑤ 去来:比喻各种行动。

⑥ 修置:修,修治、完善;置,设置。

⑦ 持盈之体:持盈,保持盛满。持盈之体,用保持身体丰盈来比喻保持国家已有的基业。



重中之重,孙绍主张要特别从九个主要方面进行计划、制订方案、加以设置和完善:一是军队的组织编制(四军五校之轨);二是军队的指挥体制(领护分事之式);三是兵员征集(征兵);四是粮食储备(储粟);五是交通保障(舟车水陆之资);六是战略要地控制(山河要害之权);七是形势平稳和危急时各种行动的开支费用(缓急去来之用);八是平时和应急的行动方法(持平赴救之方);九是节约费用和顺应天时的办法(节用应时之法)。这实际上构成了国家军事安全的一个战略框架,其可贵之处在于:

一是整体性。孙绍没有把军事安全简单地等同于军事力量强弱,而是视其为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一个体系,他所提出的九个主要方面,代表了历史上对国家军事安全体系的一种认识,有其自身的特点。

二是计划性。基于“建国有计,虽危必安”的思想,孙绍主张对国家军事安全的主要方面,也就是他所提出的九项内容进行周密计划,乃至制订具体的方案,加以设置和完善,从而使得对国家军事安全的谋划,实实在在地落到实处,而不是仅仅停留于空泛的议论。

三是对制度建设的重视。孙绍突出强调了完善军事制度问题,他提出的需要加以完善、设置的九项内容中,头三项都属于制度层面,即军队的组织编制和指挥体制,以及征兵问题,体现了通过制度建设建立一支可靠而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思想。

四是应急预置意识。“备防不虞”(对预料不到的危险加以防备)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安全思想,孙绍进一步提出要对保持安定和解救危难的方法加以完善,说明他已经具有一定的危机处理和应急预置意识。

五是经济观点。国防和军事上的各种举措,都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必须不对国家造成疲耗,才可能有效地保障国家安全。有鉴于此,孙绍专门提出要完善“节用顺时之法”。节用就是节约开支;顺时,即顺应天时,不对农业生产造成干扰和冲击,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不夺农时”,这在古代农耕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



古弼论罪之小大

题引：古弼，北魏大臣，代（今内蒙古中部至山西北端一带）人，太武帝时（424～451年）官至吏部尚书，以直言敢谏著称。本篇选自《魏书·古弼传》。

【原文】

世祖大阅，将校猎^①于河西^②，弼留守。诏以肥马给骑人，弼命给弱者。世祖大怒曰：“尖头奴，敢裁量^③朕也！朕还台，先斩此奴。”弼头尖，世祖常名之曰“笔头”，是以时人呼为“笔公”。弼属官惶怖惧诛，弼告之曰：“吾以为事君吮猎^④不^⑤适盘游^⑥，其罪小也；不备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⑦孔^⑧炽，南虏^⑨未灭，狡焉之志，窥伺边境，是吾忧也。故选肥马备军实，为不虞之远虑。苟使国家有利，吾何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⑩。此自吾罪，非卿等之咎。”世祖闻而叹曰：“有臣如此，国之宝也！”

【译文】

北魏太武帝大阅兵，将在河西围猎，古弼留守。太武帝命令把强壮的马匹供给骑手，古弼却命令给弱马。太武帝大怒说：“尖头奴才，居然敢打朕的折扣！等我还朝，先杀了这个奴才。”古弼头尖，太武帝经常称他“笔头”，所

-
- ① 校猎：用木栏遮阻，围猎野兽。
② 河西：泛指今山西吕梁山以西的黄河东西两岸。
③ 裁量：削减分量。
④ 吮（tian，音田）猎：打猎。
⑤ 不^⑤适：不符合，不和谐。此处指不符合魏太武帝的心意。
⑥ 盘游：娱乐、游逸。又作“槃游”。
⑦ 北狄：指柔然，这是当时对北魏构成最大威胁的北方游牧民族。
⑧ 孔：很。
⑨ 南虏：指南朝宋政权，与北魏南北对峙。
⑩ 干：冒犯。



以当时人叫他“笔公”。古弼的下属官吏担心被杀,很害怕,古弼告诉他们说:“我认为侍奉君主打猎,不能满足他游乐的愿望,这是小罪;而不防备意料不到的事情,使敌寇放纵为害,这是大罪。如今北方的柔然气焰十分嚣张,南方的宋尚未灭亡,这两个对手狡诈险恶,一直在边境上窥探、等待时机,这是我所忧虑的事情。因此挑选强壮的马匹充实军备,这是针对意外事情做长远的考虑。如果能对国家有利,我为什么躲避死呢!英明的君主可以用道理来冒犯。这自然是我的罪,不是你们的过失。”太武帝听到后感叹:“有这样的臣子,实在是国家之宝!”

【评析】

古弼对罪大罪小的看法,并没有太深奥的道理,但在这件事上,他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品质:一是对国家安全强烈的危机意识;二是对国家安全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三是一切从国家安全的根本利益出发,不计个人名利祸福、不惧生死的精神和胆魄,这也就是后来林则徐所概括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国家安全,归根结底要靠担负国家安全责任的人来落实。如果肩负国家安全重任者,没有强烈的危机意识,不能够居安思危,深谋远虑;没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处事不能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没有一股子精神,不能一切从国家安全的根本利益出发,而是事事考虑个人的进退得失,甚至为了个人名利,阿谀奉迎,置国家安全于不顾,那么,即使有再高明的战略构想,有再周详的计划和方案,国家安全也不会有可靠的保障。

第五章 隋唐五代

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

——唐·李世民

（《资治通鉴》

卷一百九十三）



概 述

隋唐五代时期,自公元 581 年至公元 960 年,历时 380 年。包括隋(581 ~ 618 年)、唐(618 ~ 907 年)两个统一王朝和五代的短暂分裂时期(907 ~ 960 年)。隋唐两朝共 327 年,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汉之后又一个统一强盛的时代。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达四百来年的分裂混乱局面之后,隋朝于 589 年恢复了全国统一,使天下重新归于安定。其后的唐朝,在此基础上创造了无比辉煌的成就。然而唐后期藩镇割据,致使国家动荡不安,随之而来的五代时期更陷入纷争混战、分崩大乱之中。如何在国家一统的和平时期维护统一成果,确保国家长治久安,是隋唐两代统治者所共同需要解决的课题;如何在干戈纷扰的动乱时代谋生存、求发展进而图取天下,则成为五代各个政权孜孜追求的目标。围绕种种国家安全战略问题的运筹和谋划,其认识的得与失,实践的成与败,既丰富了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内容,也为后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在隋朝建国之初,国家安全上主要面临着北方突厥的威胁。奉车都尉长孙晟上陈攻突厥之策,提出“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分化瓦解突厥的方针,为隋文帝所采纳。在统一了全国之后,数量庞大的府兵逐渐成为国家沉重的经济负担,为此隋文帝下诏对府兵制度进行改革,将“兵农分离”变为“兵农合一”,以适应安定时期恢复与发展经济的需要。然而到了隋炀帝时,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问题上随意妄为,逞一己之欲而大兴土木,广发徭役,对外频繁发动战争,最终引发了各种矛盾的大爆发,导致了隋朝的迅速灭亡。

乘隋末群雄竞起之机而建的唐朝,在立国之初同样受到突厥的严重威胁。同时,唐初统治者又面临着安定内部的严峻压力。在对当时客观形势的利害权衡之后,唐太宗把安定内部、稳住局势作为当务之急,而对突厥的进犯采取了“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策略,给予其大量财物,并订立盟约,使对方退兵。在等到各方面时机成熟之后,最终成功实施了大规模的反击,打败了东突厥。在国家安全的总体战略上,唐太宗主张“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遵循先内后外的战略方针,首先加强自身政治、经济、军事等的实力建设;反对



劳民费财、筑塞自固的消极做法,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治安中国”的基础上,适时运用武力解决来自周边的安全威胁;同时,强调“中华、夷狄爱之如一”,并采取了一系列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缓和了民族矛盾,促进了民族团结与民族融合,为唐代盛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经历了隋末的天下大乱之后,如何“治安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治国方略才能迅速恢复和稳定统治秩序,安定国家,是唐初统治者迫切关心的重大问题。以魏征为代表的大臣主张实行教化,采取轻徭薄赋、劝农务本的方针,为唐太宗所接受。这一思想成为唐初的治国指导方针,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形成了“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

唐高宗时,吐蕃逐渐成为唐朝西北边防安全的严重威胁。武则天统治时期,在事关中央政府对西域控制权的安西四镇弃留问题上,郭元振从维护国家安全出发力主坚守四镇,武则天采纳了其意见。这对于抵御吐蕃的侵扰、保持唐朝对西域的控制,进而保障唐王朝的边防巩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武则天执政时期,频繁的战争和统治者的奢靡导致国库空虚,民不堪命。中宗时韦嗣立针对当时国库空虚的现状,提出了“立国立家,皆资于储蓄”的主张。

到唐玄宗时,虽然他在统治前期勤于政事,政治较为清明,创造了著名的“开元盛世”,但统治后期朝政日趋腐败,加上长年对外用兵,边镇节度使权力过大,导致外重内轻的格局,最终爆发了“安史之乱”。对于平叛方略,李泌上疏,主张从大局出发,不计较一城一地的暂时得失,不以迅速收复两京(长安、洛阳)为主要目的,而是等待从根本上削弱叛军势力后,再光复两京,重新建立唐王朝对全国的统治。李泌的战略谋划合乎当时的战略形势,是彻底平息叛乱,再造统一的正确谋策,但未被采纳。由于唐廷在战略上的失误,致使这场战乱迁延了8年之久。对于安史之乱的惨痛教训,后人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反思,德宗朝宰相陆贽因而高度强调了“居重驭轻”战略方针的极端重要性。

然而在现实上,由于遭受安史之乱的沉重打击,唐廷已无力消除日益坐大的藩镇势力。为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朝廷虽然一直试图削藩,但大多因力量不足和方略不当而失败。晚唐藩镇割据愈演愈烈,战火此起彼伏,周边地区的动乱接连不断,农民起义的浪潮席卷全国,所有这些,都加速了唐王朝走向覆亡的进程。

五代时期历时短暂,王朝更迭频繁,是唐末藩镇割据局面的延续和发展。战乱持续50多年,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后周世宗即位后,王朴向周世宗



提出先易后难、逐一平定天下的方针,其“攻取之道,从易者始”的战略思想,产生了长远影响。虽然周世宗因病早故,未能完成统一大业。但是,后周开创的新局面,为北宋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长孙晟《攻突厥之策》

题引：长孙晟(552~609年)，河南洛阳人，字季晟，北周时曾任奉车都尉，入隋任车骑将军、右骁卫将军等职。开皇元年(581年)，突厥南下侵扰，长孙晟上攻突厥之策。本篇选自《隋书·长孙晟传》。

【原文】

晟先知摄图①、玷厥②、阿波③、突利④等叔侄兄弟各统强兵，俱号可汗，分居四面，内怀猜忌，外示和同，难以力征，易可离间，因上书曰：“臣闻丧乱之极，必致升平⑤，是故上天启其机，圣人成其务。伏惟皇帝陛下当百王⑥之末⑦，膺⑧千载之期，诸夏⑨虽安，戎场⑩尚梗。兴师致讨，未是其时，弃于度外，又复侵扰。故宜密运筹策，渐以攘之，计失则百姓不宁，计得则万代之福。吉凶所系，伏愿详思。臣于周末，忝⑪充外使，匈奴⑫倚伏⑬，实所具知。玷厥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

① 摄图：即突厥沙钵略可汗，逸可汗之子，木杆可汗之侄。

② 玷厥：即达头可汗，室点密可汗之子，摄图之堂叔。

③ 阿波：即大逻便，木杆可汗之子，摄图之从弟。摄图为沙钵略可汗后，以其为阿波可汗，还领其部。

④ 突利：即摄图之弟处罗侯，号突利设。

⑤ 升平：指太平之世。

⑥ 百王：历代帝王。

⑦ 末：衰落之世。

⑧ 膺：当，正当。

⑨ 诸夏：华夏，指中原。

⑩ 戎场(yì，音义)：与少数民族接壤的边界。

⑪ 忝：谦词，“有愧于”。

⑫ 匈奴：此指突厥，古时有人认为突厥是匈奴的别种。

⑬ 倚伏：此指突厥内部的矛盾斗争情况。



侯^①者，摄图之弟，奸多而势弱，曲取于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摄图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弥缝^②，实怀疑惧。又阿波首鼠^③，介在其间，颇畏摄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回兵，自防右地^④。又引处罗，遣连奚、霫^⑤，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承衅^⑥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上省表大悦，因召与语。晟复口陈形势，手画山川，写其虚实，皆如指掌。上深嗟异，皆纳用焉。

【译文】

长孙晟早已知道摄图、玷厥、阿波、突利等叔侄兄弟各自统领精兵强将，都号称可汗，分别居住四方，内心各怀猜忌，而表面显得团结一致，难用武力征服，而易于被离间分裂，于是向隋文帝呈上奏章说：“我听说凶丧祸乱到了极点，必定导致太平，所以上天开启其先机，而圣人成就其大事。皇帝陛下处于前代百王之末世，身应千年一遇的机运，华夏虽然得到安定，边疆尚未平复。兴兵讨伐，不是时候，置之度外，却又侵扰不宁。所以应当周密筹划，逐渐平定。策略有失则百姓不得安定，谋划得当则造福子孙万代。国家吉凶攸关，敬请仔细思量。臣在北周末年，曾充任出外使者，突厥内部复杂情况，都被我知道了。玷厥对于摄图，兵力强大而位处其下，表面上虽称服属，实际上嫌隙已经显露，只要煽动其不满情绪，一定会导致其内部战乱。又处罗侯其人，是摄图的弟弟，位卑势弱，人多奸诈，曲意取悦于众人，百姓喜欢他，因此受摄图猜忌，其内心很难自安，表面显得顺服，实际上心怀疑惧。又阿波为人首鼠两端，侧身于二人之间，很畏惧摄图，受他牵制，只站在强者一边，没有定心。现在应该远交近攻，离间强者而联合弱者，派使臣结好玷厥，说合阿波，如此摄图就势必会撤回军队，防备自家右方。再利诱处罗侯，派他连通奚、霫两个部族，这样一来，摄图又必须分散人马，防备左方。上下猜忌嫌疑，亲人离心隔膜，十多年后，再乘机征讨，必定可以一举平灭其国。”隋文帝读罢奏章

① 处罗侯：沙钵略可汗之弟，号突利设，因受突厥民众爱戴，为沙钵略所忌。

② 弥缝：表面掩饰。

③ 首鼠：两边观望，踌躇不决。

④ 右地：指突厥西面之地。

⑤ 奚、霫：突厥东面和东北面的部族，分布于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

⑥ 衅：缝隙，裂痕。



十分高兴,于是召长孙晟入官,与他交谈。长孙晟又口述突厥形势,手画山川地理,描绘其虚实态势,都了如指掌。隋文帝深为叹赏惊异,完全采用了他的计谋。

【评析】

隋文帝建国之初,南有陈朝,北有突厥,东北有高丽,西北有吐谷浑,他们不时攻掠隋边,有的还与隋内部反叛势力结合,隋王朝在战略上处于被包围的被动地位,形势相当严峻。隋文帝为巩固政权,打破包围,并进而统一全国,采取“内绥外御”的战略总方针,企图先灭陈朝,再攻突厥。但因突厥实力强大,又有奚、契丹等族相助,不仅联合原北齐营州刺史高宝宁攻占临渝镇(今山海关),而且出军40万大举攻隋,严重威胁着隋北方的安全,隋文帝改取南和北战、先北后南的战略,首先消除来自北方突厥的威胁。

长孙晟对突厥的内部形势较为熟悉。早在北周宣帝时,突厥沙钵略可汗向周室求婚,周宣帝以赵王宇文招之女千金公主许婚,长孙晟作为护送使者到了突厥。突厥首领摄图和处罗侯很器重他,让他留住突厥一年。在此期间,长孙晟常与摄图、处罗侯一起游猎,教导摄图子弟弹射之法,还一度被处罗侯视为“心腹”,暗中结盟。这使他对突厥的山川形势、部众强弱及上层内情十分了解,对其“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长孙晟深谙此理。面对突厥的严重威胁,他从当时的战略全局出发,清醒地认识到:立国不久的隋王朝,实力尚弱,尽管突厥内部矛盾重重,但其各部兵力强大,难于用武力对付;如果隋对突厥用兵,则可能促使其内部搁置矛盾,一致对外;一旦与突厥开战,胜负难以预料;即便战争获胜,损耗也会很大,必将阻碍甚至破坏南下灭陈、实现统一的总体战略计划的实施。倘若战争失败,其后果更不堪设想。在这种情况下,熟悉敌情的长孙晟提出了“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策略,建议将政治瓦解和军事打击相结合,用“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手段,分化敌人,削弱敌人,为战胜敌人创造条件。这一策略的实质,是通过“伐谋”、“伐交”,以较小的代价实现北定突厥的战略目标。

长孙晟的这一建策,是在他“知彼知己”的基础上提出的,切实可行。隋文帝看了长孙晟的上书后,非常高兴,立即召见了长孙晟,让他详细陈述突厥的情况及对付突厥的具体办法。隋文帝采纳了长孙晟的建策,遣太仆元晖赴突厥,赐达头可汗狼头纛,对其礼数甚优,达头使者到隋时,隋将其引居摄图



使者之上。又派长孙晟为车骑将军,出黄龙道(今辽宁朝阳),携带大量钱财赏赐奚、霫、契丹等部,“遣为向导,得至处罗侯所,深布心腹,诱之内附”^①。事情的发展正如长孙晟所料,突厥内部互相猜疑,矛盾激化,互相攻伐不已,很快衰落下去。

开皇三年(583年),突厥分裂,实力大削。同年四月,隋文帝颁布《伐突厥诏》,反击突厥。诏书总结了周、齐两朝对突厥采取“倾府库之财”、“资而为贼”的失策和教训,申明了要改变策略,实行反击。隋军分兵八路,大败突厥,终迫使沙钵略(即摄图)上书表示永为臣附。此后,文帝又立突利为启民可汗,将宗室女嫁给她为妻,并在朔州(今属山西)筑大利城,屯兵防御达头。在3年左右的时间里,隋廷采用“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战略,以较小的代价和适度的反击,基本实现了对突厥势力的分化和控制,解除了来自突厥的安全威胁。

长孙晟提出的“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思想,并非他的首创。早在春秋时期,郑庄公就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远交齐、鲁,近攻宋、卫,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战国时期,秦国客卿范雎明确提出“远交近攻”的战略,成为秦各个击灭六国、完成天下统一的指导思想。长孙晟继承了前人的思想,并将之与隋初突厥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实行“离强合弱”以分化突厥各部的谋略,为隋王朝北定突厥指明了方向,并为南下灭陈、完成国家统一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一个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成功范例。

^① 《隋书·长孙晟传》。



隋文帝《改革府兵制诏》

题引：隋文帝(541~604年)，即杨坚，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南)人，北周静帝时官至左大丞相，总揽朝政，后自立为帝，建国号隋。开皇十年(590年)，隋文帝发布诏书对府兵制度进行改革，以适应当时天下初定、恢复经济和巩固统治的需要。本篇选自《隋书·高祖纪下》。

【原文】

魏^①末丧乱，宇县^②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③，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④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⑤，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

【译文】

北魏末年，政权沦丧，国家动乱，天下分裂，人民每年劳苦不止，来不及休息。战士军人，暂时安置在军坊兵府，南征北战，没有固定的居所；家室墙壁破败，田里没有庄稼，长期成为流动人口，竟没有乡里的名号。我十分同情他们。自今凡是军人，都可以归属州县，其种田籍帐，都与老百姓一样。军府统领，应该按照原来的样子。罢除山东、河南和北方边境地区新设立的军府。

【评析】

兵制是国家的重要制度之一，关乎军队的强弱、战争的胜败和国防的安

① 魏：指北魏。

② 宇县：指国家。

③ 坊府：军坊和兵府。

④ 愍：同情。

⑤ 籍帐：户口和赋役文书。



危。《孙子兵法》把兵制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之一(孙子所说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事”——“道、天、地、将、法”——其中“法”,即指军事制度)。中国历代政治家、军事家也都把兵制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将兵制视为治国安邦之大计。

府兵制始于西魏,由西魏大丞相宇文泰创立。西魏时,府兵是职业军人,编入军籍,不隶州县;府兵家属随营居住,编为军户,不属民户。北周武帝天和元年(566年),“筑武功、郿、斜谷、武都、留谷、津坑诸城,以置军人”^①。府兵及其家属在渭水上游有了定居的地区,但不从事耕作,兵民分治的情况还没有改变。

隋初沿用西魏以来的府兵制。府兵及其家属、土地单立户籍,不属州县,自成系统,由军府统领。当时,隋朝的府兵数量相当庞大。为了平定江南的陈政权,仅在前线执行军事任务的府兵便有近52万人。开皇九年(589年),平陈大功告成,国家由分裂复归统一。隋文帝向全国发布诏书,指出在灭陈战争胜利结束、南北已经统一的新形势下,国家应由以往“干戈方用”的战争状态,转向当今“率土大同”的和平时期,为此,他要求全国上下都要“归于治理”,大力开展和平建设。在和平建设时期,军队一方面是维护国家统一与安全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维持庞大军队所需的巨大开支又是国家的沉重负担。如此众多的府兵,不仅成为国家沉重的经济负担,也不利于利用闲置力量去发展生产。于是,开皇十年,隋文帝对府兵制作了重大改革:府兵及其家属都在州县落籍,种田课税一律和百姓一样;同时保留军籍,在军府接受训练,并按规定到京城守卫或执行军事任务。于是西魏以来的“兵民分治”变为“兵农合一”。

隋文帝推行的这种兼具军籍和民籍的府兵制度,只在设置军府的地区实行,而军府的设置,又与内卫和边防的需要紧密相连。在对府兵管理上实行双重管理,即府兵平时直属于地方州县,应征服役期间则归军府统辖。军人除了有自己的军籍外,还可同家属都列入固定的州县户籍,按均田令受田,免除课役,平时有一定的时间轮番宿卫,实行在户为民、番上为兵、兵民结合、寓兵于民的兵役制度。隋开皇十年以后,军民虽不分籍,可是从后来隋炀帝“增置军府,扫地为兵,自是租赋之人益减”^②来看,仍旧和西魏、北周时一样,军

① 《周书·武帝纪上》。

② 《隋书·食货志》。



人是可以免除租调的。

隋文帝府兵制改革带来的好处是明显的：第一，有利于朝廷对军队的掌握。第二，府兵的家属可与民户一样安居，他们平时在军坊内从事生产，士兵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同时，解决服役期内必须自备的物资，也减轻了国家的经济负担。第三，府兵制和均田制结合起来，均田制的扩大，也即意味着府兵基础的扩大和兵源的增多。第四，军户的户籍取消后，兵役负担改由所有民户承担，减轻了军户的负担。这就把兵民分治改变为兵民合治，将府兵制和均田制相结合来，兵农合一，寓兵于农。这是在国家统一后的和平环境里，百废待兴，既要保持一定数量的军队，又要利用劳动力从事生产，而在军事方面进行的改革。也是中国古代起源甚早、深具传统的寓兵于农思想的又一次实践。它适应了隋建国之初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形势需要，同时又稳定了国家军事力量的基础，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隋代的府兵制后来被唐代统治者继承，并得到进一步完善。唐太宗贞观年间，通过完善均田制，巩固了府兵制度的基础。与此同时，完善了府兵的兵役和训练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府兵的征集、检点、任务等规定。唐太宗不但详细制定了府兵在军府期间定期进行冬季训练的具体内容，而且还亲自在殿廷教习骑射，不断提高府兵的作战能力，使之成为唐前期维护国家安全的支柱力量。



唐太宗论便桥之盟

题引：唐太宗(599~649年)，即李世民，唐高祖李渊次子，隋末随父起兵，唐朝建立后拜尚书令，进封秦王，率兵平定消灭各支割据势力及农民起义军。武德九年(626年)即帝位后不久，突厥颉利可汗率军大举进逼都城长安(今西安)，唐太宗从稳定国家大局出发，与颉利在渭水便桥之上盟约，使突厥退军，事后对臣下阐述了自己的策略思想。本篇选自《新唐书·突厥传上》。

【原文】

其七月，颉利自将十万骑袭武功^①，京师戒严。……乃与侍中^②高士廉、中书令^③房玄龄、将军周范等驰六骑出玄武门，幸渭上，与可汗隔水语，且责其负约。群酋见帝，皆惊，下马拜。俄而^④众军至，旗铠光明，部队静严，虏大骇。帝与颉利按辔，即麾军却而阵焉。萧瑀以帝轻敌，叩马谏，帝曰：“我思熟矣，非尔所知也。夫突厥扫地入寇，以我新有内难，谓不能师。我若阖城，彼且大掠吾境，故我独出，示无所畏，又盛兵使知必战，不意我能沮其始谋。彼人吾地既深，惧不能返，故与战则克，和则固，制贼之命，在此举矣！”是日，颉利果请和，许之。翌日，刑白马，与颉利盟便桥上，突厥引还。萧瑀曰：“颉利之来，诸将多请与战，陛下不听，既而虏自退，其策奈何？”帝曰：“突厥众而不整，君臣惟利是视，可汗在水西，而酋帅皆来谒我，我醉而缚之，其势易甚。又我敕长孙无忌、李靖潜师幽州^⑤以须，若大军蹶其后，伏邀诸前，取之反覆掌耳。然我新即位，为国者要在安静，一与虏校，杀伤必多，彼败未及亡，惧而修

① 武功：今陕西武功。

② 侍中：唐代门下省长官，正二品，掌封驳制敕及主持礼仪，与中书令共参朝政，居宰相之任。

③ 中书令：中书省长官，正二品，内参机密，决议朝政，居宰相之任。

④ 俄而：一会儿。

⑤ 幽(bin,音宾)州：治今陕西彬县东北。



德,与我为怨,其可当耶?今仆械卷铠,啖以玉帛,虏志必骄,骄则亡之端也,故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瑒再拜曰:“非臣愚所逮也!”

【译文】

这年(武德九年)七月,突厥颉利可汗亲自统领十万人马进攻武功,京师长安紧急戒严。……唐太宗与侍中高士廉、中书令房玄龄、将军周范等骑马出玄武门,到达渭水之上,与颉利隔水对话,责备他违背盟约。突厥的部落首领们见到太宗,都吃了一惊,下马罗拜。不久,唐军来到,旗帜铠甲鲜明耀眼,部队肃穆威严,突厥兵大为惊骇。太宗和颉利都扣紧马缰使其停止不动,随即指挥大军后退布好阵势。大臣萧瑒认为太宗轻敌,勒马进行谏阻,太宗说:“我已经考虑成熟,不是你能够理解的。这次突厥倾全军入侵,是以为我朝新近发生祸难,不能组成部队作战。如果我们关起城门,他们必然在我境内大肆掠夺。我独自出见颉利,是向他显示我们无所畏惧,同时又摆下大量部队,使其知道我们必战的决心,意想不到我能阻止他原来的图谋。现在他们已深入我境,害怕不能返回去,这样我们和他打就能取胜,讲和也会可靠,制敌人于死命,就在于这次行动了!”这一天,颉利果然请和,太宗答应了。第二天,杀了一匹白马,与颉利在便桥上订立盟约,突厥兵撤退了。萧瑒问太宗:“颉利来时,众将多要求和他打,您不听,不久敌军却自己撤退了,这是什么高计啊?”太宗回答说:“突厥兵虽多,但阵容不整,君臣只看到财利,颉利可汗在渭水之西,而各部酋长都来拜见我,我乘其酒醉捆起他们,这种情况很容易做到。而同时我已命令长孙无忌、李靖暗地率军在豳州等待。如果我们的大军在后追击,埋伏的军队在前面堵截,打败颉利易如反掌。但我即位不久,最重要的是让国家安定平静,一和突厥作战,杀伤的人必会很多,他们虽然失败了,但还不至于亡国,他们戒惧而内修德政,团结备战,与我结怨为敌,我们能对付他们吗?现在收起兵械,卷起铠甲,诱以宝玉丝帛,他们的心志一定会骄惰,骄惰是亡国的开始,所以古语说‘将要夺取,必先给予’。”萧瑒再次下拜说:“这不是愚臣所能想到的。”

【评析】

中国历代王朝在建国之初,在国家安全上往往都面临着内忧外患交加的严峻形势。应当采取怎样的战略策略与步骤,逐次解决这些安全威胁,是关系王朝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古人通常的做法是,避免与强敌发生大规模武



装冲突,努力营造相对和平的战略环境;同时,抓紧时机发展自身实力,待自身实力强大、时机成熟后,再适时运用武力解除安全威胁,并为王朝的兴盛铺平道路。唐初君臣对突厥采取的策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隋朝末年,中原地区陷于动荡不安,大量人口逃往漠北,北方的东突厥再度强盛起来。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在晋阳(今太原西南)起兵,采取“北和突厥,南结李密”的策略,打着尊隋旗号,进军关中,攻占长安。次年五月称帝建唐,是为唐高祖。他采取巩固关中,“据险养威”,然后东出决战中原、南下平定江南的战略,展开长达7年的统一战争。至武德七年(624年),除割据朔方(今陕西靖边东北)的梁师都外,基本统一了全国。

在唐高祖致力于国内统一的同时,突厥不断南下侵掠,有时竟深入腹地,严重威胁着唐王朝的统治。唐高祖鉴于中原未定,无力北顾,常赏赐突厥钱币绢帛,以求安宁。但是,突厥颉利可汗恃其兵马强盛,言词傲慢,求请无度,对唐朝的侵掠愈发变本加厉。武德五年四月,突厥大举内犯,攻陷了关中的西部门户大震关(今陕西陇县境内)。武德六年十月,又攻占马邑(今山西朔州东北)。武德七年八月,颉利乘唐朝内部争夺王位之机,大举入寇,兵锋直指幽州境内,大有南下进犯关中和长安之势。当时,唐高祖君臣甚至产生迁都逃避的打算。

武德九年六月,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八月,李渊自称太上皇,传位于李世民,是为唐太宗。九月,突厥再次大兵压境,直逼长安。面对这一严重危机,唐太宗采取了“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隐忍之策,表现了高度的智慧和才略。他一方面派泾州道行军总管尉迟敬德率部在泾阳(今属陕西)设防,阻击突厥;另一方面,又把长安城中数万居民武装起来,大张旗鼓,准备与突厥决战。部署完毕之后,唐太宗亲临前敌,充分显示了唐朝君臣不畏强敌和陈兵必战的决心。正是这种气势,最终迫使颉利请和。于是,双方盟于便桥之上,颉利在得到唐太宗赠予的大量财物后,引兵退去。

事后,唐太宗将这次与颉利订立的便桥之盟称为“渭水之耻”,但这个耻辱是唐太宗不得不饮下的一杯苦酒。当时,唐朝发生“玄武门之变”不久,对新即位的李世民来说,首要的问题是安定内部,稳住局势,此时与突厥开战,内忧外困交至,势必影响统治的稳固与国家的安定。战争获胜,必然促使突厥重整军备,以唐为敌,变本加厉地南下入侵;战争失败,可能王朝覆亡,江山不保。



《孙子兵法》云：“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在自己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如果一味与敌人死打硬拼，必然遭到败亡的命运。唐初高祖与太宗对突厥屈辱求和的策略，是符合当时的战略形势的明智选择。他们采取和亲、互市、贿赂等方式，避免与突厥发生大规模战争，以争取相对有利的战略环境，完成统一，稳定内部，发展实力。同时，他们深知，单靠纳贿求和，换不来真正的和平与安定，只有富国强兵，自身实力强大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渭水之耻”后，唐太宗君臣常以此自励，励精图治，并最终于贞观四年（630年）大败突厥，生擒颉利可汗。

历史表明，通过以屈求伸的策略避免战争，为发展实力创造条件；最终通过发展实力的战略，为战胜敌人创造条件，这是处于弱势的一方实现强弱转换、战胜强敌的必由之路。



唐太宗论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

题引：唐太宗即位后，在国家安全上采取了“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的总方略。贞观三年（629年），东北靺鞨族遣使入贡时，唐太宗阐述了这一思想。本篇选自《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唐纪九》太宗贞观三年。

【原文】

靺鞨^①遣使人贡，唐太宗曰：“靺鞨远来，盖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谓御戎无上策，朕今治安中国^②，而四夷^③自服，岂非上策乎！”

【译文】

靺鞨族派使者入朝进贡，唐太宗说：“靺鞨使者远道而来，是因为突厥已经服顺的缘故。过去人们说对付周边部族没有好的办法，我现在把国家治理好了，周边的部族自动归服，这难道不是好办法吗！”

【评析】

唐代是继秦汉之后我国历史上又一个大一统时期，其强盛时的统治区域，不仅恢复到秦汉时期的水平，而且有所扩展。由于经历了长期的民族冲突和民族融合，传统的民族观念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促使唐王朝采取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唐高祖李渊在建立唐朝的次年即颁布诏书，申明其治边政策和主导思想是“就申好睦，静乱息民”^④、“怀柔远人，义在羁縻”^⑤。唐太宗即

① 靺鞨：中国古代生活在今松花江、牡丹江流域及黑龙江中下游的少数民族，满族的前身。西汉以前称为肃慎，东汉至魏晋时称为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唐代称靺鞨，宋元明时称女真。

② 中国：此处指唐朝中央政权。

③ 四夷：此处指唐朝周边的少数民族。

④ 《全唐文》卷一。

⑤ 《册府元龟》卷一七〇《帝王部·来远》。



位后更是把“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作为治国安邦的总方略和追求的最高目标。

“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的提出,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唐太宗即位之初,唐朝面临着严峻的安全形势,外部有来自突厥的侵扰和威胁,内部统治尚不稳固,军事力量不够强大,经济重建任务艰巨。当时,大臣们纷纷上书,建议唐太宗应“震耀威武,征讨四夷”。惟独魏征力排众议,提出“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①的方针,建议唐太宗先集中力量把内部事务处理好,只要内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军事强大了,周边民族自然会服顺。这一方针被太宗采纳,“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也逐渐成为其施行军国大政、处理内外关系上的主导思想。

具体地讲,唐太宗“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的思想,主要包括有以下几层含义:第一,明确了历代王朝面临的两大安全战略问题,即“治安中国”与“外服四夷”;第二,指出了解决这两大问题的战略次序,即要遵循先内后外的原则;第三,分析了这两个安全战略问题的关系,“治安中国”是抚定四夷的基础与条件,“四夷自服”是“治安中国”的自然结果,内外兼修,共同服务于国家的安全与稳定;第四,阐明了“抚定四夷”的战略手段,主要不是用武力来征服,而是通过加强“中国”的吸引力与影响力,使之主动向化,进而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和周边稳定。

按照这一思想,唐太宗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建设上,励精图治,自强不息,推行轻徭薄赋政策,恢复并发展生产,很快扭转了因隋末战乱而造成的国家经济凋敝的局面。他高度重视国家武装力量建设,认为“中国虽安,忘战则民殆”,要求“农隙讲武”,“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同时,他又反对穷兵黩武,指出:“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②。对待周边国家和少数民族,他主张以文德服人,尽量不诉诸战争。贞观四年(630年),林邑(即占婆,在今越南中南部)献火珠,有大臣因其表辞不顺,请出兵讨伐,唐太宗认为这只是言语之间、无须介意的小事而已,加以拒绝。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完全不用武力是不可能做到“四夷服顺”的,因此实际上唐太宗又采取了两手的策略,即“降则抚之,叛则讨之”,在怀柔招抚的同时,对危害国家安全的周边部族使用武力征讨的手段,促使达到目的的实现。

①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唐纪九》太宗贞观四年。

② 《贞观政要·征伐第三十五》。



唐太宗统治时期,在“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的思想指导下,对内修明政治、发展经济、加强军队建设,国力强盛,形成了唐初“贞观之治”的局面。并通过安内而服外,使唐王朝声威远播,无数求封赏、谈商贸、讲经求学的外族首领、使者和商人云集都城长安,出现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恢宏盛况。唐太宗也被尊为“天可汗”,受到周边少数民族的拥戴。“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的思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强调的是首先要把国家内部治理好,如果内部出了问题,动乱不安,外敌就会乘虚而入,给国家安全带来严重危害,甚至会使政权倾覆瓦解。纵观中国历史,几乎任何一次周边少数民族侵入中原而导致的大规模动乱和战争,都是始自中原王朝内部的腐败和纷乱。西晋之末,八王之乱使晋朝崩溃,其后北方各部族纷入中原,互相混战,天下大乱;唐末,藩镇割据使唐朝解体,之后契丹南下加剧五代时期的纷争动荡。“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的思想,突出体现了中国传统治国安邦思想中注重内部治理的取向,不仅在当时成效显著,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太宗论不筑长城

题引：在边防战略上，唐太宗主张增强国力、军力实施积极防御，反对修建长城、筑塞自保的消极防御做法。本篇选自《旧唐书·李勣传》（参见《贞观政要·任贤第三》）。

【原文】

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①之感，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世勣^②于并州^③，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

【译文】

唐太宗对左右近臣说：“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之材，安抚边境，只知道筑长城来抵御突厥，他在才情见识上的迷惑糊涂，竟达到这种地步！我现在委任李世勣镇守并州，便让突厥人畏惧他的威名而逃走，边境平静，这难道不胜过远筑长城吗？”

【评析】

中国古代传统治边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强调实行防御，通过“修墙”、“固塞”来抵御外敌的入侵。修筑长城，在边疆地区建立安全防御体系，是中国大多数封建王朝巩固边防、维护国家安全的一项重要战略。因此，从秦汉以来的历代王朝，几乎都有在边患最为严重的北方修筑长城的举动，秦、

① 情识：才情与见识。

② 李世勣：即李勣（594～669年），唐代名将。本姓徐，名世勣，字懋功，后赐姓李，因避唐太宗名讳，单名勣。历任并州都督、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英国公。

③ 并州：治今太原西南。

④ 塞垣：长城边墙，此处指北方边境地带。



汉、金、明四代更是多次大规模加修和增筑长城。

没有修筑长城的王朝,唯有唐、清两代。唐太宗李世民和清康熙帝玄烨,则分别是这两个王朝不修长城思想的集中代表。本篇唐太宗对臣下所说的这番话,表明了他不赞成修筑长城的想法,也阐述了他的国防战略思想。对于外来侵扰,他主张实行积极防御,反对筑塞自固、消极防守,对隋炀帝不能精选良将,镇抚边境,只知筑长城以备突厥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以良将守边,构筑巩固的边防,其作用远胜于对长城的修筑。

唐太宗之所以不赞成修筑长城,是有其深远考虑的。首先,修筑长城,劳民伤财,加重人民负担,消耗国家财力。长城的修筑往往与政治上的不行仁政相联系,不体恤百姓,大兴土木,势必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给国家政权造成危害。其次,从唐以前的历史来看,秦、汉、北魏、隋均曾不同程度地修建了长城,然而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建起的这一防御工程,其防御作用却是有限的,秦汉以来匈奴、鲜卑、柔然、突厥等北方各民族轮流不断进犯中原,西晋末年更是倾覆了司马氏政权,并导致之后天下大乱的局面。可见,单纯依靠长城,并不能阻止外敌的侵扰。此外,基于他一贯提倡的夷夏一体、“胡越一家”的观念和主张,唐太宗反对用修筑长城将中原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隔开来的做法,主张在治理好内部的情况下,对周边少数民族怀之以德,畏之以威,采用怀柔羁縻政策,使中原地区与周边各族人民形成大一统的局面,共享安定太平。

作为一代英主,唐太宗在修筑长城问题上的思想认识无疑是十分清醒的,也是十分可贵的。任用良将镇守边防,来代替修筑长城的思想背后,实际上隐含着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如果统治者政治清明,国力充裕,选将得人,军事强大,是不必依赖长城来拱卫的;而如果政治腐败,民生凋敝,任将非人,武备不振,仅靠一道边墙进行消极防御,是根本起不到作用的。换句话说,没有强大的国力和军力作后盾,单纯凭仗军事防御设施,是不可能抵御外患,确保国家安全的。唐太宗的这一思想与他提出的“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的思想主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互为补充,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其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内核,也成为其治国安邦实践中的指导方针。在对内致力于修明政治、发展经济和加强军队建设的同时,唐太宗审时度势,适时出击,先后进行了征东突厥之战、灭吐谷浑之战、败薛延陀之战等重大战役,解除了威胁唐王朝安全的边患问题。高宗时期的讨西突厥之战,武后时的用兵突厥和吐蕃等,也基本上继承了唐太宗时期的积极防御战略并取得了明显成效,有力地



推动了唐代兴盛局面的形成。

唐太宗不修长城的思想,为后来清朝的康熙帝所继承,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修德安民”和“以蒙古部落为屏藩”的治边思想。康熙帝不仅认为不能凭恃长城来抵御外患,而且更强调安抚团结少数民族的重要性,以蒙古诸部的人心归附来筑起一道无形的更为坚固的长城(参见康熙论不修长城)。唐太宗、康熙帝的这种治边安邦思想,极大地拓展、丰富了中国传统战略思想的宝库,对后世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其中蕴含的深邃道理值得我们认真探究思索。



唐太宗论中华夷狄爱之如一

题引：唐太宗在对待周边少数民族问题上主张夷夏一体、“胡越一家”，实行羁縻怀柔政策。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五月，他在与近臣的谈话中阐述了这一思想。本篇选自《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原文】

上御翠华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①，不能服戎、狄^②。朕才不逮^③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④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⑤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⑥，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欲实^⑦诸怀，退不肖^⑧则欲推诸壑^⑨，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阼^⑩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
- ① 中夏：指中原。
② 戎、狄：指周边少数民族。
③ 逮（dai，音代）：及、赶得上。
④ 谕：明白。
⑤ 疾：痛恨。
⑥ 行能：品行才能。
⑦ 实（zhi，音制）：放置。
⑧ 不肖：不成材、不正派，小人。
⑨ 壑：深沟。
⑩ 践阼：登基、继承皇位。



【译文】

唐太宗来到翠微殿,问侍臣说:“自古以来,帝王虽平定中原,却不能征服周边民族。我的才能不及古人,而在建功立业方面却超过他们,我自己不明白这原因何在,诸位可坦率而实事求是地谈谈。”大臣们都说:“陛下功德有如天高地厚,是万物中难以用言语名状的。”太宗说:“并非如此。我之所以能做到这些,主要是由于五个因素:自古帝王大多忌恨胜过自己的人,我见到别人的长处,就像自己的一样。人的品行才能,不能兼备,我经常去其所短,用其所长。君主往往提拔贤士就想把他置于自己怀抱,贬退不肖就想把他推进深沟,我见到贤能之士则尊敬他,见到不肖之辈则哀怜他,让两种人各得其所。帝王多讨厌正直之臣,暗诛明杀,哪个朝代都有,我即皇位以来,荟集了众多正直之士,未尝贬黜斥责过一人。自古以来大都看重汉族,轻视少数民族,我独爱之如一家,所以各少数民族部落都像对待父母那样依附于我。这五方面,就是我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功业的原因。”

【评析】

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念包括两个对立的方面:一是夷夏对立观,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二是夷夏一体观,主张“夷夏一家”。自先秦以来,中国各民族经历了对立冲突,也经历了交流融合,到了隋唐之际,长期处于支配地位的夷夏对立观逐步被夷夏一统、华夷一体的民族观所取代。唐太宗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华、夷狄爱之如一”的思想。

唐太宗作为一个具有雄才大略和开拓精神的英主,对少数民族采取了一系列较为开明的“羁縻政策”,即对于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并不改变其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而在当地设立羁縻州府,任命他们的首领做羁縻州府的都督刺史,继续直接统辖本民族。这不仅有利于缓和民族矛盾,促进了民族团结与民族融合,而且为唐代盛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贞观四年(630年),唐朝击败东突厥后,北方各少数民族臣服于唐,突厥等诸部纷纷内附。如何安置这些内附各族,成为当时一大问题。中书令温彦博主张按东汉光武帝所行事例,在北部沿边安置,保留其部落组织,使之成为唐北部边境的一道屏障。魏征、杜楚客等则反对温彦博的主张,他们引西晋末年五胡之乱为例,认为突厥难以用恩礼安抚,使之居留中原北边时间一久,必成祸患。唐太宗采纳了温彦博的建议,对内附的突厥降户采取怀柔安



抚政策,将他们安置于临界内地的河南、朔方之境(今内蒙古南部乌审旗一带),保全原有的部落,仍由酋长治理,维持原有的风俗习惯,仍以畜牧业生产为主。突厥的首领也分别得到任用和安置。不少内迁的突厥人住进了长安城,据时人统计有近万户人家。

贞观十八年,当内奔的突厥请求在内地安置时,群臣大都表示反对,唐太宗却同意了,并解释道:“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乱。”^①唐太宗认识到,“夷狄亦人”,否定了过去“夷狄譬如禽兽”^②之类的民族歧视与偏见,尊重其人格,维护其尊严,主张以平等心对待少数民族;唐太宗认为,少数民族的臣民与中原王朝的臣民一样,都有各种欲望和要求,要因势利导,顺人之欲;对少数民族不要猜忌,而应施以德泽,待之如一家。唐太宗不仅能够采取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而且对于新民族的形成具有一种自觉意识。他认为,自古贵中华,贱夷狄,而今四海一家的新形势下,就应该是“胡越一家”,也就是说,大家都是一个融合以后的新民族了。

唐太宗这种视夷狄与华夏为一家,并对其“爱之如一”的民族观念及政策,对唐代和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华夷一体的观念意识逐步增强,对于推动各民族的融合、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①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八年。

^② 《汉书·匈奴传》。



魏征论理政得失

题引：魏征(580~643年)，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①，历官谏议大夫、秘书监、侍中、知门下事等，进封郑国公，以直言善谏著称。贞观七年(633年)，魏征与唐太宗讨论治国得失，主张实行教化，采取轻徭薄赋、劝农务本的政策方针以使国家安定。本篇选自《贞观政要·政体第二》。

【原文】

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②魏征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因曰：“当今大乱之后，造次^③不可致化。”征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④也。”太宗曰：“善人^⑤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征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⑥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对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⑦，汉杂霸道^⑧，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征所说，恐败乱国家。”征曰：“五帝、三王^⑨，不易人而化。行帝道^⑩则帝，行王道^⑪

① 一说钜鹿曲城(今河北晋州)人。

② 秘书监：秘书省主官，掌图书文籍，下有著作、太史二局。

③ 造次：急速、仓猝之意。

④ 食(sì, 音饲)：拿东西给人吃。

⑤ 善人：指贤明的人。

⑥ 期(jī, 音机)月：一个月后。

⑦ 秦任法律：秦代之治专用刑法律令。

⑧ 汉杂霸道：汉代之治以王道、霸道杂用之。

⑨ 五帝、三王：五帝指传说中夏朝以前上古时代的五个帝王，具体说法不一。《史记》以黄帝、颡顓、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禹、汤、武为三王。

⑩ 帝道：指道家所讲无为而治之道。

⑪ 王道：指儒家所讲仁义德政之道。



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①与蚩尤^②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③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④为乱虐,而汤^⑤放之,在汤之代,即致太平。纣^⑥为无道,武王^⑦伐之,成王^⑧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德彝等无以难之,然咸以为不可。太宗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厥破灭。

【译文】

贞观七年,唐太宗和秘书监魏征从容不迫地讨论自古治国的得失问题,他说:“现在处于天下大乱之后,短时期内不能达到天下大治。”魏征说:“不是这样。凡是人在危难困苦中,忧虑的是死亡。忧虑死亡,就盼望国家安定。有盼着国家安定的愿望,就容易教化。既然这样,那么大乱后容易教化,就如同饥饿的人容易给他东西吃一样。”太宗说:“贤明的人治理好国家也要等待百年之久,之后才能战胜残暴除去杀戮。大乱以后,就要企求天下大治,哪里能轻易在短时期内就达到所希望的呢?”魏征说:“这是对常人来说的,对圣哲就不是这样了。如果圣哲实施教化,上下一心,人民就像回声一样响应,不用催促就会自动加速,一个月就可以治理好,实在不是什么难事,三年取得成功,还得说是太晚了。”太宗认为魏征说得对。封德彝等人回答说:“夏、商、周三代之后,人心逐渐浮薄欺诈,所以秦代治国专用刑罚法律,汉代治国则杂用霸道与王道,都想教化天下却没能成功,难道是他们能教化却不想教化吗?如果相信魏征所说的,恐怕会使国家败乱。”魏征说:“五帝、三王时期,没有更换人民却实现了教化。可见,实行无为而治之道就会成就帝业,实行仁义德政之道就会成就王业,这取决于当时治理的方法。从典籍上查看,就可以知道了。从前黄帝和蚩尤打了七十多仗,天下十分混乱,黄帝获胜之后,很快就

① 黄帝:传说中汉族的祖先,上古时代部落联盟的首领。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

② 蚩尤:传说中上古时代东方九黎族首领,后为黄帝所擒杀。

③ 颛顼:传说中上古时代部族首领,号高阳氏。

④ 桀:夏朝末代暴君,名履癸。

⑤ 汤:商朝建立者,又称成汤、武汤等。

⑥ 纣:商朝末代暴君,又称帝辛。

⑦ 武王:即周武王,周朝的创建者,名姬发。

⑧ 成王:即周成王,武王之子,名姬诵。



达到太平。九黎族败坏道德,颛顼征伐他们,战胜之后,不放弃对他们的教化。夏桀为政混乱暴虐,汤驱逐流放他,在汤统治时,就达到了太平。商纣残暴无道,周武王征伐他,到了成王统治时,也达到了太平。如果说人逐渐浅薄欺诈,不能达到纯朴,到如今全都应该成为鬼魅了,哪里还能实行教化呢?”封德彝等人拿不出什么来加以反驳,但是都认为魏征所言不可行。唐太宗努力推行,毫不倦怠,几年之内,国家安定,击灭了突厥。

【评析】

中国封建社会的治国安邦思想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儒家的“以德治国”、以礼义教化百姓的思想;另一种是法家的“以法治国”、以严刑峻法规范民众的思想。这两种治国思想在历史上由对立走向融合,形成了儒法并用、王霸兼施的基本特征。唐朝初年,封德彝与魏征关于治国思想的争论,就是这两种思想的一次碰撞与冲突。

唐太宗继位之初,国家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政局很不平稳。一方面,隋末动乱以来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生产尚未得到恢复,土地荒废,人口减少,全国呈现出一片经济凋敝的景象,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脆弱;另一方面,社会矛盾还很尖锐,不仅一些农民还在亡命山泽,一些割据势力也伺机发动局部动乱。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尽快制定有效的治国方针,以安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

唐太宗担心承隋末大乱之后,臣民难以教化,因此多次与大臣们商谈教化问题。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提出了天下大乱之后是否能够迅速致治的问题,与群臣讨论。对此,朝廷上存在着以魏征和封德彝为代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封德彝是隋朝旧臣,他站在农民战争中受到沉重打击的山东(太行山以东地区)士族的立场上,怀着对农民阶层的刻骨仇恨,主张人心难治,应当实行高压政策,这种做法是唐高祖时期统治思维的继续。因为在隋末动荡中,农民军将俘虏的隋朝官吏及士族子弟一律斩杀,给正在走向衰落的山东士族地主以沉重打击。在唐初统一战争进程中,唐高祖基本任用山东士族出身的官僚负责农民起义区域的政权重建工作,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社会矛盾持续激化,引起了窦建德起义军余部刘黑闥的反复起兵。后来公开的成规模的反抗虽然被镇压了,但农民与朝廷的敌对一直没有消除,所以封德彝的主张代表了唐初的传统思路和一些士族地主出身的官僚的立场。



魏征来自社会下层,参加过反隋起义,对农民的情况和全国的形势能够比较准确地加以把握,他分析当时百姓的动态是,大乱以后人心思定,因此建议唐太宗实行教化,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劝农务本、发展生产的方针,以解决社会矛盾,尽快恢复统治秩序,安定国家。魏征的分析切中要害,提出的意见也更合乎实际,唐太宗最终采纳了魏征的主张,很快确定了施行教化的治国方针,并且“力行不倦”,在短短数年间,便取得了“海内康宁,突厥破灭”的明显成效。后来,唐太宗回忆说:“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①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他的教化思想进行总结说:“朕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贵。若教以礼义,使之少敬长、妇敬夫,则皆贵矣。轻徭薄敛,使之各治生业,则皆富矣。若家给人足,朕虽不听管弦,乐在其中矣。”^②这标志着唐太宗治民以静,施以教化理论的成熟,也是“贞观之治”局面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 《贞观政要·政体第二》。

②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唐纪十二》太宗贞观十六年。

马周《陈时政疏》(节选)

题引:马周(601~648年),字宾王,博州茌平(今属山东)人,累官至中书令。贞观十一年(637年),时任侍御史的马周针对朝廷在任官问题上重内轻外的倾向,上疏建议加以改变,特别强调了刺史、县令选任得人对于治理州县、安定地方的重要性。本篇选自《旧唐书·马周传》。

【原文】

临^①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唯在刺史、县令。县令既众,不能皆贤。若每州得良刺史,则合境苏息。天下刺史悉称圣意,则陛下端拱^②岩廊^③之上,百姓不虑不安。自古郡守、县令,皆妙选贤德,欲有擢升宰相,必先试以临人,或从二千石^④人为丞相。今朝廷独重内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刺史多是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方始外出。而折冲果毅^⑤之内,身材强者,先人为中郎将,其次始补州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其材堪宰莅,以德行见称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⑥由于此。

【译文】

治理天下,以民为本。要使百姓安乐,只在选拔合适的人担任刺史、县令。县令既然人数很多,就不可能做到人人都贤。如果每个州都能得到好的刺史,那么,一州的百姓就得到休养生息。如果天下的刺史都能使圣上满意,陛下就可以端坐朝堂,百姓也不担心不安定。自古以来郡守、县令,都是精心

① 临:治理。

② 端拱:喻帝王无为而治。

③ 岩廊:指庙堂、朝廷。

④ 二千石:汉代二千石俸禄为郡守和诸侯一级,故后世称郡一级地方官为二千石。

⑤ 折冲、果毅:指折冲府的折冲都尉和果毅都尉。

⑥ 殆:大概,几乎。



挑选贤明有德之士充任。打算从官员中选拔宰相,一定要先用治民之术进行考察,或者从郡守中选拔丞相。如今朝廷只重内臣,对于县令、刺史,却很不重视他们的选任。刺史大多是武将勋贵,有的是京官不称职,才外放出来。折冲、果毅当中,身体强健的,好的选为中郎将,差一些的才补任刺史。边远的地区,在用人上更不重视,地方官才能堪为宰相,以德行见称而被提拔的,十个当中没有一个。百姓之所以至今没能安定,原因大概就在于此。

【评析】

治国安邦,以人为本。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国家就会安定繁荣;否则,人民生计出现问题,国家必然动荡不安。而治理百姓,离不开亲民之官。唐代地方行政建制是州、县两级,刺史和县令分别是州、县两级的最高长官。唐太宗把刺史和县令看作是地方政权机构的两个重要环节,把治理好地方,使老百姓过上安宁富足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刺史、县令身上。

《贞观政要·择官》载,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我每天晚上都要考虑老百姓的事,常常夜半不寐。为皇帝直接管理老百姓的,是刺史(州的长官)和都督(唐朝于重要地区设都督府),我唯恐他们没有为老百姓办好事。所以,我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屏风上,每天无论坐着、躺着都要观看。听到有关他们为官善恶的情况,都写在他们的名字下面,以备提拔或处分他们时参考。县令尤其是“亲民”官(即亲自治理百姓的官员),不可不好好选择。又说:我居住深宫之中,听得不远,看得不远,就靠都督、刺史这班人,“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为了选好这些“亲民”之官,他下令:五品以上京官和地方官,各举堪为县令者,上报朝廷,以供朝廷选拔。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针对朝廷上下在任官问题上存在重内轻外的倾向,强调朝廷要重视刺史、县令这些地方官的任用,强调对地方官员要妙选贤德,不能独重内官。马周原是一个很不得志的知识分子,来自下层,深知民间疾苦,对基层官吏的暴虐残民做法及其危害有深刻认识,所以提出“欲令百姓安乐,唯在刺史、县令”的主张。

武后、中宗时期,韦嗣立上疏再论及此事,指出刺史、县令为“理人之首”,然而现今却存在着刺史、县令所用非人、难以为治的积弊。唐玄宗时期,张九龄在《上封事书》中又提出:“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县令。”从这些奏疏中,一方面可以看出,关乎地方治乱的刺史、县令问题,是一个很难解决并且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有识之士已经



充分认识到县令、刺史这些地方官员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这些地方官员作为政策的执行者,是“理人之本”、“理人之首”,关乎国家治乱安危,不可不慎择其人!

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题引：唐太宗晚期生活日渐奢靡，怠于政事，魏征连续上疏进行规谏。本篇为其中之一，选自《旧唐书·魏征传》。

【原文】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岂望流之远，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①之重，居域中之大^②，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③。不念于居安思危，戒贪以俭，德不处其厚^④，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百元首^⑤，承天景命^⑥，莫不殷忧^⑦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⑧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⑨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

① 神器：指帝位。

② 居域中之大：占据天地间的一大。《老子》上篇：“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域中，天地间。

③ 休：美好。

④ 德不处其厚：不处于上德这样的深厚道德。老子《道德经》认为，德有上下之分，上德即是属于厚德。

⑤ 元首：帝王。

⑥ 景命：大命。景，大。

⑦ 殷忧：深忧。殷，深。

⑧ 胡越：即胡与越。胡地在北，越地在南，比喻疏远隔绝；亦泛指北方和南方的各民族。

⑨ 董：督责。



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所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①而自牧^②，惧满溢则思江海而下百川，乐盘游^③则思三驱^④以为度，恐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⑤，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⑥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⑦，鸣琴垂拱^⑧，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译文】

我听说想要树木长得高大，一定要稳固它的根底；想要河水流得远长，一定要疏通它的源泉；想要国家安定，一定要积聚它的德义。源泉不深却想要河水流得远长，根底不稳固却想要树木长得高大，道德不深厚却想要国家得到治理，即使是低贱愚笨的人，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聪慧贤明之人呢？君主握有皇帝的重权，居于天地间的大位，享有极崇高的尊严荣誉，永远保持无穷的美好幸福。如果不考虑在安乐时想到危难，用节俭来消除奢侈，不处于上德这样的厚德，情理战胜不了欲望，这就像砍伐树根却想要树木茂盛，阻塞水的源头却希望水流得长远一样啊。

所有帝王，都承受上天的大命，没有不是经过深切忧虑才道德卓著，但功成之后却德行衰败。开始时做得好的，这样的人实在很多，最终能够保持到

① 谦冲：虚怀谦让。

② 自牧：自我修养。

③ 盘游：打猎。

④ 三驱：古时王者田猎之制。一说，一年打猎三次。《礼·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猎）。”一说，“三驱”为围合其三面，前开一路，使之可去，不忍尽物。《易·比卦》：“王用三驱，失前禽。”

⑤ 九德：古人谓贤人所具备的九种优良品德。但不同著作，所指不一。《尚书·皋陶谟》所说九德是：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彊（强）而义。

⑥ 豫游：逸乐嬉游。豫，欢喜，快乐。游，巡游，游乐。

⑦ 松乔之寿：意为长生不老。松、乔，古代传说中的仙人赤松子和王子乔。

⑧ 鸣琴垂拱：意为无为而治。鸣琴，弹琴。垂拱，垂衣拱手，形容无事可做的样子。



底的大概很少,难道是因为夺取天下容易而守住天下就困难了吗?从前夺取天下力量有余,如今守住天下却实力不足,为什么呢?这是由于在深重忧患之时,一定能竭尽诚意对待臣下,得志以后就放纵自己傲慢地对待一切。竭尽诚意就能使胡、越这样隔绝疏远的地方也能结成一体,傲慢地对待一切,就是骨肉亲属也能成为各不相关的人。即使用严刑来督责他们,用声威来吓唬他们,最终他们也只图苟且免除罪罚,却不怀念君主的仁德,表面上恭顺而不是内心里悦服。怨恨不在于大小,可怕的是众人。(百姓和皇帝的关系,就像水和船一样)水能载船也能够覆船,这是应该深切警惕的,奔驰的车用的是朽烂的绳索,这能疏忽吗?

作为君主,如果真的能够做到看见想要的东西就想到应该知足来警惕自己,将要兴建宫室土木就想到适可而止使百姓安宁,想到君主位高而境危就忘谦虚谨慎加强自我修养,恐怕自己骄傲自满就想到江海之所以巨大是因为它卑下而能容纳百川,喜欢打猎乐而忘返就想到君主游猎以一年三次为限度,害怕自己松懈懒惰就想到谨慎地开始并且谨慎地终束,担心耳目不通闭塞受骗就想到虚心接受下面意见,担心有谗邪的人在自己身边就想到要自身正直并斥退邪恶的人,有所赏赐时就想到不要因为偏爱而奖赏不当,有所惩罚时就想到不要因为私愤而滥用刑罚。总括这十种思虑,发扬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这九种美德,选拔有才能的人而任用他们,选择好的意见而采纳它。那么聪明的人就会施展他们的全部智谋,勇敢的人就会竭尽他们的力气,仁爱的人就会广施他们的恩惠,诚信的人就会报效他们的忠心。文臣武将争相竞逐效命,君臣之间相安无事,可以尽情享受巡游的快乐,可以保持长寿,垂衣拱手弹琴而治,不必说教就使民风淳化。何必再劳费精神,冥思苦想,代替下属去处理事务,役使自己聪明的耳目,毁弃无为而治的好办法呢?

【评析】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是一种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专制君主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享有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握有最高的国家权力。“人治”是中国古代政治的根本运作机制,它维系着整部庞大的国家政权机器的运转。建立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基础之上的国家安全战略,在其制定与实施上往往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人亡政息”的现象比比皆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做法也不鲜见,换言之,统治者的素质和精神面貌极大地影响和决定着国家的政治状况。



同一王朝的不同阶段,统治者的精神面貌与政治作风大不相同;同一统治者的不同阶段,其精神面貌与政治作风也会大相径庭。即使像唐太宗这样开明的封建帝王,在其统治期间也无法做到善始善终,始终如一。贞观初期,唐太宗能够虚心纳谏,政治清明。随着国内形势的好转和边疆胜利的扩大,到了贞观中期,便逐渐产生骄傲情绪,侈靡奢纵行为有所发展,徭役、兵役渐趋繁重。唐太宗甚至说出“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一类的言论。这些变化引起部分大臣的强烈反应。贞观十一年(637年),魏征连续上了四道论时政疏,劝谏唐太宗以隋为鉴。同年,马周也上书规谏:“但如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贞观十三年,魏征又上此疏,劝谏太宗要“居安思危”、“慎始敬终”。

本篇中,魏征围绕“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的主旨,规劝唐太宗在政治上要慎始敬终,虚心纳下,赏罚公正;用人时要知人善任,简能择善;生活上要崇尚节俭,不轻用民力。魏征以树木的生长和水流为喻,提出要使国家安定,君王一定要大力推行德义。魏征指出,凡创业的开国之君在取得成功之前,往往竭诚待人,做事都按德义的标准行事,守成之君却常常不行德义而失去人民的拥护。魏征告诫人君,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民众犹如水,人君应当深加警省。在此基础上,魏征提出“十思”,告诫帝王从十个方面推行德义,要求帝王从主观上自我约束、谦冲自牧、虚心纳谏、慎始慎终。魏征认为,能从这十个方面去努力,那么社会就能稳定和长治久安。

尽管魏征此疏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于唐太宗起了一定作用。但是,这种作为君主专制制度补充的谏议制度,其作用本质上是有限的。大臣劝谏能否成功,建立在君主能否自律的基础之上,而勇于劝谏的大臣往往需要冒极大风险,一旦龙颜不悦,他们便可能面临可悲的结局,如《韩非子·难言》所说:“子胥善谋而吴戮之;仲尼善说而匡围之;管夷吾实贤而鲁囚之。”历史表明,要革除“人治”的弊端,只靠当权者个人自律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强有力的制约机制,必须从制度入手,废除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决策与监督机制,才有可能真正保障决策的正确性与科学性,确保国家得到合理、有效的治理,保持长久的安定和安全。



郭元振《守安西四镇疏》

题引：郭元振(656~713年)，魏州贵乡(今河北大名北)人，历官凉州都督、左骁卫将军兼检校安西大都护、朔方道大总管等，进封代国公。武则天当政时吐蕃要求罢安西四镇戍兵，并分十姓突厥之地。郭元振上疏要求朝廷加以拒绝，为武则天所采纳。本篇选自《旧唐书·郭元振传》(参见《全唐文》卷二〇五)。

【原文】

臣闻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国家难消息^①者，唯吐蕃与默啜^②耳。今吐蕃请和，默啜受命，是将大利于中国^③也。若图之不审，则害必随之。今钦陵^④欲分裂十姓，去四镇^⑤兵，此诚动静之机，不可轻举措也。今若直塞其善意，恐边患之起，必甚于前。若以镇不可拔，兵不可抽，则宜为计以缓之，藉事以诱之，使彼和望未绝，则其恶意亦不得顿生。

且四镇之患远，甘、凉之患近，取舍之计，实宜深图。今国之外患者，十姓、四镇是也；内患者，甘、凉、瓜、肃是也。关、陇之人，久事屯戍，向三十年，力用竭矣。脱^⑥甘、凉有不虞^⑦，岂堪广调发耶？夫善为国者，当先料内以敌外，不贪外以害内，然后夷夏晏安^⑧，升平可保。如钦陵云“四镇诸部接界，惧

① 消息：即休养生息，此处引申为安定。

② 默啜：东突厥可汗。

③ 中国：这里指唐朝中央政权。

④ 钦陵：唐代吐蕃大将。噶尔氏族，故又称噶尔·钦陵，松赞干布大相禄东赞长子。继父任大论(大相)，总揽吐蕃大权。

⑤ 四镇：即安西四镇——碎叶、龟兹、于阗、疏勒。

⑥ 脱：倘若、如果。

⑦ 不虞：出现意外的情况。虞，意料、预料。

⑧ 晏安：安定。晏，平静、安定。



汉侵窃,故有是请”,此则吐蕃所要者。然青海、吐浑密迤兰、鄯^①,比^②为汉患,实在兹辈,斯亦国家之要者。

今宜报钦陵云:“国家非吝四镇,本置此以扼蕃国之要,分蕃国之力,使不得并兵东侵。今委之于蕃,力强易为东扰。必^③实无东侵意,则还汉吐浑诸部及青海故地,即俟斤部落^④亦还吐蕃。”如此,则足塞钦陵之口,而事未全绝也。如钦陵小有乖,则曲在彼矣。又西边诸国,款附^⑤岁久,论其情义,岂可与吐蕃同日而言。今未知其利害,未审其情实,遥有分裂,亦恐伤彼诸国之意,非制驭之长算也。

【译文】

我听说利或许会产生害,害也会产生利。国家难于安定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有吐蕃和默啜作祟。现在吐蕃请和,默啜受命,这将给国家带来很大的好处。如果谋划不周密,那么祸害一定会随之而来。如今钦陵要求分割突厥十姓之地,去除安西四镇之兵,这实在是影响治乱的关键问题,不能轻举妄动。现在如果直接阻塞其请和的好意,恐怕又会引发边患,一定会比从前还严重。如果因为四镇不能拔除,军队不能撤走,就应该好好谋划以缓和钦陵,用事来诱导他,使他求和的愿望无法断绝,那么他的邪恶意图就不会马上产生出来。

况且四镇的祸患尚远,甘州、凉州的祸患迫近,取舍的策略,实在应该好好谋划。如今国家的外部祸患,在突厥十姓、四镇;内部的祸患,在甘州、凉州、瓜州、肃州。关陇地区的人民,长期从事屯戍,大约三十年了,民力用完了。如果甘、凉发生意外,哪能承受大量调发呢?善于治理国家的,应该先考虑内部以对抗外部,不能贪图外部小利以危害内部,然后才能夷夏安定,保持太平。正如钦陵所说“四镇与吐蕃各部接界,担心唐朝侵袭,所以有这个请求”,这是吐蕃所重视的。但是青海、吐谷浑与兰州、鄯州很近,频繁成为朝廷

① 鄯:即鄯州,治今青海乐都。

② 比:连续、频繁。

③ 必:倘若、假如。

④ 俟斤部落:西突厥十姓部落于636年后分为左、右两厢,左厢五部称五咄陆部,部落酋长称啜,共五大啜;右厢五部称五弩失毕部,部落酋长称俟斤,共五大俟斤。

⑤ 款附:诚心归附。



的祸患,实在是因为吐蕃,这也是国家所要重视的问题。

如今应该回复钦陵说:“国家不是吝惜四镇,本来设置四镇用以控扼各番国的要害,分散各番国的力量,使不能合兵东侵。如今把四镇放弃给番国,他们力量强大了就容易向东侵扰。如果吐蕃确实没有东侵之意,就请把吐谷浑诸部与青海故地归还朝廷,那么突厥俟斤部落也可以归你们。”这样,就足以堵住钦陵之口,议和之事也就没有完全断绝。如果钦陵稍有违背,他们就理屈了。并且西边诸国,诚心归附多年了,就他们的情义来说,哪里会与吐蕃一样。如今未了解其中的利害,没查明真实情况,远远地就把他们分割出去,恐怕会伤他们的心,这不是掌控边疆的长远之计。

【评析】

唐太宗打败突厥后,采取积极的边防战略,开拓和经营西域(今新疆和中亚一带),继汉朝之后,再次实现了对西域的控制。到了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时期,吐蕃势力日益强盛,对西北地区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此情况下,唐朝对于是否坚守西域,产生了动摇。

安西四镇——碎叶、龟兹、于阗、疏勒,是唐朝在西域最重要的四个军事重镇,关系到唐中央政权对这一地区的有效控制,也是吐蕃极力想夺取的目标。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三月,王孝杰与吐蕃战于素罗汗山,唐朝兵败。九月,吐蕃遣使请和亲,武则天派遣郭元振出使吐蕃察探虚实。吐蕃要求朝廷撤除安西四镇的戍兵,并把西突厥十姓之地分割给吐蕃。吐蕃大将派使者随郭元振入朝面陈,武则天命大臣众议此事。

宰相狄仁杰以百姓戍守四镇极为疲弊、且西域地远难以控制为理由,建议放弃四镇。右史崔融则上书,对这种主张进行了驳斥。崔融回顾了自上古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的侵扰所造成的危害,以及汉唐两朝为消除边患所做的巨大努力。他认为,为了国家的完整、边疆与内地的安宁,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值得的。针对放弃四镇的主张,崔融指出,如果四镇不守,西北的羌族各部势必会降于吐蕃;如果吐蕃与诸羌联合起来,并力东侵,唐对西域的控制将会全部丧失,而且唐朝河西诸郡也会受到严重威胁,后果不堪设想。

在崔、狄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郭元振再次上疏,反对放弃四镇^①。郭

^① 关于崔融献议时间及其与狄、郭奏疏之关系,参见王小甫:《唐初安西四镇的弃置》,《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



元振在疏中指出,允许吐蕃之请,伤害新疆各族之心,于国不利;拒之,吐蕃为边患必深,于国亦不利。因此,他建议设计缓之。可以告诉对方唐派兵戍守四镇,意在镇抚西域。若吐蕃无东侵之志,当归吐谷浑诸部及青海故地,唐则以西突厥五俟斤部归吐蕃。如此,既塞吐蕃之口,又不绝其和亲之望。武则天认为郭元振言之有理,采纳了他的意见,否决了放弃四镇的建议。这对于唐朝保持对西域的控制,保障西北边防的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韦嗣立论立国资于储蓄

题引：韦嗣立，字延构，郑州阳武（今河南原阳）人。唐中宗景龙年间任兵部尚书，时中宗崇饰寺观，又滥食封邑者众，国用虚竭，韦嗣立上疏进行劝谏。本篇选自《旧唐书·韦嗣立传》。

【原文】

臣闻国无九年之储，家无三年之蓄，家非其家，国非其国。故知立国立家，皆资于储蓄矣。夫水旱之灾，关之阴阳运数，非人智力所能及也。尧遭大水，汤遭大旱，则知仁圣之君所不能免，当此时不至于困弊者，积也。今陛下仓库之内，比稍空竭，寻常用度^①，不支一年。倘有水旱，人须赈给，征发时动，兵要资^②装，则将何以备之？其缘仓库不实，妨于政化者，触类而是。

臣窃见比^③者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竞崇瑰丽。大则费耗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已上。转运木石，人牛不停，废人功，害农务，事既非急，时多怨咨。故《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诚哉此言，非虚谈也。且玄旨^④秘妙，归于空寂^⑤，苟非修心定慧^⑥，诸法皆涉有为^⑦。至如土木雕刻等功，唯是殚竭人力，但学相夸壮丽，岂关降伏身心^⑧。且凡所兴功，皆须掘凿，蜚虫在土，种类实多。每日杀伤，动盈万计，连年如此，损害可知。圣人慈悲为心，岂有须行

① 用度：费用、开支。

② 资：资财，此处引申为费用。

③ 比：近来。

④ 玄旨：深奥的道理。

⑤ 空寂：佛教用语，即“一切皆空”之理。这里指空洞枯寂。

⑥ 定慧：禅定感悟。

⑦ 有为：对无为的违背。无为是佛家推崇的一种境界，指无因缘做作，无生住异灭四相，与“空”的意义相近。

⑧ 降伏身心：佛教语，意即降伏内心的各种魔障。



此事,不然之理,皎^①在目前。世俗众僧,未通其旨,不虑府库空竭,不思圣人忧劳,谓广树福田^②,即是增修法教^③。倘水旱为灾,人至饥馁,夷狄作梗,兵无资粮,陛下虽有龙象如云^④,伽蓝概日^⑤,岂能裨万分之一,救元元^⑥之苦哉!于道法既有乖,在生人极为损,陛下岂可不深思之!

臣窃见食封^⑦之家,其数甚众,昨略问户部,云用六十余万丁^⑧,一丁两匹,即是一百二十万已上。臣顷^⑨在太府^⑩,知每年庸调^⑪绢数,多不过百万,少则七八十万已来,比诸封家,所入全少。倘有虫霜旱涝,曾不半在,国家支供,何以取给?臣闻自封茅土,裂山河^⑫,皆须业著经纶^⑬,功申草昧^⑭,然后配宗庙之享,承带砺之恩。皇运之初,功臣共定天下,当时食封才上三二十家,今以寻常特恩,遂至百家已上。国家租赋,太半私门,私门则资用有余,国家则支计不足。有余则或致奢侈,不足则坐致忧危,制国之方,岂谓为得?封户之物,诸家自征,或是官典^⑮,或是奴仆,多挟势骋威,凌突^⑯州县。凡是封户,不胜侵扰,或输物多索裹头,或相知要取中物,百姓怨叹,远近共知。复有因将货易,转更生衅,征打纷纷,曾不宁息,贫乏百姓,何以克堪!若必限丁物

① 皎:明。

② 福田:佛教认为积善行可得福地,犹如播种田地而获其实,谓之种福田。

③ 法教:佛法的教化。

④ 龙象如云:僧人众多。龙象,佛家语,指罗汉像,多用来比喻高僧。

⑤ 伽蓝概日:佛寺宏伟。伽蓝,指佛寺。概日,遮蔽日光,比喻寺庙极多。

⑥ 元元:众生、百姓。

⑦ 封:皇帝授予臣下的土地或封号。

⑧ 丁:成年男子。

⑨ 顷:近来,不久前。

⑩ 太府:即太府寺,唐置为中央事务机构九寺之一,掌管国家财货、贸易、关市事务,政令仰承户部。

⑪ 庸调:隋唐时期赋税徭役制度。规定成丁每年服役20天,若不服役则每日须纳绢数尺,谓之“庸”。每岁纳一定数量的绢布麻等物,非蚕乡则以输银伐替,谓之“调”。后行两税法,租庸调制遂止。

⑫ 裂山河:裂土分封诸侯。

⑬ 经纶:筹画治理的才能。本义指整理过的蚕丝。

⑭ 草昧:草创肇建之时。

⑮ 官典:官府主管。典,主管。

⑯ 凌突:欺凌冒犯。



送太府，封家但于左藏请受，不得辄自征催，则必免侵扰，人冀苏息^①。

【译文】

我听说国家没有九年的储蓄，家庭没有三年的积蓄，家不成其为家，国不成其为国。因此明白立国立家，都依靠储蓄。水旱的灾害，与阴阳的运数有关，不是人的智慧和力量所能控制的。尧时遭受严重的洪水，汤时遭受严重的干旱，就知道仁慈圣明的君主不能免灾，当时没有到穷困破坏的地步，靠的就是积蓄。如今陛下仓库当中，差不多快空了，平常的花费开支，不够一年使用。如果有水旱之灾，百姓需要救济，一时征发军队，士兵需要费用装备，将用什么来筹备呢？那些因为仓库不充实，妨碍政治教化的事情，比比皆是。

我私下看见近来营造寺庙和道观，数量非常多，都努力建得雄伟高大，争着建得奇瑰华丽。大的费用消耗百十万，小的也要用三五万以上，粗略估计总共使用的财物，动不动就千万以上。转运木材石料，人牛不停，浪费人功，妨害农业生产，这些事情既不是急迫的，时人多有怨言。所以《尚书》说：“不作无益的事而损害有益的事，事情才能成功。不珍贵奇异的东西而轻视实用的东西，人民才会富足。”这话说得实在好，不是虚话空谈。况且佛教玄妙之理神秘而微妙，最终归结为空虚寂静，如果不是修身养性、禅定感悟，诸多事物都涉及到人为做作。至于像土木雕刻等事情，只是耗尽人力，一味学着相互炫耀壮丽，和消除内心的魔障有什么关系。况且大凡营建寺观，都需要掘土凿沟，蛰伏在土里的豸虫，种类非常多，每天杀伤，动不动就以万计了，连年这样，损害可想而知。圣人以慈悲为怀，哪里能做这种不应该的事，道理明白地摆在眼前。世俗的众多僧人，没有通达这个道理，不担心府库空竭，不考虑圣上忧劳，称大量种植福田，就是增修佛家教化。如果发生水旱之灾，百姓饥寒，夷狄作乱，军队没有资粮，陛下即使有众多的僧人，宏伟的寺庙，岂能对事态有万分之一的帮助，来拯救百姓的苦难？这既违背了道法，对人民又损害极大，陛下怎能不好好地考虑这事呢！

我私下看见食封的人家，数量很多，昨天简略地问了一下户部，说是用丁六十多万，按一丁两匹绢计算，就是一百二十万匹以上。我不久前在太府，知道每年征收的庸调绢数，多时不过百万，少时七八十万，和那些食封之家相比，收入都少。如果发生虫霜旱涝灾害，还不到一半，国家的支出供给，用什

① 苏息：恢复增长，休养生息。

么获取供给？我听说从自立王侯爵位，裂土分封诸侯之时起，都必须有筹画治理天下的业绩，有开创缔造国家的功勋，这样死后才配入宗庙享受后人祭祀，世代承袭爵禄的恩典。皇朝建立之初，功臣与君主一起平定天下，当时享有封邑的才二三十家，如今凭着平常功劳和特别恩典，就增加到百家以上。国家的赋税收入，大半归于私家，私家财物有余，国家却支计不够用。有余就可能导致奢侈，不够用就可能导致忧患危险，治国的方法，哪能说是得法呢？封户的东西，由各家自己征收，有的是官府典吏，有的是私家奴仆，大多利用权势乱发威风，欺凌冒犯州县百姓。大凡被划入封邑的封户都无法忍受侵夺骚扰，或是运输物品时大量索要钱财，或是管事的从中夺取财物，百姓哀怨叹息，远近皆知。又有乘机倒卖，转而更生灾祸，苛征责打纷纷不断，没有安定平息的时候，贫困的百姓，哪里能承受！如果规定租赋送到太府，食封之家只许在左藏库领取，不得擅自催交征收，就一定能免去侵夺骚扰，百姓可望获得休养生息。

【评析】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封建社会，农业是当时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小农经济是主要的经济形态。小农经济的特点是易受天灾、人祸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由于古代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水、旱等“天灾”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极大，农民基本是“靠天吃饭”；而政治腐败、战争动乱等人祸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又甚于前者。封建制度下的农民处于社会底层，他们承受着种种徭役赋税的沉重负担，常常处于濒临破产的境地。一旦遇上自然灾害，便会衣食无着，流离失所，甚至铤而走险，聚众起义。因此，平时积贮粮食，以备灾荒，对于国家安全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正如汉代贾谊所说：“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①

神龙元年(705年)，武则天退位并取消“大周”国号，宰相张柬之联合禁军将领李多祚拥戴中宗李显复位，复唐国号。但是，唐中宗并未能中兴唐室，反而恣情奢侈，朝政被皇后韦氏、安乐公主、上官婕妤和武三思操纵把持，这些人竞相修建豪宅，比富斗丽。安乐公主曾想独占昆明池，未被允许，便霸占大量农田，开凿定昆池，意思是胜过昆明池。时人称它绵延数里，垒起的石头

^① 《汉书·食货志》。



像华山一般高,引来的河水宛如天河。统治者这种奢侈的生活耗尽了国库,浪费了大量民力,妨碍了农业生产。更有甚者,以中宗为首的统治集团为了满足自己的奢华生活竟公开纳贿卖官,纳钱 30 万,就可以被御赐官衔,一年的选官竟达数万。享受封户的贵族也肆意征索租调,遇到水旱灾荒,他们还阻挠政府减免租税,活不下去的封户只能背井离乡,流散四方。

韦嗣立在此疏中针对当时国库空虚的现状,提出“立国立家,皆资于储蓄”的主张。文中尖锐地指出了当时存在的两大社会问题:一是唐中宗、韦皇后和其他帝室权贵竞尚奢靡,大兴佛寺,导致国库空虚,民不堪命;另一社会问题,是当时食封的勋臣家数既多,所食的户数又多,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和危害,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损失。同年,韦嗣立又上《谏滥官疏》,针对当时滥官充溢、府库虚竭的严重情况,再次指出,取士冗滥,所用非人,徒竭府库,实为国家之大害。

韦嗣立强调“立国立家资于储蓄”,与汉代贾谊“积贮者,天下之大命”的思想一脉相承,代表了中国古代对粮食安全与国家安全关系的认识和重视。



李泌《对肃宗破贼疏》

题引：李泌(722~789年)，字长源，京兆(治今陕西西安)人，历仕唐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官至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邕县侯。至德元年(756年)，唐肃宗向李泌咨询平定安史之乱的方略，李泌就此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本篇选自《新唐书·李泌传》。

【原文】

贼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阳^①，有苟得心，渠^②能定中国^③邪？华人为之用者，独周挚^④、高尚^⑤等数人，余皆胁制偷合^⑥，至天下大计，非所知也。不出二年，无寇矣，陛下无欲速。夫王者之师，当务万全，图久安，使无后害。今诏李光弼^⑦守太原，出井陘，郭子仪^⑧取冯翊^⑨，入河东，则史思明^⑩、张忠志^⑪不

① 范阳：治今北京城南。

② 渠(ju，音拒)：通“诘”，难道。

③ 中国：指中原。

④ 周挚：安史叛将。助安禄山反唐，后为史思明相。

⑤ 高尚：唐幽州雍奴(今天津武清西北)人，本名不危。曾随助安禄山反叛唐朝。

⑥ 胁制偷合：因被胁迫、强制而苟且迎合的。

⑦ 李光弼(708~764年)：唐代名将。营州柳城(今辽宁辽阳)人。参与平定安史之乱，官至河南诸道副元帅，封临淮郡王。

⑧ 郭子仪(697~781年)：唐代名将。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平定安史之乱的首要功臣，累官至中书令，封汾阳郡王。

⑨ 冯翊：治所在今陕西大荔。

⑩ 史思明(703~761年)：初为安禄山部将，助其反唐。后自立为大燕皇帝，不久为其子史朝义所杀。

⑪ 张忠志：即李宝臣，奚人。随安禄山反叛，后降唐，唐肃宗赐名李宝臣。



敢离范阳、常山^①，安守忠、田乾真^②不敢离长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将也。随禄山^③者，独阿史那承庆^④耳。使子仪毋取华^⑤，令贼得通关中，则北守范阳，西救长安，奔命数千里，其精卒劲骑，不逾年而弊。我常以逸待劳，来避其锋，去翦其疲，以所征之兵会扶风^⑥，与太原、朔方军互击之。徐命建宁王^⑦为范阳节度大使，北并塞与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阳。贼失巢窟，当死河南诸将手。”帝然之，会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长安，曰：“今战必胜，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阳乎？”泌曰：“必得两京^⑧，则贼再强，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碛西突骑^⑨、西北诸戎耳。若先取京师，期必在春，关东早热，马且病，士皆思归，不可以战。贼得休士养徒，必复来南。此危道也。”帝不听。

【译文】

（安史）叛军将掠夺的财物、妇女，全部送到范阳，有苟且求生之心，哪里能底定中原呢？汉人为贼党所用的，只有周挚、高尚等数人，其余都是被胁迫、强制而苟且迎合的，至于天下大计，自然不是他们所能知道的。不出两年，贼寇就会被消灭，陛下不要追求速战速决。帝王的军队，应当做万无一失的事，谋取国家的长期安定，使国家没有后患。现在命令李光弼坚守太原，相机领兵出井陘，郭子仪夺取冯翊，进入河东，那么，贼将史思明、张忠志就不敢离开范阳、常山，安守忠、田乾真就不敢离开长安，这是用范阳、常山、长安三个地方来约束掣肘贼寇四员骁将的行动。这样，跟随安禄山的骁将，就只剩下一个阿史那承庆了。让郭子仪不要夺取华阴，使贼寇到达关中的道路得以畅通，如此，贼寇就必须北守范阳，西救长安，在往来数千里的战线上奔走救

- ① 常山：今河北正定。
- ② 安守忠、田乾真：二人皆为安史叛军的重要将领。
- ③ 禄山：即安禄山。
- ④ 阿史那承庆：唐时西突厥将领。
- ⑤ 华：即华阴（今属陕西）。
- ⑥ 扶风：今陕西凤翔。
- ⑦ 建宁王：指唐肃宗第三子李倓。
- ⑧ 两京：指东京洛阳与西京长安。
- ⑨ 碛西突骑：大漠以西能冲锋陷阵的骑兵。



援不暇,它的精锐步卒、骑兵,不超过一年必将疲惫不堪。我军常以逸待劳,敌人来攻,我避开它的锋芒,敌人退了,我出兵消灭其疲劳之卒。又,可以让郭子仪率所征之兵集结于扶风,与太原、朔方的唐军轮替出击敌人。过些时候再任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使,领兵北傍边塞,与李光弼的军队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从而夺取范阳。贼寇失去巢穴,当死于我河南诸将之手。”皇帝(肃宗)赞同他的意见。此时,正好西面的军队都到凤翔集结了,皇帝又打算迅速收复长安,说“现在战必胜,攻必取,哪有时间走数千里去先夺取范阳呢?”李泌反驳说:“如果一定先要收复长安、洛阳,那么,贼寇就会再次强大,我军就会再次处于困境。况且我们所依靠的,是大漠以西能冲锋突阵的骑兵和西北诸族的军队。如果先夺取京师,时间必定在春天,而关东天气转热较早,马匹容易得病,且士兵又都思归故乡,不可长期作战。而贼寇退回范阳巢穴,则能让士卒得到休整,然后必定会再次南犯。所以,这样做走的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呀!”皇帝没有听取他的意见。

【评析】

从中国历史上看,汉、唐、清三个王朝的前期都发生过叛乱,汉代有“七国之乱”,唐代有“安史之乱”,清代有“三藩之乱”。“七国之乱”和“三藩之乱”都很快平定,并未阻挡王朝走向兴盛的进程;而“安史之乱”爆发后,却拖延8年之久,直接导致了唐朝由兴盛走向衰亡。究其原因,唐廷在平叛方略上的失误,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至德元年(756年),唐肃宗向李泌咨询平定安史之乱的方略,李泌明确指出:“夫王者之师,当务万全,图久安,使无后害”,告诫肃宗不要追求马上就能解决问题。他从敌我双方的态势出发,提出了唐军平定安史之乱的战略方针,规划了具体的战略步骤。其战略方针,总的说就是化被动为主动,逐渐收拾残局,翦灭安史叛军,再造国家统一。其基本思路是,从战略全局出发,不计较一城一地的暂时得失,不以迅速收复两京(长安、洛阳)为主要目的,而是等待从根本上削弱叛军势力后,再水到渠成地光复两京,重新建立唐王朝对全国的统治。

应该说,李泌的战略谋划是合乎当时的战略形势的,也是唐王朝彻底平息叛乱,再造统一的惟一正确途径。因为,安禄山在边陲经营长达十余年之久,已经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和地位。他的军队规模庞大,兵员多是从少数民族地区招募的,这些人缺乏府兵制下农民出身的士兵的忠君思想,多



是为了私利才纠集于安禄山叛乱的旗帜之下,而且久经战阵,战斗力极强。安禄山叛乱前深得唐玄宗的信任,早以防边为借口直接控制了西北的一些主要军马基地,能获得骑兵马匹的充足供应。另外,安禄山因长期兼任河北道采访使这一重要职务,左右了当地官员的任命。这样,当其反叛朝廷时,已建立了一支庞大的训练有素的忠于他个人的军队和文官系统,而且还拥有一个相对稳定而富裕的战略后方。安禄山的战略是,对唐朝进行决定性的打击,核心是立刻占领唐朝的政治中心地区洛阳和长安,使朝廷威信扫地,并尽快建立自己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平叛斗争,的确不能与敌人作正面的争夺战,而只有采取“以迂为直”、逐次推进的策略,以疲惫和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战略重点,循序渐进,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通过较长时间的反复争夺,努力改变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尔后再进行战略决战,彻底平定叛乱,恢复统一。

根据这一战略方针,李泌规划了具体的战略步骤。这就是平叛战争要分三步走:其一,针对安史叛军骤然取胜,占据中原广大地区后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情况,将计就计,在唐朝广大的腹心地带与敌周旋,逐渐消耗叛军实力;同时把军事行动的重点放在对敌后方基地的破袭上,从根本上削弱叛军。其中首要的措施应是以郭子仪、李光弼两支唐军战略机动部队作灵活出击,将叛军四员骁将所率领的叛军主力牢牢牵制住,调动其长途奔波,使其无暇休整,既消耗其战斗力和兵力,又摧毁其战斗意志。这样就使叛军拖泥带水,首尾不能兼顾,陷入长达几千里的战场上不能自拔,完全丧失主动。其二,命建宁王统率部队越经塞外,从北面进攻安史叛军的巢穴——范阳;命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从南面进攻范阳。两军互为犄角,夹击叛军,覆其巢穴。这样一来,既能从心理上严重打击叛军的意志,又能在军事上从侧后和两翼形成对叛军的包围,切断叛军的归路。一旦这一目标达成,势必造成叛军内部的混乱,唐军则可乘隙蹈虚,将叛军的指挥系统一举摧毁,为最终平定叛乱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其三,在以上两个战略步骤取得完全成功的前提下,再以大军四面攻击,合围并收复两京,彻底平定叛乱,实现国家的重新统一。

令人遗憾的是,李泌的建策并未为最高决策者唐肃宗所认同和采纳。唐肃宗急于收复两京,不顾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坚持让唐军主动地在腹心地区发动正面进攻,致使朔方、河西、陇右三大战区的精锐部队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严重影响了平叛的进程和唐朝的中兴大业。这恰恰从反面证明了李泌提出的“夫王者之师,当务万全,图久安,使无后害”思想的正确。



陆贽论居重驭轻

题引：陆贽(754~805年)，字敬輿，嘉兴(今属浙江)人，历官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建中四年(783年)，陆贽总结安史之乱的教训，向唐德宗阐述了居重驭轻、加强皇权的思想主张。本篇选自《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一《论关中事宜状》(参见《全唐文》卷四六七)。

【原文】

臣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闻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则大小适称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于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于指故也。王畿^①者，四方之本也，京邑^②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势当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则不悖，处则不危，斯乃居重驭轻，天子之大权也。非独为御诸夏而已，抑又有镇抚戎狄之术焉。是以前代之制，转天下租税，委之京师；徙郡县豪杰，处之陵邑^③；选四方壮勇，实之边城。其赋役，则轻近而重远也；其惠化，则悦近以来远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业，万方底乂^④，犹务戎备，不忘虑危，列置府兵，分隶禁卫。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

承平渐久，武备浸微^⑤，虽府卫^⑥具存，而卒乘^⑦罕习，故禄山窃倒持之

① 王畿：国都四周的地区。

② 京邑：指国都。

③ 陵邑：帝王陵墓的所在地。

④ 底乂：平定。

⑤ 浸微：逐渐衰弱。微，衰败、衰弱。

⑥ 府卫：指冲府与卫士。

⑦ 卒乘(sheng, 音剩)：士兵与战车。泛指军队。乘，指战车。《左传·隐公元年》：“缮甲兵，具卒乘”，杜预注：“步曰卒，车曰乘。”



柄,乘外重之资,一举滔天,两京不守。尚赖经制^①,颇存典刑^②,强本之意则忘,缘边之备犹在。加以诸牧有马,每州有粮,故肃宗得以为资,中复兴运。乾元^③之后,大憝^④初夷,继有外虞,悉师东讨,边备既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虚,深入为寇。故先皇帝^⑤莫与为御,避之东游。是皆失居重驭轻之权,忘深根固抵之虑。内寇则崤、函^⑥失险,外侵则汧、渭^⑦为戎。于斯之时,朝市^⑧离析,事变可虑,须臾^⑨万端,虽有四方之师,宁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岂不为之寒心哉!

【译文】

我听说国家的建立,根本强大而枝末弱小,所以能够巩固。又听说治理天下,就好像身体使用手臂,手臂使用手指,大小适合相称就不会相违。身体之所以能使用手臂,是因为身体大于手臂的缘故;手臂之所以能使用手指,是因为手臂大于手指的缘故。王畿是四方的根本,国都又是王畿的根本。它们的形势应当让国都如身体,王畿如手臂,四方如手指,使用起来就不会相违背,处理起来就没有危险,这就是居重驭轻,天子的重大权柄。不只是为了控制中原各族,也是镇守安抚周边部族的手段。因此前代的制度,转运天下的租税,输送到京城;迁移地方的豪杰,安置在皇帝陵寝附近的地区;选拔各地的壮勇之士,充实到边镇。其赋役征调,是近处轻,远处重;其德惠教化,是让近者悦服,远者来归。太宗文皇帝既定国家大业,天下各地太平安宁,又致力于加强战备,不忘居安思危,分道设置府兵,分别隶属禁卫与卫府。总共有兵府八百多所,而在关中地区的差不多有五百所。全天下的府兵抵不上关中,战略布局上居重驭轻的用意十分明显。

① 经制:常规的制度。

② 典刑:前代的法令制度。

③ 乾元:唐肃宗年号(758~760年)。

④ 大憝(duì,音队):最大的奸恶;极为人所怨恨。这里指安禄山、史思明及所发动的叛乱。

⑤ 先皇帝:指唐代宗。

⑥ 崤、函:崤山和函谷关。

⑦ 汧、渭:汧水和渭水。

⑧ 朝市:朝廷和市井,此处全国上下。

⑨ 须臾:一会儿、片刻。



可是,承平时时间逐渐久了,战备逐渐衰败,虽然兵府卫士都在,但军队很少训练,所以安禄山窃取了倒悬的权柄,以外部(边镇)之重为凭借,一举掀起滔天之祸,致使两京无法守卫。所幸的是尚能依赖治国的制度,保存前代的刑法律令,虽然强根固本的用意忘了,但沿边的武备还在。再加上各牧都有马匹,每州都有粮食,所以肃宗能够以为凭借,中兴唐朝国运。乾元以后,安史之乱刚被平定,接着又起外部忧患,全军向东讨伐,边防的战备已经松懈,京师禁军戍卫也很空虚。吐蕃乘国内空虚之机,深入内地侵扰。所以先帝没有进行什么抵御,向东躲避。这都是因为失去居重驭轻的权柄,忘记巩固根本的谋虑。内部的寇乱导致失去崤、函之险,外部的侵扰让汧、渭之地落入戎族之手。在这时候,全国上下分崩离析,事态变化可想而知,瞬息万端,虽然有各地的军队,哪里能救得了突然发生的祸患呢?陛下回想起这些,怎么会不为此而感到寒心呢!

【评析】

国家军事布局从根本上说是从保障国家安全出发,对军队进行的配置和部署,是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军事部署,并把居重驭轻作为重要原则。通常地,在地方和边防都部署一定兵力的前提下,把主力精锐部队部署在京师附近,造成中央对地方的居重驭轻之势,从而保障京师的安全和政权的巩固,并藉以消除地方变乱和应付边防危机。

唐朝的衰落始于“安史之乱”,而“安史之乱”的根源就在于居重驭轻原则的破坏。在本篇中,陆贽在总结前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唐玄宗时期“外重内轻”,导致安史之乱的教训,说明了居重驭轻关系国家治乱安危的极端重要性。

唐初沿袭隋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军事区的方法。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将天下划分为10道,朝廷分道置兵,各道既有道管辖的地方军和戍边部队,又有中央直属的折冲府。部署兵力的基本原则是,以京畿和敌情严重地区为重点,分区置兵,形成“内重外轻”、中央军与地方军交叉配置、中央与地方协同防卫的国防体系。这是太宗时期统治稳固的重要原因之一。

唐玄宗时,均田法逐渐瓦解,府兵制也名存实亡,募兵制逐渐兴起,节度使权力越来越重,藩镇势力不断坐大,与此同时,中央武备却日益空虚。天宝元年(742年),边镇节度使增至10个,拥兵49万,仅安禄山掌握的兵力就达18万之多,而朝廷直接统辖的部队总共才有12万人。军事部署由原来的内



重外轻变而为内轻外重,居重驭轻的原则被破坏。另外,各道节度使都身兼数职,集军政财权于一身,久任一方,得以大力培植私党亲兵,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藩镇拥兵自重的态势。而藩镇割据成势,又进一步刺激了他们攫取更大权力的欲望和野心,以安禄山、史思明为首的武装叛乱——“安史之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杜佑也曾在《通典·兵典》序言中,反思了“安史之乱”的深刻教训。他称赞了汉代的做法:“重兵悉在京师,四边但设亭障;又移天下豪族,徙居三辅陵邑,以为强干弱枝之势也。或有四夷侵轶,则从中命将,发五营骑士,六郡良家”,将军都“因事立称,毕事则省”。又说,唐初时,有事命将“率兵御戎,戎平师还,并无久镇。其在边境,唯明烽燧,审斥候,立障塞,备不虞而已”,始终坚持居重驭轻的原则,“实安边之良策,为国家之永固”。随着唐中期外重内轻局面的形成,“王纲解纽,主权外分”,唐玄宗后期发生变乱,实在是“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他和陆贽一样,都深刻意识到了居重驭轻原则对于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但经“安史之乱”的沉重打击,唐朝已无力回天。由于无力根除安史余部,因此在招降安史余部后,不得不承认其原有势力范围,就地委以节度使之职。为了平定叛乱和抗击吐蕃、回纥,唐廷又在河洛、关陇等内地设置节度使,控制一方。以后唐廷试图“以藩镇制藩镇”,在南方也推行节度使之制。到唐宪宗时,全国十道中,共设节度使48个,形成了天下“皆分裂于方镇”的藩镇割据局面。唐王朝无可挽回地逐渐滑入衰落的深渊。



刘晏论漕运利病

题引：刘晏(? ~780年)，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菏泽西北)人，累官吏部尚书同平章事，领度支、铸钱、盐铁等使，以善理财著称。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刘晏受命整顿恢复漕运，他在给宰相元载的信中，就此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篇节选自《旧唐书·刘晏传》(参见《唐会要·转运盐铁总叙》)。

【原文】

然运之利病，各有四五焉，晏自尹京^①人为计相^②，共五年矣。京师三辅百姓，唯苦税亩伤多，若使江、湖米来每年三二十万，即顿减徭赋，歌舞皇泽，其利一也。东都残毁，百无一存。若米运流通，则饥人皆附，村落邑廛^③，从此滋多。受命之日，引海陵之仓^④以食巩、洛，是计之得者，其利二也。诸将有在边者，诸戎有侵败王略者，或闻三江、五湖^⑤，贡输红粒^⑥，云帆桂楫，输纳帝乡，《军志》曰：“先声后实，可以震耀夷夏。”其利三也。自古帝王之盛，皆云书同文，车同轨，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今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梯山^⑦，圣神辉光，渐近贞观、永徽之盛，其利四也。

所可疑者，函、陕^⑧凋残，东周^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

① 尹京：京兆尹，首都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

② 计相：唐代称拜相的管理财政之臣为计相。

③ 邑廛(chān, 音缠)：集镇。

④ 海陵之仓：海陵仓，为西汉初年吴王刘濞所建，在今江苏省泰县东面的海陵。

⑤ 三江五湖：指东南方的三条江与太湖流域一带的湖泊。

⑥ 红粒：指米。《文选·张协杂诗之十》：“尺烬重寻桂，红粒贵瑶琼。”刘良注：“红粒，米也。”

⑦ 航海梯山：渡过大海，攀越高山。指经历艰远的路程。

⑧ 函、陕：泛指今陕西一带。

⑨ 东周：此处指洛阳。



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①,萧条凄惨,兽游鬼哭。牛必羸角^②,輿必说輶^③,栈车^④挽漕,亦不易求。今于无人之境,兴此劳人之运,固难就矣,其病一也。河、汴^⑤有初,不修则毁淀,故每年正月发近县丁男,塞长茭^⑥,决沮淤,清明桃花已后,远水自然安流,阳侯、宓妃^⑦,不复太息。顷因寇难,总不掏拓^⑧,泽灭水,岸石崩,役夫需于沙^⑨,津吏旋于汔,千里洄上,罔^⑩水舟行,其病二也。东垣、底柱,滉池、二陵,北河运处五六百里,戍卒久绝,县吏空拳,夺攘奸宄,窟穴囊橐。夹河为藪^⑪,豺狼狺狺^⑫,舟行所经,寇亦能往,其病三也。东自淮阴,西临蒲坂^⑬,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军皆鼎司元侯^⑭,贱卒仪同青紫^⑮,每云食半菽^⑯,又云无挟纊^⑰,挽漕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单车使折简书所能制矣,其病四也。惟小子毕其虑奔走之,惟中书^⑱详其利病裁成之。

① 烟爨(cuan,音窜):烧火煮饭,亦指锅灶。

② 羸角:指牛很病弱。

③ 说輶:指车子很破旧。

④ 栈车:古代用竹木做成的车子。

⑤ 河、汴:黄河与汴渠。

⑥ 长茭:竹或苇制成的索。

⑦ 阳侯、宓妃:都指河神。阳侯,陵阳国侯。《淮南子》佚文:“阳侯,陵阳国侯也。其国近水,溺死于水,其神为大波。”宓妃,洛神。传说其为东帝伏羲之女,因渡洛水覆舟,死后便成洛神。

⑧ 掏拓:“掏”,意指挖掘;“拓”,意指拓展,二者连称,指浚通、修缮渠堰水道。

⑨ 需于沙:在沙滩上等待。《易经·需卦·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⑩ 罔:无,没有。

⑪ 藪:渊藪。

⑫ 狺狺(yin,音银):狗叫的声音。

⑬ 蒲坂:今山西永济。

⑭ 元侯:大国之君,一方诸侯。

⑮ 青紫:指高官显位。本义指卿大夫的服饰。《汉书·夏侯胜》:“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

⑯ 半菽:半菜半粮,指粗劣的饭食。

⑰ 挟纊(kuang,音况):披着丝绵衣。比喻受到抚慰后像披上绵衣一样温暖。《左传·宣公十二年》:“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纊。”

⑱ 中书:宰相的称谓,这里指元载。



【译文】

漕运的利与弊,各有四五条。我从京兆尹入朝任计相以来,已经有五年了。京师三辅的百姓,苦于田税太重,如果将江、湖一带的米每年运来二三十万石,就能立即减轻徭役赋税,百姓就会歌颂皇帝的恩泽,这是第一条利。东都洛阳残破,几乎什么东西也无遗留,如果米运流通,那么饥民都会归附,村庄集镇,从此增多。我受命任职的时候,转运海陵的仓粮来救济巩、洛地区,就是颇有成效的办法。这是第二条利。诸多在边塞的将领,侵犯扰乱王道的各戎夷,或许就会闻知三江、五湖,贡献大米,扬帆航运,输往京师,正如《军志》所说:“先树立声威然后使用武力,可以震慑显耀中原和周边四夷。”这是第三条利。自古帝王的兴盛,都说是书同文,车同轨,日月所照,无不顺服而供驱使。如今车船已通,商贾往来,百货云集,渡海越山,水陆繁忙,皇帝的恩泽光辉,就会逐渐接近贞观、永徽时的兴盛,这是第四条利。

有所疑虑的是,函、陕一带凋敝残破,洛阳地区尤为严重。过宜阳、熊耳,到武牢、成皋,五百里内,在编百姓只有千余户。不见房屋,也没有烟火,凄惨萧条,兽游鬼哭。牛都很疲弱,车都很破旧,漕运所需的栈车,也不容易找到。如今在无人之地,兴起这种劳民的运输,实在难以办到,这是第一条弊。黄河、汴水自从开通以来,河道不整修,就会毁坏淤沮,所以每年正月征发附近州县的成年男子,用竹苇填塞修补,疏通淤积,清明桃花开了以后,远水自然畅流,阳侯、宓妃两位河神,不再叹息。近来因为寇贼作乱,一直没有疏浚治理河道,淤积阻塞水流,岸石毁塌,役夫在泥沙中徘徊,津吏在泥泞中挣扎,千里逆流而上,如同无水行船,这是第二条弊。东垣、底柱、浞池、二陵、北河之间漕运五六百里,长期无人守护,地方官员手无寸铁。奸盗侵夺,处处窝藏盗匪。夹河集聚,豺狼嚎叫,行船所经过的地方,盗寇也能往来,这是第三条弊。东自淮阴,西临蒲坂,绵延三千里,军镇相望。中军主将都是掌握重权的一方王侯,小小士卒也都摆出高官大吏的威风,时时说只能吃个半饱,又说没有御寒的衣服,漕运所到之处,船一到就被他们扣留,这不是区区一位使者用一纸公文就能约束得了的,这是第四条弊。微臣竭尽思虑往来奔走,望中书您详察利弊加以裁决。

【评析】

漕运是中国古代北方政治重心区与江南经济重心区在空间上相分离的



格局下,从社会生产中分化出来的粮食运输系统。漕运问题虽然是一个经济问题,但关系着政治的稳固、国家的安危,因此成为一个备受统治者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

所谓江淮漕运,即从江苏扬州运粮至唐都长安的水上通道。具体路线是长江中下游各地粮食由长江运至扬州,再由扬州经运河至江苏淮安入淮河,由淮河转入汴水到河阴再转入黄河,入黄河后西上经三门(北入门、中神门、南鬼门)砥柱之险到达渭口,入渭水再输达最终目的地——长安。绵延数千里,水情复杂,水道时有淤塞,尤其是经过三门峡常常水激船翻,运输极为困难。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关中、河东(今山西地区)以及山东、河南广大地区饱受战争之害,人口减少2/3,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唐王朝在长安建立之初,所需粮食就有一部分征自江、淮地区。唐高祖、太宗期间,朝政节俭,冗员不多,中央政府机构及人员都比较精干。据《通典》记载,唐太宗统治时期,内外文武高级官吏仅600多人,每年漕运的粮食不过20万石。高宗、武则天时期,多次发动战争,中央政权机构日趋庞大,官吏人数激增,帝室生活亦越来越奢侈,所需粮食远非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所能供应,江、淮漕运粮食增到一百万斛,仍感入不敷出。中宗、睿宗时期,中央机构继续扩充庞大,冗员增多,造成国家巨额开支。唐玄宗即位时,常年漕运江、淮粮食已达一百万石以上。

“安史之乱”后,中国北部的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黄河流域数年凋敝不堪,满目苍凉。藩镇趁战乱之机、王朝衰落之时,独霸一方,拒向朝廷缴纳贡赋;而朝廷长期仰赖的东南之地,虽未经战火摧残,却因通往洛阳、长安的运河年久失修、战争破坏而难以通运。国家财政因此陷入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刘晏临危受命,负责整顿恢复漕运事宜。

刘晏长期担任转运使,对漕运的重要性深有体会。他在给宰相元载的信中说:“漕引潇湘、洞庭,万里几日,沦波挂席,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深刻揭示了漕运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他提出,从江、淮恢复漕运是“社稷之奇策”,他以事实为依据,着重分析了恢复漕运之“利”。这首先在于减轻京师三辅百姓的徭役和税赋。没有江、淮米粮供给,只有强令增加关中地区老百姓的徭赋,才能维持朝廷宫苑禁军、文武百官的需求。开通漕运,徭赋顿减,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关系到人心归附的问题,而由此也可以使残破凋零的农村得到恢复。此外,其着眼点还在于军事上巩固边疆,让夷邦蕃属看到漕运开通,贡输长安,而不敢轻举妄



动,显示朝廷的威慑作用。在更大的方面,通过漕运,舟车相通,必然带来商贾往来,百货交流,促进经济的发展,恢复唐太宗、高宗时期的盛世局面。

同时,刘晏也冷静地看到并客观分析了恢复漕运的困难。基于漕运对国家安危的极端重要性,他不辞辛劳,积极奔走,恳切陈词。史载,在刘晏的努力下,当时疏通了汴河,加固了黄河大堤,并调集一部分官军为漕卒,进行武装护送,紧急从湖南、湖北、广西调粮,由江船运至扬州,浮淮河,入汴水,过三门,进渭水,当年就从江、淮漕运了 40 万斛粮食输入关中。



王朴论攻取之道

题引：王朴(905~959年)，字文伯，东平(今属山东)人，五代后周时累官至枢密使、东京留守。显德二年(955年)，王朴向周世宗柴荣献《平边策》，提出先易后难、攻取天下的战略方针。本篇节选自《旧五代史·周书·王朴传》(参见《全唐文》卷八六〇)。

【原文】

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当今吴国^①，东至海，南至江，可挠^②之地二千里。从少备处先挠之，备东则挠西，备西则挠东，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间，可以知彼之虚实、众之强弱，攻虚击弱，则所向无前矣。勿大举，但以轻兵挠之。彼人怯，知我师入其地，必大发以来应，数大发则必民困而国竭，一不大发则我获其利，彼竭我利，则江北诸州，乃国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扬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难而平之也。如此，则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吴，则桂、广^③皆为内臣，岷、蜀^④可飞书而召之，如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矣。吴、蜀平，幽^⑤可望风而至。唯并^⑥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之，但亦不足以为边患，可为后图，候其便则一削以平之。

【译文】

攻取战胜的指导规律，是先从容易的地方着手进行。当今吴国东临大海，南抵大江，在它方圆二千里的土地上我们都可以进行攻扰。先去攻扰它

① 吴国：这里指五代十国中的南唐(937~975年)，为李昇取代杨氏吴国所建。

② 挠：攻扰。

③ 桂、广：指岭南，时属南汉。

④ 岷、蜀：指甘肃东南部及四川地区，时属后蜀。

⑤ 幽：指幽州(治今北京西南)，时为辽(契丹)所据。

⑥ 并：即并州(治今太原西南)，时属北汉。



疏于防备的地方,它加强东边的防备,我们就派军在它的西边进行攻扰,它加强西边的防备,我们就对其东边进行打击。吴国必定往返以救其薄弱环节而疲于奔命,这样在调动敌人东西奔走之间,我们就可以了解其防守部署的虚实、军队力量的强弱,从而可以攻虚击弱,使我军所向披靡。开始不要大举进攻,只派小股部队去袭扰。对方慌乱胆怯,知道我军进入其国境,就一定会征发大军来应战,三番五次征调大军之后必定会搞得国内百姓穷困国库空虚,假如哪次征调不起来大军应战,我们便从中得利,敌人力量衰竭而我军得利,那么江北各州,就归我朝所有了。得到江北以后,就可以用其百姓,充实振作我们的军力,长江以南的地方也就不难平定了。这样做,就可以用力小而收获大。夺取吴国后,那么桂、广一带地区都会归附成为臣属,岷、蜀可以下一纸诏书进行招抚,如果不归降,就四面同时进兵,以席卷之势就可以平定蜀国。吴、蜀平定了,幽州将会望风而降。只有并州的北汉是负隅顽抗的死敌,不能靠恩信去利诱,必须用重兵强攻。但它也不足以成为威胁边境的祸患,可留待日后去解决,等到时机有利就一举平定它。

【评析】

晚唐五代,干戈纷扰,战乱不休,至后周建国后,方才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周太祖郭威出身贫家,了解民间疾苦,他即位后,留心搜罗人才,政尚宽和,倡导节俭,革除弊政。雄才大略的周世宗柴荣继位后,拟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①。在太祖改革的基础上,一方面继续修明政治,一方面训练军队,开始进行统一战争,试图结束长期分裂的局面。当时后周面临的战略情势是:北面有辽和北汉,西南是后蜀,东南是南唐和吴越,南有南汉。要进行统一战争,该从何处入手,成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处身群雄逐鹿的乱世,欲平定天下而不能有一个正确的方略,到头来非但消灭不了别人,反而自取其亡。所以统一战略也是最大的安全战略。

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四月,周世宗命朝官二十多人各撰写《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各一篇,以试其才能,并期待从中发现良策以供参考。王朴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成《平边策》,献给周世宗。《平边策》的核心是提出了政治上厉行改革、军事上先易后难的战略方针。具体地说,政治上,厉行

^① 《旧五代史·周书·世宗纪》。



改革,刷新朝政,选能汰劣,以法治国,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国本,增强实力,从而在各方面做好战争的准备。军事上,在战略上先易后难,先南后北;战术上避实击虚,避强攻弱;在策略上分别对待,先诱以恩信,后制以强兵,逐一消灭各割据势力,实现天下统一。

王朴的主张基本符合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当时,天下四分五裂,后周、辽、北汉、后蜀、荆南、南唐、吴越、南汉等多个政权并立。以中原正统自居的后周,实际上处于辽、北汉、后蜀、南唐等政权的包围之中,这些政权实力有强弱,距离有远近,对后周的威胁程度也不一样。后周绝不可能四面出击,多线作战,而必须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王朴认为,在各割据势力中,北方的北汉依附于实力强劲的契丹辽国,先进攻北汉,可能导致与辽直接对抗,而南方的南唐和后蜀相对实力较弱。他提出先易后难、先南后北,就是先从南唐和后蜀下手。而在这两个割据政权中,王朴认为应以南唐为首先用兵的对象。因为后蜀远离中原,关山阻隔,交通不便,远征困难重重。历史上,后唐两征后蜀,一次得而复失,一次半途而废,前车之鉴,教训深刻。南唐是南方诸国中最强大的,又与后周为邻,经济富庶。先灭南唐,得其人力物力资源,可以增加后周的国力。同时,夺取南唐,对南北方其他各政权都可以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得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则燕地必望风内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①。周世宗对王朴的建言十分重视。后来他发动统一战争及至北宋最终平定各割据势力,基本上就是采取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方针。

在王朴之先,南唐李谷就提出过“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李谷认为,攻取天下应首先自江淮地区开始。在王朴之后,北宋宰相赵普与宋太祖赵匡胤“雪夜问对”中,再次提出“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后来宋太祖以此为指导,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可见,王朴关于“攻取之道,从易者始”的论述,代表了当时有识之士对统一战略的一种共识,它不仅成功地指导了后周至北宋的统一战争,而且揭示了一条重要的战略指导原则,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价值。

^① 《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二《后周纪三》世宗显德二年。

第六章 宋 元

以守则固，以战则胜，然后其和可保。
不务战守之计，惟信讲和之说，则国势益
卑，制命于敌，无以自立矣。

——宋·李纲《议国是》



概 述

宋元时期,自公元 960 年至公元 1368 年,历时 409 年。包括宋(960 ~ 1279 年)、元(1271 ~ 1368 年)两个朝代,期间还有辽、西夏、金等政权存在。

宋朝在五代末期的纷乱中建立,1127 年因金军入侵、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失陷而南迁,建都临安(今杭州),1279 年被元朝灭亡。史称 1127 年前的宋朝为北宋,1127 年后的宋朝为南宋。在中国历史上,宋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在经济、科技、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宋代既不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也不是一个强盛的王朝,后人往往用“积贫积弱”来概括它的时代特点。

“积弱”主要指宋代在国家安全上长期的虚弱态势,集中表现在与北方辽、西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对峙和较量中。无论是前期的辽、西夏,还是后期的金、元,宋在与它们的军事斗争中都是败多胜少,往往以岁币(定期向对方缴纳巨额的钱物)换和平,最终仍不免于战败而亡。

造成宋代积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统治集团日益昏庸腐败的大势之外,还有一些原因是需要重点指出的。一是“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的负面影响。为了巩固封建皇权,宋代统治者吸取五代战乱的教训,将重视文教、防范武将作为创制立法的基本原则,不但创立了以枢密院、三衙、率臣分权为特点的军事制度,而且逐渐形成了“以文制武”的军事统御制度。这种军事体制带来了明显的弊病:一方面,统兵文官大多不懂军事,难以正确指挥作战,而武将受到严重压制,无法充分施展才干;另一方面,分权导致“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严重影响到军队战斗力的形成和发挥。二是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带来了严重后果。宋太宗在两次伐辽失败以后,由积极进取转为“守内虚外”、消极防守。这一路线为宋代诸帝所禀承,直接导致了边防部署、军队训练、作战指导以及民心士气上的消极被动。

“积贫”主要指国家财政的长期困窘状况。宋人将“积贫”的原因总结为“三冗”,即“冗兵”、“冗官”、“冗费”。“冗兵”是指军队数量庞大而战斗力低下。仁宗庆历年间,军额一度高达 120 余万。为了维持军费开支,国家财政



不堪重负。“冗官”是“右文”政策的产物。随着科举取士规模的扩大,以及恩荫制度的泛滥,官僚集团急剧膨胀,给国家财政造成了又一沉重负担。“冗兵”、“冗官”之外,皇室的奢靡生活、大肆赏赐,以及向辽、金等缴纳的巨额岁币,都成为“冗费”的重要来源。为了维持庞大的财政开支,统治者只能增加对人民的盘剥,“三冗”问题又直接导致了阶级矛盾的激化,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国家安全上的危机,形成恶性循环。

当积贫积弱、军事危机和财政危机交相而至的时候,富国强兵就成为紧迫的时代课题。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宋代的臣僚们纷纷进言,分析形势,提出建策,其中不乏透彻、精辟的论断。范仲淹、王安石等一批务实的政治家则试图通过改革挽救时弊。他们领导的改革虽然部分地触及了社会矛盾的实质,也收到了一定成效,但终因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而告失败。南宋时期,在严峻的安全形势下,主战、主和争论不休,积弱、积贫现象越发严重,软弱无能的南宋朝廷最后在元军的强大攻势下灭亡。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政权。蒙古原为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一支游牧部族,长期处于分裂状态。13世纪初,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建立大蒙古国。在他的率领下,蒙古迅速向外扩张,先后灭掉了西夏和金。1260年,忽必烈称帝,1271年改国号大元,1279年灭南宋,最终建立起一个以大都(今北京)为政治中心的大一统政权。

元朝的统一结束了唐末以来长期的分裂局面,建立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其疆域为我国今天辽阔的版图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在客观上增进了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在征服汉地的过程中,蒙古军一开始实行野蛮的杀戮政策,还大量掳掠汉族民众,将他们变为农奴性质的“驱口”。这些做法不但使中原农业文明遭到严重破坏,也使蒙古军的入侵遭到越来越强烈的抵抗。随着对宋战争的不断深入,蒙古统治者逐渐意识到利用汉族传统统治方法的重要性,尤其是元朝的建立者忽必烈,他在一些汉族谋士的影响下,逐渐接受“汉法”,采取了一些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的措施。这对他夺取帝位、消灭南宋、安定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

元朝统一全国后,在外部始终没有严重的安全威胁,但内部一直潜伏着巨大的隐患。尽管部分采纳了汉法,民族矛盾仍然是元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蒙古统治集团的特殊利益,元统治者推行民族分化政策,将全国人民分为蒙古、色目(西域和西北各族)、汉人和南人(南宋遗民)四个等级,在任用



官吏、法律地位、科举等方面执行种种不平等的规定。处于最底层的广大汉族人民遭受着严酷的压迫,甚至连基本的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证。这就必然地激起人民的强烈不满,为元朝统治的不稳定埋下了祸根。

元代的阶级矛盾也很尖锐。蒙古统治集团从落后的游牧经济形态一跃成为汉族农业地区的统治者,其治国理念和实践都受到很大的局限。他们往往利用手中的权力,贪婪地掠夺财富,挥霍无度。从皇帝到各级官吏再到军队,整个国家机器迅速走向腐败,这构成了元代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同时也加剧了人民负担,导致了阶级矛盾的迅速激化。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异常尖锐使元代社会充满了危机。在整个元朝100余年的历史上,人民起义此起彼伏,几乎从未间断过。元顺帝时期,征发大量民工新开黄河河道的“开河”之役,以及元政府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变更钞法导致的金融混乱,成为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索,元朝最终在农民起义的风暴中覆亡。



宋太祖与赵普论息兵

题引：宋太祖(927~976年)，即赵匡胤，涿州(今属河北)人，原为后周禁军统领，后发动兵变，建立宋朝。赵普(921~991年)，北宋名臣，字则平，幽州蓟(今北京西南)人，累官至枢密使、中书门下平章事。宋朝建立之初，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之弊，赵普向宋太祖提出削夺藩镇之策。本篇选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参见《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卷一)。

【原文】

初，上既诛李筠^①及重进^②，一日，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③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勿复言，吾已喻矣。”

【译文】

起初，宋太祖在讨平李筠及李重进的叛乱之后，有一天，召来赵普问道：“天下自唐末以来，数十年之间，帝王换了八个姓氏，战斗不息，生民涂炭，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平息天下的战乱，谋求国家的长治久安，应该怎么做呢？”赵普回答说：“陛下能够谈到这个问题，实在是天地人神的福音。这种(混战局面)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方镇的权势过重，君弱臣强而已。现

① 李筠：宋昭义节度使。建隆元年(960年)四月，联结北汉反宋，宋太祖率军亲征，六月败死。

② 重进：即李重进，宋淮南节度使。建隆元年九月起兵叛宋，宋太祖亲征，十一月被讨平。

③ 方镇：又称藩镇，掌管一方兵权的军事长官，如晋持节都督，唐、五代节度使等。唐末以后，方镇往往控制数州至十余州，发展为地方割据势力。



在要解决这一问题,也没有什么奇巧的办法,只要逐渐剥夺方镇的权力,控制他们的钱粮财政,将他们的精兵收归朝廷,天下自然就安定了。”他的话还没说完,宋太祖就说:“你不必再说了,我已经明白了。”

【评析】

后周显德二年(960年),禁军高级将领赵匡胤乘周世宗去世、幼子甫立之机,在陈桥驿(今河南开封东北)发动兵变,夺得帝位,建立宋朝,是为宋太祖。

宋太祖刚刚即位,昭义节度使李筠、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就先后举兵反叛。虽然这两起叛乱都被迅速讨平,却在客观上加剧了宋太祖的危机感。自唐末以降,藩镇势力恶性膨胀,节度使总领地方军、政、财权,割据一方,互争雄长,最终导致了五代十国的混战局面。而他本人也正是倚仗了手中的兵权,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夺取了皇位。李筠、李重进的反叛只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一位像他一样有兵权、有野心的将领起而颠覆他的政权,因此,如何使赵氏王朝国祚长久,避免五代诸朝短寿的命运,便成了使宋太祖寝食难安的问题。他与赵普的这番对话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作为一位精通治道的封建官僚,赵普的分析可谓切中要害。他认识到五代十国乱况的根源在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铲除藩镇势力。他的建议深得宋太祖的赞同,并很快成为宋初施政的纲领。建隆二年(961年),赵匡胤先是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和平解除了石守信、高怀德等一批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对于地方藩镇,则渐次采取以文官知州、设置通判、转运使等方法将其政权、财权剥离出来,并选拔藩镇军中的精锐补充中央禁军,也就是赵普所说的“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最后,在开宝二年(969年),赵匡胤又通过“后苑之宴”剥夺了王彦超、郭从义等一批藩镇将领的兵权,使节度使最终成为武官的虚衔,结束了唐末五代藩镇坐大的历史。

为了彻底根除藩镇割据的弊害,宋廷还在削弱藩镇势力的同时,创制了一套以分权、制衡为原则的军事制度:在中央建立庞大的禁军,禁军的统兵之权分隶三衙,即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发兵权却掌握在由皇帝直接控制的枢密院手中。三衙与枢密院的相互制衡被认为是矫正藩镇之弊的成功举措,北宋名臣范祖禹即指出:“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



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也。”^①此外,为了防止武将与士兵、地方相交结,宋廷还实行“更戍法”,定期更换驻地,并在禁军出戍之时,打破原有编制,由部署、钤辖、都监等“率臣”统兵,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②。通过这些制度的创设,宋初基本形成了“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的军事制度,被时人尊为“万世不易之法”^③。

虽然宋代军制的创设不在赵普的建策之内,却是其“削藩”思想的必然发展,其出发点都是加强对兵权的控制,强干弱枝,巩固皇权。这一原则对于维护宋王朝的统治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至于被当作“祖宗家法”为宋历代帝王所恪守。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朝廷政策的导向,还是占主流地位的政治思想,都将武将作为防范、压制的对象,不但形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不正常现象,最终发展为“以文制武”的军事制度,而且在社会上形成了强烈的“重文轻武”之风,武人、武事备受贬抑。这种文武的失衡无疑对宋代军事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成为宋代在边防战争中屡战屡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明人陈邦瞻评价宋初“收兵权”之举说:“当时务强主势,矫枉过直,兵财尽聚京师,藩篱日削,故主势强而国势反弱矣,亦不可谓非其遗孽也。”^④

① 《范太史集》卷二六《论曹诵札子》。

② 《文献通考》卷一五二《兵考四》。

③ 《宋史·职官二》。关于宋代军制的具体情况及其利弊,参见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 《宋史纪事本末》卷二。



宋太祖与赵普雪夜问对

题引：宋太祖夺取帝位以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结束五代以来的割据局面，统一全国。赵普针对当时的战略形势，提出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方略，为宋太祖所采纳。本篇选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

【原文】

上自即位，数出微行^①，或过功臣之家，不可测。赵普每退朝，不敢脱衣冠。一夕，大雪，普谓上不复出矣。久之，闻扣门声，异甚，亟^②出，则上立雪中。普惶恐迎拜，上曰：“已约吾弟矣。”已而开封尹光义至，即普堂设重裯^③地坐，炽^④炭烧肉，普妻行酒^⑤，上以嫂呼之。普从容问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上曰：“吾睡不能著^⑥，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普曰：“陛下小天下^⑦耶？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愿闻成算^⑧所向。”上曰：“吾欲收太原。”普嘿^⑨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上问其故，普曰：“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边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彼弹丸黑子之地，将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正尔，姑试卿耳。”于是用师荆、湖，继取西川。

【译文】

宋太祖即位以后，多次微服出行，有时会到访功臣之家，时间谁也说不

① 微行：微服出行。指皇帝或官员穿着平民的服装出行。

② 亟：急忙，赶快。

③ 重裯：好几层垫子。裯(yin, 音因)，褥子、床垫。

④ 炽：燃烧。

⑤ 行酒：斟酒。

⑥ 著：同“着”。

⑦ 小天下：以天下为小。

⑧ 成算：考虑成熟的计划。

⑨ 嘿：同“默”。



定。因此,赵普每次退朝以后,都不敢脱下衣帽,以便随时迎驾。一天晚上,天降大雪,赵普认为皇帝不会再出来了。过了很久,听见敲门声,他很奇怪,急忙出来看,原来宋太祖正站在雪地里。赵普惶恐地上前迎拜。太祖说:“我已经约了我弟弟到你这里来。”过了一会儿,开封尹赵光义也到了。他们在赵普家的厅堂里铺设了几层床垫,席地而坐,烧炭烤肉。赵普的妻子出来斟酒,太祖亲切地叫她“嫂子”。赵普不慌不忙地问太祖:“现在长夜严寒,陛下下来我这儿有什么事吗?”太祖说:“我睡不着啊,我的一张床铺之外,全是别人的地盘,所以才来见你呀。”赵普说:“陛下觉得天下太小吗?南征北伐,统一天下,现在正是时候,您有什么打算呢?”太祖说:“我想先攻取太原。”赵普沉思许久,说:“这件事我就不知道啦。”太祖问他原因,他答道:“太原紧邻西北两方边境,假使能够一举攻下,那么我们也要独力承担边患,为什么不暂时留着它,等到平定了其他各国再说呢?到那时,北汉这样一个弹丸、黑痣一样的小国,又能逃到哪里去呢?”太祖听后笑道:“我的意见也正是这样,只是想试试你的想法罢了。”于是太祖用兵湖南、湖北的南平、武平,又继而攻取了西川后蜀地区。

【评析】

宋太祖建立宋朝以后,迅速平定了国内反叛势力,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但是,从军事斗争形势来看,宋王朝之外尚有7个割据政权,南有南平、武平、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北有建都太原的北汉。这就是宋太祖所说的“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然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①,如何消灭这些割据势力,完成统一大业,成为宋太祖苦心思虑的重点。

《雪夜问对》所讨论的就是统一战争战略方向的选择问题。在先取北汉,还是先攻南方诸国,也就是“先南后北”还是“先北后南”的问题上,在周世宗柴荣时即有讨论,当时著名文士王朴上《平边策》,指出“攻取之道,从易者始”,主张先消灭南方诸国,最后对北汉“以强兵攻之”^②。赵普的意见也秉承了同样的思路,在指导思想先易后难,在战略方向上先南后北(参见本书第五章王朴论攻取之道)。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六,开宝八年十一月己巳。

^② 《旧五代史·周书·王朴传》。



赵普的谈话虽然简短,却透露了两层主要意思,一是“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边患我独当之”。所谓的“边患”指的就是契丹。契丹在916年建国以后,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地域广阔、实力强大的游牧政权,其势力范围东起大兴安岭,西至河西地区,不但控制了室韦、党项、吐谷浑、回鹘等北方民族,而且多次进犯中原,对五代政权的更替施加了重要影响。后晋皇帝石敬瑭就是凭借契丹的支持登上帝位的。作为交换条件,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之地予契丹,并在名义上臣服契丹,成为屈辱的“儿皇帝”。沙陀贵族刘崇建立的北汉政权也向辽(契丹于947年建国号大辽)称臣,争得了辽的大力支持。在这种形势下,宋如果先进攻北汉,势必陷入与北汉及辽旷日持久的战争,战争的艰巨性将大大增加,且胜负未可预料。即便能够一举消灭北汉,也要直接面对辽的军事威胁,牵制其统一南方的行动。二是先平南方诸国较易,且有利于最终消灭北汉。与北汉相比,南方诸国的实力较弱,加之后周世宗以来的不断攻讨,宋对这些政权具有明显的战略优势,“先南”显然是易于成功的。另一方面,唐中期以后,南方经济的发展逐渐超过黄河流域,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平定南方可以增强宋的经济实力,为灭北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届时北上,北汉“弹圆黑子之地,将何所逃”?

宋太祖即位以后,曾多次就攻北汉之事与大臣讨论,赵普的意见最终促使他下定了决心。宋初统一战争的实践表明,赵普先南后北的战略谋划是十分正确的。建隆三年(962年),宋太祖以“假途灭虢”之计袭占南平、武平,进而相继消灭了后蜀、南汉、南唐,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吴越王钱俶纳土称臣,宋最终平定了南方诸国。在这一过程中,宋太祖在灭后蜀之后,曾两次对北汉发动进攻,但均遭失败,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赵普先南后北方略的正确性。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大举北伐,最终消灭了北汉政权。至此,中原以外的7个割据政权全部平定,“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也最终完成。

赵普的“先南后北”就是在战略筹划上统观全局,权衡利害,先易后难,化难为易,以最小的代价争取最大的胜利。这样一种战略思维是务实稳妥的,也是卓有成效的。



王禹偁论边防

题引:王禹偁(954~1001年),北宋文学家,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人,历任大理评事、左司谏、知制诰等职,以直言敢谏著称。针对宋太宗时的边防形势,王禹偁提出了自己的建策。本篇选自《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九《上太宗答诏论边事》(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

【原文】

臣伏以中国之病匈奴^①,其来久矣。故《书》云,“蛮夷猾夏,寇贼奸宄”^②,则五帝^③之所不免也。又《诗》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④,则三王^⑤之所为患也。爰^⑥自秦汉,降及隋唐,击伐通和,布在方册^⑦,皆陛下之所详览矣。臣今独引汉之文帝时事迹以为警戒,望陛下留意而览之,则天下幸甚。

盖以汉之十二帝,言乎圣明者文景也,言乎昏乱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

① 匈奴: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秦汉时期曾发展为势力强大的帝国,与中原发生多次战争。此处泛指北方部族。

② 蛮夷猾夏,寇贼奸宄:语出《尚书·舜典》,意为蛮夷等周边部族扰乱华夏,抢劫杀人,造成外患内乱。蛮夷,中国古代对周边部族的蔑称;猾,乱;寇,骚扰、侵犯;贼,杀人;奸宄(gui,音鬼),乱在外为奸,在内为宄。

③ 五帝:传说中中国上古时代的五位贤明君主,其说不一。一说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一说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一说为少昊、颛顼、高辛、尧、舜。

④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语出《诗经·小雅·六月》,意为征伐玁狁,到达太原地区。薄,句首语气词;玁(xian,音险)狁(yun,音允),我国古代北方的少数民族,也作“猃狁”、“荤粥”、“獯鬻”等;太原,也作“大原”,一说在山西太原境内,一说在宁夏固原一带。

⑤ 三王:古代的三个著名帝王,一般指夏禹、商汤、周文王。

⑥ 爰:句首语气词。

⑦ 方册:典籍。



时,军臣单于最为强盛,大有侵掠,候骑^①至雍^②,火照甘泉宫^③;哀平之时,呼韩耶单于每岁来朝,委质^④称臣,边烽罢警。此岂系乎历数^⑤,而不由于道德邪?臣以为不然矣。且汉文当单于强盛之时,而外能任人,内能修德,使不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当单于衰弱之际,外无良将,内无贤臣,而使之来朝者,系于时也。臣以为国家广大,不下汉朝,陛下圣明,岂减文帝?犬戎之强盛,未及军臣单于时。至如挠乱边土,触犯天威,岂有候骑至雍,而火照甘泉之患乎?在陛下外任其人,内修其德矣。……

臣以为圣人无名,神人无功,迹用不彰,品^⑥物自化。道德既丧,功名始生。五帝之时,犹能不伐;三代而下,多有自矜。讨蛮夷则重困生灵,得土地则空标史册。祸败之本,何莫由斯!方今万国骏奔,四方康乐,圣德被^⑦矣,神功著矣。唯兹北狄,未服中原。以臣思之,恐是宗庙之灵,天地之意,虑陛下骄于大宝^⑧,怠于万几^⑨,用广圣谟^⑩,以为警戒,陛下诚宜作备边之计,示忧民之心,不必轻用雄师,深入虏境,竭苍生之众力,矜青史之虚名。如此则天道顺,人心悦,年岁之间,可缓而图也。……

【译文】

我认为,匈奴为中国的祸患,由来已久。因此,《尚书》中说:“蛮夷扰乱华夏,抢劫杀人,造成外患内乱。”这是说,五帝时期就存在这种状况。《诗经》中又说:“征伐玁狁,至于太原。”这是说,三王也以北方部族为患。从秦汉开始,直到隋唐,与北方部族征伐、通和的各种事件在典籍中都有详细记载,这是陛下您所熟知的了。我现在仅以汉文帝时的事迹作为警戒,希望陛

① 候骑:负责巡逻侦察的骑兵。

② 雍:即雍县,今陕西凤翔南。

③ 甘泉宫:秦汉时期陆续建造,在陕西淳化县西北的甘泉山。

④ 质:留作保证的人或物。古代国家之间或是臣属国对宗主国,往往派王子或宗室子弟作为抵押,称为“质子”。

⑤ 历数:天道,也指朝代更替的次序。

⑥ 品:事物的种类。

⑦ 被:同“披”。

⑧ 大宝:帝位。

⑨ 万几:也称“万机”,指帝王日常纷繁的政务。

⑩ 谟(mo,音磨):计谋。



下能够留心阅读,那就是天下人的幸运了。

西汉的十二个帝王,要说圣明当属文帝和景帝,要说昏乱莫过哀帝和平帝,然而在文帝、景帝时期,匈奴军臣单于的势力最强大,入侵的探马甚至到了长安附近的雍县,烽火照到了甘泉宫;哀帝与平帝时期,匈奴呼韩耶单于每年都来朝贡,派遣人质,自称臣民,边疆的烽火不再有警报。难道说这只是由于时运的盛衰,而与君主的道德没有关系吗?我认为并非如此。汉文帝正当匈奴强盛之时,他在外能任用合适的人选,在内能修明德政,这一时期匈奴之所以没有造成严重的祸患,正是由于文帝的道德。哀帝和平帝正当匈奴衰弱之际,外无良将,内无贤臣,却能使呼韩耶单于来朝贡,这是由于时运的关系。我认为,国家领土辽阔,不下汉朝,陛下的圣明,难道比汉文帝差吗?北方部族也没有军臣单于时强盛。至于它们扰乱边境,触犯天威,难道有探马到雍县,烽火照甘泉宫那么严重吗?关键还在于陛下您能不能外任良将、内修德政。……

我认为,圣人的成功没有威名,没有功绩,没有明显的事迹,万物自然被改变。后世道德沦丧之后,才出现了功名。五帝时期,君主还能不居功;三代以后,多以功业自夸。讨伐蛮夷会使百姓受到严重困扰,即使得到土地也只是白白写在史书上,没有什么实际效益。祸败的根源,怎能不来源于这方面呢?现在万国来朝,四方康乐,皇帝的恩德有着广泛的影响,功业也很显著。只有北方的契丹,还没有臣服中原。按我的考虑,恐怕是宗庙的神灵,天地的意图,认为陛下登上帝位以后骄傲自满,对各种军国事务的处理有所松懈,因此用这件事来让您耗费思虑,作为警戒。陛下应该制定边防守备的大计,表示自己的忧民之心,不必轻易派出大军,深入敌境,竭尽百姓的人力物力,夸耀史书上的虚名。如果这样,就会使天道顺畅,人心欢悦,几年之内,可以逐渐解决这一问题。……

【评析】

宋灭掉北汉以后,契丹成为最重要的安全威胁,如何处理与契丹的战略关系也便成为北宋边防政策的一个重要议题。在统一天下的宏愿之下,宋初君臣很自然地选择了战争的方式。这是因为,后晋时割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原本是中原王朝的领土,如果不收复这一地区,就不能算做真正完成了国家的统一,而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诉诸战争,别无他途。进一步讲,借机削弱五代以来契丹对中原政权的相对优势,构建长期稳定的边防格局则是宋初统



治者更高一层的战略目标。

在这一思路的驱动下,宋太宗时期发动了两次对契丹的大规模战争。第一次是在太平兴国四年(978年),宋灭北汉后,宋太宗亲自率军进攻契丹,试图一鼓作气收复幽燕地区,结果大败于高粱河(今北京城西北)。第二次是在雍熙三年(986年),宋乘契丹国主耶律隆绪年幼,其母萧太后摄政之机,兵分三路,大举北伐。曹彬所率东路军大败于岐沟关(今河北涿州西南),中路、西路军也相继溃败。

两次北伐战争的失败使宋太宗的思想开始转变,朝臣之中的反战之声也日益高涨。如何调整对契丹的战略方针,成为关系国家政治、军事全局的首要问题。端拱二年(989年)初,宋太宗下诏,令文武群臣各陈备边御戎之策,掀起了一场对契丹政策的大讨论。文武群臣纷纷进言,提出各自的边防主张,王禹偁的这篇文章便是其中的一份重要奏疏。

北宋的边防问题与当时的边防形势、宋代的军事状况、经济实力等密切相关。王禹偁的这篇奏疏从总结历史上中原与北方部族的关系入手,提出了主观的“德”与客观的“时”交互作用的观点。也就是说,在北方部族势力强大之时,如果中原的君主“外任其人,内修其德”,也能够避免严重的边患,这是“德”的主导作用;如果在北方部族衰落之际,即便中原政治昏乱,也同样不会有大的边患,这是“时”的客观效应。参照这两种情形,当时的契丹族显然属于强盛时期,宋太宗的应对之策也应以西汉文帝、景帝为榜样,“外任其人、内修其德”。在这篇长文中,王禹偁对“外任其人”和“内修其德”各论述了五个方面,实质上是希望宋太宗对辽采取守势,把注意力放在内政上。

两次北伐之后,宋太宗的战略思想逐渐转为守内虚外,即以国内政治为关注的重点,在边防上由主动进攻转为消极防御,对契丹的入侵,采取“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的原则。应该说,宋太宗战略思想的这一转变与王禹偁等人的建策有很大关系。王禹偁“讨蛮夷则重困生灵,得土地则空标史册”的思想与现实军事斗争的失败相呼应,促成了宋太宗时“兴文教、抑武事”^①国策的最终形成。历史是复杂的,就宋初宋和辽的力量对比来看,宋太宗的对辽进攻是勉强的,转为防守有其必然性;但宋太宗转攻为守后,宋朝在军事上越来越消极,不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振兴武备,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王禹偁的这篇上奏,在正反两方面都起了作用。汉初文、景两帝,君臣形成共识,一方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太平兴国二年正月丙寅。



面对匈奴采取守势,一方面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增强武备,振兴实力,终使国运趋于昌盛,最终有效解决了安全问题。两相比较,其进取精神、战略思维和战略把握能力,有着截然的差别。



贾昌朝论削方镇兵权过甚

题引：贾昌朝(998~1065年)，字子明，真定获鹿(今河北鹿泉)人，历任国子监说书、崇政殿说书、参知政事、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庆历三年(1043年)，上书论边防，批评朝廷削兵权太重。本篇节选自《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三《上仁宗备边六事》(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八)。

【原文】

臣窃惟太祖初有天下，鉴唐末五代方镇武臣士兵牙校^①之盛，尽收其权。当时以为万世之利。及太宗所命将帅，率多攀附旧臣、亲姻贵胄，赏重于罚，威不逮恩，而犹仗神灵，稟成算，出师御寇，所向有功。自此已来，兵不复振。近岁恩幸^②子弟，饰厨传^③、沽名誉，不由勋效，坐取武爵者多矣。其志不过利转迁之速，俸赐之厚尔，御侮平患，何望于兹？然乘边鄙无事，尚得以自容，昨西羌之叛，骤择将领，鸠集士众，士不素练，固难指踪^④，将未得人，岂免屡易？以屡易之将，御不练之士，故战必致败。此削方镇兵权过甚之弊也。

【译文】

我认为，在太祖开国初期，鉴于唐末五代藩镇武臣、地方武装以及低级武官的势力之盛，彻底收夺了他们的军权。当时认为这样的举措是有利千秋万代的好事。到太宗时期，所任用的将帅大多为关系亲近的旧臣、有姻亲关系的贵族子弟，赏重于罚，恩大于威，尽管如此，仍然仗着祖宗神灵，稟受皇帝的

① 牙校：军队中的低级武官。

② 恩幸：君主宠幸的近臣。

③ 饰厨传：丰盛的饮食。厨传指驿站。厨，供应过客饮食；传(zhuan，音撰)，供应过客车马、住处。后以“饰厨传”指好的饮食住处。

④ 指踪：“发踪指示”的省略语，意为放出猎犬追逐野兽，比喻指挥作战。



既定方略,出师抵御敌人,取得了一些功绩。自此以后,国家的军事力量就一蹶不振了。近年以来,那些宠臣的子弟,生活奢华、沽名钓誉,不以功勋和业绩而无故获取武官爵位的已经很多了。他们的想法不过是贪图武官升迁迅速,俸赐优厚罢了。真正要抵御外侮、平定祸患,怎么能靠这些人呢?在边疆没有大的战事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勉强充数,近年西夏叛乱,紧急选择将领,聚集士兵,士兵未经平时训练,固然难以达到朝廷的期望,将领不得其人,怎能避免频繁更换?以频繁更换的将领率领训练不精的军队,因此战争每每失败。这就是宋初过分削夺方镇武臣兵权的弊端。

【评析】

北宋初年,为了矫正五代以来武将专权的弊病,采取了一系列“收兵权”以及分散、削弱武将兵权的措施(参见宋太祖与赵普论息兵),这些措施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抑制将权、加强君权的作用,以至于被认为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过分抑制武将兵权的种种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领群体素质的下降。为了牢固控制兵权,皇帝往往选用自己的亲信领兵。太祖时期,委以重任的将领还大多为五代宿将,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因此问题并不突出。从宋太宗时起,开始大量起用亲近随从掌握兵权,如柴禹锡、王显、傅潜、高琼等人,他们或者出任枢密院长官,或者成为禁军将帅,控制着军事领导体系的各个重要环节。这些人虽然受到太宗信任,升迁迅速,但以军事才能而论,大多能力平庸。这也就是贾昌朝在文中所说的“太宗所命将帅,率多攀附旧臣、亲姻贵胄,赏重于罚,威不逮恩,而犹仗神灵,稟成算,出师御寇,所向有功”的情况。真宗、仁宗时期,这种情况继续发展,皇帝的亲信成为军中的权贵阶层,功臣之后、恩幸子弟“不由勋效,坐取武爵”,将领群体的整体素质严重下降,以至于“兵不复振”。

二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为了防止将领与地方、士兵相交结而实行的更戍法虽然有效抑制了武将势力的恶性发展,但是,将领多临时任命、频繁调动,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①的局面,这就使得将领在战争中既不能顺畅地指挥部属,也无法准确地判断边防形势,大大影响了军队战斗力,也就是文中所说的“以屡易之将,御不练之士,故战必致败”的情况。

^① 《宋史·兵志二》。



三是将权不专。分散和削弱武将的权力是宋代创制立法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必然地导致了将领指挥权的分散,在地方统兵体系中,有部管、钤辖、都监、巡检等官职,互相钳制,每当谋议之时,往往各执己见,莫衷一是,或者“计之未成,事已先漏”,军事决策效率低下,执行也不得力。再有,为了控制将权,宋初各朝多实行“将从中御”之制,每遇战事,皇帝要事先授予阵图或者作战方略,这就大大限制了将领的临机指挥权,违背了“因敌而制胜”^①的基本作战规律。

除了制度上对武将权力的限制和削弱,还有思想观念上对武将的排斥和防范,两种因素相互影响,使得将领群体的积极性、能动性受到很大限制,对军事斗争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将领的兵权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疏于控制,就会导致将权对君权的背离,造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唐末、五代的历史教训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过分抑制将权,对于君主集权固然有利,但又违背了军事斗争的基本原则,会导致军队作战能力的下降。宋初的军事实践就验证了这一点。贾昌朝通过对宋初军事状况的分析,敏锐地意识到了“收兵权”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勇敢地提出了“削方镇兵权过甚”的观点,希望在控制将领兵权和提高将领素质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结合点,这一观点是有见地的。遗憾的是,虽然贾昌朝当时身为宰相,位高言重,但是,宋王朝从维护君主集权出发,未能采纳他的正确主张,走出“矫枉过正”的误区。

^① 《孙子兵法·虚实篇》。



蔡襄论强兵富国

题引：蔡襄(1012~1067年)，字君谟，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历任馆阁校勘、知谏院、知福州、三司使等职，为官刚直敢言，颇有政绩。治平元年(1064年)，蔡襄为三司使，屡次上书讨论富国强兵问题。本篇节选自《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一《上仁宗论兵九事》(参见《端明集》卷二十二《论兵十事》)。

【原文】

臣近上《国论要目》^①十二篇，以谓当今之急务，强兵为第一事，富国为第二事。欲修治道，自此而始。兵不强则国不富，国不富则民不安，是故始于强兵而终于安民，本末之论也。强兵之说如何？一曰消冗^②。谓兵不可以暴减，当有术以消之。二曰选择。谓老弱疾病不堪战阵之人即拣择而去之。三曰省兵。谓不应置兵处与置之过多者则省之。四曰训练。谓兵虽少壮而训练不得其术，与不教同。五曰立法。谓兵绝^③无统制^④，故不可用，用之则败。此五者备修，则兵少而精矣。兵少则财用饶，财用饶则国富矣。兵精，以战则胜，以守则固，而兵强矣。其说皆世人常论也，然而行之则为治道之始，不行则为天下大患。是世人之常论，乃当今之急务，臣故谓之第一事。

【译文】

最近，我曾经向您进呈了《国论要目》十二篇，认为当今最紧迫的事务，强兵为第一，富国为第二。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必须从这两点做起。军队不强

① 《国论要目》：蔡襄于宋英宗治平元年所上，内容为明理、择官、强兵、富国等军国大政。

② 冗：繁杂、多余。

③ 绝：极，非常。

④ 统制：统领、制约。



大,国家就不会富足,国家不富足,百姓就不会安居乐业。因此,治理国家从强兵开始,而以安民为最终目标,这是从本到末的顺序。强兵有哪些具体措施呢?一是消除冗兵。不能骤然大幅裁军,而应该采取一些稳妥有效的方法。二是选择精兵。对那些老弱不能战斗的士兵应该予以淘汰。三是节省兵力。对那些不应驻兵或者驻兵过多的地区要加以减省。四是加强训练。即使士兵都是少壮的年轻人,训练不得法,也与不训练没有差别。五是树立法纪。现在的军队非常缺乏法令制约,因此不可用,一旦用兵,就会失败。如果这五个方面都能得以实施,军队就会少而精。军队少了,国家的财政就会宽裕,国家财政宽裕了,国家也就富足了。军队精了,用以战斗就会取胜,用以守卫就会坚固,军队也就强大了。这些说法听起来都是世人的平常之论,但是,如果认真施行就是治理国家的开端,如果不施行就会导致大的祸患。这就是说,世人的平常之论,正是当今最紧迫的事务,因此,我把它列为第一事。

【评析】

北宋建国以后,军队数量逐渐增加。按照《宋史·兵志》的记载,宋太祖开宝年间的兵额总数为三十七万八千,太宗至道年间为六十六万六千,真宗天禧年间为九十一万二千,庆历年间则达到了一百二十五万九千,英宗治平年间则为一百一十六万二千。从开宝到治平近百年的时间里,宋代的军队数量增加了3倍。

军队数量的增加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仁宗时期宋夏战争的影响。从宝元元年(1038年)开始,宋廷大量扩军,共增加兵额“约四十二万余人”^①。其二是朝廷完善中央和地方防备体系的需要。真宗时期的增兵主要出于这一原因。其三是招募饥民充军政策的影响。为了防止饥民叛乱,宋廷往往招募饥民充军,如皇祐年间,河北安抚使富弼就从流入东京的三十万灾民中招募了九个指挥的兵力。虽然在澶渊之盟以及宋夏战争结束后,朝廷曾经削减兵力,但是困难重重,收效甚微。

军队数量虽然大幅增长,却并未带来军事实力的提升,反而给国家财政造成难以负载的沉重负担,这就是宋代所谓“冗兵”问题的由来。这一问题很早就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注,庆历年间担任三司使的张方平已指出,“民力大

^① 《乐全集》卷十八《对手诏一道》。



困,起于兵多”^①,嘉祐七年(1062年),宰相韩琦也指出,守边的军队“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给”^②。嘉祐、治平年间,蔡襄任三司使之职,他从掌管财政的亲身经历出发,对这一问题有着十分深切的认识。他指出,“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③,巨额军费已经成为国家财政匮乏的主要原因,因此,如何精简军队,压缩军费开支,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首要问题,即所谓“兵不强则国不富,国不富则民不安”。

蔡襄的“强兵富国”之说,与中国传统的“富国强兵”思想是有所区别的。应该说,二者追求的目标都是国富兵强,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但传统富国强兵思想主张以富国为强兵的基础,以强兵为富国的保障。蔡襄对此并非不了解,他针对宋代“冗兵”导致国家“积弱”的实际情况,提出通过精兵强兵以富国,是在宋代的具体条件下解决富国强兵问题的一个具体对策。虽然以“强兵”为“富国”前提,并非从发展生产的“开源”角度出发,而只是消极的“节流”之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一观点突出强调了“冗兵”的严重性,把解决这个问题视为富国强兵的当务之急,无疑是密切贴近现实的。

在这篇奏疏中,蔡襄提出了强兵的五个方面:一是消冗,控制军队数量。二是选择,保证士兵素质。三是省兵,合理配置兵力。四是训练,提高军队战斗力。五是立法,严明军纪。这五个方面紧紧围绕如何消冗、强兵问题,切中要害。如果这些建议能够得到推行,宋军有望达到少而精的状态,国家的财政负担也会大大减轻,“积弱”“积贫”恶性循环、国家安全危机不断加深的局面也会有所扭转。

遗憾的是,由于政治、军事制度本身的缺陷,加之统治者对解决冗兵问题缺乏决心,各种改革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冗兵一直是北宋的一个顽疾,蔡襄等人强兵的理想也一直没能实现。

① 《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一《上仁宗论民力大困起于兵多》。

② 《宋史·兵志一》。

③ 《端明集》卷二十二《国论要目》。

苏辙论三冗

题引：苏辙(1039~1112年)，北宋著名文学家，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父苏洵、兄苏轼并称“三苏”。熙宁二年(1069年)，时为大名府留守推官的苏辙上书，论冗吏、冗兵、冗费问题。本篇节选自《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零三《上神宗乞去三冗》(参见《栟城集》卷二十一《上皇帝书》)。

【原文】

盖善为国者不然，知财之最急而万事赖焉，故常使财胜其事，而事不胜财，然后财不可尽而事无不济。财者，车马也，事者，其所载物也。载物者常使马轻其车，车轻其物，马有余力，车有余量，然后可以涉涂泥而车不僨^①，登坂险而马不蹶^②，今也四方之财莫不尽取，民力屈^③矣，而上用不足，平居^④惴惴，仅能以自足，而事变之生复不可料。譬如弊车羸^⑤马而引丘山之载，幸而无虞，犹恐不能胜，不幸而有阴雨之变，陵谷之险，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极虑，以为方今之计，莫如丰财。然臣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财者未去，虽求财而益之，财愈不足；使事之害财者尽去，虽不求丰财，然而求财之不丰，亦不可得也。故臣谨为陛下言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

冗吏之说曰：……近世以来，取人不由其官，士之来者无穷，而官有限极，于是兼、守、判、知^⑥之法生而官法始坏，浸淫^⑦分散，不复其旧。是以吏多于

① 僨(fen, 音奋)：仆倒、跌倒。

② 蹶(zhi, 音质)：绊倒。

③ 屈(jue, 音绝)：竭，尽。

④ 平居：平日、平素。

⑤ 羸(lei, 音雷)：瘦弱。

⑥ 兼、守、判、知：宋代实行官职分离制度，官员的官名与实际职权不一致，往往以“差遣”的形式派官办事。兼、守、判、知就是加在实际官职之前的称呼。

⑦ 浸淫：逐渐接近。



上而士多于下,上下相窒。……惟陛下以时救之,下哀痛之书,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与之更立三法:其一,使进士、诸科增年而后举,其额不增,累举多者无推恩^①。……其二,使官至于任子^②者,任其子之为后者,世世禄仕于朝,袭簪绂^③而守祭祀,可以无憾矣。然而为是法也,则必始于二府^④。法行于贱而屈于贵,天下将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盖矫失以救患者,必有所过而后济。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齿^⑤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损其职掌,而多其居职之岁月……。

冗兵之说曰:臣闻国朝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国地狭,兵革至少。其后荡灭诸国,拓地既广,兵亦随众。雍熙之间,天下之兵仅三十万。方此之时,屯戍征讨,百役并作,而兵力不屈,未尝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来,契丹内侵,继迁叛逆,每有警急,将帅不问得失,辄请益兵。于是召募日增,而兵额之多遂倍前世。其后宝元、庆历之间,元昊窃发,复使诸道点民为兵,而沿边所屯至八十万。自是天下遂以百万为额。虽复近岁无事,而关中之兵至于二十八万。举雍熙天下之众,适以备方今关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于此见矣。然臣闻方今宿边之兵分隶堡障^⑥,战兵统于将帅者,其实无几。每一见贼,贼兵常多,我兵常少,众寡不敌,每战辄败。往者将帅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

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余,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于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者七十万家”,而“爵禄百金^⑦,不能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军之士莫亲于间,赏莫重于间。”^⑧间者,三军之司命也。臣窃惟祖宗用兵至于以少为多,而今世用兵至于以多为少,得失之原,皆出于

① 推恩:推广恩德,这里指宋代对于多次科考未中的举子予以优待,按一定的名额录取授官,称为“特奏名”。

② 任子:因父兄的功绩而被授予官职的人。

③ 簪绂:古代的礼服之制,表示显贵的身份。簪,冠簪;绂,丝制的纓带。

④ 二府:宋代以中书掌政令,以枢密院掌军事,合称二府。

⑤ 齿:并列、排列。

⑥ 堡障:小土城。边疆地区用以驻军防御的小型城堡。

⑦ 爵禄百金:据《孙子兵法·用间》,此处当为“爱爵禄百金”,引文脱“爱”字。

⑧ 语出《孙子兵法·用间》。



此。……故臣愿陛下复修其成法，择任将帅而厚之以财，使多养间谍之士以为耳目。耳目既明，虽有强敌而不敢辄近，则虽雍熙之兵可以足用于今世。陛下诚重难之，臣请陈其可减之实。……以实较之，士兵一人，其材力足以当禁军三人，禁军一人，其廩给足以贍士兵三人，使禁军万人在边，其用不能当三千人，而常耗三万人之蓄。边郡之储，比于内郡，其价不啻数倍。以此权之，则士兵可益而禁军可损，虽三尺童子知其无疑也。陛下诚听臣之谋，臣请使禁军之在内郡者勿复以戍边，因其老死与亡而勿复补，使足以为内郡之备而止。去之以渐，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

冗费之说曰：世之冗费不可胜计也。请言其大，与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类推之。臣闻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穷。事至而后谋则害于事，恩穷而后迁则伤于恩。昔者太祖太宗辑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时，宗室之众无几也，是以合族于京师，久而不别。世历五圣而太平百年，宗室之盛，未见有过此时者。禄廩之费多于百官，而子孙之众，宫室不能受。无亲疏之差，无贵贱之等。自生齿^①以上，皆养于县官^②，长而爵之，嫁娶丧葬，无不仰给于上。日引月长，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穷者也。……故臣以为，凡今宗室宜以亲疏贵贱为差，以次出之，使得从仕，比于异姓，择其可用而试之以渐。凡其秩禄之数，迁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与异姓均。临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时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于害民，其贤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为吏者，则出之于近郡，官为庐舍而廩给之，使得占田治生与士庶比。……此亦去冗费之一端也。

臣闻汉唐以来，重兵分于四方，虽有未大之忧，而馈运之劳不至于太甚。祖宗受命，惩其大患而略其细故，敛重兵而聚之京师，根本既强，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转漕^③之费遂倍于古。凡今东南之米，每岁溯汴而上，以石^④计者至五六百万，山林之木尽于舟楫，州郡之卒弊于道路，月廩岁给之奉不可胜计。往返数千里，饥寒困迫，每每侵盗，杂以他物，米之至京师者率非全物矣。由此观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计其患，非法之良也。臣愿更为之法。

① 生齿：古人认为男孩八个月长出牙齿，女孩七个月长出牙齿，被政府载入户籍。

② 县官：指朝廷。

③ 漕：通过水道转运粮食。

④ 石(dan, 音淡)：古代一种计量单位，一石为一百二十斤。



举今每岁所运之数而四分之，其二即用旧法，官出船与兵而漕之，凡皆如旧。其一募六道^①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过免其商税，……其一官自置场而买之京师，京师之兵当得米而不愿者，计其直，以钱偿之。……此又去冗费之一端也。

臣闻富国有道。无所不恤^②者，富之端也，不足恤者，贫之原也。从其可恤而收之，无所不收则其所存者广矣；从其无足恤而弃之，无所不弃则其亡者多矣。……然苟自今从其可恤而收之，则无益之费犹可渐减，此又去冗费之一端也。……然臣愚以为，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后，天下将益衰耗，难以复治。陛下何不讲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择任贤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其官而后责其成绩。

【译文】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并不这样。他们知道财政是最紧要的，做任何事情都要依赖它，因此常常会使财力充分满足各种事务需要，而事务的支出总比财政储备少，然后才能财力不尽而成就万事。财政就像车马，事务就像车所载的物品。负责运输的人常常使马能轻松驾车，车能轻松载物，马有余力，车有余量，然后可以在泥泞的道路上跋涉而车不至于倾覆，攀登险峻的山坡而马不至于仆倒。现在，各地的财物都被搜取干净，百姓的财力已经耗尽了，而朝廷的用度还是不够，平日里还要担心，仅仅能够用以满足基本的需要，没有余力为发生事变做准备。就好像是破车瘦马拉着山丘一样多的物品，如果侥幸没有意外，还要担心不能胜任，如果不幸有阴雨的变化、山陵低谷的险地，灾难就难以想象了。因此，我深思熟虑，认为当前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莫过于增加财富。但是我所说的增加财富并非是设法增加财政收入，而只是去除那些对财政有害的事罢了。如果不能去除那些有害财政的事，即使增加财政收入，也只会使财力更加不足；如果能够将有害财政的事彻底去除，即使不增加财政收入，财力也自然会丰厚起来。因此，我谨为陛下陈述三件对财政最有害的事：一是冗吏，二是冗兵，三是冗费。

① 六道：指东南地区淮南、两浙、江南东、江南西、荆湖南、荆湖北六路。北宋初期地方行政区划最高一级为道，后来改为路，但习惯上仍沿袭旧称。

② 恤：顾惜。

关于冗吏问题：……近代以来，录取人才入仕并非根据官职的实际需要，入仕的士人无穷，而官位却很有限，于是，兼、守、判、知等差遣之法产生，正常的官员选任制度遭到了破坏，逐渐分散支离，不再像原来的样子。因此，在上，官吏堆积，在下，应试的士人繁多，上下互相阻碍。……希望陛下能及时救治这一弊病，亲自下哀痛自责的诏书，明告天下，以官吏太多的缘故，重新确立三个条例：其一，进士、诸科的考试年限延长，但是名额不增加，对那些多次科考不中的人不再实行推恩授官。……其二，对于那些有资格享受任子待遇的官员，只对他们的直系继承人予以授官，让他们世代为官，承袭官位，继承祖业，就可以没有什么遗憾的了。但是，推行这种做法，一定要先从中书和枢密院开始。如果法令只在社会底层施行而不约束贵族，天下人将不服。天下人不服却想让法令很好地施行，那是做不到的。我并非不懂中书与枢密院二府不能与普通官吏并列的道理，只是，那些矫正失误、挽救祸患的做法一定要做得过分一些才能见到成效。其三，减少百官的职掌，同时增加他们在一个职位上任职的年限……。

关于冗兵问题：我听说我国创业初期，四方割据，我们占据的中原地区面积很小，兵马也很少。后来消灭了其他各国，大大开拓了疆土，军队的数量也随之增多。雍熙年间，全国的兵力只有三十万，这一时期，屯守征讨，兴发各种劳役，但是兵力并未显得不足，不曾有兵少的担心。自从咸平、景德年间以来，契丹入侵，西夏李继迁叛逆，每当有危急情况，将帅不考虑得失，就请求增兵。于是招募兵员日益增多，军队的数量较以前多出了几倍。其后的宝元、庆历年间，西夏元昊兴起，又令各地招募民兵，沿边地区驻扎的军队达到八十万之多。从此以后，全国军队的人数就以一百万为定额。虽然近年来没有大的战事，关中地区的驻军已经达到了二十八万。如此看来，雍熙年间全国的兵力，仅能满足现在关中一个地区的需要，兵力增长的严重程度，由此可见。但是，我听说，现在边疆地区的军队分属各个堡障，归将帅直接统领的战斗部队其实很少。每次遇到敌人，敌人的兵力往往很多，我方的兵力常常很少，寡不敌众，交战总是失败。以前将帅作战失利，没有不以此为理由为自己开脱的。

为什么祖宗朝的兵力很少却似乎显得有余，现在的兵力众多却常常要担心不够用，二者之间的差别，不可不加以考察。兵法上说：“兴兵十万，出征千里，百姓的耗费，公家的开支，每天要花费千金，前后方都动乱不安，民夫戍卒奔波在道路上的达七十万家。”但是，“（如果吝惜）爵禄和金钱，不肯用来

了解敌情,那是最不仁德的行为。……因此,三军之中,没有比间谍更亲密的,奖赏没有比间谍更优厚的。”间谍实际上是决定军队命运的人。我认为,祖宗各朝用兵能以少为多,现在用兵却以多为少,得失的原因,都在于此。……因此,我希望陛下能恢复过去的制度,选任将帅,给他们丰厚的财力,使他们多养间谍作为耳目,耳目聪明以后,即使有强敌也不敢轻易进犯,那么,即使只有雍熙年间的兵力也足够今天使用了。陛下如果认为这件事很难办,我就向您讲讲可以减兵的具体原因。……根据实际情况看,一名边疆地区的土著士兵,其能力足以顶上三个禁军士兵,而一名禁军的粮食供给却足以赡养三个土兵。假使有一万名禁军戍守边疆,他们的效用赶不上三千个土兵,却要消耗相当于三万土兵的物资。边疆郡县的物资储备与内地相比,价格高出不止数倍,从这种情况来看,应该增加土兵,同时减少禁军,即使是小孩子也知道这件事是毫无疑问的。如果陛下能听从我的谋议,我请求陛下命令在内郡的士兵不再戍边,对于老、死与逃亡产生的空缺不再补充,直到这些军队能够满足内地的武备需要而止。逐渐减去冗兵,施行十年以后,冗兵的弊病就能最终消除了。

关于冗费问题:世上的冗费是不可胜数的。请让我讲讲其中最主要以及我所知道的,陛下您可以依此类推。我听说事情总有结束,而恩情也终有断绝的时候。如果到了事情结束以后再想办法就会对事情有害,如果到了恩情断绝的时候再改变就会伤害到恩情。以往太祖太宗和陆家族内部,作为天下的表率。在那时,宗室的人数并不多,因此整个家族都住在京城,很久都没有分家。现在已经经过了五代皇帝、一百多年的和平岁月,宗室成员俸禄、粮食的消耗比百官还要多,而子孙日益众多,官室已经无法容纳。不分亲疏,也不论贵贱,所有的宗室人员都要靠国家供养,长大以后就授予官爵,所有的婚丧嫁娶的费用,都要依靠国家。这样一天天发展下去,不知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事情总有结束的时候,而恩情总有断绝的时候。……因此,我认为,凡是现在的宗室人员,都应按照亲疏贵贱排序,按照顺序逐渐脱离对国家的依赖,使他们得以入仕做官,和其他异姓子弟相同,选择其中的可用之才逐渐加以任用。这些人俸禄的数量、升迁的等级、升降的制度,以及任子的制度,都应与异姓相同。对这部分人,还要加强监察,以官员加以约束,以刑法加以震慑。按时检查他们,使其中品行不好的人不至于为害百姓,而其中贤能的人能够为朝廷效力。对那些不能做官的,则应该使他们住到京城附近的地区,由朝廷为他们建造房屋、供给粮食用度,使他们能够占有土地



从事生产,与普通民众一样。……这也是去除冗费的一个办法。

我听说,从汉唐以来,将大量的兵力部署在各地,虽然有尾大不掉的顾虑,但转运粮食不至于太困难。我朝建国以后,鉴于前代兵力部署的严重祸患而忽略其中细小的不便,将主要兵力都聚集到京城地区,这样就强固了根本,使得天下顺服。然而,转运粮食的费用却较前代高出一倍。现在东南地区的米每年都要沿着汴水向上游运输,达到五六百万石,山林的木材都用来做船了,州郡的士卒在运输的道路上奔走,每月每年耗费的物资不可胜数。往返数千里,饥寒交迫,往往偷取物资,掺杂其他物质,运到京城的米一般都不是原来的样子了。由此看来,现在施行的这种方法,只是靠人力运输而没有考虑其弊端,并非好的方法。我希望能够重新采用一种方式。把现在每年所运输的粮食总量分为四部分,其中两部分采用旧法,由官方出船和士兵进行漕运,一切都按旧的方式办。一部分招募东南六路地区的富人,让他们用自己的船和人力运输,所过之处免除商税,……另一部分由官方设置市场在京城采购,京城的士兵应该得米而不愿领取的,计算其价值,用钱偿还。……这是去除冗费的另一个方面。

我听说,富国有道。处处节省开支,是富足的开端,浪费开支,是贫穷的根源。对那些可以节省的开支全面收缩,收入就会大幅增加;对那些不值得支出的方面要予以放弃,如果不放弃就会损失惨重。……从今以后,如果能处处节省开支,那些无用的支出还可以逐渐减少,这是去除冗费的另一个方面。……但是我认为,如果三冗问题不能解决,大约十年之后,天下财力将更加衰弱,难以再进行治理。陛下何不讲求富国的根源而制定方略,选任贤能,交给他们成熟的方案,使他们能够长期任职,然后再要求他们取得成绩呢?

【评析】

冗吏、冗兵、冗费,简称“三冗”,被认为是最终导致北宋衰亡的三大积弊。对于这些问题,早在宋太宗、真宗年间,已经有一些臣僚表示出不同程度的忧虑。王禹偁在端拱二年(989年)的《上太宗答诏论兵事》中,已经提出“并省官吏”的主张,真宗即位后,他又提出“减冗兵、并冗吏”^①等建议。仁宗、英宗时期,这些问题进一步恶性发展,成为臣僚议政的热点话题。对于冗吏、冗兵给国家财政造成的沉重负担,三司使等财政大员往往较其他官僚有着更清楚

^① 《宋史·王禹偁传》。

的认识,因此,对“三冗”问题的集中论述多发端于这些大臣。宝元二年(1039年),时任三司度支判官的宋祁已经提出三冗、三费之说,他所谓的“三冗”指的官吏之冗、厢军之冗以及僧尼道士之冗,已经包含了冗吏、冗兵两个方面,他所说的“三费”指的是道场斋醮、京师寺观、使相节度所耗费的巨额财产。对于冗兵问题,庆历年间任三司使的张方平和嘉祐、治平年间任三司使的蔡襄等人也都有切要的论述。

苏辙此文的可贵之处,在于对前人的各种议论加以精练,概括为冗吏、冗兵、冗费,经他阐发之后,三冗成为时人的共识,如何解决三冗,也成为更明确的时代课题。另一方面,此文恰好撰于熙宁二年(1069年),当时宋神宗已经任用王安石准备变法,苏辙所论“三冗”切中时弊,引起了宋神宗的关注。因此,宋神宗在这份奏疏上批示:“如辙潜心当今之务,颇得其要”^①,并将他任命为王安石变法班子的成员。

“三冗”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家财政的匮乏。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冗吏、冗兵也是造成冗费的重要原因,再加上官僚政治的种种浪费,对契丹、西夏的“岁币”,有限的财政税收自然捉襟见肘。据史料统计,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国家财政已经没有盈余,至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则出现了一千五百余万缗的财政赤字^②。国家处于严重的“积贫”状态,反过来又严重加剧了“积弱”:因为财政困窘,越发无力整军经武,面对辽、西夏等政权的威逼,只能步步退让,屈辱求和,而战争又进一步增加了财政上的负担,加速了国家的衰耗——“积贫”“积弱”就这样恶性循环,国家安全危机不断加深。到神宗时期,“三冗”作为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诚如苏辙所言,“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后,天下将益衰耗,难以复治”。神宗对这一问题有明确的认识,熙宁元年(1068年),他对文彦博等大臣明确表示,“当今理财最为急务”^③,任用王安石实行的变法也以理财作为主要内容。

苏辙虽然提出了“丰财”的重要性,但他又说,“然臣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矣”,也就是说,他所说的“丰财”只是除弊,而不是兴利,只是节流,而不是开源。因此,他的“丰财”之道仅限于去除“三冗”而已。在这个问题上,王安石的主张更为积极,他认为解决财政问题

①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十四。

② 《文献通考》卷二十四。

③ 《太平治迹统类》卷十八。



的根本不在于减少开支,而在于“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也就是说,要以发展生产、加强管理作为理财的关键。

苏辙的主张虽然有其消极、保守的一面,但是,他对宋代中叶存在的严重的“三冗”问题做了系统的论述,代表了一般封建官僚的主流思想,如果宋廷能在这些方面坚决加以整顿,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挽回北宋社会的颓败之势。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遗憾的是,北宋朝野似乎都看到了国家问题的所在,却始终没有办法加以解决,由范仲淹和王安石等人推动的两次变革——“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由于强大的保守派官僚势力的阻挠和反对,都呈昙花一现,很快就归于失败。这是历史的悲剧。

李纲论战和

题引：李纲(1083~1140年)，两宋之际名臣，字伯纪，邵武(今属福建)人，历任兵部侍郎、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湖广宣抚使等职。建炎元年(1127年)，他被宋高宗任为右相，坚决反对与金议和，主张战守。本篇节选自《梁溪集》卷五十八《议国是》(参见《历代名臣奏议》卷八十四)。

【原文】

臣窃以和战守三者一理也。虽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则何以战？虽有坚甲利兵，弗能战也，则何以和？以守则固，以战则胜，然后其和可保。不务战守之计，惟信讲和之说，则国势益卑，制命于敌，无以自立矣。

【译文】

我认为，和、战、守三者是相互关联的整体。即使有高大的城墙，宽深的护城河，如果不能守，凭什么与敌人作战？即使有坚固的铠甲，锐利的武器，如果不能与敌人作战，凭什么讲和？只有能够坚固地防守，又能在作战中获胜，然后才能保全和局。如果不追求战、守的长远之计，只是相信讲和之说，就会使国势更加卑弱，受制于敌人，无以自立了。

【评析】

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金军攻克开封，将宋徽宗、钦宗掳掠北去，北宋灭亡。同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年号建炎，是为宋高宗，史称“南宋”。

南宋建立之初，虽然黄河以北部分地区经战火蹂躏，遭到很大破坏，但是金军在洗劫开封城后北归，河东、河北的大部分州郡还掌握在宋朝军民手中。金军实际占领的地区仅有十余郡，而且，这些地区的人民纷纷揭竿而起，反抗金人的统治，给金军造成沉重打击。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新建的南宋政权能够采取有力措施，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恢复故土、重整山河并非没有可



能。

宋高宗即位以后,起用抗战派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也就是右相。李纲虽为文人出身,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却能勇担重任,在靖康元年金军围攻开封之时,他成功领导了开封保卫战,在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宋高宗以他为相,也正是希望藉他的威名以“使敌国畏服、四方安宁”^①。李纲赴任后,马上奏上“十事”,全面阐述了他对时局的看法及施政方案。这“十事”分别为:“议国是”、“议巡幸”、“议赦令”、“议僭逆”、“议伪命”、“议战”、“议守”、“议本政”、“议贵成”、“议修德”。“议国是”是其中第一事,也是一个带有纲领性的问题。所谓“国是”,就是国家的大政方针。李纲认为,当时的“国是”就是确定和、战、守的根本大计,“国是定,然后设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谋,下无趋向之惑,天下之事不难举也”。

李纲对和、战、守三者的关系做了辩证的论述,认为守是战的前提,不能守则无以战,战又是和的基础,不能战则没有和的资本。并结合对北宋以来宋辽、宋金关系的分析,对当时朝臣中流行的畏战、和议之说予以痛切的批驳。他指出,靖康年间一味主和是导致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如果继续“不务战守之计,惟信讲和之说”,就会使国势更加卑弱,无异于将国家拱手送人。因此,他认为,在当时“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的情况下,应该以“守”作为基本国策:“为今之计,莫若一切罢和议,专务自守之策,而战议姑俟于可为之时”。他又进而阐述了自守的具体方略,即在河北、河东地区建立藩镇,重新构建边防体系,在沿江沿河的要冲地区设置帅府,修治城池,加强训练,提高军事实力。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可以考虑对金人大举讨伐。在他出任宰相以后,便开始按照这一思路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部署。他推荐“声震河北”的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又以积极主战的宗泽为开封府尹,主持开封防务,希望他们能够收复失地,整顿残局。为了防止金军的再次进犯,他又在战略要地设置帅府,加强战备,并下令在陕西、河北、京东西路招兵买马,补充禁军。

李纲对时局的分析是十分尖锐而深刻的,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战备措施如果能够切实实行,南宋恢复既有统治区,与金人对抗是完全可能的。张所在河北地区的作为,以及宗泽对开封的经营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以李纲为首的抗战派在与主和势力的斗争中很快败下阵来。李纲任相之初,便

^① 《宋史·李纲传》。



遭到主和派的百般阻挠,御史中丞颜岐五次上书,称李纲“为金人所恶,不当为相”^①,右谏议大夫范宗尹也三次上书,说他“名浮于实,而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②。中书侍郎黄潜善、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等高宗的亲信大臣更是主和派的代表,他们被金人的威势吓破了胆,一心希望通过讲和以求苟安一时。对于李纲的抗战主张及其军事部署,极力反对。傅亮刚刚出发十几天,便以兵少不可渡河为由被罢。张所的河北招抚使司也受到黄潜善党羽的弹劾。建炎元年(1127年)八月,李纲以“杜绝言路,独擅朝政”为名罢相,前后在相位仅75天。

李纲罢相后,他所主持的抗战措施全部被罢废。宋高宗一面派人向金求和,一面逃往扬州。建炎元年十二月,金人南侵,两河郡县相继沦陷。建炎三年,金军大举南下,高宗流窜于杭州、越州(今浙江绍兴)、明州(今宁波)等地,一度乘船逃入海中。建炎四年,金军退至长江以北,江淮地区暂时稳定下来,但是,由于中原地区彻底沦陷,最终形成南宋只能偏安于东南一隅的局面。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

② 《宋史全文》卷十六上。



虞允文论四州^①之不可弃

题引：虞允文(1110~1174年)，南宋名臣，字彬甫，隆州仁寿(今属四川)人，历任川陕宣谕使、两湖京西制置使、四川宣抚使、左丞相兼枢密使等职。隆兴元年(1163年)，金朝提出索要唐、邓、海、泗四州的要求，虞允文上书坚决反对。本篇选自《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四十九。

【原文】

窃谓自古中国之于外裔，或战或和，必因盛衰之势而用之。若当战而和，与当和而战，此安危存亡之机，不可不察也。汉高祖、唐太宗皆起于秦隋大乱之后，其所遭之时，所用将相，所集兵车，所都^②胜势，大率皆略相似。及天下初定，高祖和匈奴，太宗征突厥，其不同遽^③如此，何哉？冒顿方盛而颡利衰故也。二君者岂能为天下之机，特因其机而不失尔。臣不知士大夫以今日之敌为盛耶？衰耶？方敌盛时，力苟不足，尚以和而誅^④我，我每堕其计中。自宣和^⑤、靖康而来，可迭考而究见之也。彼欲取契丹，始誅我以海上之盟。彼未得太原，又誅我以城下之盟。达兰^⑥以蒙国为患，弃河南之地而誅我以盟。乌珠^⑦既引兵临淮，知江南不可下，又誅我以盟。数十年之间，凡四与我盟而率自叛之，而谓和犹可恃耶？彼力不足，虽战必和；彼力有余，虽和必战。往

① 四州：此处指唐(今河南唐河)、邓(今属河南)、海(今江苏连云港)、泗(今江苏盱眙西北)四州之地。

② 都：聚集、汇集。

③ 遽(jù,音据)：就、竟。

④ 誅(xu,音续)：引诱。

⑤ 宣和：宋徽宗年号(1119~1125年)。

⑥ 达兰：又作挾懒，即完颜昌。金熙宗时主掌军权，主张议和，促成绍兴和议。不久即为完颜宗弼所杀。

⑦ 乌珠：又作兀术，即完颜宗弼。在完颜昌之后统领金军事，撕毁绍兴和约，再次大举进攻南宋。



事历历可鉴,而世不悟,有识者不知涕泗之横集也。彼今已衰,不止于力之不足,一和之后,彼之力有余,不知今日之盟,士大夫能保其不叛否也。况海陵^①死,旧盟已亡,皇帝者,我自帝也,上天之所畀付也。大国者,我自国也,祖宗之所传授也。何有于不正之名,而汲汲^②于正之乎?侄国之称,岂无犹子^③之嫌?未可以言敌国。而四州之地与和尚原、商於一带之险,皆不可以轻弃,愿陛下深思而熟计之。

【译文】

我认为,自古中国与外族的关系,或战或和,一定要根据盛衰的形势来决定。如果应当战却讲和,或者应当讲和却要作战,这是安危存亡的关键,不能不认真考虑。汉高祖、唐太宗都兴起于秦、隋大乱之后,他们所处的时代,所用的将相,所聚集的武器装备,所掌握的有利形势,大体都很相似。到天下刚刚平定,汉高祖与匈奴通和,唐太宗征伐突厥,他们的举措竟这么不同,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汉初匈奴冒顿单于强盛,而唐初突厥颉利可汗已经衰落的缘故。这两个君主难道能创造天下的机会吗?他们只是利用了机会而没有使之丧失罢了。我不知道士大夫们认为现在的金国是强盛还是衰落,在敌人强盛的时候,力量如果不足,就会用讲和来引诱我,我方往往会中他们的诡计。自宣和、靖康以来的历史,可以反复稽考而得到明确的认识。敌人要进攻契丹,开始用海上之盟引诱我。敌人没有攻下太原,又以城下之盟引诱我。达兰以蒙古国为祸患,放弃河南之地,以绍兴之盟引诱我。乌珠率兵到达淮河地区,知道难以攻下江南,再次以盟约引诱我。数十年之中,共四次与我缔结盟约但都自己毁约,难道说和议还能靠得住吗?敌人的力量不足,即使发动战争也必然议和;敌人的力量有余,即使议和也必然再战。往事历历在目,可以作为借鉴,而世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有识之士不禁为此痛哭流涕。敌人现在已经衰弱,不仅是力量不足,待到议和以后,敌人的力量又会恢复,不知到那时,士大夫们能不能保证他们不背叛今日的盟约。何况海陵王已经死了,旧的盟约已经失效,皇帝是我们自己的皇帝,是上天赋予的君权,大国是我们

① 海陵:即完颜亮。1149年杀金熙宗夺皇帝位,后率军大举攻宋,为部将所杀,死后被谥为“海陵郡王”。

② 汲汲:心情急切的样子。

③ 犹子:兄弟的儿子,即侄子。



自己的大国,得自祖宗的遗传。有什么名义不正的地方,而要急切地正名呢?我们向金国自称侄国,难道没有做人家侄子的嫌疑吗?连敌对之国都称不上。海、泗、唐、邓四州之地以及和尚原、商於一带的险要地区,都不能轻易放弃,希望陛下深思熟虑。

【评析】

隆兴元年(1163年),是宋孝宗即位的第一个年份。这一年,宋孝宗任命主战派张浚发动了一场对金的北伐战争,目标是争夺淮南东路地区。但是,由于将领不和、指挥失误,这次北伐并未取得成功,在金军的反攻之下,宋军最终兵败符离(今安徽宿州北)。金索要唐、邓、海、泗四州的要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

在和谈中,金不但提出索要四州之地,而且提出宋对金称臣、继续贡纳岁币等苛刻条件。宋廷以汤思退为首的主和派主张答应金的条件,虞允文等主战派却坚决反对。虞允文先后数次上书,力主四州不可弃。他所陈述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金人统治出现危机,“内阻外讧”,对宋的议和条件不过是虚声恫吓而已。从当时形势来看,这一认识是十分准确的。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海陵王大举攻宋,这次战争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却以失败告终。金朝国力遭到很大削弱,人民起义此起彼伏,北方的契丹族又乘机发动叛乱,金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虽然继立的金世宗采取了一些稳固统治的措施,对南宋以小规模战役促使议和,争取时间迅速镇压了契丹起义,但是,总的说来,金在与宋的国力对比上并不占有绝对优势。其二,四州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海、泗二州介于山东、淮北之间,对于稳固这一地区的民心具有重要意义。唐、邓二州的地理位置则尤为重要,“以之而守,则上流之势固;以之而战,则窥洛趋汴,外连两河之民。汉光武、诸葛亮恢复汉祚,其规模皆出于此”。虞允文又指出,南宋为了取得四州之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旦弃之,很难再次收复。这些意见都是从现实战略利益的角度考虑的,反映了他务实的思想倾向及敏锐的战略意识。其三,和议只是敌人衰弱之时的权宜之计,不可轻信。虞允文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认为“彼力不足,虽战必和;彼力有余,虽和必战”,即便弃四州之地,敌人在国力恢复以后仍然会撕毁和议,再次发动战争。

虞允文对于宋金形势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刚刚即位的宋孝宗尽管也不愿放弃四州之地,最终还是迫于太上皇宋高宗以



及主和臣僚的巨大压力,同意了金的这一要求。隆兴二年(1164年)六月,当孝宗要求虞允文放弃唐、邓二州之时,时任两湖京西制置使的虞允文拒不执行,最终被召还朝。同年十月,金军再次南下,以战迫和。由于主和派自毁藩篱,不作战备,金军连克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盱眙(今属江苏)等地,进逼扬州,西路军也攻占了商州(今属陕西)。宋被迫与金签订和约:宋割海、泗、唐、邓、商、秦六州之地予金;两国以淮河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南宋皇帝不再对金称臣,改为叔侄关系;岁贡改称岁币,由银绢二十五万两、匹改为二十万两、匹,史称“隆兴和议”。

通过“隆兴和议”,金虽然在两国名分、岁币数量上做了一些让步,但取得了六州之地,正是虞允文所说的“弃虚取实”之道。在此之后,金世宗致力于稳固内部统治,不再大举南侵,宋孝宗虽然倚重虞允文,积极备战,但是迫于主和派的强大势力,也一直没有重大举措,宋金之间维持了30余年的和平局面。

历史无法假设,虽然我们不能预知如果孝宗采用了虞允文的建议会导致历史向哪个方向发展,但是从虞允文对金国形势的准确分析,以及他本人以一介书生,成功取得了采石之战的胜利等情况来看,他确实是一位颇具战略眼光的帅才。他总结宋金战争经验教训提出的“彼力不足,虽战必和;彼力有余,虽和必战”的观点,与李纲对战和问题的看法一致,在当时都是难得的真知灼见。



郝经《东师议》(节选)

题引:郝经(1223~1275年),元初名臣,字伯常,原籍泽州陵川(今属山西),博学多智,官至翰林侍读学士、皇封文馆大学士。1259年,蒙古军进攻四川受阻,郝经上《东师议》,对忽必烈所统领的东路军提出建策。本篇选自《陵川集》卷三十二(参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一、《元史·郝经传》)。

【原文】

经闻图天下之事于未然则易,救天下之事于已然则难。于已然之中复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来者得以遂,则尤难也。国家以一旅之众,奋起朔漠^①,斡^②斗极^③以图天下。马首所向无不摧破。灭金源^④,并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蹢躅^⑤诸夷,奄^⑥征西海,有天下十分之八,尽元魏^⑦、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⑧莫与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连兵构祸逾二十年。何曩时^⑨掇取之易,而今日图惟之难也?

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术图。并之以力则不可久,久则顿弊而不可振;图之以术则不可急,急则侥幸而难成。故自汉、唐以来,树立攻取,或五六年,未有逾十年者,是以其力不敝,而卒能保大定功。晋之取吴,隋之取陈,

① 朔漠:长城以北的沙漠地区。朔,北方。

② 斡:运转。

③ 斗极:北斗星与北极星。

④ 金源:金朝的别称。

⑤ 蹢躅:践踏碾压。蹢,践踏;躅(li,音历),被车轮碾压。

⑥ 奄:全部。

⑦ 元魏:北魏(386~534年),鲜卑族拓跋氏建立政权,一度统一北方中原地区,与宋、齐、梁、陈等南朝政权对峙。因魏孝文帝拓跋宏时改姓“元”,故称“元魏”。

⑧ 廓然:广阔的样子。

⑨ 曩(nang)时:从前。



宋之取唐,皆经营比邻^①,十有余年,是以其术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当其可,不妄为而已。

国家建极开统^②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遗黎残姓,游气惊魂,虔刘^③剗荡^④,殆欲殄尽。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敝乎!且括兵率赋,朝下令而夕出师,躬擐^⑤甲胄,跋履山川,阖^⑥国大举,以之伐宋而图混一。以志则锐,以力则强,以土则大,而其术则未尽也。苟于诸国既平之后,息师抚民,致治成化,创法立制,敷布^⑦纲条,上下井井,不挠不素,任老成为辅相,起英特为将帅,选贤能为任使,鸠^⑧智计为机衡,平赋以足用,屯农以足食,内治既举,外御亦备。如其不服,姑以文诰,拒而不从,而后伺隙观衅,以正天伐。自东海至于襄、邓,重兵数道,联帜接武,以为正兵,自汉中至于大理,轻兵捷出,批亢抵胁^⑨,以为奇兵。帅臣得人,师出以律,高拱^⑩九重^⑪之内,而海外有截^⑫矣。是而不为,乃于间岁^⑬遽为大举,上下震动,兵连祸结,底^⑭安于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

【译文】

我听说谋划天下之事,在事情尚未发生前是很容易的,待到事情已经发生再予以补救就很难了。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中,还存在一些可以把握的未然因素,如果能使已发生的事没有失误,使将发生的事能够成功,就尤为困难。

① 饮:同“次”,排列有序。

② 建极开统:建极、开统都指开创帝业、立法治国。

③ 虔刘:劫掠、杀害。虔、刘,都有杀害之意。

④ 剗荡:磨砺、洗涤,意为扫荡、破坏。剗(mo,音磨),磨砺、切磋;荡,涤除、洗去。

⑤ 擐(huan,音换):披。

⑥ 阖:通“合”,全、都。

⑦ 敷布:施行。

⑧ 鸠:通“纠”,聚集。

⑨ 批亢抵胁:攻击虚弱和要害的部位。亢,咽喉;胁,同“肋”。

⑩ 高拱:高拱两手安坐的姿势。

⑪ 九重:指帝王居住的宫廷,极言其深远。

⑫ 海外有截:语出《诗经·商颂·玄鸟》,意为遥远的四海之外都会顺服。截,整齐、整治。

⑬ 间岁:隔一年。

⑭ 底:尽头、终极。



我蒙古国凭借为数不多的军队,奋起于北方沙漠地区,运转枢机以图谋天下。马首所向,无不摧毁。先后消灭了金,吞并了西夏,蹂躏荆、襄,攻克成都,平定大理,扫平各周边部族,全面征服天下,已经占有了天下十分之八的地区,不但完全占有了北魏、金等的疆域,而且有所增加,地域之广大没有任何政权能比拟。只有宋朝尚未消灭,没能完成统一,双方不断交战,已经超过二十年。为什么以往出击那么容易,今天却如此困难呢?

攻取天下,有的要靠武力兼并,有的则需计谋、方法。以武力兼并不宜持久,时间久了就会困顿不振;以计谋取胜不能急躁,急躁就会产生侥幸心理,难以成功。自汉、唐以来,建立国家,攻取领土,有的用五六年时间,最多没有超过十年的,因此他们的实力没有衰敝,最终成就大业。晋攻取吴,隋攻取陈,宋攻取南唐,都有一定的战略步骤,经过十多年的时间,最终完成了统一。(这些朝代)有的远有的近,总的说来,它们的成功都适应了当时的情况,没有任意胡为。

我蒙古国开创帝业,已经将近五十年,而统一主要靠武力,百姓饱受摧残,惊魂不定,杀伐扫荡,歼灭殆尽,自古以来,用兵没有如此多而久的,国力怎能不遭到破坏呢?况且,扩充兵力,征收赋税,早晨下令,晚上就出师,大汗亲自披戴甲冑,跋山涉水,全国大举,以这样的方式讨伐宋朝而谋求统一,志向固然坚定,力量固然强大,土地固然广阔,但是在计谋方法上却有所欠缺。如果能在各国平定之后停止用兵,安抚百姓,修明政治,创立法制,树立纲纪,使国家上下井然,有条不紊,任用老成的官员作宰相,起用英雄豪杰为将帅,选拔贤能为各级官吏,聚集智谋之士为枢要机关,调整赋税以满足国家开支,发展农业以保证粮食供应,在内部政治得到很好治理以后,对外的武装力量也逐渐完备,到那时,如果宋朝不归服,姑且先致以文书劝降,如果还是拒不顺从,再寻找适当时机,大举攻伐。东起东海西至襄阳、邓州,发数路精兵,旌旗相接,作为正兵;自汉中至大理,以轻骑兵迅速出击,攻其要害,作为奇兵。如果将帅得人,军队纪律严明,大汗就可以安坐官廷之内,海外自然顺服了。不做这样的筹划,而是在两三年内忽然大举攻宋,以致上下震动,兵连祸结,转安为危,这就是事情已经发生而无法挽救了。

【评析】

蒙古灭金以后,开始与南宋直接对峙。从元太宗窝阔台七年(1235年)开始,蒙古军不断发动侵宋战争,四川、荆襄、两淮地区惨遭蹂躏。但是,由于



蒙古军以掳掠财物为主,而非对占领区进行长期治理管辖,加之南宋军民的奋起抗争,蒙古军难以在占领区建立稳固统治,所得地区往往得而复失。这一状况在忽必烈当权后发生了改变。1251年,蒙哥汗即位,命忽必烈统领蒙古军、汉军镇守中原,并负责征服南宋。忽必烈采取汉族士大夫的建议,开始重视对占领区的政治统治及经济管理,做与南宋长久对峙的打算,中原地区也由此成为忽必烈政治势力的重要根基。

1257年,蒙哥亲征南宋,兵分两路,左翼军由塔察儿统率,进攻荆襄、两淮地区;右翼军由他本人亲自率领,分三道入蜀。在这一部署中,忽必烈受到排挤,没有掌握兵权。战争之初,蒙哥所率西路军攻城掠地,进展十分顺利,但在1259年春进攻合州(今重庆合川)之时,却遇到守将王坚的顽强抵抗,连攻5个多月仍不能攻克。与此同时,塔察儿所率东路军进围樊城,惟知掳掠财物,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没能攻下一座城池。这种情况下,蒙哥不得不任命忽必烈为东路军统帅。次年春,忽必烈从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南下,准备渡过淮河,进抵长江。郝经的《东师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是针对忽必烈的“东师”的作战指导方略提出的建策。

郝经出生在金人统治的北方地区,幼年遭逢元灭金之战,饱受战乱之苦,因此对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灾难深恶痛绝。他自幼聪明好学,博览群书,年轻时已经成为一位小有名气的儒家学者,对于儒家仁政、以民为本、注重民心向背等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蒙哥汗即位后,忽必烈以皇弟身份建立幕府,广泛招纳汉族知识分子,郝经也被罗致帐下,成为忽必烈的一名心腹谋臣。他多次针对重大问题提出建策,对忽必烈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郝经首先从理论上讨论了攻取天下是以“力”还是以“术”的问题。蒙古军凭借剽悍的骑兵征服天下,不断开疆拓土,缔造了一个地域空前广大的帝国,这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在郝经看来,这是典型的以“力”并天下。但是,“并之以力则不可久,久则顿弊而不可振”,按照这一规律,蒙古军与南宋的战争持续了20余年,难免会“顿弊而不可振”,这正是蒙古不能顺利灭掉南宋的主要原因。相反,如果不是以“力”并天下,而是以“术”图天下,就不可操之过急,要按照一定的方略和步骤逐步实行。郝经还讲到了“图之以术”的另一层原因,那就是,蒙古骑兵的优势在于迅速机动、出奇制胜,这一优势在江淮以北的平原地区可以充分发挥,在南方地区则不然。南宋不但保有长江天堑之险,而且四川等地区高山深谷、险阻重重,不利于蒙古骑兵的展开,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蒙宋战争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



鉴于蒙哥的西路军已经与南宋军处于胶着之势,一时难以改变战局,郝经希望忽必烈能够借鉴西路军的教训,对东路军的作战行动做细致周密的考虑,也就是他所说的“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变”。他提出,首先应该与南宋议和,偃兵息民,保全实力,以图再战。如果南宋拒绝议和,不得不战,也要改变以往“躁轻飘忽”的特点,按照既定的方针稳步推进,同时也要体现“仁而不杀”的特点,不损害百姓的生命财产,争取民心的支持。他还对东路军的具体作战方略进行了谋划,提出了“先荆后淮,先淮后江”的作战方案。这一方案与后来南宋降将刘整提出的平宋方略基本相同,成为元灭宋战争的正确选择。

郝经对蒙古军作战特点以及战争进程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蒙古军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对南宋作战的优势,但是,如果不改变以往那种烧杀掳掠的作风,不改变进攻的方法和策略,不但会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的破坏,也不利于蒙古军在汉族地区建立长期稳定的统治。虽然忽必烈没有采纳郝经的建议马上与南宋议和,但他在统率“东师”以后,并未急于攻取,而是先派杨惟中、郝经等宣抚江淮荆湖地区,严格整顿军纪。进入南宋境内,又告诫诸将不要妄杀无辜,不要焚毁民房,对掳获的人民也全部放还。这些都体现了郝经等汉族士大夫思想的影响,对于减少战争造成的破坏,建立元朝全国性政权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郝经《立政议》(节选)

题引:忽必烈即位以后,郝经向其建言采用“汉法”,以确立国家基本制度。本篇选自《陵川集》卷三十二(参见《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五、《元文类》卷十四)。

【原文】

夫纪纲^①礼义者,天下之元气也;文物^②典章者,天下之命脉也。非是则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废则小坏,大废则大坏,小为之修完则小康^③,大为之修完则太平。故有志于天下者必为之修而不弃也,以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孳孳^④汲汲^⑤,持扶安全,必至于成功而后已。……

国家光有天下,绵历四纪^⑥,恢拓疆宇,古莫与京^⑦。惜乎攻取之计甚切而修完之功弗逮^⑧,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急也。盖其几^⑨一失而其弊遂成。初下燕云^⑩,奄有河朔^⑪,便当创法立制而不为,既并西域、灭金源^⑫,

① 纪纲:治理国家的法度。一般指维护封建君主集权政治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② 文物:礼乐典章制度。

③ 小康:小安。

④ 孳孳:同“孜孜”,勤勉不懈。

⑤ 汲汲:急切的样子。

⑥ 纪:古代纪年单位,十二年为一纪。

⑦ 京:大。

⑧ 弗逮:不及。逮,达到。

⑨ 几:同“机”,事物的先兆。

⑩ 燕云:指今北京、天津及山西、河北北部地区。五代末期以来为幽、云等十六州之地,通常称“幽云”、“燕云”或“燕蓟”。

⑪ 河朔:指黄河以北地区。古代把北方看作是万物之始,因此称北方为朔方,称黄河以北为河朔。

⑫ 金源:指金朝。



蹂荆襄,国势大张,兵力崛阜^①,民物稠夥^②,大有为之时也。苟于是时正纪纲,立法度,改元建号,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汉唐之举也。而不为,于是法度废则纲纪亡,官制废则政事亡,都邑废则宫室亡,学校废则人材亡,廉耻废则风俗亡,纪律废则军政亡,守令废则民政亡,财赋废则国用亡,天下之器虽存而其实则无有。赖社稷之灵,祖宗之福,兵锋所向无不摧破,穿彻海岳之锐,跨凌宇宙之气,腾掷天地之力,隆隆殷殷^③,天下莫不慑服。当太宗皇帝临御之时,耶律楚材为相,定税赋,立造作,榷宣课^④,分郡县,籍户口,理狱讼,别军民,设科举,推恩肆赦^⑤。方有志于天下,而一二不逞^⑥之人,投隙抵罅^⑦,相与排摈^⑧,百计攻讦,乘宫闈^⑨违豫^⑩之际,恣为矫诬,卒使楚材愤悒以死。既而牵连党与,倚叠締构,援引宵人^⑪,畀^⑫之以政,相与割剥天下,而天下被其祸,荼毒宛转十有余年,生民顛顛^⑬,莫不引领望明君之出。先皇帝^⑭初践宝位,皆以为致治之主,不世出也。既而下令鸠括^⑮符玺,督察邮传^⑯,遣使四出,究核徭赋,以求民瘼^⑰。污吏滥官,黜责殆遍,其愿治之心亦切也。惜其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旧弊未去,新弊复生,其为烦扰,又益剧甚,而致治之几又失也。

① 崛阜:非常强盛。崛,突出;阜,多,旺盛。

② 稠夥:众多。夥(huo,音火),盛多。

③ 隆隆殷殷:“隆隆”、“殷殷”均为象声词,形容声势浩大。

④ 宣课:元太宗时立十路宣课司,负责征收赋税。

⑤ 肆赦:大赦。宽赦罪人。

⑥ 不逞:不满意,不得志。

⑦ 罅(xia,音下):缝隙。

⑧ 排摈:排斥。

⑨ 宫闈:宫廷中后妃居住的场所。闈:宫中的旁门。

⑩ 违豫:对古代皇帝、皇后等生病的讳称。豫,安乐,娱乐。

⑪ 宵人:小人、坏人。宵,通“小”。元太宗窝阔台皇后乃马真氏当政时期,罢逐耶律楚材等,任用西域商人主政,大肆聚敛财物。

⑫ 畀(bi,音必):给予。

⑬ 顛顛(yong):仰慕的样子。

⑭ 先皇帝:指元宪宗蒙哥。

⑮ 鸠括:搜集。鸠,聚集;括,搜求。

⑯ 邮传:古代传递文书的驿站。传(zhuan,音撰),驿站或驿站的车马。

⑰ 民瘼:民间疾苦。瘼(mo,音末),病,疾苦。



今皇帝陛下统承先王，圣谟英略，恢廓正大，有一天下之势。自金源以来，纲纪礼义，文物典章，皆已坠没，其绪余土苴^①，万亿之能一存，若不大为振澡^②，与天下更始，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成一王法，是亦因仍苟且，终于不可为，使天下后世以为无志于天下，历代纲纪典制至今而尽，前无以贻谋，后无以取法，坏天地之元气，愚生民之耳目，后世之人因以窃笑而非之，痛惜而叹惋也。

昔元魏^③始有代地^④，便参用汉法，至孝文迁都洛阳，一以汉法为政，典章文物灿然与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称为贤君。王通^⑤修《元经》，即与为正统，是可以为鉴也。金源氏起东北小夷，部曲^⑥数百人，渡鸭绿，取黄龙^⑦，便建位号，一用辽宋制度，取二国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饰王化，号十学士。至世宗与宋定盟，内外无事，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风俗完厚。真德秀^⑧谓“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称为贤君。燕都故老语及先皇者，必为流涕，其德泽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以为鉴也。今有汉唐之地而加大，有汉唐之民而加多，虽不能便如汉唐，为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

【译文】

纲纪礼义是国家的元气，礼乐典章制度是国家的命脉。如果没有它们，国家政权就不会稳固，它们小有损废国家就有小的损坏，他们大有损废国家就有会严重破败。对它们稍做整治，社会就会达到小康，如果大力讲求，就会出现太平盛世。因此，有志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对纲纪、典章等进行建设而不是予以丢弃，要以太平盛世作为自己的理想，以天下安危为己任，勤勤恳恳，扶持保全，一定要达到成功为止。……

① 土苴(jū,音居):泥土和枯草,比喻微贱的东西。

② 振澡:振作、革新。澡,洗涤。

③ 元魏:即指北魏。孝文帝时改拓跋姓为元姓,故又称元魏。

④ 代地:今山西大同至内蒙古河套一带地区。北魏初以此地为中心建国,称代国。

⑤ 王通:隋代大儒。字仲淹,河东龙门(今山西万荣)人。

⑥ 部曲:魏晋南北朝时豪强大族所属家兵、私兵的称谓,这里泛指军队。

⑦ 黄龙:即黄龙府,今吉林农安。1115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称帝,建立金朝,年号收国,随后才率军攻取了辽黄龙府,并非先取黄龙,后称帝建号。

⑧ 真德秀:南宋大臣、著名理学家。字景元,后改希元,世称西山先生,建宁浦城(今属福建)人,官至户部尚书、参知政事。



我们国家建立政权、征服天下,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开疆拓土,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也比不上。可惜的是,虽然作战攻取的方法很恰当,但建立和完善国家政权的功业却做得很不够,以致于国家日益败坏,百姓日益贫困。其原因就在于没有适时把握时机,从而形成了这样的弊病。在刚刚攻下燕云诸州、全部占据河朔地区的时候,就应该创立制度和法纪,但当时却没有做。待到吞并西域、灭掉金朝、侵入荆襄的时候,国势大张,兵力强盛,财物富足,正是大有可为的时候,如果在这时正纲纪、立法度,改元建号,和前代一样兴盛,使天下焕然一新,这真是汉唐盛世才会有的局面啊。但这时仍然没有那样做,于是法度沦废导致纲纪散亡,官制不立致使政事混乱,都邑不修以致官室破败,学校废弃因而人才缺失,不讲廉耻以致风俗沦丧,不严纪律以致军政败坏,不委任地方官因而民政荒芜,不治理财赋因而财政亏空,国家政权虽然存在但其实质却是一无所有。依赖社稷的保佑,祖宗的荫庇,我军仍然能够在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以穿透大海高山的锐利,跨越宇宙之上的气势,运转天地的力量,声势极为浩大,天下无不畏惧臣服。太宗皇帝统治时期,耶律楚材为宰相,他制定赋税标准,建立各种机构,征收赋税,划分郡县,核定户口,处理案件,区别军民,设立科举,推广皇帝的恩德,大赦罪人。正当他踌躇满志地要治理天下的时候,却有那么一两个不得志的小人,利用各种机会排斥他,想方设法攻击他,乘皇帝生病、汗位虚悬的机会肆意诬陷,最终使耶律楚材在愤怒和忧郁中死去。然后他们又拉拢一群臭味相投的人,互相勾结援引,进用一些小掌握政权,他们一起来残害天下,天下遭受这些人的祸害,已经有十多年了,老百姓都急切地盼望着,希望英明的君主早日出现。先皇帝宪宗刚即位的时候,人们都以为他是一个可以兴致太平的君主,是一位难得的明君。他即位不久就下令搜集符玺,督察驿站,派遣使臣到各地检查徭役赋税,以了解人民的疾苦。对那些贪官污吏,几乎都给予贬黜和惩罚,他希望天下大治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可惜的是,他所任用的那些督察人员都是以前残害百姓最严重的人,旧的弊病没有消除,新的弊病又产生了,给百姓带来的烦扰,比以前更加严重,达到太平盛世的机会就这样再次失去了。

现在陛下您继承先王的统绪,雄才大略,气度恢弘,具有一统天下的气势。自从金朝以来,维持国家政权的纲纪礼义、典章文物都已经沦落丧失,仅存的一点还不及万亿分之一,如果不能大加振作,重新建设国家政权,以我朝现有的法度为基础,援引中原唐宋各朝传统的典章制度,参考辽朝和金朝遗留的体制,设定官职,区分职能,建立制度,安抚百姓,形成一代王朝的法度,



而是继续因循苟且,最终不能有所作为,就会使后人认为您没有统一天下的志向,历代的纲纪和典章制度到您这里就终结了,既不能对前代的经验加以吸取,又不能给后世留下什么可以效法的成就,破坏天地的元气,愚弄百姓的耳目,后人一定会笑话您、批评您,并为您痛惜感叹的呀。

从前,北魏刚刚占有代地,便开始参照使用汉法,到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就完全采用汉法进行统治,典章文物粲然可观,可与前代媲美,天下人至今还称颂他为贤君。王通撰著《元经》,就以北魏为正统,这是可以作为历史借鉴的。金朝从东北的一个小部族发展起来,所属军队当时只有几百人,渡过鸭绿江,攻占黄龙府,(完颜阿骨打)就即了帝位,建立了年号,完全采用辽朝和宋朝的制度,招纳两国的知名士人,让他们担任亲近而重要的官职,用以装饰和美化政治,号称“十学士”。到金世宗时期,与南宋订立盟约,国内外都没有大的事变,国家和平安宁,法制清明,风俗淳厚。真德秀称“金朝的典章法度成就在北魏之上”,天下人到现在还认为金世宗是一个贤君。燕京的老人们提及这位先皇的时候,还一定会流下眼泪,他的恩泽是如此深入人心,这也是您可以作为借鉴的。现在我们国家的土地比汉、唐还要广大,人民比汉、唐还要多,即使我们在政治上达不到汉唐盛世那样的水平,达到北魏、金朝的程度也是可以的。

【评析】

蒙古族是一个崛起于北方广袤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13世纪初,其社会发展形态还处于奴隶制阶段。与其凶猛剽悍的作战风格相适应,蒙古军对于所征服的地区往往采取野蛮的烧杀抢掠政策。在进军中原的初期,这一特点表现得十分突出。大量汉族人民惨遭屠杀,或者被蒙古贵族掳为私奴性质的“驱口”,土地大面积荒芜,或是被强占为牧场。这种做法虽然能在短期内掠夺到大量财富,但是,由于社会生产遭到破坏,统治者反而无法长期稳定地攫取财物。另一方面,政治的混乱使那些依附于蒙古贵族的军阀、官僚以及大商人、大地主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他们通过加重对百姓的盘剥掠取了巨额财富,而蒙古最高统治者却得不到多少实际利益。这种局面使得蒙古统治者逐渐意识到,抢夺土地和拥有人民同样重要,只有让汉族人保持原有的生产方式,发展社会经济,并建立起由中央政权有效控制的政治体制,才能保证蒙古最高统治者的长久利益。因此,从窝阔台时期开始,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设立“十路课税所”,委任官吏征税,并部分仿照汉族官制,设立了中书省。



忽必烈主管汉地以后,更多地听取汉族士大夫的意见,采取了一些安抚流民,发展生产的措施,社会秩序初步稳定下来。但是,由于纲纪不立,法制未备,蒙古贵族随便杀人抢掠的事情仍然时有发生。汉法的逐渐推行也遭到了一些蒙古贵族的强烈反对,其过程显得一波三折,耶律楚材仿照汉制的税收改革,就遭到了反对派的阻挠,以致耶律楚材“愤悒以死”。

元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宣布即大汗之位。虽然此时南宋未灭,国家尚未统一,但是,作为一个以汉族地区为主要统治区域的政权,以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建立统治制度无疑是一个立国的关键问题。郝经上《立政议》,就是要在这一问题上使忽必烈明确思路。这篇奏议写于他赴南宋议和的途中,足见他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

郝经明确主张实行“汉法”,所谓“汉法”就是历代中国封建王朝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一系列统治制度与方法,以及作为其根基的儒家思想和文化。具体而言,它包括了这样几个层面:一是建立起高度君主集权的健全的国家机构和职官制度;二是在经济上以农业为基础,实行重农政策;三是在文化观念上提倡以儒学为主体的汉族传统文化。郝经又提出,忽必烈政权的立国之法应该是“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典故,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成一王法”,也就是说,要在综合蒙古族、汉族统治方法以及辽金遗制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统治制度,使混乱的政治经济秩序走上正轨,安定社会和百姓。郝经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也是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的。在他看来,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和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是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吸纳中原王朝的制度文化以巩固统治而取得成功的两个例子,他希望忽必烈能够向这两个政权学习,成就一番功业。

应该说,行汉法是忽必烈身边一些汉族士大夫的共识。刘秉忠很早就向忽必烈提出建立朝省、树立法度、制定官制、整饬财赋等主张,忽必烈即位之初,他又“采祖宗旧典,参以古制之宜于今者,条列以闻”^①,对元朝开国制度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郝经之后,至元三年(1266年),名儒许衡上《时务五事》,其中第一件事即为“立国规模”,主要阐述“必如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宜也”^②。不过,元初最早对汉法问题有深入、集中论述的,郝经实为第一人。他的主张对元初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汉法作为元代政治制度的基本元

① 《元史·刘秉忠传》。

② 《元文类》卷十三。



素最终被确立下来,从而为忽必烈统一全国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也对元代的社会发展及多民族的融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郝经建议忽必烈行汉法的长远目的是通过“立政安民”来巩固元朝将来对全国的统治。但后来元朝恰恰对于“立政安民”问题解决得不好,一直采取民族歧视和高压政策,结果在没有严重外部安全威胁的情况下,却亡于内部安全危机——因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而爆发的农民大起义。这不能不使人感佩元朝开国时郝经等人的卓识。

第七章 明

处太平之世，不可忘战；
略荒裔之地，不如守边。

——明·朱元璋

（《明太祖实录》卷七十八）



概 述

明朝,自1368年至1644年,历时277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由汉族重新建立的一个统一王朝。综观明朝270余年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形势,以“北虏南倭”为代表的外部威胁一直不断。初期由于政治相对清明,国力强盛,最高统治集团的战略应对措施较为得宜,故而没有酿成大祸,并在多方面有所开拓。但后期随着朝政的日趋败坏,统治集团在国家安全战略举措上的屡屡失当,内忧外患交织加剧,最终还是走上了衰亡之路。

明太祖朱元璋亲身体验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威力,因此在开国以后,十分注重总结历史上治乱成败的经验教训,在怎样维护政权长治久安这个问题上煞费苦心,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治国思想,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进行了改革,建立起一系列制度,以巩固明王朝的统治。鉴于王朝建立之初,当务之急是恢复发展生产,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尽快稳定新的统治秩序,明太祖在制定内外军政方针大略时,大都以此为基本出发点。在国防战略和对外政策上,主要以防御为主;对内则确保稳定,在处理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上强调实行“刚柔并济”、“恩威兼施”的策略。从成效来看,明太祖所采取的一系列治国安邦的措施,起到了巩固明朝统治、稳定边疆和海疆的作用,其思想和制度也多为后来的明代历朝皇帝沿袭继承。然而这些治国方略和政策,有的带有明显的两面性,积极与消极因素并存,如为防御倭寇而实行海禁,带来很大的弊端;有的则被证明是失策,甚至完全错误,如分封诸子为王,造成日后“靖难”之变的战乱动荡。

明成祖时期,蒙古鞑靼、瓦剌部先后崛起,屡屡南下侵扰边关,对明朝的国家安全构成很大威胁。为解决边患,明成祖适时转换战略,先后五次亲征及派大将统军深入漠北,对蒙古诸部实施积极主动的进攻,在军事打击的同时进行政治上的招抚,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改善了北边的安全形势。但在对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举措上,明成祖同样存在着较大失误,最突出之处就是将边塞藩王内迁,及将北边重要卫所迁徙到内地,导致了前沿防线的空虚,埋下了隐患,使后来边防出现了非常被动的局面。此外连年北征也带来了国力



的极大损耗,为缓解经济压力而对百姓剥削的加重,引发了国内的反抗暴力活动,使得明朝在初期趋于稳定的内部,产生了新的危机。

继明成祖之后的仁宗、宣宗及时调整了内外政策,重新恢复了明太祖时期以防御为主的战略,与民休息,确保了政权的稳固。然而由于过于注重守成,在边防上采取消极防御的策略,继续放弃军事要地,致使北边防务大为削弱。尤其是将重镇开平卫(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内迁至独石堡(今河北赤城北独石口),更是战略决策上的一大失误。自此以后明朝北边险要尽失,边防形势愈加衰弱。

明宣宗之后,最高统治者逐渐荒嬉怠政,宦官相继专权,政治趋于紊乱,各种隐患和社会问题开始显露出来。土地兼并加剧,赋税徭役加重,导致农民大量逃亡,反抗起义增多,王朝内部变得危机四伏。一些较有远见的大臣注意到了这些危机产生的根源,建议统治者体恤民力、减轻对百姓的压迫剥削,以安邦固本,维护政权的稳定。

明朝在进入明世宗嘉靖时期(1522~1566年),吏治日趋腐败,军事积弱,卫所制度败坏,边海防废弛。长期困扰明廷的北部边防危机,东南沿海倭寇猖獗造成的海防危机,加上日益窘促的财政危机,形成了总爆发,使明朝在国家安全上一度面临前所未有的极度危险境地。为解决严重的边海防危机,统治集团内部的有识之士从不同思考角度提出了各种办法和措施,其中不乏标本兼治、立高见远的良策,并在被程度不同地采纳付诸实施后,收到了显效。倭患问题在嘉靖末年得到了解决,而自明朝建国起就存在的北部边患问题,到了隆庆年间(1567~1572年)也基本得到了解决。

在经历万历初年张居正短暂的改革自救后,明朝的统治危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然而张居正死后遭清算,改革被罢除,自此统治集团更加骄奢淫逸,腐朽透顶,很快陷入新的危机之中。而万历中期的援朝抗倭战争,则将明政府政治、军事决策机制上的低能暴露无遗。明朝君臣虽然能从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出发,出兵援救朝鲜,但意志和决心一直不够坚定,在战与和的重大战略方针问题上摇摆不定,战争指导一再失误,致使战争迁延日久,最终付出很大代价才取得了胜利。援朝抗倭加上平定国内叛乱的战争将明朝的国力几乎消耗殆尽,衰颓之势日益加深而不可复振,对于后来东北地区后金政权的崛起以及明末遍及各地的农民大起义,已是无力阻挡。



明太祖论御边之道

题引：明太祖，即朱元璋（1328～1398年），字国瑞，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人，元末参加红巾军，后逐次削平各地割据势力，称帝建立明朝。在将蒙古贵族驱逐出中原之后，朱元璋对于北部边防主张以守御为主，并以此多次诫谕边将。本篇选自《明太祖实录》卷七十八洪武六年正月壬子条。

【原文】

壬子^①，命魏国公徐达、曹国公李文忠等往山西、北平^②练兵防边。上谕之曰：“处太平之世，不可忘战；略荒裔之地，不如守边。朕同卿等起布衣^③，削群雄，定祸乱，统一中夏^④，勤劳累岁，至此无事，可以少休。然念向者创业之难及思古人安虑危之戒，终不敢自宁。山西、北平与胡地相接，犬羊之群^⑤变诈百出，仓卒有警，边地即不宁矣，卿等岂能独安乎？今无事之时，正宜往彼练习军士，修葺城池，严为备守。使边境永安，百姓乐业，朝廷无西北之忧，卿等亦可忘怀高枕矣。”……上复戒之曰：“御边之道，固当示以威武，尤必守以持重。来则御之，去则勿追，斯为上策。若专务穷兵，朕所不取，卿等慎之。”

① 壬子：即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初十。中国古代以天干地支搭配纪年、月、日、时，六十个组成一个循环，反复使用。

② 北平：今北京。明初改元大都路为北平府，不久又改为北平布政使司驻地，明成祖即位后始改称北京。

③ 布衣：布制的衣服。借指平民百姓。《史记·李斯列传》：“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

④ 中夏：华夏，中国。《后汉书·班固传下》：“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棱。”

⑤ 犬羊之群：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借指和蔑称。意即其以畜牧犬羊为生及与犬羊为伍。东汉应劭《鲜卑胡市议》：“鲜卑隔在漠北，犬羊为群”。《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一《唐纪四十七》德宗兴元元年：“不宜尚眷眷于犬羊之群，以失将士之情也。”

【译文】

(洪武六年正月)初十,(明太祖)命魏国公徐达、曹国公李文忠等前往山西、北平训练兵士、防守边疆。告诉他们说:“身处太平时代,不能忘记战争(危险);攻略边远荒凉的地方,不如防御好边疆。我同你们都是出身普通平民,消灭雄霸各地的势力,平定战乱,统一了全国,辛苦操劳很多年,到现在天下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稍微休息了。然而想到以前创业的艰难和古人居安思危的警示,终究不敢心安。山西、北平同北方异族的聚居地接壤,这些胡人狡诈善变,一旦有紧急警报传来,边境就不得宁静了,你们又怎能独自安稳呢?现在没有事故的时候,正应当前往那里训练军士,修缮城池,严加防备守卫。从而使边境永远安宁,百姓安居乐业,朝廷没有西北方面的忧患,你们也可以放心睡大觉了。”……(明太祖)又告诫说:“守御边疆的方法,固然应当示之以武力威慑,但更必须谨慎稳妥地防守。(敌人)来进犯就抵御,退走了就不要穷追,这是高明上等的策略。至于一心非要穷追到底,是我所不愿选择的,你们对此千万要慎重。”

【评析】

元朝覆亡后,退回到漠北草原的蒙古贵族仍然拥有较为强大的军事实力,“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①,并且不甘心失败,时刻图谋卷土重来。为消除蒙古的威胁,明太祖朱元璋从洪武三年(1370年)开始,先后数次派军大举北征讨伐,虽然取得了很大胜利,给北元政权以沉重打击,但明军自身也蒙受不少损失。经此之后,明太祖开始转变战略,对蒙古残余势力采取总体防御性的战略方针。

从当时的历史形势来看,明太祖这么做是十分正确的,也是惟一可行的选择。因为一方面漠北之地广袤荒远,蒙古贵族在此统治基础极深,回旋余地很大,缺乏战马的明军并不具备深入其境与对手进行大规模骑兵作战的能力;另一方面对初立的明王朝政权而言,尚面临着迅速稳定统治秩序、恢复因战乱而残破不堪的经济和发展生产的迫切任务。如果一味诉诸武力,单纯靠军事进攻手段来解决北部边防问题,不仅短时期内难以奏效,势必还会加重民众负担,延滞影响社会经济重建的步伐。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明太祖才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故元遗兵》。



对边防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确立了战略防御的方针,这也成为后来明代历朝皇帝在北部边防政策上一直遵循的基本指针。

明太祖的战略防御方针,其前提和基础是“严为备守”,即首先大力加强防务,确保边防的巩固,维护北方边境的安全。根本和核心原则就是“来则御之,去则勿追”,即扬长避短,以逸待劳,凭借稳固的防守击退来犯之敌,而不劳师动众,穷追不舍。具体防御措施则是在边地沿辽东、大宁(今内蒙古宁城西)、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到嘉峪关一线遍置都司卫所,修筑城池,屯驻重兵;同时分封秦、晋、燕、代、肃、辽、宁等诸王镇守边塞要害之地,使北部防线连为一体,形成抵御蒙古的坚实屏障。在诸王没有全部就藩之前,代之以派遣功臣武将每年春、秋定期巡边的制度。每次巡边之前,明太祖都要对接受任务的将领谆谆告诫,再三强调防御政策的重要性,要求务必常存戒心,严加守备。洪武九年正月,他在给奉命赴延安防边的中山侯汤和、颍川侯傅友德等人的敕谕中说:“自古重于边防,边境安则中国无事,四夷可以坐制”,“至边上常存戒心,虽不见敌,常若临敌,则不致有失矣”^①。这种高度重视边防的思想在中国历代帝王君主中也是不多见的,充分反映了朱元璋的雄才大略和深谋远虑。

明太祖在边防政策上虽然强调以守为主,但却不是死守,更不是只守不攻。他的防御战略,并非仅仅是为了防御,而是一种积极性质的。根本目的还在于积蓄力量,伺机进攻,最终消灭北元蒙古势力,彻底解决这个威胁明朝国家安全的心腹大患。因此,他在整体防御性的态势下,也不放弃抓住有利战机,主动出击歼敌。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派蓝玉率军15万大举进攻北元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这次军事打击,给蒙古势力以重创,从此北元政权急剧衰落,很快便分崩离析。蒙古的纷争内耗,使得明朝在北部边防的军事压力大大减轻。从实际效果来看,明太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思想,为恢复发展经济争取到了相对和平的环境,对稳定边疆、巩固明朝统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三,洪武九年正月。

明太祖论安近来远

题引：明太祖建国后，在对待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上，主张“安近以来远”，行“威惠并行”之策，强调着重在“恩抚”上下功夫。本篇选自《明太祖宝训》卷六。

【原文】

洪武十八年六月甲午，广西都司^①言：“频年猺^②寇窃发，皆因居近溪洞之民^③与之相通，诱引为患。请先捕戮此辈，庶绝其党。”太祖曰：“溪洞之民引诱猺獠^④为寇，此诚有之。然其间岂无良辈？若一概捕戮，恐及无辜。大抵驭蛮夷之道，惟当安近以来远，不可因恶以累善。非实有左验，不宜捕戮。”

……

七月^⑤，是月，有御史^⑥自广西还，进《平蛮六策》，内有曰立威。太祖览毕，谕之曰：“汝策甚善，但立威之说亦有偏耳。夫中国^⑦之于蛮夷，在制驭之何如。盖蛮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怀。然一于威则不能感其心，一于惠不能慑

① 都司：都指挥使司的简称。明代在各省设都指挥使司，掌管一省之军政，与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合称“三司”。长官为都指挥使，下设都指挥同知、都指挥僉事等官。

② 猺：即“瑶”。居住在广西等地的瑶族在隋唐时期被称为“莫徭”，宋以后一般称“徭”，明代多称为“瑶”。

③ 溪洞之民：中国隋唐以后中央王朝对居住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等沅水上游地所谓“五溪蛮”的统称，有时亦称为僚、苗、僮等，实际上是对侗、苗、土家等少数民族的混同杂称。

④ 獠：即“僚”。明代统治者对西南一些少数民族的统称。

⑤ 七月：这里承接省去的上文，指洪武七年（1374年）七月。

⑥ 御史：指监察御史。明初袭前制在中央置御史台作为最高监察机构，设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监察御史等官。后改置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分派各省纠察地方官吏。

⑦ 中国：此处指中央政权。



其暴。惟威惠并行,此驭蛮夷之道也。古人有言:以怀德畏威为强。政^①以此耳。”

【译文】

洪武十八年六月初四,广西都指挥使司报告说:“瑶民连年暗中作乱,都是因为居住在附近的溪洞之民和他们交接往来,勾引其制造祸患的缘故。请首先捕杀这些人,也许可以断绝其党羽。”(明)太祖说:“溪洞之民引诱瑶民等为盗寇,确实有这样的事。可是他们中间难道就没有良民吗?如果(不分清楚)一律捕杀,恐怕会殃及无辜的人。驾驭统治蛮夷民族的方法,大体上在于应当安抚近处的以招徕远处的,不能因为(他们当中)有了为恶的人而连累那些良善的人。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为寇),不应该捕杀。”

……

(洪武七年)七月,这个月,有御史从广西回朝,呈进《平蛮六策》,其中有说要“立威”。太祖看完,告诉他说:“你的建议很好,但是立威的说法也有偏颇。中央朝廷对蛮夷,(关键)在于怎样控制驾驭。对蛮夷不用威力就不能使其畏惧害怕,不施行恩惠就不能使其感念归附。然而(如果)只用威力就不能够感化其心,只行恩惠就不能够震慑住其暴行。恩威并施,这才是驾驭统治蛮夷的方法。古人说过:能够使人感念恩德而又畏惧武力威慑才是真正的强大。原因正在于此啊。”

【评析】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问题一直是历朝历代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民族关系处理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甚至生死存亡。在中国历史上由于民族问题没解决好,导致国家衰亡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元朝。元朝实行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使得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成为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的重要诱因。

投身元末农民大起义洪流,并最终推翻元朝统治的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下层普通农民,幼时贫困多难,对元代残酷的民族压迫有过切身的体验,因此在建国之后,对如何处理民族关系才有利于政权稳固,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认识比较深刻,在民族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方针和具体措施,也比较开明

^① 政:通“正”。

可取。其治理边疆少数民族的一个总的思想,可以概括为“刚柔并济”、“恩威兼施”。尤其在对待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上,更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在他看来,对少数民族如果只用武力就不能使其感化,但只施行恩惠又不能使其畏服。只有恩威并施,才是好办法。这种思想是我国历代帝王治理边疆少数民族的传统思想,明太祖比较全面地进行了贯彻施行,而且,“刚柔并济”、“恩威兼施”,在具体实施上更侧重于“柔”和“恩”,更多地怀柔和恩抚上下功夫,以恩惠仁德使其心悦诚服,欣然归顺。一方面,尊重这些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和行政组织形式,不强加改变,因其俗而治之。承认和保留各族首领及上层人物的政治、经济特权,在当地沿用元朝的土司制度,设置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土判官等官职,由各族头人世袭,通过他们实现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和控制;另一方面,对反对和不服从明朝统治的土司及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示之以“威”,进行武力威慑和镇压。但在使用“威”的手段时,明太祖又主张慎重对待,调查核实,区分情况,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不分首恶胁从一概加以捕杀,以免连累无辜激化矛盾。总体上还是要坚持恩抚的手段为主,必要时使用武力为辅,以分化瓦解少数死硬之敌,安抚笼络大多数人心。

明太祖处理边疆少数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方针,被后来的明成祖及明代历朝皇帝基本继承,并且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尽管有明一代也存在着统治阶级歧视、分化、限制乃至压迫少数民族的现象,少数民族首领及上层贵族亦不乏反叛起事之举,但总的来说明朝的民族矛盾较元朝大大趋于缓和,周边地区大体上也比较安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较大的开发,各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加强,在此基础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应当说,这是与明朝民族政策的有利影响是分不开的。



明太祖申海禁策

题引:明朝立国后不久,明太祖为防备倭寇骚扰入侵,实行海禁政策,以维护沿海地区安全。随着事态发展,海禁令也越来越趋于严厉。本篇选自《明太祖实录》卷七十洪武四年十二月乙未条。

【原文】

乙未,上谕大都督府臣曰:“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近闻福建兴化卫^①指挥^②李兴、李春私遣人出海行贾,则滨海军卫岂无知彼所为者乎?苟不禁戒,则人皆惑利而陷于刑宪矣。尔其遣人谕之,有犯者,论如律。”

【译文】

(洪武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明太祖)皇帝告诉大都督府官员说:“因为海路能够交接外国的缘故,所以我曾禁止与其来往。最近我听说福建兴化卫指挥李兴、李春私自派人出海经商,沿海卫所难道就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吗?如果不加以禁止管制,那么人人都会沉迷于(经商带来的)金钱利益而陷自己于法律(制裁)之中。你们派人去告诉那些卫所,有触犯(海禁规定)的人,按律令定罪。”

【评析】

明朝一建国,就史无前例地面临着外敌从海上入侵的形势。由日本武士、浪人和商人组成的海盗集团——倭寇在元末割据势力张士诚、方国珍等部余党的勾引下,屡次侵扰中国沿海一带,杀伤居民,劫夺财物。明太祖本着

① 兴化卫:明初置,属福建都司,治今福建莆田。

② 指挥:官名。明代在全国各要害之地设置卫指挥使司,简称卫,由都司或行都司率领,隶属中央五军都督府。约五千六百人为一卫,防地包括一府或者数府,长官称指挥使,下设指挥同知、指挥佥事等。卫下设千户所和百户所。卫所是明代军队的基层组织。



对外实行防御自卫和睦邻友好政策的思想,多次派遣使者出使日本,谋求与对方建立友好关系,试图以外交手段解决倭寇问题,但始终没能达到目的。于是转而决定实行海禁,禁止沿海居民出海,禁止私通外国。并且随着倭寇入侵的有增无减,这种禁令到洪武十四年(1381年)之后变得越来越严。凡民间从事海上买卖贸易,甚至使用外国货,一律在严禁之列。

应当说,明太祖实行海禁政策,其中有利也有弊。断绝倭寇的接济之源,切断海外未靖势力同沿海居民的联系,对于防止倭寇入侵,保障沿海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确实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为了断绝倭寇内应接援,实施海禁,却连带一起禁止渔民出海捕鱼,禁止正常的民间海上贸易,这就断绝了沿海普通百姓的生活来源和出路,使得宋元以来发达的民间海外贸易遭受到了打击,阻滞了沿海经济的发展。因噎废食,弊端显然也是比较大的。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与经济严重不适应的弊端越来越凸显出来,成为导致社会变乱不安的诱因。海禁不仅没有达到当初防倭的目的,反而由于海防的逐渐废弛而导致倭患愈演愈烈。更为严重的是,海禁政策被明太祖加以规定成为制度后,一直被以后的明代历朝皇帝尊为圭臬,将之视为一成不变的“祖宗之法”,虽然在明成祖时期稍有松动,但总体来说还是执行海禁政策。这种情况直到中后期的明穆宗隆庆年间,才有了较大的改变。但是海禁意识已经根深蒂固,这对后来清代也产生了消极不利的影响。清代的闭关锁国政策,追根溯源,是与明代的海禁政策有一定关系的。

叶伯巨谏分封太侈

题引：叶伯巨，字居升，浙江宁海人。元末即有文名，明初以通经学入国子监学习，后授山西平遥县学训导。洪武九年（1376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求言，叶伯巨上书言三事之弊端，尤其针对分封诸王太侈，极力指陈其害。本篇节选自《明经世文编》卷八《叶居升奏疏·方言书》（参见《明史·叶伯巨传》）。

【原文】

《传》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①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所以强干弱枝，以遏乱原而崇治本也。国家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以树藩屏，以复古制，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也。然而秦、晋、燕、齐、梁、楚、吴、闽诸国^②各尽其地，而封之都城宫室之制，广狭大小亚于天子之都，赐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③。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起其怨，如汉之七国、晋之诸王^④。否则恃险争衡，否则拥众入朝，甚则缘间而起，防之无及也。

① 《传》：指《左传》。都：都邑，即诸侯国中建有宗庙的城邑。城：城墙。雉：古代度量单位，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国：指诸侯国的国家、国都。先王之制：这里指西周的制度。这句话出自《左传·隐公元年》。

② 明初分封诸王中并没有梁王和闽王，参《明史·叶伯巨传》，“闽”处为“蜀”，实际上蜀王直至洪武十一年才分封，因此两书所载皆有误。

③ 尾大不掉：下级和部属势力强大膨胀，不听从指挥和调度，难以控制和驾驭。《左传·昭公十一年》：“末大必折，尾大不掉。”

④ 汉之七国：指西汉景帝时发动七国之乱的吴、楚、赵、济南、淄川、胶西、胶东王等宗室。晋之诸王：指西晋八王之乱中的汝南、楚、赵、齐、长沙、成都、河间、东海王等宗室。

【译文】

《左传》上说：“诸侯国中国都下面都邑的城墙超过一百雉，就会对国都（家）产生危害。按照西周的制度，诸侯国中大的都邑，不得超过该国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得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能超过九分之一。”（这样就）使上下具有不同的等级层次和各自的规定制度。上对下能够兼并控制，而下对上却不能够兼控。这样做有利于强干（中央权力）弱枝（地方势力），是用来遏止祸乱源头而注重推崇治国之本的好办法。国家之所以把国土分封给诸王，使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封地，以此来树立屏藩，恢复古代的制度，原因是防止（出现）宋、元两代宗室势力弱小，（从而导致）中央孤立无助（这种）弊端。然而这么做，秦、晋、燕、齐、梁、楚、吴、闽诸王各自完全占有其所在地区，而封给他们的都城以及所定的王府官室制度，其规模大小仅次于皇帝的都城，又被赐予数量可观的护卫军兵。我担心几代过后就会形成势力很强大、很难驾驭和控制的局面。之后要削夺他们的兵权和封地，会激起怨恨，就像汉代七国之乱和西晋八王之乱的那些宗室一样。即使不削夺他们的兵权和封地，他们也会要么依恃险要分庭抗礼，要么率领部众入京把持朝政，甚至会乘隙发动叛乱，到那时再防备是来不及的。

【评析】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在总结前代兴亡的经验教训时，认为宋、元两朝的覆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干强枝弱，中央缺少地方的有力屏藩。因此，他决定重新拾起古代的分封制度，把自己的子孙都派到各地做藩王，冀望通过家族的力量来拱卫朱氏家天下，维护政权的长治久安。第一次分封在洪武三年（1370年），共封了秦、晋、燕、吴、楚、齐、潭、赵、鲁、靖江十王，并定王府官制，设置大宗正院，掌管藩王事务。此后于洪武十一年、二十四年，又分两次分封了十五王。这些藩王被分封到全国各要害之地，不仅享有丰厚的岁禄，而且被赋予很高的政治地位和军事指挥大权。诸王“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优而拜谒，无敢钧礼”；皆设王府护卫都指挥使司，每王府设三护卫，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并且可以指挥当地卫所的守镇兵。尤其是几个分封在北部边塞用来抵御北元蒙古势力侵扰的所谓



“塞王”，更是手握重兵，如大宁的宁王，拥有“带甲八万，革车六千”，其麾下有几良哈三卫的蒙古骑兵，十分骁勇。晋、燕二王“尤被重寄，数命将兵出塞”^①，一些元勋宿将，也要受其节制。明太祖甚至还在《皇明祖训》中，赋予了亲王更高的“清君侧”的权力：“朝无正臣，内有奸恶，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亲王统领镇兵讨平之。”

明太祖借鉴历史教训，企图纠正前代王朝在国家安全战略上的失误，可谓煞费苦心。但用分封制这种办法来“夹辅王室”，未免又矫枉过正。所封藩王名义上和原则上是“列爵而不临民，分土而不任事”，然而事实上的职权却远远超过了制度规定的范围，这就埋下了隐患。一旦诸王势力膨胀，不听号令，势必对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如果再时移世易，政局有变，很容易导致变乱陡生。

关于分封制的弊端和危害，自汉代以来就不断有人指出来。西汉初年，针对众诸侯王势力日盛，渐成尾大不掉之势，贾谊就曾向汉文帝建议众建诸侯，予以削弱。景帝时采取晁错之策削藩，虽然导致了“七国之乱”，但叛乱平定后，朝廷将地方军政大权收归中央，其后又通过施行推恩令等办法，陆续削减诸侯王权力和封地，使分封制变得有名无实，从而得以完全控制地方势力，保证和维护了中央集权（参见本书第三章贾谊《治安策》、晁错论削藩、主父偃请行推恩法等篇）。到了西晋武帝时，又再次大封宗室，授予诸王重权，结果重蹈汉初覆辙，酿成“八王之乱”，少数民族和各地流民乘机而起，很快倾覆了西晋政权（参见本书第四章刘颂《陈封国之制》）。叶伯巨的上书，也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但他的看法却与明太祖正好相反。他担心分封不按周时古制，藩王权力过重，像汉、晋之初那样，日后难以驾控而生乱，因此提醒明太祖要注意限制诸王都城宫室的規制，减其护卫和封地，以强干弱枝，从而达到屏藩皇室、保障国家长久安定的目的。

可是，叶伯巨的这篇奏疏非但没有引起明太祖的重视，反而使其大怒，认为他是离间自己和诸王间的骨肉之情。叶伯巨被逮到京师南京，后来囚死在狱中。晚年的明太祖对诸王权势渐重的情况也有所警觉，尤其是对常年统兵北边、勇略过人的燕王朱棣曾表示过忧虑，临死前专门告诫要小心提防。然而此时燕王羽翼已丰，形势已很难逆转。明太祖死后仅仅一年，围绕削藩问题明朝统治集团内部爆发了尖锐矛盾，燕王朱棣援引《祖训》借口“清君侧”，

^① 《明史·诸王传》。



举兵“靖难”，从继立的建文帝手中夺取了帝位。虽然皇权只是在朱氏家族内部实行了更替，没有产生更严重的后果，但战争却给新建不久的国家带来社会动荡，从元末战乱中尚未完全恢复过来的经济生产又遭受破坏。这是明太祖始料未及的，也是与其当初分封诸王的初衷和愿望背道而驰的。



明成祖《北征诏》(节选)

题引:明成祖(初谥太宗),即朱棣(1360~1424年),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初封燕王,镇守北平(今北京),太祖死后举兵“靖难”,夺取帝位。永乐八年(1410年)初,针对蒙古鞑靼等部不断袭扰边境,明成祖决定亲征,出征前发布讨伐诏书。全文见《明太宗实录》卷一〇一永乐八年二月辛丑条。

【原文】

朕受天命,承太祖高^①皇帝洪基,统驭万方^②,抚辑庶类。凡四夷僻远,靡不从化。独北虏残孽处于荒裔,肆逞凶暴,屡遣使申谕,辄拘留杀之。乃者其人钞^③边,边将获之,再遣使护还,使者复被拘杀。恩既数背,德岂可怀?况豺狼野心,贪悍猾贼,虐噬其众,引领徯苏。稽于天道则其运已绝,验于人事则彼众皆离。朕今亲率六师^④往征之,肃振武威,用彰天讨。

【译文】

我受命于上天,接替太祖皇帝的宏伟基业,统治天下,安抚治理万物和百姓。凡是四方偏远的民族,没有不顺从教化的。唯独北方(蒙古)胡虏的残余势力,处在荒凉偏僻的地方,肆意施展凶恶和残暴,屡次派遣使者去开导晓示(归附),总是将其扣留杀害。往日他们的人掠夺边境,守边的将领将这些人俘获,再派使者护送回去,使者又被拘留杀害。(对他们的)恩德已经数次遭到背弃,怎么还能(指望)使其感怀呢?何况(他们)具有豺狼那样的野性,贪婪凶悍狡猾狠毒,残害吞并其部属,伸着脖子等待着复苏(的机会)。从天道

① 高:明太祖朱元璋的谥号。

② 万方:万邦,各方诸侯。《尚书·汤诰》:“诞告万方。”这里引申为指全国各地区。

③ 钞:同“抄”,抢掠的意思。

④ 六师:天子所率的军队。《谷梁传·襄公十一年》:“古者天子六师。”西周由周天子直接统辖、屯驻拱卫西土王畿的军队称为宗周六师或西六师。



法则来考察,那么他们的命运已经到头了,以人为之事来校验,那么他们的部众都背离散去。我现在亲自统率军队前往征讨他们,以军事威力扫清震慑,来表明(这是)上天(予以)的讨伐。

【评析】

占据漠北的蒙古残余势力,从明朝建国以来就一直是明朝的心腹大患。明太祖朱元璋曾动用数十万的兵力,发动了多次打击,仍没能彻底将其消灭。最后不得不采取防御为主的战略方针,对蒙古采取守势。不久,北元蒙古政权爆发内讧,分裂形成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势力。北元皇帝事实上已沦为虚空的名号,且屡屡为部帅所弑杀。建文三年(1401年),鬼立赤杀北元皇帝坤帖木儿自立为可汗,废北元国号,称鞑靼,自此三部完全分裂,各自为政。

永乐元年(1403年),即明成祖朱棣即帝位的当年,太师阿鲁台杀鬼立赤,立可汗本雅失里,企图一统蒙古与明朝抗衡。明成祖起初试图使用怀柔手段进行招抚,但派去通好的使节被杀害。招抚失败后,明成祖于是决定诉诸武力,于永乐七年秋派遣淇国公丘福等率精骑10万北征鞑靼。但鲁莽无谋的丘福孤军冒进,在胘胸河(今克鲁伦河)陷入重围,全军覆没。明成祖闻讯极为震怒,于是决定御驾亲征。从永乐八年到二十二年的15年内,明成祖先后五次亲自统率大军出塞,对蒙古各部进行打击。其中四次以鞑靼和兀良哈为对象,一次以瓦剌为对象。

明成祖一改明太祖和建文帝时期的战略防御态势,对蒙古发动战略进攻,一方面是当时客观的历史形势使然,另一方面也与其性格大有关系。永乐初年,蒙古鞑靼、瓦剌等部军力强盛,其首领阿鲁台、马哈木等野心甚大,谋求恢复元朝的统治,屡屡袭扰边境,对明朝北部边防构成较大威胁。在怀柔政策无效的情况下,非武力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不用军事手段已经难以确保边疆的安定和明朝统治的稳固。另外,蒙古诸部的分裂也为军事上的各个击破提供了可能。明成祖敏锐洞察这一情势,及时转换战略,主动出击,长驱直入漠北歼敌,通过多次亲征,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在明太祖朱元璋二十多个儿子中,第四子朱棣最似乃父风范。他自幼习练武事,勇略兼备,早年为塞王之首分封镇守北平,即多次率军出塞打击蒙古势力。后起兵夺取帝位,即位后的诸般文治武功措施都堪称具有开拓进取性。近人孟森曾就明成祖北征称赞说:“五征漠北,皆亲历行阵,假使建文承



袭祖业,必不能有此。”^①评价是很有道理的。明成祖的五次亲征,虽然未能完全解除北部边防的威胁,但给敌以极大震慑,削弱了蒙古各部的势力,遏制了其入侵骚扰,维护了国家安全,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不过,也应当看到,明成祖以皇帝身份亲自统兵作战,前后五次调遣动用数十万军队大规模出塞远征,除前三次取得的战功尚可外,后两次出击均因为鞑靼避而不战而无功而返,白白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既劳民伤财又有点得不偿失。明成祖本人也在最后一次出击漠北的回师途中病死。当时的大臣夏原吉就曾痛心地指出说:“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②。后来的明宣宗朱瞻基也曾批评乃祖这种好大喜功、只靠个人英武,过分使用武力的行为。

频繁大规模的用兵,给刚刚经历“靖难”之役尚处在恢复之中的国家经济平添了压力,增加了百姓的负担。永乐末年,山东爆发了唐赛儿起义,山西、河北甚至一向号称富庶的江南等地都出现了大批流民和“盗贼”,可以说就是这种负面影响直接导致的后果之一。

这也给当今我们一种警示:在运用军事手段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敌对势力时,必须合理适当,要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和范围之内。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既要善于抓住有利时机,全力以赴达成目的,又要充分考虑到由此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理智有节,不能随意放任,否则事情就会走向反面,背离正确的轨道,对国家的整体安全造成损害。

^① 《明清史讲义》第二编第二章《靖难》。

^② 《明史·夏原吉传》。



诸臣议请明成祖迁都

题引:明成祖即位后,即开始酝酿迁都北京,为此多次召集文武群臣商议。永乐十四年(1416年),诸臣上疏以北京地理位置及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表示赞同迁都于此。本篇选自《明太宗实录》卷一八二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壬寅条。

【原文】

上以营建事重,恐民力不堪,乃命文武群臣复议之。于是公、侯、伯、五军都督及在京都指挥等官上疏曰:“臣等切惟北京河山巩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朴,物产丰富,诚天府之国,帝王之都也。……”六部^①、都察院^②、大理寺^③、通政司^④、太常寺^⑤等衙门尚书、都御史等官复上疏曰:“伏惟北京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

【译文】

(明成祖)皇帝因为建造(北京皇官)之事繁重,恐怕百姓无力承受,于是

① 六部:隋唐以后对中央行政机构吏、户、礼、兵、刑、工各部的总称。六部初属尚书省,至元代改属中书省。明初承元制,后废除中书省丞相制度,政务分归六部,六部尚书各自独立对皇帝负责,地位比前代大大提高。

② 都察院:官署名。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御史台置,掌纠劾百官,辨明冤枉,巡按地方等监察情事。设左、右都御史各一人,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左、右僉都御史各二人。清代沿置,设官略有不同。

③ 大理寺:官署名。始置于北齐,为国家最高审判机构。明代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掌复审平反刑狱事,长官为大理寺卿。

④ 通政司:明洪武十年(1377年)置通政使司,通常省称为通政司。掌受内外章疏臣民密封申诉之事,长官为通政使。清代沿置。

⑤ 太常寺:官署名。始置于北齐,掌陵庙祭祀礼乐之事,明清沿置,长官为太常卿。



命令文武众大臣再讨论此事。这时公、侯、伯、五军都督府的都督以及在京城
的都指挥等官员进呈奏疏说：“我们深切认为北京山河（之势）坚固，水质甘
甜，土壤肥厚，民风淳朴，物产丰富，的确是天府之国、帝王的首都。……”六
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太常寺等衙门尚书、都御史等官员又上疏说：“北
京是皇上兴起的地方，北面枕靠居庸关，西面耸立着太行山，东面连接山海
关，南面俯瞰着中原，肥沃的土地有千里（之多），山川的地理形势优越有利，
完全可以做到控制四方外族，统治整个天下，确实是帝王世世代代（永保基
业）的国都。……”

【评析】

明成祖迁都北京，是明初乃至明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迁都北京奠定了后来整个明代历史的基石，书写了全新的篇章，意义十分深远。

北迁都城早在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就有此意。当时虽然以应天（今南京）为京师，但明太祖认为以南京为都城的历朝都是气数不久，地理位置上又偏处江左，作为国都不甚理想，因此一直有北迁都城的想法。后来他曾派太子朱标巡视河洛和关中，考察两地地形。只是不久因为朱标病死，加之他自己也已年老，迁都之事遂被搁置。明成祖一取得帝位，就将自己当年就封的燕王藩都北平宣布为北京，之后更是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升北京的政治地位，开始为迁都做准备。先后设立北京行在六部、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北京国子监，罢北平布政使司，改顺天知府为府尹。永乐四年（1406年），又命营建北京宫殿。永乐七年后，明成祖多次北巡，坐镇北京，而以太子监国南京，天下奏章都要送往北京行在所，使整个国家的决策、军事和行政系统逐渐北移。这时的北京已经成为实际的政治中心。永乐十四年，明成祖再次下诏营建北京宫殿，并集合文武群臣商议迁都之事。诸臣大都赞同迁都，于是在永乐十八年北京宫殿落成之后，明成祖下令以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

明成祖在国家建立没多久就进行国都的大迁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但他有自己的考虑，事实上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等官员的上疏中，已经清楚说明了他迁都的本意。这就是：（一）北京是他的“龙兴之地”。北京既是其发迹的福地，也是其控制全国政局的基地，政治实力所在是他决定迁都的首要因素。（二）北京“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从地理位置来看，北京北靠居庸关，西峙太行山，东接山海关，南瞰中原，既有高山河海之阻，又



有连通中原之便,土壤肥沃,物产丰饶,完全符合作为都城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当时对明朝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主要是仍然图谋兴复的北方蒙古势力,而北京紧邻着漠北蒙古各部,塞外就是其势力活动范围。迁都北京,在临近隐患策源地建立全国政治中心,有利于指挥调度,灵活反应,及时制止祸乱,巩固明朝基业。

另外,北京作为金、元两朝的国都也已历经 200 余年,尤其是元朝定都于此(当时称大都),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将漠北与中原地区统一联系在一起,对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明成祖迁都北京,正是继续推进这一进程,肯定了北京作为全国统治中心的地位。这样不仅可以统治中原和南方地区,而且还便于对辽阔的北方边疆开拓进取,将包括黑龙江、贝加尔湖、阿尔泰山一线的广大地区都纳入控制范围之内。正如时人所评论的那样:“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虏而远棹东南。”^①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成祖迁都北京,的确是具有长远政治眼光的战略举措,不愧为一代雄主。

^① 明·陈霆:《两山墨谈》卷十八。



史家论明宣宗内迁开平卫

题引：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明朝将军事要地开平卫(治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内迁至独石堡(今河北赤城北独石口)，给北部边防带来极大危害。本篇选自《明通鉴》卷二十宣宗章皇帝宣德五年。

【原文】

是月^①，迁开平卫于独石。初，洪武三年，李文忠克元上都，设开平卫守之，置八驿，东四驿曰凉亭、泥河、赛峰、黄厓，接大宁^②古北口；西四驿曰桓州、威虏、明安、隔宁，接独石。文皇^③四出塞，皆道开平、兴和^④、万全间，尝曰：“灭此残寇，惟守开平，则兴和、大宁、辽东、甘肃、宁夏边圉，永无虞矣。”已，弃大宁界三卫^⑤，而兴和亦废，开平失援。至是以北寇数犯开平，乃置独石堡，徙开平卫治之。自此蹙地三百里，尽失龙冈^⑥、滦河之险，而边地益虚矣。

【译文】

(宣德五年六月)这个月，将开平卫迁徙至独石。当初，洪武三年，李文忠

① 是月：即宣德五年六月。

② 大宁：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名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在此地置大宁卫，同年又置大宁都司治此，辖境相当今河北长城以北、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以南地区。不久改称北平行都司，永乐元年(1403年)复旧称，徙治保定。

③ 文皇：指明成祖。“文”是其死后的谥号。

④ 兴和：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所置的千户所。治今河北张北，属北平行都司。后直隶后军都督府，永乐二十年(1422年)徙治宣府(今河北宣化)。

⑤ 三卫：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在蒙古兀良哈部驻地置朵颜(今内蒙古绰尔河上游一带)、福余(今黑龙江齐齐哈尔附近)、泰宁(今吉林洮南附近)三卫，合称为朵颜三卫，又称兀良哈三卫。

⑥ 龙冈：又名卧龙山，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



攻克元朝上都,置开平卫在此守御,设了八个驿站,东面四个驿站叫凉亭、泥河、赛峰、黄厓,连接大宁都司的古北口;西面四个驿站叫桓州、威虏、明安、隰宁,连接独石。(明)成祖四次出塞北征,都取道开平、兴和、万全之间,(他)曾经说:“消灭这些(蒙古)残余敌寇,只要守住开平,那么兴和、大宁、辽东、甘肃、宁夏边境,就可以永远没有忧患了。”(设置开平卫及八驿站)不久之后,(明成祖)放弃大宁给予兀良哈三卫,而兴和所也废弃,开平卫失去了支援。到了这时北面的(蒙古)虏寇多次进犯开平,于是修建了独石堡,迁移开平卫为治。从此边地缩减了三百里,龙冈山和滦河的险要地势全部丧失,(北部)边境地区更加空虚了。

【评析】

明宣宗时期放弃军事重地开平卫,是在国家安全战略上的一个重大失策。明初李文忠攻克元上都后,明太祖在此置开平卫,是有其战略考虑的。在他确定的北边防卫体系中,开平与大宁、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两卫及兴和千户所,构成了防御的中心,且东西联络、互为呼应。开平卫作为这一整体防线上的重要连接点之一,战略地位不言而喻。明成祖四次北征都经过开平,并且曾对近臣说:消灭此地(蒙古)残寇,只要守卫住开平,则兴和、辽东、甘肃、宁夏边防就可永远无忧。可见,开平卫无论是在明太祖还是明成祖心目中,其军事战略意义都极其重大。

然而,明成祖虽然也重视开平卫的作用,但他在起兵夺取帝位后,为了报答“靖难”有功的兀良哈三卫,以大宁相让,而将大宁都司内迁至保定,同时将东胜等卫也迁于内地。这样就使北边防线出现了两个大的缺口,一个是在辽东与开平之间,另一个是在大同与宁夏之间,由此使得蒙古诸部可以轻易进入河套地区,随意南下。永乐二十年(1422年),兴和所被鞑靼部阿鲁台袭陷后,被迫徙治宣府,从此开平卫变得势孤援绝,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由于孤悬于最前线,又需派大量军士守备,军储供应成为一大问题。从后方往开平运粮,需要付出很大的人力、财力,使朝廷不胜负担。所以当明宣宗刚即位不久时,就有把开平卫内迁至独石堡之议。宣德元年(1426年)户部主事王良奏称:“开平极边之地,岁运粮给之,而军士戍守者皆有妻子,粮不足以赡其家。”^①于是在宣德五年明宣宗下令放弃开平,将卫治迁至独石堡。

^① 《明宣宗实录》卷十七,宣德元年五月丙午条。



开平卫的内迁,从表面看直接原因是孤立无援和军粮难以为继,追根溯源却还是明成祖时期屡弃边防要地种下的恶果。明成祖将沿边一些卫所相继内迁,虽然以迁都北京直接控制北方作为弥补措施,并调集内地重兵加强京城周围的军事力量,还先后在辽东、大同、宣府、宁夏、甘肃五地派出由侯、伯、都督等高级将领担任的总兵官镇守边防要地,更五次亲征漠北打击蒙古势力,大大减轻了北方边防面临的威胁,但这些对沿边的布置筹划措施,终究不能彻底消除由于放弃军事重镇而造成的负面影响。到了宣德时期,将势孤援绝的开平卫内迁,也只能是顺理成章的无奈之举。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也凸现出了明宣宗及众大臣的战略短视,以及永乐以后明朝在安全思想和国防战略上的消极化倾向。开平卫的内迁,使得宣府和大同直接裸露在北部边界上,“自此蹙地三百里,尽失龙冈、滦河之险,而边地益虚矣”。对于这件事,史家的评论一点也不为过。正统年间,瓦剌军队之所以能长驱直入,进逼京师北京,不能不说与这种削弱北部边疆防御的举措有着较大的关系。



刘球《谏伐麓川疏》(节选)

题引:刘球(1392~1443年),字廷振,江西安福人,历官礼部主事、翰林侍讲。正统二年(1437年),麓川(治今云南瑞丽)土司思任发反叛,宦官王振怂恿明英宗派军大举征讨,刘球上疏力谏,陈述利害得失。奏疏全文见《明经世文编》卷三十一《刘忠愍公奏疏》(参见《明史·刘球传》)。

【原文】

天子之驭夷狄,必宽宥于其小,而谨防于其大,所以适缓急之宜,为天下久安计也。故周伐崇^①不克,即退修德教以待其降。至于玁狁^②,则命南仲^③城朔方^④以备之;汉征南粤^⑤不利,即为罢兵赐书以通好。至于匈奴,虽已和亲,犹募民徙居塞下入粟入边^⑥,复命魏尚^⑦守云中以拒之。以成周^⑧、西汉之力,破灭崇、越易如振槁,皆释不诛,惟汲汲玁狁、匈奴之备,何也?盖不穷兵于小敌以伤生灵,惟防患于大寇以安中国也。今麓川残寇思任发本依山负

① 崇:古国名。商的盟国,在今陕西户县东。至崇侯虎时,为周文王所灭。

② 玁狁:古族名。又作猃狁、荤粥、獯鬻、熏育、荤允等。商周时游牧于今陕西、甘肃北部及内蒙古西部地区,春秋时被称作戎、狄。

③ 南仲:周宣王时大臣。任卿士,曾率师征伐东方淮夷及北方的玁狁。

④ 朔方:在今河套地区。

⑤ 南粤:古族名,亦作南越。百越的一支,秦汉时分布于今湖南南部、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一带,曾建南越国。

⑥ 入粟入边:西汉初年采取晁错的建议,规定凡输纳谷物到边塞者,可以赐予相应的爵位或者免去所犯之罪,以此达到积粟实边、巩固边防的目的。

⑦ 魏尚:西汉内史槐里(今陕西兴平东南)人。文帝时为云中郡(治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守,善治军取下,士卒皆愿效命,匈奴不敢犯。

⑧ 成周:即指周。周成王时周公在今河南洛阳筑城作为东都,称成周,后世多以成周作为洛阳的代称,有时也代称周。



谷、羈縻^①纳贡之夷，……皇上念此小夷僻居南徼，灭之不为武，释之不为怯，特降玺书原其罪恶，使得自新，是即周、汉修教赐书之意也。奈何边将不能宣达圣意，欲屯十二万兵于云南，以急其降，不降则攻之。而不虑王师不可轻出，夷性不可骤驯，地俭^②不可用众，客兵不可久淹，是皆兵法所忌也。况江南近年水旱相仍，军民俱困，若复动众恐至纷扰。臣窃以为终宜缓诛，如周、汉之于崇、越也。至如北虏，犹古獯豸、匈奴，世为边患，今虽少抑，然部曲尚疆^③，戎马尚众，未可保其终不寇边。居安思危，此维其时。……窃以为宜防其患，如周、汉之于獯豸、匈奴也。

【译文】

天子驾驭周边民族，一定要对力量小（不构成威胁）的放宽原谅，而对力量强大（构成威胁）的谨慎防范，在这上面适当把握好轻重缓急（的尺度），这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策略方法。所以周（文王）讨伐崇国没有成功，就退兵修明道德文教来等待对方归降。对于獯豸，（周宣王）则命南仲筑朔方城进行防备；西汉征讨南越不利，（汉文帝）就因而停止武力赐给（南越王）诏书以示往来友好。至于匈奴，虽然已经实行和亲，仍召募百姓迁居塞下及输粟充实边疆，又命魏尚为云中太守加以抵御。凭周、西汉的力量，攻破消灭崇国、南越就如摇落枯叶那样非常容易，（却）都放过不置于死地，而迫切忙于防御獯豸、匈奴，这是什么缘故呢？原因在于不对微不足道的小敌滥用武力而伤害百姓，而对有危害的大敌予以防范来（达到）使国家安定（的目的）。如今麓川尚未剿灭之敌思任发本来是依据山谷（之险）、（被实施）羈縻（向朝廷）进贡的边疆外族，……皇上考虑到这种蛮夷小族居住在边远偏僻的南方，消灭他算不上强大威风，放过他（也）不是（显示）胆怯，特意颁赐印玺诏书原谅其（所犯）罪恶，使其改过自新，这就是（与）周修明德教、汉赐书通好（一样）的意思。无奈镇边将领不能够领会传达皇上的旨意，准备在云南集结十二万兵，来急迫其投降，不投降就发动进攻。却不考虑朝廷的军队不可以轻率出

① 羈縻：中国古代唐、宋、明等中央王朝为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怀柔笼络，往往设置一些行政单位，以当地部族首领为官世袭统治管辖，这种政策和制度称之为羈縻。

② 俭：通“险”。

③ 疆：通“强”。



动,边疆民族的性情不可能马上就驯化,地势险要不适于动用大军,外地调来的军队不能长久滞留,这些都是兵法所忌讳的(因素)。更何况江南地区近年水旱灾害连续不断,军队和百姓都穷困窘迫,如果再兴师动众恐怕会导致混乱。我私下认为终究还是应当延缓征讨,就像周对待崇国、汉对待南越那样。至于像北边的蒙古,就如同古代的獫狁、匈奴,世代为边疆的大患,现在虽然稍微得到了抑制,但部属和军队仍然强大众多,无法能够保证其一直不侵犯边塞。居安思危,现在正是时候。……我认为应当防备蒙古(有可能带来)的危害,就如同周对待獫狁、西汉对待匈奴那样。

【评析】

正统二年(1437年),云南麓川土司思任发反叛明朝,侵掠邻近地方。受宠于明英宗、把持朝政的宦官王振为了示威于蛮荒,决定用武力镇压。兵部尚书王骥为讨好王振,更是力主用兵。于是王振召还甘肃总兵蒋贵等人,并调发四川、贵州等地军兵,准备大举征讨麓川。

对于这种做法,朝中大臣多数是不赞成的,其中尤以侍讲刘球反对最为激烈。在上疏中,他不仅举周、汉两代的史例为鉴,而且着重分析了当时的边防形势,指出当务之急是防备北方的蒙古瓦剌部,而不是大动干戈压服南方小土司的反叛。在他看来,统治者在处理事关国家安全的边疆民族问题时,要“适缓急之宜”,即把握好区分轻重主次的原则与尺度,具体来说就是要“必宽宥于其小,而谨防于其大”。对国家安全不构成主要威胁的敌对力量,争取宽大对待,用政治手段加以解决。而把战略重心和注意力放在对付主要的安全威胁上面,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获得长久的安定。

刘球的观点,既是对历史上国家安全战略制定与实施成功经验的总结,又切合明朝国家安全形势的实际。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统治者,都十分懂得“适缓急之宜”的道理。在面对外部多方向的安全威胁时,都把防范对象和防御重点放在对国家安全危害最直接、最突出的方向,从而集中力量予以消除;而不是不分主次轻重,随意树敌,使自己陷入多线作战的困境。像刘球所列举的西汉时期应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做法,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证。正是汉初始终把抵御匈奴作为战略考虑的重心,而对当时并不构成西汉王朝最重大、最直接威胁的“西南夷”及南越,主要采取政治招抚的策略,从而才得以全力专注于反击匈奴的战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使国家安全形势得到了根本改观。



就明初的周边态势而言,西南、东北边疆地区的民族,力量相对较为弱小。虽然不断有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土司反抗明朝的统治,但同北方的蒙古相比,其威胁显然微不足道。由于蒙古骑兵的强大战斗力,更因蒙古贵族“屡谋兴复”的野心不死,被明朝一直视为“腹心之害”,从明太祖建国时起就认为“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①。明太祖之后的成祖等皇帝也都始终将蒙古视为头号大敌,从而倾力加以防范戒备,不敢有丝毫大意。

但是以幼冲之年登基的明英宗,不仅政治经验全无,对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更是懵懂无知,一切惟王振之意是从。而王振一心要借平服麓川来巩固权势,提高个人声望,因此刘球等人的劝谏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正统六年正月,王振命蒋贵为征蛮将军,王骥提督军务,抽调甘肃边兵及其他各地兵共15万,征讨麓川,而全然不顾此时的蒙古瓦剌部已经迅速崛起,其首领也先称雄漠北,野心勃勃,正日夜虎视眈眈随时准备伺机南侵。

麓川之役起后一年,“转饷半天下”^②,却毫无结果。次年,王振再次派兵征讨。正统十一年,思任发兵败被杀,其子思机发多次遣使人朝谢罪,王振仍不肯罢兵。连年用兵,耗费了明朝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给百姓增添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也带来不少灾祸。王骥等征调民夫抬运綵绸,卖给沿途土司,借机大发战争财;又多捕渔民充俘虏,以掩败报功。正如时人所议论抨击的那样,麓川用兵“老师费财,以一隅骚动天下”^③,完全是一种本末倒置、主次不分的蛮干行为。

由于倾全力征剿麓川,而对北方势力正盛的瓦剌疏于防范,明朝在北边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沿线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战备措施。正统十四年秋,瓦剌大举南侵,轻易即破关而入。明英宗在王振的怂恿下亲率50万大军仓促北征,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遭到惨败,自身也被俘虏。“土木之变”使明太祖、成祖辛苦创立的基业几乎毁于一旦,近百年积聚起来的国力受到极大损耗,明朝也从此由盛转衰,教训可谓极其惨痛沉重。

① 《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八,洪武四年九月辛未条。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麓川之役》。

③ 《明史·王骥传》。



唐顺之论海防策略

题引：唐顺之(1507~1560年)，字应德，又字义修，号荆川，武进(今江苏常州)人。通晓天文、地理、乐律、数学及兵学，历官主事、郎中、右通政、凤阳巡抚等，曾督师东南抗击倭寇，并提出御海洋、固海岸的海防策略和主张。本篇节选自《明经世文编》卷二六〇《唐荆川家藏集二·条陈海防经略事疏》。

【原文】

一、御海洋。照得御倭上策。自来无人不言御之于海，而竟罕有能御之于海者，何也？文臣无下海者，则将领畏避潮险，不肯出洋。将领不肯出洋，而责之小校水卒，则亦躲泊近港，不肯远哨。是以贼惟不来，来则登岸，残破地方。……合无春汛紧急时月，苏松兵备^①暂驻崇明，宁绍兵备或海道^②内推择一人暂驻舟山，而总兵^③、副总兵常居海中，严督各总^④，分定海面，南北会哨^⑤，昼夜扬帆，环转不绝，其远哨必至洋山^⑥、马迹^⑦。……

① 兵备：即兵备道，整饬兵备道的简称。明中期始设于江西，专管兵备事宜，嘉靖后以倭患严重，遍设东南沿海诸省，协助抗倭。其官称为兵备副使，多由按察司副使兼任。也有以分巡道官员兼领兵备道，统称为兵巡道。

② 海道：官名。明代于沿海各省设巡视海道按察副使，简称海道副使、副使，专管海防事务，通常由按察司副使充任。后为抗倭需要，也可以兼领兵备，称为海道兵备副使。

③ 总兵：官名。亦称总兵官。无品级，无定员，初皆属临时差遣性质，随事立名，前多加提督、巡视、备倭等衔，事毕即交印回本任。后渐为常设之武官，分驻九边及各省。清代总兵为绿营各标之统帅，仅次于提督，称“总镇”。

④ 总：即把总。官名。明初设为京营三大营的武官，中期之后为适应防倭需要在沿海诸省遍设此职，隶属于总兵，为基层组织“总”的领兵官。这里专指浙江沿海所设的海宁、定海等六把总。

⑤ 会哨：即巡洋会哨制。按照水师的布防位置和力量划分一定的海域巡逻，设定界标，定期相会，交换令箭。

⑥ 洋山：又作羊山，即今浙江嵊泗西南海上大洋山。

⑦ 马迹：即今浙江嵊泗南海上马迹山。



一、固海岸。照得贼至不能御之于海,则海岸之守为紧关第二义。贼新至饥疲,巢穴未成,击之犹易。延入内地,纵尽歼之,所损多矣。……宜分定沿海,保护内地,内地策应沿海。沿海力战,损兵折将,宜坐内地不能策应之罪;内地残破,沿海幸完,宜坐沿海纵贼之罪。……如此,则人知谨于海岸之守,不敢幸贼空过以觊免,门户常扃,堂奥^①自安矣。

【译文】

一(条)、在海洋上实施防御。经明察得出这是抗御倭寇的上等策略。一直以来没有人不说在海上抵御倭寇,然而最终却很少有能够这么做的,什么原因呢?文官大臣没有到海上去的人,而武将畏惧躲避浪潮的风险,不愿意出海。武将不愿意出海,却责令低级的校官和水师士兵去,而这些人也将船只停靠躲避在港口附近,不愿意到远洋巡哨。因此倭寇要么不来,来就(长驱直接)登陆海岸,残害破坏当地。……在没有春汛紧急事情的时候,应让苏(州)松(江)兵备道暂时驻扎崇明岛,从宁(波)绍(兴)兵备道或者海道中推选一人暂时驻扎舟山,而总兵、副总兵经常驻处海中,严加督促各把总,分区划定海面,南北区域定期实行会哨,日夜行船出海,来回不停,其中远洋巡哨一定要到达洋山、马迹山。……

(又)一(条)、在海岸进行固守。经明察得出(如果)倭寇来犯在海洋上不能抵御,那么防守海岸是最为重要的第二点。倭寇刚到饥饿疲惫,巢穴尚未建成,攻击他们很容易。引入内地,纵然将其全部歼灭了,遭受的损失也大了。……应当划分确定沿海防区,保护内陆地区,内地策应沿海。沿海地区奋力作战,损兵折将,应判内地没能策应的罪名;内地残缺破败,沿海地区意外完好无损,应判沿海纵容倭寇的罪名。……这样的话,那么人人懂得小心防守海岸,不敢侥幸认为倭寇仅仅只是经过而冀望幸免,(沿海)门户经常关上,(内地)堂里自然安宁了。

【评析】

明初对于倭寇的侵犯,实行水陆并防的方略,大力加强水军建设,造战船,置水寨,建卫所,并在沿海构建了初步完整的、具有一定纵深和层次的防御体系:水军平时巡逻于海上,遇有倭寇进犯即予以歼灭;倭寇靠近海岸,则

^① 堂奥:意为内地、心腹之地。本义指堂屋的深处,屋的西南角称奥。



以卫所军迅速赶赴迎击,水军同时进行配合共同歼敌。这种抗倭方略有效地保持了东南海疆的安全,倭寇、海盗尽管有所活动,但没有构成大祸。

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年),倭患因为明朝沿海兵备的废弛而愈演愈烈,不少有见识的文臣武将及一些军事幕僚在极力主张匡正各项弊政、奋发振举收拾人心的同时,也就如何抗击倭寇提出了更系统更完整的战略策略。其中以唐顺之、郑若曾等为代表,主张实施海陆策应、攻守兼施的沿海防御方略。其基本思想是御近海、固海岸、严城守的多层次有纵深防御。唐顺之的这篇奏疏,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

唐顺之等人认为海防“必宜防之于海”,在海上抵御倭寇是一种上策。倭寇进犯,必由海上而来,故而“海舟防之于海,其首务也”^①。敌远道而来疲惫,兼之船小,又不习水战,因此只要用战船遏制要冲,以火器截击倭寇于海上,使之不得上岸,就可以保障内地的安全。为御倭于海洋,唐顺之还提出了“哨贼于远洋”、“击贼于近洋”及主张沿海各府“协谋会捕”、击敌于将至等相应的具体策略。如果不能尽歼倭于海上,那么就要在海岸各要害处设防,进行堵截,击敌于将登,即固海岸之守。因为沿海是内地的门户,守好了门户,内地才能安全,所以要趁倭寇浮海而来疲惫来不及休整,立足未稳之际,予以抗击,便于将其歼灭。

除了御海洋、固海岸之外,当时还有人提出了要与严守河港、内河和要害之城,及提高陆地野战能力等相结合的整体纵深防御方略。这些海防思想既是对明初以来沿海防卫经验的总结,也是结合抗倭斗争中出现的实际情况的一种思考,对后来抗倭战争的胜利具有指导意义,也为后世筹划海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① 明·俞大猷:《正气堂集》卷七《议水陆战备事宜》。

张濂论御倭策

题引：张濂(1512~1561年)，字子清，号泽山，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嘉靖进士，累官至金都御史，后被罢归乡，家居期间目睹倭寇猖獗时局败坏，痛心之余遂上疏陈述御倭之策。本篇节选自《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沿海倭乱》。

【原文】

臣本杭人，顷复家居五载，颇知海寇始末。始以海禁乍严，遂致猖獗。而督^①、抚^②因循玩愒，养成贼势。……臣寓父母之邦，同舟共济，志惟切于报君，嫌何避于出位，敢以三策为陛下陈之。

一曰重军法以作积弱之气。士惟力战而后克敌，亦惟畏法而后力战。今江南非无义勇也，迎敌九死，退走十生，何怪其有退而无进哉。军法之行，不在行阵而在平时，诚得必死之士万夫，海寇百万不足平矣。

一曰选民兵以收必胜之功。夫江南卫、所，已成虚设，地方有急，辄假外兵。糊口而来，原非义勇，掉臂而去，莫可勾查。臣愚以为莫若尽散调募之兵，专责州县立保伍^③，更番较阅，期于不扰。一遇有警，按籍而呼，共保身家。寇小至，则率众以攻之；大至，则坚壁以守之。

一曰复海市以散从贼之党。夫海市旧制，原非创设。向使濒海之军卫如故，则市舶未为害也。惟武备日弛，不能制变。而后海禁渐严，倭寇乏食，海

① 督：即总督。明代前期开始派中央官员到地方总督税粮工程等事宜，后发展到总督军务、河道漕运等，成为常设之官，但始终属负有特殊使命的临时差遣性质。至清代逐步地方化和制度化，总督辖一省或数省，综理军政事务，为地方最高长官。

② 抚：即巡抚。明前期开始派中央官员巡抚地方各省，后逐渐成为专设之官，常加“提督军务”等衔，位权在三司之上。清代正式设为省级地方长官，总揽一省的军政事务，地位仅次于总督。

③ 保伍：中国古代一种乡间基层组织。通常五户为一伍，五户或者十户为一保。

寇由之以起。惟军民既练,寇掠则惧遭斩获,交易则可保首领。彼虽至愚,必不以彼易此。然后相机稍复海市之旧,不惟散已聚之党,而濒海穷民假此为生,又足以收未溃之人心。

【译文】

我原本就是杭州人,近来又在家乡住了五年,略微知道海盗倭寇产生的经过。最初由于海禁骤然变得严厉,于是导致(其)凶猛横行。而总督、巡抚拖拉疲沓,贪图安逸荒废时日,放纵滋养倭寇形成(现在的)力量。……我住在(这个)国家里,要(与国家)齐心协力共度危难,志愿只在于报答皇帝,不避超越本分的嫌疑,胆敢向陛下陈述三个策略。

一是严明军令来振作长期衰弱的士气。士兵只有拼力作战之后才能击败敌人,也只有畏惧军令之后才能拼力作战。现今江南地区不是没有忠义勇敢的人,(但)迎击敌人十次有九次会战死,退却逃走(却)每次都能活命,怎能责怪他们只退不进呢?军令的施行,不在于战时而在平时,(如果)真能有抱定必死决心的士兵一万人,(即使)海盗倭寇有一百万人也完全可以平定。

一是选募民兵来达到必胜的功效。江南地区卫、所,已经成为空虚的摆设,本地一有紧急情况,就借调外省士兵。(这些人是)为了混口饭吃才来(从军)的,本来就不是忠义勇敢的人,甩胳膊就走,无法缉查追拿。我认为不如全部遣散外调招募的士兵,专门督促责成各州县成立保伍制度,在没有(倭寇)侵扰的时候会合集中(乡兵),更换轮番训练检阅。一旦遇到警报,依据籍贯召唤,一起保卫自身和家庭。倭寇小规模来犯,就督率众人进攻;倭寇大规模来犯,就据垒坚守。

一是恢复海上贸易来离散跟从倭寇的党羽。海上贸易原本是过去的制度,不是初创新设的。假若沿海卫所还跟以往一样,那么商船对外贸易就不会产生危害。只是由于武备日趋废弛,不能应对(情况)变化。之后海禁逐渐严厉,倭寇缺少生活来源,海盗(祸患)因此而兴起。而军队和乡民有了训练后,(这些人再)侵害掠夺就会害怕被杀或俘虏,而买卖贸易却可以保全性命。他们即使很愚笨,也一定不会以那样(结局)来换取这样(结局)。在此之后察看(合适)机会稍微恢复过去海上贸易的制度,不但能使已经聚集起来的党羽离散,而且沿海穷困百姓能凭借这个生活,又完全可以聚拢没有溃散的人心。



【评析】

自明朝建国之初就存在的倭患,到了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年)达到了高峰。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15世纪后期以后,日本再度进入藩侯割据混战时期,在战争中失败的武士以及浪人、奸商、海盗等为寻找出路,更多地加入到倭寇的队伍中来,疯狂对外掠夺财富;另一方面这也是嘉靖以后沿海卫所制度败坏、海防松弛导致的恶果。此外,还与自明初以来实行的海禁政策有一定的关系。

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其本意是为了对付元末张士诚、方国珍等东南沿海割据势力的余党(多数窜入海上为海盗),防止他们勾结倭寇劫掠祸害沿海地区。但这种貌似釜底抽薪的做法却存在极大的弊端,这就是海禁使得沿海居民正常的生活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尤其是使那些依靠海上贸易及以出海捕鱼为生计的商人、渔民,一下子失去了生活来源,有的在万般无奈之下,就加入到海盗的队伍中去,这些海盗又与进犯中国沿海的倭寇同流合污,不断攻略沿海城乡,烧杀劫掠,倭患于是骤然猖獗。海禁政策不仅没有达到预先的目的,反而适得其反,将局面弄得更加不可收拾。所以张濂在上书中提出“复海市以散从贼之党”,就是要恢复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制度,使海商及沿海居民生活有所保障,利益得到维护,这样自然就不会有人不明利害,冒着危险再去跟从倭寇海盗作乱了。而且还可以起到“收人心”的作用,可谓一举两得。

张濂的这个思想,实际上也反映和代表了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的看法。当时不少人都认为要抵御倭寇、巩固海防,在政治上最根本的措施是要招抚那些依附跟随倭寇的百姓,并且关心他们的实际困难,“行宽大,布恩信,问疾苦,时拊循”^①,只有真正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也就是说做到了百姓安居乐业、人心安定归附了,倭寇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所到之处遭孤立打击,清除他们也就容易了。从这点说,明人提出的巩固海防的政治谋略思想,对后来包括当今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张濂还指出倭寇之所以越来越猖獗,是由于地方督、抚“因循玩愒,养成贼势”。明初国力强大,重视海防,置卫所,造战船,布置严密。而到了嘉靖时,朝政腐败,官吏贪污成风,对于事关国家安全的方针大计漠不关心,

^① 明·郑若曾:《筹海图编》卷十一《经略一·叙寇原》。



不仅边防败坏,海防也近乎完全废弛。沿海卫所空虚,用于防倭的战船严重破损,所剩无几。文官武将贪生怕死,遇倭畏之如虎,相互推诿扯皮,却热衷于争权夺利、营私舞弊。在这种情况下,倭寇长驱直入,所过之处无不残破。卫所军队不堪一击,而从外地调来的客兵和土兵(湖广和广西等地部族土司的军队)虽然较有战斗力,但由于很多不隶军籍,很难驾驭管理。这些客兵还存在军纪败坏、作风涣散的问题,甚至剽劫抢掠不亚于倭寇。故此,张濂建议编练保甲,招募地方义勇,他认为这样一方面便于管理,另外也可以激发这些人保卫家园的动力。

但是,仅仅依靠保甲制度组织乡民闲暇进行训练,要抵御凶悍强大的倭寇,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这只能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或者作为一种辅助性的抗倭措施,终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不过张濂的建议凸显了卫所制下的军队不能有效抗击倭寇这一重大现实问题,也对改革明朝现有的兵役制度提出了一种可行的思路,那就是放弃衰败的卫所世袭兵制,以募兵制加以代替。后来明朝为适应抗倭需要而逐渐推行募兵制,戚继光、俞大猷等都自行招募选练了新兵,组建了非常有战斗力的军队,对最终取得抗倭战争的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戚继光《练兵条议疏》(节选)

题引:戚继光(1528~1588年),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世袭登州卫指挥金事,先后任参将、副总兵、总兵等职,为平定沿海倭寇立下不朽功勋,后调北方总理边务及练兵事,官至左都督加少保。在主持北方防务期间,主张练精兵以抵御蒙古侵犯。本篇选自《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七《戚少保文集二》(参见《明史·戚继光传》)。

【原文】

臣昔在南方,倭俱巢重山叠险,密林深谷。而浙兵脩攻仰斗,无有不胜。此臣躬试,非臆说也。即使其乘墙而守,亦惟浙兵而守可固。何则?南省邑城,高不逾丈,厚止数尺,复无墩堞偏坡之险。贼动以万数围之,且鸟銃^①发无不中,吕公车^②高逾于城。而以浙兵千人守之,累月不下。今边墙既高,临下复有偏坡,杂以品坑^③,使以浙兵守之,未有不固者。至于鸟銃,已调到三千,分发防秋^④。伏望敕下廷臣博议,再于浙兵内取杀手^⑤三千,鸟銃三千。或于西北招募新兵,或就蓟镇^⑥摘取见^⑦兵。即不十万,亦须马足五枝,步足

① 鸟銃:明代中后期对火绳枪和燧发枪的统称。因其枪机形似鸟嘴,故又名鸟嘴銃。清朝多称为鸟枪。它的基本结构和外形已接近近代步枪,是近代步枪的雏形。

② 吕公车:古代一种大型攻城器械。车起楼数层,内藏士兵和兵器,外蔽皮革,下有撞木等破坏城墙的工具,以牛拉或人推至城下。

③ 品坑:明代在北边长城沿山坡平坦广远、高下不一处凿设品字形暗坑,以限制蒙古骑兵通过。

④ 防秋:明代为防备北方蒙古势力的侵扰,实行每年春、秋时节定期调兵更番戍守沿边的制度,称之为春、秋防,或两防。因每年秋收时蒙古诸部入掠最严重,故以秋防最为重要。

⑤ 杀手:明代戚继光在平定倭寇的过程中创造出“鸳鸯阵”法,每12人为一小队,其中使用藤牌、长枪、镋钯等长短武器配合杀敌的步兵,称之为“杀手”。

⑥ 蓟镇:即蓟州镇,明代九边之一。防地相当今河北长城内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及天津以北一带,为拱卫北京之重镇,总兵官驻三屯营(今河北迁西西北)。

⑦ 见:通“现”。

十枝,专听臣统练,与蓟防无碍。俟合练成,凡遇春秋两防,臣将二万分布相近乘守。万一疏虞,致使突入,臣即通行聚合截杀。不惟蓟省人卫之费,而各边亦免空虚之忧。斯战守咸备,一举而四利矣。

【译文】

我以前在南方(的时候),倭寇都把巢穴营垒建在崇山峻岭、林密谷深之处。然而浙江兵无论俯冲进攻还是向上搏斗,没有不胜利的。这是我亲自使用验证的,不是凭想象胡说。即使让浙江兵登上城墙防守,也非得他们才能守得稳固。为什么这么说?南方省份的城池,高度不超过一丈,厚度仅几尺,又没有土堆沟壑斜坡这样陡险不平的地势(可以依托)。倭寇常常用数万人围攻,而且鸟铳发射无不命中,吕公车高过城墙。可是用一千左右的浙江兵守御,连续数月(倭寇)也攻克不下来。现在北边的城墙已高,往下还有斜坡临靠,间杂布置着品字坑,如果派浙江兵来防守,没有不坚固的。至于鸟铳,已经调拨到了三千(支),分发下去用于秋防。希望下令朝臣讨论解决再从浙江兵中调取步兵杀手三千(名),鸟铳三千(支)。或者从西北召募新兵,或者就近在蓟州镇挑选现成的士兵。即使不够十万人,也要有骑兵五队,步兵十队,专门听从我的统一训练,(这)同蓟镇的防务没有妨碍。等到共同训练好之后,凡是遇到春、秋两防(的时候),我用二万人分散部署在(蓟镇)附近登墙防守。万一疏忽,导致敌人突破进来,我就统一实行集中会合堵截击杀。不单蓟镇省去调兵来增援保卫的耗费,北方各边镇也没有了空虚的担忧。这样战守(又)都齐备,一(个)举(动)就具有四种好处。

【评析】

明朝到了嘉靖以后,边防已经十分败坏,面对蒙古诸部的入寇侵掠,除了修补长城以此为凭靠实行消极的抵御之外,统治集团再也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而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加修的九边长城(主要在宣府、大同、山西和蓟镇等地带),由于边备废弛,并没能够发挥预期的有效防御作用,根本阻挡不住蒙古的铁骑。嘉靖年间鞑靼俺答部的连年猖獗入犯,就是一个明证。因此,当时有不少人都反对修筑长城。

戚继光奉调镇守蓟州(今河北迁西西北)、永平(今河北卢龙)、山海关诸处后,曾对北边形势作了实地考察,提出对蒙古“须驻重兵以当其长驱,而又



乘边墙以防其出没,方为完策”^①的综合防御主张。在他看来,要对付蒙古骑兵的袭扰,维护边疆安全稳定,不光需要屯驻重兵,守边备戍,而且要充分发挥长城作为防御性设施的作用,将之与受过良好训练的士兵、精良的武器和装备、正确的战略战术有效配合使用。他根据过去在东南沿海抗倭的经验,深知首要任务是要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精兵。因此,他一到任后,就上书朝廷请求调拨10万兵士,由他负责训练。等训练好之后,再以这10万人为种子,训练边兵和京营兵。此外,他还就粮饷的筹集、武器的制造等事宜向朝廷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在练兵过程中,戚继光注重培养部队严明的纪律,强调要随令而动,大大改变了边镇守军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懈怠作风和涣散现象。在部队编成上,新组建了车营、辎重营,实行车步骑营的混合编制,辅之以杀伤力大的火器,相互配合,协同作战。为提高长城的整体防御能力,他还在边墙上修建了空心敌台,并主张依托边墙和敌台,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战法御敌。敌人来犯,如果登上边墙,就以步兵将其赶下或就地歼灭。万一某处疏漏导致被敌袭破而入,则以车步骑营将其聚歼或逐出。敌溃逃败退时,则命骑兵追击予以消灭。

经过戚继光的整顿训练,蓟镇兵节制精明,军容严整,器械犀利,成为边防诸镇之冠。进犯的蒙古朵颜三卫始终未能讨得便宜,在多次受挫后再也不敢轻易犯境。史载:“(戚)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晏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②可见,他以练兵、治军为核心整饬边备的举措是卓有成效的,大大改善了自嘉靖以来岌岌可危的北边形势,有力地巩固和确保了边防的安全。

^① 《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七《戚少保文集二·请兵破虏疏》。

^② 《明史·戚继光传》。



王崇古论俺答封贡

题引：王崇古(1515~1588年)，字学甫，号鉴川，蒲州(今山西永济西)人，曾参与东南沿海抗倭战争，累官至兵部尚书。在总督宣大、山西军务期间，上疏力主与蒙古俺答汗通贡互市，以安定边境。本篇节选自《明经世文编》卷三一六《王鉴川文集一·再奉明旨条议北虏封贡疏》。

【原文】

夫夷狄之为中国患，从古以来五帝三王^①未有能臣之者。今一旦改虑输诚，求欲内附，称臣上表，乞贡索封，兹乃天地祖宗之灵，皇上恢弘之烈，顾可以轻阻之哉？……职封疆之臣，非不能为大言抗绝，以耸动宸聪。但俺酋既已两次遣使，若重为拂逆，非惟阻其向化之念，抑亦挑其忿憾之心，职恐边方自此又多事也。盖许其通贡者，非恃其和好，并中国之防范战守之具而悉撤之也。俺答果向顺也，年年进贡，则华夷得所，中外两安。即此天未阴雨之时，正我绸缪牖户之日。自此修颓年不可修之堡，自此耕塞外不可耕之田，自此练春秋不可解之甲。一年安静，一年之修备也；十年安静，十年之整顿也。万一俺酋弗率，违背前好，侵我边疆，即将闭关绝使，整戈秣马，与之驰驱疆场。今其稽颡向顺，乃拒之而不纳，及其跳梁怒背，又抚之而不能，不几于朱^②策耶？

【译文】

边疆外族危害中原国家，从上古五帝三王以来(的历代帝王)没有能够使其臣服的。如今(他们)忽然改为想要降顺，请求准备归附，上奏称臣，恳乞通

① 五帝三王：五帝指传说中夏朝以前上古时代的五个帝王，具体说法不一，一般多指黄帝、颡顼、帝喾、尧、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一说指夏禹、商汤和周代文王武王。

② 朱：通“侏”，智识见解短浅愚昧。



贡求封官职,这是天地祖宗神灵保佑,皇上洪大无比的功业所致,怎么反而可以轻易加以阻止呢?……我是朝廷的封疆大臣,不是不能说冠冕堂皇的话驳回拒绝,(并以此)来怂恿打动皇上。可是俺答已经两次派遣使者,如果再不答应,不仅会阻断其向顺归化的想法,而且会激起他的怨恨之心,恐怕边疆从此又要多事了。朝廷允许其纳贡,并不是倚恃着双方议和友好(就以为太平无事),连带一并将备战防守的器具全部撤除了。俺答如果真的归顺,每年进贡,那么中原和边疆民族各得其所,都能安定。这种没有阴雨天气的日子,正是我们紧密缠缚窗户的时候。从此修缮连年没能得到修缮的城堡,耕种没能得到耕种的田地,训练一年到头无法解甲休息的士卒。一年边疆安宁,就有一年整修战备的时间;十年边疆安宁,就有十年整修战备的时间。万一俺答不遵守,违背之前(定下)的友好之约,侵犯我边疆,将来就封闭边关断绝来往,整理武器喂饱战马,同他在沙场上驰骋追逐一决胜负。现在他低头归顺,如果拒绝不接纳,等到其一怒之下违反初衷跋扈横行,再招抚又行不通,这种做法不等于短浅愚蠢吗?

【评析】

明朝中期以后,尤其是进入明世宗统治时期(1522~1566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边备废弛,长期困扰明廷的北部边防危机变得更加严重。蒙古鞑靼俺答部在嘉靖年间多次大举入侵骚扰内地,一度兵临北京城下,焚烧抢掠,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的摧残破坏。

然而,连年与明战争及内部不停的纷争矛盾,使得俺答等部也受到很大消耗。而在经济上,蒙古各部与中原内地的贸易联系越来越密切,依赖性也越来越大。广大蒙古族人民都希望与中原地区人民和好相处,迫切要求结束战争。在蒙古人民的推动下,俺答开始转变策略,寻求与明朝通好贸易,先后数次派使者到边关请求通贡互市。但昏聩的明世宗对这一有利于改善国家安全环境的重要战略机遇视而不见,民族偏见又很深,屡屡予以拒绝。于是俺答继续兴兵进犯,多次大掠北京附近州县,致使京师多次戒严。整个明世宗在位期间,俺答部的侵扰一直是明朝北边的一大祸患,明与蒙古的关系始终未有所改变。

到了明穆宗时期,由于重视边防,穆宗本人也较少民族歧视思想,情况开始有了变化。发生在隆庆四年(1570年)的把汉那吉事件,则成为一大转机。把汉那吉为俺答之孙,原准备聘免扯金之女为妻,而俺答外孙女三娘子也接

受了袄儿都司的聘礼。不料俺答见三娘子貌美,竟夺为己有,却将兔扯金之女嫁给袄儿都司。为此,把汉那吉十分愤恨,于是在这年十月率众归附明朝。这一事件影响颇大,不仅在蒙古各部及逃依蒙古的汉民中引起了反响,更震动了明朝上下。在围绕如何处置把汉那吉事情上,明廷内部产生了争论。一部分朝臣以虏情叵测,反对收留;而宣大、山西总督王崇古和大同巡抚方逢时则力主接收,提出乘此机会优待把汉那吉,采取安抚政策,缓和与蒙古的紧张关系。

尤其是王崇古,继上陈这篇奏疏后,又连续多次上疏,主张借此事为契机,答应俺答“封贡”之请,即俺答向明朝提出的封赐官职、通贡互市的要求。他指出俺答封贡的好处在于:第一,可以使兵戈平息,边境安宁;第二,可以趁机修复边墙城堡,整饬补救边防。他认为对方主动向顺,解决北部边患的千年不遇的机会就在眼前,如果轻易主动放弃,无疑是一种浅陋愚蠢的行为。拒绝俺答封贡请求只会刺激对方用抢掠手段达到目的,给国家的安全利益带来严重的危害。但允许俺答封贡,双方和好,也不能就此以为太平无事了而放松警惕,停止军事防备。王崇古特别强调指出,不能凭恃一纸和约就全部撤走战守器具,而应利用双方和好的机会着手加强防御措施,整顿边备,以防止敌人背弃和约,再来侵犯。

王崇古的看法和建议,从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出发,立足战略全局,眼光深邃,考虑周全,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作为封疆大吏,他在重大敏感的政治问题上不消极畏避,能直陈自己的见解,也体现出其对国家安全高度的责任感。王崇古的主张得到了同样具有远见卓识的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的大力支持,最终也得到了明穆宗的赞同。隆庆五年,明朝与俺答议和,封俺答为顺义王,其他蒙古各部首领也先后封为都督同知、指挥同知、千户、百户等官职。不久,明朝又恢复了与蒙古诸部的贡市。

俺答封贡,是明中后期乃至整个明代政治军事方面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古代边疆史上的重要事件,意义非凡。它结束了蒙古各部与明朝近200年的尖锐对立和战争状态,明朝自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的北部边防危机基本得到解除,“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①。这种较为安定和平的局面一直保持到明末,对后来的清朝边防格局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清人魏源即曾评价说:“不独明塞息五十年

^① 《明史·王崇古传》。



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①。俺答封贡还再度确立了蒙古各部政权与中央政权的从属关系,促进了蒙汉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这点上说,王崇古不愧为治世安邦之能臣良将,正是他力陈主张,促成了俺答封贡,与高拱、张居正及俺答、明穆宗等人一起,共同为国家的安定和统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① 《圣武记》卷十二《武事余记》。



宋应昌论援朝抗倭

题引：宋应昌(1536~1606年)，字时祥，号桐冈，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历官知州、巡抚、兵部右侍郎等。万历二十年(1592年)，奉命经略朝鲜率师援朝抗倭，收复平壤等地后，兵部尚书石星等竭力主张撤兵议和，宋应昌则上疏认为不妥。本篇节选自《明经世文编》卷四〇二《宋经略奏议二·慎留撤酌经权疏》(参见《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二《援朝鲜》)。

【原文】

封贡之事^①，臣方差官与之讲论。彼止欲请封，即与之封，封后二三年无事，果可与贡，另议与贡。事体次第，应该如是，无庸论矣。至如留守之事，正今日所当亟为讲求者，何也？盖朝鲜与中国势同唇齿，非若琉球^②诸国泛泛之可比也。唇亡齿寒，自古言之，休戚与共，是朝鲜为我中国必不可失之藩篱也。故臣尝谓朝鲜为蓟、辽、保东吃紧屏翰，全罗、庆尚系朝鲜一国吃紧门户，此乃臣之实言，非诬语也。守全、庆则朝鲜可保无事，失全、庆则朝鲜危矣；守朝鲜则四镇^③可保无事，失朝鲜则四镇危矣。今日御倭之计，惟守朝鲜为至要，守朝鲜之全罗、庆尚，则尤要也。

【译文】

(关于)册封纳贡的事情，我正派官员同日方谈判讨论。对方只想请求册封，那么就答应给予册封，册封后二三年之内不出问题，果真可以让其纳贡了，另外再商议让其纳贡。事情的先后次序，应当就是这样，用不着争论了。

① 封贡之事：指侵朝日军可能向明朝提出的议和要求，给予册封，并互通贡市(以纳贡的名义与明朝进行贸易往来)。

② 琉球：古国名，在今琉球群岛。明初开始遣使来华，朝贡称属，接受册封。至清末为日本吞并，改为冲绳县。

③ 四镇：指辽东、蓟州、昌平、保定四处军事要地。



至于留守(朝鲜)的事情,正是当下应当急需商讨谋求的,为什么呢?因为朝鲜与中国是唇齿相依的形势和关系,不是像琉球那些(利害关系)一般的国家所能相比的。唇亡齿寒,从古代以来就这么说,朝鲜同中国利害攸关祸福与共,是中国绝对不能失去的藩屏。因此我曾经说朝鲜是蓟州、辽东、保定等镇东面的重要屏障,全罗道和庆尚道是朝鲜整个国家的重要门户,我说的这是实话,不是欺骗之词。守住全罗、庆尚道那么朝鲜就可以确保安全无事,失去全罗、庆尚道那么朝鲜就危险了;守住朝鲜那么(辽东、蓟州等)四处边镇就可以确保安全无事,失去朝鲜那么这四个镇就危险了。现在抗击抵御日本的策略,以守卫朝鲜最为重要,守卫朝鲜的全罗、庆尚道,则尤其重要。

【评析】

明万历中期,刚刚结束了藩侯割据纷争局面、基本完成全国统一的日本立即走上对外武力扩张的道路。关白(即宰相)丰臣秀吉野心勃勃,妄图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建立一个包括中国、朝鲜在内的日本大帝国,成为整个东亚的最高统治者。万历二十年(1592年),丰臣秀吉派遣水陆军16万人进入朝鲜,很快占领王京汉城、开城、平壤等地。朝鲜国王逃往义州,并接连派使臣向明朝求救。这年七月,明朝应朝鲜请求派出副总兵祖承训、游击史儒等率兵3000人入朝应援。由于兵力过少,又不谙敌情、地理,明军在冒然进攻平壤时中伏惨败。消息传来后,明朝又派兵部侍郎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提督,统兵数万进援朝鲜。

次年初,李如松督率明军取得平壤之役的胜利,接连恢复平壤、开城。但在进逼汉城时,因轻敌中伏在碧蹄馆失利,被迫退守开城一线。不久明军援兵到来,切断日军粮道,焚烧龙山粮仓,使敌陷入缺粮的困境。而日军自平壤战败后士气低下,加上疫病流行,遂撤出汉城,退至釜山一带,并向明军提出和谈。而此时原本主战的明朝兵部尚书石星等人,以明朝大军在外已久,一意主张撤兵议和。经略宋应昌虽然同意议和,准予对方封贡的请求,但是却反对马上撤兵,主张留守朝鲜。他在奏疏中指出朝鲜与中国是“势同唇齿”、“休戚与共”的战略关系,彼此利害攸关,因此必须留兵驻守,防范日本,保障朝鲜和中国自身的安全。

宋应昌能从地缘关系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认识到援朝抗倭的重大意义,并把留守朝鲜视为当时抗击日本侵略最紧迫重要的大事,确属难能可贵。但他在议和问题上却立场不够坚定,为图尽快结束战争,附和石星等人的主

张,在李如松进攻汉城受挫后,即派略通日语的沈惟敬到汉城与日军议和,表现出缺乏坚决抗敌的决心和对日本侵略野心没有足够的警惕性。事实上,日军当时尚未受到决定性的打击,因此议和的主要目的并非是要停止侵朝战争,而是一种缓兵之计,通过暂时休战来重新积蓄力量,并引诱明军撤兵,等待时机成熟以卷土重来。就在双方和谈期间,日军也不断行动,攻犯咸安、晋州等地。

当时明朝政府中有一些比较有远见的官员,都反对轻谈和议及封贡。兵部主事曾伟芳就上书明白指出:“(日军)知我兵未撤,不能以一矢相加遗也。欲归报关白(丰臣秀吉),卷土重来,则风帆不利,正苦冬寒。故曰:款^①亦去,不款亦去。沈惟敬前倭营讲媾,咸安、晋州遂陷,而欲恃款,冀来年不攻,则速之款者,速之来耳^②。故曰:款亦来,不款亦来。为今日计,宜令朝鲜自为守,吊死问孤,练兵积粟,以图自强。”^③但执掌朝权的主和派最终还是作出了撤兵的决定,只留刘綎率领四川兵协助朝鲜防守,其他主力部队全部撤回国内。

撤兵决定是个极大的失策,和议给了丰臣秀吉充足的备战时间。万历二十五年,日军再次大举入侵朝鲜。朝鲜告急,明廷仓促间只得重新调兵援朝。经过中朝军队的奋勇苦战,至次年底将日军全部赶出朝鲜。援朝抗倭战争的胜利,粉碎了日本侵占朝鲜、进而进攻中国的图谋,确保了朝鲜的领土完整和明朝的国家安全;使广大人民免除一场浩劫,意义是十分重大深远的。

但此次战争也暴露了明王朝政治的腐败及其决策机制的低能。在关乎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策略上,明朝的决策中枢始终摇摆不定,时战时和,缺乏全力抗战的决心和信心。战争指导上屡屡失误,汉城碧蹄馆之战后轻信和谈、盲目撤兵,更是令自己失去先机,陷入被动。整个战争迁延达7年之久,大大消耗了明朝本已趋于衰落的国力。

① 款:和议。

② 速之款者,速之来耳:意为和议越快,日军卷土重来越快。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二《援朝鲜》。



许孚远论开放海禁

题引：许孚远(1535~1604年)，字孟中，号敬庵，浙江德清人，历官至南京兵部侍郎。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侵略朝鲜后，明朝再次颁布海禁令，时任福建巡抚的许孚远上疏表示反对，请求继续开放海禁。本篇节选自《明经世文编》卷四〇〇《敬和堂集·疏通海禁疏》。

【原文】

夫沿海居民凭藉海滨，易与为乱。往者商舶之开，正以安反侧、杜乱萌也。乃今一禁，彼强悍之徒，俯仰无赖，势必私通。继以追捕，急则聚党遁海，据险流突。……然禁之当有法，而绝之则难行。何者？彼其贸易往来，余谷他处，以有余济不足，皆小民生养所需，不可因刖而废屦者也。不若明开市舶之禁，收其权而归之上，有所予而有所夺，则民之冒死越贩者，固将不禁而自止。臣闻诸先民有言：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禁商犹易，禁寇实难，此诚不可不亟为之虑。且使中国商货通于暹罗^①、吕宋^②诸国，则诸国之情尝联属于我，而日本之势自孤。日本动静虚实，亦因吾民往来诸国，侦得其情，可谓先事之备。又商船坚固，数倍兵船，临事可资调遣之用；商税二万，不烦督责军需，亦免搜括之劳。市舶一通，有此数利。不然，防一日本，而并弃诸国，绝商贾之利，启寇盗之端，臣窃以为计之过矣。

【译文】

沿海居民凭借靠近海边(之便)，容易结党作乱。以往开放商船对外贸易，正是为了安稳民心、杜绝反乱的源头。如今一禁止(海外贸易)，那些地区的强横凶暴之人，(生活)没有任何依靠，势必私下通商海外。(如果)接着再追踪逮捕，(他们)逼急了就会聚集党羽逃入海中，凭据海上之险奔突流

① 暹罗：今泰国。

② 吕宋：菲律宾古国之一，在今吕宋岛马尼拉一带。



窄。……只是实施海禁应当讲究方法,而完全禁止是难以行通的。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他们往来贸易,到别的地方买进谷物,用(对方)富余的弥补自己所缺少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普通小百姓求生养家所必需的,(他们)不可能因为会断足就不要鞋子了。不如公开开放商船对外贸易的禁令,将事权收归上面,有所给予又有所夺取,那么沿海之民冒着(违法)被杀危险越洋过海买卖交易(的现象),必将不用严禁也会自动止住。我听说古代贤人讲过:贸易开通了那么盗寇转变成成为商人,贸易被禁止了那么商人转变成成为盗寇。禁绝商人很容易,禁绝盗寇实在难,这的确是不能不迫切予以考虑的。况且让中国的商业货物流通暹罗、吕宋各国,那么(由于)这些国家曾与我国有联结藩属关系,这样日本的处境自然(会变得)孤立。日本的动静虚实,也会因为我国商民往来这些国家,侦察得知到情况,可以为之预先做好准备。另外商船坚固,数量是兵船的几倍,遇到有事可以调取差遣使用;商税收入(每年)税银二万(两),不必劳烦从粮饷军需中督促索求,也可免去搜求征集的辛苦。商船对外贸易一旦开通,会有这样几种好处。否则,(为了)防范日本一个国家,却连并其他海外各国一齐放弃,断绝了商人的利益(来源),开启了(由商转为)盗寇的祸端,我私下认为这种策略和做法是不对的。

【评析】

嘉靖末年,困扰明朝将近200年的倭患终于得以基本肃清。在此前后,东南沿海地区的民间私人海上贸易活动冲破官府的重重阻碍,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与此同时,随着沿海地区倭寇问题的解决,海禁政策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已成为一种严重的桎梏和障碍。社会各阶层要求开放海禁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形势下,隆庆元年(1567年),新即位的明穆宗不得不接受福建巡抚涂泽民的上奏意见,宣布解除海禁,允许私人船舶前往东西洋贸易。但唯独日本仍在禁止之列。此外还严禁将硝黄、铜、铁等货物,夹带出海。

隆庆开海后,民间海外贸易特别是中国到西洋各国的贸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当时人称颂说:“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剗脍脍,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①由此可见,开海之后带来的好处是极

^① 明·张燮:《东西洋考》周起元序。



大的。然而到了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鲜,矛头直指中国,为防御日本的人侵,明廷于是再次下令在沿海实行海禁。

应该说,明廷基于维护海防安全的需要这么做,出发点无可厚非。然而用重拾海禁的老办法期望达到目的,开历史倒车走回头路,显然属不智之举。海禁已经被此前的史实证明并不能解决海防安全面临的问题,弊端和害处很多。而最大的弊端和害处,许孚远在疏中非常明确地指陈了出来,那就是海禁只会导致福建等贫瘠少地、经济方式以海外贸易为主的沿海地区商民失去生计,逼迫他们出海走私,甚至铤而走险沦为海盗,与官府进行对抗,从而引发海疆的动乱不宁。因此,他认为完全禁绝私人对外贸易是不可能的,与其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不如公开开放海禁,在“收其权而归之上”的同时,“有所予而有所夺”,即于通之之中,申禁之之法,将私人海上贸易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置于国家和政府的管控之下,这样则比较切实可行。

许孚远还对明政府为防备日本而连带禁止整个海外贸易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一种舍本逐末、因小失大的行为。在他看来,只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商人通倭及将违禁的铅硝等货物运往日本,准许私人远贩东西二洋未必不可。何况,开放海禁后,通过中国商品流通于与明朝有藩属关系的吕宋、暹罗等国,可以从经济上加强与这些国家的联系,从战略上孤立日本。同时通过中国商民往来这些国家,也能侦知、了解日本国内的动静虚实,从而可以预先作出应对。自明初以来,特别是嘉靖时与日本断绝关系之后,明朝上下对日本的局势发展和动向几乎茫然无知,也不懂得怎么去获知,许孚远主张利用商业活动获取其情报信息,就当时来说的确是独树一帜、高人一筹的见识。

此外,许孚远在奏疏中还指出了开海贸易的其他好处:既可以在遇到海防有事的时候征调数量多、质量坚固的商船,又能征收商税以补贴兵饷,从而省去穷搜极括之劳。总体而言,他认为重新开放海禁,有利于国计民生,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确保海防的安全,是一举而数利的事情。

由于许孚远的奏疏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疏通开放海禁的必要性,对比强调了开海禁海的利弊,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和实质,分析透彻,提出的对策又较为妥当,因此引起了明廷的重视。不久,明神宗就批准下令福建重开海禁。尽管此次开禁依然十分有限度,如仍禁止对日贸易,禁止硝黄、铜、铁等战略物资的出口,并且对出海贸易的船只数目等都有严格限定,但毕竟反映了统治者对自身在安全战略上失误的匡正,避免了在禁海问题上重蹈历史覆辙。



徐光启论御后金策

题引：徐光启(1562~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历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曾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研习西方科技，精通天文、历算、火器，在明与后金争战中，力请铸西洋大炮御敌。本篇节选自《明经世文编》卷四八九《徐文定公集二·谨申一得以保万全疏》。

【原文】

臣之愚见以为，广宁^①以东一带大城，只宜坚壁清野，整備大小火器，待其来攻，凭城击打。一城坚守，彼必不敢募越长驱；数城坚守，自然引退。关^②以西只合料简大铕，制造火药，陆续运发。再用厚饷招募精兵能守城放砲者，令至广宁前屯^③、宁远^④诸城，助之为守。万勿如前二次列兵营火砲于城壕之外，糊涂浪战，即是目前胜算矣。待兵力果集，器甲既精，度能必胜，然后与战可也。……今欲以大以精胜之，莫如光禄^⑤少卿李之藻所陈，与臣昨年所取西洋大砲；欲以多胜之，莫如即令之藻与工部主事^⑥沈荣等鳩^⑦集工匠，多备材料，星速鼓铸；欲以有捍卫胜之，莫如依臣原疏建立附城敌台，以台护铕，以铕护城，以城护民，万全无害之策，莫过于此。

① 广宁：今辽宁北宁。

② 关：即山海关。

③ 广宁前屯：即广宁前屯卫，驻今辽宁绥中西南前屯镇。

④ 宁远：今辽宁兴城。

⑤ 光禄：即光禄寺，官署名。北齐时始置，掌宫殿门户及百官朝会膳食等事。长官为光禄寺卿，佐贰官(副官)为少卿、寺丞。

⑥ 主事：官名。汉代光禄勋所属有主事之官，后历代中书、尚书等官署均置为属官。北魏时称主事令史，隋唐后称主事，掌管文书案牍等事，不在正规职官之列，级别很低。金代以后始用士人担任，明代为各部司官中最低一级。清代相沿，除六部外其他许多官署亦设此官。

⑦ 鳩：同“纠”，聚集、集合。



【译文】

我的愚笨意见认为,广宁以东附近一带的大城,只适于坚壁清野,整理准备好大小火器,等后金军来进攻,凭据城池施放攻击。(有)一座城坚守,对方一定不敢越过长驱直进;几座城(都)坚守,(他们)自然会退走。山海关以西地区只应挑选威力大的炮铳,制造火药,陆续运送发放(给前方)。再以丰厚的饷银招募能守城放炮的精兵,命令他们到广宁前屯、宁远各城,协助防守。千万不要像前两次那样在城壕外面陈列兵营和火炮,糊涂轻率作战,这就是眼下能够获胜的计策了。等到兵力最终集结,武器已经精良,估测一定能取得胜利,然后就可以与敌交战。……如今要凭借威力大武器精战胜后金军,最好就是光禄寺少卿李之藻所奏陈的和我在去年所购取的西洋大炮;要凭借数量多战胜后金军,最好就是马上命令李之藻与工部主事沈桀等人召集工匠,多准备原料,火速鼓风铸造;要凭借有所保护战胜后金军,最好就是按照我原先的奏疏(当中所说的)建立依傍城池的敌台,用敌台保护铳炮,用铳炮保护城池,用城池保护人民。(这样就)万无一失没有弊端,没有比这更好的策略了。

【评析】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就是重“道”轻“器”,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①。反映在军事上则表现为注重道义力量,注重谋略运用,而相对忽视科技的因素。这种观念倾向使得历代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大都停留在以智谋取胜的“形而上”的层面上,而对“形而下”的“器”——武器装备的革新、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往往重视不够。能站在时代前列,充分认识到先进军事技术和装备在保障国家安全,尤其是军事安全方面作用的有识之士寥寥无几。徐光启便是这为数不多者中突出的一个代表。

明代后期,崛起于东北地区、由满族建立的后金政权成为明朝北方新的重大安全威胁。在经历万历末年萨尔浒之战的惨败之后,明朝对新兴起的后金政权一直处于战略守势,多次争战均以失败告终,丢失了辽河以东大片土地。面对辽东危局,忧心国事的徐光启接连上疏,提出御敌之策。他认为只

^① 《周易·系辞上》。



讲用兵方略,而不从改善军事装备、提高军队战斗力入手,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当务之急和根本之计是坚甲利器、选练精兵,建设一支武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他特别强调火器的重要独特作用,主张引进和制造西洋大炮(也称“红夷大炮”,为欧洲早期加农炮),对付后金军的进攻。并提出运用葡萄牙人在澳门的炮台建造技术,改造传统的塞上墩台城堡,将火炮防御与保护火炮结合起来,以炮护台,以台护炮,两者互为依存,凭借坚城有效发挥火器的威力,打击敌人,保全自己。本篇论述,集中全面反映了他的这一军事思想。

西洋大炮在当时是最先进的火器,不仅威力大,而且射程远,机动性好,是先期传来的葡萄牙佛朗机铳和明朝自制火器所无法比拟的。但是鉴于在城外野战是后金军之长,而为明军之短,如果阵地一失,火炮势必落入敌人之手,因此徐光启坚决反对像以往那样在平地旷野使用大炮,而主张将西洋大炮安置于城上敌台内。敌台则采取西洋炮台造法,建于城的四角,三面伸出城外,一面与城相接。大炮架于台上,可以调整角度,三面轰击。即使敌冲到城墙下,门角两台攒射形成交叉火力,也能予以很大杀伤。

徐光启提出的凭坚城用大炮的战法,符合当时战争的客观形势,体现了扬长避短、克敌制胜的谋略思想。他对西洋大炮的极力推崇,积极要求输入和仿造,实际上就是要在实战中拥有和应用“撒手铜”武器抗御强敌,增强军事实力,赢得战争,巩固边防。这种思想主张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也是十分可贵的。徐光启的建策为明廷所采纳,从澳门购买和制造西洋大炮的任务也主要由他负责完成。后来袁崇焕把“器胜”的军事思想运用于对敌实践,使用徐光启倡导的西洋台铳法构筑了宁远城,将大炮安在四角敌台上施射,重挫前来进攻的后金军,取得了天启六年(1626年)著名的宁远大捷。这是明与后金争战以来前所未有的胜利。令人遗憾的是明朝政治的腐朽不堪最终还是导致军事上的一连串失利,随着大批明军将领叛变投敌,赖以致胜的西洋大炮等新式武器及技术也为后金所拥有,从此明朝再无任何军事优势可言,其衰败之势更加难以挽回。



马文升论爱民以固邦本

题引：马文升(1426~1510年)，字负图，号约斋、三峰居士，钧州(今河南禹州)人，历仕五朝，官至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弘治时，针对赋役渐重、百姓不堪负担，马文升上疏极陈其害，恳请恤民养民维护国本。本篇节选自《明经世文编》卷六十三《马端肃公奏疏二·恤百姓以固邦本疏》。

【原文】

切惟自古人君之有天下，未尝不以爱养斯民为首务也。仰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万方，惓惓以仁爱养民。凡遇灾伤，即免税粮。虽丰收之年，度其仓廩有余之处，亦量蠲免。地亩税粮，十一而税。凡一应供用果品、牲口、颜料等项，俱于粮石内免粮买办，未尝分毫重科于民。视彼成周，尤为过之。列圣相承，咸遵是道，所以人民殷富，而天下晏然。自成化^①以来，科派不一，均徭^②作弊，水马驿站之剋害，户口盐钞^③之追征，加以柴薪皂隶^④银两、砍柴抬柴夫役，与夫买办牲口厨料、夏秋税粮马草，每省一年有用银一百万两者，少则七八十万两。每年如是，所以百姓财力竭，而日不聊生也。一遇荒歉，饿殍盈途，盗贼蜂起。若不痛加减省，大为苏息，诚恐将来之患，有不可救者矣。

① 成化：明宪宗年号(1465~1487年)。

② 均徭：明代按民户丁粮多寡而编排均派的杂泛差役。一户或编一差，或编数差，也有数户共编一差，轮差次序十年或三五年一次。均徭分力差和银差两种。力差指应役户亲自充役(后准募人代役)，银差即一部分均徭折成银两缴纳。后来也有力差折征银两者。万历九年(1581年)后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均徭并入田赋征收。

③ 户口盐钞：明初实行户口食盐制，政府按户口配给食盐，计口纳钞或钱粮。后私盐盛行，政府不再配盐，然而盐钞仍旧征收。

④ 柴薪皂隶：明代一种杂役。主要到各级衙门充当官员的随从跟班，从事买柴烧水等杂活。



【译文】

自古以来君主帝王获得天下,未曾有不以爱护抚养百姓为首要事务的。我朝太祖皇帝受天命恩顾,统有全国,诚恳施行仁德慈爱来让人民生存休养。凡是遇到灾害(年份),就免去税粮。即使是丰收的年份,也估量那些粮仓富余的地方,根据情况免除(税粮)。田地税粮,税率为十分之一。凡是一切上供使用的果品、牲口、颜料等(征收实物的)名目,都派人采买办理并免其分内所应承担的粮税,丝毫不曾向民户加派征收。比起周代来,还要超出胜过。(太祖之后)历朝皇帝继承延奉,都遵守这个办法,因此百姓殷实富裕,天下安静太平。自从成化年间以来,赋役征派不统一,均徭法存在舞弊,水夫、马夫、驿递夫役的侵害,户口盐钞的加派,加上柴薪皂隶、砍柴夫与抬柴夫役银两,和牲口厨料的采买、夏税秋粮马匹草料银的征收,每省一年(多则)有需要支用银子一百万两的,少则要七八十万两。每年如此,因此百姓财穷力尽,而越来越无法生活。一遇到荒年歉收,饿死的人填满道路,盗贼蜂拥而起作乱。如果不严厉地予以精简减少,大力恢复休息,只怕将来的祸患,会发展到无法挽救的地步啊!

【评析】

一个国家的政权巩固与否,维持的时间有多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统治阶级能否正确处理好与人民的关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要正确处理好与人民的关系,就必须要以民众的利益为立国之根本,即所谓“民为邦本”,一切措施的制定与实施都要以这个为前提。如果处理不好与人民的关系,处处危害广大民众的利益,就会遭到人民的抛弃,政权就会覆亡。反之,则政权稳固,国运昌隆。

关于立国安邦必须以人民为根本的政治观念,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已被提了出来。《尚书》上就有“后非众,罔与守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历代王朝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民众对君主和国家存亡的极端重要作用,民为邦本的思想也不断得到肯定和强化。孔子指出:“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



亡”^①。荀子曾形象地比喻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②西汉的政治家贾谊反复强调“国以民为安危”、“国以民为存亡”、“国以民为兴坏”^③。唐太宗李世民则总结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④的道理。

明太祖朱元璋也是比较能认识到“民为邦本”道理的封建君主，他亲眼目睹了元朝在农民起义风暴中覆亡的事实，深刻懂得存恤百姓、爱民养民的重要性。因此，在建立明朝后各项措施的制定均基本围绕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思想来进行，取得的效果也非常显著，虽不至像马文升所夸誉的“视彼成周，尤为过之”，但“人民殷富，而天下晏然”还是符合实际的。具有浓厚民本思想意识的马文升在奏疏中通过对比明初，直言不讳地指出，成化之后苛捐杂税增多，赋役严重不均，导致了百姓的负担越来越沉重，民不聊生，这种不爱民惜民的做法如果不及时加以纠正改善，再发展下去，势必酿成大患，对国家政权造成无法挽救的危险后果。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其出发点和目的在于确保君权的稳固和家天下的长久，归根结底是立足于君主的利益，实质上还是以君为本。作为传统的封建士大夫，马文升的思想不可能超出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但是它所包含的“仁爱养民”的意识，以及视民安为国安之根本的观念，仍具有积极的思想价值。

① 《礼记·缁衣》。

② 《荀子·王制》。

③ 《新书·大政上》。

④ 《贞观政要》卷一《君道》。



薛应旂论省官

题引：薛应旂(1500~1573年)，字仲常，号方山，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嘉靖进士，曾任知县、通判、提学副使等官，著有《宋元资治通鉴》、《宪章录》等。在著述中，对明中期之后设官泛滥导致的弊病提出批评，主张减省冗官。本篇节选自《明经世文编》卷二八八《薛方山文集·省官议》。

【原文】

我国家设官之制，准周六典^①，参酌前代，文武无偏重之权，内外有相维之势，诚足以垂之万世而无弊者矣。但其间亦或因一事而分一官，或有因一时而设一职，积习既久，遂以为常。不有以省之，则无益于事，只以扰民。《记》曰：“官不必备，唯其人。”《书》曰：“知人则哲，能官人。”盖官有大小繁简之殊，才有短长能否之异，称其职则政立，枉其能则事乖。故先王立庶官而后求人，使之各司其局也；辨众才而后人仕，使之各尽其能也。如此则官虽省，而庶事理矣。

【译文】

我朝设定官制，以周代的六典为依据标准，参考择取前代各朝，文职和武职没有(哪一方)权力偏重，内(中央)官和外(地方)官形成彼此维系相互制衡的情况，确实完全可以传承万代也没有弊端。然而这中间或者因为某一件事情，或者因为某一时(的需要)而分设某一官职，时间积累长了习惯了，于是就成为了常制。(如果)不进行裁减，那么对事情没有什么帮助，只会扰害老百姓。《礼记》上说：“置官不必太多和齐备，只在于所任的人是否得当称职。”《尚书》上说：“了解别人的人就是聪敏睿智的，(他)能够用适当的人做官任事。”官职和所任事情有大与小、繁琐和简单的区别，才干和能力有短和

^① 六典：周代六种治国法典的合称。即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由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六官分掌。



长、是否适合职位的差异,称职就能成事,不称职就会把政事搞坏。因此古代的帝王先设置好各种官职然后再去寻找(合适担当的)人,使他们各自管理负责本部门;察明辨别众人的才能之后再让其做官,使他们都能将才能完全发挥。这样就做到了官位虽然减少,但各种事情却得到了治理。

【评析】

明朝中后期尤其是嘉靖以后,国家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土地兼并剧烈、赋役不均导致农民大量逃亡是一方面原因,而官僚和贵族寄生集团数量的激增、开支耗费巨大也是另一种不可忽视的原因。

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宗室人口的繁衍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而官员人数的增长之快同样触目惊心。嘉靖年间霍韬奉命编修《大明会典》,在检查天下册籍时发现:“天下武职洪武初年二万八千余员,成化五年增至八万一千余员,锦衣卫官洪武初年二百一十一员,今增一千七百余员,由二万而八万,增四倍矣;由二百而一千七百,增八倍矣。”^①这还只是武官,至于文官人数,更是一个无法统计的庞大数字。

官员数量的增长,原因固然有薛应旂在本篇所说的“其间亦或因一事而分一官,或有因一时而设一职”,但根本原因还是政治的腐败。到嘉靖、隆庆年间,很多人通过边功升授、勋贵传请、大臣恩荫甚至直接捐买等途径当官,导致文武官员的数量激增。与此相同步,则是官吏银米俸禄支出数目的猛升。更严重的是,这些冗官冗员不仅于治国安民无补,反而大多贪赃枉法中饱私囊,极尽扰民害民之能事。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给事中罗嘉宾等查核军饷开支,发现督、抚诸臣侵吞军需之数,多者“以十万四千计”,其他“或以万计,或以数千计”^②。吏治败坏导致了冗官泛滥,冗官泛滥反过来又加剧了吏治败坏,直接恶果就是造成了国家财政的全面匮乏。嘉靖中期以后,明朝的财政就经常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财政危机日益成为困扰明朝政府的紧迫现实问题。

不仅明代如此,从历史上来看,官吏人数过多往往是许多封建王朝政治危机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冗官不仅导致行政运行效率的降低,而且造成民众负担过重,从而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隐患。历代有识之士都一针见血地指

^① 《明经世文编》卷一八七《霍文敏公文集三·修书陈言疏》。

^② 《明通鉴》卷六十二世宗肃皇帝嘉靖三十九年。



出了这点。唐代名臣刘晏就认为“官多则民扰”^①。宋代学者黄震也总结出“官多则吏多,吏多则民扰”^②的规律。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顾炎武更认为“官多则乱,将多则败”^③。因此在他们看来,要想减轻和避免这种对政治管理的负面影响,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真正稳定,就必须裁汰过多的冗官冗吏。

薛应旂的这篇《省官议》,在指出官多扰民弊害的同时,也明确提出了“省官”的建议,要求统治者削减官职和官员数量,吸取古代贤明君主在设官任官上积极有效的做法,以客观实际的需要为官职设置的依据,以官员的能力素质作为任命的标准,做到人称其职,各尽所能,这样即使官不多也能使国家得到治理。这种见解和主张,对积重难返正走向没落的封建王朝来说多少显得有些理想化,但它为解决国家政治安全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具有一定的长远思想价值。

①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六《唐纪四十二》德宗建中元年。

② 《黄氏日抄》卷七十一。

③ 《日知录》卷五《医师》。



高拱论漕粮海运

题引：高拱(1512~1578年)，字肃卿，河南新郑人，嘉靖末年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隆庆末年为内阁首辅。当政期间鉴于漕河经常淤塞，主张开通海路，两路并运。本篇节选自《明经世文编》卷三〇二《高文襄公文集二·论海运漕河》。

【原文】

国家财赋，仰给东南，漕粮不至，则京师坐困。然漕河甚可虑，年年淤塞，年年修筑，为功促迫，劳费已多，又不的当，而挽运犹阻，此其一也。且一衣带之水，筑之甚难，决之甚易；通之甚难，塞之甚易。意外之防犹不可忽，此又其一也。予昔当国时，念此至深，乃计通海运，非元之海洋中运也，乃边海一道商贩私往来者。自淮直达京师，一风之便，数日可至。既不患于迟延，而较诸漕河挽运，且省无穷之力。况海运既通，则漕河自可安心修筑，不至迫促而罔功。奏功之后，二路并运。脱有一路之阻，亦自有一路之通，京师可以坐俟无忧。且国计既不专恃漕河，则意外之防可弥，所以伐谋者即此而在，此万年之计也。

【译文】

我朝的财政赋税，仰仗东南地区供给，漕粮运送不到，京城就会坐等陷入窘困。可是运送漕粮的河道很值得担忧，年年淤塞，年年修理，工程紧急匆促，耗费已经众多，又不恰当适用，运输却仍然不畅通，这是一方面。况且如同衣服带子那样狭长的水道，修筑很难，冲垮很容易；疏通很难，阻塞很容易。对意料不到事故的防备也还不能忽视，这又是一方面。我以往当政的时候，对这件事考虑极其深远，于是筹划开通海运，不是元代那样走海洋当中运，而是商贩们私下往来贸易的沿着海边的一条线路。从江淮直接通达京城，一路借助风的便利，几天就可以到了。既不用担心推迟延误，同时与从漕河运输比较，又节省了不知多少的力气。况且海运通了之后，运粮河道就自然可以



安心修理了,不至于(因为)急迫仓促而没有效果。事情成功之后,海运和漕运两路同时进行。(即使)因阻碍而失去了一路,自然还有能通的另一路,京城可以稳坐等待不用担忧。此外国家经济既然不专门依赖漕河了,对意料不到事故的防备就可停止,故而以谋略称胜的道理就在于这里,这是万年长久的谋划。

【评析】

隋朝开凿的大运河是中国封建时代联系南北地区的大动脉,它不仅对于封建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关系到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国家政权的稳固。因此历朝历代都对漕运高度重视,确保漕粮和物资运输的畅通无阻,成为统治者着力思考谋划的一大战略问题。特别是随着封建国家统治中心的北移,这一问题凸显得尤为重要。

元代建都大都(今北京),北方军粮、官俸及宫廷耗费,绝大部分仰赖于富庶的江南地区。而负责将南方物资北输的漕运,因为运河淤塞、行船不畅,后来不得已被废罢,主要实行海运。明朝建国初,都城定于南京,由于位处江浙地区,故而南北漕运未成重大政治任务与经济问题,北边所需军粮的转运仍沿承元代的海运路线。但到了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南粮北调的任务开始日益加重。在此之前,鉴于海运路途险远,海船又经常失事,明廷决定修浚治理运河,改行漕运。永乐十三年(1415年)大运河贯通后,海运于是基本停止,漕粮大多由河运。

但是,海运在明代仍然有着相当的影响。自明中期后,不断有人提出恢复海运。其中最有名、呼吁最有力的,当属高拱和在其之前的丘濬两人。他们都认为比起漕运来,海运的成本更低,耗费更少,危险性更小,因此都极力主张恢复海运,与河运并行,并且都把此事看作是国家万年之计——“千万年深远之虑”^①,是攸关封建王朝生存命运的重大战略举措。高拱在做内阁首辅期间,曾主持计划重新实行海运,后来从江淮直达北方的海运也一度短暂恢复过。

从明中后期漕运面临的实际情况来看,恢复海运也确实有一定的必要性。到了嘉靖、隆庆和万历时,由于长期专赖河运导致运河负载过量,加之黄河溃决,运河河道堵塞,漕运已经变得困难重重。为解决这一问题,明政府还

^①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三十四《漕挽之宜下》。



曾考虑重开元代曾短暂试行过的胶莱运河工程,缩短海运航程,进而恢复海运。但由于河道水源不足、工程复杂艰巨等原因,直到明亡,虽屡有人请开胶莱河,最终均未果作罢。终明之世,海运也没有全面恢复起来。

高拱等人的主张尽管受种种条件限制未能实现,却集中反映了明朝国家政治中心北移后,河运、海运并行乃是漕运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高拱本人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思考漕运问题,力倡河运、海运“二路并行”,是有长远眼光的。

第八章 清前期

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示自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弃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也。

——清·乾隆《十全记》



概 述

清朝,自1644年至1911年,历时268年,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历史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分水岭,分为前期和后期。清前期(1644~1839年)历时196年,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直至最终定型的重要时期。近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就是在这—时期开始形成的。清朝前期,统治者所面临的内外形势,较之以往任何朝代都更为特殊复杂。因此,在国家安全上所采取的方针和战略,也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鲜明特点,具有独特的内容。

对内来说,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入关定都北京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面临着建立和巩固全国性政权、稳定统治秩序、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的重大战略任务。如何完成这些任务,成为清朝统治集团战略决策的出发点。从康熙时期起,针对各种分裂割据势力及反清力量严重威胁清王朝统治和社会安定的严峻现实,清朝统治者筹划和制定了相应的对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制止分裂、完成全国统一的过程中,统治集团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调整战略策略,对事关国家安危的重大战略问题的处理,总体来看取得了成功,有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影响深远。如严格建立镇将经常赴京朝觐的制度,限制将权膨胀,使将领拥兵自重、心生异志的情况得以杜绝;在平定统一西北时全盘统筹,将西藏、新疆、蒙古纳入整体战略考虑范围之内,最终以打击边疆地区叛乱割据势力为契机,统一喀尔喀蒙古、新疆、西藏,奠定了中国的疆域基础。尤其是在武力平台之后,采纳施琅固守台湾的主张,在台设官治理,派军驻守,将台湾正式纳入国家版图。这一战略举措,对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巩固东南海防,抵御西方殖民侵略,具有深远重大的意义。

在完成全国统一并巩固政权的同时,如何治理边疆地区,也是统治者迫切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以康熙、雍正、乾隆诸帝为代表的清前期君主,深切认识到处理好民族问题与民族关系对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宽严相济”、“恩威并施”的基本思想和方针,同时强调“因俗而治”,并制定出合乎实际、行之有效的边疆政策,根据边疆不同地区的情况,因地制



宜建立相应的行政制度和机构。通过联姻、封赏、优尊喇嘛教等多种手段措施,密切了少数民族上层贵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加强了对边疆的统治,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巩固了大一统的局面。

对外来说,清朝前期正当资本主义兴起,西方列强开始加速向东进行殖民扩张之时,在边防和海防上,清朝都面临严峻的挑战,如何防范和抵御外来势力特别是西方列强的侵略,成为国家安全战略上一个新的内容。对此,清前期统治者从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的思想基础出发,制定了相应的对策和办法,较好地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在抵御沙俄、英国、廓尔喀(今尼泊尔)等外来势力对边海疆入侵渗透的斗争中,清前期统治者不断增强领土和主权意识,认识到国与国之间签约勘界的重要性,提出了各守疆土、和睦相处的原则,以及必要时使用武力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主张。

但防内甚于防外的一贯主导思想,却使得清朝统治者在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上发生严重偏差甚或错误,如为了防范东南海上反清势力,颁行了长达20余年的禁海迁界令,后来又颁布南洋禁令。而事实上这些消极防御的政策措施非但达不到预期目的,反而不利于国计民生和社会的稳定,故而深为当时不少有识之士所诟议。

由于清廷在防外过程中总是将之与防内挂钩,整个国家安全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此,加之封建统治集团在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直接导致了乾隆中期以后闭关自守国策的逐步确立。其在海防上的表现,就是消极防堵列强于国门之外,而真正有效的应对措施,却少之又少。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清前期统治者对世界形势和国际环境懵懂无知,缺乏将国家安全利益置于世界大潮中进行审视和考虑的战略大视野,固步自封,孤立自闭于世界潮流之外,导致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力差距不断拉大,最终为清后期(近代)的全面落后挨打埋下了沉重的伏笔。



康熙论不修长城

题引:康熙帝(1654~1722年),即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在位61年,曾筹划指挥过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抗击沙俄入侵、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等重大战争。康熙三十年(1691年)和三十五年,康熙帝在与臣下的谈话中阐述了自己不修长城,“修德安民”,抚绥蒙古诸部以安定边疆的思想。本篇选自《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

【原文】

上驻蹕鄂尔哲图阿尔宾敖拉^①地方,谕扈从诸臣曰:“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②,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

工部等衙门议复古北口总兵官蔡元疏言:“古北口一带边墙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应如所请。上谕大学士^③等曰:“蔡元所奏未诸事宜。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④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⑤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

① 鄂尔哲图阿尔宾敖拉:亦名福延山,在今内蒙古多伦西南。

② 喀尔喀:清代漠北蒙古诸部名称。明代驻牧分布于喀尔喀河流域,故而得名。共十二部,其中内喀尔喀五部,外喀尔喀七部。内五部清初编为四部五旗,属内扎萨克(内蒙古)。外七部清初并为四部八十六旗,属外扎萨克(今蒙古国杜尔格湖以东、木伦河以南地区),仍袭用喀尔喀蒙古称呼。

③ 大学士:官名。始置于唐代,掌侍从顾问。明成祖时以翰林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至中叶大学士渐成为内阁长官,替皇帝起草诏令,批条章奏,商承政务。后又多以尚书、侍郎等入阁办事,兼大学士,实权甚重,成为事实上的宰相。清代设立军机处,大学士职权为军机大臣所代替,其称仅作为荣衔授予军机大臣及内外各官资望特高者。

④ 太祖:即清太祖努尔哈赤。

⑤ 路:明代长城沿边设为九镇,其中古北口一带所属的蓟镇之下分为三协,每协之下又分为四路。



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蔡元见未及此，其言甚属无益，谕九卿^①知之。”

【译文】

（康熙）皇上停留暂住鄂尔哲图阿尔宾敖拉一带地方，告诉跟从扈驾的众大臣说：“过去秦代大兴土木，修建长城。我朝对喀尔喀蒙古实施恩德，使其防守北方，比长城更加坚固。”

……

工部等衙门讨论回复古北口总兵官蔡元上疏所说的：“古北口一带很多地方长城城墙倒塌，请进行修筑”，应当依照他的奏请。（康熙）皇上对大学士等人说：“蔡元的奏请在于不明事理。帝王统治天下，自然有其根本，不专门依恃险阻的地形和防御工事。秦代筑建长城以来，汉、唐、宋代也常常修理，那些时候难道就没有来自边境的祸患吗？明朝末年我太祖皇帝统率大军长驱直入，各路明守军土崩瓦解，都不敢抵挡。可见守卫国家的方法，只是在于修养德行安抚人民。民心悦服了那么国家的根本就获得了，而边境自然就稳固，众人的意志就是长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像古北口、喜峰口一带，我都巡视察看，那里城墙大多损坏，现在要修缮，兴起工程劳民作役，怎能不苦害百姓。况且长城广绵延伸几千里，驻扎屯养多少兵力才能各处都能分别把守得到呢？蔡元的见识没有看到这一点，他所说的话很无用处，告诉九卿让他们知晓这个道理。”

【评析】

清代在经营筹划北部边防上与前代王朝的一个最显著的区别，就是放弃了以修筑长城抵御外患的传统边防模式，代之以“修德安民”的治边思想和理念。

清代以前历朝筹边的一大重要思想和措施，就是依托凭借长城设置防

^① 九卿：官名合称。清代通常以六部尚书、理藩院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大理寺卿为大九卿；以宗人府丞、詹事、太常寺卿、太仆寺卿、光禄寺卿、鸿胪寺卿、国子监祭酒、顺天府尹、左右春坊庶子为小九卿。



线,屯兵驻守,实施军事防御。秦汉以来,由于中原王朝的主要外患均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因此“历代备边,多在西北”^①。自秦至明,几乎每个封建王朝都曾修筑长城。明代为防御蒙古鞑靼、瓦剌等部的侵扰,自洪武至万历年间,前后历经200余年,修建了一道东起鸭绿江边、西抵嘉峪关,全长1万余里的“边墙”。然而就历代统治者修长城的效果看,虽然起到了一定的防御作用,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游牧民族南下攻掠的局面。事实证明,仅凭长城是不可能确保边防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在考察居庸关,论及几个王朝灭亡的教训时,曾感慨地说:“地非不险,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粮非不足也,国法不行而人心去也。”^②一语道破了人心向顺对于政权稳固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早在入关以前,清王朝的奠基人努尔哈赤、皇太极便通过联姻、赐爵等手段,积极笼络漠南蒙古各部,使之变为进攻明朝的得力助手。入关后,在统一中国、巩固边疆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进一步采用怀柔安抚蒙古诸部的策略措施。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军在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大败准噶尔部噶尔丹势力。次年五月,康熙帝亲赴多伦诺尔草原,召见、宴赏漠北喀尔喀蒙古三部首领和哲布尊丹巴活佛,以及内蒙古四十八旗王公,共谋北部边疆安定,商讨国家统一大计,史称“多伦会盟”。在举行会盟期间,通过与蒙古各部首领的会面交谈,使康熙帝深切体会到边疆民族渴望国家统一、边疆地区安定的心愿,促使他确立了新的筹边安边的战略思想。在他离开多伦诺尔回京途中停驻在鄂尔哲图阿尔宾敖拉时,对扈从近臣就修筑长城和抚绥喀尔喀蒙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而当康熙三十五年,古北口总兵蔡元因古北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奏请修筑时,康熙帝不仅未予批准,而且借机批评了蔡元,进一步阐发了他关于不修长城的思想主张。

康熙帝的前后两段话,集中反映了他对以长城设防的认识,也反映了他的新的治边思想。概括而言,这就是“不专恃险阻”和“修德安民”,即强调要把实现边疆安全和国家安定的重心,放在“修德”而不是放在“修城”上,通过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一和安抚,使其归心向顺,从而成为边疆的屏藩,在边疆筑起一道真正的长城。这种以少数民族为捍卫边疆主要力量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康熙帝的雄韬大略和远见卓识。应该说,康熙帝的这一思想顺应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发展趋势,不仅是对传统观念的否定,更是对中国古代治

① 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

② 顾炎武:《昌平山水记》。



边思想的一大贡献。后来乾隆帝在评价这一思想时称誉说：“自秦人北筑长城，畏其南下，防之愈严，则隔绝愈甚，不知来之乃所以安之。我朝家法，中外一体……恩亦深而情亦联，实良法美意，超越千古云。”^①

更为重要的是，康熙帝的治边思想被其后的统治者所继承，成为有清一代治边政策的指导原则。清朝统治者通过制定“年班”、“围班”的朝觐制度，以及封爵授衔、优恤赏赐、扶植宗教等手段措施，密切了与边疆各民族上层贵族的关系，联络了感情，增强了其政治向心力。尤其是蒙古族，清朝统治者不仅用封爵、赏赐对蒙古贵族施以笼络，而且采取满蒙世代联姻的制度和做法，用血统关系维系政治联盟，使蒙古成为清朝统治全国的一支重要凭藉力量，不仅彻底解决了历代一直没能解决的北方游牧民族侵扰中原政权这一重大难题，而且真正变其为北边不设防的长城。清朝前期，喀尔喀蒙古在抵御沙俄对我国北方边疆的侵略，巩固边防和维护国家统一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这充分说明，以德化之、人心归附的边疆民族，是有生命力有向心力的万里长城，其坚固程度要远胜以土石堆成的没有生命的长城。清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的战略方针的实施是非常成功的，胜过了历朝。

^① 《热河志》卷二十，清高宗《出古北口》。



康熙论抗击沙俄侵略

题引：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清朝取得雅克萨自卫还击战胜利后，迫使沙俄政府同意停战谈判。康熙帝命索额图等为代表赴尼布楚参加边界谈判会议，在其临行前，召见并就谈判事宜发布谕旨加以指示，表达了其抗击沙俄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本思想。本篇选自《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五。

【原文】

上谕领侍卫内大臣^①索额图等曰：“罗刹^②侵我边境，交战于黑龙、松花、呼马尔^③诸江，据我属所居尼布潮^④、雅克萨^⑤地方，收纳我逃人根特木尔等……其黑龙江之地，最为扼要。由黑龙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库尔瀚江^⑥，及乌喇^⑦、宁古塔^⑧、席北^⑨、科尔沁^⑩、索

① 领侍卫内大臣：武官名。清代侍卫处最高长官。顺治元年(1644年)设，武职正一品。以勋戚大臣充任，镶黄、正黄、正白旗(上三旗)各二人。掌管统帅侍卫亲军，扈从卫护皇帝，地位尊崇。

② 罗刹：俄国的中文译名之一。又译罗禅。清初文献多用作称从西伯利亚来的俄国人，是对侵犯骚扰黑龙江地区的哥萨克人的蔑称。从莫斯科来的俄国人，则被称为鄂(俄)罗斯。

③ 呼马尔：即呼玛尔，指今黑龙江呼玛河(又名库玛尔河)。

④ 尼布潮：又作尼布楚、尼布抽、尼布绰、泥朴处等，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

⑤ 雅克萨：今俄罗斯阿尔巴津。

⑥ 库尔瀚江：即今牡丹江。库尔瀚亦作呼尔(儿)哈。

⑦ 乌喇：又作兀喇、乌拉、吉林乌拉，在今吉林吉林市北松花江东岸。

⑧ 宁古塔：清初设宁古塔将军、副都统，镇守管理今吉林、黑龙江流域及库页岛，驻宁古塔城(今黑龙江宁安)。后宁古塔副都统移驻吉林乌拉，不久又复移回驻宁古塔城，而以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乌拉。

⑨ 席北：即锡伯。又作席伯、西伯等。

⑩ 科尔沁：明清时蒙古部名。亦作火儿慎、好儿趁、廓尔沁等。驻牧今内蒙古东南部一带，明末最早归附后金(清)。



伦^①、打虎儿^②诸处。若向黑龙江口,可达于海。又恒滚^③、牛满^④等江及净溪里江^⑤口,俱合流于黑龙江。环江左右,均系我属鄂罗春^⑥、奇勒尔^⑦、毕喇尔^⑧等人民,及赫哲飞牙喀^⑨所居之地。若不尽取之,边民终不获安。朕以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我之逃人根特木尔等三佐领^⑩,及续逃一二人,悉应向彼索还。如鄂罗斯遵谕而行,即归彼逃人,及我大兵所俘获招抚者,与之画定疆界,准其通使贸易。否则尔等即还,不便更与彼议和矣。”

【译文】

(康熙)皇上指示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等人说:“罗刹人侵犯我边境,同我军交战于黑龙江、松花江和呼马尔江等地,占据属于我国的尼布潮、雅克萨地方,接收容纳我方叛逃的根特木尔等人……黑龙江一带地方,是最关键的要隘之地。从黑龙江往下,可到达松花江;从松花江往下,可以到嫩江;往南走可通达库尔瀚江,及乌喇、宁古塔、席北、科尔沁、索伦、打虎儿各处。如果沿着黑龙江下游入口,可到达大海。另外恒滚、牛满等江及净溪里江口,都在黑龙江合流。环绕黑龙江两岸,都是属于我国的鄂罗春、奇勒尔、毕喇尔等族人民,以及赫哲飞牙喀族人民所居住的地方。如果不把这些地方都占取,边疆人民最终得不到安宁的。我认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以及连通黑龙江的每一条河每一条溪流,都是属于我国的土地,丝毫不能放弃给鄂罗斯。我方叛逃的根特木尔等三名佐领,和跟着叛逃的一两个人,应当向对方全部要回来。如果鄂罗斯遵照告示行动,我们就遣返他们逃归我方的人,以及被我军俘虏招抚的人,同鄂罗斯划分设定疆界,准许其互通使者进行贸易。不

① 索伦:清代对达斡尔族、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的统称。有时也专指鄂温克族。

② 打虎儿:即达斡尔。又作达呼尔、达瑚尔、达呼里、打虎力等。

③ 恒滚:即恒滚河,今俄罗斯境内阿姆贡河。

④ 牛满:即牛满江(河),今俄罗斯境内布列亚河。

⑤ 净溪里江:即精奇里江,今俄罗斯境内结雅河。

⑥ 鄂罗春:即鄂伦春。

⑦ 奇勒尔:清代鄂伦春族的一支,主要居住在今阿姆贡河流域。

⑧ 毕喇尔:清代鄂伦春族的一支,主要居住在今结雅河流域。

⑨ 飞牙喀:清代居住在黑龙江、松花江下游及库页岛等地的少数民族,又作飞雅喀、费雅喀等。有时与赫哲族人混同称赫哲飞牙喀,库页岛的飞牙喀人又称尼夫赫人。

⑩ 佐领:武官名。清代八旗组织中基层编制单位牛录的长官。



然的话你们就回来,不方便再同对方谈判议和了。”

【评析】

沙皇俄国从明朝末年开始侵略我国黑龙江流域,到康熙初年,已经在黑龙江地区建立了尼布楚、雅克萨等重要据点,在此建筑村落,移民垦殖,不断向黑龙江中下游蚕食推进,并煽动中国边境地区各族人民叛逃沙俄境内。

沙俄侵略者的行为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觉,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后,立即把注意力转向北方。在对东北边防进行实地考察后,他清楚地意识到,沙俄侵略者盘踞雅克萨等据点四出扩张,是对中国边境安全的严重威胁。特别是雅克萨距离清朝“发祥之地甚近,不速加翦除,恐边徼之民,不获宁息”^①,因此定下了以武力驱逐侵略者、收复雅克萨的决策。通过两次对雅克萨用兵,最终迫使沙俄政府同意中方提出的派使谈判、划分中俄东段边界的和平建议。康熙二十八年,中俄使团在尼布楚正式举行边界谈判。

以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和都统、一等公佟国纲为首的清方使团临行前,康熙帝亲自召见他们,以发布谕旨的形式专门就谈判事宜进行指示,向他们交代了谈判的基本原则和需坚持的严正立场。这篇上谕集中反映了康熙帝对国家安全隐患及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的战略预见和思考,也体现了其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识和思想。他首先回顾了中俄两国交恶的历史,指出根源在于对方侵占我边境领土,扰害当地居民,收纳我叛逃之人。其次,分析强调了黑龙江流域的重要地位,并旗帜鲜明指出俄方占据的尼布楚、雅克萨等地方,以及黑龙江上下和通此江的一河一溪,都是中国鄂伦春、达斡尔等族人民居住的土地,属于中国的领土,丝毫不能放弃给俄国。最后,强调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和约,划定两国疆界,建立正常的外交和通商关系。

在与沙俄侵略者的斗争中,康熙帝最早提出边界的概念。他深深认识到边界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萌生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思想。在两次雅克萨自卫还击战前后,他多次明确表示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并声称不惜以武力加以捍卫。同时也认为中俄两国的边界必须加以明确划定,区分清楚,两国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各居疆土,互不侵犯,彼此贸易遣使,和睦相处,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鉴于清朝以往在边境上未部署常备的军事力量,导致沙俄侵略者屡次卷土重来的历史教训,康熙帝还深谋远虑地作出了在黑龙江地区筑城永戍、派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一。



兵常驻的战略决策,以加强充实边防,抵御沙俄的入侵,从而长久地确保北部边疆的安全。他曾对大臣说:“若黑龙江我兵不能永戍,自松花江、黑龙江以外,所居民人皆非我有矣。……务期为久远充裕之计。”^①再三强调在边境地区驻兵长期守卫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正是由于康熙帝的高瞻远瞩和运筹帷幄,周密准备,军民齐心配合,最终取得了抗击沙俄侵略者的胜利。

后来在尼布楚边界谈判会议上,索额图等秉承康熙帝的旨意,据理驳斥了俄国代表提出的以黑龙江至海为界的无理要求,明确阐述了中国对黑龙江流域拥有主权的立场,最终与对方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国际法律效力的边界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的签订,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明确划分了中俄两国东段边界,遏止了沙俄对中国黑龙江流域的继续入侵,使东北边疆获得了比较长久的安宁。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一。



康熙论地方镇将不时朝覲

题引：康熙十二年至二十年(1673~1681年)发生的三藩之乱，一度使清朝的统治出现严重危机。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后，为防止地方镇将久握兵权，骄妄而生异心，与臣下讨论决定严格朝覲制度。本篇选自《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四月。

【原文】

王熙^①奏曰：“边疆将帅常来朝见，则晓朝廷法度，不敢妄萌邪念。”上曰：“常来朝见，则心知敬畏。如吴三桂^②、耿精忠^③、尚之信^④辈亦以不令来朝，心生骄妄，以致反叛。此处所关甚要，况边陲将士，惟知其统辖之主，不习国家法度。曩者，朕曾降敕于广西将军马承荫，承荫跪受，其下诸人皆惊，谓我将军亦跪人耶！即此观之，兵权不可令久擅也。”

【译文】

王熙奏对说：“边疆将帅经常来京城朝见皇帝，那么就会明白朝廷的法度，不敢妄自萌生不正的念头。”(康熙)皇上说：“经常来朝见，就会心里知道敬畏。像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这类人也因为不让他们来朝，心里产生了骄傲狂妄的情绪，导致了叛乱。这里关系到的问题十分重要，况且边疆将士，只知道统辖他们的主帅，不知晓国家的法度。以前，我曾经降下敕令给广西将军马承荫，马承荫跪下受命，他的下属众人都震惊，说我们将军也向别人下跪

① 王熙：清康熙时大臣。字子雍，又字胥庭，号慕斋，顺天宛平(今北京)人。顺治进士，官至兵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

② 吴三桂：康熙年间发动叛乱的“三藩”之一。字长白，扬州高邮(今属江苏)人。明末为总兵，后降清，封平西王。

③ 耿精忠：康熙年间发动叛乱的“三藩”之一。袭祖耿仲明、父耿继茂为靖南王。

④ 尚之信：康熙年间发动叛乱的“三藩”之一。平南王尚可喜长子，叛应吴三桂，后复降清，又被告谋叛赐死。



啊！就从这个可以看到，兵权是不可以让将领长久独揽的。”

【评析】

康熙前期爆发的三藩之乱，很大程度上是清廷失去对三藩的权力管控，放任其拥兵自重、专恣跋扈导致的结果。三藩叛乱被平定之后，康熙帝和大学士王熙、明珠等大臣认真讨论总结了这一经验教训，认为提督、总兵官等镇守一方的高级将领不能让其久握兵权，而必须加以约束限制。其中一种办法就是严格朝觐制度，令地方镇将经常赴京朝见，这样就可以使其明晓中央和朝廷的存在，心知敬畏，从而不敢妄生反叛之心。

朝觐制度后来被确定加以贯彻执行。与朝觐同时实施的还有陛辞请训制度，就是新任命的地方高级将官在赴任前，须向皇帝辞行，接受请示训导。这样，就大大增进了中央朝廷与高级将领之间的沟通联系。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举措，将地方镇守将领的权威置于朝廷的威严之下，从心理上加强了对他们的控制威慑，对于抑制和消除他们的邪妄之心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由于清朝同时又实施了裁汰镇将、限制领兵数额、严禁将有私兵、限年更调等一系列削弱将帅权力的措施，从平定三藩之乱后直到清末，未有再发生高级将领拥兵跋扈、独霸一方的情况。



施琅《边患宜靖疏》(节选)

题引:施琅(1621~1696年),原名郎,字尊侯,号琢公,福建晋江(今泉州)人,初为郑成功部将,降清后历任副将、总兵、福建水师提督等职。康熙初年,针对台湾郑氏势力割据分裂渐趋严重之势,施琅多次上疏请求尽快统一台湾。本篇选自《靖海纪事》卷上。

【原文】

伏思贼党盘踞台湾,沃野千里,粮食匪缺。上通日本,下达吕宋、广南^①等处,火药、军器之需,布帛、服用之物,贸易备具。兼彼处林木丛深,堪于采造舟楫。以致穷岛一隅,有烦南顾。为今之计,顺则抚之,逆则剿之。若恣其生聚教训,恐养痍为患。且此时经制船只尚堪远驾,过洋舵梢见有可选;迟之数载,船只久坏再造,则损内帑之金,舵梢拨散召募,安得惯洋之人。万一蠢动,属费驱除。以臣愚见,不如乘便进取,以杜后患。

【译文】

我考虑逆党盘踞台湾,那里沃野千里,粮食不缺乏。上可以通达日本,下可以到吕宋、广南等地方,火药、器械等军需,布帛、服装等用物,都通过贸易可以充足地获取拥有。加上那里丛深林密,能够采伐制造船只。以致于这个偏处一隅的穷荒之岛,需要烦劳南向顾及。当今的策略是,台湾逆党顺服就安抚,抗拒就加以征讨。如果任随其生息繁衍,恐怕是养着毒疮给自己造成祸患。况且这个时候按制度标准建造的船只还能够远航,能驾驶过洋的舵手还可以选拔;延迟几年之后,船只时间长了破败了再来建造,就会耗损国库资金,舵手遣散了再来招募,怎么能召到惯习海洋之性的人。台湾万一有所举动,要费很大力气平定消除。按照为臣我的愚笨意见,不如乘方便的时候进攻获取此地,以杜绝后患。

^① 广南:今越南南部。



【评析】

郑成功死后,继立的郑经虽然仍旧坚持抗清,但其根本目的已发生改变。反清复明目标渐失,而分裂割据、自成一国的意图却越来越明显。郑经曾宣称台湾“远在海外,非属版图之中”,自己在台湾的“万世之基已立于不拔”^①。从康熙元年(1662年)起,清廷与台湾郑氏集团多次展开和谈。但郑经试图援引朝鲜例使台湾成为清朝的藩属国,从中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双方的和谈皆以失败告终。

施琅早已看出郑氏集团确无受抚之意,因此在康熙六年(1667年)陈上这篇《边患宜靖疏》,明确表示如果招抚不成功,就必须要以武力解决问题。他在奏疏中分析了敌我情势:台湾不仅沃野千里,粮食不会匮乏,更重要的是,郑氏势力进踞台湾后,凭借海上贸易,一切军需、被服等物资都应有尽有。并且此地林木丛深,便于造船。如果现在不加以平定,将来清军水师船只久坏再造,势必耗费财力;而熟习水性的人遣散了之后,再召募未必能得其人。他指出:如果让郑氏集团长期在台盘踞,休息生养,无异于“养痍为患”。因此坚决主张渡海征讨,以杜绝后患。

次年,施琅又上《尽陈所见疏》,再次表达了克平台湾的必要性。他从统一台湾对国家的重要意义出发,认为“东南膏腴田园及所产渔盐,最为财赋之藪,可资中国之润”;他还颇具远见地指出,“郑成功其子有十,迟之数年,长成群强,假有一二机觉才能,收拾党类,结连外国,联络土番耕民,羽翼复张,终为后患”,特别是其一旦勾结外国势力,将后患无穷,因此必须早日予以讨平。

施琅还提出了剿抚并用,因剿寓抚,以战逼和的平台战略方针。主张先攻克澎湖,消灭郑军主力,然后遣使赴台先宣朝廷德意,争取以政治手段统一台湾本岛。如果郑氏集团还是“顽梗不悔”,则用武力攻克台湾。施琅还将他几年来努力招兵、练兵、筹饷、造船、制器的情况,一一奏闻康熙帝。

康熙帝在听了施琅这些分析透彻、谋划深远的意见和建议后,深为所动。但是,此时康熙帝刚刚亲政,朝政大权尚掌握在辅政大臣鳌拜之手。鳌拜力主对郑氏行招抚之计,大多数朝臣也认为渡海作战风涛莫测,难以取胜,主张以和谈解决台湾问题。康熙帝还考虑到稳定大陆内地统治秩序、恢复发展经济乃当务之急,攻台缺乏强大的水师和坚固的战舰,时机尚未成熟,因此施琅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其本人也被撤去福建水师提督职务,奉调入京担任内大

^① 《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臣的闲职。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解决了三藩问题后,康熙帝审时度势,认为平台时机完全成熟,才重新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肩负起统一台湾的重任。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率清军从铜山誓师出征澎湖,并顺利攻克,消灭郑军刘国轩部主力,迫使郑经之子郑克塽奉表请降,最终完成了台湾与大陆的重新统一。

从当时历史形势来看,清王朝在逐步统一大陆后,已建立起一个空前规模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人心向往和平安定,发展成为当时历史的主旋律。施琅力主武力平台,实现国家统一,顺应了历史潮流,其功绩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他认识到统一台湾对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性,将克平台湾作为屏障东南各省、防范外部势力入侵、维护海疆安宁的前提,反映了其高瞻远瞩的眼光。历史也证明,只有将台湾纳入祖国的版图,完成海峡两岸的统一,才能对付外部势力的入侵,巩固海防,维护沿海地区的安全与和平。



施琅《陈台湾弃留利害疏》(节选)

题引: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率军平定台湾后,清廷很多王公大臣以台湾难守而主张弃台,施琅则上疏极力陈述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力请保留和固守台湾。奏疏全文见《清经世文编》卷八十四《兵政十五·海防中》(另参见《台湾外纪》卷三〇)。

【原文】

台湾北连吴会^①,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迴,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臣奉旨征讨,亲历其地,备见野沃土膏,物产利溥,……实肥饶之区,险阻之域。逆孽乃一旦纳土归命,此诚天以未辟之方舆,资东南之保障,永绝边海之祸患,岂人力所能致哉!

夫地方既入版图,土番^②人民,均属赤子,善后之计,尤宜周详。此地若弃为荒陬,复置度外,则今台湾人居稠密,户口繁息,农工商贾各遂其生,一行徙弃,安土重迁,失业流离,殊费经营,实非长策。况以有限之船,渡无限之民,非阅数年,难以报竣。使渡载不尽,苟且塞责,则该地之深山穷谷、窜伏潜匿者,实繁有徒,和同土番,从而啸聚。假以内地之逃军流民,急则走险,纠党为祟,造舟制器,剽掠滨海,此所谓藉寇兵而资盗粮,固昭然较著者。且此地为红毛^③住处,无时不在涎贪。该夷赋性狡黠,所到之处,善为鼓惑人心。重以夹板船只,制作精坚,从来无敌于海外。未有土地可以托足,尚无伎俩。若坐弃数千里之膏腴,以资其停泊,必倡合党与,窃窥边场^④,逼近门庭,沿边诸省,断难晏然无虞。至时复勤师远征,两涉大洋,波涛不测,恐未易再建成效。

如仅守澎湖而弃台湾,则澎湖孤悬汪洋之中,土地单薄,界于台湾,远隔

① 吴会:指江浙地区。古代为吴郡、会稽郡辖地,故合称代指。

② 土番:清代对台湾当地高山族的称呼,又称番族。

③ 红毛:明清时对荷兰人的称呼。亦称红毛番、红毛夷、红夷。

④ 场(yi,音义):边境,边界。



金、厦,岂不受制于人。是守台湾即所以固澎湖,必须联为臂指,各相犄角,声气关通,应援易及,可以宁息。……

盖筹天下之形势,必求万全。台湾一地,虽属外岛,实关四省之要害,无论彼中耕种,犹能少资兵食,固当议留;即为不毛荒壤,必藉内地挽运,亦断断乎其不可弃。……臣思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

【译文】

台湾北面连接着江浙地区,南面连接广东的绵绵山岭,纵长几千里,山川险峻,港口水道迂回曲折,确实是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的左侧屏障。……为臣我奉旨去征讨,亲自到过那地方,亲眼全面地看到原野土地肥沃,物产珍贵丰富,……实在是肥沃富饶的地方、险要的区域,叛逆者们一下子献还土地、回归朝廷,这简直就是老天给予尚未开发的土地版图,做为东南地区的保障,永远断绝了海疆的祸患,这难道是人力所能达到的吗!

此地既然已经归入国家版图,高山族人民,(和别的民族一样)都是朝廷的臣民百姓,怎样善后管理,尤其要周密详细筹划。这地方若是作为荒芜偏僻的地方扔在那里,重新放到治理管辖之外,那现在的台湾居民稠密,户口繁殖很多,农工商务行业,都还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着;一旦迁徙内地抛弃这里,安居久了的地方不愿迁移,又会失业流离失所,很费经营,的确不是好决策。况且以有限的船只来装载非常众多的百姓,不历经几年时间是难以完成的。假使载渡不尽,马马虎虎敷衍塞责,那么在这地方的深山僻谷躲藏起来的人,一定会很多,他们联合本地高山族,呼应聚集对抗政府。借助内地的逃亡军士、流浪民众,急了就会造反犯法,纠集党羽成为祸患。造战船制兵器,抢掠沿海,这就是所谓资助敌寇武器而送给盗匪粮食,本来是很清楚明白的。况且这地方原来是红毛荷兰人一度占住过的,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垂涎贪图。这些外国人本性狡猾精鬼,所到的地方,最会蛊惑人心;再加上几层板的船只,制作精良坚固,从来无敌于海外诸国。当没有土地站脚的时候,还没有什么伎俩,若是我们弃置几千里的肥沃土地,来给他们停泊,他们必定纠合党羽同类,偷偷窥探我们的边防城乡,逼近家门庭院,沿海各省,绝对难于平安无忧。到那时,再度兴兵远征,两次涉渡海洋,波涛难以预测,恐怕不容易再收到应有的成功与效果。

如果只守澎湖而弃守台湾,那么澎湖就孤悬在汪洋大海中,其地形势单薄,处于台湾的边界,远隔着金门、厦门,怎能不受制于别人?守台湾就是用以巩固澎湖,必须像胳膊和手指那样使他们彼此联系,互相成为犄角之势,声



气相通,接应援救容易达到,两处都可以确保宁静安全。

筹划天下的战略形势,必须追求万无一失。台湾虽然属于海外的岛屿,但却是关系到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安全的要害之地,不要说那里开荒耕种,还能略微资助军粮,从这点考虑本来就应当商讨留守;即使是荒凉的不毛之地,必须靠内地运输接济,也绝对不能放弃。……为臣我考虑放弃了必酿成大祸,留守确实可以永保边疆的稳固。

【评析】

清廷统一台湾后,关于台湾的弃留问题在统治集团内部引起很大的分歧和争论。不少王公大臣认为台湾乃是一块荒壤无用之地,“得其地不足以耕,得其人不足以臣”,主张迁其人而弃其地。有的大臣则认为,派兵驻守台湾要费兵糜饷,极不合算,主张只守澎湖,放弃台湾。连大力支持施琅克复台湾的大学士李光地起初也认为:“台湾隔在大洋以外,声息皆不相通”,可以“空其地任夷人居之,而通款纳贡,即为贺兰(荷兰)有亦听之”^①。甚至康熙帝本人也曾一度认为台湾属海外地方,得与失对国家关系不大。一时弃台之声甚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帝下谕令众臣详议,以便综合各方意见决定台湾弃留。

深知台湾弃留事关东南沿海诸省安全的施琅,于康熙二十二年底单独上了这篇《陈台湾弃留利害疏》,极力反对弃台。他在奏疏中对台湾的弃留问题作了详尽的分析,首先指出了台湾在海防上的重要性:台湾虽远在海外,但“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海道迂迴”,是国家东南的屏障,直接关系江、浙、闽、粤四省的安危,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果对台湾弃而不守,不但海盗会以此地为巢穴,扰乱沿海,更为严重的是会再被荷兰等外国势力侵占,他们以台湾为据点,威胁海疆,窥伺内地,东南沿海各省的安全将无法保证。

其次,施琅充分肯定了台湾的重要经济价值,从经济角度说明它对国家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台湾沃野千里,物产丰富,植被繁茂,各种日用品基本可以自给,“实肥饶之区,险阻之域”,是天赐的一块宝地,而绝非可有可无的荒壤无用之地,因此不能轻易放弃。

针对朝中一些庸臣关于弃台守澎的论调,施琅坚决表示反对,主张台澎一守兼之。他以多年驰骋东南海疆的经验指出,台、澎相互支撑,构成完整的

^① 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十一。



海防体系,守澎必守台,反之亦然。况且澎湖的防御空间狭窄,其战略地位无法与台湾相比,如果弃台守澎,则澎湖不堪一击,是根本守不住的。因此,“守台湾即所以固澎湖,必须联为臂指,各相犄角,声气关通,应援易及,可以宁息”,即必须要将台湾、澎湖作为一个整体来守卫,这样才能达到确保东南沿海安全的目的。

施琅充分认识台湾是抵御西方殖民者侵略的重要屏障和基地。他指出:台湾曾为荷兰侵占过,对方无时不在伺机准备重新占据这个地方,如果放弃台湾,就等于拱手送给了西方殖民者,他们有了这个富饶的地方作为立足点,联合勾结海盗及不服从朝廷的乱民,东南海疆就将会永无宁日。故而强调绝对不可以放弃,而必须留守台湾,严密防范西方殖民者的入侵。

在施琅的据理力争下,最终康熙帝决定留守台湾,并按照施琅的建议在台、澎驻扎军队,同时设府置县,进行治理。这是一项重大的战略举措,意义十分深远。从此,台湾正式成为中国行政区划的一部分,从政治上进一步确定了大陆与台湾之间不可分割的隶属关系。

在台湾长期驻兵守卫,从军事上确保了台湾和大陆沿海地区的安全,使台湾地区不再遭受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台湾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被西方殖民者视为进行海上贸易和扩张行动的必争之地,成为其垂涎的对象。清政府在台湾建立起有效的行政管辖机构,部署了常驻的防御力量,以大陆雄厚的实力作为后盾,使台湾地区和大陆形成一个防御整体,不仅使台湾的安全得到了根本保障,而且大大巩固和加强了中国东南地区的海防,有力地捍卫了中国东南海疆的安全。自从清政府统一台湾,在台湾建府设防后,一直到鸦片战争前的150多年内,西方殖民者再也未敢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及岛屿发动大规模的入侵,东南沿海地区也由此获得了较安定的和平发展时期。



李之芳论禁海迁界

题引:李之芳(1622~1694年),字邺园,山东武定(今惠民)人,明末举人,清初进士,历官监察御史、浙江总督、兵部尚书等职,晋文华殿大学士。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全面实行强制迁徙濒海居民的迁界政策,李之芳上疏极力表示反对。本篇节选自江日昇《台湾外记》卷六。

【原文】

山贼、海寇,何代无之?但当制驭有方,使民获宁宇,未闻堂堂天朝迁民避贼者也。……今诏谕欲徙五省^①沿海边民,何以垂训后世?……郑成功江南大败,胆破心寒,今已远遁台湾,所有余孽,或剿或抚,呼吸可定。况沿海皆我赤子,一旦迁之,鸿雁兴嗟,室家靡定。或浮海而遁,去此归彼,是以民予敌。……江南薄土,一夫受田不满三亩;一家聚食,尚捕鱼买贩以补不足。圣谕颁下,欲酌给田宅,安插移民。田宅无所措,当道者未有处置,惟催赶日促,使民而逃。贫者不过数日之粮,富者亦但数月之储,逼处内地,无家可依,无粮可食。饿寒逼而奸邪生,不为海寇,即为山贼。一夫持竿,四方响应,其若之何?……江南鱼盐,为富强之资,沿海一带,鱼盐之利何啻数千万?土产之物,百倍其利。况乃日用之需,盐更五谷之辅,一日无盐,物将日腐。且土产年例解京,从此而止。……夫郡县内地,亦赖边界以捍御,故朝廷设边界为郡县藩篱,亦以卫民。今兵不守沿海,尽迁其民,移居内地,则贼长驱内地,直抵其城邑,其谁御之?

【译文】

山贼、海盗,哪个朝代没有呢?只要控制驾驭方法得当,能使百姓获得安宁的住所,没听说过我堂堂朝廷迁徙百姓来躲避贼寇的。……如今诏令准备将五个省份的沿海人民迁移到内地,拿什么来垂示教育后世呢?……郑成功

^① 五省:指山东、江南(辖境相当于今江苏、安徽、上海)、浙江、福建、广东。



在江南遭受大败,胆破心寒,现在已经远逃到台湾,所有剩下的余党,或者用征剿或者用招抚的手段,呼吸之间很容易就可以平定。况且沿海人民都是我朝的臣民百姓,一旦要迁徙他们,就像鸿雁一样悲叹,家庭找不到安定栖身的地方。他们也许就会乘船过海逃到台湾,离开我朝归附对方,这是把百姓送给敌人。……江南沿海地区土地瘠薄,一名男子受田不满三亩;一家聚集生活,还要靠捕鱼买卖交易来弥补不足。圣旨颁下,准备根据情况赐给田宅,安插这些移民。田宅没有安排筹措,当政的官员不想办法去办,却日渐催促驱赶他们,使百姓逃跑了。贫穷的家庭只有不过几天的粮食,富裕的家庭也只有几个月的储粮,被逼迫身处内地,没有安定的家可以依靠,没有粮食可吃。饥饿寒冷逼迫就会产生不走正道的奸邪之人,这些人不当海寇,就做山贼。一人揭竿而起,周围四方都响应,那该怎么办?……江南地区的鱼盐,是赖以富强的物资,沿海一带,鱼盐的利润又何止数千万?当地的土产物品,更是那利润的百倍。而且这些都是日常必需品,盐更是五谷主要粮食的辅助佐料,一天没有了盐,生鲜之物将一天比一天腐烂。况且江南的土特产每年照例要运送到京城,从禁海迁界之后也就将停止了。……内地的州县,也依靠边界来捍卫防御,因此朝廷设置边界作为内地州县的屏障,也是用来保卫百姓。现今放弃沿海不驻扎士兵防守,将那里的人民全部迁徙,移到内地居住,那么逆贼就可以长驱内地,直接抵达城镇之下,谁来抗击防御呢?

【评析】

清初,为了防范对付海上反清势力,尤其是日益壮大的郑氏抗清力量,统治者在军事征剿、政治招抚的同时,袭用明代的海禁政策,采取大规模的禁海迁界行动来封锁郑氏集团的经济来源,并称之为“断乳饿杀”之计。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廷颁布《申严海禁敕谕》,责令沿海各省督抚及文武官员“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即将贸易之人,不论官民俱行奏闻处斩,货物入官”。要求“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①。对于负责执行禁海令的文武官员,有失职者,从重治罪。同年九月,清军攻取舟山,尽迁岛民于内地。顺治十七年,清廷又迁福建等地沿海居民入内地安插。

顺治十八年,为进一步坐困郑成功,清廷正式颁布“迁界”令,强行迁徙沿

^① 《清世祖实录》卷一〇二。



海居民于内地,规定“以垣为界,三十里以外,悉墟其地”^①,即在东南沿海各省距海30里构筑垣墙,设立界碑,派兵戍守,界外夷为废墟。此后,又在康熙三年(1664年)和康熙十八年两次进行大规模的迁界移民,范围遍及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五省沿海,而以靠近郑成功反清基地(厦门、金门)前沿的福建、广东两省,推行迁界令最为严厉。迁徙的时间定为3天,过期则派兵驱赶。为断绝迁民后顾之忧,界外房屋全部焚毁一空。迁界后有敢越界者,立即斩杀。

由于清朝统治集团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满洲贵族,其所统率的八旗兵弓马娴熟,长于陆战,而不习水战,实行禁海迁界,正可以扬长避短。因此,这项政策和做法明显带有“以汉治汉”、牺牲汉人利益的取向,遭到了不少汉族官员的反对。他们不仅着眼于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且从维护清朝封建政权的安全稳定出发,陆续上疏提出批评意见,李之芳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禁海、迁界是一种消极防御的策略,不可能达到使郑氏海上政权不攻自灭的目的,还会造成很多社会及民生问题,带来严重的后果。更重要的是,濒海地区是内地的藩篱,放弃沿海不守等于是自撤藩篱,使敌长驱直入内地,危害则更大。

事实证明李之芳的看法是正确的。清朝统治者实行的禁海迁界政策不仅没有起到困死对手的作用,相反却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按照清朝统治者的设想,厉行禁海迁界措施,在沿海与内陆之间形成一个无人区,以此杜绝陆海之间的往来,彻底切断郑氏集团与大陆的经济联系,使郑氏集团失却“通洋之利”,从而迫其就范。然而事实却是当时郑氏集团的海上势力已操中国、日本、东南亚之间海洋贸易的牛耳,“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来往”。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拥有了较为稳固的新的抗清基地,通过发展农业和海外贸易,经济和社会都得到发展,军事力量也维持下来,并与清廷对抗了20年。

禁海和迁界严重破坏了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生产力,给各省人民带来极大灾难和损失。由于抛弃而荒芜的土地数目惊人,据康熙二十三年奉命往福建、广东巡视开界事宜的工部尚书杜臻所奏,两省原迁界外田地合计共570余万亩。不仅耕地,历来以捕鱼和煮盐业为主的沿海地区在这方面的损失更为严重。渔业几乎陷于绝境。由于盐场多在界外,与民生关系非常大的海盐的生产,也差不多完全停顿,福建等地的百姓只能无盐淡食。对外贸易和商

^① 《重纂福建通志·海防》。



品的交流也基本中断。这些直接导致了清政府赋税收入的锐减,康熙十二年福建总督范承谟就在一份奏疏中指出:“自迁界以来,民田废弃二万余顷,亏减正供约计有二十余万之多,以致赋税日缺,国用不足。”^①

而被暴力手段强制内徙的迁民们的境遇则更悲惨,很多人失去家园田产,生活无着,在官府驱赶下“弃费携累,仓促奔逃野处露栖,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②。一部分人于是铤而走险,或投靠参加郑氏集团,或逃入海中依附海盗,或就在当地据抗反清;还有一些逼处内地无法谋生的迁民,不甘坐以待毙,或砍人树木,掘人坟墓,掠人妻女以泄愤;或百十为群,手执枪刀,抢劫乡间富室之家。清廷本想以禁海迁界隔离反清势力与沿海人民结合,维护海疆安定,巩固政权统治,最终效果却是如此大相径庭,这是统治者当初决策时所万万没有料到的。

继李之芳之后,广东巡抚王来任、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福建总督姚启圣等官员都纷纷表示反对迁界,要求开放海禁。他们认为开海既有益于民生,也有助于国库收入。随着三藩之乱和台湾的平定,这种呼声越来越高,迫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重新审视变化了的内外形势,顺应历史需要和民众愿望,对以往的错误政策予以改正。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终于下令沿海各省展界复业。紧接着又于次年十月,正式宣布解除海禁。

^① 《清经世文编》卷八十四《兵政十五·海防中·条陈闽省利害疏》。

^②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地语》。



李光坡论海防

题引:李光坡(1651~1723年),字皋轩,一字耜卿,号茂夫,福建安溪人,一生家居不仕,专心研究经学,著有《诗经测义》、《周礼述注》等。针对清初沿海海盗不靖问题,李光坡撰《防海》一文,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本篇节选自《清经世文编》卷八十三《兵政十四·海防上·防海》。

【原文】

窃尝考筹海之篇,有“慎设其守”焉,有“探止泊而遏之”焉,有“度要需而绝之”焉。三者行,则小丑不难靖也。……宜严檄沿海帅将,追寻前朝^①汤和^②所筑自登^③、莱至浙五十九城,周德兴^④所筑福建海上十六城故址,择其要害,量置兵守,诘其出入,捕其奸细,使之孤危无党,所谓“慎设其守”者此也。……宜飭边海巡徼舟将,不必以擒贼为功,惟密侦其巢穴,即以大师捣之,自然可绝,此“探止泊而遏之”之谓也。……当责成督、抚严檄滨海州县,凡采捕渔舟只许单桅平底,朝出暮归。不许造双桅尖底,经月不返。凡海船取水井泉之处,可湮者则湮之,不可湮者,令土著之民十家轮守,设兵专汛。严立条格,犯者抵死。此前朝名将俞大猷^⑤、邓钟^⑥所反复丁宁,以为此二事实心行之,可以千古永绝海患。然则“度要需而绝之”,又是三事之最要也。

① 前朝:即指明朝。

② 汤和(1326~1395年):明朝开国功臣,封信国公。曾巡视浙江沿海,筑城防御倭寇。

③ 登:即指登州(今山东蓬莱)。

④ 周德兴(?~1392年):明朝开国功臣,封江夏侯。曾巡视福建军务,筑城建寨防倭。

⑤ 俞大猷(1503~1579年):明嘉靖时抗倭名将。字志辅,号虚江,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官至广东总兵。

⑥ 邓钟:明万历时将领。曾任游击、副总兵等职,参与镇压海南黎民起义。



【译文】

我曾查考筹划海防方面的文章,有“慎设其守”、有“探止泊而遏之”、有“度要需而绝之”这样的办法。这三条措施要是能实行了,那么海盗小丑就不难肃清了。……应当严厉传令守卫沿海地区的将帅,追求寻找前代明朝汤和所构筑的从登州、莱州到浙江的五十九座城池,周德兴所构筑的福建海上十六座城故址,从中选择要害之地,根据情况酌量设兵驻守,对进出的人进行盘问,逮捕当中的奸细,使海盗没有党羽感到孤单危险,所谓“慎设其守”指的就是这个。……应当命令在沿海地区海上巡逻的水军将领,不一定非要以擒拿贼寇为功劳,而要秘密侦察到其巢穴,然后就动用大军将之捣毁,海盗贼寇自然可以断绝,这就是“探止泊而遏之”。……应当责成总督、巡抚严厉传令靠海的州县,凡是出海捕捞鱼虾的渔舟只允许是单桅平底,早上出去晚上就要回来。不允许造双桅尖底的渔船,出海过了一个月也不返回。凡是出海船只只需要汲取淡水的水井泉眼地方,能够填塞的就填塞起来,不能够填塞的,命令当地居民每十家轮流守护,安排兵丁专门驻留巡逻。严格订立条规制度,违犯者判处死罪。这是前代明朝名将俞大猷、邓钟所反复强调的,认为这两条真要落实了,可以千百年永远根绝海上的祸患。然而“度要需而绝之”,又是三件事当中最为重要的。

【评析】

清朝初年,沿海地区一直有海盗活动,因此当时海防的任务主要是防止海盗对沿海地区的骚扰,维护当地社会的安定。从海盗成员的构成来看,只有少数人确实是作奸犯科、亡命海上的江洋大盗,大多数人是沿海地区的贫苦渔民、农民和小商贩,为官府所逼、生计所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加入海盗队伍。连康熙帝本人也曾承认:“闻浙江海中渔船甚多,……其中有不聊生之穷人不得入海口,从此遂为海贼,观此则海贼即内地渔人,是官兵迫而驱之海中为贼也。”^①

为了肃靖沿海海盗,清廷多次命水师缉拿抓捕,同时采取了限制商民出海贸易的一系列措施,来确保海防的安全。当时的一些朝野人士也为剿灭海

^① 《大清十朝圣训》第232页。

盗献计献策,提出许多办法和建议。一直家居不仕、潜心经学的李光坡因乡籍就在福建,平时留心海防形势,也就防止海盗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只要采用前代明朝人所提倡实施的“慎设其守”、“探止泊而遏之”和“度要需而绝之”这三种策略,就可以永绝海盗之患。他尤其强调要实行“度要需而绝之”的策略,就是严格限制民船规格、填湮水泉,以断绝海盗接济从而将其困死。

这些办法不可谓不可行,然而终究是治标不治本。清代海盗的出现和屡剿不绝,归根结底是与当时统治者实行的政策紧密相关的。清初为了防止沿海人民与郑成功反清势力相联结,清廷悍然颁布前所未有的“迁海”令,强迫沿海居民迁徙内地,导致了许多人无家可依,贫苦加剧,最终被迫流亡海上为盗。统一台湾之后,虽然开放了海禁,但是清朝统治者出于防范海外反清势力再次崛起的目的,对海外贸易尤其是南洋贸易颁布禁令,对出海的民船也设置种种限制。例如像李光坡所建议的那样,规定民商船只只许造单桅平底,不许造双桅以上尖底,甚至对尺寸都加以严格规定,要求渔船一律改成小船,以防止大型船只给海盗米粮接济。然而事实却是虽然采取了这些措施,但海盗活动有增无减,证明成效是不大的。更严重的是,由于限制民船发展,导致船只越改越小,技术与质量越改越差,从而造成了造船业的逐步萎缩和造船技术的落后,为后来在浮海东来的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动挨打,种下了苦果。



蓝鼎元论开放南洋之禁

题引:蓝鼎元(1680~1733年),清初著名学者。字玉霖,别字任庵,号鹿洲,福建漳浦长溪(今赤岭)人,曾任普宁知县、广州知府。雍正初年,蓝鼎元就清廷实施数年的禁航南洋政策,提出反对意见,要求取消禁令。本篇节选自《清经世文编》卷八十三《兵政十四·海防上·论南洋事宜书》。

【原文】

天下利国利民之事,虽小必为;妨民病国之事,虽微必去。今禁南洋有害而无利,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闽地不生银矿,皆需番钱,日久禁密,无以为继,必将取给于楮币皮钞,以为泉府^①权宜之用,此其害匪甚微也。开南洋有利而无害,外通货财,内消奸宄,百万生灵仰事俯畜之有资,各处钞关^②且可多征税课,以足民者裕国,其利甚为不小。

【译文】

治理天下,凡是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的东西,即使再小也必须去做;对人民有妨碍对国家有害的东西,即使再细微也必须去掉。现在禁止通商南洋只有害处而无好处,只能令沿海居民富裕的人变得贫穷,贫穷的人变得困苦,驱使工商业者变成游手好闲的人、游手好闲的人变成盗贼罢了。福建当地不生产银矿,却都需要西洋人所铸造的银币,时间长了禁令严密,无法维持继续下去,必定会拿纸钞来补充,以此作为税务部门暂时使用,这种做法的害处不是很小的。开放通商南洋有好处而无害处,对外可以往来交易财货,对内可

① 泉府:这里指税务机构。本为古代官名,掌管市的税收等事宜。

② 钞关:明清内地征税机构。明宣德年间始设于运河沿岸各重镇,凡往来商船纳钞完税,故名钞关。清代陆续设于水陆交通要冲或商品集散地,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设立海关,为相区别,原钞关称为“旧关”或“常关”,海关称为“新关”或“洋关”。



以消除作乱的盗贼,百万百姓对上奉养父母,对下养育妻儿有了凭藉,各处钞关还可以多征收商税,来使人民富足而使国家丰裕,其好处是很不小的。

【评析】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下令解除海禁,实行开海贸易后,海上贸易盛况空前。各国商人纷至沓来,中外商品和货物交流频繁,海外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是随之而来也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到海外尤其是南洋的华人越来越多,其中包括许多不愿降清的明朝遗民和反清志士,以及从台湾逃出之人。这些人加上一直在沿海骚扰活动的海盗,使清朝统治者十分不安,唯恐反清势力在海外死灰复燃,危及政权的稳固。康熙帝在康熙五十五年与臣下的一次谈话中说:“海外有吕宋、噶喇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藪也。”^①开始考虑通过限制南洋贸易的办法,严加防范。很快于次年初,发布了南洋禁航令,规定:“凡商船照旧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喇吧等处不准商船前往贸易,于南澳等地方截住。令广东、福建沿海一带水师各营巡查,违禁者严拿治罪。”^②其后,虽然特许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可往南洋贸易,但严格申谕不得夹带汉人。

这项政策出台后,很快在清廷上下引起了争议。一些官员或由于传统观念作祟,或基于海防安全的政治考虑赞同禁止南洋贸易。但反对的声音也很多。尤其是福建、广东籍的很多汉族官员和缙绅,从维护地方利益及国家的长远战略利益出发,都不赞成这么做,不断提出反对意见。其中以蓝鼎元在《论南洋事宜书》中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比较了开海、禁海的利弊,直言不讳地指出,实行南洋之禁有害而无利,不仅会给闽粤江浙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问题,而且外洋流入中国银元的减少,又势必影响到国家财政金融制度的正常运行。相反,开禁南洋贸易,则有利而无害。外可以“通货财”,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内可以“消奸宄”,杜绝因为洋禁而驱民为盗的源头。他还批驳了那种忧虑南洋商人卖船给外国或海盗,载米偷漏出洋是助长盗贼、增加盗案的谬识,认为这是并不熟悉海疆实际情况的“坐井观天之见”。

蓝鼎元对南洋之禁于国计民生的严重影响,及对国家和社会安定危害的痛切论述,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后不断有海疆官吏奏陈朝廷,呼吁调

^①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〇。

^②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一。



整南洋政策,允许人民赴南洋贸易。雍正四年(1726年),闽浙总督高其倬上书,以福建连遇灾荒,“地狭人稠,无田可耕,民且去而为盗”^①,社会动乱不安,请求撤销南洋禁令。雍正帝虽然在即位后仍然继续承袭了康熙时的南洋政策,但已经开始意识到禁令难以收到预期的成效,不仅不能起到宁谧海疆的作用,相反却造成沿海地区的动荡不稳定,于是在经过反复权衡后,同意了高其倬的奏请,于次年下令解除南洋禁令。

然而,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政权,清代的历朝皇帝对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人始终怀有无法消释的猜忌与防范心理,阻断内地人民与海外的联系,控制和隔绝他们与外国的交往,一直是统治者制定安全政策的出发点之一,限制与禁止海外贸易,因而成为清朝坚持推行的一项基本政策。尽管雍正帝开放了南洋之禁,但同时也附带了一些防范与限制措施,如限令出洋贸易之人三年内必须回国,否则不许回籍;出洋之船须造报官府查验等等。清朝统治者将去海外谋生之人一贯看作是不安分之人,是可能危害清朝政权的危险分子。海禁思想一直在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直到嘉庆年间,清廷还在讨论海禁问题。虽然在实施过程中有弛禁与严禁的不同,但总的趋势来看,清朝海外贸易的大门越开越小,并最终导致了隔绝中外的一道堤墙——闭关政策的出笼,这不仅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前进,也加速了清王朝自身的衰亡。

^① 《清史稿·高其倬传》。



雍正论对回民策

题引:雍正帝(1678~1735年),即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康熙帝第四子,在位期间勤于治政,加强中央集权,厉行改革,在治理边疆处理民族问题上多有建树。雍正七年(1729年)四月,在给内阁的一份敕谕中,雍正帝阐述了自己对待回民的政策。本篇选自《清世宗实录》卷八十。

【原文】

辛巳^①,谕内阁:“直省^②各处,皆有回民居住,由来已久。其人既为国家之编氓^③,即俱为国家之赤子,原不容以异视也。数年以来,屡有人具折密奏回民自为一教,异言异服,且强悍刁顽,肆为不法,请严加惩治约束等语。朕思回民之有教,乃其先代留遗家风土俗,亦犹中国^④之人,籍贯不同,嗜好方言亦遂各异。是以回民有礼拜寺之名,有衣服文字之别。要亦从俗从宜,各安其习。……”

【译文】

(雍正七年四月初七,(雍正帝)告谕内阁:“直隶省各个地方,都有回民居住,时间由来已久。他们既然已经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就都是朝廷的百姓,原本不应当当作异族来看待。这几年以来,不断有人写递折子秘密陈奏说回民自奉一种宗教,语言和服装与众不同,而且强横狡猾顽固,肆意做违法的事情,请求严厉予以惩治约束等这样的话。我想回民具有宗教,这是他们前代祖先留传下来的自家风俗,也就像中原汉族的人一样,地方籍贯不同,爱好和方言也就都有差异。所以回民有礼拜寺这样的名称,有衣服文字的差

① 辛巳:指雍正七年四月辛巳日(初七)。

② 直省:指直隶省(辖境相当今北京、天津、河北大部 and 河南、山东部分地区)。

③ 编氓(meng,音蒙):编户齐民。氓:人民,百姓。

④ 中国:这里指中原汉族。



别。重要的是也要尊重依从其风俗,采取适宜的做法,不影响破坏各民族的习惯。……”

【评析】

清朝治理边疆少数民族的方针主要表现在“怀柔”二字上,而怀柔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因俗设官,“因其俗以治之”。清朝统治者在统一幅员辽阔的中国边疆地区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要在当地建立起稳定而行之有效的统治,必须根据不同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建立起不同的统治机构,并任用对朝廷归顺的少数民族首领来管理其众,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早在入关之初,清廷在招抚西北少数民族时即明确宣布:“一切政治,悉因其俗。”^①其后,康熙帝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进一步认识到“从俗从宜”不仅是平定天下,更是稳定天下的良策,所以他主张治理边疆各民族的方式应因人因地有所不同,不能强求一致。他说:“治天下为宽裕仁慈,加惠以因人性,不可拂逆。即如满洲、蒙古各方之人,饮食日用,其性各殊,必欲一之则乱,亦断不可行也。”^②

雍正帝同样继承了这种思想。他在上面这篇敕谕中所论述的对回民的立场态度,实际上也是其对其他各少数民族一贯坚持的政策主张。即因俗而治,“从俗从宜,各安其习”。承认并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不强迫加以改变,通过保持和利用各民族固有的社会习俗与社会制度,来使各民族人民安心服顺,从而达到统治的目的。他在论对蒙古族的政策时的另一番话,也很具有代表性。他说:“蒙古之尊信佛教,惟言是从,故欲约束蒙古,则喇嘛之教亦不轻弃,而不知者辄妄生疑议,乃浅近狭小之见也。总之……人品类不齐,习尚不一,不能强异亦不能强同,且各有长短,惟存其长而弃其短,知其短而不昧其所长,则彼此可以相安,方得圣帝明王明通公溥之道,而成太和之宇宙矣!”^③

继雍正之后,乾隆帝也强调“从俗从宜”,“不易其俗”。如在平定准噶尔后,他对居处西北边陲的布鲁特部落公开宣谕:“尔等若如哈萨克慕化来归,朕将令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惟遣使来请朕安,即加恩赏

① 《清世祖实录》卷十五。

② 《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七月。

③ 王之春:《清朝柔远记》。



賚。其或尔等以外藩习俗与中国异宜,不欲投诚降服,亦惟尔便。”^①这种“从俗从宜”、因俗而治的治边思想及政策,一直是清朝历代统治者治理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指导方针,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总的来说,由于实施了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加上高度重视团结和安抚少数民族上层势力,增进其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使得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在清代得到极大巩固和加强。清代在处理边疆民族关系和管理民族事务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对后世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五。



鄂尔泰《改土归流疏》(节选)

题引:鄂尔泰(1677~1745年),字毅庵,满洲镶蓝旗人,雍正时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乾隆时任总理事务大臣,授伯爵。在任云南巡抚及云贵总督期间,多次上疏奏请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得到了雍正帝的支持。奏疏全文见《清经世文编》卷八十六《兵政十七·蛮防上》。

【原文】

窃以苗獠^①逞凶,皆由土司^②。土司肆虐,并无官法,恃有土官土目之名,行其相杀相劫之计。汉民被其摧残,夷人受其荼毒。此边疆大害,必当翦除者也。……然改归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自投献为上策,勒令投献为下策。……至于黔省土司,与滇省异,一切凶顽,半出寨目。因地制宜,更须别有调度。

【译文】

我私下认为苗族等行凶为害,原因都在于土司身上。土司横行肆虐,并没有官府法纪约束,他们依仗着土官头目的名号,实行其相互攻杀劫掠的目的。汉族人民被其摧残,少数民族人民也受其欺凌毒害。这是边疆的大祸害,必须要消除去掉的。……然而改土归流的办法,用计策归服是上策,用兵征讨是下策;让土司自己投顺献地为上策,强行勒令其投顺献地为下策。……至于贵州省土司,同云南省的情况不同,所有的凶悍顽抗之徒,半数都是来自土司寨子中的头目。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采取适当的办法,对此更需要分别对待安排好。

① 苗獠:明清统治者对西南地区苗族等少数民族带有侮辱性的混同杂称。

② 土司:元、明、清时在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由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并世袭的官职,按等级分为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等武职和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文职,借以实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治。



【评析】

土司作为一种制度,始于元代,在明代趋于完善。元明以来的中央政府通过授予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以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以及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官职名号,来加以羁縻笼络,来实现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这种“以夷治夷”的思想和做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弊病也是十分明显的。由于土司拥有土地、人民,又多储兵械,高筑堡寨以自固,各据一方,形同割据之势。这种弊端从明中后期就已经开始暴露出来,不断有土司拥兵自重,不遵朝廷号令,甚至发动叛乱,对国家安全和当地的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带来很多问题。

清初为了迅速统一全国,稳定在各地的统治秩序,在平定西南地区后,沿承明制,保留了土司制度。当时的各种土司势力,也还没有对新生政权构成威胁。随着清朝建立起在全国的稳固统治,西南土司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此时“大一统”的观念深入人心,清朝统治者对巩固边疆的要求前所未有地强烈,而土司制度的割据性显然是与此背道而驰的。康熙时,朝野就不断有人对土司制度发表看法,力陈其弊病和危害,主张予以改变。如戴名世认为,土司制度的存在,“名为羁縻”,实为“王化之所不及,声教之所不通,标枝野鹿尚如洪荒之世”,是未经开发治理之地,乃“天地间之缺陷”^①。刘彬更指出“筹边之道,在乎防微;保民之方,贵于经久。若仅泥于目前,非不晏安无事,而不知其有事之机自在也”^②。因此,不图一时苟安之计,而力求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逐渐成为清代朝野上下的共识。

到了雍正年间,在西南地区废除土司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一方面土司自立一方,有的抗拒中央政权,且经常为争夺土地和人口而相互攻杀,危害地方安宁,矛盾日益激化尖锐,土司制度已经到了非废止不可的地步;另一方面

① 清·戴名世:《戴南山全集》卷十二《纪红苗事》。标枝野鹿:这里指像太古那样落后的时代。标枝,树梢之枝,比喻上古时代在上之君恬淡无为;野鹿,比喻在下之民放而自得。后多以“标枝野鹿”指太古时代。

② 清·刘彬:《永昌土司论》。“若仅泥于目前……”一句意思是:如果仅仅只是拘泥于考虑现在,不从长远筹划进行改土归流,虽然这样不是边疆就不能安宁了,但却不知道引发事乱的机会也正存在于其中。



边区与内地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各族人民之间来往加强,客观上要求打破彼此之间的隔离,实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此外,经过几十年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使得清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为大规模废除土司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鄂尔泰在雍正初年连续上疏,请求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改土归流,以彻底解决西南土司问题。所谓改土归流,即废除土司,取消少数民族首领对当地的世袭统治特权,设立府、厅、州、县等行政建制,由中央任命的有一定任期的流动之官进行管理。鄂尔泰之所以坚决主张改土归流,就是看到明及清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央政府面对土司之弊,始终拿不出根治的办法来,只有在其作乱时,才利用武力进行镇压,而对整个土司制度却不予触及,属于治标而不治本。他认为土司制度终究是“边疆大害”,必须从根本上加以翦除。但是在具体实施上,鄂尔泰主张要因地制宜,根据各省情况区别对待,不能操之过急,搞“一刀切”。要讲究策略,“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自投献为上策,勒令投献为下策”,力求令土司自动献土,同时辅之以必要的武力。

雍正帝十分支持鄂尔泰的建议和主张,他也认为那种临时性措施对于治理边疆地区,“乃攀枝附叶之举,非拔本塞源之策”^①。因此,下决心标本兼治,彻底铲除土司之患。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帝命鄂尔泰专办改流事宜。从这一年起,清政府开始对西南各省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由于自动投献的土司不多,在改流过程中清廷动用了军队加以征讨。到雍正九年,云南、贵州、广西、湖广等地一百多土司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新设的流官。仍在土司控制之下的地区大大减少,能够掌握一府一县之地的土司已经没有了。特别是云南、广西沿边各地,基本都改为由流官控制。

雍正年间西南各省的大规模改土归流,是清代历史和中国民族边疆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通过改土归流,取消了少数民族首领对当地的世袭统治特权,改由中央任命的流官直接治理,杜绝了长久以来土司、土官各自为政、独霸一方的割据局面,大大加强了中央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控制力。通过改土归流,使土司控制地区原有落后的奴隶制或农奴制改变为封建制,促进了西南诸省苗、彝各族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加强我国民族大家庭的团结、推动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往,乃至推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均具有重

^① 《朱批谕旨》,雍正五年二月初二日韩良辅奏之朱批。

大意义。对此,近人魏源曾评价说:“五帝不沿礼,三王不袭乐。今日腹地土司之不可置,亦如封建之不可行。鄂尔泰受世宗旷世之知,功在西南,至今百年享其利。”^①清末还有人认为当年的改土归流使“九州之大归于一统,此长治久安之道也”^②。

① 《圣武记》卷七《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

② 光绪《普洱府志稿》卷九《建置志》。



晏斯盛论绥理苗疆

题引：晏斯盛(? ~1752年)，字虞际，号一斋，江西新喻(今新余)人，历官至湖北巡抚、户部侍郎。在任贵州学政期间，晏斯盛专门写信给云贵总督尹继善，讨论如何治理苗疆问题。本篇节选自《清经世文编》卷八十八《兵政十九·苗防·与尹制府论绥理苗疆书》。

【原文】

滇黔苦兵久矣，其素既无以服之，其继皆有所以激之。文武员吏，贪利而幸功，苟且一时，断未有能善其后者。彼地险隘而性犷悍，剿固已难，既剿而绥抚之，使长治久安尤难。然治安之要，在于得人。得其人而治之安之，则亦无不可久长也。其人务以清静为体，以缜密精明宽大为用。始也制要害而周为之防，继也因习熟而利为之导，斯亦可矣。……总之，地方之安否，惟在亲民之有司。勿作无益以害有益，勿规小利而忘大经，勿工于悦上而绌于信民，勿执私见而昧恒理，……苟得其人，则州县之承风旨而懷宪法者，可朝令而夕至也。

【译文】

云南贵州两省为兵事所苦时间很久了，平时已经没有让苗民顺服的办法，接二连三却都有激化事态的做法。文武官吏，贪图眼前功利而希望侥幸成功，得过且过一段时间，全然没有能够考虑如何善后的人。那些地方地势险要而居民性情凶猛彪悍，征剿本来就已经难了，征剿之后再加以安抚，使得保持长治久安就更难了。然而治理安定的关键，在于用人得当。任用得当的人进行治理安抚，那么也不是不能做到长治久安。所任用的人务必以施政清简无为作为本体，以缜密筹划精明行事宽大待人作为使用手段。开始要控制住要害关键并进行周密防范，接着要顺应风俗习惯而朝有利方向引导，这样就可以了。……总之，一个地方安定与否，只取决于当地官吏。不要做没有用处的事来妨害有益的事，不要贪求微小的利益而忘记了大的原则，不



要只善于取悦上司而不懂得取信于百姓,不要固执个人的偏见而违背常理,……假如真任用了得当的人,那么州县接到旨意就畏惧国家法令的情况,在很短时间内就可以达到了。

【评析】

清代苗疆,是指四川、贵州、云南、广西、湖北、湖南等西南省份在实行改土归流后新开辟的少数民族地区,因当地苗族占多数,故而统治者将这些地区统称为苗疆。雍正年间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总体来说是比较成功的,土司势力受到很大限制,中央得以直接控制治理边疆地区,有利于这些地区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的问题。由于清廷许多时候是用军事征剿的武力手段强行废除土司,因此在改土归流过程中就已不可避免地制造了许多矛盾;而清中央王朝统治力量进入这些地区后,一方面安营设卡,建立军事据点;另一方面又派驻流官,建立地方政权。在苗区基层,流官照搬内地治理经验,设立保甲。有的地方十户立一头人,十头人立一寨长,实行联保连坐,“逐村经理,逐户稽查”,“一家被盗,全村干连。保甲长不能觉察,左邻右舍不能救护,各皆酌罚,无所逃罪”^①。这种用强力手段推行中央集权制度的做法,激化了原本就有的矛盾,引起了苗疆少数民族的反抗。雍正改土归流之后不久,贵州等地就屡次发生苗瑶等族暴动之事,到了乾隆、嘉庆年间,更是爆发了湘黔苗民大起义。一时论者纷起,将其归咎为改土归流。

事实上改土归流本身并没有错,但如何进行,以及改流后如何选用合适的官吏进行治理,才是事情的关键所在。晏斯盛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治安之要,在于得人”,只要选拔任用官吏得当,采用合适的策略方法进行绥理安抚,保持和维护西南苗疆地区的稳定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至于怎样才能“得其人”,晏斯盛提出了应具备的条件和素质,即“其人务以清静为体,以缜密精明宽大为用”;在策略方法上要“始也制要害而周为之防,继也因习熟而利为之导”,强调要亲民怀民,采取因势利导的治理方法。

康熙间云南永北府(今永胜)人刘彬在论及治边政策时曾经说:“从来有一定之形,无一定之制,时不同则制变;有一定之制,无一定之功,人各异则功

^① 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十九》。



殊。”^①认为同样的政策由不同的人来执行,就会有不同的效果,故而也强调地方官吏的作用。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帝在谈到贵州苗民反抗起事的时候,承认“苗疆之事,未得善策”^②,也认为改流之功能否长久在于办理得人与否。这些都表达了和晏斯盛相同的观点。

① 《清经世文编》卷八十七《兵政十八·蛮防下·论全滇形势》。

② 《清高宗圣训》卷二七八。



张广泗等奏请众建土司

题引：张广泗(? ~1749年)，清汉军镶红旗人，历任贵州按察使、巡抚等职。乾隆十二年(1747年)初，受命为川陕总督主持军务督兵进剿大金川(治今四川金川)土司，七月，张广泗会同四川巡抚纪山奏陈战况，并请将来平定之后众建土司以分其势。本篇选自《清高宗实录》卷二九五。

【原文】

金川^①正在众番蛮土司之中，深邃幽险，尺寸皆山，难以安设营镇。若驻兵防守，运饷更难。惟俟将来荡平之后，就现在恭顺效力之土司，择其从征有功之子弟头人，量为画界分授，少其地而众建之。既以彰赏罚之典，又使力少不能为乱，庶可宁辑边陲。

【译文】

金川正处在众多的藏蛮等少数民族土司当中，地势深暗险要，到处都是山，难以安置营垒兵镇。如果驻扎士卒防守，运送粮饷更难。只有等到将来扫荡平定之后，顺便从现在恭敬顺从效力朝廷的土司中，选择跟从征讨立有功劳的子弟、头目，根据情况划分范围授予土地，减少土司的地盘，增加土司的数目。既可以此来彰显赏罚的法度，又可以使他们力量减弱不能作乱，这样差不多就能够使边疆稳定安宁了。

【评析】

“众建而分其势”，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惯用的一种统治手法。清朝统治者为防止西南地区一些土司势力膨胀，也采取了这种策略。

早在雍正大规模改土归流之前，清朝统治集团就已经意识到要消除土司之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限制其势力的增长，不能让其独大。雍正初，蓝鼎

① 金川：这里指大金川。



元、岳钟琪等人都曾提出要对土司实行削地分权的办法,使其力量减弱,不能产生危害。雍正三年(1725年),吏部等衙门奏请从土司挑选“支庶子弟中有驯谨能办事者”,“酌量给予职衔,令其分管地方事务”^①,得到了雍正帝的批准。此后,土司子孙分地授职成为了一种定制。自雍正四年起,清廷开始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能改土归流之地都被改流,对于深山穷谷、不便设置流官之处,就采用多封众建、分割治理的策略,多立众小土司,使其地少势分,事权不一又彼此牵制,朝廷得以居高制衡,从而牢牢控制住了众土司。

乾隆年间大金川土司恃强凌弱,屡次发兵攻打附近土司。乾隆帝出于“铲绝根株”、“永靖边陲”的考虑,于乾隆十二年初作出了用兵的决策。但大金川两岸地势险峻,到处是山,交通不便,地瘠人贫,不利军队驻扎,粮饷运输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此,张广泗等人提出平定后沿用“众建而分其势”的方法,对恭服顺从、跟随协助清军征讨立功的土司子弟,借机从原土司辖地中划出一块土地,授予他们治理的权力,这样既可表示封赏之恩,又可削弱原有土司的势力,实为一举两得之策。

但后来乾隆帝并未采纳这一建议,在对大金川用兵费时2年、耗银1000万两仍难取胜后,为急于体面地结束战争,最终答应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的乞降要求,主动撤兵停战。金川地区仍保持原有的统治格局,土司中的割据势力并没有受到抑制和打击。没多久,大金川土司又故态复萌,继而联结小金川(治今四川小金)土司,不断侵扰邻近土司。乾隆帝不得不再次调重兵前往征讨,最终费时长达5年、耗银7000万两才将金川地区平定,代价可谓非常巨大。

^① 《清世宗实录》卷三十六。



乾隆论柔远安边

题引：乾隆帝(1711~1799年)，即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雍正帝第四子，在位60年，期间清朝达到鼎盛。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十月，乾隆帝发布谕旨要求边疆将军及督抚体恤外商，并系统阐述了自己柔远安边的思想。本篇选自王之春《清朝柔远记》。

【原文】

冬十月，飭边疆将军督抚体恤夷商。……谕旨且谓：“夷商估舶冒越重瀛，本因觅利而至，自应与之公平交易，使其捆载而归，方得中华大体。……中国抚驭远人，全在秉公持正，令其感而生畏，方合政经。……汉唐宋明之末季，多昧于柔远之经，当其弱而不振，则轻忽而虐侮之，及其强而有事，则又畏惧而调停之，姑息因循，卒至酿成大衅而不可救。宋之败，明之亡，皆坐此病，不可不引为殷鉴也。方今国家全盛，远近震慑威灵，自不敢稍萌异志，然思患预防，不可不早杜其渐。……朕统驭中外，一视同仁。如内扎萨克诸藩，恭顺诚服，朕皆抚若儿孙，……即新附之准夷^①、回部^②，年班^③来者，朕亦必联之以情，待之以礼，厚其犒赉而遣之，众亦莫不怀德感恩，几与内扎萨克相等。……又如朝鲜、安南^④、琉球、日本、南掌^⑤及东洋、西洋诸国，凡沿边、沿海等省分，夷商贸易之事皆所常有，各该将军督抚等并当体朕此意，实心筹办，遇有交涉词讼之事，断不可徇民人以抑外夷，即苗疆、番境诸省，亦当推广此意妥行。……将军督抚皆当善体朕意，毋怠毋忽，自可寓久安长治之计。

① 准夷：指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

② 回部：指天山南路维吾尔族聚居地区。亦称回疆。

③ 年班：清代一种朝觐制度。蒙古各王公首领及回部伯克、四川土司、蒙藏喇嘛等，各按人数多寡编定若干班次，每年各以一班于年节时轮流入京朝觐。

④ 安南：今越南北部。

⑤ 南掌：亦称澜沧，今老挝。



即我世世子孙，敬体朕意，守而勿失，亿万年无疆之庆，诃不在是邪？”

【译文】

（乾隆四十一年）冬十月，令边疆地区的将军、总督、巡抚保护体恤外国商人。……谕旨并且说：“外国商船冒着艰辛越过重重海洋，本来是为了追求利益而到中国的，自然应该同他们公平交易，使其捆绑满载而返回，这样才具备我中华大国的身份气度。……中国招抚驾驭远方之人，完全在于秉持公正，使他们感恩并且心生敬畏，才符合政治的常法。……汉、唐、宋、明朝的末期，大多违背怀柔远人的常法，当对方弱小而势力没有兴起的时候，就轻视疏忽而加以虐待侮辱，等到对方强大而发生事端了，就又畏惧害怕而加以安抚调停，姑息迁就沿袭不改，终于发展到酿成大祸而无法挽救。宋朝和明朝的败亡，都是因为这个弊病，不能不引以为借鉴。当今我国家全盛，远近地区和国家震慑于显耀的声威，自然不敢稍微萌生一点异常的反叛侵犯之心，然而考虑着可能发生的危害予以预先防备，必须要及早杜绝刚露出的苗头。……我统治控驭中原和边疆，对各族一律平等对待。像内扎萨克蒙古等藩属，恭敬顺从诚心归服，我都把它们当儿孙一样安抚看待，……就是新近归附的准噶尔部、回部，每年轮班来京朝觐的，我也必定会用感情来联络，用礼节来对待，赠予丰厚的赏赐并遣还他们，众人也没有不感怀恩德的，其享受的待遇几乎与内扎萨克蒙古一样。……又比如朝鲜、安南、琉球、日本、南掌及东洋、西洋等国家，凡是与它们邻近的沿边、沿海等省分，外商来往贸易都是经常有的事情，各处管辖负责的将军、总督、巡抚等人都一并应当体会我的这个用意，真正用心落实筹划办理，遇到有诉讼交涉的纠纷事情，绝不可以曲从袒护本国百姓而压制外国人，就是西南苗人地区、台湾境内所属等省，也应当推广这个用意妥善加以实行。……将军、总督、巡抚都应该善于体会我的意图，不要玩忽懈怠，这其中自然蕴含着长治久安的谋略。就是我的世世代代的子孙，也要恭敬地体会我的意图，遵守执行不要丧失，亿万年没有穷尽的福泽，难道不就在这里吗？”

【评析】

乾隆帝这篇很长的上谕集中反映了他治国安边的思想和政策。首先，他和其前代清朝统治者一样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天下一统，和柔四夷”的治边思



想,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乃至海外诸国主张实行德政,强调怀柔安抚。乾隆帝认为“治天下者,以德不以力,故德盛者王,德衰者灭”^①。并提倡天下一家,将归附的蒙古诸部喻如“臣仆”、“儿孙”,“亲如家人父子”。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二月,有人在奏折中把蒙古人和汉人分别名色,用夷、汉二字称之时,乾隆皇帝立即给予严厉斥责,并敕谕军机大臣等说:“蒙古、汉人同属臣民,……以百余年内属之蒙古,而目之为夷,不但其名不顺,蒙古亦心有不甘,将准噶尔及金川番蛮等又将何以称之。著再行传谕沿边各督抚知之,如有仍旧书写之处,朕必加以处分。”^②

对归顺和来投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乾隆帝均封以崇高爵位,赐以优厚俸禄,保留、承认他们统治本民族的特权。在他们赴京或赴热河朝觐时,不仅提供路程和食宿费用,而且盛宴款待,并给予丰厚的赏赐,以此来联络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感情,增强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事实证明,这种措施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大大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其次,这篇上谕也清楚地显示,乾隆帝和清朝历代统治者一样,都没有认识到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他们在对外交往尤其是对待从海上来的西方殖民主义者时,依然采取传统的那一套治边思想和政策,缺乏灵活与变通。乾隆帝以天下共主自居,不论是国内少数民族地区,还是周边属国,以至于东洋、西洋诸国,其对待的方式是完全一样的,即他所说的“统驭中外,一视同仁”,以及“中国抚驭远人,全在秉公持正,令其感而生畏,方合政经”。他还将此视为“久安长治之计”,明令要求沿边沿海地方各将军、督抚乃至后世子孙用心遵照执行。这样就使之成为清朝对外交往的国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乾隆帝之后的嘉庆帝在颁给暹罗国王和英国国王的敕谕中,遣词用句内容口吻几乎相同,将正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第一强国英国视如周边的弱小属邦一样,是需要天朝“宠灵”和“体恤”的。这又折射出清朝统治者的愚昧和虚骄自大。

不过,乾隆帝虽然不明于现实的世界形势,在对待周边少数民族、藩属国和西方殖民国家的政策方针上囿囿一体,未能加以区分,但他也说出“思患预防,不可不早杜其渐”、“我国家承平日久,海疆宁谧,中外习为固然。然从来

①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六《新唐书后志论》。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三五四。



防患在于未形,未雨绸缪,古人所云”^①这样的话,这说明他对虎视眈眈的外国殖民者还是有所警惕的,遗憾的是缺乏切实的积极防范措施,泛泛说说而已,终给子孙留下了苦果。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三。



乾隆论征讨廓尔喀

题引：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今尼泊尔)再次入侵西藏，乾隆帝决定派兵征讨，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针对这种情况，乾隆帝颁布上谕，说明使用武力的必要性。本篇选自《清高宗实录》卷一四〇三。

【原文】

贼匪等竟敢扰至扎什伦布^①，肆行抢劫，若不痛加歼戮，贼匪无所忌惮，势必为得尺则尺之计，渐至侵及前藏^②，即察木多^③、巴塘、里塘^④一带，亦必受其煽惑，日久渐成边患。且此时仅以和息了事，将来大兵撤后，倘贼匪复来滋事，后藏距川省辽远，鞭长莫及，断无屡劳兵力，远涉剿办之理。是以特命福康安、海兰察等统兵前往声罪致讨，无非为绥靖边圉，保护卫藏起见。朕临御以来，拓土开疆，肤功屡奏。以廓尔喀之蕞尔弹丸，不及回准二部、两金川^⑤、缅甸、安南百分之一，岂屑利其土地，而为此劳师动众之举。此朕不得已用兵之苦心，又宜为天下臣民所共谅者。

【译文】

(廓尔喀兵)贼寇匪徒竟然敢进犯骚扰到扎什伦布，肆意进行掳掠抢劫，如果不大力加以歼灭惩罚，贼寇匪徒无所顾忌害怕，势必要做得寸进尺的打算，逐步侵犯到前藏地区，就是察木多、巴塘、里塘一带地区，也一定会受到其

① 扎什伦布：即扎什伦布寺所在地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是西藏佛教格鲁派(黄教)四大寺院之一，也是班禅四世之后历代班禅举行宗教和政治活动的中心。

② 前藏：清代将住居拉萨布达拉宫的达赖喇嘛的管辖地区，称为前藏。而将住居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班禅喇嘛之辖地，称为后藏。

③ 察木多：今西藏昌都。

④ 里塘：今四川理塘。

⑤ 两金川：即大、小金川。



煽动鼓惑,时间长了逐渐成为边疆的祸患。况且在这个时候如果仅为求得息兵和解了却事端,将来我方大部队撤退之后,假如廓尔喀兵贼匪再来扰犯生事,后藏地区距离四川省遥远,鞭长莫及,绝不可能有屡次劳用兵力,远程跋涉去剿灭解决的道理。因此我特地命令福康安、海兰察等人率军前往宣布其罪行进行讨伐,不过是为了安定肃靖边疆,保护西藏地区的目的。自从我登基即位以来,开拓疆土,屡次建获大功。凭廓尔喀这么小如弹丸的国家,国土不到回部和准噶尔两部、大小两金川、缅甸、安南的百分之一,我怎么会屑于贪图它的土地,并为此做出劳师动众的举动呢。我不得已而用兵的这份苦衷,又是天下臣民应该共同体谅的。

【评析】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廓尔喀部沙阿家族的普里维·纳拉扬统一尼泊尔之后,积极推行对外扩张的政策,对与之毗邻、地广人稀的西藏,早有覬觐之心。乾隆五十三年,廓尔喀在六世班禅之弟沙玛尔巴的怂恿挑拨下,以贸易纠纷为借口,派军从聂拉木侵入西藏。西藏地方僧俗官员和驻藏大臣巴忠等畏惧敌人,急于平息事态,与廓尔喀私订和约,许岁币银一万五千两,廓尔喀遂退兵。乾隆五十六年七月,廓尔喀在沙玛尔巴的挑唆下,借口西藏地方政府没有缴纳岁币,再度派兵从聂拉木大举进攻西藏。八月,攻占扎什伦布寺,纵兵抢掠。

对于廓尔喀的入侵,乾隆帝从一开始就定下了以武力抗击的方针,认为“贼既侵犯天朝边界,若不加之惩创,何以安番众而靖边圉”,因此一面檄谕廓尔喀退兵,一面调兵遣将增援。但没想到巴忠等违背旨意,私自与敌议和,反而谎奏报捷,称廓尔喀“震慑天威”、“畏罪输诚”。乾隆帝被蒙蔽,以为廓尔喀真的是畏罪乞降。直到廓尔喀第二次侵入西藏,巴忠等“许银赎地”的行径败露,他才了解到事实真相。鉴于廓尔喀不断扩大侵略,乾隆帝决心大张挾伐,以确保边疆的安全和稳定,他命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大臣,调索伦兵、金川土屯兵数千人,进军西藏。

然而,对廓尔喀的武力征讨却招致了一些反对的声音,个别大臣不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大事为重,竟然迂腐愚昧地认为“不应劳师动众,以致雨泽愆期”,将久旱不雨的天灾归咎于这次用兵。乾隆帝这篇上谕,驳斥了这种谬识,也回击了对他用兵是想开疆拓地的猜疑,阐述了必须使用武力的原因,即如果不以武力震慑,苟且了事,势必助长敌人的侵略气焰和野心,使之得寸进

尺,危及整个西藏地区,成为边疆的祸患。何况四川内地距离西藏路途遥远,地险难行,如果不能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问题,势必耗费更多的人力和财力,因而必须示以兵威,予以惩创,使之畏服,不敢再来侵犯。

福康安等人执行了乾隆帝的谕旨,在济咙、热索桥、协布噜、东觉岭等地连败廓尔喀军,收复失地,并追击深入到廓尔喀境内。廓尔喀虽然阻止了清军的进攻,但在大军压境之下,深感国都危险,于是遣使乞降。乾隆帝也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这次用兵的真正用意并不在贪图对方的土地,授意福康安接受廓尔喀的请降,立即撤军。至此,廓尔喀战事结束。

乾隆帝在战后总结经验教训时说:“远徼外夷,偶有跳梁不靖,必得痛加惩创,使之中心畏惧,然后受其归降,始能久而不变。”^①再次强调用武力抗击外敌入侵,绥靖边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性。事实证明,乾隆帝的想法与决策是十分英明的。如果不是乾隆帝派兵反击入侵之敌,连战连捷,犁庭扫穴,廓尔喀是不会真正谢罪乞降的。而正是取得了反击廓尔喀入侵战争的胜利,廓尔喀与西藏边疆地区之间,才在其后出现了60余年的和平局面。

^① 《廓尔喀纪略》卷首二。

福康安上治理西藏策

题引：福康安(1754~1796年)，字瑶林，号敬斋，清满洲镶黄旗人，历任云贵、陕甘、闽浙、两广总督，晋武英殿大学士，封贝子。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在击败廓尔喀侵藏后，福康安奉乾隆帝谕旨上疏，就西藏各项善后事宜提出意见。本篇节选自《清经世文编》卷八十一《兵政十二·塞防下·藏内善后事宜书》。

【原文】

藏内诸事，应统归驻藏大臣管理也。向来驻藏大臣，惟资坐镇，不复预闻，以致藏务日就废弛。嗣后驻藏大臣除上山瞻礼外，其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自噶布^①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分系属员，事无大小，均应禀命办理。至札什伦布一切公事，亦令戴琿^②、堪布^③一体禀知驻藏大臣办理。庶卫藏^④事权归一，积弊可以永除。

【译文】

西藏地区的各种事务，应当统一归驻藏大臣管理。在此之前的驻藏大臣，只是坐镇西藏，不参预听闻政事，导致西藏事务日渐废弛。自此以后驻藏大臣除了上山观瞻宗教礼仪活动之外，其监督办理西藏地区事务之权，应当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同。从噶布以下的各级藏官，以及管事的喇嘛，各分支机构的属员，事情无论大小，都应当禀告驻藏大臣之后奉命办理。至

① 噶布：官名。又称噶布伦、噶布隆、噶隆，清代西藏地方政府行政长官，共设四人，其中一人为首席。隶于达赖喇嘛之下，综理藏务。

② 戴琿：清代及民国时期西藏地方军队军官职称。亦译作代本、戴绷、代奔。

③ 堪布：管理达赖、班禅宫内事务的上层僧官。

④ 卫藏：即西藏地区。藏族将藏区分为卫藏、安多和康巴三个方言区，清朝遂将达赖喇嘛、班禅喇嘛所居之地，即西藏地区沿用藏族的习惯称为“乌思藏”或“卫藏”。



于扎什伦布寺的一切公务事宜,也要求戴琿、堪布一起稟明驻藏大臣之后办理。这样可使西藏的事权归于统一,积累下来的弊端可以永久去除。

【评析】

乾隆年间廓尔喀两次入侵西藏,除了外部因素之外,应当说与西藏政治宗教制度存在的弊端不无关系。乾隆十六年(1751年)在平定珠尔墨特那木扎勒谋叛事变后,乾隆帝颁布了《酌定西藏善后章程》,虽然废除了藏王制度,改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共理藏政,驻藏大臣的职权得到了提升,但是权力却集中到了噶伦手中。噶伦代替达赖管理日常行政事务,遇事大都直接与达赖商办,不经过驻藏大臣。噶伦专权带来了很多问题,像第一次廓尔喀战争中,掌握实权的西藏上层僧俗官员就擅自与敌议和,以许银赎地的做法求得对方退兵。不仅蒙蔽了朝廷,而且不久又因债款纠纷为廓尔喀第二次入侵制造了借口。

乾隆帝后来已经深深察觉到这种弊端,他在抗击廓尔喀第二次入侵西藏期间,曾总结说:“卫藏一切事务,自康熙、雍正年间,大率由达赖喇嘛与噶布伦商同办理,不复关白驻藏大臣,相沿已非一日。达赖喇嘛系清修梵行,惟知葆真养性,离尘出世之人,岂复经理俗务,自必委之于噶布伦。而噶布伦等遂尔从中舞弊,诸事并不令驻藏大臣与闻,及滋生事端,始行稟白,吁求大臣为之经理,迨至事过,仍复诸事擅行,以致屡次滋衅,成何事体。”^①他认为驻藏大臣从思想上和行动上还不能体现代表清朝治理西藏的权威,因此定下决心要对西藏的政教制度实行改革。

乾隆五十七年,随着反击廓尔喀战争的节节胜利,乾隆帝对筹议善后章程一事屡降谕旨。福康安等遵旨先后拟定各项善后章程,分别奏请。经议复奏准后,福康安将各项章程主要条款汇集成29条,于次年正式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令西藏地方政府遵行。这个章程对西藏的政治、宗教、军事、外交等各项制度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确立了以驻藏大臣为主的西藏行政体制,规定:驻藏大臣总揽全藏政务,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决策者,地位与达赖、班禅相等;达赖、班禅及各呼图克图的灵童转世,必须在驻藏大臣的监临主持下,集众喇嘛采取“金瓶掣签”的方式来决定,报请中央政府批准;达赖和班禅的收入及开支,需经过驻藏大臣审核;所有噶伦以下首脑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九三。



及办事人员以至活佛,无论大小都得服从驻藏大臣,札什伦布的一切事务,都由堪布等禀呈驻藏大臣办理;各噶伦及僧俗地方官员、喇嘛补缺,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拣选;驻藏大臣管理西藏地方驻军,每年春秋二季出巡前后藏和检阅军队;西藏对外交涉事宜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等等。

《钦定西藏章程》的颁行,以极大提高和强化驻藏大臣的职权和地位为标志,解决了西藏地方政体中存在的弊病和问题,从此作为西藏的一项基本制度,贯彻于有清一代,成为定制。这对于稳定西藏社会秩序,巩固西南地区边防,加强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管理和控制,密切西藏与内地及中央政府的关系,抑制和防止上层僧俗分子擅权分裂活动的抬头,具有重大的意义。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19世纪末帝国主义疯狂侵华、边疆形势风云激荡,如“瓜分豆剖”之时,西藏基本上没有出现大的变乱和分裂,这不得不说是与乾隆年间确立的这一制度分不开的。



乾隆论守中国

题引：乾隆帝在位期间，曾成功筹划指挥了平定准噶尔部、回部和大小金川土司以及反击廓尔喀入侵等十次战争，自称为“十全武功”。乾隆晚年在击败廓尔喀第二次侵藏后，撰写了《十全记》，在夸耀其事功的同时，总结了治理守卫国家的经验教训。本篇选自《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一四。

【原文】

昔唐太宗策颉利^①曰：示之必克，其和乃固。廓尔喀非颉利之比，番边殊长安^②之近，彼且乞命吁恩准之不暇，又安敢言和乎？然今日之宣兵威，使贼固意求降归顺，实与唐太宗之论，有所符合。昔予记土尔扈特^③之事，于归降归顺，已悉言之。若今廓尔喀之谢罪乞命，归降归顺，盖并有焉。以其悔过诚而献地切也。乃知守中国^④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弃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

【译文】

从前唐太宗对付东突厥颉利可汗的策略讲：展现出一定能战胜对手的实力和决心，边界的安定和平才能得到巩固。廓尔喀同颉利可汗无法相比，它的边境距我都城又不同于东突厥距唐都长安那么近，颉利可汗尚且恳请宽恕乞求恩准其降顺，唯恐来不及，又怎么敢谈讲和呢？然而现在我向廓尔喀宣示军事威力，迫使贼敌坚定想法请求投降归顺，实际上与唐太宗的说法，有符

① 颉利：即唐初东突厥颉利可汗。

② 长安：今西安，唐时都城。

③ 土尔扈特：清代漠西（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及额尔齐斯河中游以西，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西迁至今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居留。因不堪沙俄压迫，在首领渥巴锡率领下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东返回归祖国。

④ 中国：这里指中央王朝和政权。



合的地方。以前我记述土尔扈特蒙古部的事情,对于归降归顺,已经全部都谈论了。像如今廓尔喀承认罪过乞求宽恕,归降归顺,大体上一并都包括在内了。这是因为其诚心悔过,并且尽速归还土地的缘故。由此可知治理中国的人,不能空讲抑止武事振兴文教,从而自己就示弱了。如果他一直抑止武事而修明文教,必定会导致丢弃原来就有的基业而守不住,这点也是必须要知道的啊。

【评析】

乾隆帝在位期间,正值清王朝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也正是在他统治期间,清朝战争频繁。在《十全记》里,乾隆帝将自己亲自筹划决策所进行的战争归结为“十全武功”。尽管“十全武功”里面有的的确属于本不该或没有必要发动的战争,如对安南之战,但大多数战争是为了平定内乱、抵御外侮、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定和主权领土完整,有其迫不得已的客观情势。所以绝不能说乾隆帝是个喜欢穷兵黩武的君主。乾隆帝本人也一再声称其“十全武功”并非穷兵黩武之举,因为非此不能确保江山社稷的安全,巩固大一统的局面。

在清代皇帝中,乾隆帝与乃祖康熙帝一样,也是疆域观念和主权意识十分强烈的君主。这种观念和意识,在其与外国交往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他曾说:“夫开边黩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①在主权与领土问题上,一方面要与邻国友好相处,另一方面坚持寸土不让。主张中国“既不无理强取他国之寸土,亦决不无故轻让我寸土于人”^②。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蒙古回归祖国后,沙俄政府行文清朝,指责其“不当收留”,声称如果收留的话将可能“兵戈不息,人无宁居”。乾隆帝令理藩院回书严辞驳斥,指出这是中国内部的事务,外国无权干涉,毫不示弱地回应了沙俄的武力威胁:“或以兵戈,或守和好,我天朝惟视尔之自取而已”^③。明确表示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不惧及不惜诉诸武力。

在乾隆帝看来,虽然动用武力不是件好事,轻易不要发动战争,但若“非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三七七。

②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第501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九一四。

师旅征伐,则梗我王化者无以蓄伏惩创”^①,也就是说,不使用武力就无法维护国家的安定、统一和完整,就不得不使用武力。只要战争有利于国家的安定、统一、领土和主权完整,就必须要打,而且一定要取胜。他在《十全记》里,以唐太宗对待东突厥的策略和清朝反击廓尔喀入侵取得的胜利为例,对两者进行了分析比较,最后得出“乃知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弃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的结论,强调指出了盛世不忘武备的重要性。

乾隆帝的这一思想十分可贵。“示之必克,其和乃固”,只有拥有强大的国防力量,以军事威慑力为坚强后盾,展示出敢打必胜的决心和信心,和平稳定才能得到巩固,国家的统一和安定才能得到维护。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九。



舒赫德《八旗开垦边地疏》(节选)

题引:舒赫德(1710~1777年),字伯容,一字明亭,满洲正白旗人,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乾隆二年(1737年),疏请将八旗闲散安置于盛京、黑龙江、宁古塔三地实施屯垦,以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奏疏全文见《清经世文编》卷三十五《户政十八·八旗生计》。

【原文】

臣闻治天下之道,在乎由亲以及疏,由近以及远。果能使根本绵固,则枝叶自茂。臣愚以为八旗者,国家之根本也。……伏思盛京^①、黑龙江、宁古塔三处,为我朝兴隆之地,土脉沃美,地气肥厚。闻其闲旷处甚多,概可开垦。虽八旗满洲不可散在他方,而于此根本之地似不妨迁移居住。……若令分居三处,不惟京城劲旅原无单薄之虞,而根本重地更添强壮之卒,事属两便。由是合计京师及三处地亩,均匀摊给,务使家有恒产,人有恒心,然后再教以俭朴,返其初风,则根本绵固久远可计矣。

【译文】

我听说治理国家的方法,在于先照顾考虑到关系亲近的,然后再到关系疏远的,逐渐地由近以及远。如果真正能使树的根本久远稳固,那么繁衍的枝叶自然就茂盛。为臣我的愚见认为,八旗就是国家的根本。……我考虑盛京、黑龙江、宁古塔三个地方,是我朝兴隆发达之地,土壤丰美,地质肥沃。听说那里空阔闲置的地方很多,大多可以开垦。虽然按制度满洲八旗之人不能分散到别的地方,但是在我朝这根本之地似乎不妨迁移居住。……如果让他们分别居住这三个地方,不仅京城八旗劲旅不用担心会变得势单力弱,而我朝的根本重地又会增添强壮的兵卒,这是两方面都便利的事情。在这个基础上统计京师北京和盛京、黑龙江、宁古塔三地方的土地田亩,平均摊给分配,

^① 盛京:今沈阳。清朝入关后定都北京,以沈阳为盛京,作为留都。



务必使得每个家庭都有固定的产业,每个人的心都能安定下来,然后再用节约简朴的道理教育他们,使其恢复当初的风气,那么国家的根本延续下去稳固久远就可以实现了。

【评析】

清朝军队主要是由八旗军和绿营军组成,八旗军队是清政权的支柱。清统治者定都北京、统一全国之后,为巩固以满族贵族为主的政权,实现对人数众多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统治,除了竭力笼络控制和利用汉族地主阶级外,还充分依靠八旗武装作为统治全国的主要工具。

为了确保这一立国的“根本”,清统治者制定了各种制度和措施,千方百计授予八旗旗人各种特权,树立和巩固他们在全国的优越地位。这些人被免去了除兵役之外的全部义务,也不用从事生产,而完全凭借自己或祖辈的功劳领取优厚的俸禄,过着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生活。在聚“数万人于京华”的北京八旗旗人及其子弟中,许多人都是游手好闲的吃喝玩乐之徒,花费极大,以至一月钱粮数日耗光,家中所有挥霍一空,八旗生计问题由此开始出现。

此外,日趋腐化堕落的生活,导致了以骑射见长的民族特性逐渐丧失,八旗军队的战斗力急剧下滑减弱。三藩叛乱时,吴三桂就说过:“清朝军中向者旧臣皆勇猛,今甚衰弱矣,焉能及前人哉?”^①各地的八旗驻防军几乎都是养尊处优,久不操练,成为名副其实的老爷兵。这些腐败的八旗子弟不仅已经不能打仗,而且军纪败坏,有的甚至公然骚扰百姓,抢劫财物,危害社会的稳定。

这种状况从顺治之后开始引起清朝统治者的关注,尤其是京师北京地区的八旗生计问题,直接影响到拱卫京师和紫禁城的八旗兵力,因此更成为关注的重点。但统治者除了本着“满洲乃国家根本,宜加爱惜”的目的,不断对旗人施以赏赐或赈济银两、粮米,或者让汉军出旗外,也实在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办法来。这些措施只能聊解燃眉之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雍、乾之后,当时统治集团中开始有人提出建议,将八旗“闲散移屯”外地。雍正时曾在京畿固安县试行“井田”,但最后以失败告终。乾隆二年舒赫德的这篇上疏,也是奏请将八旗闲散移屯到外地,只不过去处是清朝统治者一直封禁的

^① 《康熙起居注》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十一月。



“龙兴重地”东北地区。舒赫德认为东北盛京、黑龙江、宁古塔三省是清朝的发迹地,土地又肥沃丰美,如果移京师八旗旗人前往屯垦,既可解决八旗的生计问题,又可以避免八旗子弟的荒嬉腐化,增强东北地区的防守力量,一举多得,从而可以达到永久巩固清王朝“根本”的目的。

然而,舒赫德的建议虽然受到了乾隆帝的肯定,要求奉旨议行,但最终并未得到认真落实。乾隆帝一度迫于京城满洲八旗人口急剧膨胀,一人钱粮难养全家的情况,命挑取满洲八旗人在吉林拉林等地开垦地亩,建造房屋,前往屯种。还想方设法通过加赋等措施逼迫现有流民放弃已占耕的土地,并试图利用退出耕地来解决八旗生计。与此同时为保证旗人独享东北地利,屡次严申封禁制度。但这种严禁政策由于民间偷越、当地官吏渎职腐败等因素而有禁不止,移旗屯田也因八旗人丁萎靡之风积重难返等原因,多数归于失败。乾隆中期以后,由于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以及连年的内外战争,清廷财政状况恶化,导致统治者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赈济八旗旗人。因此,八旗生计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终清之世,被清朝统治者倚为“根本”的八旗的生计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妥善解决,与此相联系,其战斗力日趋低弱,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加速清朝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乾隆谕移民新疆

题引:乾隆时期,随着全国的统一和日趋稳定,面对人口激增,内地民户向边疆地区加速流动,清廷改变了过去的封禁政策,在一些地区采取了移民实边的措施。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帝发布上谕,鼓励向新疆移徙内地人口。本篇选自《清高宗实录》卷六〇四。

【原文】

今日户口日增,而各省田土不过如此,不能增益,正宜思所以流通,以养无藉贫民。……西陲平定,疆宇式廓,辟展^①、乌鲁木齐等处在于屯田,而客民之力作、贸易于彼者,日渐加增。将来地利愈开,各省之人将不招自集,其于惠养生民,甚为有益。

【译文】

现今人口一天比一天增多,而各省的土地不过就是这些,不能增加,这种情况下正应当考虑怎样流通人口,来养育存活没有依靠的贫民……西部边事平定,疆域范围扩大,辟展、乌鲁木齐等地到处都在实行屯田,而从外地到那些地区耕种土地、经商贸易的人们,日渐增多。将来那边农业生产及地理条件得到更大开发了,各省的民众将不用召集就自己会聚而来,这对于施恩抚养百姓,是非常有益的。

【评析】

清代中叶以后,统一多民族国家逐渐得到巩固,疆域统一,经济发展,出现了和平、稳定、繁荣的局面。但是随着盛世时代的来临,一些社会问题也开始凸显出来。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乾隆以后内地人口急剧增长的矛盾日益加剧。加之一些地区土地兼并严重,旱灾、涝灾频繁,灾民、流民时

^① 辟展:今新疆鄯善。



有增加。大批无地少地或遭灾的农民出外寻觅生路,形成了一股股由中原内地向西南、西北、东北等地广人稀的边疆地区的移民浪潮。

清初从维护边疆地区的政治秩序,消除不安定因素的角度出发,对整个边疆地区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封禁,禁止东南沿海人民渡海到台湾和其他海岛谋生,不许中原人民赴内陆边疆开垦种植,安家落户。到了乾隆时期,在日益高涨的移民流动的冲击下,清政府不得不对以往的封禁政策有所改变,承认内地人民流往边疆的现实,进而在一些地区鼓励移民迁入。这在新疆地区尤其明显。

清政府很重视新疆,鉴于其“东捍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系葱岭”,“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建瓴”^①的至关重要的地理位置,为确保其战略地位,在统一新疆前后,清廷曾对治理新疆的大政方略展开过深入的讨论。熟谙西北边疆军务的黄廷桂、兆惠、范时绶等人相继进言建议在新疆实行“屯田、移民、实边”之策。乾隆帝肯定了这种向新疆移徙内地人户的意见,他的这篇上谕,明确了自己的态度和想法,事实上确认了移民实边的方针。

乾隆二十五年以后,清政府在此前大力推广屯田的基础上,组织大批移民到新疆北部地区屯垦,开发新疆。向新疆移民屯田,缓和了内地人口的压力和矛盾,也有力地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通过移民屯垦,巩固了清朝对新疆的统治,国家的统一局面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内地民众移徙边疆后,充实那里的力量,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融合,他们一起开发边疆,为保卫边疆、抵御外敌入侵而并肩战斗。因此,清朝移民边疆,客观上具有历史的积极作用。但是,清朝统治者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移民实边对巩固国防、开发边疆、促进国家全面发展所产生的深远意义,为了维护满族统治阶级以及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利益,继续抱残守缺,在广大边疆地区总体上依然维持其保守、落后的封禁政策,这种情况直到近代,随着边疆危机的全面加剧,最终才被打破。

^① 清·钟广生:《新疆志稿》卷一。



乾隆《赐英吉利国王敕书》(节选)

题引: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派出以马戛尔尼为正使的外交使团,以祝贺乾隆帝83岁寿辰为名访华。马戛尔尼向清朝提出开放通商口岸、在北京设立商行等六项要求,对此,乾隆帝以向天下臣民颁布诏谕的形式致书英国国王,全部予以拒绝。全文见《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

【原文】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赉表章,航海来庭,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

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赉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

又据尔使臣称,欲求相近珠山^①地方小海岛一处,商人到彼,即在该处停歇,以便收存货物一节。尔国欲在珠山海岛地方居住,原为发卖货物而起,今珠山地方既无洋行^②,又无通事^③,尔国船只已不在彼停泊,尔国要此海岛地方,亦属无用。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况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货物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别国纷纷效尤,恳请赏给地方居住买卖之人,岂能各应所求。且天朝亦无此体制,此事尤不便准行。

① 珠山:今浙江舟山群岛。

② 洋行:又名洋货行、外洋行。清代官方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

③ 通事:清代鸦片战争前后,担任中国官商与外国商人联系,并代办某些临时性业务的翻译人员。



【译文】

(英吉利)国王与中国远隔重洋,全心向往归服,特地派遣使者恭敬送上书信奏章,从海上航行来到我朝,叩拜敬祝我长寿万岁,并且准备了本国当地的物品呈上进献,用来表达热忱诚恳的心意。我翻阅奏章的内容,语言恳切真挚,完全可见国王你恭敬顺服的诚意,我十分赞赏。……至于在你的国书内,恳请要从你国派出一个人,驻留在我国,照应管理你国贸易的这件事,却是不符合我朝制度的,绝对不可以实行。……

如果说仰慕我国,想让派来的人参观学习政教风化,那么我朝自有我朝的礼仪法度,与你国不一样;你国所派来驻留的人,即使能够学习,你国自有你国的风俗制度,也绝不可能效仿中国,即便学会了也是没有用处。我朝治理天下,只在于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对于奇珍异宝,并不看重。国王你这次送上的各种物品,我考虑到是你的一片诚心这么遥远过来进献的,特地下旨令有关负责管理的衙门接纳收下。事实上我朝恩德威名到达远方,万国都来尊王朝拜,各种贵重的物品,从水路陆路汇集而来,无所不有,这是你国使团的正使等人所亲眼看见的。……

又据你国使臣说,想求得珠山附近的一处小海岛,商人到了那里,就在该处停留歇脚,以便收发存放货物。你国要在珠山海岛地方居住,原本起因是为了发卖货物,现在珠山当地既没有洋行,又没有通事,你国船只已不在那里停泊,你国要这个海岛,也是没有用处。我朝每一尺的土地都划入了国家版图,疆域的位置范围严密完整,即使是岛屿、沙洲也一定要划分疆土界限,使各有专门的归属。况且向往归服天朝,交易货物的海外国家,也不仅止你英吉利一国,如果别的国家纷纷仿效,恳请赏给某处给其买卖贸易的商人居住,难道能每个都答应。何况我朝也没有这样的制度,这件事更不利于准许实行。

【评析】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派出以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庞大使团,以向乾隆帝祝寿为名出使清朝。这是中英之间第一次正式的国家间交往。英国使团访华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打破清廷对外商的种种限制,要求清廷改变对外政策,为本国商品打开中国市场进行一次尝试,并带有炫耀资本主义实力和文明、强行开拓殖民利益的意图。马戛尔尼在热河觐见乾隆帝返回北京后,向清廷提出了六项要求:一、开放舟山、宁波、天津诸港;二、在北京设立



商行；三、拨给珠山附近小岛一处，以便英商停歇和收存货物；四、拨给广东省城一处，以便英人居住或准许澳门居住之人出入自便；五、允许英商自广东下澳门由内河行走，货物不上税或少上税；六、请公开确定船只关税条例，照例上税。

对英国使团提出这六条要求的真正用意，乾隆帝自然能察觉得到。为此，他特地给英国国王颁写了两道敕谕，对对方的要求逐条进行了驳斥，重申清廷对外限制的政策不会改变，强调指出上述要求与清朝体制不合，不便允行。对于英使提出的拨给珠山附近小岛一处使用的要求，乾隆帝明确予以了拒绝，同时义正词严地指出：“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表明了领土疆域即使是“尺土”，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度主权意识。体现了乾隆帝保卫海疆，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坚决抵制外来侵略的决心。在拒绝英使要求后，乾隆帝即催令使团迅速回国，并传谕沿途官员严加防范，以防英国人滋事。

毋庸置疑，作为封建帝王的乾隆帝具有强烈的主权意识，拒绝英使的非分无理要求，抵制外国势力的侵略，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他对外部世界毫不了解，对英国的崛起、资本主义及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等世界格局中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茫然无知，仍以天朝上国自居，盲目自大，把英使当作贡使，对其携带的礼品所体现出的先进科学技术和西方文明不屑一顾；特别是面对西方殖民主义袭来的挑战，只是被动采取闭关锁国的“鸵鸟政策”，而未能从长远考虑任何积极应对的措施，却是愚昧落后的。

就英国使团提出的具体要求而言，要求拨给珠山、广东一块土地，这是涉及到国家领土主权的问题，应该毫不含糊、断然拒绝的。免税减税的要求也不合国际通例，不能允准也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多口通商、在北京设立英国洋行和使馆等等，仅就要求本身来看，似乎也并不过分，只要遵循对等原则，对双方都有利，不应一律拒绝。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最终宣告失败，中国也就此丧失了一次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深入接触交流、开拓视野、认识世界的大好机会。乾隆帝及其后来的嘉庆帝、道光帝等清朝统治者，仍然抱着闭关锁国的保守思想和政策，固步自封，拒绝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结果，在短短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就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后面，为后来中国遭受外侮埋下了伏笔。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的大门在西方殖民国家的坚船利炮下被迫打开。



嘉庆谕防堵外国兵船入内海

题引：嘉庆帝(1760~1820年)，即清仁宗爱新觉罗·颋琰，乾隆帝第十五子，即位之初奉乾隆帝为太上皇帝继续执政，四年后始亲政。在嘉庆朝，英国等西方殖民势力对中国东南沿海的侵扰活动日益频繁。嘉庆十九年(1814年)，嘉庆帝敕谕军机大臣强调用防堵之策抵御西方殖民者入侵。本篇选自《清仁宗实录》卷三〇〇。

【原文】

粤省地方濒海，向准各国夷船前来贸易，该夷商远涉重洋，懋迁有无，实天朝体恤之恩。然怀柔之中，仍应隐寓防闲之意。……嗣后所有各国护货兵船，仍遵旧制，不许驶近内洋，货船出口，亦不许逗留。如敢闯入禁地，即严加驱逐，倘敢抗拒，即行施放枪炮，慑以兵威，使知畏惧。

【译文】

广东地方靠海，以前允许外国的船只前来贸易，是考虑到外国商人从遥远的地方渡涉重洋，进行贸易互通有无，实际上是我朝体恤他们予以的恩德。然而笼络怀柔之中，仍然应该隐含寓藏着防备约束的意图。……自此以后所有各国保护货物的兵船，仍旧要遵守过去的制度，不许行驶靠近内海，货船驶出港口，也不许停滞逗留。如果胆敢擅自闯入禁止去的地方，就严厉予以驱逐，倘若敢违抗不听，就鸣放枪炮，用军事威力进行震慑，使对方知道畏惧害怕。

【评析】

从乾隆后期开始，清王朝已开始由盛转衰，政治腐败，封建剥削日益苛重，导致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在军事上武备废弛，海疆防御十分虚弱。在防内重于防外的指导思想下，水师的主要任务是防止走私和缉捕海盗。沿海巡哨制度也不能得到很好执行，“苟无海贼之警，即终年停泊，虽有出巡会哨之文，



皆潜泊于近岙内岛无人之地”^①,甚至有相邻两省哨船相距不过数百里,却从未会合谋面的情况。而与此同时,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开始加紧向外扩张侵略的步伐。乾隆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就连续派船携带大炮,强行进入中国口岸进行贸易。到了嘉庆年间,英国兵船不断到广东沿海活动,多次擅闯内洋,肆行侵扰。嘉庆十三年更是强占澳门,进泊黄埔,后被当地官员奉旨派兵驱逐。

面对日益严峻险恶的海疆形势,嘉庆帝采取了与其父乾隆帝一样的办法,就是不断用各种防范限制措施来“防堵”:小到重要物资的进出口和西方人的在华活动,大到外国护商兵船和军舰进入内海,一律在防堵的范围之内。嘉庆十九年的这篇给军机大臣的上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年冬,两广总督蒋攸銓密奏英商贸易情况,并议定《酌筹整饬洋行事宜》(《整饬夷商贸易九事》)奏上,嘉庆帝表示很满意,同时进一步重申各国护货兵船不许驶入内洋,护货出口也不许逗留,否则即以武力加以驱逐。

客观地说,防御外国军事力量进入中国沿海,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然而鸦片战争前以嘉庆帝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昧于世界大势,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扩张政策缺乏明确认识,又死抱“天朝定制”不放,因此除了政治上实行闭关锁国,在海防安全上一味强调消极防堵之外,拿不出什么更好的策略来。他们一方面骄妄无知,把和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商视作是“天朝体恤之恩”,是表示怀远羁縻之举;另一方面又对西方列强的行为存有一定的戒心,认为必要时要“示以兵威”,来维护海防的安全和疆土的完整。嘉庆帝和后来的道光帝都严饬沿海疆臣不得丢失寸土尺地,一再强调“沿海一体严密防范”。至于如何严密防范,则没有提出明确而具体的措施,故而实行起来,只能是分兵把口、处处消极防堵而已。

在嘉庆帝之前,最早从康熙帝起清朝统治者就已意识到西方国家日后会对中国形成威胁,也有用武力防范抵御外敌入侵的决心。但又都提不出任何消除这种威胁的积极办法,采取真正有效的应对措施。即使是以“圣主”、“明君”称于世的康熙和乾隆二帝,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定方面武功赫赫,卓有远见,但其海防观念及所施行的政策,却始终是消极防御性的,缺乏积极进取精神和远大眼光。其海上防范的重点也不在西方列强,而是念念不忘防止海外番夷与内地汉人交接联合,危害清朝的统治。因此一有感受到来自海上

^① 清·魏源《圣武记》,附录卷十四。



的威胁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紧闭大门,禁防“民夷交错”,用防堵的办法隔绝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任何往来。

从防堵具体内容来看,清廷为“防范夷人”而制定的规条和章程,很多要求过于苛细,有悖情理,甚而显得有些荒谬。如不许外商上岸居住;不许外国妇女进入广州城;禁止外国人乘轿;禁止中国人受雇于外国人等等。至于限制通商口岸、只准在广州一地通商的规定,更是与西方殖民者扩大贸易的要求相违背,由此不断引发矛盾冲突,加之殖民者的侵略本性,日后战争的爆发自然势在难免。而由于海防战略上的短视,一味消极防堵,缺乏认真对付外敌的准备;又由于政治军事的衰败和全面落后,当资本主义列强以武力入侵时,清王朝的被动挨打已是无可逆转了。

第九章 清后期

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清·李鸿章《筹议海防折》



概 述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把清朝历史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清朝后期(1840~1911年)历时72年,是中国历史上发生巨变的时期。鸦片战争后为应对内外交困的安全形势,救亡图存,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和近代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历史影响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并将其付诸实施,从而带动整个清王朝在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及政治制度、思想观念上长达70年之久的变革。尽管这些变革存在很多局限性,并未从根本上消除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威胁,也未能挽救清王朝最终覆灭的命运,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使中国走向了近代化,并促进了国家安全观念的发展,对当时乃至以后的中国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可以说鸦片战争后的70年,既是中国历史上国家安全面临空前威胁、内忧外患不断加剧的70年,也是对国家安全的认识逐渐发展、思想变革日益深化的70年。

中国近代对于国家安全的新形势具有清醒认识,并最早提出具有一定战略高度的新思想的是林则徐、魏源等人。他们摆脱了天朝上国的自大心理,第一次睁眼看世界,比较客观地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和西方列强在军事、技术上的先进。他们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在当时不仅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而且为之后兴起的洋务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因两次鸦片战争的刺激而发展起来的洋务运动,是在实践上对这一思想进行的探索。洋务运动的结果虽然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但客观上却使政府和社会对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维护国家安全的认识得到进一步加深。诸如铁路、电报、钢铁制造、轮船制造等一些关乎国家安全的重要之“器”,在这一时期被提出和兴建,表明传统上将“器”视为奇技淫巧的旧观念开始发生变化。

随着器物层面上对西方长技认识的加深,也促进了制度以及观念上的缓慢变革。历来被传统社会视为“末”的工商业,开始加速兴起和发展。同时大批企业的建立,对能够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的迫切需要,推动了新式学堂的建立。传统八股取士的教育方式不再适应时代需要,逐步退出历史舞



台。而晚清大批留学生的出现,也将西方社会的民主观念、法制观念、尚武精神引入中国,使晚清近代化的变革重心逐步由器物层面转入制度、思维和观念层面。但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晚清朝廷顽固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各方面的变革始终未从根本上触及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制度。

近代在军事上的变革速度较之其他领域相对滞后,特别在军事制度上的改革更是如此。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曾在军事上进行一些变革。在武器装备上,逐步以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代替冷兵器;在军事制度上,尽管八旗、绿营作为国家的经制之兵地位并未发生改变,但以募兵制为基础的湘军、淮军则成为国家军事力量的真实主体。随着19世纪70年代中国海疆、陆疆安全面临的威胁不断加剧,迫使清政府重新审视传统的国防战略,逐步认识到发展海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促进了近代海军的建立。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则宣告了清军一直坚守的传统军事制度的失败,完全按照西方军队的编制体制和训练方法编练新式军队的主张也在这一时期被提出。北洋新建陆军、南洋自强军乃至后来全国编练新式陆军的兴起,对于促进晚清军事近代化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

总的来看,晚清在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上,学习西方、进行变革是主要的特征,基本运行轨迹及遵循的重心是先器物、再制度、再观念。由于固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从根本上触及深层次的制度问题,而且这种变革始终处于被动应对、激发而后效的过程中,缺乏积极主动变革的精神,自始至终没有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提出过指导变革的整体规划,因而严重制约了改革的进程和深度。

之所以如此,除了封建统治制度的腐朽没落和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外,积淀千年的传统观念对人们思想的禁锢是一个重要原因。任何变革性的思想一旦出现,就会立即受到传统观念的围堵,要实现突破并加以实施则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近代社会变革的缓慢前行,就是新旧思想相激相荡的结果。从本质上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指导思想的提出,也是新旧思想相互妥协的结果。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但晚清有识之士面对全新的挑战,为维护国家安全提出的诸多新认识,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的近代化,对人们的观念变化和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产生了积极作用,一些政策的实施也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其历史意义正体现于此。



黄爵滋奏请严禁鸦片

题引：黄爵滋(1793~1853年)，字德成，号树斋，江西宜黄人，历官鸿胪寺卿、大理寺少卿、刑部右侍郎等。晚清之祸，始于鸦片。道光十八年(1838年)，针对鸦片泛滥为害，黄爵滋特上折要求重治吸食者以禁止鸦片。本篇选自《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

【原文】

盖自鸦片流入中国，我仁宗睿皇帝^①知其必有害也，特设明禁。然当时臣工，亦不料其流毒至于此极，使早知其若此，必有严刑重法，遏于将萌。查例载：凡夷船到广，必先取具洋商保结^②，保其必无夹带鸦片，然后准其入口。尔时虽有保结，视为具文^③，夹带断不能免。故道光三年以前，每岁漏银数百万两。其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为浮靡，尚知敛戢^④。嗣后上自官府缙绅^⑤，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⑥。盛京^⑦等处，为我朝根本重地，近亦渐染成风。

外洋来烟渐多，另有趸船^⑧载烟，不进虎门海口，停泊零丁洋中之老万山、大屿山等处。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龙、快蟹^⑨等船，运银出洋，运

① 仁宗睿皇帝：指嘉庆帝(1796~1820年在位)。仁宗是其庙号，睿是其谥号。

② 保结：向官府具出的保证书。

③ 具文：空文。

④ 戢(jì,音及)：收敛。

⑤ 缙绅：古时宦者垂绅搢笏，所以称士大夫为缙绅，也作“缙绅”。

⑥ 日中：日益昌盛。

⑦ 盛京：今沈阳，清朝入关后作为留都。

⑧ 趸船：一种无动力装置的矩形平底船，设在突堤或码头的尽头且固定在岸边，通常有浮动而锚着的平台，供船舶停泊或旅客和货物上下船用。

⑨ 扒龙、快蟹：扒龙，常见于广东广西的舢板小船。快蟹，清代中后期水师的一种大型战船。



烟人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江、浙、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

然则鸦片之害,其终不能禁乎?臣谓非不能禁,实未知其所以禁也。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臣请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日起,至明年某月日止,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虽至大之瘾,未有不能断绝。若一年之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

臣查余文仪《台湾志》云:咬啍吧^①本轻捷善斗,红毛^②制造鸦片,诱使食之,遂疲羸受制,其国竟为所据。红毛人有自食鸦片者,其法集众红毛人环视,系其人竿上,以炮击之人海,故红毛无敢食者。今人中国之鸦片,来自啖咭喇^③等国,其国法有食鸦片者以死论。故各国只有造烟之人,无一食烟之人。臣又闻夷船到广,由孟迈^④经安南^⑤边境。初诱安南人食之,安南人觉其阴谋,立即严刑示禁,凡有食鸦片者死不赦。夫以外夷之力,尚能令行禁止,况我皇上雷电之威,赫然震怒,虽愚顽之人沈溺既久,自足以发聩振聋。

【译文】

自鸦片流入中国以来,仁宗皇帝知晓此物对国民一定有害,特地明令禁止。然而当时的朝臣,也没有想到流毒会如此厉害,假使当时就知道鸦片有如此危害,必定会施行严刑重法,将其制止于未萌之时。有成例记载:凡西洋商船到广州,必定向洋商取保证书,以确认其没有夹带鸦片,然后才能准许其进入国内。但这种保结的办法,后来被视为一纸空文,夹带鸦片的行为无法避免。所以道光三年以前,每年因此损失白银几百万两。起初吸食鸦片的只有富家子弟,他们习惯浮华奢侈,但还知道收敛。以后上至朝廷官员士绅,下至各行各业的百姓,甚至妇女、和尚、尼姑、道士都在吸食鸦片,置购烟具的买

① 咬啍吧:古国名,在今菲律宾吕宋岛。

② 红毛:中国明清时期对荷兰(人)的称呼。

③ 啖咭喇:即“英吉利”,指英国。

④ 孟迈:即今印度孟买。

⑤ 安南:今越南北部。



卖也日益兴盛。而在我朝立国的根本重地盛京等处,近来也吸食鸦片成风。

国外运来的鸦片日渐增多,还有一些走私趸船,它们不从虎门进入,而是停泊于零丁洋之中的老万山、大屿山等地。广东省的奸商与巡海兵弁相勾结,用扒龙、快蟹等船,将白银运出海外,而将鸦片运入关口。所以从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每年损失白银一千七八百万两,从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每年损失的白银则增加到了二千余万两,从十四年至今,逐渐损失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江苏、浙江、山东、天津等处关口,总计又有数千万两的损失。用中国可用的财力去填补外国的无尽的欲望,换来这些害人的东西,日益让人担心国家会变成“病国”。像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然而鸦片的流毒难道最终没有办法禁绝吗?我认为并不是不能禁绝,实在是因为没有找对如何禁绝的办法。之所以耗费那么多的银两,是由于鸦片贸易的兴盛,而鸦片贸易的兴盛,是因为有众多的吸食鸦片的人。如果没有人吸食了就自然没有人贩卖鸦片了,那么外国人也自然不会再运鸦片过来。现在要以重刑整治,一定要先整治吸食者,我请皇上降道严厉的圣旨,从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准许一年为期限,要求这些吸食者戒除烟瘾。即使烟瘾极大的人,用一年时间也没有戒不掉的。过了一年的戒烟期,如果仍有人吸食,就将其当作不遵守国家法律的乱民,以重刑惩罚。这样就能做到公正恰当。……

我查过余文仪的《台湾志》,上面说:咬嚼吧人本来是轻捷善斗的,后来荷兰人制造鸦片,引诱他们吸食后,于是变得羸弱不堪被荷兰人所制,国家也最终被其占领。荷兰人中也有自己吸食鸦片的,(如果被发现)采取的办法是召集众荷兰人围观,将吸食者系于长竿之上,用大炮将其击入大海,所以荷兰人没有敢吸食鸦片的。现在进入中国的鸦片,来自英国等国,这些国家法律有吸食鸦片判处死刑的条款。因此各国只有制造鸦片的人,而没有吸食鸦片的人。我又听说外国船只到广州,要由孟买经过安南边境,起初引诱安南人吸食鸦片,安南人觉察到其中阴谋,立即用严厉的刑罚予以禁止,凡有吸食鸦片者一律处以死刑而不赦免。以外国人的力量,(对待鸦片)尚且能做到令行禁止,何况我朝皇上具有雷电一样的威严,勃然大怒起来,即使是愚笨顽固沉溺吸食鸦片已久的人,也足以使他们醒悟过来。

【评析】

19世纪初,随着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势力以鸦片作为打开中国国门的



贸易武器,流入中国的鸦片日见增多。尽管清政府屡次限制鸦片走私,结果却是“禁止愈严,而偷漏愈盛;治罪愈重,而走私愈多”^①。到了道光时期,鸦片已成泛滥之势,吸食者更是遍及各行各业,甚至被视为根本重地的盛京也逐渐习染成风。

鸦片的泛滥不仅损害了民众的身心,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而且还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危机。其一,导致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破坏了清朝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其二,在鸦片贸易的高额利润刺激下,官商勾结、贪污贿赂风行,吏治更趋败坏;其三,一些将领和士兵也吸食鸦片,使得军队的战斗力大为削弱。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将会动摇清王朝的统治基础,给国家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正如林则徐所言:“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之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②然而,当时清政府内部相当多的人对鸦片的危害认识不清,以许乃济为首的一派人就坚持弛禁鸦片的主张。他们认为不必全面禁绝鸦片,可以准许非公职人员吸食鸦片,同时准许国人栽种鸦片。持弛禁论观点的人其着眼点只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待鸦片问题,目的仅在于防止白银外流,在鸦片对社会、对人民身心及对清王朝政权威胁方面缺乏深刻的认识,但他们的言论却在清廷内部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针对这一状况,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日(1838年6月2日),时任鸿胪寺卿的黄爵滋向道光帝上了本篇奏折。事实上,早在道光十五年黄爵滋就曾两次上奏,表明严禁鸦片的坚定立场,而此折则是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对原有论点的充实和发展。在这篇奏折里,黄爵滋力陈鸦片给国家各方面安全带来的极端危害,并将禁绝鸦片的着眼点锁定在吸食者身上,提出用重刑惩治吸食鸦片者的办法,来断绝国人对鸦片的需求,抵抗鸦片的输入,进而解决由此带来的财政危机等问题。

黄爵滋的认识显然要比弛禁论者更为深刻。这篇奏折对道光帝的触动很大,促使他转变了在禁烟问题上游移不决的态度,而下定决心实行禁烟。不久道光帝颁布《严禁鸦片章程》,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标志着全面禁烟的开始。

① 《清史列传》卷四十一《黄爵滋传》。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

魏源《海国图志》序

题引：魏源(1794~1857年)，近代启蒙思想家，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一生强调经世治用之学，著有《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等。在《海国图志》的序文里，魏源针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

【原文】

《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①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②，创榛辟莽^③，前驱先路。大都东南洋、西南洋^④，增于原书者十之八；大小西洋、北洋、外大西洋^⑤，增于原书者十之六。又图以经之，表以纬之，博参群议以发挥之。

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⑥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⑦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易》曰：“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故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⑧焉；同一款敌，而知

① 林尚书：指林则徐。清制，凡总督则加兵部尚书衔。

② 钩稽贯串：取舍研究，整理编辑。钩，取，选择。稽，查核。贯串，使文章意思连贯。

③ 创榛辟莽：劈荆斩棘，指开创新的领域和做前人未做过的事业。榛、莽，野树杂草。

④ 东南洋、西南洋：东南洋，指今亚洲东南部各国。西南洋，指今南亚和西亚各国。

⑤ 大小西洋、北洋、外大西洋：大西洋，指欧洲各国。小西洋，指非洲各国。北洋，指俄国和北欧各国。外大西洋，指南、北美洲各国。

⑥ 谭：同“谈”。

⑦ 款：议和，这里指外交活动。

⑧ 相百：相差百倍。



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古之驭外夷者,諏^①以敌形,形同几席;諏以敌情,情同寝馈。

然则执此书即可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②。此兵机^③也,非兵本^④也;有形之兵也,非无形之兵也。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人心之积患如之何?非水,非火,非刃,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吸烟贩烟之莠民。故君子读《云汉》、《车攻》^⑤,先于《常武》、《江汉》^⑥,而知二《雅》诗人之所发愤;玩卦爻内外^⑦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所忧患。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⑧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昔准噶尔^⑨跳踉^⑩于康熙、雍正之两朝,而电扫于乾隆之中叶。夷烟^⑪流毒,罪万准夷。吾皇^⑫仁勤,上符列祖,天时人事,倚伏相乘^⑬。何患攘剔之无期,何患奋武之无会?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排,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⑭,去营窟^⑮,则人心之寐患祛其一。以实事程^⑯实功,

① 諏(zou,音邹):咨询,询问。

② 唯唯、否否:应答词,表示不置可否。唯唯,表肯定;否否,表否定。

③ 兵机:具体的战略战术。

④ 兵本:用兵的根本,这里指国家的实力。

⑤ 《云汉》、《车攻》:前者为《诗经·大雅》中的篇名,后者为《诗经·小雅》中的篇名,都是讲治理国家内政之事。

⑥ 《常武》、《江汉》:均为《诗经·大雅》中的篇名,讲整顿武备抵御外敌之事。

⑦ 卦爻内外:指《周易·系辞》所说的“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爻是构成卦的基本符号,爻象变化,可测吉凶。

⑧ 否(pi,音痞):厄运、不顺。

⑨ 准噶尔:清代漠西蒙古四部之一。自康熙年间起多次发生叛乱,至乾隆时才最终平定。

⑩ 跳踉(liang,音良):即跳梁,这里指叛乱。

⑪ 夷烟:指鸦片。

⑫ 吾皇:此处指道光帝。

⑬ 倚伏相乘:好事坏事这对矛盾是可以互相依托转化的。《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⑭ 养痈:养着毒疮,比喻姑息坏人坏事。

⑮ 营窟:土室、穴居,比喻为个人谋算。

⑯ 程:考核,衡量。



以实功程实事,艾^①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②,毋冯河^③,毋画饼^④,则人材之虚患祛其二。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传曰:“孰荒于门,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⑤叙《海国图志》。

【译文】

《海国图志》六十卷,根据什么来写的呢?一是根据前两广总督林则徐所编译的西方国家的《四洲志》一书,二是根据历代史书中的志以及明代以来的岛屿志要,和最近的外国地图、外国书籍。在此基础上编辑整理进行研究,披荆斩棘,作为先驱者当先开辟道路。有关东南洋、西南洋的内容,比《四洲志》原书增加了十分之八;有关大小西洋、北洋、外大西洋的内容,比原书增加了十分之六。又在书中用图、表加以标识,广泛参考吸取各方的评述观点而在此之上予以发挥。

这本书与从前记述海外各国地理的书有什么不同?答:那些书都是中国人谈论西方,而这本书则是西方人谈论西方。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答:是为了利用外国间的矛盾来分化他们而写,为了搞好与外国安抚和谈的策略而写,为了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从而战胜他们而写。《易经》上说:“人假如没有喜好、厌恶,就没有得失,也就没有凶吉。有好有恶,两者相攻,就有凶有吉。物取之不以理,舍近求远,或是本远求近,则生悔恨。真情相感则生吉,虚假的感情相感则生凶。”所以同是防御敌人,了解敌人的情势与不了解敌人的情势,两者的利害结果相差很大。同样是与敌和谈,知晓敌人的虚实与不知晓敌人的虚实,两者的利害结果也相差很大。古时候对付外敌的人,询知掌握敌人的形势和情况,就像对自己的小桌、床席和吃饭、睡觉一样熟悉清楚。

那么有了这本书就可以抵御外敌了吗?答:不一定。这本书只是讲用兵

① 艾:一种草药名。存放的时间越久,治病的效果越好。

② 网临渊而结之:到了临近水潭的地方再结渔网。语出《汉书·董仲舒传》:“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③ 冯(píng,音平)河:徒步涉水渡河,比喻冒险。《论语·述而》:“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焉。”

④ 画饼:比喻图虚名不务实。《三国志·魏志·卢毓传》:“画地作饼,不可啖也。”

⑤ 四海:指天下。均:公平。越裳:古南海国名。臣:臣服。这句话出自唐代韩愈《琴操十首·越裳操》。



的方法,而非克敌制胜的根本;是讲有形的军事行动,而不是影响战争的各种无形的因素。明朝大臣有人说过:“要想平定海上倭寇,先要解决人们内心积累下的问题。”人内心积累的问题如何解决呢?它不是水火,不是金刃,不是沿海的奸民,也不是吸食鸦片贩卖鸦片的败类。因此君子在读《诗经》时先读《云汉》、《车攻》,后读《常武》、《江汉》,从而明白《大雅》和《小雅》中诗人所要抒发的情怀;研究卦象的吉凶变化,而后知道《易经》作者所忧患的是什么。愤发与忧患意识,这是天理命运由不顺而转入亨通,人们思想脱离愚昧而变醒,人的才能去掉虚浮而变实际的条件。以往准噶尔部在康熙、雍正两朝发动叛乱,而在乾隆中期被迅速剿灭。鸦片的流毒比起准噶尔叛乱来要厉害万倍。当今皇上宽仁勤政,同列位先皇一样,而天时人事的好与坏也是可以互相依托转化的。还担心什么鸦片的驱除铲绝没有日期,武力得不到发挥的机会呢?这是所有有血性的人应当忧愤于心,所有有心智的人应当议论谋划的。将一切伪装、虚饰、畏难和姑息养敌、营求私利的想法统统去掉,那么人心理上的愚昧迷惑问题就将清除,这是其一。用实际事情来衡量考察其实实在的功效,用实在的功效来衡量考察实际事情,将艾草存放三年(方能更好发挥功能),临近水潭时再结网捕鱼,不冒险,不务虚,那么人们身上的不切实际的毛病就会去除,这是其二。愚昧迷惑去除了国运就会昌盛,不切实际去除了行动就迅速。曲传说:“有谁会任自己的门庭荒芜,而去治理田园呢?只有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外国才会臣服。”(以上作为)《海国图志》序。

【评析】

鸦片战争使中国国门被迫打开,而割地赔款的事实也让“天朝上国”颜面扫地。但是怀着恐惧心理的清朝统治者,却并没有从失败中获得教训,他们拒绝以真实的视角来看待入侵者,仍然以“华尊夷卑”、“夷夏之防”的陈旧观点来自欺欺人。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理解到其后果的严重性,更认识不到这是一个大变局的开始。这种严峻的现实,使作为思想家的魏源深受触动,开始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最终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安全战略思想。

鸦片战争中魏源曾两次到过浙江前线,对于西方的坚船利炮有着较多直观认识。在不断的反思中,魏源逐渐形成了制夷一悉夷一师夷的思路。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魏源受林则徐所托,将其所译《四洲志》扩编成《海国图志》。《海国图志》是一本系统介绍南洋、欧美各国历史和地理的书,是近代



初期中国编撰的最详细的一部介绍世情的巨著,也是介绍、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特别是关于战舰和火器生产技术的著作。魏源在书的序言中根据林则徐“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思想,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这一主张已经走出了狭隘的思维范畴,将视角延伸到整个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的矛盾中,并具有了从世界的和历史的高度思考问题的意识,是对当时时代主题的回答,也第一次给近代中国指出了学习西方、自强御侮的方向。这无疑具有划时代的启蒙意义。

魏源认为在近代史上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敌人,已经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蛮夷入侵,而是在各方面都远远超乎中国之上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几千年的历史提供不了现成答案,传统的“文死谏,武死战”也解决不了问题,真正的爱国主义已不再仅仅是岳飞式的“精忠报国”,还应包括对国家命运的深刻担忧,对救国良策的苦苦追寻。在他看来,既然对手超过自己,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向其学习,师其长技。只有承认己之不足,向西方学习才能由弱转强,进而战胜和制止西方列强的侵略。在当时“中外大防”、“华夷之辨”的历史氛围下,魏源以对国家、民族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独树一帜地提出了“师夷”的思想主张,显示了其远大的战略眼光和非凡胆识。

魏源还认为要“师夷”,必须先去除人民心中的积患,即昏庸无知和虚浮不实之风,只有将落后、愚昧、陈旧的思想观念清除掉,人们才能够以一种正常的眼光来看待西方,才能明白西方的优长到底在哪里。这种“以治内为治外”的思想也是很有见地的。

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为救亡图存、抵御外侮,维护国家安全提出了现实可行的思路,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后来的洋务派倡导以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为中心,开展创办军事工业、“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中国军事、经济诸方面向近代化迈进的步伐,而确立这一运动思想基础的,正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左宗棠论自行设局造船

题引:左宗棠(1812~1885年),清末洋务派和湘军领袖,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历官巡抚、总督、军机大臣等职。同治五年(1866年),针对李鸿章等人反对设局自行建造轮船的情况,左宗棠特上折陈明设局造船的必要。本篇选自《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十八《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

【原文】

窃维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自广东、福建而浙江、江南^①、山东、直隶^②、盛京以迄东北,大海环其三面,江河以外,万水朝宗。无事之时,以之筹转漕^③,则千里犹在户庭;以之筹懋迁^④,则百货萃诸廛肆^⑤。匪^⑥独鱼盐蒲蛤^⑦足以业贫民,舵艚水手足以安游众也。有事之时,以之筹调发,则百粤^⑧之旅可集三韩^⑨;以之筹转输,则七省之储可通一水。匪特巡洋缉盗有必设之防,用兵出奇有必争之道也。况我国家建都于燕^⑩,津沽实为要镇,自海上

① 江南:这里指江苏省。

② 直隶:即直隶省,辖境相当今北京、天津、河北大部 and 河南、山东部分地区。

③ 转漕:运粮。车运为转,水运为漕。

④ 懋迁:指贸易。懋,通“贸”。

⑤ 廛(chān,音缠)肆:市肆、街市。

⑥ 匪:同“非”。

⑦ 蒲蛤:蒲,一种香草,叶可供编织。蛤,泛指水产品。

⑧ 百粤:亦称“百越”,中国古代聚居在今广东、广西一带的部族,这里泛指岭南南方之地。

⑨ 三韩:朝鲜半岛南部古代居民的总称,包括马韩、辰韩和弁韩三支。这里泛指邻近朝鲜的东北之地。

⑩ 燕:北京地区的别称。春秋战国时为燕国之地,故称。



用兵以来,泰西各国^①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比及回南,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销耗愈甚,不惟亏折货本,浸^②至歇其旧业。滨海之区,四民^③中商居什之六七,坐此阗阗^④萧条,税厘^⑤减色,富商变为窶^⑥人,游手驱为人役,并恐海船搁朽。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是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从前中外臣工屡议雇买代造,而未敢轻议设局制造者,一则船厂择地之难也;一则轮船机器购觅之难也;一则外国师匠要约之难也;一则筹集巨款之难也;一则中国之人不习管驾,船成仍须雇用洋人之难也;一则轮船既成,煤炭薪工,需费不啻^⑦,月需支給,又时须修造之难也;一则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事败垂成,公私均害之难也。有此数难,毋怪执咎^⑧无人,不敢一抒筹策,以徇^⑨公家之急。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虽善作者,不必其善成。而善因者,究易于善创。

【译文】

我认为东南地区的利益关键,在于水路而不在陆路。自广东、福建到浙江、江南、山东、直隶、盛京一直到东北,大海三面环绕,江河在此汇聚于大海。在没有战事的时候,利用江河进行漕运,即使千里的距离也会像在自家庭院那样方便;利用江河进行水上贸易,那么所有的物品都会汇集于城市之中。

① 泰西各国:即西方各国,通常指欧美各国。泰西,极西的意思。

② 浸:逐渐。

③ 四民:即指士、农、工、商四种人。

④ 阗阗(huānhuī,音环会):市肆、街道,也借指店铺、商业。阗,本义为市场的围墙;阗,本义为市场的门。

⑤ 税厘:晚清起实行的一种商业税。分坐厘、行厘两种,前者征货物交易税,后者征货物通过税。因税率按货值抽若干厘,故名厘税,又叫厘捐、厘金。

⑥ 窶(jù,音巨):贫寒、贫穷。

⑦ 啻(zì,音资):衡量、计量。

⑧ 执咎:承担责任。

⑨ 徇:献身、舍身。



不单鱼、盐、蒲、蛤足以养活穷苦百姓,舵手、艄工、水手等职业也可使游民有事可做。有战事的时候,可以利用水路调拨军队,即使在相隔很远的百越之地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集结到东北等地;利用水路来进行运输,那么上述七个省的物资就可以水路互相调剂。不单巡查海面、缉拿海盗要有必须的海防设施,而且出奇用兵也有必争的通道。况且我国建都于北京,天津就成为屏障北京的重镇。自从海上交兵以来,西方各国军舰可以直达天津,使这一屏障形同虚设,进出迅疾,毫无阻挡。自从外国商船被准许搭载货物以来,北方商品行销各口岸,以至北方各地货价暴涨。江浙两省中以水上贸易为大商贾,向北方购买商品,货价更高,等到运回南方,费用大行程耽搁久,又不能减价以与洋商竞争。时间长损耗会更厉害,不仅亏损本钱,发展到最后不得不停业。靠海的地区,士农工商四种人中从商的占十之六七,城市商业将因此变得萧条,厘税也会减少,富商会变成穷人,而无业游民会变成供人役使的奴仆,而且恐怕海船因长期闲置也会腐朽。目前江浙两省的海运就已存在无船可供的局面,而且漕运事务更难于得到解决,这种情况非设立船政局加紧建造轮船不能加以改变。以前中央和地方官员曾多次讨论过雇佣或购买代造轮船事宜,而始终没敢提出设立船政局来制造商船的原因,一是造船厂选址有困难;二是购买制造轮船的机器有困难;三是邀请外国工匠有困难;四是筹集需要的巨额费用有困难;五是中国人还不熟悉驾驶轮船,船造成了还必须要雇佣外国人,这也有困难;六是轮船造成后,要维持轮船正常运转所需的煤炭费、工时费非常可观,每月都要支出,而且还要兼顾修造,这也是十分困难的;七是这种不同寻常的做法,容易遭到非议,最先倡导的、实际去做的、袖手旁观的各有其人,如果功败垂成,个人和国家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失,这也是有困难的。有这些困难存在,就不会奇怪为什么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直抒筹办海防的对策,以解决国家的当务之急了。我认为要想在海洋中趋利避害,除了整顿水师别无他法。而要想整顿水师就一定要设立船政局自己负责来建造轮船。西方国家技术精巧中国就一定不能只安于拙陋的现状,西方国家有的东西中国就不能以没有为荣。虽然有好的开始,不一定就有好的结果。但善于学习,却总是要比善于创造来得容易。

【评析】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不断加剧,清政府上下对海防危机的认识开始不断深入,魏源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



洋务运动中也得以逐步贯彻。作为洋务运动领袖的左宗棠,很早就对西洋的器物产生了兴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提出了“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①的思想主张,从而成为洋务运动的先导。同治五年(1866年)春,左宗棠镇压太平天国余部后,由广东回到福州。当时清廷正在考虑购雇轮船的问题,他立即写信给总理衙门,指出“就局势而言,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这一想法提出后,立刻招来一片反对之声。李鸿章就认为依靠自身力量建造轮船不仅面临很多困难,而且造船费用高昂,因此主张从国外购买,反对自行建造。针对此左宗棠上呈了本篇奏折,陈明兴办船政局、自行建造轮船的必要性。

在这篇奏折中,左宗棠分析了世界大势的变化,认为轮船是西方列强扬威海上的利器,而中国的海防要得到巩固,就必须建立强大的新式兵轮水师。有了水师,再修明政治,精练兵勇,就可以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从这一点出发,他认为,即使有诸多困难存在,也必须设立自己的船政局,自行建造舰船。在左宗棠的全力争取下,同治五年六月,清政府发布上谕,称“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②,批准了左宗棠设立船政局的计划。1866年12月,中国近代海防的产物——福州船政局在福州马尾成立,成为晚清著名的海军军工企业之一。

从现代国家安全理论的视角来看,左宗棠所提出的自行建造舰船的主张是十分有见地的。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各国海上争雄的军备竞赛趋势,以及强敌不断自海上入侵的严峻形势,加强海防力量显得刻不容缓。左宗棠洞察到自造舰船发展海军对于维护国家军事安全的重要作用,是十分难能可贵的。19世纪60年代,虽然西方列强已经凭借坚船利炮和强大的海军占据海上主导权,但此时中日两国的海军发展均还处在起步阶段。左宗棠设厂造船的主张,及推动福州船政局的创办,使中国的海防暂时还没有落后于日本。福州船政局购进机器,聘用外国技师、工匠监造轮船,同时培养造船和驾驶人才,为以后南北洋海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二。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十八。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节选)

题引:李鸿章(1823~1901年),清末洋务派和淮军领袖,字少荃,安徽合肥人,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职。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清廷内部关于海防战略展开讨论,李鸿章上书力陈加强海防的重要性。奏折全文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

【原文】

目前当务之急与日后久远之图,业经综括无遗,洵^①为救时要策。所未易猝办者,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②之难化,故习之难除。循是不改,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然则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何以言之?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③,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④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庚申^⑤以后,夷势駸駸^⑥内向,薄海冠带之伦^⑦,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局外之訾议^⑧,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

① 洵:诚然、确实。

② 畛域:事物之间的界限。

③ 埒(lie,音列):等同、并立。

④ 麇(qun,音群)集:成群聚集。

⑤ 庚申:指咸丰十年(1860年)。这一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沙俄趁火打劫,强迫清政府分别签订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

⑥ 駸(qin,音侵)駸:马跑得很快快的样子,比喻迅疾。

⑦ 冠带之伦:指士大夫、为官之辈。

⑧ 訾议:非议、指责。



然靡所依据。自古用兵,未有不知己知彼而能决胜者,若彼之所长,己之所短,尚未探讨明白,但欲逞意气于孤注之掷,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臣虽愚闇^①,从事军中十余年,向不敢畏缩,自甘贻忧君父。惟洋务涉历颇久,闻见稍广,于彼己长短相形之处,知之较深。而环顾当世饬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未由。《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总之,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伏愿我皇上顾念社稷生民之重,时势艰危之极,常存欬然^②不自足之怀,节省冗费,讲求军实,造就人才,皆不必拘执常例,而尤以人才为亟要。使天下有志人士无不明于洋务,庶练兵、制器、造船各事可期逐渐精强。积诚致行,尤需岁月,迟久乃能有济。目前固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彼族^③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

【译文】

目前的当务之急与日后的长远规划,业已概括得全面而无遗漏,确实是挽救时局的良策。之所以不易马上办成,是因为人才难得,经费也难于筹措,而且地区间的差异难于化解,积习难于破除。如果因循照旧而不加改变,即使天天在考虑怎么设防,也只是画饼充饥而已。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应当尽力破除成见,以求实效。为什么这样说呢?历代防备边患,多在西北地区。那里强弱的态势,主客的实力变化,都正好差不多,而且还有彼此的边界。现在东南海疆长达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汇集于北京及内地各省,名义上是为邦交和好而来,实际上却怀有吞并的野心,一个国家挑起争端,其他国家都会煽动生事,这实在是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巨变。轮船电报的迅捷,转眼之间就能到达千里;军事装备的精巧,比人力强过百倍。炮弹所到之处,无坚不摧,海上陆地的关隘,已无法再发挥遏制的作用,这种强敌也是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外患交错,如此变化,而我们却仍然用过去的老办法来对付他们,这就像医生治病不问症状,一律按照古老药方下药一样,是根本看不到效果的。庚申年之后,外敌内侵有加剧之势,沿海大小官员,没有不为之

① 愚闇(an,音暗):愚昧无知。闇,同“暗”。

② 欬(kan,音侃)然:谦虚不自足的样子。

③ 彼族:即指西方列强。



愤慨的,争相主张予以驱逐。那些局外人的非议,本来就不了解当事者的困难,等到问起要怎样才能自强?要怎样才能抵御外侮?却都茫然而说不出所以来。自古以来用兵作战,没有人能在既知己也不知彼的情况下取得战争胜利的,如果连对方的优势是什么,己方的劣势是什么,都还没有探讨清楚,只想意气用事孤注一掷,这不是将国家大事当成儿戏吗!我虽然愚昧无知,但在军旅十多年时间,向来不敢畏缩不前,而给皇上增添麻烦。只是我筹办洋务较久,见闻比其他人稍多,对敌我之间的优劣对比情况,了解得比较深一些。然而环顾当今形势军饷和人才实在还不能适应要求,而且又多被老办法所束服,受制于众人的议论,虽然想要振作发奋却没能蹈行。《易经》上说:“事物发展到极点和穷尽的时候就必须求变化,变化之后便能够通达适合需要。”不知变通则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靠不住,即使是求和也不会持久。……

总而言之,现在要想整顿海防,除了变法与选用人才,别无其他可以采取的办法。请皇上能够以国家人民为重,在这样形势艰难危急的时候,常常保有不自足之心,节省不必要的经费开支,重视军事装备,同时要造就人才,这些都不必拘泥于成法,而且尤其以培养人才最为紧迫。要使天下的有志人才都能够明洋务,那样训练军队、修制军器、制造轮船等事差不多可望逐渐又精又强。而且要积聚诚心予以施行,更需要时间,长久才会有效。目前固然需要保守和局,即使将来武器精良国防也巩固了,也不应该从我们这里对西方国家挑起事端。对方如果有对我国非常无礼的时候,才不得已应对一下。

【评析】

1874年,一向被清政府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派兵侵入台湾。这次事件对清政府的自尊心造成极大刺激,同时也促使其认清了发展海军已迫在眉睫。事件后,总理衙门提出建立新式海军、购置新式枪炮等六条建议,几乎同时丁汝昌上奏了《海洋水师章程六条》。清廷将这两个六条发给沿海各督抚,谕其详细筹议,从而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关于海防战略的讨论。在这次海防战略讨论中,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所上的《筹议海防折》最令人瞩目。

李鸿章在这篇奏折中,在分析了前所未有的严峻对外形势的同时,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变法、建立海军、兴办民族工业的认识。这种认识,源于他对当时时局的清醒判断和准确把握,并将其概括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一著名论断。李鸿章对时局的认识,首先在于承认“变”,并且十分重视这个



“变”。这代表了清廷内部一部分比较能正视现实并想努力加以挽救的官僚士大夫的思想,同另一些闭耳塞听的顽固派形成了显著区别。李鸿章常用这种变局观批驳那些不识时务者,抨击许多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巨大变局,一味守旧苟安,因此他希望清廷能摆脱妄自尊大、自我封闭的心态,认清数千年来雄踞东方的“天朝上国”已经沦为列强欺凌宰割对象的现实形势,承认敌强我弱的事实,设法图强自救,力挽危局。

在奏折中,李鸿章阐明了“变通”,即调整战略、改变做法以应对危局的迫切性,尤其着重阐明了海防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将海防建设与军事制度、经济制度、用人制度联系起来,提出海防建设与其他改革同时进行,并就建设海军亟待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人才、经费、训练、武器等,一一作了分析阐述。

这次“海防大讨论”之后,李鸿章又急切进言呼吁购买铁甲巨舰。但清政府此时虽然已经意识到加强海防的迫切性,但因受东南海防和西北塞防(中亚阿古柏入侵新疆、俄国出兵强占伊犁)同时告急的牵制,未能全力大举兴办海军。1884年8月,中法战争马江一役,福建水师全军覆灭。战争刚一结束,年轻的光绪皇帝就郑重颁布了“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上谕。随即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宣告成立,海军成为国家的经制军种之一,引来了大发展的黄金时期。随着大量外购的军舰陆续到华服役,总理海军衙门于1888年秋上奏获准颁行《北洋海军章程》,标志着北洋海军正式建建成军。

应当说,作为清朝封建政权中流砥柱的重臣,李鸿章能较早感受到中外关系和客观环境发生的巨变,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在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上存在的差距,从而吁请清政府适应形势,以建设海军带动国家的革新强大,其思想是具有一定的开明性和进步性的。其围绕海军建设的战略构想,推动了后来北洋海军的创建。



左宗棠论海防塞防并重

题引：晚清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论者在强调东南海防重要性的同时，却忽视西北陆防，甚至主张放弃新疆，专注东南。光绪元年（1875年）三月，左宗棠专门上书予以批驳，提出了海防塞防并重的观点。本篇选自《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

【原文】

窃维时事之宜筹、漠^①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匀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

论者拟停撤出关兵饷，无论乌鲁木齐未复，无撤兵之理；即乌鲁木齐已复，定议画地而守，以征兵作成兵，为固圉^②计而乘障防秋^③，星罗棋布，地可缩而兵不能减，兵既增而饷不能缺，非合东南财赋通融挹注^④，何以重边镇而严内外之防？是塞防可因时制宜，而兵饷仍难遽言裁减也。……

今若画地自守，不规复乌垣^⑤，则无总要可扼。即乌垣速复，驻守有地，而乌垣南之巴里坤、哈密，北之塔尔巴哈台^⑥各路，均应增置重兵，以张犄角；精选良将，兴办兵屯、民屯，招徕客、土，以实边塞，然后兵渐停撤，而饷可议节

① 漠(mo, 音磨):计谋、谋略。

② 圉(yu, 音雨):边境。

③ 乘障防秋:凭借险阻而加强防备。障,障碍、险阻。防秋,古时塞外少数民族多乘秋季收获时节进犯内地,故防备工作十分重要,称为秋防或防秋。

④ 挹(yi, 音义)注:以有余补不足。

⑤ 乌垣:指乌鲁木齐。

⑥ 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



矣。……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①堪虞,即北路科布多^②、乌里雅苏台^③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

【译文】

我认为当前应筹划的事情、应制定的谋略,是东面加强海防,西面加强塞防,二者并重。现在持海防论的人,认为目前无力专顾西域,而且应当严守边界而不必急于谋图进一步发展,请求将边防停撤的军饷拿来补济海防建设。持论塞防论的人,认为俄国人怀贪诈之心图谋入侵,应当把全部力量放在西征上,西北边疆没有危险了,东南沿海自然就稳固了。这些都是臣子出于忠忱为国作出的谋划,而不是囿于私心偏见维护自己的利益。……

有人认为应当停止裁撤出关的兵饷,我想无论乌鲁木齐收复与否,都没有撤兵撤饷的道理;即使乌鲁木齐已经收复,商定要画地而守,将出征军队变为屯戍军队,也应为巩固边疆考虑而加强防备,星罗棋布地部署力量,即使土地可以缩减但兵力不能削减,兵力增加了之后军饷就不能缺少,如果不能将东南地区的财赋融通用于军饷,怎么能注重边镇从而加强边疆及内地防务呢?因此边塞设防可以因时而变,但军饷却仍不能骤然裁减。……

现在如果画地自守,不收复乌鲁木齐,就无要害可扼守。即使乌鲁木齐能迅速收复,在此能派兵驻守,然而乌鲁木齐以南的巴里坤、哈密,以北的塔尔巴哈台各路,都应增加重兵把守,这样才能形成犄角之势;精心选择良将,大兴军屯、民屯,招徕外地和当地人,以充实边塞,在这之后军队可以逐渐停增裁撤,而军饷才可以谈到节省。……如果此时就停兵节饷,自己放弃屏障,那么敌人就会得寸进尺,不光陇右值得担忧,就是北路的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地,恐怕也不能再安宁。所以停兵节饷对于海防不一定有益,对于边防却是大有妨碍,孰利孰害,是迫切应当深思熟虑的。

① 陇右:这里指陇山以西的甘肃、新疆大部及青海湖以东地区。

② 科布多:又称和卜(布)多,清代西北边疆政区。设参赞大臣一名,驻今蒙古国科布多城。

③ 乌里雅苏台:清代西北边疆政区。属定边左副将军辖区,驻今蒙古国乌里雅苏台城。



【评析】

19世纪60年代,在英俄两国的共同支持下,中亚伊斯兰汗国的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以喀什噶尔(今喀什)为中心建立“哲德莎尔国”,并进而占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实行殖民统治。1871年,俄国乘机出兵占领新疆军政中心伊犁。就在西北塞防吃紧之时,东部海防亦出现事端。日本于1874年成立了“台湾都督府”,派兵侵犯台湾。中国面临着东西两个方向上的强敌入侵。如何同时应对两个方向上国家安全遭受到的威胁,处于多事之秋的清政府在1874年展开了历时半年的“海防”、“塞防”孰轻孰重的讨论,以确定当时国防的战略重点。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持“海防”论者认为,新疆收不收复,对于国家肢体之元气无伤,而海疆不防,则是心腹之大患,因此反对出兵西征收复新疆失地,并要求把用于“塞防”的经费挪作扩充海军之用。而以湖南巡抚王文韶为代表的一批持“塞防”论者,认为西方列强的侵略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是视清廷对外部侵略的反应态度而决定动止,如果任其侵略西北,将更会刺激其群起侵略中国的野心,从而导致东南海防的危机,因此积极支持西征。但争论的最终结果却是“海防”论者占了上风,一时间请罢西征之声尘嚣其上。

光绪元年(1875年)三月,清廷密谕左宗棠,要求其对海防、塞防提出意见,左宗棠于是上奏此折。奏折中,左宗棠摆脱了一己私见,从全国的国防形势以及新疆的战略地位出发,逐条批驳了停兵撤饷、请罢西征的危害,力主出兵收复新疆。同时深刻地分析了海防与塞防之间的关系,强调二者互为表里,互相影响,二者不能偏废。提出新的国防布局 and 战略应对方针应为海防、塞防双向并重,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以两个方向共同作为国防战略的重心,在西北和东南同时加强军事防御的建设。

从表面上看,左宗棠的观点是折中了尖锐对立的海防、塞防两派论点,但事实上他是反对把战略防御的重点只转移到海上方向,以牺牲“塞防”来加强“海防”。从维护国家整体安全的角度和高度思考问题,反映了他的战略眼光。

由于左宗棠的奏折分析精辟,建策更为合理可行,得到了大学士文祥等人的支持,也对清廷的决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虽然清廷此时已深知海防建设刻不容缓,但新疆问题关系到蒙古甚至京师的安全,不能不作为国家安全的主要矛盾予以解决。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清廷决心不放弃将西北塞防作



为国防战略重心的选择,但基于对现实形势的考虑,同时将东南海上方向作为国家战略防御的另一重要方向,最终确立了“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战略方针。不久,清廷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督办新疆军务钦差大臣,全权负责收复新疆事宜。同时任命李鸿章为北洋大臣,沈葆楨为南洋大臣,主持海防事宜。这表明清廷实际上采纳了左宗棠的主张和建议。后在左宗棠的努力下,清朝终于收复了新疆,暂时解除了西北方向的边疆危机,从而得以全力加大对海军的投入,应对东南海上方向日益严峻的安全形势。



左宗棠《遵旨统筹全局折》(节选)

题引:光绪三年(1877年)夏,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过程中,清廷谕令其统筹新疆全局之计,左宗棠遂上奏此折,进一步陈明新疆的战略地位,并提出新疆建省的主张。全文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

【原文】

窃维立国有疆,古今通义。规模存乎建置,而建置因乎形势,必合时与地通筹之,乃能权其轻重,而建置始得其宜。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盖东南以大海为界,形格势禁^①,尚易为功;西北则广莫无垠,专恃兵力为强弱。兵少固启戎心,兵多又耗国用。以言防,无天险可限戎马之足;以言战,无舟楫可省转饷之烦,非若东南之险阻可凭,集事^②较易也。周秦至今,惟汉唐为得中策;及其衰也,举边要而捐之,国势遂益以不振。往代陈迹,可覆按^③矣!顾祖禹^④于地学最称淹贯^⑤,其论方輿^⑥形势,视列朝建都之地为重轻。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不特前代所谓九边^⑦皆成腹地,即由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以达张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堠^⑧

① 形格势禁:事情为形势所阻,无法进行。格,阻碍。禁,禁止。

② 集事:成事、成功。

③ 覆按:查核、按验。

④ 顾祖禹(1631~1692年):明末清初历史地理学家。字复初,一字景范,江苏无锡人。所撰《读史方輿纪要》为一部研究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

⑤ 淹贯:渊博而贯通。

⑥ 方輿:一般指地理。

⑦ 九边:这里指明代时北部边塞的辽东、宣府、大同、延绥等九个军事要镇。

⑧ 斥堠:即斥候,用于侦察的人。这里指敌情警戒。



遥通,而后畿甸^①宴然。盖祖宗朝^②削平准部^③,兼定回部^④,开新疆、立军府^⑤之所始也。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⑥,尤不可不豫^⑦为绸缪者也。……

区区愚忱,实因地不可弃,兵不可停,而饷事匱绝,计非速复陕疆无从着手,局势所迫,未敢玩愒^⑧相将。至省费节劳,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已者。

【译文】

我认为国家的建立都要有疆界,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边界的规模由郡县的设置来决定,而郡县的设置则取决于形势的变化,一定要将时机与地理条件统筹规划,方能权衡出轻重,而建置之才能比较恰当。自古以来,中国的边疆危机,西北总是比东南严重。这是因为东南以大海为界,在形势阻隔之下,防守容易有效;西北地区土地辽阔,只能依靠兵力的多寡来决定其强弱胜负。如果驻军太少会引起敌人侵略的野心,如果驻军太多又会增加国家开支。就防守而言,西北没有天险可屏障无法限制外族的骑兵;以进攻而言,没有舟船之便可资利用以省却军需转运之苦,不像东南地区有天险可以凭藉,防守成功较为容易。自周、秦至今,只有汉、唐二代处理得较好;但到其衰败时期,却

① 畿甸:古制王畿千里,千里之内称为甸服。后泛指京城地区。

② 祖宗朝:此处指康熙、乾隆时期。

③ 准部:指发动叛乱的漠西蒙古准噶尔部。

④ 回部:亦称回疆,指天山南路维吾尔族聚居地区。

⑤ 军府:清代在新疆实行的军政合一的政治制度。设伊犁将军统管天山南北军政事务,下另置参赞大臣、办事大臣等分管各地事务,依靠当地少数民族贵族建立起统治。

⑥ 徙薪宜远,曲突宜先:把灶旁的柴草搬走应越远越好,把烟囱改建成弯的应越早越好。比喻预防灾祸,防患于未然。

⑦ 豫:同“预”,预先。

⑧ 玩愒(kai):贪图安逸,荒废时日。



将边疆要地全都放弃,国势于是日益衰弱不振。前代的旧事,教训可供借鉴啊!顾祖禹在地理学方面最为渊博贯通,他探讨地理形势,是看历朝历代国都所在之地而定轻重的。我朝定都北京,北方有蒙古部落环卫,一百多年来没有战火,非但前朝明代所谓的九边之地现在都已成为腹地,即使由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到张家口这一线,也都是重兵屯戍,互通声息,而后京畿地区才能平安无事。这都是康熙、乾隆两朝削平准噶尔叛乱,平定统一回部,开辟新疆、设立了军府所奠下的基业。所以重视新疆是为了保全蒙古,保全蒙古是为了守卫京师地区安全。这样西部与北部就会像臂膀与手指相连一样灵便,形势完整坚固,敌人自然就无隙可乘。如果新疆不稳固,蒙古就不会安全,不但陕西、甘肃、山西等边境地区随时都有被侵犯的危险,防不胜防,就是直隶北部的关外地区,也将没有安宁的时候。况且现在的形势与过去相比,又大不一样。俄国开拓疆土日益广阔,从西到东万余里,与我国北部边境接壤,只有中段有蒙部相阻隔。为防患于未然,这是尤其必须预先做好防备的。……

我的一片忠心如此,实在是因为新疆的土地不能放弃,军事行动不能停止,但现在军饷匮乏,考虑到唯有迅速收复肥沃的疆土,否则别无他法,为形势所迫,而不敢以敷衍了事的态度对待啊!至于节省军饷劳费,为新疆筹划一个长治久安的计策,以解除朝廷西北的边患,那么在新疆设立行省、改置郡县,事情已克不容缓。

【评析】

“海防”、“塞防”之争后,清政府决定收复新疆,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用兵方略,令刘锦棠等率军进兵新疆,至1876年底全部收复北疆地区。次年7月,在左宗棠指挥各路清军挺进南疆之时,清廷发出上谕,指令左宗棠全盘筹划新疆的善后事宜。左宗棠奉谕后,遂上奏了这篇《遵旨统筹全局折》。

在奏折中,左宗棠坚持了其在“海防”、“塞防”大讨论中对新疆战略地位的基本认识,立足于反侵略斗争和维护西北边疆安全的现实需要,进一步阐述了确保新疆对于屏护蒙古、防卫京师的重大战略意义。他还总结了汉、唐两代在经营西域过程中的历史经验教训,强调指出正是这两个朝代在走下坡路之时作出了国家安全战略上的错误决策,将西北边疆的军事要地尽数放弃,才导致了国运的更加衰落不振。在重申收复新疆全境必要性的同时,左宗棠明确提出了新疆“设行省,改郡县”的主张。他认为对新疆的安全构成严



重威胁的,主要是俄国,而要抵御俄国的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就必须废除过去长期存在于新疆的军府制,改设行省,立郡县,以加强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直接控制。

关于新疆建省,早在1820年龚自珍就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提出过,并规划了新疆区划郡县的具体计划;魏源也在《圣武记》中提出新疆置郡县的主张。不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样的认识没能受到足够的重视。而左宗棠对于新疆战略地位的认识,以及新疆建省主张的重新提出,则是对解决日益深刻的西北边疆危机深思熟虑的结果。就客观现实条件而言,进军新疆收复北疆,乃至最后全疆的归复,则为新疆建省提供了有力的实力保障。

1878年初,左宗棠督军收复南疆以后,再次上奏提出建立新疆行省事宜,并建议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设总督,阿克苏设巡抚。这年11月,左宗棠又上《复陈新疆情形折》,详细阐述了新疆建省的理由,指出随着新疆百姓的增多,用原来简率的军府制,依靠当地少数民族贵族实行统治管理已经行不通,因此他请求从维护新疆的长治久安考虑,置郡县,改行省,建立起由中央政府直辖的完整的行政体系。在左宗棠的再三吁请下,清廷经过反复筹议,至1884年11月,下诏正式设置新疆省。左宗棠的意见,对清政府的最终决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新疆建省,是自秦始皇废分封、行郡县以来,郡县制第一次推广实行于新疆地区,从根本上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管治。其重大历史意义在于,一是削弱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影响,遏制了其分裂势头,巩固了中央政权在新疆的统治地位;二是有效遏制了沙俄对我国西北边疆的侵略和扩张,保障了西北边疆的稳定与安全;三是加强了新疆与内地的联系,以及新疆各族人民的友好交往和民族团结,促进了新疆的开发和发展。左宗棠作为新疆建省的倡导者、推动者、设计者和奠基者,其功绩永垂史册。



刘铭传《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节选)

题引:刘铭传(1836~1896年),清末淮军将领,字省三,安徽合肥人,累官至总兵、提督,后出任首任台湾巡抚。光绪六年(1880年),刘铭传上书建议发展铁路,以加强国防。奏折全文见《刘壮肃公奏议》卷三。

【原文】

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①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以及行旅、厘捐者,不可殫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中国幅员辽阔,北边绵亘万里,毗连俄界;通商各海口,又与中国共之。画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驱,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而至;虽百万之众,一呼而集。无征调仓皇之虑,无转输艰阻之虞。且兵合则强,兵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之,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各省兵饷,主于各省督抚,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征饷调兵,无力承应。虽诏书切责,无济缓急。若铁路造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节饷裁兵,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方今国计绌于防边,民生困于厘卡。各国通商,争夺权利,财赋日竭,后患方殷。如有铁路,收费足以养兵,则厘卡可以酌裁,并无洋票通行之病。裕国便民之道,无逾于此。且俄人所以挟我,日本所以轻我者,皆以中国守一隅之见,畏难苟安,不能奋兴。若一旦下造铁路之诏,显露自强之机,则声势立振,彼族闻之必先震骇^②,不独俄约易成,日本窥伺之心亦可从此潜消矣。

① 机括:治事的权柄,这里为关键、要害之意。

② 骇(zhe,音哲):惧怕、震慑。



【译文】

自强的办法,在于操练军队、制造军械,这些固然需要逐渐施行,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应当加紧建造铁路。修造铁路对于漕运、赈灾、商业、矿业以及旅行、收厘纳捐,都有说不尽的好处。从用兵作战角度来看,尤其应当加紧修造,不能再拖延了。中国幅员辽阔,北面边界绵延万里,与俄国接壤;而通商的各海口,又是两国共同管理。如果在划定的疆域上派军驻守,就会防不胜防;如果有事则派兵,无事则撤兵,就会鞭长莫及。只有开通铁路,东西南北才能联结起来,这样就可以根据敌人的指向之处,相机做出反应。即使万里之遥,数日可达;百万之众,瞬间可以集结。没有仓促征调的忧虑,他不必担心物资运输艰难。而且兵力集中实力就会强大,兵力分散军力就会弱小。就中国十八省来说,兵员不是不多,军饷不是不充足,但各省士兵、军饷,由各省督抚掌握,彼此所管地域分得很清楚,各有自己的打算。一旦遇有战事,自顾不暇,要求征收其军饷调拨其军队,更是无力承担应从。即使下诏严加责备,也无济于事。如果铁路修成,那么各省就会联成一气,彼此贯通,通过节省军饷,裁撤冗员,练成劲旅,这样防边、防海,运输枪炮,可以朝发夕至。常驻的军队,可以变为机动的军队。十八省的兵力合成一气,那么一个士兵的功用可以抵得上十几个士兵。将来的调兵之权、发饷之权全部收归朝廷,形成了内重外轻的局面,就不会被疆臣所牵制了。现在国家支出因防边而不足,百姓也因厘卡而困顿。各国为与我国通商,争夺权利,致使我国财赋日益衰竭,后患正趋于加深。如果有了铁路,从中收取的费用足以用来养兵,那么厘税的关卡就可以酌情减少,并且不会有洋票通行的弊端。使国家富裕百姓便利的办法,莫过于此。况且俄国之所以会要挟我国,日本之所以会轻视我国,都是因为我们固守一隅之见,害怕困难而苟且偷安,不能奋发图强。如果一旦下了修造铁路的诏书,显示中国自强的决心,那么中国的声威就会振起,西方列强知道了必然就会首先受到威慑,不单与俄订立合约容易成功,日本对我国的野心也会从此悄悄消失的。

【评析】

铁路问世于19世纪初期,作为近代最先进的运输工具,它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运输方式,加速了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进程。19世纪中期西方殖民势力



进入中国后,为提高商品的运输能力,1863年在华的27家洋行提出要在中国修筑铁路。这是在中国修筑铁路的最早动议。但在旧观念占统治地位的清朝内部,对于铁路普遍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如认为铁路“占人田业,毁人庐墓,沿途骚扰,苦累无穷。而此路一开,遂专为外国火车独行之路,中国车马既难与之并驾齐驱,更不堪其横冲直撞,势将断绝往来,商民交困”^①。即使是向来以趋新自诩的李鸿章,也一度认为铺设铁路,“有大利于彼,有大害于我”^②。

19世纪70年代,随着官办工业的发展和扩大,人们对铁路的认识也不断深入。1878年开平矿务局成立,总办唐廷枢禀请李鸿章从唐山修筑一条至胥各庄的轻便铁路,用来运煤。李鸿章专折具奏,获清廷批准。唐胥铁路的建设,使得清政府对于铁路的作用有了更多直观的感受,部分较为开明的大臣开始认识到铁路与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密切关系,因而反对修造铁路的态度逐渐松动。1880年,中俄伊犁交涉局势紧张,俄国出动陆海军进行威胁。清廷急召赋闲在家的刘铭传进京议事。12月刘铭传应诏入京后,趁机上了本篇奏折。

在此折中,刘铭传陈述了列强修造铁路的情况,着重从巩固国防的角度,阐述了修造铁路对于中国军事、经济、民政诸方面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并提出了初步的规划。他认为铁路一旦修成,就会使各省联成一气,部队可以通过铁路快速集结,提高部队的机动能力和补给能力。同时,修筑铁路亦能展示中国反对外敌入侵的坚强决心,这将对俄、日两个对中国存在野心的国家产生很大的威慑作用。刘铭传是清政府中最早提出修建铁路的建议和规划的官员,这篇奏折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专门论述铁路重要性的文件,但它并不局限于铁路运输的本身来谈问题,而是将铁路作用提升到国防战略的高度来加以认识,认为铁路的兴建与否,关乎国防的长远发展和军队战斗力的提升。应当说刘铭传的这一认识是相当深刻的。

此折一出,立即在清廷内部引发了一场关于是否兴办铁路的争论。李鸿章也急上四千言奏折,论及铁路有9大好处,称兴修铁路在中国势在必行,对刘铭传的主张予以支持。但以内阁学士张家骥、道政使司参议刘锡鸿等为代

① 《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0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三。



表的守旧官员群起反对,最终清廷以反对声音太多为由诏罢刘铭传所议,结束了这次争论。尽管刘铭传的主张未被清廷采纳,但此折所引发的争论却使清廷内部对修筑铁路问题的分歧公开化和具体化,对朝野的思想观念产生了一次大震动,为清廷后来转变态度,制定兴修铁路的政策打下了基础。



张之洞《选募新军创练洋操折》(节选)

题引:张之洞(1837~1909年),清末洋务派领袖,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等职。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署理两江总督期间上奏此折,建议仿照西法编练一支新式陆军。全文见《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四十。

【原文】

窃臣前因海氛^①粗定,愤兵事之不振,由翎习之太深,非认真仿照西法,急练劲旅,不足以为御侮之资。……

查今日练兵必须改用洋操者,其故有七:承平之时,绿营有积习,军兴以后,勇营^②亦有积习,人皆乌合,来去无恒,不练固无用,练成亦不能禁其四散。徒劳无功,一也。里居^③不确,良莠难分,二也。无论征军、防军,从不缺额之事,即其实有之勇,亦多系安置闲人,令当杂差,则虽不缺额亦与缺额同,三也。层层刻扣,种种摊派,长夫^④视为津帖,营官皆有例献,将拥厚资,士不宿饱,四也。外洋新式快枪快炮,精巧非常,旧日将领大率不解,亦不爱惜,粗疏者任意抛掷,动致损坏,谨慎者收藏不用,听其锈涩,其于擦拭、拆卸、装配、修理、测准诸事,全不讲求。将弁不知,何论兵勇?操练不能,何论临阵?五也。营垒器用,但守旧法,绘图、测量、行军、水陆工程诸事,尤所不习,讨内匪则可,御外侮则不能,六也。营官、统领,专讲应酬,奢华佚惰,用费繁多,营谋请托,无所不有,既视为营私谋利之路,岂尚有练兵报国之心?七也。

① 海氛:此处指甲午战争。氛,祸端。

② 勇营:清末一种军事制度。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曾国藩在湖南募团丁为官勇,订营哨之制,粮饷取自公家,称湘勇或湘军。之后又有仿湘军制度建立的淮军和各省勇营,并取代八旗、绿营,成为晚清国防力量的主体。

③ 里居:居住地、籍贯。

④ 长夫:部队中长期征用的民夫。



惟有改以洋将带之,则诸弊悉除。无论将来临敌之效若何,总之,额必足,人必壮,饷必裕,军火必多,技艺必娴熟,勇丁必不当杂差,将领必不能滥充,此七者,军之体也。至于临阵调度运用之妙,赏罚激励之方,军之用也。凡事必其体先立,然后其用可得而言。

【译文】

我上奏是因之前的海上祸端虽已基本平定,但却为军事不能振作而愤懑,之所以军事不振是因为传统习惯的影响太深,除非认真仿照西法,加紧编练一支劲旅,否则现在的军队根本无法担负起防敌御侮的责任。……

考查现在练兵必须要改用洋操的原因,有七个:太平时期,绿营积习渐生,战争时期,勇营也渐生积习,营众大多乌合之众,或来或走没有约束,这样的军队不进行操练当然没有用,即使操练了也无法约束管理。徒劳无功,这是其一。士兵家住哪里无法确定,素质怎样也无法辨别,这是其二。无论出征的军队还是驻防军队,从没有满员的时候,就是实际在位的士兵,也多是安置为闲人,充任杂差,所以这样的军队即使不缺额,实际情况也和缺额差不多,这是其三。军饷被层层克扣,摊派种类很多,将长夫费用当作津贴,营官都有明确的进献款项,当官的拥有很多钱财,普通士兵却吃不饱肚子,这是其四。外国的新式快枪快炮,非常精巧,但思想陈旧的将领大都并不了解,也不加爱惜,粗心马虎的人会随意丢弃,往往导致损坏,仔细小心的将枪炮收藏起来,任其锈蚀,对于擦拭、拆卸、装配、修理和测准这些事情,从来不管不问,军官都不了解,更不要说士兵了。平时操练都做不好,又怎能谈得上临阵作战呢?这是其五。营垒建造和枪械的使用,依旧使用过去的老办法,绘图、测量、行军、水陆工程等技术,更是不通,这样的军队镇压国内盗匪还可以,抵御外来侵略就不行了,这是其六。营官、统领专门讲究应酬,生活骄奢淫逸,花费繁多,各种营私舞弊行为,样样都有,既然把当官看作谋取私利的途径,还怎么会有练兵报国的雄心呢?这是其七。只有聘任洋人教官来管理军队,种种很多弊端才会得到清除。不管以后军队临敌效果怎样,总之,军队一定要兵额不缺,将士一定要身体强壮,军饷一定要丰裕,武器一定要充足,士兵一定要技艺娴熟,勇丁一定不能承担杂差,将领一定不能滥竽充数,这七点,是军队的根本。至于临阵调度运用巧妙,赏罚激励有方,那就是军队运用的事了。凡事都是根本先得以确立,然后才谈得上其运用的事。



【评析】

清代仿照西法编练军队,最早始于李鸿章的淮军。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淮军开始装备西方较为先进的武器,同时雇用西方军队将领按照西式操典进行训练。但是,在最能体现近代化军队特征的编制体制上,淮军却仍旧沿袭湘军的营伍之制,而未将西方的军师旅团制引入进来。因此,尽管淮军配备了西式的武器装备,但它并不是一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军队。由于淮军在编制与训练、管理上彼此脱节,不能真正做到人与武器的紧密结合,因而战斗力低下,这在甲午战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战争期间,淮军在陆战中一再失利,使清政府内部针对淮军营制弊端的批评日见增多,认为“湘淮将领,多不服西法,虽亦购其枪炮,习其操阵,仅学皮毛,不求精奥”^①。这样就使变更传统的军队编制体制及训练方法,全面仿照西法训练新式军队渐成朝野共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两江总督刘坤一奉调北上指挥对日作战,张之洞受命代理两江总督之职。在巡视两江各地驻防清军的过程中,张之洞切身感受到绿营、勇营的种种腐败已不堪改造。因此上奏此折,提出仿照西法编练一支新式陆军的建议。

在这篇奏折中,张之洞从军队员额、军饷、训练等7个方面对绿营、勇营的弊端进行了归纳,分析相当透彻。他认为,造成军队弊端丛生、战斗力很差的原因,除了积习难改外,对于西方训练和管理之法认识的缺乏,以及军官自身素质低下也是重要因素。因而要消除这些弊端,必须抛弃旧的选将练兵之法,而完全仿照西法进行教练。同时,张之洞还大胆地提出选用西方军官来主导军队的训练和管理,以中国优秀的武将充任副手,并大批招募武备学堂学生充任哨官。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通过观摩学习,提高中国军官的素质,掌握西方的训练和管理手段,以便为日后扩大新军训练规模储备人才。为防止洋将操控兵权,张之洞在此折中提出,“带兵操练之权,悉以委之洋将弁,而约束惩戒之权,则专归华官”,一旦军队训练完成,军队由中国副手接管。

自甲午战争失败后,内忧外患的加剧,国家安全上面临的空前威胁,促使清政府不得不下决心对军事制度实行重大改革。张之洞的建议适逢其时,正合其意,因此所奏很快获得了清廷的批准。一年后,经张之洞一手创建、按德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十三,故宫博物院,1932年版。



国营制操练的自强军在江宁(今南京)成军,全军 2500 余人,分为步、马、炮队共 11 营。自强军与同一时期袁世凯在北方编练的新建陆军,成为中国两支最早的近代化部队,对于推动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了一定作用。



郑观应论以商立国

题引：郑观应(1842~1922年)，近代维新思想家、实业家。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今中山)人，著有《易言》、《盛世危言》等书，主张“振兴商务”、“以商立国”。本文选自《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卷三《商务三》。

【原文】

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农之利，本也，商之利，末也。此尽人而能言之也。古之时，小民各安生业，老死不相往来，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也不然，各国并兼，各图利己，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①往来，皆为通商而设。英之君臣又以商务开疆拓土，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通中国，皆商人为之先导。彼不思我之练兵讲武，特患我之夺其利权。凡致力于商务者，在所必争。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

查英国设商部专理其事，于商务讲求最精，故收效亦最巨。法、美踵其迹，而亦步亦趋，均致富强。……然各国工力悉敌，出入损益，厥势维均，则不得不以亚洲各国为取财之地，牟利之场，此亦必然之势也。……

日本初亦受其腹削^②，至大藏省^③尽余纸钞，金银日稀，国势已形岌岌。厥后其大臣游历各国而归，窥见利病之故，乃下令国中，大为振作，讲求商务，臣民交奋。学西洋之制造，以抵御来源；仿中国之土货，以畅销各国。表里图利，而国势日兴。纸钞悉数收回，府库金银充溢，此日本近日通商之实效也。日本既避通商之害，反受通商之益。于是亚洲大国受其害者，惟中国而已。

① 聘问：中国古代(主要是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相互通问修好，这是当时各国邦交活动中一项重要的礼仪。

② 腹(juan，音捐)削：剥削。

③ 大藏省：日本从近代开始设立的主管全国财政、金融、税收的最高行政机关。



【译文】

中国以农业立国,而西洋各国则以商业立国。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商业是国家的枝叶,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在古时候,人们各安其业,老死不相往来,所以只有谷物和布匹的交换。现在不同了,各国互相兼并,谋取自己私利,借助商业以增强国力,借助军队以保卫商业。彼此间订盟立约,外交往来,都是以通商为目标的。英国的君臣又是通过商业活动而得以开拓疆土,开辟美洲,占领印度,据占缅甸,与中国通商,都是商人为其先导。对方不害怕我国练兵讲武,而特别担心我国争夺其商业利益。因此凡是致力于商业者,都处处加以争夺。由此可知要想制服洋人而得以自强,没有比得上振兴商业的了。怎么能说商业是细枝末节呢?……

经查核英国设置了商部专门管理商务之事,在致力于商务方面最有水平,因此收效也最大。法国、美国跟随其后,事事加以模仿,都走上富强之路。……然而各国技术能力及国力都完全差不多,收支增损,势必要讲究均衡,于是不得不以亚洲各国为捞取财富的地方,牟取利益的场所,这也是必然的趋势。……

日本起初也受他们的剥削,以至大藏省只剩下纸币,金银日益稀少,国势已岌岌可危。后来其国大臣游历世界各国回来,找到了导致国家受利与受害的原因,于是下令全国,大加振作,重视发展商业,全民发奋。学习西方的制造技术,以抵御外国货;仿制中国的土特产品,以畅销世界各国。里里外外都在谋取商业利益,国势因而日益兴盛。纸币全部收回,国库中金银充足,这是日本近年来通商的实际效果。日本不仅避免了通商之害,反而从中获取了好处。这种情况下在亚洲大国中受通商之害的,就只有中国了。

【评析】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一直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传统农业国家。鸦片战争之后,虽然资本主义工商业有所发展,但作用微乎其微。农本商末、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在人们特别是上层势力的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这种思想对业已萌芽的商品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阻碍作用,使得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举步维艰,即使是打出“自强求富”旗号、以官督商办为主要形式的洋务运动,亦是如此。

19世纪70~90年代间,一批改良思想家在思考西方国家强大的原因时,逐渐认识到商业对振兴经济进而富国强兵的特殊作用。著名的改革派代表人物薛福成认为,“欧洲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藉于商”^①。马建忠亦指出“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②。郑观应在吸收这些观点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商为国之本的“重商论”,并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战略思想,主张通过“振兴商务”、“以商立国”,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以抵制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维护民族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这些观点和主张,集中体现在其所著的《盛世危言》一书中。

郑观应认为以农为本是古代社会的特点,现代社会是以商为本、以商富国的。他通过对英、法、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日本走上富强之路的分析,强调指出了“振兴商务”、“以商立国”的重要性。他以历史的发展眼光,尖锐地批判了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和政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只重视农业而轻视商业。只有发展商业,以商立国,才是中国与西方列强相抗衡的出路所在。他在《商战》一文中,更明确指出:“故兵之并吞祸之易觉,商之培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认为要改变近代中国的落后局面,仅仅采取“强兵”政策,依靠军事力量与西方列强竞争是远远不够的;学习西方,不能只热衷于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不遗余力讲求“兵战”,而应把“商战”放在首位。所以他说,“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因为有形的“兵战”只能治标,而无形的“商战”却能治本^③。

在分析中国商业不发展的原因时,郑观应认为政府和商户自身都存在弊端,而要想商业健康发展必须先清除这些弊端。他对晚清“官办商”这种形式进行了批判,认为官督商办是名为保商实则剥商;而商户的自私自利也是阻碍商业发展,使中国商务不能振兴的重要原因。为解决这些弊端,郑观应要求清政府采取“护商而不病商”的政策,除此而外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发展商业、实施“商战”的具体办法和措施。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和策略就当时的历史现实来说,许多地方带有过于

① 《筹洋刍议·变法》,见《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7页。

② 《适可斋纪言纪行·富民说》。

③ 《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卷三。



理想化的色彩,难以实现。但其思想的核心是富强救国,以推动工商业的发展来捍卫民族的经济利益,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最终将贫弱的中国变成富强的中国,这一点是应当肯定的。

世界进入 21 世纪初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得国家安全的内涵也随之出现了新的变化。国家经济利益和国家经济竞争力逐渐上升至国家安全的优先位置,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利益的核心。没有经济上的安全和保障,经济利益受到打击与侵害,经济实力受到削弱,维护国家的军事安全及其他安全也无从谈起。因此,谋求经济力量的增长和掌握经济主导权,日益成为大国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时着力把握的方向和追求的目标。从这个角度,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无疑具有启迪意义。



严复《拟上皇帝书》(节选)

题引:严复(1854~1921年),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福建侯官(今闽侯)人,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1898年初清廷朝野提倡维新变法之时,严复在《国闻报》上发表此文,阐述自己的思想。全文见《严复集》第一册。

【原文】

盖古今谋国救时之道,其所轻重缓急者,综而论之,不外标、本两言而已。标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夫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势亟^①,则不能不先事其标;势缓,则可以深维其本。盖使势亟而不先事标,将立见覆亡,本于何有?顾标必不能徒立也。使其本大坏,则标匪所附,虽力治标,亦终无动。是故标、本为治,不可偏废,非至明达于二者之间,权衡至审而节次图之,固不可耳。……

迨岁以来,朝野之间,其言变法以图自强者,亦不少矣。或云固圉为急矣,则请练陆营而更立海军;或云理财最要矣,则请造铁路、开各矿而设官银号;又以事事雇用洋人之不便也,则议广开学馆以培植人才。大抵皆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夫国家岁入之度支有限,而新政之日增无穷,新旧并存,理自竭蹶。臣闻为政之道,除旧布新,相因为用者也。譬如病痞之夫,欲求强健,良医临证用药,必将补泻兼施,夫而后积邪去而元气苏,徐收滋补之效。使其执不可攻削,恐伤病人之说,而专补不泻,日进参蓍^②,则虽所费多金,以求良药,恐痞疾终不可愈,积邪日以益坚,而大命之倾将无日矣。陛下试观今日诸臣所为,何以异此?故臣窃谓前者诸事,以治标而论,则事势太

① 亟:紧急、急迫。

② 参蓍(shi,音诗):参,即人参。蓍,古时用于占卜的草,可入药。中医往往将两者合用以滋补。



逼,恐无救于危亡;以治本而言,则积习未祛,亦无益于贫弱。其事诚皆各国所以富强之具,今日所不可不图,第为之而不得其序,则远之有资敌之忧,近之有糜财之患,而于自强之实,去之尚遥。

【译文】

古今谋划国家挽救时局的道理,按轻重缓急综合起来而言,不外乎“标”和“本”。所谓“标”,主要集中在于理财、整顿武备、选择友邦、搞好睦邻友好;而“本”是存在于修明政治、培养人才、社会风气及人心是否统一等因素里。如果形势紧迫,就不能不先解决好“标”的问题;如果形势趋缓,则可以扎实地解决好“本”的问题。如果形势紧迫而不先解决标的问题,就有可能迅速覆亡,那本还能存在吗?所以“标”一定不可能单独存在。如果“本”已经被破坏了,那么“标”就无所依附,即使再努力治“标”,也不会发生改变。所以既要治标也要治本,两者不能偏废,除非深入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努力地权衡审查,依次筹划,否则是难于做到既治标也治本。……

近几年来,朝野之间讨论变法,力图自强的人也并不少。有的说要想巩固国防最要紧的应当加紧操练陆军,而且要设立海军;有的说理财最要紧,请求建造铁路、开矿山并且设立国家银行;又因事事都要雇佣外国人很不方便,便提议广泛设立学校以培养人才。这些认识大体上都是要增加新的事物,而从没有一个人说要改变旧的制度的。国家每年的收入有限,而实行新政所需的费用又日益增加没有穷尽,新旧并存,自然导致财竭。我听说为政之道,在于除旧布新,根据情况互相交替运用。就像生病的人想强健身体,好的医生用药总是会将补药与泻药同时施用,将身体里积聚的邪气去除了,元气才会得以复苏,慢慢收到滋补的效果。如果坚持认为不能使用泻药,担心会伤害到病人,每天只服参茸等补药,那么尽管为求好药花费不少,恐怕疾病也不会得到痊愈,体内堆积的邪气反而会日益深厚顽固,距离死也就没多少时日了。陛下看看现在大臣们所做的一切,与这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所说的前面的这些事,以治标而论,那么就进行得太过猛烈,恐怕对于救亡图存于事无补;以治本而论,那么旧的东西还没有去除干净,也对改变贫弱局面没有帮助。这些改革的事情确实是各国富强所必需的,现在不能不想办法去做,只是如果做的不分主次先后,那么从长远来说恐怕对敌人有利,就近而言是浪费财力,而距离自强的目标,反而越来越远。



【评析】

在清末“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急于选拔新政人才,时有贵州学政严修建议,除八股取士普通科外,另设特别进士科——经济特科,作为选拔人才的途径。严复经考试后,由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直接向光绪帝推荐,并请量才使用。严复遂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自己在《国闻报》发表的《拟上皇帝书》加以修缮,送呈光绪帝。

在篇文章中,严复提出了变革的“标”和“本”的概念。他将晚清政府办洋务、经武备、谋外交视为治“标”,而将政治改革、培养人才、转变社会风气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等社会全面进步作为自强之“本”。严复认为,自强是为了拯救国家危亡,要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必须“标”、“本”兼治。

晚清政府从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直到洋务运动,历经几十年努力,试图通过学习、引进西方近代军事技术以增强军事实力,巩固国防,保障国家安全,最终却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归于惨败,前功尽弃。这不能不引起国人对晚清自强道路的反思。具有较宽阔视野的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晚清变革的根本缺陷是治“标”不治“本”。严复的这篇文章,是当时较为尖锐的分析。但他们也都没有开出一付切实管用的治“本”药方,这个任务,最终是由无数志士仁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的伟大革命来完成的。



梁启超《论尚武》(节选)

题引:梁启超(1873~1929年),近代思想家。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1898年参与戊戌百日维新,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在此期间主张通过培养国民的尚武精神使国家自立自强。本文选自《梁启超全集》第三卷《新民说》。

【原文】

世人之恒言曰:野蛮人尚力,文明人尚智。呜呼!此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之言,迂偏而不切于事势者也。罗马文化,灿烁大地,车辙马迹,蹂躏全欧,乃一遇日耳曼森林中之蛮族,遂踣蹶^①而不能自立,而帝国于以解网。夫当日罗马之智识程度,岂不高出于蛮族万万哉?然柔弱之文明,卒不能抵野蛮之武力。然则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卑斯麦^②之言曰:天下所可恃者非公法,黑铁而已,赤血而已。宁独公法之无足恃,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众民,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

夫人之所以为生,国之所以能立,莫不视其自主之权。然其自主权之所以保全,则莫不恃自卫权为之后盾。人以恶声加我,我能以恶声返之,人以强力凌我,我能以强力抗之,此所以能排御外侮,屹然自立于群虎耽耽、万鬼睒睒^③之场也。然返人恶声,抗人强力,必非援据公法、樽俎折冲^④之所能为功,必内有坚强之武力,然后能行用自卫之实权。我以病夫闻于世界,手足瘫痪,

① 踣(bó,音勃)蹶:跌倒、颠覆。

② 卑斯麦:现通常作俾斯麦(1815~1898年),19世纪中后期普鲁士及德意志帝国宰相。以实行强权和武力的“铁血政策”而闻名,被称为“铁血宰相”。

③ 睒(shàn,音闪)睒:眼光闪烁的样子。

④ 樽俎折冲:不以武力而在宴会交谈、外交谈判中制胜对方。折冲,使敌人战车后撤,击退敌人之意。



已尽失防护之机能,东西诸国,莫不磨刀霍霍,内向而鱼肉我矣。我不速拔文弱之恶根,一雪不武之积耻,二十世纪竞争之场,宁复有支那^①人种立足之地哉!……

今日群盗入室,白刃环门,我不一易其文弱之旧习,奋其勇力,以固其国防,则立羸羊于群虎之间,更何术以免其吞噬也!呜呼!甲午以来,一败再败,形见势绌,外人咸以无战斗力轻我矣。然语不云乎:一人致死,万夫莫当。彼十九世纪之初期,法兰西何尝不以一国而受全欧之敌,然拿破仑^②率其剽悍之国民,东征西击,卒能取威定霸,奋扬国威。彼四十余万之法人,乃蹴踏^③全欧;我以十倍法人之民族,顾不能攘外而立国,何衰惫若斯之甚也?《诗》曰:“天之方蹶,无为夸毗。”^④柔脆无骨之人,岂能一日立于天演之界^⑤?我国民纵阙于文明之智识,奈何并野蛮之武力而亦同此消乏也?呜呼噫嘻!

【译文】

现在人们总是说:野蛮人崇尚武力,文明人崇尚智谋。唉!说这些的人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而且迂腐偏颇不切于实际。罗马文化,多么辉煌灿烂,铁骑更是踏遍了整个欧洲,然而一遇到日耳曼森林中的野蛮民族,就被颠覆而不能再振起,而罗马帝国也因此而土崩瓦解。当时罗马帝国的知识水平,难道不高于野蛮民族无数倍?然而柔弱的文明,却最终抵御不了野蛮民族的武力。崇尚武力是国民的思想根基,国家依赖武力才得以自立,文明依赖武力才得以维持。俾斯麦说过:天下所能够凭藉的不是公法,只是黑铁和赤血罢了。如果主政者没有尚武的国民,没有铁血主义,不但公法不足以依恃,即使有文明,有知识,有广大的民众,有广阔的疆土,也一定不会自立于竞争激烈的舞台之上。……

① 支那:即中国。

② 拿破仑(1769~1821年):即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一世),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以善于指挥作战著称,曾多次击败反法联盟,成为欧洲霸主。

③ 蹴踏:践踏。

④ 天之方蹶,无为夸毗:《诗经》原句为“天之方蹶,无为夸毗。”蹶(qi,音奇),愤怒。夸毗,屈己卑身以讨好。全句意思是上天正在发怒,不要做卑躬屈膝的事。

⑤ 天演之界:即指世界。严复所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中,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生物界包括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人之所以能够生存,国家之所以能够建立,都是以自主之权作为前提的。然而这种自主权得以保全,没有不依赖于自卫权作为后盾。有人诋毁我,我能反唇相讥;有人以武力欺侮我,我能够以武力还击,只有这样才能抗拒外侮,屹立于你争我夺、你死我活的竞争世界。然而反唇相讥,反击别人,要依据公法、通过谈判不一定能达到目的,必须具备了坚强的实力,才能有使用自卫的实际权力。我国以东亚病夫形象闻名于世,就像手足瘫痪的病人,已经彻底失去自我防护的能力,东西方列强,无不朝我国磨刀霍霍当作鱼肉宰割的。如果我国不能迅速拔除文弱的恶根,洗清长久以来武力不强的耻辱,那么二十世纪的竞争舞台上,那里会有中国人的立足之地!……

现在西方列强像一群盗贼一样已经闯入我们的家门口,四周都面临武力的威胁,如果我国不一改文弱的老样子,勇猛发奋,以巩固国防,那结果就像羊羔置于虎群当中,还有什么办法能免被吞噬呢?唉!甲午战争以来,我国一再失败,形势越来越窘迫,外国人都以我国没有战斗力而加以轻视。然而不是有种说法吗:一个人有必死的勇气和决心,一万个人也挡不住。十九世纪初期,法兰西何尝不是被全欧国家视为敌人,然而拿破仑却能率领其剽悍的法军,东征西击,最终取得威名称霸欧洲,奋扬了国威。法国能以四十多万人就踏遍整个欧洲,而我国人多过法国人十倍,却不能驱逐外敌而使国家自立,为什么衰弱到如此厉害呢?《诗经》上说:“上天正在发怒,不要屈己卑身以讨好别人。”软弱没有骨头的人,怎能存在于世界上哪怕一天呢?我国国民纵然缺少智识和文明,怎么连带最原始野蛮的武力也一同消失了呢?

【评析】

中国近代自鸦片战争始,不少忧国忧民之士就呼吁整军经武,加强国防。林则徐、魏源等人从抵御外侮的角度提出了革新武备的思想和主张。继之而起的洋务派领袖们则着眼于消除内患和外抗强敌以达到长治久安,开始关注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的革新。但是,甲午战争中清军的惨败,以铁的事实和血的教训向人们明白地宣示,拥有近代化的军事装备并不等于就拥有了一支近代化军事力量。事实上,要实现军事领域的近代化,真正有能力保障国家的安全,除却技术、装备的革新外,还应当有军事思想和军事体制的变革,还应当关注军人精神的塑造和全体国民尚武精神的养成。从一定意义上说,精神层面的近代化是器物 and 制度层面近代化的深入和发展,是决定军事近代化



是否成功的一个关键。对于这一点,清末的思想家们只是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逐步认识到。最早推动这一思想传播的是一批留日学者和学生,其中尤以梁启超的影响为最大。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日本期间,他对这个正处于上升阶段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有了更多直观的感受,亲眼目睹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的变化,这引发了他对民族精神与国家发展之间关系的思考。他认为日本立国维新、雄立于东洋之上,日本民族的尚武精神是一个重要因素。故此,梁启超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祈战死》、《中国魂安在乎》、《中国积弱溯源论》以及《斯巴达小志》等一系列宣扬尚武精神的文章。在这批文章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这篇《论尚武》。

文章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普遍存在贱武尚文的社会心理,这是造成中华民族尚武精神缺失的主要原因。由此而带来的后果是民族的怯懦以及畏死的性格,并形成无魂之兵、无魂之国的局面。国家就像是手足瘫痪的病人,没有自卫的能力。而未来国家间的竞争会越发激烈,如果不能迅速摆脱文弱的病根,确立国民的尚武精神,国家将无法立足于世界。文章认为,要培养国民的尚武精神,应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心力,即国人应自以为强而不能自以为弱;二是胆力,即排除畏惧心理;三是体力,即造就强健的体魄。

梁启超振聋发聩的大声疾呼,对腐朽无能、江河日下的晚清政府没有起到作用,却对后来投身中国革命洪流的进步青年产生了巨大影响。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E5NDk3MDQuemlw",
  "filename_decoded": "11949704.zip",
  "filesize": 40868926,
  "md5": "b59981f87f6de104792eeeb4aa3794f9",
  "header_md5": "c4168a52369ea1c2a6a866bc076555dc",
  "sha1": "ff0633912758ef2f10c106b721f92e0103b6433a",
  "sha256": "9c4391b05fcab53cd7bc04a980de6267f191ed50e36360d469955deb4a003447",
  "crc32": 3241366984,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42081721,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533,
  "pdg_main_pages_max": 533,
  "total_pages": 557,
  "total_pixels": 3079655232,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